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4

## 宋辽西夏金元卷

李致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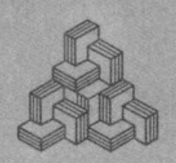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4

宋辽西夏金元卷

李致忠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李致忠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68-1786-8

Ⅰ．中…　Ⅱ．李…　Ⅲ．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辽宋金元时代③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西夏（1038～1227）　Ⅳ．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915号

责任编辑／柳　华
责任印制／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正文印张／36.5　彩页印张 0.25
字　　数／528千字
版　　次／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4.00元

# 第一章　宋代出版事业勃兴的社会背景

宋代是我国出版事业发展史上勃兴的时代，也是黄金时代。两宋319年间，出版规模之大，出版图书数量之多，刊印之精，流通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两宋的出版事业究竟为什么会达到如此发达的程度，这要从两宋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风尚、军事形势、社会与民族矛盾等诸方面去寻找原因，从而总结出出版事业在两宋达到空前发展并十分出色的客观规律。

## 第一节　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

公元960年元旦，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一夜之间黄袍加身，推翻了五代后周政权，建立了赵宋王朝。

赵宋王朝建立政权之后，接受的是一个经过半个多世纪战乱纷争、生产破坏、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烂摊子。刚刚诞生的赵宋王朝，要想在这种流沙一样的基础上稳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和适当的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全国统一的政权。

自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直到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五代十国割据局面，中国一直处在战争连年、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其中重

要原因就是地方藩镇的权力过于集中。他们不但各自掌握着雄厚的军事力量，而且掌握着各个地方的政权、财权和司法等权。所以早在唐朝中叶以后，地方藩镇实际早已形成割据势力。五代十国的出现，实际就是这种藩镇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赵匡胤不但清楚这些历史，而且他自己也恰恰是依靠所掌握的精锐禁军，用军事政变的方式为自己夺得了政权，所以他深知掌握军权的重要和军权旁落的威胁。因此，在他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赵宋王朝之后，首先就是夺取中央禁军的指挥权和削弱地方节度使的军权、政权和财权。

后周的中央禁军统归殿前都点检指挥和调遣。宋朝建立以后，首先分散禁军的统辖权，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三司分别统辖。而三司又只能在平时对禁军实行管理和训练，没有调遣权。调遣权归枢密院领属，而枢密院则任用文人而知兵者，并且由皇帝直接指挥。所以对中央禁军统辖权的分散，实质是为了皇帝更高度的集中。这就给任用文人，以文抑武政策的确立与实施开辟了道路。

在中央集中权力的同时，就是削弱各地方节度使的特权。唐、五代时的地方节度使，兼领数州，地方上的军、政、财、文、司法等大权，统归节度使节制，形成了实际上的地方独立政权。这是出现唐末至五代割据自立的重要原因。宋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全国的统一，虽然在表面上仍然保留着节度使的名号，实际只不过是个空衔。也就是说，宋朝各地方虽然还设有节度使，但各地方的州、县长官却都由朝廷派遣文人去充任，不再听节度使的支配，这样就把地方政权从节度使手中夺了过来。同时朝廷还派遣文人到各州、县，充当通判，监督地方长官，并与地方长官共同掌管地方行政事务。派遣文人充任监当使臣，到地方掌管各州、县的财政与税收。又增设转运使和转运通判，负责把各地的税收、财物运往中央。这样一来，就把唐末、五代以来军、政、财等大权统归节度使掌管的局面一分为三，而又通过朝廷派遣的州县长官、通判、监当使臣、转运使、转运通

判，互相监督，互相牵制，最后再达到三者合一，统归朝廷，集权中央。

宋王朝建立政权之后，围绕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所采取的这一系列重大措施，引起了用人路线的重大变化。宋太祖曾对他的近臣赵普说过，我现在用儒臣分治各藩，纵使一百个儒臣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一个武将作乱后果严重。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宋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就逐渐用文臣代替了武将，即便是在军队中也多用文人而知兵者。这种因政治变革所引起的任人路线的重大变化，不但带动了习文的社会风气，而且又引起科举制度的相应变化。

科举制度在隋唐早已实行。但唐代的科举多被门阀贵族所操纵，寒门出身的人考中并为官者甚少。唐末农民大起义，有力地打击了这种门阀制度。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这种门阀制度难以恢复、继续和发展。到了北宋，一方面继续摧毁这种门阀制度的残余和习惯势力，一方面使科举更加广泛地向文人开放。只要文章合格，不论门第高低，出身贵贱，均可录取。录取之后即可量材推官，使之成为宋王朝封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国家统一的维护者。并且从宋太祖时候起，逐渐加强科举取士。两宋前后共历319年，科举考试，包括恩科，一共举行130榜，平均每2.4年就开科一次。并且每科取士一次比一次多。还对多次科考而久不中式者表示莫大的关心，认为他们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因而可以宽恩特赐本科出身。以后这种特赐还形成了定制，凡考试多次而不中者，都可特赐，叫做"特奏名"。宋代这种科举制度的改变，大大刺激了社会各个阶层读书应考，考取做官，做官富贵的热情，致使整个社会形成了潜心经术、倾心文章、崇尚文化的浓重气氛，这是宋代出版事业勃兴发达的重要社会背景。

"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1]。这是宋太宗对王者之道的高度概括与深刻总结，说明宋朝的最高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文武兼施的统治策略。所以宋朝自夺得政权以后，在运用武力

【1】[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三《圣学》。

征服各个尚未归服的独立王国、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对于能够教化归服各地民心、巩固国家统一的文化事业，也不遗余力地加以实施。如统一法制、编订律例，尊崇儒术，崇信佛、道教以及提倡三教一义等，北宋初期的几个皇帝就都很注意。总之，这一系列文治政策的推行，不但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促进了国家的统一，而且对出版事业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当然，要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恢复社会经济，努力发展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

唐、五代时按照门阀士族的等级占有土地和农奴的部曲制，被宋时地主只能购置田产和对佃客进行租佃剥削的租佃制所代替。宋代这种土地占有制和剥削关系的变化，虽然未从根本上改变地主剥削农民的本质，但对于唐、五代时期那种门阀士族占有土地并占有农奴的部曲制来讲，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农民则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解放和劳动生产的自由。加上宋初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改良耕作技术等，所以农业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各种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城镇建设等，也相应得到了恢复、发展并逐渐繁荣了起来。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但大大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与巩固，使社会得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同时也使其他一切事业获得了发展的经济基础，如冶炼、烧瓷、织染、造纸直至本书所要讲的出版图籍等。

除此而外，出版事业也还有其自身发展的背景和条件。如前所述，早在唐、五代时期，雕版印书技术及事业不但早已发生，而且有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酝酿和实践阶段。在唐代，今四川、浙江、淮南、福建一带早已出现了刻书出版事业。到五代时期，虽然朝代频繁更迭，十国割据并立，但刻书出版事业由于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却在这种抢攘乱离的夹缝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所有这些，不但构成了宋代出版事业勃兴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而且从雕刻工人的培养、印刷力量的积蓄、技术造诣的提高等多方面，都为宋代出版事业的兴盛和发达做了充分的准备。因

此，进入宋朝之后，当国家获得统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经济获得发展，文化需求和水平获得进一步提高的时候，出版事业便应时勃发了起来。

宋王朝的建立是靠政变一蹴而成的，但扫平中原与南方诸割据王国，建立统一的政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气力。特别是对于北方契丹人的辽、党项羌人的西夏以及后来女真人的金，宋朝政府虽多次进行尝试，想进一步完成统一的大业，但终因内部意见不一，实力不足，不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反使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始终与两宋南北对峙，并以他们的铁骑不断南下侵扰，使得宋朝赔款、割地、失主、迁都。因此，在如何对待北方的辽、西夏、金等问题上，构成了宋朝朝野尖锐的矛盾与斗争，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宋王朝制定国策的着眼点和出发点。这种民族与政治上的矛盾与斗争，反映在刻书出版事业和对出版事业的管理上，便是随着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提倡出什么书、严禁出什么书，其倾向表现得非常鲜明。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研究两宋出版史所应当注意到的问题。

## 第二节　宋代出版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宋罗壁《罗氏识遗》说："宋兴，治平（1064—1067年）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1068—1077年）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1] 罗璧，字子苍，自号默耕，新安人。生当宋末元初，乃传朱子之学者。其《识遗》十卷，盖结稿于宋亡之后。其爬梳钩索，征据旧文，颇可采信，故其所谓英宗治平以前出版禁令犹严，神宗熙宁以后此禁方弛的说法，大体可信。推其原因，盖是宋代先坐江山，后打天下，边打仗，边建国，自然诸事谨慎。至神宗，已立国百年，江山已固，又推行新法，版禁始开，为宋代此后二百余年出版事业的勃兴，营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正是在这种政策、环境都适宜的背景下，宋代在出版机构、出版规模、出版数量、出版品质等诸方

【1】[宋]罗璧：《识遗》卷一。

面，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

宋代的出版机构，按其自身的性质大体可分为官办、私营和民间集体经营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的出版目的和宗旨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在构建宋代出版网络，推动出版事业繁荣兴盛上，在客观上却有着共同的贡献。

所谓官办，是指中央各部、院、司、局，各殿、监、省、所；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司、台、库、所；各府、州、军、县学校，以及各地书院，主持或出公帑从事图籍出版业务的官方机构。这种机构，论性质多为中央官府和地方官府的行政或职能部门；而府学、州学、县学、郡斋、郡庠、学宫、頖宫、县斋、学舍，以及各地书院，则是教授作养之所，一句话，它们都不是专门的出版机构，但又都多寡深浅不同地涉足出版活动，这就大大活跃了宋代出版事业的社会气氛，为私营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示范和良好环境。

所谓私营，是指各地私宅和坊肆主持或投资从事出版业务的私家或书坊。宋代的私宅出版与坊肆出版，虽然都属于私营，但其性质与宗旨是不完全相同的。私宅出版，其投资虽也是私家所出，但目的多数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学术，并不完全以是否盈利或盈利多少为切入标准。如鹤林于氏家塾刻印出版的《春秋经传集解》，黄善夫家塾之敬室刻印出版的《史记》三家注合刻，蔡琪家塾刻印出版的《汉书集注》，蔡梦弼东塾刻印出版的《史记集解索隐》，蔡子文东塾刻印出版的《击壤集》，陈彦甫家塾刻印出版的《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廖莹中世彩堂刻印出版的《韩》《柳》集等等，均可视为宋代的私宅出版物。这些出版物通常都是校勘精审，版印精良，书品极佳。虽然这些私宅出版品也发行出售，但主要是为嘉惠学林，承传学术，赚回成本，略有盈余。与坊肆出版商以盈利为宗旨而投资刻印的出版物，是有本质区别的。尽管坊肆出版物中也不乏精品，但出版目的与私宅还是有不同的。《天禄琳琅书目·茶晏诗》谓两宋私营出版家以"赵、韩、陈、岳、廖、余、汪"七家最有名。赵者，指长沙赵淇；韩者，

指临邛韩醇；陈者，指临安解元陈起；岳者，指岳飞的孙子岳珂；廖者，指贾似道的门人廖莹中；余者，指建安万卷堂余氏；汪者，指新安汪纲。这七家私宅与坊肆相混，如陈起及万卷堂，便是典型的书铺子，是坊肆掌柜，而不是私宅主人。但不管怎么说，作为私营出版家，这两股力量都是不可忽视的。

据现存宋版书的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私宅、坊肆出版家就有105家。其中如刘日新宅的三桂堂、鹤林于氏家塾的栖云阁、杭州大隐坊、余氏万卷堂、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金华双桂堂、廖氏世彩堂、钱塘王叔边、毕万后裔魏齐贤宅富学堂、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刘通判宅仰高堂、蜀广都费氏进修堂、建宁府陈八郎书铺、临安府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杭州开笺纸马铺钟家、周必大、赵与篙（筹）、闽山阮仲猷种德堂、临安府贾官人经书铺、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建安黄善夫、义乌蒋宅崇知斋、汾阳博济堂、婺州市门巷唐宅、蔡琪家塾、蔡梦弼东塾、建安魏仲举家塾等等，就都是比较有名的宋代私人出版家。这些出版家活跃在全国各地，出版物行销到神州四方，构成两宋重要的出版亮点，是全国出版网络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两宋出版事业的有力支撑。

所谓民间集体经营，是指寺院、道观、家族祠堂等靠募捐或家族亲友等集资方式共同主持或投资而开展的出版活动。泉州开元寺、福州东禅等觉院、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院、平江府碛砂延圣院等寺院，在宋代先后都曾募刻出版过释家大藏。宋释居简《北硐文集》还说："近世蜀之昌州不动居士冯公，以无量寿愿，施五千四十八卷，凡四十八藏。《般若》、《宝积》、《华严》、《涅槃》合八百四十一卷，亦满厥数。"[1] 八百四十一卷，俗称《小藏》。此前他（冯檝）还向杭州灵隐寺舍过《大藏》。福州闽县万寿观，还奉敕开雕出版过《万寿道藏》。金华吕氏祠堂、严陵赵氏祠堂等，也都出版过族人先贤的著作。佛寺、道观的出版活动，内容上均系本教经籍的汇刻，目的都是做功德，祈福祉，因而在时间上此作彼仿，赓续不断；在规模上一

【1】[宋]释居简:《北硐文集》卷四。

藏比一藏大。有宋319年中，大概前后一共出版过七部释藏，两部道藏，在总卷数上大约比四部书少不了多少。所以寺院、道观之出版，也是两宋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把官方、私营、民间三大系统的出版机构合在一起加以不完全的统计，除中央各部、院、司、局、殿、监、省、所以外，就现存宋版书所能知晓的地方府、州、军、县，各提刑司、安抚司、转运司、茶盐司等机关和专司职能机构从事出版活动的仍有36家，府州军县学从事出版活动的仍有123家，各地书院从事出版活动的仍有9家。加上前边所统计之两宋私宅、坊肆105家，合计仍有273家。加上中央的出版机构，大约不下300家。这还是仅就现存宋版书，而且主要是国家图书馆所藏之宋版书上明确可知的出版机构，实际数字当比此数要大得多。八百多年前，就能有三四百家出版机构从事出版活动，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仅见的，可知两宋的出版事业是多么的兴旺发达。

宋代的出版规模，既反映在出版大部头书籍上，也反映在总体的出版物数量上。出版大部头书，在财力、校勘、镌刻、刷印、用纸、敷墨、折配、装帧诸方面，都比刻印出版一两卷、三五卷的小书要复杂得多。开宝四年（971年），距赵匡胤黄袍加身仅有十年，便由朝廷派遣高品职司人员张从信前往益州，即今成都，监雕释家大藏13万版，5 048卷，480函。这是我国第一部刻印出版的释家《大藏经》，也是我国用雕版印刷技术出版的第一部大部头的释家典籍。如此规模的出版，就是在今天，仍令人叹为观止，可是中华民族在一千多年前就做到了。此后三百余年，释、道两家的单经大藏、前朝旧典、四部书的官修私撰层出不穷，赓续不断，将我国的出版事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当然，时至今日，谁也无法确切统计出两宋到底出版了多少典籍，但从几部重要书目著录中可略知梗概。

第一部是《崇文总目》。这部目录是北宋崇文院，其中包括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目录。此目编成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距立国已80余年。凡六十六卷，叙录一卷，

为王尧臣、欧阳修等奉敕编撰。其体例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有大序、部序、类序，每书款目之下有提要。共收图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惜原目已佚，无以窥其全貌。清修《四库全书》，采用《永乐大典》辑本，厘为十二卷。嘉庆四年（1799年）钱东垣又从《欧阳文忠公集》、《玉海》、《文献通考》等书中辑为五卷，并补遗、附录各一卷。较《四库》辑本已多，可得原目十之三四。钱氏辑本后来刻入《粤雅堂丛书》，今据该丛书本加以统计，其录经部书193种，2 263卷；史部书655种，7 768卷；子部书1 824种，4 991卷；集部书744种，5 868卷。总为3 416种，20 890卷。如果这些只是全目的十之三四，则照此推算全目收书当为8 540种，或者更多更少一些。这个数字已十分可观。钱东垣《崇文总目附录》又说："政和七年（1117年），校书郎孙觌言：'太宗皇帝建崇文殿为藏书之所，景祐（1034—1038年）中仁宗皇帝诏儒臣即秘书所藏编次条目，所得书以类分门，赐名《崇文总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为秘书，厘正官名，独四库书尚循《崇文》旧目。顷因臣僚建言，访求遗书，今累年所得《总目》之外凡数百家，几万余卷。乞依景祐故事，诏秘书省官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乞别制美名，以更崇文之号。'乃命觌及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通撰次，名曰《秘书总目》。"[1] 政和是宋徽宗的年号，已届北宋末年。《崇文总目》经过这次补充，更名为《秘书总目》，其收书当已品种有加，卷帙大增。至金人破汴，北宋内府藏书及所雕书籍版片，被金人捆载以去，国子监、三馆、秘阁书及版片荡然无存。并移文开封府，令现钱支出收购民间藏书。一个半世纪的出版成果，被金人毁于一旦。

宋朝南渡后，经高宗的不懈努力，经济很快恢复和发展，史称中兴。"靖康之变，中原板荡。及偏安江左，庶事草创，唯网罗散逸较之先朝独无歉焉。虽旧典视前少损，多当代编述，然自今日视之，所纪者皆七百年前故籍"。故"淳熙四年（1177年）十月，秘书少监陈骙等乞编书目，五年六月上之，凡七十卷，序例一卷，五十二门"[2]。这部《中兴馆阁书目》共著录图书44 486

【1】[清]钱东垣：《崇文总目附录》，《粤雅堂丛书》本。

【2】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序》，1933年北平图书馆、中华图书馆协会合刊之《古逸书录丛辑》或1987年11月现代出版社出版《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上。

卷，种数不得而知。1932年贵阳赵士炜复从《玉海》、《山堂考索》、《直斋书录解题》、《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词学指南》、《小学绀珠》、《宋史·艺文志》诸书中钩沉考索，得《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五卷、《中兴馆阁续书目辑考》一卷。其中《中兴馆阁书目辑考》经部收书577种，5 555卷；史部收书470种，7 283卷；子部收书319种，4 680卷；集部收书56种，1 235卷。四部总共收录图书1 422种，18 753卷。辑出来的五卷书目就著录这么多书，如果依书目原卷数将此数扩大14倍，那就是19 908种，262 542卷。实际上当然不可能如此形而上学地推算。但此目收书多为宋时当代著述，且种数卷数均比《崇文总目》所录图籍有加，则是事实。加上嘉定十三年（1220年）秘书监张攀主持编撰的《中兴馆阁续书目》三十卷所录淳熙五年（1178年）以后馆阁新书14 943卷，总卷数已达59 429卷，大大超迈前代。元代修《宋史》，其《艺文志》所著录的图籍，基本来源就是《中兴馆阁书目》与《中兴馆阁续书目》。

今考《宋史·艺文志》，谓："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1] 可知北宋有书凡6 705种，73 877卷。"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移跸临安，及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自是而后，迄于终祚，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絫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前后部帙有亡增

【1】《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序》，中华书局校点本。

损，互有异同。今删其重复，合为一志，盖以宁宗以后史之所未录者，倣前史分经、史、子、集四类而条列之。大凡为书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云"[1]。"盖以宁宗以后……"的"盖"字，中华书局校点本《宋史·艺文志》校勘记谓："《考异》卷七三以'盖'字是'益'字的刊本之讹，疑是。"此考极当，否则文义不通。即对宁宗以前的四部书目所录去其重复，而益以宁宗以后的新书，总共为9 819种，119 972卷。这个数字只会比实际少，而不会比实际多。据明代王世贞《朝野异闻录》记载，明权相严嵩被劾抄家时，中有宋版书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既证明其巨贪暴敛，也表明宋代出版物传至明代中叶，仍为数不少。宋代出版事业的盛况，于此亦可见一斑。

至若宋代出版物的品质、内容姑置勿论，其外在表现则历来是众口一词，称赞不已。当然，中国幅员辽阔，疆域广大，各地出版物的品质也不完全相同，也有高下精粗之分。"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2]。这是时人叶梦得的品评意见。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号石林，苏州吴县人。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进士，累官至户部尚书，迁尚书左丞，终官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石林燕语》乃其著作之一。由此可知叶氏乃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的人，其评论的出版物品质，当是其所见到的北宋和南宋初年的出版物。时人评时物，大体可信。验以现存宋版书，更可证叶说之不诬。出版是文化事业，同时也是商品经营活动。从事业上讲，它有弘扬圣道、阐扬主张、承传学术、传播知识的职责义务；从商品经营上讲，它又有降低成本、速成易售、行销盈利、可持续发展的正当权利。两者叠加，便构成了出版家永恒的理念。即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永远是出版者追求的目标。杭州地处两浙轴心，经济富庶，人文荟萃，出版品精良考究，当属自然；巴蜀雕版印书唐代已发其端，又号称天府，经济自给有余，文化发达，出版品仅次杭州而居其

【1】《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序》，中华书局校点本。

【2】［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二，亦很容易理解；福建三山六水，经济落后，经商盈利乃其出路之一，出版品降低成本，速成易售，行销各地，争为天下先，亦合乎逻辑。还有一个江西，两宋时期亦是出版大省，出版物品质虽低于杭浙，而绝对高于蜀、闽。这是版本学家和出版史上始终未予充分注意的课题。当然还有江淮广大地区，刻书数量与品质，也不应忽略。

书和人一样，人有人品，书有书品。归结起来，宋代出版物在品质上能给后世留下影响者，一是印刷技术，二是装帧艺术。

所谓印刷技术，应包括雕版镌字、敷墨印刷、印纸字体诸方面。明谢肇淛说："所以贵宋板者，不惟点画无讹，亦且笺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笺古色而极薄，不蛀。"[1] 明高濂说："藏书以宋刻为善。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2] 明张应文说："藏书者贵宋刻，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绝者有欧、柳笔法。纸质莹洁，墨色青纯。为可爱耳。"[3] 清人孙从添说："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文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色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之妙尽之矣。"[4] 所有这些评论，虽有溢美之嫌，但基本符合宋代出版物品质的事实。就一般情况而言，宋代出版物的版样字体形状有方、长、扁、圆、瘦几种形态，但常见者为方。就书家流派，有宗颜，有习欧，有学柳，当然也有学苏东坡和宋徽宗瘦金书的，但常见者为颜、欧、柳。就刻手而言，则良工辈出，刀法娴熟，流畅剔透。就印纸而言，则皮纸、麻纸兼而有之，南宋以后竹纸渐夥。墨色则清香淡雅，光泽如漆。其整体的雕版印刷工艺，可谓达到了极致，为后世传统的刻印出版树立了楷模风范。

所谓装帧艺术，应包括出版物的版式设计、插图形式、装订形制诸方面。宋代出版图籍的版式设计，原则是"用"与"美"的巧妙结合，版框栏线、鱼尾中缝、版口、书耳，各尽其用，而

【1】[明]谢肇淛:《五杂俎》。

【2】[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论藏书》。

【3】[明]张应文:《清秘藏》。

【4】[清]孙从添:《藏书纪要》。

又美观大方。插图则突破唐五代时单一的卷首扉插桎梏，而出现了卷中插、连续插的活泼形式，使图因文作，文借图明，结合得更加紧密。装订形制，则适应版印的特点，也突破了长期以来盛行卷轴装的旧制，一变而成了册叶式的蝴蝶装和经折装。所有这些创格，首先是横向影响了辽、西夏、金广袤的三北地区，纵向也影响了其后的元、明、清几百年。

# 第二章 宋代的官方编修与繁荣的私人撰述

出版活动的首要环节是得有文稿、有撰述，而撰述无非是官修与私撰。没有官方频繁编修与大批私人撰述的产生，出版活动与出版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的官方修撰有优良的传统，私人撰述也在春秋末期随着“学在官府”朝“学在四夷”的转移而久已萌生。至宋代，封建社会已高度成熟，因而使宋代官府的编修之作与私人撰述层出不穷，从而为两宋出版业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第一节 宋代官方的编修机构与编修活动

宋代中央的编修机构，大体可分为常设专门性机构和临时性机构。两者相辅相成，使宋代中央的编修活动显得格外兴盛。

### 一、中央专门性编修机构

秘书省是宋代常设的重要专门编修机构。秘书省设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少监为之副，而秘书丞参领之。其下属有五：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二人，掌修纂日历，实为皇帝日历编纂负责人；秘书郎二人，掌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图籍，以甲、乙、丙、丁

为部，各分其类，实为秘书省的图书管理人员；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雠典籍，判正讹谬，各以其职隶于长贰。唯日历编修官不预。北宋初，置三馆于长庆门以北，谓之西馆。到太宗太平兴国初年，又于升龙门东北创立三馆书院。三年（978年），赐名崇文院，迁西馆书贮藏于此。东廊为集贤院的书库，西廊分为四部，为史馆的书库。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又于右掖门外创立外院。天禧初，又令三馆为额，置检讨、校勘等官。在太宗赐名崇文院后十年，即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又在崇文院中堂创建了秘阁，以三馆书籍中的正本及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淳化元年（990年），又诏三馆置直阁，以朝官充当；校理，以京朝官充当。直阁、校理，掌缮写秘阁所藏。"景祐元年（1034年）闰六月，以三馆及秘阁所藏或谬滥不全，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等看详，定其存废。讹谬者删去，差漏者补写。因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定著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于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已丑上之，赐名曰《崇文总目》。后神宗改崇文院曰秘书省，徽宗时因改是书曰《秘书总目》"[1]。元丰五年（1082年），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官属，始立为定员，分四案，置八吏。崇宁五年（1102年），诏馆阁（即崇文院别称）官并除进士出身。政和七年（1117年），诏秘书省类集所访遗书，名曰《秘书总目》。宣和二年（1120年），立定秘书省员额：监、少监、丞并依元丰旧制，著作郎以四员为额，校书郎二员，正字四员。靖康之难，宋室南渡，未遑制作。然至绍兴元年（1131年），又诏置秘书省，权以秘监或少监一员，丞、著作郎、佐各一员，校书、正字各二员为额。续又参酌旧制，校书郎、正字召试学士院，合格者而后命之。自此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四库之书略备。又在秘书省下复置史馆，以修《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绍兴五年（1135年），又仿唐代十八学士之制，秘书省除监、少监、丞以外，置著作郎、佐郎、秘书郎各二人，校书郎、正字十二人，共十八人。又迁移史馆于秘书省所在之

[1]《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崇文总目提要》。

侧，单独别为一所，以示增重其事。九年（1139年），诏著作局惟修日历。遇修国史，则开国史院；遇修实录，则开实录院，以使名实相符。孝宗即位，诏馆职储养人才，无定员。以上是宋代秘书省（也称崇文院、馆阁）的基本情况，详见《宋史·职官志四》。

宋代秘书省下有日历所、会要所、国史实录院、太史局，各掌其职，应诏完成各自的编修任务，产生专业性极强的职务作品。

（一）日历所

日历所是秘书省的下属机构，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将宰执的《时政记》及左右史的《起居注》所书之资料汇集而加以编次，以成一代之典。旧时门下省有编修院，专掌国史、实录，纂修日历。元丰四年（1081年）十一月，废编修院归史馆。元丰新制施行以后，属秘书省国史案。元祐五年（1090年），移国史案置局，专掌国史、实录，编修日历，以国史院为名，隶门下省，更不隶秘书省。绍圣二年（1095年），又诏日历所还秘书省。宣和二年（1120年），诏罢在京修书诸局，惟秘书省日历所系元丰国史案，除著作郎官专管修纂日历之事无定员外，其分案编修日历书库官吏，并依元丰旧法。绍兴元年（1131年），初修皇帝日历，诏以修日历所为名，本省正副长官通行修纂。三年（1133年）十一月，诏以修国史日历所为名。四年（1134年），又诏以史馆为名。十年（1140年），诏依旧制，又并归秘书省国史案。不久，又复诏以国史日历所为名，并编修《神宗宝训》和《哲宗宝训》。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又将编类圣政所并归到日历所。所谓日历，乃史官按日记载朝政事务的册子。其制始于唐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唐顺宗李诵令史官撰写日历。其法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四时，以四时系年。至宋，历朝则每在修实录之前先修日历，故置日历所，专掌编修日历。日历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参预机务之臣的时政记录，以及左右史的起居注。古制，君举必书，故置左史以记言，右史以记事，最终形成

起居注，成为日历编纂的原始资料之一。两宋三百余年，到底编修了多少日历，已无从稽考。《玉海·艺文类》著录，宋代曾存《建隆飞龙日历》、《孝宗日历》、《嘉定日历》等。日历这种以日系事的编修方法，其规模数量当十分可观。只不过其性质是档案性材料，长期秘不示人，而在改朝换代时最易被掠毁，故今已无法得见。

（二）会要所

会要所是专门编制历朝《会要》的机构，以秘书省官员通任其事。元符三年（1100年）十二月，诏修《国朝会要》。绍兴九年（1139年）十二月，命续修《元丰会要》。同年，高宗诏令秘书省官员雠校《国朝会要》，并给参与各官茶汤钱。乾道四年（1168年），诏尚书右仆射陈俊卿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每逢遇到提举官开院过局，需要于秘书省道山堂聚呈文字，其提举诸司官、承受官、主管诸司官，多由国史日历所官兼当。五年（1169年），又令秘书省再加删定，以《续修国朝会要》为名。九年（1173年），秘书少监陈骙上言，编类建炎（1127—1130年）以后会要成书，以《中兴会要》为名，获准施行。此后会要的接续修纂，一直由秘书省职掌。所谓会要，指唐以后历代分门别类记载一朝或几朝政治、经济、文物、故实等典章制度的汇编之书。始创于唐代苏冕所撰唐高祖李渊至德宗李适《九朝会要》。这部《九朝会要》后又经杨绍复等收采德宗至宣宗李忱时事，编为《续会要》。宋初王溥又续增宣宗至唐末时事，材料始全，汇为《唐会要》100卷。其后王溥又撰《五代会要》30卷，于是形成传统。宋代官方很重视会要的修撰，前后重修续修十多次，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代曾编有《庆历国朝会要》、《元丰增修五朝会要》、《政和重修会要》、《孝宗会要》、《光宗会要》、《宁宗会要》等14种，2 800多卷，惜均已不传。清代嘉庆时徐松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将近五百卷，称为《宋会要辑稿》，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早有影印本行世。近年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又有续辑出版。元朝所修《经世大典》，乃会要之别名。

明、清两代的会典，则专重制度法令，不详叙史实，乃会要的变体。可证宋代的会要所，乃是会要由私人汇纂变为官修的一个正式常设机构。

（三）国史实录院

前边曾提到南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下诏："遇修国史则开国史院，遇修实录则开实录院，以正名实。"[1] 同年修《徽宗实录》，便诏以实录院为名，仍以宰相提举，以从官充修撰、同修撰，余官充检讨，无定员。明年，以未修正史，诏罢史馆官吏并归实录院。二十八年（1158年），历时20年，《徽宗实录》修成，紧接着便诏修《三朝正史》，复置国史院，以宰相监修，侍从官兼同修，余官充编修。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又诏置实录院，动手编修《钦宗实录》，其修撰、检讨等官，则又以史院官兼领。四年（1168年），《钦宗实录》修成，又诏修《钦宗正史》。以右仆射蒋芾提举《四朝国史》，增置官员。淳熙四年（1177年）罢实录院，专置史院。十五年（1188年），经11年则《四朝国史》成书，立即诏罢史院，复开实录院，编修《高宗实录》。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又开实录院，编修《孝宗实录》。嘉泰元年（1201年），仍开实录院，编修《光宗实录》。二年（1202年），复开国史院，修高宗以来正史。从此，国史、实录两院并存，交替使用。可以看出，封建社会也很注意机构的精简，尽可能避免机构设置上的叠床架屋。他们很懂得以一套班子打时间差，遇修实录则进实录院，编修实录；遇修国史则进国史院，编修国史。既驾轻就熟，又节省人力，为编撰出版史创造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宋代皇帝十六传，实录至少修十五次，实际恐怕还不止。宋太祖赵匡胤以五代后周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身份得天下，故对后周表面上总是优礼有加。建隆二年（961年），在建国称帝的第二年，便修成了《周世宗实录》，以尽旧有的君臣之道。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正月，命修《太祖实录》。五年（980年）九月甲辰，史馆上《太祖实录》。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太宗崩，真宗即皇帝位于灵柩之前。同年十一

[1]《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职官志四》。

月，诏工部侍郎钱若水修《太宗实录》。咸平元年（998年）九月，又诏吕端、钱若水重修《太祖实录》。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二月，王旦等上《两朝国史》。仁宗天圣二年（1023年）三月，王钦若上《真宗实录》。英宗帝祚仅四年，疾病缠身，无暇多顾。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正月，诏修《英宗实录》。二年（1069年）二月，又命翰林学士吕公著修《英宗实录》。七月，韩琦上《仁宗实录》，曾公亮上《英宗实录》。十年（1077年）五月，诏修《仁宗正史》和《英宗正史》。元丰五年（1082年）六月，王珪上《两朝正史》。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三月，吕大防上《神宗实录》。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七月，诏修《神宗史》。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同修国史蔡卞请重修《神宗实录》。同年五月，修国史曾布请以王安石《日录》载之《神宗实录》。元符元年（1098年）四月，章惇等进《神宗帝纪》。哲宗崩于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无子，以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同父弟端王赵佶立，是为徽宗。即位一个月之后，即二月始听政。九月，便诏修《哲宗实录》。同月，又诏修《神宗史》。崇宁三年（1104年）八月，蔡京上《神宗史》。宣和二年（1120年）二月，诏别修《哲宗史》。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代所修实录、其中包括五代《周世宗实录》、《南唐烈祖实录》、《后蜀高祖实录》、《后蜀主实录》、《宋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真宗实录》、《仁宗实录》、《英宗实录》、《神宗实录》、《哲宗实录》、《徽宗实录》、《钦宗实录》、《高宗实录》、《孝宗实录》、《光宗实录》、《理宗实录》、《度宗实政记》凡18部，3 027卷。当中两修者尚不计算在内。上述这些事实可以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宋代官方的皇帝实录及正史之修撰，非常重视、非常正规，后朝修前朝实录、正史赓续不断；二是宋代实录、正史并非十六修，当中有重修、续修；三是实录院、国史院两块牌子交替使用，歇人不歇马，效率很高。这是编修史上成功的经验。

（四）太史局

太史局也是秘书省的下属机构，其职责是掌测验天文，考定

历法。凡日月星辰、风云气候及祥异之事，日具所占以闻。每岁预造下一年历书，礼部审批后即行雕造，颁行天下。祭祀、冠昏、大典，择选吉日良辰，共四项日常职责。其下属机构有天文院、钟鼓院、印历所。其官员有令，有正，有春官、夏官、中官、秋官、冬官正，有丞，有直长，有灵台郎，有保章正。南渡后，隶秘书省。还有个算学，或归属国子监，或归属太史局，两个机构中时有时变。

太史局第一项职责，即测验天文，考定历法，盖为天文院具体执行。天文测算的精疏，是订定历法的基础。反过来，历法的疏密，于测验天文，预知祥异，改善为君之策，又至关重要，所以历朝都很重视历法的考定。北宋立国第四年，即乾德元年（963年）四月，便修成了《建隆应天历》。宋初本沿用五代后周显德年间的《钦天历》，因自唐以来的漏刻渐差，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便诏司天少监王处讷等别造新历，四年（963年）修成，名《应天历》，乾德元年颁行。行用二十一年，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又用《乾元历》。推行没多久，"气候又差，继作者曰《仪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天》、曰《观天》、曰《纪元》，迨靖康丙午，百六十余年，而八改历。南渡之后，曰《统元》、曰《乾道》、曰《淳熙》、曰《会元》、曰《统天》、曰《开禧》、曰《会天》、曰《成天》，至德祐丙子，又百五十年，复八改历"[1]。由此可见两宋历法的修订是非常频繁的。不足三百二十年，十六次修改历法，其前其后都是少见的。致使《宋史》的修撰者不能不发出"使其初而立法脗合天道，则千岁日至可坐而致，奚必数数更法，以求幸合玄象哉！"[2]的慨叹。

【1】《宋史》卷六十八《律历志一》。

【2】《宋史》卷六十八《律历志一》。

第二项职责，是岁颁历日于天下，并预造进呈。每岁由中央朝廷的主管部门颁行历书于天下，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老例。进入封建社会，特别是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日益普及，严禁私造历日的禁令不断下达，其造历之权完全控制在中央。原因是不能有乖敬授之道，更不能朔晦互差，节令天时相错。所以每年都要

由秘书省（监）太史局下边的天文院或司天监、钦天监预造来年新历。通常在每岁冬至日，呈奏明年的新历书样本给礼部，经礼部审定后才可雕造颁下行用。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二十三日，宋神宗诏："民间毋得私印造历日，令司天监选官，官自印卖，其所得之息，均给在监官属。"[1] 这种历书一年一本，年年都要编修，年年都要由太史局出版，而后由礼部颁下，各路才可重刊发行。国家图书馆珍藏一部宋荆执礼撰的《大宋宝祐四年丙辰岁会天万年具注历》，为清咸丰六年（1856年）翁同书家抄本。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秘书省上言太府寺丞张湜与李德卿算造的历法，同谭玉续进的历书，在六个方面有牴牾，请得商榷推算，合众长而为一，然后赐名颁行。同年新历修成，赐名《会天历》，宝祐元年（1253年）施行。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部《会天历》，正是当时推行《会天历》的有力见证（图1）。秘书省不但要完成上述的职务编修，还经常受命置局专编某书，并由馆阁派人领修。其置局编书地点则因时因书而异。"景祐中命修《总目》，则在崇文院。余皆置局他所，盖避众人所见。《太宗实录》在诸王赐食厅，《真宗实录》在元符观。祥符中修《册府元龟》，王文穆为枢密使，领其事，乃就宣徽南院厅，以便其事"[2]。可证秘书省的编修活动，其地点并不局限在本机构所在地。

以上是秘书省及其下属编修机构的编纂简况，这些机构的编修活动十分频繁，非常设无以完成任务，故两宋三百多年间，无论是叫崇文院也好，叫秘阁、馆阁或叫秘书省也好，名字虽不始终如一，但任务性质却没有多大变化。可以说，这是宋代中央最大的常设专门编纂机构。

（五）玉牒所

太宗淳化六年（995年）始设局置

【1】《宋会要辑稿》第七册《职官》一八之八四。

【2】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17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图1
清翁同书家抄本《大宋宝祐四年丙辰岁会天万年具注历》

大宋寶祐四年丙辰歲會天萬年具注歷
太歲在丙辰 幹火枝土 納音屬土 凡三百五十四日
歲德在東南丙位 合在辛丙辛上 取土及宜修造 大將軍在子
太陰在寅 歲刑在辰 歲破在戌
歲殺在未 黃幡在辰 豹尾在戌
碧白赤太歲已下諸神其地各有所忌如有隳壞
白白黑事須修營擇其日與歲德月德歲德合
黃綠紫月德合天恩天赦母倉併者修營無妨
正月大 二月小 三月大 四月小 五月小 六月大
七月小 八月小 九月大 十月大 十一月大 十二月小

官，诏以《皇宋玉牒》为名，并营建玉牒殿。咸平初年，命赵安易、梁周翰编属籍，始创规制。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以知制诰刘筠、夏竦为修玉牒官，其后是置一员还是二员，仍无定员。元丰改制后，才正式分隶于宗正寺。宗正寺专门职掌分叙宗派属籍，以别昭穆而定其亲疏。修纂牒、谱、图、籍，其别有五：一曰玉牒，以编年之体叙帝系而记其历数，凡政令赏罚、封域户口、丰凶祥瑞之事皆载于此；二曰属籍，序次皇帝同姓之亲并次第其服纪之亲疏远近；三曰宗藩庆系录，辨明谱系之所自出，序次其子孙名位、品级；四曰仙源积庆图，用以考定世次枝分派别而系于本宗；五曰仙源类谱，用以序次男女宗妇族姓婚姻，以及官爵迁叙，并著其功罪生死之况。规定凡录以一岁，图以三岁，牒、谱、籍以十岁修纂以进。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始建玉牒所，设提举一人或二人，以宰相或执政充任。侍从官一人兼修，宗正寺宗正卿、少卿以下则共同参与修纂。就《宋史》所载，乾道六年（1170年）五月，陈俊卿、虞允文等上《太上皇玉牒》；淳熙四年（1177年）三月，龚茂良等上《仁宗玉牒》、《皇帝玉牒》；五年（1178年）冬十月，史浩等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类谱》、《仁宗玉牒》；十三年（1186年）十一月，王淮等上《仁宗玉牒》、《英宗玉牒》；绍熙三年（1192年）十二月，帝率群臣上《寿皇圣帝玉牒》；庆元三年（1197年）二月，京镗等上《神宗玉牒》；六年（1200年）二月帝率群臣奉上《圣安寿仁太上皇玉牒》；嘉泰三年（1203年）四月，陈自强等上《徽宗玉牒》；四年（1204年）八月，陈自强等上《皇帝玉牒》；开禧元年（1205年）闰八月，韩侂胄等上《钦宗玉牒》；嘉定六年（1213年）闰九月，史弥远等上《三祖下七世仙源类谱》、《皇帝玉牒》；十三年（1220年）五月，史弥远等上《玉牒》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淳祐二年（1242年）正月，右丞相史嵩之等上《玉牒》、《宁宗玉牒》；五年（1245年）二月，范钟等上《玉牒》；十一年（1251年）二月，左丞相郑清之等上《玉牒》；宝祐二年（1254年）八月，谢方叔等上《玉牒》；五年（1257年）闰四月，程元凤等进《玉牒》。显示出自绍兴十二年建立专门玉牒所之后，玉

牒之编进较为频繁。玉牒是皇室的家谱、族谱，故由宗正寺掌管，下设玉牒局或玉牒所负责纂修。

(六) 编修敕令所

其职掌是裒集诏旨，纂类成书。法律，是国家的大法，是基本法，不可能包罗万象，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总要因时因事由皇帝下诏或发布敕令，以示禁止或提倡，作为法律的补充。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宋代在太祖建隆四年（963年）修订五代后周的《大周刑统》为重定《宋刑统》的同时，还汇集中唐以后颁行的敕令格式，分门别类地附在《宋刑统》之后。并在重定《宋刑统》的同时，还由当时的工部尚书并判大理寺窦仪主持编进了立国三年来皇帝所下的诏、敕、令106条，名曰《建隆编敕》，凡四卷，与《宋刑统》同时颁行。此后，这种编修法令格式的活动，历朝都有，赓续不断。但其职事机构的名称，却并不完全一样，编修敕令所亦不是最早的名称。北宋仁宗天圣（1023—1032年）间称为"详定编敕所"。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又称为"编修诸司敕式所"。熙宁八年（1075年）九月以前还有个"详定一司敕令所"与"编修诸司敕式所"并存，八年九月以后所有各司的编敕机构，都并入了"详定一司敕令所"。职掌仍是编修、删定历朝敕、令、格、式、条法，各以本朝年号为名，如《淳熙重修敕令格式》、《淳熙条法》。元祐（1086—1094年）间又名"重修敕令所"。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至绍兴五年（1135年），又称"详定重修敕令所"。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九月十一日以后又称"编类圣政所"，专掌编纂高宗建炎、绍兴年间所颁布的大号令、大政事及元祐以来和靖康忠臣义士传纪。由于其内容已涉及史传，故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十九日，并入国史日历所。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以后才叫"编修敕令所"。由于条法敕令关乎统一法令，秩序社会，凝聚民心，涉及国家稳定，故其长官通以宰相或执政官兼领，详定、删定诸官，则由侍从官、职事官内差选兼职，以示严肃而郑重。

至于历朝都编定过多少敕令格式，现已无法做出确切统计。

《宋史·艺文志》著录有150种左右，也不敢说准确，所以只能举例性地加以描述，以窥一斑。现知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冬十月，丁谓上《景德农田编敕》；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颁行《天圣编敕》；景祐二年（1035年）六月，颁行《一司一务及在京敕》；庆历七年（1047年）正月，颁行《庆历编敕》；九月，诏删定《一州一县敕》；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命富弼等详定《编敕》；十月，颁《禄令》；七年（1062年）四月，颁行《嘉祐编敕》；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十二月，颁行《元祐敕令式》；六年（1091年）五月，后省上《元祐敕令格》；八年（1093年）六月，中书后省上《元祐在京通用条贯》；绍圣三年（1096年）二月，诏复《元丰恤孤幼令》，十二月，蔡京上《新修太学敕令式》及《详定重修敕令》；元符元年（1098年）四月，曾布上《删修军马敕例》，六月，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敕令》；二年（1099年）八月，章惇等进《新修敕令式》；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诏颁《斗杀情理轻重格》；建炎元年（1127年）九月，诏内外官司参用《嘉祐敕》和《元丰敕》；二年（1128年）三月，初立《大小使臣呈试弓马出官格》；绍兴元年（1131年）八月，张守等上《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三年（1133年）冬十月，朱胜非上《重修吏部七司敕令格式》；十年（1140年）冬十月，秦桧上《重修绍兴在京通用敕令格式》；十三年（1143年）冬十月，秦桧上《监学敕令格式》；乾道六年（1170年）八月，复置详定一司敕令所，同月，虞允文上《乾道敕令格式》；淳熙元年（1174年）五月，颁行郑兴裔所创《检验格目》；二年（1175年）十二月，颁行《淳熙吏部七司法》；四年（1177年）七月，颁行《淳熙重修敕令格式》；六年（1179年）七月，颁行《隆兴以来宽恤诏》，同年十二月，颁行《重修淳熙敕令格式》；七年（1180年）九月，颁行《淳熙重修百司法》；十一年（1184年）四月，重颁《绍兴申明刑统》；十二年(1185年）四月，颁行《淳熙宽恤诏令》；绍熙二年（1191年）十一月，上《太上皇帝宽恤诏令》；嘉泰元年（1201年）三月，颁行《庆元宽恤诏令》；二年（1202

年）八月，谢深甫等上《庆元条法事类》，十一月，重修《吏部七司法》；三年（1203年）七月，颁行《庆元条法事类》；开禧元年（1205年）六月，陈自强等上《新修淳熙以后吏部七司法》；二年（1206年）三月，颁行《开禧重修七司法》；嘉定六年（1213年）二月，有司上《嘉定编修吏部条法总类》；十四年（1221年）五月，颁行《庆元宽恤诏令》；宝庆二年（1226年）四月，诏以《隆兴格》为制；宝祐二年（1254年）冬十月，谢方叔等进宝祐编《吏部七司续降条令》，等等。这些敕、令、格、式，不敢说都是编修敕令所删定编修的，但绝大部分当是出自敕令编修所。只不过这个所向以中书或门下省为首脑，即宰相、执政直接主持领导进行修定，所以显不出这个所的职能作用。但每一进呈或颁行，都表明裒集修定工作已经完成，达到了出版颁行条件。国家图书馆珍藏一部清抄本宋谢深甫纂修的《庆元条法事类》八十卷，残存三十六卷，及《开禧重修尚书吏部侍郎右选格》二卷，可以使我们多少了解一些当时这类东西的面貌。（图2）

慶元條法事類卷第四
職制門一
官品雜壓 令申明
令
官品令
諸太師太傅太保左右丞相少師少傅少保王為正
壹品
諸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太子太保師太傅太
保嗣王郡王國公為從壹品

图2
清抄本《庆元条法事类》

（七）太常礼院

这个机构名义上属太常寺，实际则直接通于皇帝。《宋史·职官志四·太常寺》称："别置太常礼院，虽隶本寺，其实专达。有判院、同知院四人，寺与礼院事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始并兼礼院事。元丰正名，始专其职。……宣和三年令本寺《因革礼》五年一检举，接续编修。"太常礼院有判太常礼院、同判太常礼院、知太常礼院、同知太常礼院等不同职级的差遣官。太常礼院的下边还有一层机构，名太常礼院编纂礼书，也是差遣官，嘉祐六年（1061年）二月设置，编修《太常因革礼》，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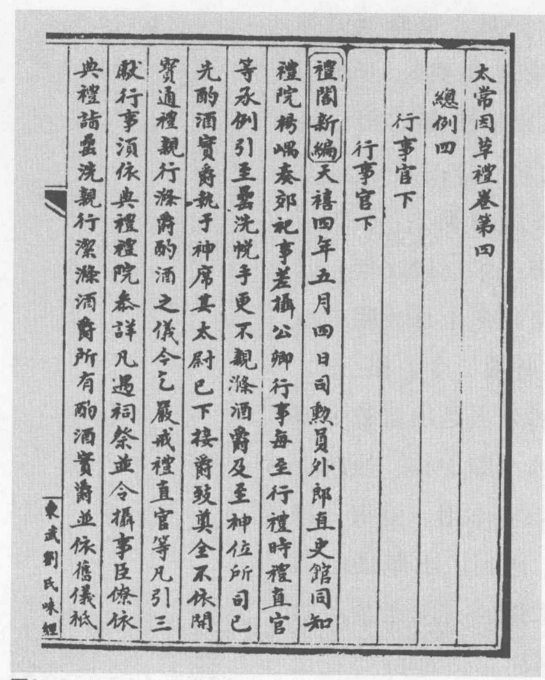

太常因革禮卷第四
總例四
行事官下
行事官下
禮閣新編　天禧四年五月四日司勲員外郎直史館同知
禮院楊嵎奏郊祀事差攝公卿行事每至行禮時禮直官
等承例引至盥洗帨手更不親滌酒爵及至神位所司已
先酌酒實爵執于神席其太尉已下接爵致奠全不依開
寶通禮親行滌爵酌酒之儀今乞嚴戒禮直官等凡引三
獻行事須依典禮禮院參詳凡遇祠祭並令攝事臣僚依
典禮詣盥洗親行潔滌酒爵所有酌酒實爵並依舊儀祇
東武劉氏味經

图3
清刘氏味经书屋抄本《太常因革礼》

政和五禮新儀卷第一
御製五禮序
禮緣人情而為之節聖王稽其典常制其等差辨其儀物秩其
名位所以正人倫定尊卑別貴賤也故有君道焉有父道焉有
子道焉夫唱而婦隨兄友而弟恭莫不有敘人倫正也上不可
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大不可以陵小小不得以加大無得而
踰尊卑定也朝廷邦國鄉黨遂序有典有則有倫有節有條而
不紊貴賤別也天下有萬不同之情先王同之于一堂之上薄
海內外雖愚夫愚婦莫敢以私智側言改度易制者以分定故
也夫人倫正尊卑定貴賤別則分守明分守明則人志一而好
作亂者未之有也下不好亂上無僭差而天下不治者亦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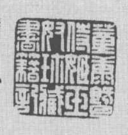


图4
清抄本《政和五礼新仪》

选人差充。治平二年（1065年）九月成书。任何一个朝代，立国之初有两件事是最急迫的，一是统一律令，一是制定礼仪。宋朝也不例外，太祖建隆四年（963年）八月，也就是建国后三年零八个月，便颁行了《宋刑统》。至开宝六年（974年）十二月，诏行《开宝通礼》，标志着宋朝有了自己的礼书和礼仪制度。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二月，丁谓上《封禅朝觐祥瑞图》，刘承珪上《天书仪仗图》。三年（1010年）六月，颁天下《释奠先圣庙仪》及《祭器图》。天禧二年（1018年）正月，王钦若等上《天禧大礼记》。天圣九年（1031年）六月，宋绶上《皇太后仪制》。庆历四年（1044年）正月，太常礼仪院上新修《礼书》及《庆历祀仪》。皇祐三年（1051年）二月，宰臣文彦博等进《皇祐大飨明堂记》。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集贤院学士宋敏求上编修《阁门仪制》。大观三年（1109年）六月，诏修《乐书》。政和三年（1113年）四月，颁《五礼新仪》。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续编《绍兴太常因革礼》。绍兴九年（1139年）十二月，命续编《绍兴革礼》。嘉定五年（1212年）九月，有司上《续编中兴礼书》。凡此种种，表明宋代礼书的修定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活动。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刘氏味经书屋抄本、宋欧阳修等编撰的《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存八十三卷(图3)；清抄本宋郑居中等编撰《政和五礼新仪》二百二十六卷《目录》六卷（图4）、宋徽

宗《御制冠礼》十卷，存二百六卷；清蒋氏宝彝堂抄本、清徐松辑、宋礼部太常寺礼院编修《中兴礼书》三百卷，存二百四十七卷（图5）；宋叶宗鲁等编修、清徐松辑、清蒋氏宝彝堂抄本《中兴礼书续编》八十卷，存六十六卷（图6）。这些书虽不是当时原物，但亦可以抄传实物的身份，证明宋代礼书编修的事实。这些书当时都曾奉诏颁行，表明其已正式出版。

上面所举都是一些职能性机构的编修活动，还有些机构，如枢密院的编修官，虽“随事而置，无定员，以本院官兼者不入衔”[1]。但自熙宁三年（1070年）以王存、顾临等同修《经武要略》，政和七年（1117年）编修《北边条例》之后，似乎也成了常项职能，遇有大规模军事冲突之后，就要进行编修。例如景德二年（1005年）七月，刘质所进的《兵要论》、嘉定七年（1214年）九月，史弥远等进呈的《高宗中兴经武要略》、嘉定十五年（1222年）五月所修的《孝宗经武要略》、淳祐二年（1242年）正月，右丞相史嵩之等进呈的《孝宗经武要略》、五年（1245年）二月，范锺等进呈的《光宗经武要略》、十一年（1251年）二月，左丞相郑清之进呈的《宁宗经武要略》、宝祐二年（1254年）八月，谢方叔等进呈的《七朝经武要略》、五年（1257年）闰四月，程元凤等进呈的《经武要略》等，应当都是枢密院编修官编撰的，也是职能性的作品。另外如户部编撰的有关国计民生的《景德会计录》、元祐二年（1087年）七月诏修的《会计录》等，也是职能性的作品。其他还可举出若干这方面的例子，表明两宋中央各职能机构，差不多都

图5
清蒋氏宝彝堂抄本《中兴礼书》

【1】《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二·枢密院》。

图6
清蒋氏宝彝堂抄本《中兴礼书续编》

有职能性的编纂活动和作品。

## 二、中央临时性编修机构

宋代以朝廷的名义，组织力量开局开馆编书也是比较频繁的。但常是一书一局，或一书一馆，其设置一般是三五年或十年，最长不超过二十年，书成局罢，显示出明显的临时性。作为封建王朝，宋代历朝统治者所最看重的还是正经正史，其次才是子书诗文，此从以下所编次、疏正、撰著之书，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政策的倾向。

### （一）经史书籍的校正编刊

前边说过，宋太祖赵匡胤以五代后周殿前都点检身份抢班夺权，兵不血刃，迫使后周幼小的恭帝柴宗训让位，故使得后周的很多典制和有益的活动得以继续。如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二月下诏校刻的《易》、《书》、《周礼》、《仪礼》四经释文，本由五代儒臣田敏、尹拙、聂崇义等校勘，但事有未竟，便发生了朝代更迭。入宋则继续校勘《礼记》、《春秋》三传及《毛诗》。建隆三年（962年），判监崔颂等上《新校礼记释文》；开宝五年(972年)，判监陈鄂与姜融等四人校《孝经》、《论语》、《尔雅》释文上之；二月，李昉、知制诰李穆、扈蒙校订《尚书释文》；咸平二年（999年）十月十六日，直讲孙奭请摹印《古文尚书音义》与新定《释文》，从之。端拱元年（988年）三月，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易》则孔维等四人校勘，李说等六人详勘，又再校，十月雕印出版并进呈皇帝御览。《尚书》亦如此，二年（989年）十月出版进献。《春秋》则孔维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详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990年）十月刻印出版。《诗》则李觉等五人再校，毕道昇等五人详勘，孔维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992年）四月出版进献。《礼记》则胡迪等五人校勘，纪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详定，淳化五年(994年）五月出版进献。就在这一年，国子监判李至上言诸经义疏、释文仍有讹舛，建议更加刊定。并推荐杜镐、孙

爽、崔颐正等苦学强记，请让他们复校。至道二年（996年）李至又请命礼部侍郎李沆、校理杜镐、吴淑、直讲崔偓佺、孙奭、崔颐正校定。咸平元年（998年）正月，刘可名又上言诸经板本多误，于是皇帝又命崔颐正详校。刘可名又奏《诗》、《书》正义差误，二月，孙奭等重校，改正九十四字。沆预政二年，又命国子祭酒邢昺代领其事，舒雅、李维、李慕清、王涣、刘士元等参与其事，《五经正义》始毕其功[1]。

至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三月，又命国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正义；重定《孝经》、《论语》、《尔雅》正义。至四年（1001年）九月，历时一年半，由翰林侍讲学士邢昺及直讲崔偓佺表上重定这七经疏义，凡一百六十五卷。赐宴国子监，邢昺加一级，其余人亦都奖进有差。至此，宋代自身的《七经疏义》全部完成。十月九日，命摹印颁行[2]。上述充分说明，宋自立国伊始，大约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对经书反复加以雠正。其原因就是因为“经禀圣裁，垂型万世”[3]，大有助于“君人南面”的资治价值。

“正史体尊，义与经配”[4]。这是《四库全书》馆臣重视历来正史思想的真实反映，也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史资治的深刻总结。明白了这一点，再来谈宋代对正史的校刻与修撰，其政治思想逻辑就容易理解了。据《玉海·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记载：“淳化五年（994年）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杜镐、舒雅、吴淑、潘谨修校《史记》，朱昂再校；陈充、阮思道、尹少连、赵况、赵安仁、孙何校前后《汉书》。咸平中以校勘未精，命陈尧佐等复校《史记》。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丙午，任随等上复校《史记刊误文字》五卷，赐帛。丁未，命刁衎、晁迥、丁逊复校前后《汉书》。二年（1005年）七月壬戌，衎等上复校《前汉书》板本，刊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上之，赐器、帛。咸平三年（1000年）十月，校《三国志》、《晋书》、《唐书》，五年（1002年）毕。乾兴元年（1022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出版颁行。天圣二年（1024年）六月辛

[1]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三《开宝校释文及端拱校正〈五经正义〉》。

[2]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三《咸平校定〈七经疏义〉》。

[3] [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序》。

[4] [清]《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正史小序》。

西，校南、北《史》、《隋书》，四年（1026年）十二月毕。景祐元年（1034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复校南、北《史》。九月癸卯诏选官校正《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二年（1035年）九月壬辰，诏翰林学士张观刊定《前汉书》，下胄监颁行。秘书丞余靖请刊正《前汉书》，诏靖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至是改旧摹板。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校梁、陈等书，镂板。七年（1062年）冬，始集。八年（1063年）七月，《陈书》始校定。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六日庚子，进新校《汉书》。咸平元年（998年）七月甲申，赐诸王及辅臣新印三史。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理宋、齐、梁、陈、后魏、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全者，访求之。"[1] 从太宗淳化五年（994年）至熙宁二年（1069年），断断续续历时76年，将《唐书》以前的所有正史凡15史，均行校正刊定。《唐书》准备重修，未列入刊正范围。可证宋代建国初期，非但重视儒家经典，也很重视前修正史，以便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治国经验和教训。

【1】[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三《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

宋代除刊正以前正史以外，还组织力量编修了两部纪传体的断代正史，一部编年体的通代正史。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四月二十五日，政府开局编修《五代史》。以薛居正为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刘兼、李九龄等预修，任务是编纂梁、唐、晋、汉、周五代国史。到开宝七年（974年）闰十月，历时19个月，书成局罢，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该书原称《五代史》，亦称《梁唐晋汉周书》，后因欧阳修所撰《五代史记》者出，乃渐失行用。清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又从《永乐大典》中重新辑出，编入正史序列，称为《旧五代史》。称薛修之书为《旧五代史》，这是为了与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相区别；后者称《新五代史》。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奉敕编撰。全书《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至嘉祐五年(1060年)

全书告竣，前后历时17年。此期北宋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政治、经济危机都很尖锐。正如欧阳修所说："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需者财用，今财用乏矣。"[1] 在这种形势下来新修《唐书》，其要借镜历史经验、挽救危局的意图十分明显。

【1】[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全集》卷四六《准诏言事书上》。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司马光等奉敕编撰。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先后为开封府推官、天章阁待制、侍讲、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官。英宗时曾为龙图阁直学士。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编成了一个大事年表，名曰《历年图》，时间断限与后来的《资治通鉴》同。后来又"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便览"，于是又在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写成《通志》八卷，记战国至秦二世几百年的史事。进呈后，颇得英宗赏识，于是受命再编《历代君臣事迹》，并在崇文院设局，任其选用刘攽、刘恕、范祖禹等精通史学者，共襄其事。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司马光又将续写的部分进呈，同样得到神宗的赏识，并为其撰写御制序，且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在历史上的官修书中，堪称成功的典范，推其原因有二：一是选人得当，助手得力；二是编撰的程序得法。先有严密的编辑凡例，再有编写事目，三有史事长编，四由司马光一人最后执笔撰稿。长编环节至关重要，没有这个环节，不但史事理不清，写起来几乎无从下笔。有了这个环节，司马光写起来只是删繁就简，斟酌表述，得心应手。《资治通鉴》历来被目为正史，只是因为后来这类编年体史书的撰写时断时续，时有时无，不能续时连代，才未被列入正史。《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编年类"小序讲得非常清楚。

正经正史外，宋代对字书、韵书的增续也很重视，乾德四年

（966年）正月，陈鄂上《四库韵对》，且诏进行续编。天禧五年（1021年）六月，陈鄂之孙上其祖父所续作《韵对》九十八卷。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六月，诏太子中舍陈鄂等五人共同详定《玉篇》、《切韵》。太宗于便殿曾召见直史馆句中正等文字学者，令集辑凡有声无文者。翌日，中正上其书。太宗则说自己亦得二十一字，当附在《切韵》之末。因而又命句中正、吴铉、杨文举等，考古今异同，究篆隶之原，补缺刊谬，为新定雍熙《广韵》一百卷，端拱二年（989年）六月上之，诏付史馆。景德四年（1007年）十一月，崇文院上校定《切韵》五卷，依《九经》例颁行。祥符元年（1008年）六月五日改为《大宋重修广韵》。景祐元年（1034年）四月，诏直史馆宋祁、郑戬，国子直讲王洙刊修《广韵》、《韵略》，命知制诰丁度、李淑详定。祁等言多疑混字，举人会试常误用其字，故命修之。景祐四年（1037年），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郑戬建言，说是陈彭年、邱雍所定《切韵》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因受命与直讲贾昌朝、王洙共同修定，知制诰丁度、李淑典领，令所撰集务从该广，凡字训悉本许慎《说文》。慎所不载者，则引他书为解。字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分十卷，诏名曰《集韵》。贾昌朝又请修《礼部韵略》，其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通用之[1]。与此同时，书学字书，也在修正。语言的发展，向来快于文字的创造，常常是已有语音，但还未产生相对应的文字。而有了文字，又不知应该归入哪一韵，所以历来的韵书总是一修再修，宋代韵书之修尤显突出。《礼部韵略》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公布历朝皇帝的御名讳和嫌名讳，以免文人士子应试呈文犯讳获罪。

（二）子书类书与总集的校辑

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命杜镐等校《道德经》，六月功毕。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校定《庄子》并《释文》三卷，镂板行世。《老子》、《庄子》被唐陆德明视为经典，故《经典释文》中有《庄子释文》。后又命李宗谔等雠校《庄子序》。祥符四年（1011年）三月，校《列子》，五年（1012年）四月上新印

【1】[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五《乾德韵对·雍熙新定广韵·景德校定切韵·祥符重修广韵·景祐集韵》。

《列子》。十月，校《孟子》，孙奭等言《孟子》有张镒、丁公著二家撰录，今采众家之长为《音义》二卷。七年（1014年）正月，上新印《孟子》及《音义》。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戊寅，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左补阙知制诰李穆，太子少詹事汤悦，太子率更令徐铉，太子中允张洎，左补阙李克勤，右拾遗宋白，太子中允陈鄂，光禄寺丞徐用宾，太府寺丞吴淑，国子寺丞舒雅，少府监丞吕文仲、阮思道等十四人，同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杂编，为五百卷。八年（983年）十一月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一千卷，宜令日进三卷，朕当亲览焉，自十二月一日为始。……十二月庚子书成，凡五十四门。诏曰：'史馆新纂《太平总类》一千卷，包括群书，指掌千古，颇资乙夜之览，何止名山之藏！用赐嘉称，以传来裔，可改名《太平御览》。……先是帝阅类书，门目纷杂，遂诏修此书。兴国二年（977年）三月，诏昉等取野史、小说，集为五百卷。三年（978年）八月书成，号曰《太平广记》……二书所命官皆同，唯克勤、用宾、思道改他官，续命太子中允王克正、董淳，直史馆赵邻几预焉"[1]。此为编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之经过。

《册府元龟》可以说是在皇帝直接指导下编成的大类书。景德二年（1005年）九月，真宗命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億修《历代君臣事迹》。王钦若又奏请派直秘阁钱惟演、刁衎，龙图阁待制杜镐、戚纶，直集贤院李维，直史馆王希逸、陈彭年、姜屿、陈越，太子右赞善大夫宋贻序等参与共同编修。开始曾令钱惟演等各撰篇目，送王钦若、杨億参详审改。王钦若等也自撰篇目，共同奏进请皇帝御审。真宗则以王钦若所撰为定，未完善者，再奉旨增删。同时又命内臣刘承珪、刘崇超典管其事。又增派秘书丞陈从易、校理刘筠参与同修。还增派直集贤院夏竦、职方员外郎孙奭撰注音义。并于景德三年（1006年）四月和四年（1007年）八月，两次驾幸编修之所，指导编次。并强调："朕编

【1】[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四《太平兴国太平御览·太平广记》。

【1】[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四《景德册府元龟》。

【2】[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四《雍熙文苑英华》。

此书，盖取著历代君臣德美之事，为将来取法。"[1] 故纂修诸臣目标明确，采择精审，分为三十一部，部有总序；一千一百零四门，门有小序。祥符元年（1008年）二月，令李维等六人撰讫，付杨億等改定。五月，真宗又手书下诏，命凡悖恶之事及不足为训者，悉删去之。并令日进草稿三卷，亲加审定，凡八年而成书。祥符六年（1013年）八月十三日，王钦若等上表进呈。此为《册府元龟》的编修过程。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九月，太宗以诸家文集其数至繁，各擅所长，优劣相间，于是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直院徐铉，中书舍人宋白，知制诰贾黄中、吕蒙正、李至，司封员外郎李穆，库部员外郎杨徽之，监察御史李范，秘书监丞杨砺，著作佐郎吴淑、吕文仲、胡汀、戴贻庆，国子监丞杜镐，将作监丞舒雅等，"阅前文章，撮其精要，以类分之，为千卷，目录五十卷。雍熙三年（986年）十二月壬寅书成，号曰《文苑英华》"[2]。景德四年（1007年）八月，真宗以前所编次未尽允当，又诏三馆分校《文苑英华》，择前贤文章，重加编录，删繁补缺换易之，但仍为一千卷。此为《文苑英华》的编修过程。还可以举出很多书的编修事例，但上述已能充分说明宋代中央这种临时性编修机构及其编修活动，是十分频繁的。这四部大书，是宋代标志性的撰著，有专供资治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有继昭明《文选》之后撮选历代文章精要的《文苑英华》，也有专辑野史、小说的《太平广记》，四部大书凡三千五百卷，几乎将其以前所有著作中的精华囊括殆尽。这种规模，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仰止的文化建设工程。这种出版壮举，到今天亦不失其辉煌。宋代的尚文之策，于此可略见一斑。

## 三、宋代官私的方志修纂

凡经乱离而江山混一后的政权，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有修志的强烈激情和愿望。宋朝结束五代的分裂局面后，更视方志为佐治之具，多次下诏征集图经，纂修地理之书。并明文规定兵

部的职方郎中及员外郎，“掌天下图籍，以周知方域之广袤，及郡邑、镇砦道里之远近。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1]。因此，宋代立国不久便开始了大规模总志、方志的纂修工作。

[1]《宋史》卷一六三《职官三·兵部职方郎中》。

（一）宋代官私总志的纂修

乾德修蜀中山川形势图：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西蜀曾派孙遇、赵彦韬、杨蠲等以蜡丸中藏帛书联络北汉，以图抗拒宋兵。但他们到了宋都以后，赵彦韬却暗中将蜡丸中帛书取出，献给了医官，医官献给了宋太祖。于是太祖多次召见，问遇等蜀中山川水陆情况，并令指陈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里远近，画以为图。有了这样的地图之后，宋军便命王全斌率军依图进讨，挥师取蜀。此为宋朝立国后最早注意地理图经的实例。

开宝修《诸道图经》：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正月，命知制诰卢多逊、扈蒙等重修天下图经，未成。六年（973年）四月，卢多逊赴江南搜求江表诸州图经，因而十九州形势尽在掌握之中，以备修书。八年（975年），诏宋准修诸道图经。此为宋代立国后最早纂修的全国性的诸道图经。

太平兴国及以后修《太平寰宇记》等全国总志之书：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乐史在广泛参考山经地志和徐锴《方舆记》的基础上，修成《太平寰宇记》一书。《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目录》二卷，内容包括十三道，及十三道下属之两京、二府、三百四十四州、二县、十七监、四十四军，以及东夷十七国、南蛮五十九国、西戎八十三国、北狄四十四国。同时还将五代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割给契丹人的幽蓟十六州，写在自己的书里，以示领土主权的归属及完整。《太平寰宇记》较宋以前各志书增加了风俗、姓氏、人物、土产等内容，改变了以前志书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的缺陷，也为其后志书的纂修体例树立了典范。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太平寰宇记》提要所说：“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

然而《太平寰宇记》纂修时，宋朝还在统一的过程中，一些

尚未投降纳土的小王国尚未收入版图，因而使该书的修纂不得不更多地靠以前的资料，这是该书先天性的不足。加之乐史其人博而寡要，疏于考证，错误也在所难免。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汉被平定，唐末以来73年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北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分天下为十道。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命知制诰孙仅、龙图阁待制戚纶等重修《十道图》，而卒未克成。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格式司要用《十道图》考郡县、定俸法、登户口，急请校订新本，于是真宗才命真镛、邵焕、晏殊校订，王曾总领其事。天禧元年（1017年）才纂成《十道图》三卷。而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为应急需，王曾、李宗谔曾修成《九域图》，实则只有文字而无图。

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都官员外郎刘师旦上言：《九域图》自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修成，迄今已涉六十余年，州县有废置，名号有改易，等第有升降，所记古迹亦有出于俚俗而不经者，乞选有识之士重修。朝廷于是命馆阁校勘曾肇、光禄丞李德刍等删定，知制诰王存审其事。元丰三年（1080年）书成，名《元丰九域志》十卷，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颁行。《元丰九域志》总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三十七、监四、县一千二百三十五，都有所记载。凡州县皆依路分隶，首叙州封，次及旁郡，彼此互举而决不相混。每县下又详载乡镇及名山大川。“其于距京距府，旁郡交错，四至八到之数，缕析最详，深得古人辨方经野之意。叙次亦简洁有法”[1]。到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曾设置《九域图志》局，重修《九域图志》，这是国家设局修志的开端。但由于政治的原因，没有修成。

[1]《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元丰九域志提要》。

宋徽宗政和中（1111—1118年），庐陵欧阳忞纂成《舆地广记》三十八卷。卷一至卷三，记自尧舜至于五代的疆域大略，同时系以宋代郡县名。第四卷则专载宋代郡县名，体例特为清晰。第五卷以后，乃列四京二十三路郡县沿革离合。于燕云十六州则标目“化外州”，虽非宋所辖，而前代固有之，故仍附各郡县之

下。而于一般方志之四至八到、道里、户口、风俗、物产及诗词艺文等，则概不登录，而集中笔墨于地理沿革，形势叙述，成一家之言，备职方之考，从地文地理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成了半壁江山。理宗嘉熙时（1237—1240年）有祝穆者纂《方舆胜览》七十卷。祝穆字和甫，福建建阳人。初名丙，与弟癸同受业于朱子。做过迪功郎、兴化军（今福建莆田北）涵江书院山长。自序说“酷好编辑郡志”，故“所至辄借图经，积十余年，方舆风物收拾略尽”。同时广搜古今纪事诗文与夫稗官小说，摘其要语以附入。他为写此书，曾往来于闽、浙、江、淮、湖广之间，所到之处，登山临水，孜访风土，披览四部群书、稗官野史、金石刻辞、郡邑志乘，于是以南宋所辖十七路为脉络，以南宋行在临安为首府，记载各路及其所属府州军县之郡名、风俗、形胜、土产、山川、学馆、堂院、亭台、楼阁、轩榭、馆驿、桥梁、寺观、祠墓、古迹、名宦、人物、名贤、题咏、四六等二十方面的内容，而于其他志书所详之疆域、道里、户口、田赋等内容，则率多省略。故《四库全书总目·方舆胜览》提要论该书“惟于名胜古迹多所胪列，而诗赋序记所载独备，盖为登临题咏而设，不为考证而设，名为地记，实则类书也”。认定实为允当。

比祝穆《方舆胜览》略早，还有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二百卷问世。王象之字仪父，婺州金华人。庆元元年（1195年）进士，知分宁县和江宁县。象之曾从其父宦游江、淮、荆、闽等地，其仲兄曾至绵城，叔兄北趋武兴（今陕西略阳），南渡渝泸，为其提供各地风光材料。他认为过去的地理书，不过是辨古今，析异同，考山川之形势，稽南北之离合，资游谈而夸辩博。至若收拾山川之精华，借助于笔端，使骚人才士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尚未见其书。故矢志搜括天下地理之书与夫诸郡图经，参订会粹，每郡自为一编。以郡之因革见于编首，而诸道次之，郡之风俗又次之。它如山川之英华，人物之奇杰，吏治之循良，方言之异闻，故老之传说，乃至诗文章翰之关乎风土人情

者，均粹见于每编之下。使人一读便如身到其地，足不出户皆坐而可知。其书之纂修盖在嘉定（1208—1224年）间，而成书约在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历时十余年。以上是宋代官私纂修总志的基本情况。

（二）宋代府州县志的纂修

前边谈到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曾特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以进，以便重修《九域图志》。虽因政治动荡，《九域图志》终未修成，然其所命州郡都要编纂图经，则大大推动了各地方志的纂修。北宋方志中，有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官修的《吴郡图经》。元丰中（1078—1085年）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宋敏求《长安志》、李宗谔《越州图经》、林特《会稽录》、赵抃《成都古今集记》等，则前后接踵而出。南渡后，南方各处修志则如雨后春笋，其中尤以两浙东西路为最盛，前后纂修过方志165种，而浙东就有132种。其次是广南东西路，前后修志也有120种。四川约有110种。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也各有七八十种。福建路43种。陕、甘、河南各10余种。河北6种。山东3种。总计为718种。有的郡县还不只修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修。如临安府就有乾道、淳祐、咸淳三次修志，同时还有《仁和县图经》，仁和即杭州。明州（今宁波）则有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绍兴则有《新修绍兴图经》、绍熙《越州新志》、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嵊县有嘉定《剡录》。新昌有《剡东录》、《新昌志》。严州则有绍兴、淳熙、景定三志。台州《赤城志》也有正续三志。黄岩、永嘉、乐清、括苍、东阳、信安、吴兴各县也都有志。苏州有绍定《吴郡志》，昆山有淳祐《玉峰志》，常州有咸淳《毗陵志》。而江南东西路的建康亦有乾道、庆元、景定三次修志。又有淳熙《新安志》、绍熙《旌川志》、嘉定《泾川志》、《宣城志》、咸淳《溧水志》。另外南康、浔阳、抚州、宜春、盱江等，也都曾修志。淮南东西路则有《广陵志》、宝祐《维扬志》、绍熙《仪真志》、淳熙《吴陵志》、淳熙《高邮志》等，

此外合肥、无为也各修有志书。四川则有范成大的《成都古今丙记》、胡元质《丁记》、孙汝聪《成都古今前后记》、袁说友《成都志》等。福建路则有淳熙《三山志》、《长乐志》、宝祐《仙溪志》，另外建安、延平、清漳、鄞江、临汀、莆阳、清源等也都曾修志。他如长沙、岳阳、邵阳、零陵、襄阳、武昌、桂林、云南、遵义、潮阳、琼州、吉阳军、万安军、楚州、江州、黄州、房州、衡州、广州、云间等州县也都修有志书。常棠在宝祐间还纂修了海盐县《澉水镇志》，为后世乡镇村志之纂修开了先河。

我国的官修志书制度，底定于隋唐时期，但在体例上还多为图经体，与后世方志尚有不同。两宋则是我国近代方志体例的大致定型期，且影响到其后历代方志的纂修。宋人关于方志的起源、性质、作用、内容、资料搜集鉴别、凡例、艺文、详略、与修人员条件等诸方面，都有自己的理论。例如淳祐间所修的《玉峰志》（即《昆山志》）凡例则规定："凡事旧在昆山，而今在嘉定者，以今不逮本邑，今皆不载；凡碑记现存者，书其名不载其文，不存者载其文；凡事有《吴郡志》所载，与今所修不同者，以今所闻见无异者修；凡叙人物有本邑人而今居他所，本非邑人而今寓居者，今皆载；凡事有重见者，止载一处，余书见某门，更不重载。"这个凡例比较简单，但明确取舍，界定尺度，属于开创，多为后世修志所遵循。周应合纂修景定《建康志》，注意到该地在北宋天禧（1017—1021年）时为仁宗潜邸，南宋建炎、绍兴（1128—1161年）时又为高宗行宫的特点，则以《留都录》为首，次为《建康图》，次为《建康表》，次为十志，次为十传，末为拾遗，形成了《录》、《图》、《表》、《志》、《传》五体之例。明朝永乐十六年（1418年），公布过一个纂修志书的凡例，顺序为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城郭、镇市、土产、贡赋、田地、税银、税钞、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宦迹、人物、仙释、杂记、诗文。这是总结以前志书修纂所涉及的内容、体例而条理出来的凡例。拿着这份凡例与宋代志书相对照，许多都能在那里寻

到根源或前例。所以说宋代方志之书不仅纂修得多，且在内容、体例上继往开来，多有创建，堪为后世修志者法。地方志，实则即地方史，由各级地方官衙长官主持、官方出资修纂并出版，这是中国出版史上光辉的篇章。

## 第二节　宋代繁荣的私人撰述

宋代朝野，从皇帝到文人士子，从庙堂达官到乡村野老，个人撰述极为丰富，这跟宋代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有关系。历史经验证明，“崇文抑武”或“崇武抑文”，都是片面的，两者都曾给国家造成过惨痛教训。北宋末年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建议改崇文院为秘阁，便含有要矫正政策偏颇的意思。但终宋一代，始终没有矫正过来，因此两宋也就始终未得安宁。“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1]。这话虽是清代四库馆臣对子部书部局的阐释，但反映的是当时朝廷的大政方针。清初百年间一方面高扬“稽古右文”的大旗，一方面又宣扬多次战功，光乾隆一朝就有十大武功。这种“文武兼备”的政策，是其以前正反两方面经验培育出来的结果。当我们现在要讨论两宋繁荣的私人撰述和阐释两宋兴盛发达的出版事业时，提醒人们注意在其背后武功孱弱给国家造成损失的惨痛教训，是很有意义的。

【1】《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总叙》。

### 一、皇帝御撰之书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武，是马上皇帝，文采方面“稍逊风骚”。但自太宗赵匡义起，则情况大变，崇文之风首先由皇帝那儿刮起。据《玉海·祥符太宗御制御书目录》记载：“《太宗御集》四十卷《目》一卷、《朱邸集》十卷《目》一卷、《至理勤怀篇》一卷、《文明政化》十卷、《逍遥咏》十卷、《缘识》五卷、《秘藏诠》三十卷、《禅枢要》三卷、《莲花心轮回文偈颂》二十五卷、《心轮图》一卷、《注金刚经疏宣演》六卷、《廻文诗》四卷、《君臣赓载集》三十卷《目》二卷、《棋谱图》

三卷、《琴谱》二卷、《九弦琴谱》二十五卷、《五弦阮谱》十七卷，凡百一十九部，总二百一十八卷。龙阁、太清楼、御书院、秘阁各藏一部。副本二千一百四十八部，总万四千五百八十六卷。"[1] 这是宋太宗的撰述情况。当然，所谓御撰，也并不是说篇篇字字都是皇帝亲自动笔写的，有些是帝令别人草创而自己认同的，因而也算在他的名下，这并不奇怪，此为古今通例。

【1】[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八。

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诏丁谓等作天章阁，奉安御集。五年（1021年）三月阁成，将真宗《御制集》三百卷、《颂铭碑文》十八卷、《赞》八卷、《诗》三十七卷、《赐中宫诗》七卷、《赐太子歌诗箴述》五卷、《龙图阁歌诗》四卷、《水殿诗》一卷、《清景殿诗》二卷、《四园诗》三卷、《三教诗》九卷、《读经史诗》四卷、《维城集》三卷、《奉道诗》十卷、《岁时新咏》五卷、《乐章》一卷、《乐府集并新词》五卷、《论述》十卷、《序》八卷、《箴》七条各一卷、《记》六卷、又《记》三卷、又《记》一卷、《书》十卷、《正说》十卷、《承华要略》二十卷、《静居集》三卷、《玉宸集》五卷、《法音前集》七卷、《春秋要言》五卷、《试进士题》一卷、《密表密词》六十九卷、《玉京集》二十卷、《授时要录》二十四卷等，从玉清昭应宫奉安于天章阁[2]。这一年，真宗还没死，二年后才驾崩。北宋真宗享国25年（998—1022年），25年的时间里能有如此众多的著述，表明宋朝皇帝对于文墨之事是太过于倾心了。

【2】[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八《天禧真宗御集·注释御集·天章阁御集》。

《玉海·治平仁宗御书》记载宋仁宗赵祯"《御书》一百卷、《诗》二卷、《乐章》二卷、《述》一卷、《铭》六卷、《手诏》一卷、《记》一卷、《碑》二卷、《边防》一卷、《挽词》一卷、《观文鉴古图述》十卷、《审乐要记》四卷、《乐府要略》二卷、《乐髓新经》三卷、《迩英圣问》三卷、《钦崇禋祀记》三卷、《洪范政鉴》二十四卷（实为十二卷，每卷又分上下卷）、《洛书五事图》一卷、《风角集占》三卷、《神武秘略》十一卷、《攻守图》一卷、《释门》十三卷、《道门》二卷、《密表词》五卷"，也有23种之多。

英宗赵曙帝祚只有4年，《玉海》引征《两朝艺文志》别集类，他只有《御制集》一卷。

宋神宗赵顼，称帝18年，《御制集》也有九十卷，是由苏辙、刘颁负责编次的。到绍圣（1094—1098年）间又重行编辑，增加8 872篇，成二百卷，分为文辞、政事、边防三类。

崇宁元年（1102年）十二月十六日，徽宗下诏实录院编修哲宗御书。五年（1106年）七月二十七日书成，共一百册，凡二千五十七篇。大观元年（1107年）二月十三日，徽宗又下诏重加编纂，得五十册，以元祐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所作为前集，绍圣、元符亲政时期所作为后集。四月又诏删定所存者，凡六百九十三篇，成三十册，进呈。大观二年（1108年）四月将这些著作奉安于显谟阁。故《中兴馆阁书目》著录哲宗《御制集》前集政事十八卷、文辞一卷；后集文辞一卷、政事七卷，凡二十七卷。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十一月十七日，实录院奉诏编次徽宗赵佶《御制集》成书，上之。凡《诗》百九十五、《宫词》二百、《赋》一、《序》十二、《记》十、《碑》四、《策题》九、《文》七、《乐章》二、《挽词》二十七、《杂文》十五、《诗解》九、《论语解》二、《道德经解》八、《南华冲虚经解》二十、《圣济经》十、《科仪》二、《政事手札》千三百五十、《边机手札》二百四十四，通为百卷，高宗亲为之序。

开禧元年（1205年）七月二十四日，实录院上高宗赵构《御制集》一百卷。高宗《御制集》的编次，始于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六月，至开禧元年书成，前后历经17年。

庆元元年（1195年）十二月十八日，宁宗赵扩下诏实录院，编修孝宗赵昚《御制集》。嘉泰元年（1201年）十月二十七日，宁宗赵扩又下诏编类光宗《御制集》。开禧元年（1205年）十二月一日，诏限两年成书，实则到淳祐五年（1245年）二月，孝宗、光宗的《御制集》才编成奏上。景定二年（1261年）三月，宁宗赵扩的《御制集》亦编成奏上。

上面我们从北宋太宗排到南宋宁宗，凡十一帝，每帝都有御

制集若干卷，在封建社会的帝王中表现空前，极为突出。后世皇帝御制集能超过宋帝者，大概只有清代乾隆皇帝弘历。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皇帝既然如此在文事方面率先垂范，那么亲王、郡王、达官显贵，直至硕学鸿儒，便会紧跟其后，于是造成了浓重的社会文化气氛，个人撰述也就层出不穷。

## 二、个人撰进之书

### (一) 天文仪象阴阳律历书的撰进

宋代皇帝敕撰之书进呈、个人所得或私撰之书进览，不可胜记。景祐三年（1036年）九月，司天监丞邢中和上所藏《古今天文格子图》。康定元年（1040年）二月，天文官季自正上《星变图》。至和元年（1054年）十月九日，道士洞渊大师李思聪撰集《璇霄列象拱极图》进呈。大观四年（1111年）十二月，宰臣张商英上《三才定位图》。绍兴七年（1137年）六月八日，资州翠微洞隐士张大椷进《翠微洞隐书》、《司天玉匣秘书》、《金键要诀》等。《景祐乾象新书》、《景祐三式太一福应集要》、《宝元天人祥异书》、《庆历注天官书》、《洪范论》、《皇祐岳台晷景新书》、《元丰天文书》、《绍兴太一总鉴》、《绍兴乾象通鉴》、《绍兴天经》、《淳熙钦天要略》、《星书要略》、《崇政殿浑仪图》、《浑仪总要》、《元丰浑仪法要》、《绍圣仪象制度法略》等，也先后撰进。元丰元年（1078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提举司天监奉旨校定馆阁及私家所藏阴阳书，编成七百十九卷奏上。《皇祐乐律》、《皇祐律吕璇相图》、《元丰大乐十二均图》、《吕律新书》、《建隆应天历》、《太平兴国乾元历》、《至道新历》、《咸平仪天历》、《天圣崇天历》、《治平明天历》、《熙宁奉元历》、《元祐观天历》、《崇宁占天历》、《纪元历》、《绍兴统元历》、《绍熙会元历》、《庆元统天历》、《开禧新历》、《宝祐会天历》等律历方面的新书，也相继撰进。此为天文、仪象、阴阳、律历方面的撰进之作。其中有的虽不属个人行为，但也是个人或群体奉敕而撰。

（二）图经志书的撰进

开宝四年（971年）正月，太祖命知制诰卢多逊、扈蒙等重修《天下图经》。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闰七月，有司上诸州所贡《闰年图》。咸平四年（1001年）八月，采纳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吴淑建议，令在闰年时与《闰年图》同时绘进各路职方图，故有《咸平陕西河北地图》、《祥符西域图》、《河西陇右图》等绘进。淳化四年（993年）分天下为十道，景德四年（1007年）命知制诰孙仅、龙图阁待制戚纶重修《十道图》，未修成。祥符六年（1013年）吏部、刑部、户部急用新图，才又命校理真镛、邵焕、晏殊校定，王曾总领其事，至天禧元年（1017年）图成上之。此后又有《祥符九域图》、《熙宁十八路图》、《祥符州县图经》、《祥符山川城寨图》、《天禧南京图》等，先后陆续绘进。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十日，殿直赵珣上《聚米图经》五卷及《五阵图兵事》十余篇。元祐间又绘进《职方图》、《天下州县图》。乾道间又有《选德华夷图》绘进。此为地理图经之撰进。

图7
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太平寰宇记》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
河南道一　東京上
開封府
開封府今理開封浚儀二縣禹貢爲兗豫二州之域星分房宿
在春秋時爲鄭地戰國時爲魏都史記云魏惠王
自安邑徙都大梁卽今西面浚儀縣故城是也後
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因引河水灌城而拔之卽
以爲三川郡地漢祖起沛酈生說曰陳留爲天下
衝四通五達之郊無名山大川之阻卽此謂也後
定天下爲陳留郡之浚儀縣至文帝封皇子武爲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正月，太宗命汤悦、徐铉、王克正、张洎修《江表事迹》。太平兴国间，直史馆乐史撰进《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图7），同时还有《总记传》一百三十卷、《坐知天下记》四十卷、《掌上华夷图》一卷。太宗至道（995—997年）中，张参撰进《江左记》。景德四年（1007年）二月，侍讲学士邢昺，侍读学士吕祐之，龙图阁待制杜镐、戚纶、陈彭年奉敕编集车驾所经地理古迹以闻，祥符元年（1008年）八月《景德朝陵地里记》三十卷成书进呈。因御史知杂事赵湘的建议，祥符四年正月命直集贤院钱易，直史馆陈越，秘阁集贤校理刘均、宋绥修车驾祀

汾阴所经州县山川古迹风俗，书成赐名《土训纂录》，每驻跸舍止一次为一卷。嘉祐元年（1056年）十一月，王洙等撰进《地里新书》三十卷。因都官员外郎刘师旦建议，命集贤校理赵彦若、馆阁校勘曾肇等撰《熙宁九域志》以进。王存等纂进《元丰九域志》（图8）。元丰三年（1080年）十月，详定官制所检讨文字、光禄寺丞李德刍上《元丰郡县志》三十卷《图》三十卷。绍兴十六年（1146年）九月，抚州布衣吴澥上《宇内辩》、《历代疆域志》各十卷。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何洋召对，献《河防守禦图》。绍兴中，郑樵撰进《春秋地名谱》，掌禹锡撰进《郡国手鉴》。《淳熙九丘总要》先是由王日休进呈，仅二十卷。后孝宗又命宁国府给札写之，于淳熙六年（1179年）进呈，扩展为三百四十卷。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正月，知广州李符进《海外诸域图》。景德三年（1006年）七月，沿海安抚使邵晔上《交州图》。康定元年（1040年）九月，渭州推官魏庭坚通过王尧臣撰进《四夷龟鉴》三十卷。嘉祐二年（1057年）四月，黄州通判赵至忠上《契丹地图》及《虏庭杂记》十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光地理、地志、地图方面的个人撰进就如此丰富，其他方面可想而知。

图8
清初影宋抄本《元丰九域志》

（三）御边对策之书的撰进

南北两宋，先后与辽、西夏及金尖锐对峙，备边、安边、御边成为突出的问题，因而这方面的对策、论述也就比较多。端拱二年（989年）正月，太宗诏文武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直史馆温仲舒的对策先行进呈，得到嘉奖。因而户部郎中张洎、直史馆王禹偁等亦先后有对策奏进。英宗时更有薛向献《西陲利害》十五篇，治平三年（1066年）冬，又上《御边五利》。太宗淳化二年

（991年），曾致尧掇集前世靖边之要，列为十三门五十卷，名《靖边前要》，后又进《西陲要纪》十卷。赵瑜进《安边致胜策》三卷。刘滬进《备边机要》一卷。咸平二年（999年）钱若水进《备边五要》。三年（1000年）王济献《备边策》十五条。景德二年（1005年）七月刘质上《边防要论》，真宗嘉许，赐同进士出身。同年，陈贯上《形势选将练兵论》三篇。祥符中，张宗诲进《安边论》三十卷。景祐间，翰林承旨盛庆上《边计》十事。康定元年（1040年），都官员外郎景泰上《边臣要略》二十卷、《平戎策》三卷。同年，丁度上《备边要览》十策，张方平上《平戎十策》，夏竦议攻守计，列二策以上。庆历二年（1042年）十月，贾昌朝上《边备六事》，范仲淹上《攻守策》，姚仲孙上《边防龟鉴》。康定元年吴遵路上《陕西御戎要略》、《边防杂事》二十篇。皇祐四年（1052年），陈次公撰进《安南议》十篇，冯炳撰进《皇祐平蛮记》二卷。皇祐五年（1053年），宋祁上《御戎论》七篇。元丰五年（1082年），冯默上《平蛮方略》。淳熙十二年（1185年）十月，胡介上其父《川陕边防战守钱粮奏议》三十卷。淳熙间，程大昌撰进《北边备对》一卷（图9）。淳熙间还有《三贤安边集》进呈。绍兴二年（1132年）兵部尚书权邦彦献《十议》，七年（1137年）十一月，王缪上《六朝进取事类》，最后由胡寅撰成《三国六朝攻守要论》十卷进呈。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虽然大都是一些文人的空论，挡不住金戈铁马和强弓硬弩，但却成书颇多。从出版的角度看，未尝不是繁荣，但繁荣的背后却有不同的动因。这一点很值得出版史研究者的注意。透过表象看本质，永远是我们应该坚持的辩证法原则。

图9
清初钱曾家抄本《北边备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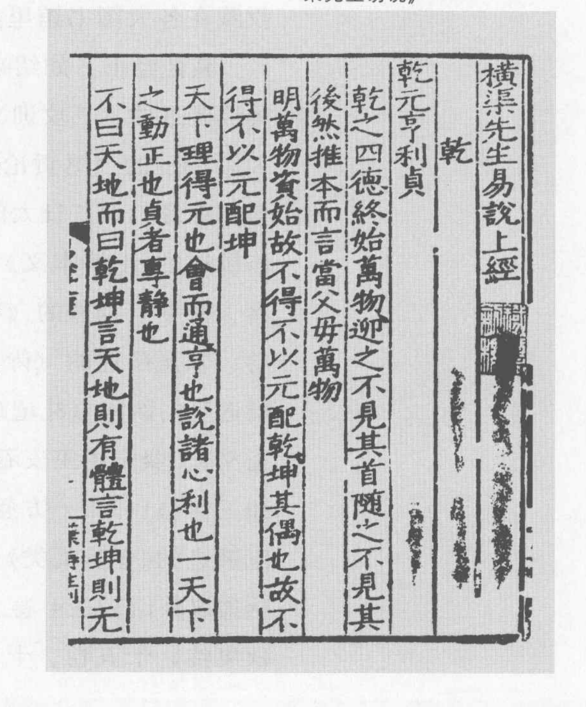
北邊備對
四海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則爲東海在廣
南則爲南海人人得而聞見不待證說矣
若禹迹所及西竟流沙而極于西海東北
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謂外
薄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
帝事遠有効弧矢兵師使命方行四表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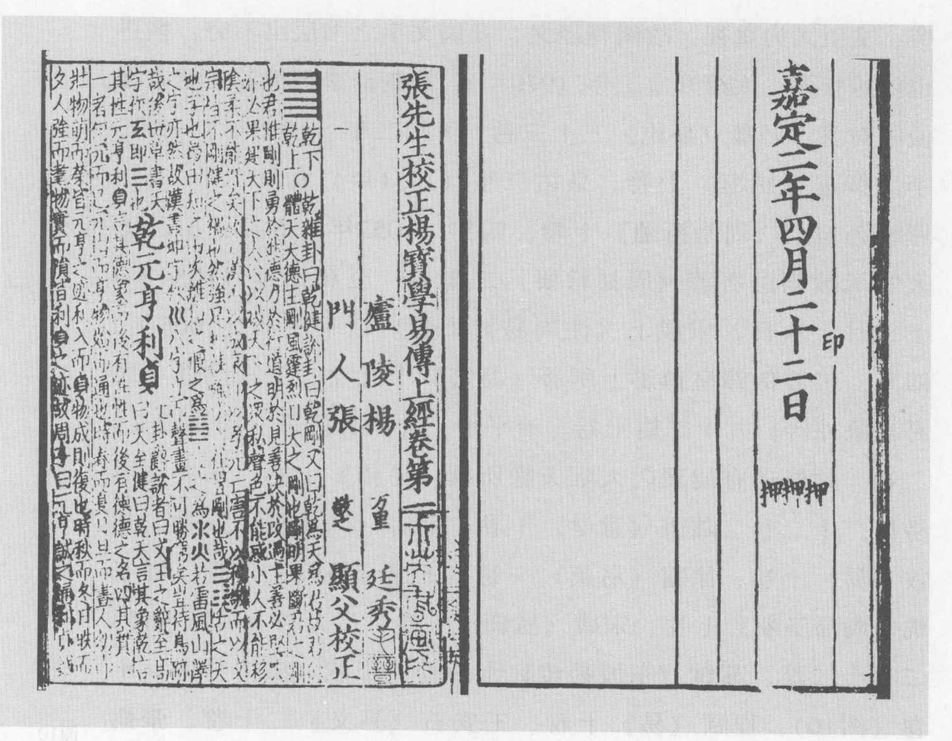
（四）解经之书的撰进

至于儒家经典，乃治道之所由，皇

帝、文臣尤为重视，故阐释经义、音训文字之书层出不穷，撰进也就比较多。太祖开宝三年（970年），知制诰李穆推荐王昭素在便殿对答，乃著《易论》三十三卷。天禧二年（1018年）七月，李见撰进《易枢》十卷。皇祐三年（1051年）九月二十二日，评事孙坦上《周易折蕴》十卷。四年（1052年）五月，田况上太常丞戴渊进所著《周易旨要》二十卷。至和元年（1054年）十二月十八日，宋咸上《注周易》十卷。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工部侍郎皇甫泌上所著《易解》十九卷。王洙撰进《周易言象外传》九十二篇十卷。治平中，叶昌龄撰进《周易图义》二卷。此外还有胡瑗门人阮天隐所撰《易传》十卷、郑夬《周易传》十二卷、陆秉《意学》十卷、邵古《周易解》五卷、刘牧《易》十卷、徐庸《易蕴》一卷、王逢《易传》十卷、鲜于侁《周易圣断》七卷、宋咸《易训》三卷、吕大防《周易古经》二卷十二篇、苏轼《东坡易传》十一卷、张载《横渠易说》十卷（图10）、程颐《易》十卷、王安石《易义》二十卷、张弼《易》十卷、房审权《周易义海》一百卷、晁说之《古易》十二卷、朱震《易集传》十一卷《易图》三卷《丛说》一卷、王湜《易学》一卷、杨万里《诚斋先生易传》二十卷、林黄中《周易经传集解》三十六卷、项安世《周易玩辞》十六卷、程迥《易章》十卷外编《占法》一卷《古易考》一卷、魏了翁《周易集义》六十四卷，等等，先后撰进。据《宋史·艺文志》记载，两宋《易》学之作，约有150多种。可见解经乃是宋朝人倾心的方向，也是他们问学的根底。这些个人撰进的《易》学著作中，有的至今还存世。如《横渠易说》、《东坡先生易解》、程颐《易传》、项安世《周易玩辞》、杨万里《诚斋先生易传》（图11）、魏了

图10
明嘉靖十七年吕柟刻本《横渠先生易说》


横渠先生易說上經
乾
乾元亨利貞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後然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
得不以元配坤
天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
之動正也貞者專靜也
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則有體言乾坤則无



嘉定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印

押押押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一

盧陵楊 廷秀

門人張 顯父校正

乾元亨利貞

图11
宋刻本《杨宝学易传》

翁《大易集义》等等，就都有传本，甚至宋时刻印出版的原物还收藏在各大图书馆里。

其他经书，如绍兴十六年（1146年）九月六日江西抚州布衣吴沆撰进的《三坟训义》三卷、淳熙四年（1177年）七月九日程大昌撰进的《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傅史浩撰进的《尚书讲义》二十二卷、欧阳修撰进的《毛诗本义》十六卷、王安石撰进的《新经毛诗》二十卷、梅尧臣撰进的《毛诗小传》、苏辙撰进的《诗解集传》二十卷、朱熹撰进的《诗集传》二十卷；咸平二年（999年）六月邢昺进呈的新印《礼记疏》七十卷、六年（1003年）颁行的《周礼正义》、熙宁中王安石在经义局撰进的《周礼义》二十二卷、政和三年(1113年）方悫撰进的《礼记解义》二十卷；天禧中叶清臣撰进的《春秋纂类》十卷二十六门、庆历中李尧俞表进的《春秋集议略论》三十卷、景祐元年（1034年）正月王沿表进的《春秋集传》十五卷、十二月崇政殿说书贾昌朝撰进的《春秋要论》

十卷；咸平中邢昺撰进的《论语正义》十卷、淳熙中朱熹撰进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绍兴间王悱进献的《孝经解义》、程全一进呈的《孝经解》、林独秀进献的《孝经指解》等，几乎每种经书都有人加工整理，反映出宋代解经之作确是不胜其多。尤其从解经中将儒学发展为理学，周、程、张、朱功不可没，也为后世所宗法，当是宋代对经学的一大贡献。

（五）史部书的撰进

史部书，正史、国史的官修自不必说，还有一些私人撰进的史书也很值得一提。如天圣五年（1027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秘书监退休官员胡旦所进呈的《唐乘》七十卷、《五代史略》四十二卷、《演圣通论》七十二卷、《将帅要略》五十三卷，就都属于史书。皇帝为嘉奖其进书，诏以其子胡彤为秘书监主簿，故至景祐元年（1034年）七月，胡旦又上《续演圣论》。与此同时，王禹偁进《五代史阙文》一卷十七篇。到祥符中，陶岳又撰进《五代史补》五卷。他如王沿《唐志》二十一卷，孙冲《五代纪》七十七卷，贾昌朝《通纪》八十卷，郑向《五代开皇纪》三十卷，任弁《两汉类记》，路振、路伦《十国志》五十一卷，郑樵《通志》二百卷，吉州布衣萧常《续后汉书》四十二卷，李杞改修《三国志》六十七卷，陈傅良《建隆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也都先后撰进。至若《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可以说是宋代所编最成功、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史学巨著，出版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此书行世后，等于为史书又创一体例，为后世所效法。此书最初是由国子监下杭州镂板，今已不可见。今仍传世者尚有宋绍兴三年（1133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及其他六个宋刻本。史书部头大，卷帙浩繁，出版这类史书很能反映出宋代出版事业的盛况。

至于说到子部书，按照清代四库馆臣的界定："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好象凡立一家之说并编纂成书者，都能称为子书。其实真正子部书的范围仍远不止立说为书者，凡有一技一能一艺之长而又形诸文字且成为书籍者，后来也都视为子书而

收入了子部。《宋史·艺文志》著录子部各家著作共3 999部，28 290卷。其中儒家类著作169部，1 234卷。当中34部是宋以前人的作品，应当剔除不计，纯宋人著作或加工注释旧著者则有135部965卷，宋人儒家著述占了《宋史·艺文志》所录儒家著作总数的79.3%。如果不惮形而上学，用这种比例加以类推，则宋人的子部著作当有3 100多部。其中儒家、道家、释家、天文、算法、农家、兵家、医家等类的著作更为突出。具体不能一一介绍。

## 三、个人别集之编刻

别集指个人作品的结集。有作者自己选编者，有作者的后人、族人、弟子、门人、朋友，乃至志同道合甚至书商编辑者。结集的时间也不同，有作者在世时编集者，有作者所生活过的当代编集者，也有不少是后世编集者。宋朝科举取士最多，加上特赐、特奏名，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进士一多，意味着文化人就多，因而别集也就多。收录现存宋人别集最为完备的目录，是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辑的《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1985年冬，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统筹安排，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接受了编辑《全宋文》的任务。为使《全宋文》编辑工作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上，他们首先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于1987年开始，编制了《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1989年由巴蜀书社正式出版。这个目录反映了国内29个省市公共、科研、高校三大系统250多家图书馆，以及日本、美国33家图书馆的现实收藏情况。共计收录两宋739人的诗词文集，其中诗集、文集、诗文合集的作者632人，词集作者107人。如此众多的宋人有别集传至于今，使我们不难想象两宋文人当时创作的盛况。其实存世的这点宋人别集，实际上不及其半。特别是有些别集，如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明州公库刻印出版的宋徐铉的《徐文公集》三十卷，于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发现，并由此而得知北宋真宗天禧（1017—1021年）中便由胡克顺率先出版了此集。宋太宗赵炅的《御制逍遥咏》十一卷，宋福州

开元寺曾予刻印出版，今藏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张诚《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录》一卷，宋咸淳五年（1269年）曾由伊赓崇阳县斋刻印出版，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三十卷，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曾由黄州官署刻印出版，今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图12）。此为王禹偁的自编文集。魏野《钜鹿东观集》十卷，绍定元年（1228年）曾由严陵郡斋刻印出版。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二十卷，北宋就已刻印出版，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还收藏一部带《别集》四卷《尺牍》二卷的乾道间（1165—1173年）刊行的版本。宋祁《景文宋公集》，南宋建安麻沙书坊曾予刻印出版，今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梅尧臣《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宋绍兴十年（1140年）曾由宛陵郡守汪伯彦刻印出版，今藏日本内野五郎家。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宋绍熙间（1190—1194年）刻印出版，今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庆元二年（1196年）周必大再次予以刻印出版，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赵抃《赵清献公文集》十六卷，于宋景定元年（1260年）由陈仁玉刻印出版，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苏洵《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十二卷，绍兴四年（1134年）由吴炎刻印出版，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陈襄《古灵先生文集》二十五卷《附录》一卷《年谱》一卷，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由陈辉在赣州刻印出版，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十二卷《年谱》一卷，宋代也刻印出版。另外宋代还出版过一部不分卷的《濂溪先生集》。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八十卷，宋代也刻印出版，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曾巩《元丰类稿》，宋代也刻印出版，今藏北京文物局。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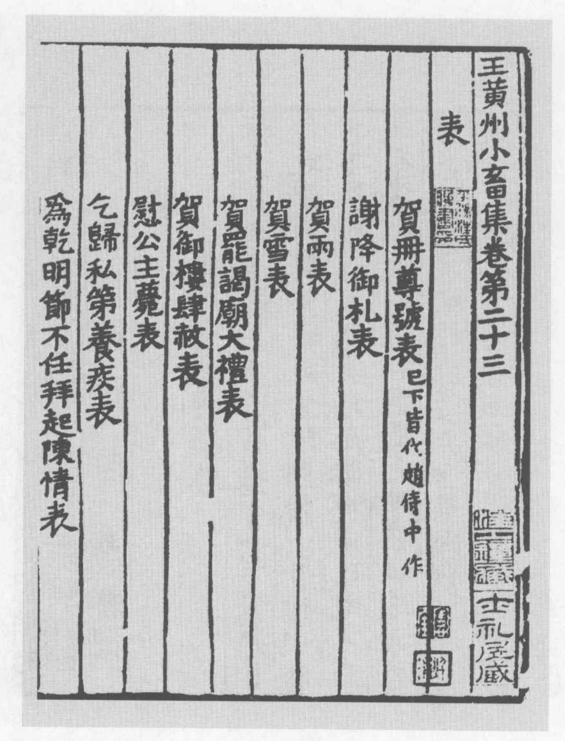

王黄州小畜集卷第二十三
表
賀册尊號表 已下皆代趙侍中作
謝降御札表
賀雨表
賀雪表
賀罷謁廟大禮表
賀御樓肆赦表
慰公主薨表
乞歸私第養疾表
爲乾明節不任拜起陳情表

图12
宋绍兴十七年黄州刻本《王黄州小畜集》

百卷《目录》二卷，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由两浙西路转运司王珏刻印出版，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苏轼的文集，宋代出版不只一次两次。其弟苏辙的文集，宋代也不只出版过一次。黄庭坚《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于乾道（1165—1173年）间由麻沙镇水南刘吉宅编辑出版，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秦观《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乾道九年（1173年）由高邮军学刻印出版，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内阁文库。陆游《渭南文集》五十卷，嘉定十三年（1220年）由其子陆子遹在溧阳学宫刻印出版，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图13）。朱熹《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则在南宋出版就不止一次。上述只是举例而已，它们不但是宋人别集的代表性作品，而且都在宋代便版行于世，反映出宋代私人创作极为繁荣，宋代出版也极为昌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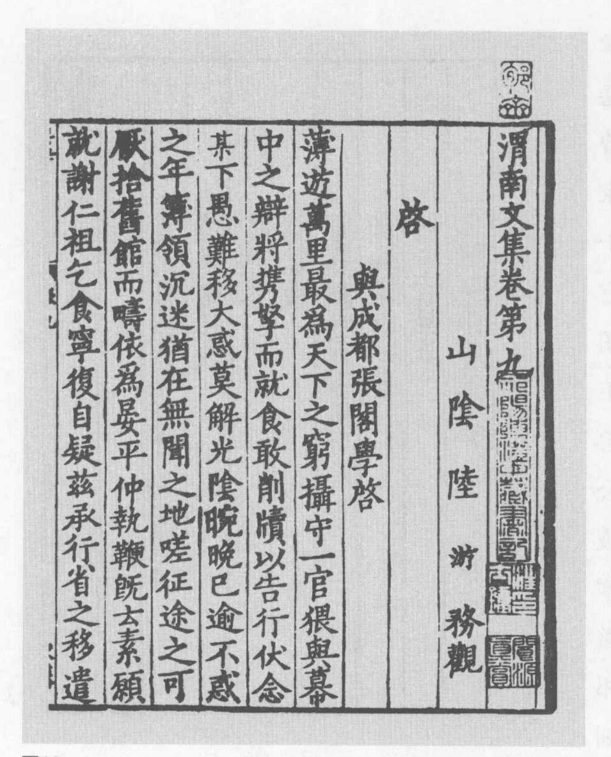

渭南文集卷第九
山陰 陸 游 務觀
啓
與成都張閣學啓
薄遊萬里最爲天下之窮攝守一官猥與幕中之辯將携挈而就食敢削牘以告行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光陰晼晚已逾不惑之年籌領沉迷猶在無聞之地嗟征途之可厭拾舊館而疇依爲晏平仲執鞭既玄素願就謝仁祖乞食寧復自疑茲承行省之移遣

图13
宋嘉定十三年陆子遹溧阳学宫刻本《渭南文集》

## 四、宋人总集之编刻

遴选历代众人之文粹为一书，以为文章轨范，是为总集。自昭明太子《文选》以降，形成了传统，历有巨帙。宋代编制总集始自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九月太宗下令编辑的《文苑英华》一千卷。南宋周必大曾说："臣伏观太宗皇帝丁时太平，以文化成天下。"[1] 这句话可以说是一语破的，点出了太宗编辑此书的政治背景。前边曾说过太宗还有一句名言："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2] 意谓打江山靠武功，坐天下却要靠文治。所以当着宋世江山基本平稳之后，大的文化工程，如《太平御览》、

【1】[宋]周必大：《周益文忠公·平园集序稿》卷十五《文苑英华》。

【2】[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五。

《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几部大书，便相继着手编制。这是文治武功交替使用的典型事例。关于宋代文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曾引述陈寅恪的一个著名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这四部大书的编纂，正是两宋文化造极的表现。《文苑英华》可以看成是《文选》的续作。《文选》收文起于先秦，迄于南朝梁初。《文苑英华》收文则起自南朝梁末，迄于唐末五代。但由于这部书选文历史跨度大，驾驭困难；加之"右文"政策的急需，仓猝上马，急于求成；编纂诸臣如扈蒙、宋白、吕蒙正等又多词章之士，并非知识渊博的学者；且不断换人，新旧衔接不契，所以弃取失当，类分失调，体例驳杂，标准不一。清代李慈铭曾批评《文苑英华》"陈陈相因，最无足观"[1]。因而到景德四年（1007年）只好由真宗下诏，令文臣择古贤文章，重加编录。南宋孝宗时曾下令杭州刻印江钿所编《文海》，周必大认为此书乃书铺所为，去取差谬，不足观。孝宗于是乃诏馆职裒集《皇朝文鉴》，周必大则乘机又建议重新厘定已有的《文苑英华》。孝宗接受建言，又命校勘官再次校定，但因校者皆书生稍及文墨者，反而妄加涂注。这是宋代官修四部大书中最不成功的一部。直至宁宗庆元初年，周必大致仕得闲，才又重新厘定，并于嘉泰四年（1204年）由周必大主持刻印出版了这部一千卷的大书。这是第一次刻印出版此书，也是宋代的最末一次。今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此本的残帙。

【1】[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戊子十一月十三日》。

真宗景德（1004—1007年）中，《西崑酬唱集》成，收杨亿、钱惟演、刘筠、李宗谔、晁迥及同馆唱和七言、五言诗二百四十七章。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祀汾阴后土之月，姚铉编辑的《唐文粹》一百卷成书，绍兴九年（1139年）由临安府官署刻印出版，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此外，王安石曾辑《唐百家诗选》二十卷。洪迈曾辑《万首唐人绝句》一百一卷。江钿曾辑《圣宋文海》一百二十卷，宋时

已刻印出版。吕祖谦曾辑《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目录》三卷，宋嘉泰四年（1204年）由新安郡斋刻印出版，今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魏齐贤、叶棻曾辑《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卷，由魏齐贤富学堂刻印出版，今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真德秀曾辑《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二十卷，宋时也刻印出版。宋临安名坊主人陈起曾遍刻唐、宋诸家诗集，又辑刻宋人《江湖小集》、《江湖续集》、《增广圣宋高僧诗选前集》一卷《后集》三卷《续集》一卷。还可以举出若干宋人编辑的诗文总集，但这已足以表明宋代对总集之编辑，也是十分倾心的。

从皇帝御制，到个人撰进，到别集编辑，到总集编选，构成了宋代庞大的私人著述队伍。这种编辑虽属编撰、编纂，并不全同于近现代出版社之编辑的性质，但古书的篇卷安排、抄写行格、大小字数、每叶行款、卷端上下题名、卷次页码等等，都在雕版这个环节之前，由出版者与刻板者共同协商、设计和决定。之后便由雕版者设定版式行款、绘画边栏界格、鱼尾书口等，而后写样上板，操刀镌刻，敷墨印刷、折页装订，出版发行。所以古人编书写书，书稿一成，在正式抄写时便由作者做了一些编辑工作，因而写本书一经行世，广为复制传播就当视为正式出版，是有一定道理的。

# 第三章　宋代的出版机构与出版概况

宋代的出版事业，适应着政治的需要和文化的需求，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的发展，逐渐兴盛发达了起来。它的重要标志，就是出现了许多出版机构、出版单位和出版家，官方出版、私宅出版与坊肆出版同时并举，在全国形成了庞大的出版网络，刊行了浩如烟海的典籍，使整个社会的出版事业呈现空前的繁荣。

宋代的出版机构，就其出资或主持的性质来说，大体可分为官方出版和民间出版两大系统。官方出版又可分为中央官署和地方官署，以及带有官方性质的各级学校、书院等的出版；民间出版又可分为私宅、坊肆，以及带有民间性质的寺院、祠堂等的出版。其中除坊肆和少数私宅专事出版，实为专门的出版机构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各种单位兼事出版。这种出版格局，发挥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也为其后历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出版事业开创了基本范式。

## 第一节　宋代的官方出版机构与出版概况

### 一、宋代中央官署的出版概况

宋代中央官署很多，但并不全都兼事出版。凡有明确官署的

名称，又知其曾经出版过什么书，都标出名称，具体阐述；只知出版过什么书，而无法考稽其出版官署者，则统归于内府之下，以求叙述上的方便，也不会产生太严重的歧异。

（一）内府出版

1. 律令格式的出版

内府一词最初是官名，职责为管理皇室的仓库。《周礼·天官·内府》说："内府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显然指的是官名。《史记·淮阴侯列传》蒯通为韩信分析楚汉之势时说："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此时"内府"已演变引伸为皇室的粮库。以后又进一步演变为皇宫的总称，在版本学研究者那里甚至演变为在京官署的总称。因此我们用"内府"一词来概括奉敕出版而又不确知其为哪个中央官署所执行时，其概念不会有太大的毛病。

北宋建国之初，最大的政治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强调国家统一，巩固新兴政权。这个最大的政治反映在出版上，就是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赵宋王朝后的第三年，即太祖建隆四年(963年)，便急忙统一律令，重定刑事法典，刻印出版《宋刑统》。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太祖建隆四年（963年）二月五日，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言'《周刑统》科条繁浩，或有未明，请别加详定。'乃命仪与权大理寺少卿苏晓、正奚屿，丞张希逊及刑部大理寺法直官陈光义、冯叔向等同撰集……至八月二日上之，诏并模印颁行。"[1]"模印"即是刊印，这是我国第一部刻印出版的刑事法典，也是宋代内府出版图籍的最早记载。窦仪等编纂的刑律是根据五代后周的《大周刑统》删订而成的，所以称为重定《宋刑统》。《大周刑统》又直接来自《唐律疏义》，因此重定《宋刑统》也就基本保存了唐律的原则精神和基本框架，所以它是研究北宋以前，特别是研究唐代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重要法律文献。当然，重定《宋刑统》对《大周刑统》和《唐律疏义》的具体内容和条文，也不是没有增损，例如原有的"折杖法"，在《宋刑统》中就被取消了。但总的看重定《宋刑统》基本上保存

【1】《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六十四册《刑法一》。

了唐律的面貌。同时还汇集中唐以后颁行的有关刑事的敕、令、格、式，分门别类附于书后，作为正式刑律的修改和补充，所以重定《宋刑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刑事法典。

在编纂版印重定《宋刑统》的同时，窦仪等又上“《编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条。诏与新定《刑统》三十卷并颁天下，参酌轻重为详”[1]。这就是所谓的《建隆编敕》。《编敕》是根据情况由朝廷或皇帝临时下达的诏令规定，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常有的现象，也是必要的。自《建隆编敕》作为正式刑法的补充并颁行天下之后，此后宋代历朝都有类似的东西出现，成为定制。如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六月，《太平兴国编敕》颁行；端拱二年（989年）下诏编次此前敕令；淳化五年（994年）修成《淳化编敕》颁行；景德二年（1005年）九月，三司进呈《新编敕》十五卷，皇帝从大臣之请，镂板颁行。

[1]《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一》。

北宋建国之初，政权未稳，自顾不暇，为什么非要急急忙忙编定出版刑事法典和敕、令、格、式？可以说这完全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唐末、五代时期各地拥兵的藩镇，不但在地方把持了军、政、财、文等大权，而且在藩镇中用军校作马步都虞候，兼管刑法狱断，称为马步院，将执掌生杀的司法权也垄断在自己的手里，这就造成了各地法律的不统一，执法的不一致，因而也就给一些“奸民歹徒”以违法乱纪的可乘之机。北宋建国后，太祖、太宗为了扭转这种法律混乱的局面，不但亲自折狱，而且采取行政措施，改马步院为司寇院，选派新及第的进士到各州去作司寇参军，代替过去藩镇中的马步都虞候，掌管各州的刑法。太宗时又在各路设提点刑狱司，掌握地方的司法大权。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就是统一全国律令，建立法制规范。因为有了法，才能建立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国家机构；有了法，才能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建设国家政权。这就是北宋建国之初首先编定出版刑事法典及敕、令、格、式的内在原因。

2. 释家大藏的首次刻印出版

宋太祖赵匡胤本是行伍出身，又深受后周世宗反对、限制佛、道教的影响，所以起初对于儒术和佛、道教的作用都不怎么看重。但当他取得政权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稳固刚刚建立的统一政权，他不得不面对现实，顺从民心，改变策略。

众所周知，五代时期，佛教在一些封建割据的独立王国内很是流行。如在吴越、南唐、后蜀等，朝野就都很崇信佛教。宋太祖用武力统一了这些割据的独立王国以后，为了争取这些地区地主阶级的支持和收买这些地区的人心，一反过去的思想，对佛教反而采取了保护政策。当时有个河南府进士李蔼，作《灭邪集》，表示反对佛教。宋太祖就拿他开刀，责难他是"非毁佛教，诳惑百姓"，把他流放到沙门岛。紧接着于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特派高品级官员张从信前往益州（今成都）主持监雕佛教大藏经13万版，凡5 048卷，480函，1 076部。这就是我国出版史上有名的《开宝藏》、也称为《蜀藏》的雕版印刷出版工程。这部大藏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印行的佛教文献总汇，它的雕印不但使宋朝收到了巩固统治的政治效果，而且也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出版印刷事业的实践。通过这次实践，培养了大批雕印工人，积蓄了丰富的印刷出版经验，使自唐末以来就有刻书出版基础的四川，到了宋代则更发展成为全国三大刻书出版中心之一，对当时和后世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版雕成之后运至京师，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于开封（汴梁）太平兴国寺内的印经院刷印完成，历经12年。《开宝藏》的雕版虽在四川，那是利用了当时该地的刻字工人和雕版技术，它犹如当今的印刷厂，并非出版社。出版社的书稿可以发到任何地方的印刷厂去排字去印刷，也可以一厂排字制版而另一厂印刷。故《开宝藏》的真正出版者，是当时的朝廷，是皇帝，是内府，而雕版在四川，印刷在汴梁（开封）。国家图书馆所藏《开宝藏》中的《佛说阿惟越致遮经》镌有"大宋开宝六年癸酉岁奉勅雕造"题记可证。

3. 天文乾象之书的出版

中国封建社会，其实早于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历来都十分重视天文乾象之书的编纂和缮正工作，宋代的历朝皇帝也毫不例外。原因是无论他们称王或称帝，都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南面称君是在替天行道。行道好坏上帝都会通过天文乾象表示自己的褒贬态度，皇帝根据这种警示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政策。忠臣良将也以此作为规劝皇帝的依据和手段。故历代对这类书的编撰，不遗余力。宋代如邢中和的《古今天文格子图》、季自正的《星变图》、李思聪的《璇霄列象拱极图》、元祐《四时中星图》、绍兴《盖天图》、乾道御制《敬天图》、《景祐乾象新书》、《三式太一福应集要》、宝元《天人祥异书》、康定《洪范政鉴》、《风角集占》、庆历《天官书》、元丰《天文书》、绍兴《乾象通鉴》、《太一总鉴》、《天经》、淳熙《钦天要略》等，均先后被进呈或编撰了出来。宋时图书出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雕版印行，一种是缮正传抄。宋杨惟德等编撰的《景祐乾象新书》三十卷，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司天监秦孝先、苏宗亮、徐钦邻等写本（图14）；宋王安礼、欧阳发等看详的《灵台秘苑》十五卷，明抄本；题宋李季编撰的《乾象通鉴》一百卷，明抄本等，就都以抄本形式流传，今中国国家图书馆都有收藏。

4. 皇帝御书的出版

《玉海》卷二十八记录了一个太宗赵炅的御制集目录，谓“凡百一十九部，总二百一十八卷，龙阁、太清楼、御书院、秘阁各藏一部。副本二千一百四十八部，总万四千五百八十六卷。……《十二愿》至《百官历子序》，刻板于御书院。《心轮图》、《大言赋》并录出别行”。如此众多的副本，恐非雕版印行而难其成。而《十二愿》等则由御书院正式刊印出版，也能印证这一点。原因是这两部书非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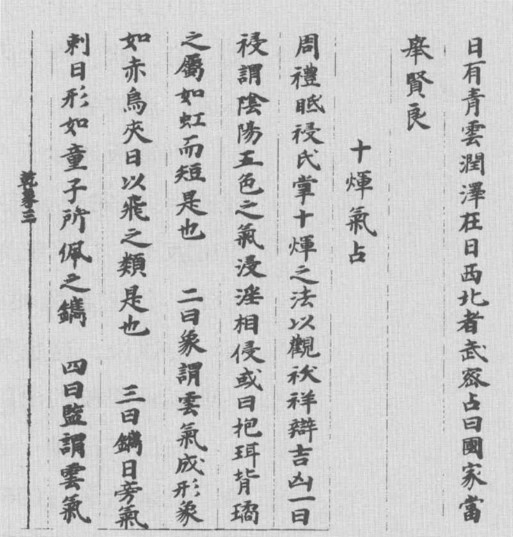

日有青雲潤澤在日西北者武密占曰國家當
舉賢良
十煇氣占
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祆祥辨吉凶一曰
祲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
之屬如虹而短是也　二曰象謂雲氣成形象
如赤鳥夾日以飛之類是也　三曰鑴日旁氣
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鑴　四曰監謂雲氣
乾象三

图14
北宋元丰元年司天监秦孝先、苏宗亮、徐钦邻等写本《景祐乾象新书》

是太宗御撰，而且是御书，故由御书院刊行出版。

《玉海·真宗御集·注释御集·天章阁御集》卷二十八记载："天禧元年（1017年）十一月庚子，龙图阁待制李虚己等上新编御集百二十卷、目录三卷。……四年春，著作佐郎张仲尹上言：'御制文集，望诏儒臣笺注。'既而两制拜章继请，遂从之。六月甲午，诏宰相寇准，参政李迪参详，学士杨亿、钱惟演、盛度等十人为注释官，仍就禁中崇文院为注释所。七月壬子，又以馆阁官张复等二十七人为检阅官。准、迪罢，丁谓、冯拯代之，注成。……十一月壬戌，宰臣言：'圣制已分部帙，望摹印赐馆阁及名山。规度禁中严洁之所，别创殿阁缄藏。'诏可。"表明真宗赵恒的《御制文集》一百二十卷《目录》三卷，还在他在世时就正式雕印出版了。

天禧元年李虚己所上真宗《御制集》仅一百二十卷，至五年（1021年）三月天章阁建成，奉安御集于其内。这时辅臣又新编"《御制集》三百卷、《颂铭碑文》十八卷、《赞》八卷、《诗》三十七卷、《赐中宫诗》七卷、《赐太子歌诗箴述》五卷、《龙图阁歌诗》四卷、《水殿诗》一卷……《圣政纪》凡一百五十卷，并镂板"[1]。《玉海》卷二十八引《真宗实录》亦谓："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戊午，上御龙图阁，召近臣观图籍，御制文、论、歌、诗，因谓辅臣曰：'朕听览之暇，留心翰墨，久而不废，遂盈卷帙。'丁谓等曰：'陛下圣文冠古今，愿付臣等编集，仍镂板颁示天下。'上许之。庚申，内出圣制七百二十二卷付辅臣。"完全证实了北宋真宗的《御制集》七百多卷的确是刻印出版了。仁宗乾兴元年（1022年）八月，也就是真宗驾崩的第二年，仁宗赵祯便将这些印制出版的真宗《御制文集》分赐辅臣。应该说，这也是规模不小的出版工程，可以说是宋代内府的一项颇具规模的出版物。

宋仁宗赵祯，在位长达41年，著述颇多，粗略统计也有23种，英宗治平（1064—1067年）中由吕公著、邵必编辑而成，藏于宝文阁。英宗赵曙在位仅四年便驾崩，且身体不好，其御制集

【1】［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八《天章御集》。

只有一卷。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中书舍人苏辙、刘攽奉命编辑神宗赵顼《御制集》。四年（1089年）三月完成，三省和枢密院请哲宗御制序。凡收录文章935篇，厘为90卷，目录5卷。苏辙奏称："内四十卷，皆赐中书、密院及边臣手札，言攻守密计，先被旨录为别集，不许颁行。仍制集序一篇……窃见祖宗御集，皆于西清建重屋，号龙图、天章、宝文阁，以藏其书。为不朽计，又刻板模印，遍赐贵近，乞付三省，依故事。"故于元祐"六年（1091年）九月，诏以《边机》四十卷送密院机要库掌之。……绍圣（1095—1098年）中，诏再加编次，至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书成，比元祐所集凡增八千八百七十二篇，通为二百卷，更以文辞、政事、边防三门为目。靖国元年（1101年）诏以文辞十卷、政事一百五十卷，镂板颁赐"[1]。表明宋神宗的御制文，除涉及军国边机不宜公开者外，其余也都由内府正式刊印出版了。

【1】[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八《元祐神宗御集·圣制神宗文集序》。

崇宁元年（1102年）十二月，徽宗命实录院编次《哲宗御书》。五年（1106年）七月书成，凡录文章2 057篇，成100册。大观元年（1107年）二月又诏重加编次，得50册。同年四月，又诏删定，所存者693篇，成30册。二年（1108年）四月奉安于显谟阁。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十一月，实录院奉诏编成徽宗《御制集》，奉安于天章阁。开禧元年（1205年）七月，实录院奉诏编成高宗《御制集》百卷。庆元元年（1195年）十二月，实录院奉诏编辑孝宗《御制集》。嘉泰元年（1201年）十月，诏编光宗《御制集》。淳祐五年（1245年）二月，两集编成上之。景定二年（1261年）三月，宁宗《御制集》亦编成上之。表明宋代从太宗至宁宗十一帝都有《御制集》行世，这是个相当规模的内府出版物。

（二）国子监出版

宋代的国子监，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仁宗后成为掌管全国学校的总机构，犹如后来的教育部。"旧置判监事二人，以两制或带职朝官充，凡监事皆总之。直讲八人，以京官选人充，掌以经

术教授诸生。丞一人，以京朝官或选人充，掌钱谷出纳之事。主簿一人，以京官或选人充，掌文簿以勾考其出纳。监生无定员。元丰官制行，始置祭酒、司业、丞、主簿各一人，太学博士十人，正、录各五人，武学博士二人，律学博士、正各一人……建炎三年，诏国子监并归礼部。未几，诏复养生徒，置博士。绍兴十二年，置祭酒、司业各一人。十三年，太学成，增置博士、正、录……至隆兴以后，正、录不兼权，祭酒、司业并置，复书库官。淳熙四年，置监门官一员，兼管石经阁，以不厘务使臣充，以后相承不改。……淳化五年，判国子监李至言：'国子监旧有印书钱物所，名为近俗，乞改为国子监书库官。'始置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元丰三年省。中兴后，并国子监入礼部。绍兴十三年，复置一员；三十一年，罢。隆兴初，诏主簿监书库。乾道七年，复置一员"[1]。可见宋代国子监不但是最高学府、教育主管部门，还兼具出版发行典籍的职能，并设有专门的机构。淳化是北宋二帝太宗的年号，淳化五年是994年，距赵宋立国仅34年。淳化五年，由于认为"印书钱物所"名称近俗，改称"国子监书库官"，专掌雕印经史群籍。可证在淳化五年以前的国子监刻书机构，名印书钱物所，淳化五年以后，由于李至的建言，才改印书钱物所为"国子监书库官"，并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

【1】《宋史》卷一六五《职官五》。

1. 国子监校刻出版经书

前边说过，宋太祖是以后周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身份，用兵变手段从后周那里夺得皇位，对从后周开始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动都很熟悉，对其中一些有益的事业也能接续而做。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二月，曾下诏刻印出版了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易》、《书》、《周礼》、《仪礼》四经的释文，由田敏、尹拙、聂崇义校勘。到宋太祖时则相继校勘《礼记》、《春秋》三传和《毛诗》释文。建隆三年（962年）判监崔颂等上新校《礼记释文》。开宝五年（972年）判监陈鄂与姜融等四人校《孝经》、《论语》、《尔雅》释文上之。二月，李昉、知

制诰李穆、扈蒙校定《尚书》释文。诏并刻板颁行。咸平二年（999年）十月十六日，直讲孙奭请摹印《古文尚书音义》，与新定《释文》并行。从之。景德二年（1005年）四月，吴铉曾上言国子学版本《尔雅释文》多误，于是命杜镐、孙奭详定，天圣四年（1026年）五月由国子监受命刻印出版颁行。端拱元年（988年）三月，国子监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百八十卷，诏国子监镂板颁行。

淳化三年（992年），"判监李至言：'义疏、释文尚有讹舛，宜更加刊定。杜镐、孙奭、崔颐正苦学强记，请命之复校。'至道二年（996年）至请命礼部侍郎李沆，校理杜镐、吴淑，直讲崔偓佺，孙奭、崔颐正校定。咸平元年（998年）正月丁丑，刘可名上言诸经板本多误，上令颐正详校。可名奏《诗》、《书》正义差误事，二月庚戌，奭等改正九十四字。沆预政；二年（999年），命祭酒邢昺代领其事，舒雅、李维、李慕清、王涣、刘士元预焉。《五经正义》始毕"[1]。可证《五经》释文、正义，国子监不只是一次刻印出版。淳化三年以前的印板写样，由前资官或进士书写。三年以后国子监所刻诸经正义，则由赵安仁写样上板。赵安仁（958—1018），字乐道，洛阳人。太宗雍熙二年（958年）进士，历太常等职。真宗朝，拜右正言，参预重修《太祖实录》。迁知制诰，知审刑院，充翰林学士，累官至御史中丞。此人字写得好，故请他写样上板。

淳化五年（994年），李至兼判国子监，上言："《五经》书疏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备，岂副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偓佺皆励精强学，博通经义，望令重加雠校，以备刊刻。"太宗皇帝采纳了李至的建议，并"引吴淑、舒雅、杜镐检正讹谬，至与李沆总领而裁处之"[2]。至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三月癸巳，命国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传正义。又重定《孝经》、《论语》、《尔雅》正义。四年（1001年）九月丁亥，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及直讲崔偓佺表上重校定《周

[1]［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三《端拱五经正义》。

[2]《宋史》卷二六六《李至传》。

礼》、《仪礼》、《公》、《穀》传、《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凡一百六十五卷。赐宴国子监，昺加一阶，馀迁秩。十月九日命摹印颁行，于是《九经》疏义具矣”[1]。

【1】[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三《咸平校定七经》。

可是到咸平元年（998年）正月，刘可名又上言诸经板本多误，真宗又命择官详校。“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一日，（真宗）幸国子监，历览书库，观群书漆板，问祭酒邢昺曰：‘板数几何？’昺曰：‘国初印板止及四千，今至十万，经史义疏悉备。’帝曰：‘非四方无事，何以臻此？’因益书库十步，以广所藏。又诏褒之。九月辛亥，命侍学士邢昺与两制详定《尚书》、《论语》、《孝经》、《尔雅》文字。先是，国子监言群经摹印岁深，字体误缺，请重刻板。因命崇文检详杜镐、诸王侍讲孙奭详校，至是毕，又诏昺与两制详定而刊正之。祥符七年（1014年）九月，又并《易》、《诗》重刻板本，仍命陈彭年、冯元校定。自后《九经》及释文有讹缺者，皆重校刻板。天禧元年（1017年）九月癸亥，诏国子监，群书更不增价。五年（1021年）五月辛丑，令国子监重刻经书印板，以岁久刓损也”[2]。至此，不难看出自宋太祖起，中经太宗，直至真宗，凡三朝半个多世纪，几经整理，几经刊定，几经雕印，儒家经典的《九经》疏义和释文都已正式出版。故真宗视察国子监，问及经书版片时，祭酒邢昺不无自豪地回答：“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并颇有感慨地谈道：“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3] 国初不及四千板，仅几十年刊板竟达十余万块，翻了二十余倍。可见国子监刻书出版之多之快之盛。

【2】[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三《景德群书漆板·刊正四经》。

【3】《宋史》卷四三一《邢昺传》。

2. 国子监校刻出版史书

对正经如此，对正史也不遗余力。太宗“淳化五年（994年）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杜镐、舒雅、吴淑、潘谨修校《史记》，朱昂再校；陈充、阮思道、尹少连、赵况、赵安仁、孙何校前后《汉书》。咸平中，以校勘未精，命陈尧佐等复校《史记》，景德元年正月丙午，任随等上《复校史记刊误

文字》五卷。赐帛。丁未，命刁衎、晁迥、丁逊复校前后《汉书》。二年七月壬戌，衎等上《复校前后汉书板本刊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上之。赐器帛。咸平三年十月校《三国志》、《晋书》、《唐书》，五年毕。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天圣二年六月辛酉，校南北《史》、《隋书》，四年十二月毕。景祐元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复校南北《史》。九月癸卯，诏选官校正《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二年九月壬辰，诏翰林学士张观刊定《前汉书》，下胄监颁行。秘书丞余靖，请刊正《前汉书》，因诏靖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至是改旧摹板。嘉祐六年八月，校梁、陈等《书》，镂板"[1]。"嘉祐七年十二月，诏以七史板本四百六十四卷，送国子监镂板颁行。唯开宝所修《五代史》未布，以俟笔削"[2]。表明从淳化五年（994年）至嘉祐七年（1062年），前后用了66年的时间，几经校勘，几经摹印，最后由国子监正式雕印出版，共十五史。其中《唐书》、《五代史》，北宋均行重修，故不忙于雕印出版。待修好后再行出版，此为后话。所以宋时已有十七史。此事，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史部，有类似记载。

到金人攻破开封，汴京失守，国子监所藏书籍及书籍版片则被劫掠一空。所以到了南宋初年，国子监只好重新校刻经史群书。"监本书籍者，绍兴末年所刊也。国家艰难以来，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张彦实待制为尚书郎，始请下诸道州学，取旧监本书籍，镂板颁行。从之。然取诸书多残缺，故胄监刊《六经》无《礼记》，正史无《汉》、《唐》。二十一年五月，辅臣复以为言。上谓秦益公曰：'监中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镂板，虽重有所费，盖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3]。可见宋代国子监刻书，也随着国势的兴衰，两起两落。北宋国子监刻书曾盛极一时，但衰于金人破汴。南宋偏安，时有中兴，国子监刻书又盛极一时。当然，所谓宋代国子监出版，除本监的印书钱物所和后来的书库官直接雕印出版外，还有很多书经校订后下各地镂板。"若七经正

[1]［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三《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

[2]［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三《景德群书漆板·刊正四经》。

[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

义，若《史》、《汉》三史，若《资治通鉴》，若诸臣书，皆下杭州镂板"[1]。说明宋代国子监带有国家出版社的性质，自己编校好的书稿，可发本监书库官镂板，也可下地方镂板。有些近乎现在的出版社，本社编审的书稿，既可在本社印刷厂排印，也可在其他任何地方印刷厂排印。可见宋代国子监非但是最高学府、国家教育管理机关，还是国家出版总社。所以虽是国子监，却是国家中央一级的出版大社。

【1】王国维：《两浙古本考》。

3. 国子监校刻出版其他书籍

国子监有时还奉中书门下敕牒，执行皇帝命令，开雕某些重要典籍。如北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国子监便奉中书门下敕令雕印了《说文解字》。牒称："许慎《说文》起于东汉，历代传写，讹谬实多，六书之踪，无所取法。若不重加刊正，渐恐失其源流。爰命儒学之臣，共详篆籀之迹。右散骑常侍徐铉等，深明旧史，多识前言。若能商榷是非，补正缺漏，书成上奏，克副朕心，宜遣雕镌，用广流布。自我朝之垂范，俾永世以作程。其书宜付史馆，仍令国子监雕为印版。"[2]"自我朝之垂范，俾永世以作程"，实在是有了率先垂范，以为后世法的出版思想。

【2】李致忠：《宋版书叙录·说文解字》。

北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中书门下又奉旨牒令国子监依孙奭所奏雕印《后汉志》三十卷。牒称："国子监翰林侍讲学士尚书工部侍郎、知审官院事、兼判国子监孙奭奏：'臣忝膺朝命，获次近班。思有补于化文，辄干尘于睿览。窃以先王典训，在述作以惟明，历代宪章，微简策而何见！铺观载籍，博考前闻，制礼作乐之功，世存沿袭。天文地理之说，率有异同。马迁八书，于焉咸在。班固十志，得以备详……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佚，终遂补全。缀以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惟《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前》、《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牒，奉敕，宜令国子监依孙奭所奏施行。"[3]

【3】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三月，“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三司户部判官、太常丞、直史馆郑戬等奏：‘昨奉差考校御试进士，窥见举人诗赋多误使音韵，如叙序、坐座、底氐之字，或借文用意，或因释转音，重叠不分，去留难定，有司论难，互执异同，上烦圣聪，亲赐裁定。盖现行《广韵》、《韵略》所载疏漏，子注乖殊，宜弃仍留，当收复缺，一字两出，数文同见，不详本意，迷惑后生。欲乞朝廷差官重撰定《广韵》，使知适从。’”[1] 奏文得准，诏祁、戬与国子监直讲王洙同刊修；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李淑详定。又以都官员外郎、崇政殿说书贾昌朝尝纂《群经音辨》，奏同刊修。至宝元二年（1039年）九月书成上之。九月十一日由延和殿进呈，奉旨由国子监开雕。庆历三年（1043年）雕印工竣，仍由延和殿进呈，亦奉旨由国子监施行。

[1] 李致忠:《宋版书叙录》相应条。

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命杜镐等校《道德经》，六月毕功。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校定《庄子》，并以《释文》三卷雕印出版。祥符四年（1011年）三月，校《列子》，五年四月进呈新出版《列子》。十月校《孟子》，并由孙奭采众家之长，撰《音义》二卷，七年正月，刻印出版《孟子》及《孟子音义》，进呈御览。表明子书，国子监也已校正开雕。

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国子监奉敕开雕《千金翼方》、《金匮要略》、《王氏脉经》、《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竣工。书后亦有国子监牒文，谓监官准尚书礼部符准绍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敕，中书省尚书省送到礼部状，据国子监状，据翰林医学本监三省看治任仲言状，伏睹本监先准朝旨，开雕小字《圣惠方》等共五部出卖。医方一字之差，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得由国子监校刻出版，并由大字改为小字，以便社会各阶层买得起，用得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结合得十分完美。

上述种种，说明中书省、尚书省、礼部等上级机关，也奉旨给国子监下达刻书出版任务，使国子监更具国家出版总社的性质。按宋代的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号称三省。中书、门下

是宋朝中枢部门的首脑官署和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务的最高行政机构。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其地位和职权是“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1]。很类乎现在的国务院，是中央政府，当然可以给下属机关下令雕版印书。中书省，又称为“右省”。其长官是中书令，副长官是中书侍郎。另派中书舍人任判中书省事，真正掌管本省职权。中书省的职权是主管郊祀、皇帝册文、幕职州县官考课、斋郎等年满复奏、文官改赐章服、僧道赐号、举人出身、寺观名额等。特别是他掌管皇帝册文，亦有权下令国子监刻书出版。尚书省又称“都省”。其长官名义上是尚书令，还有左右仆射、左右丞相等，但尚书令从不委任。实际另派诸司三品以上官员或学士一员任“权判尚书都省事”。尚书的职权是总辖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和司封、司勋、考功、度支等二十四司，并主管议定官员谥号、祀祭、受誓戒、在京文武官员封赠、注甲发付选人、二十四司人吏迁补等事。所以上述国子监刻印医方药书，是接到了中书省、尚书省送来的礼部呈请的牒文，奉命承印出版的。

[1]《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

前边在谈到国子监书库官时，已介绍了其职责是“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值，以上于官”。进一步表明了国子监刻书的用向：一是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二是为天下士子提供读书范本；三是为发卖或许人出钱刷印而收其值，以充公帑。如前述雍熙三年由中书门下牒令国子监雕印的徐铉《新校定说文解字》，及“《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绍圣三年由中书省、尚书省牒礼部所请，着国子监所刻的“小字《圣惠方》等五部出卖。并每节镇各十部，余州各五部，本处出卖。今有《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王氏脉经》、《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五件医书，日用而不可缺。本监虽见印卖，皆是大字，医人往往无钱买，兼外州军尤不可得。欲乞开作小字，重校对出卖”。这不啻为国子监推销自己刻书的一张广告。可见宋代国子监，不但是中央机关中最大的出版机构，而且还自办发行，许人花钱刷印，可谓集出版社、印刷厂、发行总

店于一身。这在10世纪的世界文化史上，不能不说是新鲜事物。表明宋代的出版业，走在了彼时人类文明的前列。

（三）崇文院出版

崇文院，北宋太平兴国三年设置。“宋初，置三馆长庆门北，谓之西馆。太平兴国初，于升龙门东北创立三馆书院。三年，赐名崇文院，迁西馆书贮焉。东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四部，为史馆书库。大中祥符八年，创外院于右掖门外。天禧初，令以三馆为额，置检讨、校勘等员。检讨以京朝官充，校勘自京朝、幕职至选人皆得备选。以内侍二人为勾当官，通掌三馆图籍事。孔目官、表奏官、掌舍各一人。又有监书库内侍一人，兼监秘阁图籍孔目官一人……端拱元年，就崇文院中堂建阁（秘阁），以三馆书籍真本并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淳化元年，诏次三馆置直阁、校理，以诸司三品、两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阁事。直阁、校理通掌阁事，掌缮写秘阁所藏。供御人、装裁匠十二人。元丰五年。职事官贴职悉罢，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官属，始立为定员，分案四，置吏八”[1]。可证崇文院亦纯属文化机构，其刻书亦属不少，也是宋代中央机关中兼事刻书出版的机构之一。就目下所知，崇文院于咸平三年（1000年）刻印出版了《吴志》三十卷，景德四年（1007年）刻印出版了《广韵》五卷，天圣中（1023—1032年）又刻印出版了《隋书》八十五卷、《律文》十二卷、《音义》一卷，《齐民要术》十卷，宝元二年（1039年）刻印出版了贾昌朝《群经音辨》七卷。元丰五年（1082年）改崇文院为秘书省，又由赵彦若等校定刊行《算经》十书，这是数学书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

【1】《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

（四）秘书省出版

秘书省从崇文院改名而来，实际上是中央国家机关中专事编纂撰修的机构。置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少监为之贰，而丞参领之。其属有五：“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二人，掌修纂日历；秘书郎二人，掌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各分

其类；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雠典籍，刊正讹谬，各以其职隶于长贰……绍兴元年始诏置秘书省，权以秘监或少监一员，丞、著作郎佐各一员，校书、正字各二员为额……即秘书省复建史馆……五年……又移史馆于省之侧，别为一所，以增重其事。九年，诏著作局惟修日历，遇修国史则开国史院，遇修实录则开实录院，以正名实。"[1] 所以宋代的国史院时有时无，其亦兼刻书出版当无疑义，但仅知其于景祐四年（1037年）开雕过《景祐乾象新书》，此为宋代国史院刻书出版的实例。其下属之太史局印历所，则是个专门出版历书的机构。"太史局掌测验天文，考定历法。凡日月星辰，风云气候，祥眚之事，日具所占以闻。岁颁历于天下，则预造进呈"。其所属之"印历所，掌雕印历书。南渡后，并同隶秘书省，长、贰、丞、郎轮季点检"[2]。可见宋代的历书每年是由太史局编制，由其所属的印历所雕印出版的。这是为了统一正朔，避免民间滥造。此在唐代已然，宋代更加规制了。

【1】《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

【2】《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

（五）左司郎局出版

左司郎局盖属尚书省。宋代尚书省有左司、右司，内外文字，申报到都省开拆房，由左右司分定，即日发付。也称为都司。类乎办公厅，故文牍书籍之事，也是其职责之一。现知左司郎局于淳熙三年（1176年）刻印出版了《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卷后有题记："淳熙三年四月十七日，左司郎局内曹掌典秦玉祯等奏闻：'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不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九月进览。监造臣曹栋校梓，司局臣郭庆验牍。'"[3] 可知尚书省左、右司郎局也从事刻书出版活动。

【3】《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三。

此外御书所、礼部、刑部、进奏院、尚书度支部、编敕所、详定一司敕令所、德寿殿等，也各刻过一些专业的书和律令条格。

开宝间在成都开雕的《大藏经》十三万版，后来也运到京师开封。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在京师设置印经院。熙宁四年（1071年）仲秋初十日，中书奉神宗旨意，又将《大藏经》版赐

予显圣寿禅院，并许国内各处庙宇可自备纸墨费，向其借版印造。婺州开元寺新建大藏经楼，便自备纸墨之值赴汴京印造这部《大藏经》。嘉祐中（1056—1063年）又印造宣赐松江府兴圣院。崇宁五年（1106年）又印造赐予汀州开元禅寺。所以这部《大藏经》虽版雕益州，而印造却多在汴京。可见宋代的中央所在之地，各机关单位雕版印书的出版活动是相当频繁的，标志着宋代图籍出版事业的勃兴与繁荣。

## 二、宋代地方官署的出版概况

宋太祖受周禅，逐渐得天下之地。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至道三年（997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又析为二十三：曰京东东、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东、西，曰永兴，曰秦凤，曰河东，曰淮南东、西，曰两浙，曰江南东、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曰梓、利、夔，曰福建，曰广南东、西。……大观元年，别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广西，以广西黔南为名。四年，仍旧为广南西路。……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谓极盛矣”[1]。《文献通考·舆地》也称：“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其后又增三路，……凡十八路，州、府、军、监三百二十二。”[2]前边所述宋代中央许多官署都兼事出版的风气，影响宋朝各府、州、军、监、县官署，也几乎都有出版物行世。宋人王明清所说“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3]，正反映了这种事实。只是时间久远，有的已经失传而无以稽考，有的虽能稽考而书已失传，有的书虽流存而又无以考出其为哪地哪级官署所刻，所以只就可考知或现存可知的某些出版物，举例性地加以描述，借以反映两宋地方官署出版的概况。

### （一）各府、州、军、县官署的出版

据前人著录和现存传本可知北宋仁宗嘉祐三年至四年

【1】《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一》。

【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五《舆地》。

【3】张秀民：《中国印刷史》，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058—1059年）建宁府雕印《建康实录》二十卷。五年（1060年）中书省奉旨下杭州雕印《新唐书》二百五十卷。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杭州又奉旨开雕《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余姚县也雕印《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九年（1139年）绍兴府刻印《毛诗正义》四十卷。同年临安府刻印《群经音辨》七卷，《汉官仪》三卷，此书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卷末有“绍兴九年三月临安府雕印”字样。同年又刻《唐文粹》一百卷，末有刊刻年月及校勘官衔名，此书现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绍兴十年（1140年）临安府又刻《两汉文类》四十卷，卷末有“绍兴十年四月 日临安府雕印”字样。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藏有此书残帙五卷。绍兴十五年（1145年）平江府刻印《营造法式》三十四卷。十九年（1149年）平江府又刻印徐铉《骑省集》三十卷，二十八年（1158年）又刻印《文选》六十卷。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严州刻印《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九年（1180年）温陵州刻印《读史管见》八十卷。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吉州刻印《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二十卷。十五年（1222年）南康军刻印《仪礼经传通解续》十五卷，此书现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端平三年（1236年）常州军刻印《古文苑注》二十一卷，淳祐十年（1251年）福州刻印《国朝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中国国家图书馆亦有收藏。

此外还知道应天府刻印出版过《二李唱和诗》，宣和四年（1122年）京西南路信阳刻印出版过《陶渊明集》，治平（1064—1067年）中河东路太原府刻印出版过唐李璋的《晋阳事迹杂记》，熙宁二年（1069年）两浙东路越州刻印出版过《外台秘要方》，政和四年（1114年）明州（今宁波）刻印出版过《柳集》，元祐九年（1094年）余杭刻印出版过《吕氏春秋》，秀州刊正出版过《文选》，盐官县刻印出版过《通典》，嘉祐四年（1059年）苏州刻印出版过《杜工部集》，元丰（1078—1085年）间苏州刻印出版过《李翰林集》，还刻印出版过《吴郡图经续记》、《白氏文集》、《唐会要》，江南西路洪州刻印出版过

《阙里世系》，庐山刻印出版过《白氏文集》，宣和五年（1123年）吉州刻印出版过《六一居士集》，临川刻印出版过王安石的《临川集》，天圣七年（1029年）江阴刻印出版过《国语》，嘉祐中（1056—1063年）江南东路江宁府刻印出版过《花间集》，元符三年（1096年）歙县刻印出版过《黄山图经》，政和元年（1111年）吴江刻印出版过《笠泽丛书》，虔州赣县刻印出版过《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淮南东路高邮军刻印出版过《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等。这还都是北宋的出版品。南渡后，偏安于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江南东西路有茶叶、冶铸、金帛、稻米之利；福建路则灌溉便利，无凶年之忧；四川则天府之邦，自古富庶；两浙东西路更有鱼米盐布之产，号称鱼米之乡；长沙则长达38年的连年丰收，致使"斗米二三钱，县县人烟密，村村景物妍"。加之沿海港口的市舶收入，故到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国库储金多至80万两，银186万两，下库现缗钱常五六百万[1]。因而出版业更为发展，各地官署出版品层出不穷，带动出版业又进入了一个极盛时期。

【1】[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八五《乾道会计录》。

（二）各路使司的出版

宋承唐制，在各路设安抚司，管理较大地区的军、民两政；设转运使司，主管各州郡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设提刑司，提点各路刑狱诉讼；设茶盐司，主管茶盐专卖和折算。所以，宋代的各路使司，实际上掌握着各地的政治和经济命脉。他们既有权，又有充裕的经济条件，因而也附庸社会风气，竞相刻印出版书籍，进一步繁荣了宋代的出版事业。

据前人著录和现存传本可知，两浙东路茶盐司于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刻印出版了《外台秘要》四十卷。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刻印出版了《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绍兴六年(1136年）刻印出版了《事类赋》三十卷。绍兴年间刻印出版了《周易注疏》十三卷、《周礼疏》五十卷、《尚书正义》二十卷、《唐书》二百卷。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刻印出版了《毛诗正义》三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这些书至今仍多

有流传，此为两宋茶盐司刻印出版之实例。

绍兴十四年（1144年）四川眉山漕司刻印出版《宋书》一百卷、《魏书》一百一十四卷、《梁书》五十六卷、《南齐书》五十九卷、《北齐书》五十卷、《周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即版本学上所谓有名的眉山七史（眉山七史刻在什么地方，另有别论）。七史书版历宋，经元，至明，曾多次修补重印，所以至今流传不稀。不但国家图书馆，很多省馆或大学图书馆，都藏有此类书的三朝本，但多已漫漶，模糊不清。

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广西漕司刻印出版王叔和《脉经》十卷。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建安漕司刻印出版了《东观余论》不分卷。绍兴十七年（1147年）福建转运司刻印出版了《太平圣惠方》一百卷。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两浙西路转运司刻印出版了《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绍兴年间淮南路转运司刻印出版了《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江南东路转运司刻印出版了《后汉书注》九十卷，《志补注》三十卷。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江西转运司刻印出版了《本草衍义》二十卷。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淮南东路转运司刻印出版了《徐积节先生文集》三十卷。这些版印的图书，中国国家图书馆都有收藏。此为两宋转运司刻书出版之实例。

绍兴十八年（1148年）荆湖北路安抚使司刻印出版了《建康实录》二十卷，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乾道四年（1168年）两浙东路安抚使司刻印出版了《元氏长庆集》六十卷。淳熙六年（1179年）浙西提刑司刻印出版了《作邑自箴》十卷。嘉定五年（1212年）江西提刑司刻印出版了《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此为两宋安抚使司、提刑司刻书出版之实例。

淳熙八年（1181年）江西计台刻印出版了《荀子注》二十卷。淳熙九年（1182年）江西漕台刻印出版了《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此书中国国家图书馆现有藏本。同年，江西漕台又刻印出版了《申鉴》一卷。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印

出版了《春秋繁露》十七卷，中国国家图书馆亦有藏本。此为两宋漕司、漕台、计台刻书出版之实例。

清纪昀等撰《历代职官表·提举常平司》条称："南宋时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与提举常平，称为帅、漕、宪、仓四司。仓司虽以常平为名，实亦有监督地方行政之权。"因而可知安抚使司又可称为帅司，盖因其有统帅一路行政权力而得名；转运使司又可称为漕司，盖因其肩负一路粮谷漕运之责而得名。转运二字古人分别诠释，谓路运为转，水运为漕。盖宋时常年粮谷转运，特别是南宋已偏安江淮以南，粮谷已多用水运，故将转运使司简称为漕司。提点刑狱司又可称为宪司，盖因其肩负一路官员违宪、民人作奸犯科的检查、诉讼、司法等职责而得名；提举常平茶盐司又可称为仓司、仓台，盖因其专管一路常平仓储及茶盐专卖，实关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故又称仓台。上举四使司之出版实例，又可分别称为帅司、漕司、宪司、仓司、仓台、计台出版。此为两宋各路使司兼事出版之实例。

（三）各地各级公使库的出版

宋代公使库类乎现在各级各地的招待所，本职是接待安寓来往的官吏。"太祖既废藩镇，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于是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馈，欲使人无旅寓之叹。……承平时，士大夫造朝不赍粮，节用者犹有余以还家。归途礼数如前，但少损"[1]。宋代这种公使库"诸道监、帅司及州、军、边县与戎帅皆有之。盖祖宗时以前代牧伯皆敛于民，以佐厨馔，是以制公使钱，以给其费，惧及民也。然正赐钱不多，而著令许收遗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2]。"若帅、宪等司，则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其实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东南而为尤甚。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账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必数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书为平江守，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厚，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时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总计摄润者，视事不半岁，过例馈送皆至四五万缗，供宅酒至二百余斛。孝宗怒而绌

[1]［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

[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公使库》条。

之，然其风盖未殄也。东南帅司、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近岁，蜀中亦然。其会聚之间，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为准。有一身而适兼数职者，则并受数人之馈。献酬之际，一日而得二千余缗，其无艺如此。顷岁陈给事岘为蜀帅，冯少卿宪为成都漕，就以所遗元物报之，陈怒，奏其容覆脏本……诸郡皆立额，白取于属县，县敛于民，吏以输之。小邑一岁亦不下千缗，人尤以为怨，谓宜罢互送，而捐遗利，使上下一体，而害不及民，则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1]。可见宋代公使库，名义上是要以公帑接待来往官吏，实际上却成了所谓公使巧取豪夺，挥霍黎民百姓血汗的场所。为了尽可能满足来往贪官的需要，各地公使库巧立名目，剥敛于民之外，还从事出版售卖，创收牟利，以填充招待馈送无底贪坑的黑洞。当然也有附庸社会出版图籍风雅的含义，所以公使库也成了宋代地方的出版机构之一。

[1]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公使库》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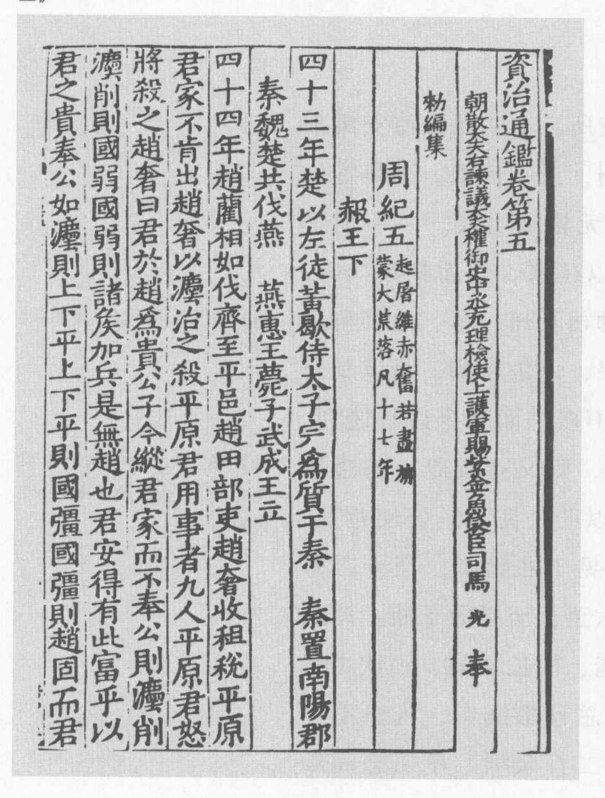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卷第五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 奉
勑編集
周紀五 起屠維赤奮若盡旃蒙大荒落凡十七年
赧王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爲質于秦 秦置南陽郡
秦魏楚共伐燕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四年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原
君家不肯出趙奢以灋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
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灋削
灋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
君之貴奉公如灋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

图15
宋绍兴二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资治通鉴》

据记载和现存传本可知：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苏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吉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欧阳修《六一居士集》五十卷，又续刻五十卷。南宋高宗绍兴二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出版了司马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此书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图15）。绍兴十九年（1149年）明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骑省徐公集》三十卷。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沅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淳熙三年（1176年）舒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礼记郑注》二十卷，《礼记释文》四卷，

又出版了《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同年还刻印出版了《大易粹言》十二卷。这些书，国家图书馆都有藏本。淳熙七年（1180年）台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颜氏家训》七卷。八年台州公使库又刻印出版了《荀子》二十卷（此本又称唐仲友刻本，实则用公使库钱，刻印出版后自己售卖，中饱私囊）。九年信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李复潏水集》十卷。十年（1183年）泉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十四年(1187年)鄂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花间集》十卷。此外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还刻印出版了《周易注》九卷，《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释文》一卷，筠州公使库刻印出版了苏辙《诗集传》二十卷及其文集。国家图书馆亦有藏本。此为两宋公使库出版之实例。

其中舒州公库所出版之曾穜的《大易粹言》，卷尾有一纸舒州公使库雕造所广告性的告白，称："舒州公使库雕造所。本所依奉台旨，校正到《大易粹言》，雕造了毕。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下为校勘人衔名，略）今具《大易粹言》一部，计贰拾册。合用纸数、印造工、墨钱下项：纸副耗共壹千叁百张；装背饶青纸叁拾张；背青白纸叁拾张；棕、墨、糊药、印背匠工食等钱共壹贯伍百文足；赁板钱壹贯贰百文足。本库印造见成出卖每部价捌贯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贴司胡至和具。杭州路儒学教授李清孙校勘无差。"从这纸告白中，我们直接算不出它的工料总成本，但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旧抄本宋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书前有广告性牌记。"其一云：'沅州公使库重修整雕补到《续世说》壹部，壹拾贰卷，壹佰伍拾捌板，用纸叁佰壹拾陆张，右具如前。'其一云：'今具印造《续世说》一部，计六册，合用工食等钱如后：一印造纸墨工食钱，共伍佰叁拾肆文足。大纸壹佰陆拾伍张，计钱叁拾文足；工墨钱，计贰佰肆文足。一褾褙青纸物料工食钱，共贰佰捌拾壹文足。大青白纸共九张，计钱陆拾陆文足；面蜡工钱，计贰佰壹拾伍文足。以上共用钱捌佰壹拾伍文足。右具在前。'"[1] 这样我们即可以算出，大纸165张，计钱30

[1]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

文足，合每张0.115文。大青白纸共9张，计钱66文足，合每张7.33文。以此作为参数，则舒州公使库所出版之《大易粹言》，用纸1 300张，合钱约150文足；装背饶青纸30张，约合220文足，背青白纸30张，亦约合220文足，共440文足。三项纸钱不足600文。再加上1贯500文棕墨糊药印背匠等的工食钱；1贯200文的赁板钱，总共是3贯290文，粗计不到4贯钱。可是每部出售定价却开到了8贯钱，利润在一倍以上。从这里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宋代官署、民间之所以竞相刻书出版，原来是有利可图。利润法则从来就是经营者的驱动力。至于公使库赚钱为了什么，大概是为了打点来往官员。因为公使库对官员的馈赠越来越多，仅靠政府的那点拨款不敷使用，故经营刻书赚钱也是一种财政缺欠的补贴。过去所谓"公使库有所谓公使钱、公使库醋钱等名目，除作为免费招待官员外，又有余款可以刻书"的说法，恐怕需要重新加以审视。连帅司、宪司都得开当铺、卖熟药以补助他们的公使库，完全可以证明宋代公使库打点来往官员的重负，逼得他们不得不官府经商赚钱以填补馈赠不完的黑洞。

（四）各府、州、军、县学校的出版

宋代各府、州、军、县都设有学校，称为州学、府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頖官、学舍、县斋、县学，这些都是读书讲学和作养人才的地方，比其他单位更加崇尚文化。它们一有学田，每年可以收取不薄的租金；二有人力、人才和时间，于学问内行，可以精校细勘，所以也多从事出版活动。绍兴九年（1139年）临安府学刻印出版了贾昌朝《群经音辨》七卷，十二年（1142年）汀州宁化县学亦刻印出版了《群经音辨》七卷。十五年（1145年）齐安郡学刻印出版了宋夏竦《集古文韵》五卷。乾道六年（1170年）姑孰郡斋刻印出版了宋洪遵《洪氏集验方》五卷，七年（1171年）该郡斋又刻印出版了宋李柽《伤寒要旨》一卷、《药方》一卷。同年平江府学刻印出版了唐韦应物《韦苏州集》十卷、《拾遗》一卷，零陵郡庠刻印出版了《唐柳先生外集》一卷。乾道八年（1172年）姑孰郡斋刻印

出版了宋杨侃所辑《两汉博闻》十二卷。九年（1173年）高邮军学刻印出版了宋秦观《淮海集》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淳熙二年（1175年）镇江府学刻印出版了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集注》二十卷。同年严陵郡庠刻印出版了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九江郡斋刻印出版了宋欧阳忞《舆地广记》三十八卷。淳熙六年（1179年）湖州頖宫刻印出版了蔡节《论语集说》十卷。七年（1180年）舒州頖宫刻印出版了蔡邕《独断》二卷。八年（1181年）池阳郡斋刻印出版了《文选注》六十卷。十年（1183年）象山县学刻印出版了宋林钺《汉隽》十卷。十一年（1184年）南康郡斋刻印出版了宋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八卷。十四年（1187年）严州郡斋刻印出版了宋陆游《新刊剑南诗稿》二十卷。庆元六年（1200年）寻阳郡斋刻印出版了汉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解》十三卷。嘉泰元年（1201年）筠阳郡斋刻印出版了米芾《宝晋山林集拾遗》八卷。四年（1204年）新安郡斋刻印出版了《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目录》三十卷。嘉定四年（1211年）滁阳郡斋刻印出版了宋林钺《汉隽》十卷。九年（1216年）兴国军学刻印出版了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十年（1217年）当涂郡斋刻印出版了宋朱熹《四书章句集解》二十八卷。十一年（1218年）衡阳郡斋刻印出版了宋胡寅《致堂读史管见》三十卷。十三年（1220年）溧阳学宫刻印出版了宋陆游《渭南文集》五十卷。嘉定年间建宁郡斋刻印出版了宋徐天麟《西汉会要》七十卷。宝庆二年（1226年）建宁郡斋又刻印出版了徐氏《东汉会要》四十卷。绍定元年（1228年）严陵郡斋刻印出版了宋魏野《钜鹿东观记》十卷。六年（1233年）临江军学刻印出版了《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嘉熙四年（1240年）新定郡斋刻印出版了宋卫湜《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淳祐十年（1250年）上饶郡学刻印出版了蔡沈《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六卷、《书传问答》一卷。咸淳元年（1265年）镇江府学刻印出版了汉刘向《说苑》二十卷。五年（1269年）崇

县县斋刻印出版了张咏《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所有这些都是仅就国家图书馆现今所藏、而且带有明确刻书年份、举例性地对宋代学校刻书出版所做的梗概性的描述。但仅就这点实例，也足以说明宋代学校的刻书出版，是整个宋代出版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各地书院的出版

宋代书院很兴盛，创办者或为官府或为私人。一般都选择山林名胜之地作为院址，如白鹿、石鼓（一说为嵩阳）、应天、岳麓四大书院，就都是很著名的书院。书院一般都是由著名的学者讲学其间，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等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教学，对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反映在刻书出版上，校勘比较精审，多为后世所称道。据各家著录可知：绍定三年（1230年）婺州丽泽书院再版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国家图书馆现在藏有绍定三年(1230年）越州读书堂也就是司马光后人出版的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一卷。绍定四年（1231年）象山书院刻印出版了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十二卷。淳祐六年（1246年）泳泽书院刻印出版了大字本朱子《四书集注》十九卷。八年（1248年）龙溪书院刻印出版了陈淳《北溪集》五十卷、《外集》一卷。宝祐五年(1257年）竹溪书院刻印出版了方岳《秋崖先生小稿》八十三卷。景定五年（1264年）环溪书院刻印出版了《仁斋直指方论》二十六卷、《小儿方论》五卷、《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七卷、《医学真经》一卷。咸淳六年（1265年）建宁府建安书院刻印出版了《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别集》十一卷。国家图书馆还藏有白鹭洲书院刻印出版的《后汉书注》九十卷，《志注补》三十卷。这些都是宋代书院刻印出版之实例。

以上举例性地描述了宋代中央官署和地方官署出版的概况。如果我们站在宋代这个中国出版史的支点上回首过往，五代国子监校刻出版《九经》，则是它承传的起点，并由它拓展到中央和地方官署普遍兼事刻书出版事业；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支点上

放眼前瞻，则宋代中央和地方官署普遍兼事刻书出版的模式，不仅为其同时的辽、西夏、金，也为其后的元、明、清全面传承。一条史的轨迹十分清晰地镌刻在中国出版史的沙盘上，并不时地闪烁着不同时代的亮点。在中国出版史上，宋代这种继前往而启未来的拓展之功，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 第二节　宋代的民间出版概况

印刷形式的出版，民间早于官署，此在唐代已然。进入宋代，随着“崇文抑武”政策的实施，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强力推行，使许多平民百姓的胸中燃起了希望之火——读书→登第→做官→发迹。而宋朝政府的科考取士，又一次比一次多，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实现理想的机会。天圣二年（1024年）三月，宋仁宗赵祯一次便“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四百八十五人”[1]。这种现象其前的唐代，其后的元、明、清，均极罕见。并且宋朝廷给官员的待遇也较为丰厚：“京朝官正俸，宰相月三百千。又有禄粟，月给一百石。职钱六曹尚书六十千。元随傔人衣粮，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此外，又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饲马刍粟、米面羊口之给。官于外者，有公用钱、职田、茶汤钱等。既是薪金制，又加实物供给制。”[2] 如此优厚的待遇和利益吸引，自然要烘起浓重的社会文化气氛，此是宋代民间出版业勃兴的社会基础。

### 一、宋代的私宅家塾出版概况

#### （一）宋代的私宅出版

所谓私宅出版，是指某人某家某宅或他们的家塾，以私人私家之钱投资或主持刻印出版图籍的活动。其出版图书多以学问崇尚、文化推广、传播知识为目的，不以盈利为第一要务，所以出版品校刻精审，多可信赖。当然，私宅与坊肆有时也很难区分，有时前者也向后者发生演变。这里只能大体分开，彼

【1】《宋史》卷九《仁宗本纪一》。

【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此交插在所难免。私人私宅搞出版，首先是得有资金，这就跟前边说的宋朝官员待遇优厚有关系了。“密州观察使致仕王永从一家，既在思溪创建圆觉禅院，造宝塔十一层，又捐舍家财，独力能刻《大藏经》。昌州冯楫以俸资能印大小藏各四十八藏。可见他们财力之雄厚”[1]。这是我们介绍宋代私宅出版之前首先要交待的。宋代私人私宅出版，已无法稽考其全部情况，只能就所知举例性地加以描述，反映其概况而已。

【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57页。

宋代私宅刻书极其普遍，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印出版了汉郑玄注《周礼》十卷；义乌蒋宅崇知斋刻印出版了汉郑玄注《礼记》二十卷；淳祐十二年（1252年）魏克愚刻印出版了《周易要义》十卷、《仪礼要义》五十卷、《礼记要义》三十三卷，此为现存宋代私宅刻印出版经部书之实例。这里的婺州市门巷唐宅，其实就近乎坊肆。唐宅即指唐仲友家。淳熙间唐仲友知台州，利用公使库公款和由明州因刻印假币犯罪而发配来的犯人蒋辉刻印《扬子》、《荀子》。刻印出版的这两种书，就派人送往老家婺州市门巷书铺出售，牟取私利。此为朱熹弹劾唐仲友的重要罪状之一。

宋王叔边刻印出版了《后汉书注》九十卷《志注补》三十卷。王叔边本为钱塘人，在杭州开书铺，从事出版事业，后因临安成了首都，对图书出版控制较严，故迁移到了控制较为宽松的福建建安，继续从事出版活动，此《后汉书》之刻，即是他迁移之后的出版品。毕万后裔魏齐贤富学堂刻印出版了宋李焘《李侍郎经进六朝通鉴博议》十卷。关于毕万裔宅和魏齐贤富学堂，长期以来都被说成是毕万裔宅和魏齐贤富学堂两家，其实这是绝大的误会。谢水顺、李珽所著《福建古代刻书》引证清光绪时所刊《钜鹿魏氏宗谱》，其首保留有宋绍熙四年（1193年）魏甫序，称：“吾祖乃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允公，武王末受命始封爵于毕，后子孙以毕为姓。春秋时其裔仕晋，曰毕万，为晋献公右师，伐霍有功封之于魏，于是有公侯。……唐末天祐元年（904年）黄巢作乱，有君公与兄弟十余房来闽建、

剑、漳、泉……。”由此可知，魏氏先祖乃于唐末入闽，分居于建阳、南平、漳州、泉州等地。所谓“毕万裔”，乃是魏齐贤自称为毕万后裔，以便借先祖之名以自重，其实就是一家。宝祐五年（1257年）赵与篡在湖州刻印出版了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称为天下之善本。此为现存宋代私宅出版史部书之实例。

宋崇川于氏刻印出版了《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十卷，《新增丽泽编次扬子事实品题》一卷，《新刊扬子门类题目》一卷；王氏取瑟堂刻印出版了宋阮逸《中说注》十卷，此为现存宋代私宅出版子部书之实例。

宋婺州王宅桂堂刻印出版了《三苏先生文集》七十卷。咸淳年间廖莹中世彩堂刻印出版了《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一卷，又刻印出版了《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淳熙三年（1176年）王旦刻印出版了宋王阮《义丰文集》一卷。绍熙四年（1193年）吴炎刻印出版了宋吕祖谦《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十二卷。庆元二年（1196年）周必大刻印出版了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庆元五年（1199年）黄汝嘉刻印出版了《东莱先生诗集》二十卷、《外集》三卷。嘉泰四年(1204年）吕乔年刻印出版了《东莱吕太史文集》十五卷、《别集》十六卷、《外集》五卷。绍定五年（1232年）黄埒刻印出版了《山谷诗注》二十卷。景定元年（1260年）陈仁玉刻印出版了宋赵抃《赵清献公文集》十六卷，此为现存宋代私宅刻印出版集部书之实例。

这是仅就国家图书馆现存善本书中举出的上述私宅刻书的数十例，当时私宅刻书出版之盛可想而知。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即私宅刻书侧重于子、集，大概是私宅比官刻有较大的自由，这一点从家塾与坊间刻书中还可进一步得到证实。

（二）宋代的家塾出版

家塾刻书与私宅刻书在概念与性质上，都没有本质区别。

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地主、富商大贾，都常常设立家塾，聘师教授自己的子侄。被聘的教师虽未必有什么科第功名，但往往德高望重，具有真才实学。他们在教书的过程中，常常就自己的志趣和所长，或著述、或校勘、或整理、注释、阐明前人著作，依靠主人的财力，兼事刻书。据国家图书馆所藏可知：宋鹤林于氏家塾曾刻印出版过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黄善夫家塾之敬室刻印出版了《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蔡琪家塾刻印出版了《汉书集注》一百卷，乾道七年（1171年）蔡梦弼东塾刻印出版了《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黄善夫家塾之敬室刻印出版了《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这些都是现存宋代家塾刻书出版的实例。此外，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所出版邵尧夫《击壤集》十五卷，建安陈彦甫家塾所出版《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一百卷，梅山蔡建侯行父家塾所出版《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一百二十卷，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尺牍》十六卷，建安刘元起家塾之敬室所出版《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建安魏仲举家塾所出版《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别集》一卷，《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附录》二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建安曾氏家塾所出版《文场资用分门近思录》二十卷、《后录》十四卷，建安虞氏家塾所出版《老子道德经》四卷，也都是见于著录和非常有名的家塾本。所有这些都说明宋代家塾出版是相当兴盛和普遍的。

## 二、宋代的坊肆出版概况

坊肆，即书坊、书肆，也称书林、书堂、书铺、书棚、书籍铺、经籍铺。唐代中叶以后，伴随雕版印书的兴起，这种坊肆就在今长安、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和洛阳等地逐渐兴盛起来。进入宋朝以后，这种书肆发展更为普遍。东京汴梁、杭州，建阳崇化、麻沙等地，坊肆不但很多，而且也很有名。宋

代的坊肆书商，有的专门接受委托，刻印出版和售卖书籍，有的坊肆主人本身就是藏书家，而且兼事编撰、刻印、售卖，也就是说编撰、出版、发行，往往集中在一坊一肆。所以坊肆出版之书常常名目新、刻印快、行销广，使整个宋代的出版活动显得十分活跃。叶梦得《石林燕语》评介宋代各地刻书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1] 叶氏这段话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说明宋代全国有四大刻书中心，杭州、川蜀、福建和汴京。蜀中与杭州早在唐末就有刻书出版的基础，到宋代继续发展，渊源有自。福建后来居上，但只是速成量多，质量较差。汴京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刻书出版自不减杭州和其他地方，但至今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所谓宋汴梁刻印出版的版本书。另一方面也品评了这四大地区刻书出版的优劣短长。其实，纵观宋代私人出版之书，包括私宅、家塾和坊肆，其刻书出版之多，地域之广，远远超出了叶氏所描述的范围。

【1】[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汴梁大相国寺东门大街书铺林立，幌子高扬。有的明标"兑客书坊"，有的书写"发兑古今书籍"，以招徕顾客，一看便知是经销性的书铺子。

(一) 杭州地区的坊肆出版

杭州可考的出版商号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在洪桥子南河西岸和鞔鼓桥南河西岸，可能还有陈宅的两家分号。还有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贾官人经书铺、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保佑坊前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桔园亭文籍书房、杭州积善坊王二郎、行在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临安赵宅书籍铺、临安李氏书肆、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太学前陆家、钱塘王叔边（后迁往建阳）、钱塘前宅书塾、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

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等二十余家。这还仅是可以考知的。如此众多的出版商、经销店集聚在当时的临安城，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盛事。其中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桔园亭文集书房，则是杭州的有名出版商。当然最有名的还要属陈起家的书籍铺，此留待后边再讲。现知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也称为尹家父子文字铺，前后刊印出版过《述异记》、《续幽怪录》、《北户录》、《康骈剧谈录》、《钓矶立谈》、《渑水燕谈录》、《茅亭客话》、《曲洧旧闻》、《郤扫编》、《箧中集》等小说家作品，一看便知其出版倾向。这些书极具普遍性和可读性，发行面宽，有利可图。张官人家刻印出版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王念三郎家经坊刊印出版的《金刚经》，沈二郎经坊刻印出版的《莲经》，王二郎、贾官人经书铺刻印出版的《妙法莲花经》，郭宅经铺刻印出版的《寒山诗》，赵宅书籍铺刻印出版的《重编详备碎金》，俞宅书塾刻印出版的《乖崖张公语当》等，也都很有名。而杭州猫儿桥开笺纸马铺钟家刻印出版的《文选》，贾官人经书铺刻印出版的《妙法莲花经》，至今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至于荣六郎家，本住东京大相国寺东，靖康之变，避地临安，在中瓦南街东面继开了一家经史书籍书籍铺和经销店，继续出版书籍。其在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六月出版的《抱朴子内篇》，至今仍藏在辽宁省图书馆。浙江除杭州外，还有绍兴、宁波以及两浙东路的婺州（今金华市)，也多有书肆从事出版。严州、衢州、湖州、平江等两浙西路的城镇，出版图籍也不少。江南东路的建康府（今南京市)，据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三记载，所出版的书籍版片多至68种，共计2万多块，也显示出该地出版的盛况。成都早在唐末五代，就有出版传统，宋代驾轻就熟，继续发展。成都府市西俞家、西蜀崔氏书肆、临邛韩醇家、广都北门裴宅、广都费氏进修堂，尤其是眉山地区，其出版数量与质量都堪与杭州比美。

（二）福建地区的坊肆出版

福建是宋代出版事业，特别是私人出版事业最发达的地区，

在宋代出版事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中国出版史上也占据着光辉的篇章。这与当地的人文环境有关系。“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1]。反映了福建人的读书热情。据知乾道元年（1165年）秋，福建报名参加乡试的有17 000人，还有一说是10万人。据淳熙《三山志》说，宋末背着书箱、扛着雨伞进京赶考的闽人，常占全国之半。北宋时期福建进士有2 503人，南宋时期有3 482人。光莆田地区历史上据说就出过1 200名进士，6名宰相。故有“海滨邹鲁”之誉。反映出福建的文化气氛十分浓厚。加上程朱理学在此地的升华，使得福建学术气氛更浓。此为福建出版业兴盛的重要社会基础。建阳县与建宁府的建安县则是福建的出版中心。建宁府出版的书籍，被戏称为当地“土产”。建阳县西七十里的麻沙、水南、崇化、长平等地，则书坊林立，比屋弦诵。尤其是麻沙、崇化两坊，号为“图书之府”。现在仍可以考知的，据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所列，有建邑王氏世翰堂、建安蔡子文东塾、建安余唐卿宅、建安余彦国励贤堂、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建安余恭礼宅、建安刘之向（刘元起）宅、建安刘叔刚宅、建安刘日新宅三桂堂、麻沙刘仕隆宅、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麻沙刘通判宅、建安虞氏家塾、建宁府麻沙镇虞叔异宅、麻沙镇南斋虞千里宅、建安魏仲立宅、建安魏仲举家塾、建安魏忠卿家塾、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建阳崇化黄及甫家塾、建阳崇化陈八郎书铺、建安江仲达群玉堂、建安万卷堂、建阳龙山堂、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等37家。这37家有的可以考知出版过什么书，有的其出版物至今仍有流传。如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印出版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礼记》，建安刘日新宅三桂堂刻印出版的《童溪王先生易传》等，至今仍流传于世。上述为宋代坊肆出版的概况。坊肆出版除上述两个地区，浙江、四川、江西等地也分别有不少坊肆，留待后边谈出版家时再谈。

[1]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87页。

## 三、宋代的寺观出版概况

寺院、道观本是佛、道教的香火之地，与出版没有必然的联系，尤其是世俗作品，更无由寺院、道观出版的内在逻辑。可事实上不然，尤其是宋代的寺院、道观，不仅出版与佛、道教紧密相关的单经、大藏，也出版一些所谓世俗的四部书。从而使寺院、道观也成为宋代出版事业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 （一）宋代寺院的出版

刻印出版释家大藏，始于朝廷开雕的《开宝藏》，也称为《蜀藏》。其后宋代寺院、道观刻印出版大藏经接二连三，好像形成了一股潮流，在中国出版史上不能不占有特殊的一页。现知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由冲真、普明、咸辉等主持，于福州东禅寺募捐开雕的《大藏经》，至宋徽宗崇宁二年竣工，前后历时23年，凡雕印6 430卷，580函，经折装。今传世的东禅寺大藏经本《华严经》卷八十有彦肃"福州东禅等觉院住持慧空大师冲真于元丰三年庚申岁谨募众缘，开雕《大藏经》板一副，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的题记，说明了出版缘起，是为上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所以此经也就得名《崇宁万寿大藏》。这部藏经可以说是我国民间寺院募刻出版大藏经的滥觞，也是藏经由卷轴装改为经折装的滥觞。

民间募捐出版大藏经的先例一开，各大寺院争相仿效。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开始，由本明、宗鉴、行崇、了一及蔡俊臣、陈洵、刘浙、冯檝等主持，在福州开元禅寺开雕出版的《大藏经》，至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竣工，历时60年，凡6 170卷，567函，世称《毗卢大藏》。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开始，由王永从及其弟、侄眷属及住持僧宗鉴、净梵、怀琛等主持，在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开雕出版的《大藏经》，凡5 480卷，548函，世称《思溪圆觉藏》。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改思溪圆觉禅院为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寺，又重修出版大藏经5 740卷，599函，世称《思溪资福藏》。这两部《大藏》

实为一套板，前者初刻，后者补板重印。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由藏主法忠，功德主清圭，沙门德璋、志清、慧琚、慧朗、志明、志莲、志昌、行一、惟总、昙瑞、惟吉等共同主持，在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开设《大藏经》局，开雕出版的《大藏经》6 362卷，590函，世称《碛砂藏》。有宋一代共历319年，公私前后开雕出版大藏经6部，凡35 181卷，其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空前绝后。此外，金粟山广惠禅院在北宋时还写过一部《大藏》，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出版大藏若此，出版单经也不少，如宋开庆元年（1259年）太平天寿寺释延福刻印出版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宋嘉定间（1208—1224年）净慈寺刻印出版的《嘉泰普灯录》，至今仍有流传。另知河北东路沧州归化镇彰微院刻印出版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今山西曲沃县图书馆有藏。淳化、咸平之际杭州龙兴寺还刻印出版过《华严经》，景祐中（1034—1038年）大中祥符寺还刻印出版过《大般涅磐经》，法昌院印造出版过《佛说观世音经》，临安府南山慧因讲院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还刻印出版过《华严经旨归》，绍兴三十年（1160年）临安府北关接待妙行院还刻印出版过智觉禅师的《心赋注》，嘉定三年（1210年）临安府菩提教院还刻印出版过《净心诫观发真何》，杭州净戒院还刻印出版过唐人赵蕤《长短经》等，不胜枚举。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明教寺还刻印出版过《韩昌黎集》，相国寺刻印出版过《秦传国玺》，思溪资福寺以刻印释家《大藏》所剩余的板片刻印出版《新唐书》、《五代史》，其板片后被征入国子监，再刷印出版之书便成了南宋国子监本。

（二）宋代道观的出版

宋代朝野对佛教如此崇尚，对道教也很提倡。宋太祖时曾有道士进见，劝他“无为无欲”、“恬淡寡欲”，宋太祖根本不予理睬。但自太宗召见华山道士陈抟并赐予封号之后，太宗认识到道教也很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于是，在东京（今开封）、苏州等地修建道观；并命五代降臣徐铉、王禹偁等搜求校正道

书，得3 737卷，缮写成书，贮藏在大内后苑太清宫。真宗更是道教的狂热鼓吹者，他在《崇释论》中说“释、道二门，有补世教”，“三教之设，其旨一也”。这就完全表露了宋朝统治者提倡宗教的真实动机。他们把儒、佛、道三教一起提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国家统一，巩固封建统治。真宗为了利用宗教愚弄民心，还不惜和道士一起编造神话，说玉皇大帝在他梦中转告，赵氏始祖是轩辕皇帝。于是真宗便尊玉皇为玉皇大天帝，赵氏始祖为圣祖天尊大帝，布告天下，并用金、银各五千两，分别铸造玉皇像、圣祖像和真宗像。还制定礼仪，在东京玉清昭应宫大事祭祀，表示自己是奉天承运，玉帝使者。紧接着便把秘阁道书和太清宫道书悉数送往余杭，命学士戚纶、漕运使陈尧佐、道士朱益、冯德等，专事修校，命王钦若总领其事。凡得书4 359卷，分为三洞、四辅、十二类，赐名《宝文统录》。

到了宋徽宗，则更是有名的道君皇帝。他进一步搜访道家遗书，命道士刘元道就书艺局校定《大藏》，又增至5 387卷，于政和年间（1111—1117年）送往福州闽县万寿观，令福州知州黄裳鸠工镂板，进于京师，因名《万寿道藏》。这是我国第一部刻印出版的道教总集。此后金代金道明补刻出版的《金道藏》，蒙古时期宋德方及其弟子在玄都观校刻出版的《玄都宝藏》（又名《宋德方藏》），都是就宋刻《万寿道藏》的版片加以修补重印而成的。

此外作为民间出版，北宋大观（1107—1110年）初年广南东路潮州韩文公庙，刻印出版过《韩昌黎集》，嘉定八年（1215年）金华吕氏祠堂刻印出版过吕本中《童蒙训》二卷，十四年（1221年）严陵赵氏祠堂刻印出版过赵彦肃《复斋易说》六卷。当然，祠堂跟宗教截然不同，且上述所出版的佛、道教典籍也并非都是民间筹资所刻，这里为了叙述方便，放在一起来说，实际上祠堂出版与寺院募捐出版佛藏，只不过在投资性质上有近似之处，其余是根本不相同的。

宋代朝野崇尚佛、道，已如上述。但作为宋代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既非释家，更不是道教。佛、道思想只不过作为统治思想的两翼，被统治阶级统一于儒学之中了。真正的官方哲学还是儒家思想，所以宋代官方出版之书也多侧重于这方面的内容。

# 第四章　宋代的重要出版家及其出版事迹

在出版活动中，或一生以刻书出版为职业者；或虽非以此为主业，所出版之书或规模大，或印制技术新而影响深远者；或老店新张，家族子嗣相继，在出版业中贡献突出者，都可以称为出版家。古代出版家的出版活动大致也有策划组稿、编审校稿、刻印出版、销售发行等环节。宋代够得上出版家称号的不胜枚举，这里只能分地区举几位最有名的出版家，以勾勒出宋代出版家及其事迹的大致轮廓。

## 第一节　江浙地区的重要出版家及其出版事迹

浙江是宋代三大刻书中心之首，其刻书出版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不是其他地区能比拟的。因此自北宋以降，中央和地方官署的很多书刻都下杭州镂板，乃至当时高丽的某些著作，也到杭州付梓。这就使浙江地区的出版业显得更加繁荣。反过来，出版业越是繁荣，培育出来的出版家也就越多。

### 一、杭州地区的出版家陈起

宋代的杭州地区是出版家麇集之地，而杭州的出版家中，又以陈家书籍铺最具代表性。陈家书籍铺第一代主人陈起，字宗之，一字彦才，号芸居，又号陈道人。宁宗时举乡贡第一名，故

又称陈解元。唐制，凡考进士者，皆由地方将举人解送入京，参加会试，其中获取乡试举人第一者称为解元。其后沿袭成俗，只要获取乡试第一的举人，不论其是否进京参加会试，统称为解元。不过，唐代凡由地方解送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就都称为进士，中式者则称为“进士及第”。陈起曾考取举人第一，故可称为“解元”。又有武林陈学士之称。朱彭《南宋古迹考》说：“陈宗之，钱塘人。宁宗时乡贡第一，时称陈解元。事母至孝，居睦亲坊，开肆卖书以奉母。”[1] 方回《瀛奎律髓》也说：“陈起，睦亲坊开书肆，自称陈道人，字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尝刊《江湖集》以售。宗之诗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哀济邸而诮弥远也。或嫁其语于敖器之，言者论列，劈《江湖集》板，宗之坐流配。”[2] 方回《瀛奎律髓》还说：“卖书陈彦才，亦曰陈道人。宝庆初，以‘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诗为史弥远所黥。诗祸之兴，捕敖器之、刘潜夫等下大理狱，郑清之在琐闼止之。余及识此老，屡造其肆。别有小陈道人，亦为贾似道编管。”[3] 小陈道人，指陈起之子陈思。陈伯玉《宝刻丛编序》谓：“都人陈思，儥书于都市。士之好古博雅，蒐遗猎忘以足其所藏，与夫故家之沦坠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于其肆，且售且儥。久之所阅滋多，望之辄能别其真赝。”[4]《梦兰琐笔》谓：“陈思汇刻《群贤小集》，自洪迈以下六十四家，流传甚罕。鲍以文诗云：‘大街棚北睦亲坊，历历刊行字一行。喜与太丘同里闬，芸编重拟续芸香。’注云：‘陈解元诗名《芸香稿》，子名续芸。’”[5] 又《四库全书总目·宝刻丛编》提要云：“宋陈思撰。思，临安人。所著《小字录》前有结衔，称‘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又有《海棠谱》自序，题开庆元年，则理宗时人也。”法式善《存素堂文集·跋〈江湖小集〉》云：“旧本题宋陈起编。起字宗之，钱塘书估，设局于睦亲坊，世所传宋善本，皆其所刻，又称陈道人雕板者是也。”又《江湖后集跋》：“宋人陈起，在宝庆、绍定间以书贾能诗，与士夫抗颜列席，名满朝野。篇什转赠，随时标列名目，付

【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71页。

【2】[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

【3】[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二《赠陈起》诗注。

【4】[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

【5】[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

【1】[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七《补正》引《江湖后集跋》。

【2】《宋史》卷四一四《史弥远传》。

雕即成，远近传播。"[1]

当着我们把这些基本材料摆出之后，陈起、陈思的行实事迹也就有了大致的轮廓。其人颇有文学才气，但于科第仕途却不得意，故以能诗而结交江湖诗人，江湖诗人亦皆与之友善。宝庆、绍定间（1225—1228年）其亲手遴选、编辑，并主持刻印、出版的《江湖集》九十五卷，可以证明他与江湖诗人声气相通，心心相印。他编辑出版《江湖集》的过程中，史弥远作为宰相辅佐宁宗17年，又拥立理宗，独相9年，可谓权倾朝野。宁宗不豫，继承人意在济国公赵竑身上，史弥远与郑清之合伙阴谋废了济王，而立理宗赵昀。而"理宗德其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计，虽台谏言其姦恶，弗恤也。……识者群起而论之"[2]。故陈起也借着编刻出版《江湖集》，自己赋诗"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对皇子济王赵竑寄予无限同情，对春风得意的史弥远则给予无情讥诮。因而也就得罪了史弥远，致使自己坐罪流配。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死，陈起获赦回到临安，仍从事出版发行业，继续编刻出版《江湖后集》和《江湖续集》。陈思跟他并不完全一样，他们都多年经营书肆，既出书，也卖书。有时为了策划好的出版项目，或经手异本获利，又常常广搜珍本善本，故能眼别真赝，心识古今。因而得到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书籍搜访员的虚衔。成忠郎，本武阶名，绍兴年间厘定入品，为武阶五十二阶中的第四十九阶，正九品。缉熙殿，乃南宋皇家藏书之地。国史实录院、秘书省，乃宋代中央专门的编纂机构，又典掌图籍收藏保管。陈思挂的虽是虚衔，但也能反映出他多年从事刻书出版业练就的那点本事，表面上还是得到了皇家的认可。

陈家在临安除在棚北睦亲坊巷口开有书籍铺，在洪桥子南河西岸和鞔鼓桥南河西岸还开有两间分店，看来规模和实力都相当可观。至于他们父子到底出版过多少书，现已无法勾稽出其确切数字，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说其刊书可考者有32种，恐怕也只是个参数。肖东发先生《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开列了

一个陈家书籍铺出版目录，著录《江文通集》十卷、《常建诗集》二卷、《韦苏州集》十卷、李贺《歌诗编》十卷《集外诗》一卷、《孟东野诗集》十卷、《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浣花集》十卷、《甲乙集》十卷、《王建集》十卷、《唐求诗集》一卷、《于渍诗集》一卷、《张滨诗集》一卷、《周贺诗集》一卷、《碧云集》三卷、《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李推官披沙集》六卷、《棠湖诗稿》一卷、《李丞相诗集》二卷、《安晚堂集》十二卷，凡19种。一看便知还缺少《朱庆馀诗集》、《章孝标诗》、许浑《丁卯集》等。陈起对唐人诗情有独钟，又写得一笔好字，故有“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之誉。其实作为出版家或者称为出版商，陈家书籍铺还编刻出版过《增广圣宋高僧诗选前集》一卷《后集》三卷《续集》一卷、《中兴群公吟稿》甲乙丙丁戊集、《前贤小集》、《前贤小集拾遗》等总集，陈思编刻出版过《两宋名贤小集》、《宝刻丛编》、《书苑菁华》。他们的书籍铺还刻印出版过《释名》、《画继》、《图画见闻志》、《湘山野录》、《灯下闲谈》、《剧谈录》、《续世说》、《挥麈录》、《容斋三笔》、《宾退录》等书。国家图书馆至今还藏有陈宅书籍铺出版的宋赵与旹《宾退录》十卷、《王建诗集》十卷、《朱庆馀诗集》一卷、《周贺诗集》一卷、《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唐罗隐《甲乙集》十卷、唐李建勋《李丞相诗集》二卷，凡7种。还有些版式规制、行款字数、字体刀法都很类似的唐人诗集，当也是出自陈宅书籍铺。宋岳珂的《棠湖诗稿》一卷，天津图书馆有藏。

一个私人出版商能编刻出版这么多书，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不多见的。陈起编刻出版图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且卖书“收价清于卖卜钱”，即价格低廉。还“赊书不问金”，贫穷文人一时拿不出钱来买书，不但可以赊账，还不计较多少钱。还“成卷好书借人看”，对实在买不起的，干脆就借给人看。他这种经营理念和为满足文化人需求而表现出来的大度品格，博得了“江湖名姓香”的盛誉。他这种经营理念，拿到今天来看也不算落后。杭州还有几间出版坊肆也很值得一提，如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也是父一辈

子一辈地经营出版，可考知者，他们出版过10种小说家类的书，颇有特色。荣六郎家书籍铺是个老铺，其刻印出版的《抱朴子内篇》卷第二十后镌有5行广告性的牌记："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壬申乃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显然这是一位在北宋时即从事出版业的东京汴梁的老出版家。靖康之乱，避地临安，老店新张，继续从事出版事业。

## 二、婺州地区的出版家唐奉议

江浙地区除杭州，还有绍兴、明州、婺州、湖州等地出版业也很发达。尤其是两浙东路的婺州，即今浙江的金华，南宋时出版业与临安、建宁、四川眉山等地齐名。婺州及其所属的义乌、东阳、永康等县有不少书坊从事刻书出版事业，如金华双桂堂景定二年（1261年）重刻出版的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非常有名，今藏上海博物馆。它与南宋刊本的《忘忧清乐集》（围棋谱）被称为宋刻双谱，历为藏书家所青睐。它如婺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刻印出版的《老泉先生文粹》、义乌酥溪蒋氏崇知斋刻印出版的巾箱本《礼记》、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刻印出版的《三苏先生文粹》、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刻印出版的大字本《初学记》、婺州永康清渭陈宅刻印出版的《精骑》（台湾存三卷）等，就都很有名。尤其是婺州市门巷唐宅，就是更负盛名的出版家。虽然唐宅一共出版过多少种书已无法详实稽考，但唐宅是南宋婺州的出版名家则无庸置疑。其南宋初年所刻印出版的《周礼》郑注十二卷，可以证明这一点。该本传世者凡两部，一部有配补，一部是完帙，均藏国家图书馆。卷三后镌"婺州市门巷唐宅刊"牌记，卷四、十二后各镌"婺州唐奉议宅"牌记。唐宅，指的是唐尧封、唐仲温、唐仲义、唐仲友父子一家。唐尧封字嘉猷，绍兴间进士，绍兴末以光禄寺丞兼庆王府直讲，除祠部员外郎。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擢国子司业，再除殿中侍御史，以敢言受

帝知，为政有清直声。唐仲温字与直，仲友长兄，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赵逵榜进士。唐仲义字与信，仲友二兄，绍兴三十年（1160年）梁克家榜进士。唐仲友字与政，号说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为西安主簿。三十年（1160年）复中博学鸿词科。历建康府学教授、秘书省正字。上万言书论时政，孝宗纳之，召除著作佐郎，出知信州、台州。为学多与朱熹相左，后为朱熹劾罢。康熙《金华府志》说他"再转知台州，兴利除害，政声哗然。俄为同官高文虎所忌，谮于提举刑狱，劾罢。主管建宁武夷山冲道观。开席授徒，学者云集。仲友史学精绝，尤邃于诸经。下至天文地理、王霸兵农、礼乐刑政、阴阳度数、郊庙学校、井野畿疆，莫不穷探力索而会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该并举。与吕子同居于婺，而独尚经制之学。然天性廉直，与物多忤，仕未通显，托之于论述而终"[1]。中国旧时方志之书，写人物有个原则，叫作隐恶扬善，但隐扬到《金华府志》这种程度也就无法让人信任了。关于唐仲友，朱熹曾有过六道劾状，劾他贪污腐化，胡作非为，最后发展到利用曾刻印假币的犯人蒋辉再为自己刻印假币。但此人有才，他们父子四人，都在绍兴三十年以前先后登第，一门出四位进士，已十分显赫。又都做过高低不同的官，亦都有政声。所谓"婺州唐奉议宅"，指的就是唐宅。奉议，乃奉议郎的简称和别名，在宋代是寄禄官的官名。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由太常、秘书、殿中丞、著作阶改，是文臣寄禄官三十阶中的第二十四阶，正八品。唐尧封做过殿中侍御史，唐仲友做过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都可称为奉议郎官，简称奉议。考婺州到清初还有石板巷、芝麻山巷、柴场巷、螺蛳巷、麻糍巷、斯家巷、庄家巷、赵麻巷、石子巷、酒坊巷、皂坊巷等名称[2]，表明此地街道有称巷的传统，市门巷当是宋代的婺州地名之一。唐家满门文化人，可又都是小官，收入并不优厚。一为推展文化，一为牟取薄利，故经营出版，且为校刻出版《荀子》、《扬子》，向台州公使库敛钱，将多部化归己有，发往婺州售卖。并窝藏私镌东南楮币印版的配犯蒋辉，为其雕刻《荀子》、《扬

【1】康熙《金华府志》卷十六。

【2】康熙《金华府志》卷二。

子》、《文子》，而遭到朱熹弹劾。可证唐宅确是利益思想较重，甚至贪赃枉法。

## 三、湖州地区的出版家王永从弟兄子侄

两浙西路的湖州，宝庆元年（1225年）改名安吉州。地处太湖西南，宋代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此地有王永从、王永锡兄弟子侄，曾在思溪建寺院、修宝塔、雕印出版《大藏经》，既是功德主，又是出版家，雕印出版史上也颇负盛名。

成化《湖州府志》卷十二记载："法宝禅寺，在县南三十里思溪。宋宣和中，士人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与其弟崇信军承宣使永锡建。旧名圆觉禅院，后改名法宝。"嘉泰《吴兴志》卷十三记载："圆觉禅院在思溪，宣和中士人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与弟崇信军承宣使永锡创建，赐额为'慈爱（当为受）和尚道场'。寺有塔十一层，及有《藏经》五千四百八十卷印板，作印经坊。"《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二有《思溪圆觉法宝寺舍利塔记》："吴兴城东三十五里思溪之上，有大丛林，号圆觉法宝寺，住山文梓重建塔成，伐石属某书之，用图永久。按状：宋崇信军承宣使王永从，宣和间仕于朝。慈受（怀）深禅师时住慧林，永从暇日数与之游，而咨决心要，间语及有为因果。禅师言：'起塔之功德最胜。'盖舍利所在则为有佛也。永从既谢事而归，则舍家造建塔，迎禅师为之开山。其后永从子孙日益衰，悉取故所施田，而寺遂废。淳祐间，观文殿学士赵公与憲捐金钱畀之，使以田复入于寺，且缮葺其栋宇，缺之以复完。国朝至元十三年，塔与寺屋俱毁于兵。"这些材料，足以说明王永从兄弟曾舍家财修建了思溪圆觉法宝禅院和十一层的舍利塔，还施舍了寺田。观察使，乃正任武阶名，始设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北宋诸州沿置，但不带刺史。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三月，又诏依唐代故事，观察使又兼本州刺史。政和二年（1112年）九月，又不复带持节。元丰后为正五品，位次于节度观察留后，但高于防御使。承宣使，亦为正任武阶名，政和七年（1117年）六月由节度观察留

后改名而来，正四品。即其弟王永锡高他一品。尽管宋代官员待遇优厚，但光靠那点俸禄也是造不成寺建不成塔的。湖州乃丝绸之乡，历来出富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谓："辛未，湖州民王永从献钱五万缗以佐国用，上不纳。辅臣言版计无缺。或曰：'曩以纳其五万缗矣，今却之，则前后异同。'乃命併先献者还之。仍诏自今富民，毋得辄有陈献。"[1] 此事发生在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二十二日，可证王家确有经济实力，政府也不失国格。

[1]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

日本京都南禅寺所藏《思溪资福藏》中的《无相思尘论》卷后镌有题记："大宋国两浙道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溪居住左武大夫密州观察使致仕王永从同妻恭人严氏、弟忠翊郎永锡妻顾氏、侄武功郎冲允妻卜氏、从义郎冲彦妻陈氏、男迪功郎冲元妻莫氏、保义郎冲和妻吕氏并家眷等，捐舍家财，命工开雕《大藏经》板五佰五拾函，永远印造流通。所鸠善利，恭为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利及一切有情。绍兴二年四月日谨题。雕经作头李孜、李敏；印经作头金绍；掌经沙门觉清；干雕经沙门法祖；对经沙门仲谦、行坚；对经沙门静仁；慧觉大师道融赐紫修敏；都对证湖州觉悟教院住传天台教真悟大师宗鉴；劝缘平江府大慈院住持管内掌法慈受禅师怀深。"《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二后所镌题记，除印经作头、掌经沙门不同外，其余全同。《解脱道论》卷一背后则有"丙午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旦，修武郎閤门祇侯王冲元亲书此经，开板结《大藏》之因缘"。表明此经之始刻尚在北宋末年，至绍兴二年已进行了六七年，当已接近了尾声。因而可以肯定，绍兴二年前后王永从出家资雕印出版了5 480卷550函的《大藏经·思溪圆觉藏》，这无庸置疑。且以余版又刻印出版了《唐书》和《五代史》。后来这两套书的版片，连

图16
宋绍兴二年王永从刻《思溪藏》本《大智度论》

大智度論卷第六十四　端
龍樹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釋第四十二品下　訖第四十三品上
爾時釋提桓因問須菩提云何是求菩薩道
善男子礙法須菩提報釋提桓因言憍尸迦
有求菩薩道善男子善女人取心相所謂取
檀波羅蜜相取尸羅波羅蜜相羼提波羅蜜
相毗梨耶波羅蜜相禪波羅蜜相般若波羅
蜜相取內空相外空內外空乃至無法有法
空相取四念處相乃至八聖道分相取佛十

同宇文时中守吴兴时所刻印出版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版片，均被杭州国子监取去充作监板了。137年后，即嘉熙三年（1239年）安吉州思溪圆觉禅院久已改称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又用王永从旧版补刻而成《思溪资福藏》（图16）。当然出版《大藏》与出版世俗之书不完全相同。出版释家《大藏》只有做功德的理念，而无盈利的动机。但利也分当世和来生、洪福和清福。看来出版跟赢利总是分不开，只不过有图眼前利，有图长远乃至来生利，当然也有图清名利者。但从刷印流传的角度讲，两者是一样的，都是出版。

## 第二节　四川地区的重要出版家及其出版事迹

早在唐五代时期，四川的刻书出版事业就较别处发达。剑南两川刻印历书、成都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成都樊赏家印卖具注历、成都书肆雕印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小学字书，五代西蜀毋昭裔刻印出版《九经》、《文选》等，都是唐五代时四川出版家的杰作。宋初政府开雕《开宝藏》之所以安排在四川，也是因为这里有娴熟的刻工和丰富的出版经验。成都附近之广都县（今双流）以产楮皮纸、竹纸出名，蜀中出版经史子集书多用广都纸刷印。广都北门裴宅，南北宋均印卖《六家注文选》。广都费氏进修堂出版大字本《资治通鉴》。临邛韩醇在南宋淳熙年间刻印出版韩愈、柳宗元的文集。南宋初期，四川的出版中心由成都向眉山地区转移，出现了一些新的书肆和出版家。其中井宪孟主持刻印出版的南北朝七史，在出版史上较为有名。然井宪孟的行实，只有一些零星的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了解一些有关他藏书和刻书出版方面的事迹。

### 一、井宪孟与眉山七史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自序称："公武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为业者七世，故家多书。至于是正之功，世无与让焉。然自中原无

事时，已有火厄；及兵戈之后，尺素不存也。公武仕宦连蹇，久益穷空，虽心志未衰，而无书可读，每恨之。南阳公（井宪孟）天资好书，自知兴元府，至领四川转运使，常以俸之半传录。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间多有异本，闻之未尝不力求，必得而后已。历二十年，所有甚富。既罢，载以舟，即庐山之下居焉。宿与公武厚，一日贻书曰：'某老且死，有平生所藏书，甚秘惜之。顾子孙稚弱，不自树立。若其心爱名，则为贵者所夺；若其心好利，则为富者所售，恐不能保也。今举以付子，他日其间有好学者归焉，不然则子自取之。'公武惕然从其命。书凡五十箧，合吾家旧藏，除其复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绍兴二十一年元日昭德晁公武序。"表明井宪孟也是一位以翰墨为业的文化人，是喜欢藏书的官员。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书》提要云："……嘉祐中，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舛谬亡阙，始诏馆职雠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久之始集。治平中，巩校定《南齐》、《梁》、《陈》三书上之，刘恕等上《后魏书》，王安国上《周书》，政和中始皆毕，颁之学官，民间传者尚少。未几，遭靖康丙午之乱，中原沦陷，此书几亡。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阙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十许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清叶昌炽谓："读此，知井公收刊史籍之功甚巨也。"[1]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又引周紫芝《太仓稊米集·书谯郡先生文集后》的话："今又得《谯郡先生集》一百卷于四川转运副使南阳井公之子晦之，然后知先生之诗文为最多，犹有网罗之所未尽焉。晦之泣为余言：'百卷之书，皆先君无恙时贻书交旧而得之，手自校雠，为之是正，凡一千八百三首，历数年而后成。君能裒其所未得者，以补其遗，是先君子之志也。"因知井宪孟有文集流传，且有子接替他做了四川转运副使。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氏读书志》提要谓："其《序》

【1】[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

言得南阳公书五十箧……南阳公未知何人，或云井度宪孟也。”其注引“郑樵云井氏望出扶风及南阳”[1]。《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唐吏部侍郎南阳韩愈退之撰条之下提要有云：“南阳者，唐东都之河阳。《春秋传》‘晋于是始启南阳’者也。”

[1] 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八《晁氏读书志》校记一。

从上述资料可知井宪孟名度，宪孟盖为其字，郡望盖为南阳，故人称南阳公。从兴元知府升为四川转运使。兴元乃陕西山南西道，即今陕西南郑县治。宋制，各路转运使多选历任知州中有政绩、晓钱谷的文臣出任。而凡由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充任者，则称为都转运使。井宪孟仅是转运使，故低于五品，可谓小官。井氏知过兴元府，又是文化人，符合做转运使条件。绍兴十四年(1144年)，他来司四川漕台，便命各州学官搜求嘉祐旧本南北朝七史，令眉山地区刊行出版。南北朝七史总共465卷，卷帙规模也很可观。其版式为每半版九行，行十八字，可谓行格疏朗。版历三朝，多次刷印，模糊不清，书铺子称为“邋遢本”。直至清朝嘉庆间，遭回禄之灾，七史版片全毁。

## 二、蜀刻唐人文集

眉山还以出版唐、宋人文集而驰名。眉山地区庠塾聚学者众，文学之士彬彬辈出。宋高宗曾说“蜀中多士，几与三吴不殊”。王称更说“吾乡抑文章之所自出”。蒲叔献亦说“吾蜀文籍巨细毕备”[2]。文人多，文化气氛、学术空气浓，直接推动出版业兴旺发达。其中蜀刻唐人文集，在出版史上之声誉不亚于眉山七史。关于唐人文集，过去多泛称蜀刻本，近人研究多认为出版于眉山地区。赵万里先生在《中国版刻图录》中曾做出结论性判别：“传世蜀本唐人集有两个系统：一为十一行本，约刻于南北宋之际，今存骆宾王、李太白、王摩诘三集；一为十二行本，约刻于南宋中叶，除上举孟浩然、李长吉、郑守愚三全本，孟东野、元微之二残本外，尚有欧阳行周、皇甫持正、许用晦、张承吉、孙可之、司空一鸣六全本，与刘文房、陆宣公、权载之、韩昌黎、张文昌、刘梦得、

[2]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86页。

姚少监七残本，总得十八种。此十八种唐人集，元时为翰林国史院官书，清初均为颍川刘体仁藏书，其时闻尚存三十种。别有王无功、张说之、杜荀鹤三集，均见前人著录，惜不传。”第一个系统的《骆宾王文集》、《李太白文集》中高宗赵構的“構”字，不缺笔避讳，似应出版在北宋。可是高宗赵構之嫌名“搆”字，却又有讳有不讳，又显系出版于南宋初年。而《王摩诘文集》则“構”、“搆”均不避，当刻印出版在北宋末年。这几书之编次均不太好，类出书肆之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李翰林集》提要云：“近蜀本又附入左绵邑人所裒白隐处少年所作诗六十篇，尤为浅俗。白天才英丽，其辞逸荡隽伟，飘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读者自可别其真伪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右丞集》提要云：“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而此集编次尤无伦。”又《直斋书录解题·骆宾王集》提要亦云：“又有蜀本，卷数亦同，而次序先后皆异。”可见这个十一行本系统的蜀刻唐人文集，编次毛病较多，显系出版商标新立异，以图满足人们猎奇心理，速售获利。

十二行本蜀刻唐人文集，书中光宗赵惇嫌名“敦”字皆缺笔避讳，当出版于南宋中叶。以现存这个系统的蜀刻唐人文集的版式行款、字体风格、印纸墨色来看，如出一辙，因疑其为某断代总集之散出者。且现存十九种（非十八种，《杜荀鹤文集》今藏上海图书馆）文集，每一种书前卷尾都未留下出版者的痕迹，也特似丛刻之散出者。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五，出现了《唐六十家诗集》一名，但未说明由谁在什么地方出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右丞集》提要谓：“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异于他处本。”王楙生于1151年，卒于1213年，福州福清人。所著《野客丛书》，分门类聚，钩隐抉微，考证经史百家，下至骚人墨客，佚草佚事，细大不捐。所记《唐六十家诗集》，在他下世前十七八年已经行世，当为亲眼所见。陈振孙晚他三四十年，但是目录学家，所谓“蜀刻《唐六十家集》多异于他处本”，当是他校审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可以相信，南宋光宗时四川眉山地区编刻出版过一部《唐六十家诗集》。惜

《宋史·艺文志》草草编成，未予著录。而明代杨士奇等核编的《文渊阁书目》，虽是簿录式的登录，却多为宋、元旧籍。其卷十著录两部残本《唐六十家诗》，指的当就是王楙、陈振孙所说的《唐六十家诗集》。元兵灭宋，版片归西湖书院，很多书则归了翰林国史院。明灭元之后，翰林国史院旧藏又归了明文渊阁。今蜀刻唐人集中钤盖“翰林国史院官书”长条朱印，即典出于此。清初，又归藏内阁大库。刘体仁可以入阁看书，这些唐人文集便随手携归己有。因此，我们基本可以肯定，现存蜀刻唐人文集十二行本，当是南宋中叶眉山地区出版家参酌闽刻，博采众长，重新编刻出版之《唐六十家诗集》的零种。连原刻带传抄，现存总共不及其半。这是宋代四川出版史上的一段公案，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但究竟是哪位出版家编刻的，尚有待于未来的发掘。眉山是三苏的老家，《苏文忠公文集》，眉山出版过大小两种版本。苏辙的《苏文定公文集》，也由眉山出版。另外此地还出版过《三苏文》。眉山程舍人宅出版过邑人王偁的《东都事略》。眉山还编刻出版过《新编十七史策要》、《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梅亭四六类稿》、《后山诗注》、《册府元龟》等。足见眉山确是出版家云集之地。

## 第三节　福建地区的重要出版家及其出版事迹

宋代图书出版量最大的地区是福建，而福建出版家云集之地则在建宁府的建安与建阳。值得称道的出版家如詹光祖、詹天祥、詹天麟、廖莹中、叶武子、刘应李、韩元吉、俞闻中、叶箌、严粲、吴炎、叶时、黄埒、赵与迿、林经德、余仁仲、蔡纯父、魏仲举、魏齐贤、黄善夫、蔡梦弼、吴坚、余恭礼、余文兴、余静庵、余唐卿、余彦国、刘之问、刘叔刚、刘日新、刘仕隆、刘仲立、刘仲吉、虞叔异、魏忠卿、陈彦甫、王朋甫、江仲达、黄及甫、陈三八郎、王懋甫等，不胜枚举，都是宋代福建的出版家。正是他们打造了福建的出版事业，也将宋代社会的出版业推向了高峰。

## 一、建安出版家余氏

叶德辉《书林清话·宋建安余氏刻书》谓："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且当时官刻书亦多由其刊印。"叶氏之说无误，但余氏经营出版业由宋经元至明，甚至延续到清初，前后几百年，余氏也有宗派分支，历朝有各自的主营者，笼统言之，无济于事。乾隆四十年（1775年）正月，乾隆皇帝曾因阅米芾墨迹，纸幅上印有"勤有"二字；继阅《千家注杜诗》，卷后又镌有"皇庆壬子余氏刊于勤有堂"字样；又阅《古列女传》，书末亦镌有"建安余氏靖安刊于勤有堂"字样，未能悉其来历，故谕军机大臣选派当地诚妥之员予以考察后复奏。当地奉旨考查后复奏称："余氏后人余廷勷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彼时外省板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选纸料，印记'勤有'二字，纸板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时有余文兴，号勤有居士，亦系袭旧有堂名为号……。"[1] 这段答复虽说很笼统，但大致可信。余祖焕从河南固始县新安村来居闽中，远在南北朝时期。传14世有余继祖、余同祖生。余同祖曾于北宋时任广西安抚使，任满致仕归乡，于建阳蹈书林，见其山水胜状，于是安家于此。此事当在北宋至道三年（997年）以后，嘉祐八年（1063年）以前。此为余氏定居书林之始。书林既是地名，又确是书坊林立的出版之乡，受其薰染，余氏于南宋起，也开始大事经营出版业，但非余氏勤有堂，而是余仁仲的万卷堂。勤有堂虽始自宋代，但主要出版事迹则在元朝，此话留待后边再讲。现在仍可考知者，余仁仲以万卷堂或家塾名义出版过《陆氏易解》一卷、《尚书注疏》二十卷、《尚书全解》四十卷、《尚书精义》五十卷、《周礼注》十二卷、《纂图互注重言重意周礼》十二卷、《礼记注》二十卷、《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春秋穀梁经传解诂》十二卷、《事物纪原》二十六卷等。其所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后镌

[1]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宋建安余氏刻书》。

印6行广告性的告白，足以反映出余仁仲的出版态度。告白曰："《公羊》、《穀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江浙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陆氏釀作讓；隐元年嫡子，作適归；含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蒐作廋，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绍熙辛亥乃光宗赵惇绍熙二年(1191年)，时值南宋中叶的开端，经济形势尚好，出版家刻书也很严谨考究。元岳浚荆谿家塾校刻《九经》过程中，谓"宋时《九经》刊板，以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为善"。这里所说之"建安余氏"，指的就是余仁仲。可证建安余仁仲非但出版过《九经》，而且所刻《九经》于80多年后得到了岳浚的充分肯定，可知其出版态度十分严肃。近见朱熹《中庸章句解惑》一册，是华人从韩国私人手中购回者，镌有"延祐甲寅艮月麻沙万卷堂刊"长方牌记，与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著录之《孟子集注》七卷版本完全相同，当出于同一出版家之手。肖东发先生极力批评将其归入余氏万卷堂。其实延祐甲寅已是元仁宗的第二个年号，为1314年，距余仁仲的主要活动期已过一百二三十年，其后人用家传堂号在麻沙继开书坊，出版读本《四书集注》，也是极有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则余氏万卷堂也是百年以上的老字号。

## 二、建安出版家蔡梦弼

蔡梦弼，字傅卿，号三峰樵隐，南宋建阳著名的出版家，南宋初期人。他所刻印出版的书中，以《史记集解索隐》合刻最有名。经书正文、注、疏合刻在一起出版，始于南宋初期两浙东路茶盐司官雕。史书中的《史记》正文、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合刻在一起出版，盖即始于蔡梦弼的《史记》二家注合刻。国家图书馆今藏两部。此前经文、注、疏各自单行，览者不便。史书也是正文、注、解各自单行，览者病焉。这种经、史正文、注释的合刻，是出版史上的创新，表明出版家首先是为了读者便于披览，注重社会效益，其次才是赢得读者，获取经济

效益。这是出版家理应遵循的原则，也是颠扑不破、不可违背的规律。蔡梦弼家塾出版之《史记集解索隐》每半版12行，行22字、注文小字双行，行28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式清朗，字体凝重，不同于一般建阳本。特别是《三皇本纪》的《补纪》，其字体模仿宋徽宗瘦金书，光彩夺目。后镌两行出版题记："建谿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时岁乾道七月春正上日书。"七月当为七年（1171年）之误。此例一开，读书人都感觉到方便，发行很好，故于蔡氏出版《史记》之后五年，即淳熙三年（1176年）便由张杅在桐川郡斋再次出版《史记集解索隐》。蒙古中统二年（1261年）山西平阳段子成也出版了《史记集解索隐》。当然，影响最深而又有所发展者，则是建安黄善夫。

## 三、建安出版家黄善夫

黄善夫，名宗仁，善夫当是其字，南宋建阳人。受蔡梦弼合刻《史记》二家注启发，他将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家注都分解到《史记》各相关正文之下，出版了《史记》三家注合刻本，这就更便于披阅了。一书在手，原来各自单行的正文、三家注四部书全来眼底，实在是出版史上的创格。该书每半版10行，行18字；注文双行，行22~23字不等；细黑口，左右双边。宋讳缺笔至敦字，表明其出版当在南宋光宗赵惇之世，较蔡梦弼合刻《史记》二家注，晚20余年。此书每版带有书耳。所谓书耳，系指每版左边栏之外上角，以左边栏为内线向左向下镌印一长条框围，像是长出了一个耳朵，故称书耳。书耳不是艺术鉴赏的尤物，而是在其中镌印本版所属之篇名、年份、体裁等标示性简略文字，以方便阅读。这种在书耳中镌印的文字叫作耳题或耳记。今天出版之书，讲究者也有楣线，楣线之上的部位印章、节之名，以便寻检，盖属书耳遗意。这种书耳和耳题，据说是宋代福建出版商创造的，这显然是以读者为上帝经营理念的表现。这是出版思想的一大进步，是出版版式上的一种创新。黄版《史记》目录后镌印"建安黄氏刻

梓”木记，卷首集解后镌印“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其后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彭寅翁崇道精舍，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廖铠，嘉靖四年（1525年）王延喆、汪谅，嘉靖十三年（1534年）秦藩朱惟焯等所刻三家注《史记》，盖都祖于黄善夫本。然三家注文何其繁夥！再准确镌印到《史记》相应正文之下，又谈何容易！故黄善夫对三家注文是有所删节的，这是出版商的通病。彭寅翁崇道精舍本，祖于黄善夫本，于三家注又有更改。为了少刻字少镌板以降低成本，不惜动手删改内容，这也是出版商甩不掉的利益桎梏。故后世反重单注本，是有道理的。

黄善夫另一著名出版品，是刊于南宋中叶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东坡纪年录》一卷。此书题为宋王十朋纂集，实则很可能就是黄善夫自己组织力量纂集的。其基础是已流行的苏诗“五注”、“八注”、“十注”，而后又“搜索诸家之释”，“铲烦剔冗”，最后编成这个汇注本。手法与三家注《史记》基本相同，号称百家，广告宣传力度更大，卖点更多，销路更广。《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姓氏、目录后镌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双行牌记。每半版13行，行22~23字不等，注文小字双行，行27~29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狭行细字，显然是为了降低成本，扩大营销。但字体端庄清秀，刀法剔透，属建本上乘。果然此书一出，大获成功，因而招致“闽中坊肆遂争先镌雕。或就原版以摹刊，或改标名以动听，期于广销射利，故同时同地有五六刻之多。而于文字，初无所更订也”[1]。直到元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所刻此书，便改称《新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东坡纪年录》一卷。不仅如此，还于注家、注文妄加删节，质量上远不如黄本。当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舍黄本而用务本书堂本，实误。建安万卷堂也出版过《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姓氏后镌有“建安万卷堂刻梓于家塾”牌记。建安魏仲卿家塾也出版过此书。这两本均藏日本。

[1]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三《元建安熊氏本百家注苏诗跋》。

## 四、建安出版家刘氏

宋代建阳出版家中还有刘麟、刘仲吉、刘仲立、刘将仕、刘元起、刘叔刚等人值得一提。刘氏参与出版活动始于北宋末。刘僎特喜唐元稹诗文，并编成《元氏长庆集》六十卷，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由其子刘麟版行于世。刘仲吉（1131—1202）名大成，字仲吉。子刘崇之，是朱熹的学生。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引《刘氏忠贤传》卷一说仲吉“天姿爽迈，赋诗有警句，已乃不利场屋，闭门教子。淳熙乙未，子崇之登第，公方强仕，喜曰：‘有子成吾志，尚何求！’就养长乐，久馏吴京，晚历蒸湘，日赏湖山之胜。间归乡间，稍筑园圃，与客觞酌吟咏，休休如也。性嗜书，手不释卷。前辈文集，昼夜编集，或质疑义，应答如流。襟度旷达，轻财重义，里中推为长者”。后以子贵，死后赠吏部员外郎、太中大夫。周必大为其撰墓志铭，朱熹为其书像赞。他曾于绍兴三十年（1160年）刻印出版《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乾道（1165—1173年）刻印出版《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目录后镌有告白：“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近求到《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计五十卷。此视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近求到”可能是个托词，实际很可能就是他自己编的。“前辈文集，昼夜编集”已透露了这种信息。此书每半版15行，行26~28字不等；白口，间有细黑口，左右双边，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其次子刘将仕，名立之，字信父，登淳熙科进士，官莱阳县令，授将士郎。他曾刻印出版过《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每半版13行，行21字，黑口，镌“麻沙刘将仕宅刊”，今亦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另外刘仲立家塾于隆兴二年（1164年）还刻印出版过《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刘叔刚一经堂还刻印出版过《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大易粹言》七十卷《总论》三卷。刘元起家塾庆元元年（1195年）还开雕出版过《汉书注》一百卷、《后汉书注》九十卷《志注补》三十卷。《汉书注》宋讳缺笔至

"敦"字，表明是南宋光宗赵惇时，即南宋中叶的出版品。

## 五、建安出版家魏、廖、熊氏

建阳还有一位魏仲举，名怀忠，建阳人。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他编刻出版了《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序传碑记》一卷《韩文类谱》十卷、《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前者今存南京图书馆，后者今存国家图书馆。韩集目录镌有"庆元六祀孟春建安魏仲举刻于家塾"牌记。这是典型的由书坊出版家自编、自刻而出版的范例。《四库全书总目·韩集》提要谓当年魏仲举所引"原书世多失传，犹赖此以获见一二，亦不可谓非仲举之功也"。

说到韩、柳集，还应提及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这是历来被誉为"无上神品"的出版品。廖莹中（？—1275)，字群玉，号药洲，福建邵武人。中式之后，即为权相贾似道门客，为其专管藏书。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兵攻鄂州，贾似道领兵出援，私向忽必烈称臣纳币，换得北兵引还，贾却诈称大捷，廖莹中特撰《福华编》以颂之。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革职居西湖葛岭待罪，门客皆离散而去，唯廖氏仍终日相随。一夕二人饮酒通宵，各叙衷曲，归舍后服冰脑自尽。可见他追随奸相，没有人格标准。然于出版图书则极考究。廖氏世彩堂所刻韩、柳集，其字体之清秀，刀法之剔透，印纸墨色之匀净，令人阅以拭目，爱不释手，是杭州地区刻书的上品。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建阳出版家中还有熊姓家族。这个家族分为东、西两族，两族始祖熊秘唐时原住崇泰里（今建阳莒口乡）樟埠一带，后子孙繁衍，户数越来越多，故所居地又称熊屯。传至13世熊祖荣，因入赘而从崇泰里迁到崇化里书林，于是他便成了刻书出版的熊氏始祖。祖荣之孙熊忠信，字明决，是元代出版家翠岩精舍主人刘君佐的岳父，他生有三个儿子，分为恭、俭、让三房。长子天佑，恭房祖；次子天燧，俭房祖；幼子天儒，让房祖。元、明两代熊氏出版家，多为让房子孙，其他两房者少。今可考的宋代熊氏出

版家，是南宋初期的熊克。熊克属熊氏东族一支，居住在建阳城外的赤岸。熊克字子复，绍兴间进士，知诸暨县，被荐为校书郎，累迁起居郎兼直学士院，出知台州。淳熙十二年（1185年）被罢。著有《九朝通略》、《诸子精华》、《中兴小历》等。他于乾道六年（1170年）刻印出版《老子注》二卷，乾道间刻印出版《孝经注》一卷、《毛诗指说》一卷，淳熙九年（1182年）刻印出版其父熊蕃所著《宣和北苑贡茶录》一卷。《皕宋楼藏书志》载存熊氏刻书题记云："北苑贡茶最盛，然前辈所录止于庆历以上……先子亲见时事，悉能记之，成编俱存。今闽中漕台所刊《茶录》未备，此书庶几补其缺云。淳熙九年冬十二月四日，朝散郎行秘书郎兼国史编修官权直学士院熊克谨记。"反映他从事刻书出版，在南宋初期[1]。

【1】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8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六、建安出版家朱熹、祝穆

还有两位建阳的著名学者值得提及，一位是朱熹，一位是祝穆。朱熹一生安贫乐道，潜心理学。《宋史·朱熹传》说："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如此困窘的生活，逼得朱熹不得不走当地众人谋生之同路，这就是出版图书，盈利以自给。他的刻书出版作坊在建阳崇化，名为同文书院，由其子朱在、女婿刘学古经营。门人蔡元定、蔡渊、林择之等，则在其中编校。嘉靖《建阳县志》中有一幅《书坊图》，同文书院就座落群坊中间。后来重修同文书院时，朱熹的三传弟子熊禾专门写了上梁文，称道："儿郎伟，抛梁东，书籍日本高丽通……；儿郎伟，抛梁北，万里车书通上国。"[2] 可证同文书院不但刻印出版了不少图书，而且通行四远，乃至于日本和高丽。生意状况可想而知。为什么会这样？这跟朱熹的名气有关。正因为他的名气，他的一些著作，如《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周易本义》等，在未定稿之前就被出版商设法弄到手而出版发行，获取厚利。同文书院的开

【2】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8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设，则保护了自己的知识产权，自己出版，自己获利。

祝穆，初名丙，字伯和，又字和甫，自号樟隐，南宋建阳人。其曾祖祝确，是朱熹的外祖父，朱熹辈份上高于祝穆，故祝穆从小便师事朱熹。20岁时由朱熹高足黄干为其行冠礼。祝穆未走理学之路，而是注意地理疆域和类书。他所编纂的《方舆胜览》七十卷、《事文类聚》一百七十卷及《四六宝苑》等，都曾自己主持刻印出版，且受到社会的重视与欢迎，乃至"蜀中人士来购者，一次竟以千部计"[1]。书既这么好卖，其他书铺就窥伺盗版，为防止盗版现象发生，他便向福建路转运司乞行约束，保护版权。宋代福建的福州、福清、侯官、兴化军、莆田、晋江、泉州、南安、安溪、漳州、尤溪、同安、南剑州、建安、建阳、麻沙、崇化、武夷、建宁、宁化、汀州、邵武等无一地不刻书，无一地无出版家，还有不少值得提及，但上述足以表明宋代福建出版业较其他地方要兴盛发达得多。祝穆《方舆胜览》将福建印书列为"土产"，尤其是麻沙、崇化两地，号为"图书之府"。朱熹也称当地刻书"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刘克庄亦说"建阳两坊文籍大备，比屋弦诵"。熊禾在谈到建阳时，说"文公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犹水行地"[2]。这些都是当时当地的名人所说，可谓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当时福建，尤其是建阳地区的出版盛况。而且福建，特别是建阳地区的出版家，很多还能薪火相传，香烟有继，从宋经元到明，乃至于清初，仍赓续不断地从事出版事业，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光辉的篇章。福建能写出自己的出版史，而且灿烂耀眼。推其原因，盖福建三山六水一分田，在古代海洋渔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地少人稠，穷则思变。充分利用当地林木茂密，雕板有材可取；闽北武夷山区又盛产竹子，可用来造纸，就地取材，发扬优势，出版业于是长盛不衰，并且形成了传统。而优良传统，有时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发展的推动力。

【1】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83页，引[元]方回：《瀛奎律髓》夹注。

【2】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6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第四节 江西地区的重要出版家及其出版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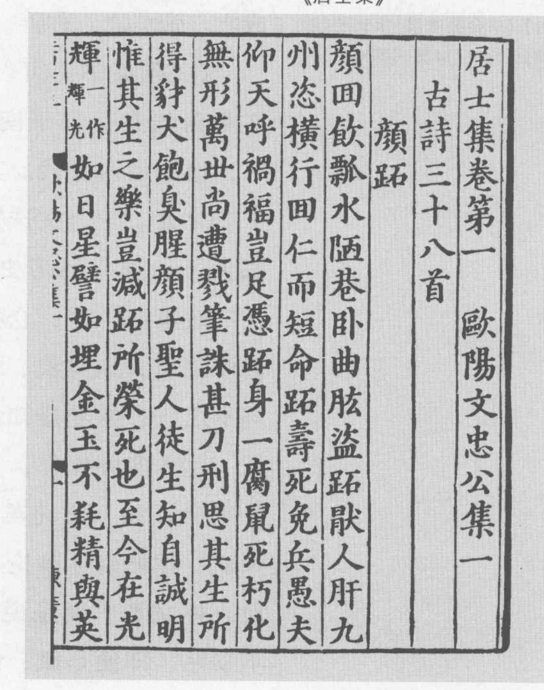
江西在宋代属江南西路，故又称江右。饶州、信州、南康军，当时属江南东路。处长江中游，人杰地灵，经济繁荣。北宋崇宁年间全省有200余万户，445万余口。《宋史·地理志四》说"江南东西路……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秔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而据《梦溪笔谈》卷十二、《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记载，宋政府每年从东南六路漕运粮食总定额为600万石，北宋时江南西路为1 208 600石，占1/5。到南宋时，增至200万石，占1/3。与此同时，手工业、商业、冶炼、陶瓷、造船、造纸也很发达。此地遍生桑、楮、竹子，可作为重要的造纸原料。很多州县都盛产纸张，如抚州的茶杉纸、牛舌纸、箄钞纸(亦称捭纸)，清江的藤纸，吉州的竹纸，临川的滑薄纸，九江的云蓝纸，南康军的布水纸等，都很有名。其中抚州更是宋代七大造纸中心之一，所产箄钞纸远近驰名。雍正《江西通志》记载"宋人墨刻用捭纸者为贵，今绝无矣"。叶德辉《书林清话·宋人钞书印书之纸》卷六说："廖群玉《九经》本最佳，以抚州箄钞纸、油烟墨印造……当时廖氏选纸之精，独重抚州箄钞。"江西还文化昌盛，人才济济。据不完全统计，宋代除官学，江西境内还有书院130余所，有"江西书院甲天下"之誉。宋代进士可考者有29 000人，其中江苏、浙江、福建、四川、江西、安徽达24 000人，约占82%。而江西之临江、吉安、抚州三府就有进士199人。钱存训先生《印刷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一文说："各地进士名额和印书数量的多寡成正比例。"可以说经济、文化、人才，三者都居上乘。故刻书出版业也相对发达。尤以吉州、袁州、赣州、饶州、临江、信州、南安、江州、南昌、南康军等，出版业更盛，至今还能开出一长串所出版的书名。周必大、吴革、洪迈、严用和、赵崇恩、刘宅梅溪书院、赵希琴、郑

寅、陈东、董应梦等出版家，也不胜枚举。其中尤以宰相出版家周必大最值得称道。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又字洪道，号省斋居士，晚号平园老叟。其先郑州管城人，祖父周诜于北宋宣和中来居庐陵，因家于此，故称吉州庐陵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授徽州户曹，累迁监察御史。孝宗继位，除起居郎，应诏上十事，皆切时弊，权给事中，缴驳不避权幸。后任枢密使，创诸军点试法。淳熙十四年（1187年）拜右丞相，进左丞相。光宗时封益国公。宁宗即位，庆元元年（1195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四年（1193年）卒，年七十有九，赠太师，谥“文忠”。《宋史·周必大传》说他“著书八十一种，有《平园集》二百卷。尝建三忠堂于乡，谓欧阳文忠修、杨忠襄邦乂、胡忠简铨皆庐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为文记之”。周必大一生为官，却不舍文翰，著作等身，所以才特别敬重家乡先贤，建三忠堂以记之，这大概是他致仕后编刻出版《欧阳文忠公集》的思想基础。今《周益文忠公集》的《平园续稿》卷十二，有一篇他写的《欧阳文忠公集后序》，能反映周必大编刻出版欧阳修文集的思想理念。

序谓：“《欧阳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闽、蜀皆有之。前辈尝言，公作文揭之壁间，朝夕改定。今观手写《秋声赋》凡数本，刘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别本尤多，后世传录既广，又或以意轻改，殆至讹谬不可读。庐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帖丛脞，略无统计，私窃病之，久欲订正，而患寡陋，未能也。会郡人孙谦益，老于儒学，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览群书，尤长考证。于是遍搜旧本，旁采先贤文集，与乡贡士曾三异等，互加编校。起绍熙辛亥春，迄庆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别为附录五卷，可缮写模印。惟《居士集》经公抉择，篇目素定，而参校众本，有增损其辞至百字者，有移易后章为前章者，皆已附注其下。如《正统论》、《吉州学记》、《泷冈阡表》，又迥然不同，则收置外集。自余去取因革，或有据依，或不必存而存之，各为之说，列于卷末，以释后人之惑。第首尾浩

博，随得随刻，岁月差互，标注牴牾，所不能免，其视旧本则有间矣。既已补乡邦之阙，亦使学者据旧鉴新，思公所以增损移易，则虽与公生不同时，殆将如升堂避席，亲承指授。或因是稍悟为文之法，此区区本意也。六月己巳前进士周某谨书。”这篇序文言简意赅，表达了出版者的几层意思：一是《欧阳文忠公集》，京师、江浙、闽、蜀等地都曾出版过，但欧阳修为文，朝夕修改，乃至再三，故前已出版，后又修订者有之。后世传录，又轻意删改，庐陵所刻之本错讹更甚，甚至不可卒读。此为周必大重行出版欧集的重要原因。二是正遇庐陵郡人孙谦益，非但老于儒学，而且长于为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览群书，尤长考证；加上乡贡士曾三异，具体操作，为重新编校出版欧集提供了人力保证。三是旁搜博采，参校众本，互加编校，随成随刻，不使窝工。周刻《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为庆元二年（1196年）周必大刻本，每半版10行，行16字，白口，左右双边，皮纸印造，书品极好。国家图书馆藏一部全帙，两部残帙(图17)。此书可以说集搜采、编校、出版于一身，这是古代出版家的一种模式，与当代之组稿、编辑加工、版式设计、发排出版很近似。编辑开始于绍熙二年（辛亥）（1191年）春，完工于庆元二年（丙辰）（1196年）夏，进行了五年又三个月。开始时，周必大尚在相位，四年后退休，直接主持其事，又一年才版行于世。真可以称得上是宰相出版家。



居士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

古詩三十八首

顏跖

顏回飲瓢水陋巷臥曲肱盜跖饜人肝九州恣橫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所得豺犬飽臭腥顏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輝（一作輝光）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

图17
宁宗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居士集》

周必大还有一项出版工程值得表彰，这就是他在退休后又主持重修和出版一千卷的《文苑英华》工程。在宋朝推行“崇文抑武”基本国策的初期，急忙诏修大书。宋太宗一共在位二十年（976—997年），而其诏修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却集中在太平兴国年间。也

就是他御极的前十年。可见他对“右文”政策的急迫。《太平御览》一千卷，诏修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蒇事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太平广记》五百卷，诏修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翌年八月竣事。监修同修均为李昉、扈蒙、李穆、汤悦、徐铉、宋白、王克贞、张洎、董淳等。而正在这两部书的编纂落地或将要落地时，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又下诏抽调《太平御览》的监修同修官员李昉、扈蒙、宋白、徐铉等，动手编纂《文苑英华》，后又命苏易简、杨徽之、王祐等参修。《宋会要辑稿》谓：“太平兴国七年九月，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直学士院徐铉，中书舍人宋白，知制诰贾黄中、吕蒙正、李至，司封员外郎李穆，库部员外郎杨徽之，监察御史李范，秘书丞杨砺，著作佐郎吴淑、吕文仲、胡汀，著作佐郎直史馆战贻庆，国子监丞杜镐，将作监丞舒雅，阅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类分之，为千卷。雍熙三年十二月书成，号曰《文苑英华》。昉、蒙、蒙正、至、穆、范、砺、淑、文仲、汀、贻庆、镐、雅继领他任，续命翰林学士苏易简，中书舍人王祐，知制诰范杲、宋湜与宋白等共成之。帝览之，称善，降诏褒谕。以书付史馆。赐器币各有差。”[1]

【1】《宋会要辑稿》第56册《崇儒》五之一《编纂书籍》。

《文苑英华》可以看作是昭明《文选》的续作。《文选》收文起自先秦，迄于南朝梁初。《文苑英华》收文则起自南朝梁末，迄于唐末五代。其中收梁末至隋文约占十分之一，唐文约占十分之九。于《文选》可谓承上起下，继往开来。但由于这是一部大书，选文的历史跨度又大，驾驭起来已很困难。加之“右文”政策的急需，仓猝上马，急于求成，这就难免粗制滥造。而纂修诸臣，如扈蒙、宋白、吕蒙正、杨砺、苏易简等等，又都是词章之士，并非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如此浩繁细密的工程，靠这么一些人实际操作，其书弃取失当，分类失调，体例驳杂，就十分难免。如《文苑英华》选录大量的诏诰、书判、表疏、碑志、律赋、试帖诗、策论、公牍等，就很令人费解。不是说这类东西没有好文章，而是说将这些东西当作精粹收入《文苑英华》就极不妥贴。即便是赋、诗的选录，也极失标准。有些赋诗不但内容

贫乏空洞，在艺术上也堆垛辞藻，敷衍成文。连一般封建选家的标准也没达到。清代李慈铭就讥评《文苑英华》"陈陈相因，最无足观"[1]。而在另一方面，一些为历来选家都不肯放弃的名篇，千卷巨帙的《文苑英华》反而摒而不录。如李白的《朝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三吏》、《三别》、《诸将》、《咏怀古迹》等名篇，《文苑英华》全部失收。宋之问的诗选了一百三十多首，柳宗元的诗则只选一首。这种该有则无，该无则有的滥收尺度，造成了《文苑英华》又滥又缺的选录结果，从而大大降低了其自身的学术、资料价值。所以这部书在明清两代并不为学术界所看重，利用也极不普遍。像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对它就不怎么看重。

【1】[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戊子十一月十三日》。

从编纂体例上看，也一袭《文选》的分类原则，将所收作品分为三十八类，每一类中又分为若干门目。这种方法把作品分割入类，使人无从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并且，这种分类也难做到科学恰当。例如赋、诗、文的区别在于文体，中书制诰和翰林制诏的区别则在于对象与作者身份。一种分类同时采用两种原则，是分类学上的大忌。足见《文苑英华》在编纂的用人上，在文章的弃取上，在分类编排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尽管书成进览，太宗称善，降诏褒奖，实际上却被长期搁置了起来。

《文苑英华》不但在弃取编排上存在严重缺陷，在文字上也鲁鱼亥豕，舛谬颇多。故在成书后二十年，也就是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便又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校勘。《宋会要辑稿》称："景德四年八月，诏三馆、秘阁、直馆校理，分校《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文苑英华》，以前所编次未精，遂令文臣择古贤文章，重加编录。芟繁补阙换易之，卷数如旧。"[2]可知《文苑英华》于太宗雍熙三年十二月（987年）编完进呈后，到真宗景德四年便发现其所存在的问题，故重新分官校理。这次校理，又重新选取了一些古贤的好文章，替换了一些原不该收录的拙劣文章；删去了一些繁文冗章，补进了一些缺漏的文章；并对收录文章重行编次，使体例也有所调整。又过两年，也就是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2】《宋会要辑稿》第55册《崇儒》四之三《勘书》。

(1009年),“又令工部侍郎张秉,给事中薛映,龙图阁待制戚纶、陈彭年校之”[1]。可证在真宗时不但对《文苑英华》重新编次过,还又组织力量对它进行校勘过。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次对《文选》、《文苑英华》校勘“未几,宫城火,二书皆烬”[2]。这就是说,真宗时对《文选》和《文苑英华》所花费的心力,都付之一炬了。十多年后,也就是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才又由“监三馆书籍刘崇超上言:‘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校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天圣七年十一月版成,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校对焉”[3]。证明在真宗时宫中失火后,《文苑英华》就再未有人提及了,而《文选》则确由三馆雕版印行于世。

[1]《宋会要辑稿》第55册《崇儒》四之三《勘书》。

[2]《宋会要辑稿》第55册《崇儒》四之三《勘书》。

[3]《宋会要辑稿》第55册《崇儒》四之三《勘书》。

南渡以后,高宗中兴,文事继续受到重视。至孝宗赵昚又命儒臣校勘过《文苑英华》。这次校勘《文苑英华》的起因,是孝宗先欲刻江钿《圣宋文海》,周必大回奏此书去取差谬,不足观。孝宗于是乃诏馆职裒集《皇朝文鉴》,周必大又就此提出了《文苑英华》。他说《文苑英华》“虽秘阁有本,然舛误不可读”。孝宗皇帝遂“传旨取入,遂经乙览”。故命校勘官员再次校定《文苑英华》。但“时御前置校正书籍一、二十员,皆书生稍习文墨者,月给餐钱,满数岁补进武校尉。既得此为课程,往往妄加涂注。缮写装饰,付之秘阁,后世将遂为定本”[4]。所以这次校勘仍然是敷衍塞责,不足凭信。

[4]周必大:《周益文忠公集》卷五五《平园续稿》一五《文苑英华序》。

南宋庆元初年,周必大致仕,告老还乡,摆脱了繁忙的政务,故又由他主持,再次对《文苑英华》进行校勘,才算最后有了定本。“晚幸退休,遍求别本,与士友详议,疑则阙之。凡经史子集、传注、《通典》、《通鉴》及《艺文类聚》、《初学记》,下至乐府、释、老、小说之类,无不参用。惟是元修书时历年颇多,非出一手,丛脞重复,首尾衡决。一诗或析为二,二诗或合为一。姓氏差误,先后颠倒,不可胜计……今皆正之,详注逐篇之下。不复遍举”[5]。可见这次校勘是动了真格的,于是也就有了真水平。

[5]周必大:《周益文忠公集》卷五五《平园续稿》一五《文苑英华序》。

由上可知《文苑英华》自北宋雍熙三年十二月(987年1月)编纂蒇事,至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定本梓行,前后共历二百一十七年,才得以面世。而在这二百多年中,一部编纂粗糙的

《文苑英华》，却经历了规模大小不同的四次校勘。前三次校勘，没得出任何结果。最后一次由于是周必大主持，严肃认真地进行，才有了较为可信的传本。

“今二书（指《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闽、蜀已刊，惟《文苑英华》士大夫家绝无而仅有……。始雕于嘉泰改元春，至四年秋讫工，盖欲流传斯世，广雍熙陵右文之盛，彰阜陵好善之优，成老臣发端之志。深惧来者莫知其由，故列兴国至雍熙成书岁月，而述证误本末如此。阙疑尚多，谨俟来哲”[1]。连续刻印出版两部如此规模的大书，在宋代出版家中是不多见的。

【1】周必大:《周益文忠公集》卷五五《平园续稿》一五《文苑英华序》。

非但如此，周必大还在出判潭州时再造泥活字，排印出版了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此事反映在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他给朋友程元诚的信中：“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2] 这里的“胶泥”，指的就是泥活字；“铜板”指的是排字的范板；“移换摹印”，指的是两板交替排字刷印；“近用沈存中法”，指的是根据沈括（字存中）《梦溪笔谈》所记载毕昇之泥活字印书法。这是目前所知最早仿效毕昇泥活字印书法而加以实践的第一人，这个人就是周必大，可见周必大在出版技术方面还是位肯于创新的人。

【2】周必大:《周益文忠公集》《书藁》卷一三。

周必大卒于《文苑英华》出版蒇事的同年，即嘉泰四年（1204年）的下半年。《宋史·周必大传》谓必大“一子，纶”。也就是因为他有了这么一个儿子周纶，他自己的文集才得以及时编刻出版。今传《周益文忠公集》卷尾有一篇《周益文忠公集后记》，提供了周纶出版其父文集的梗概：“右先公丞相文集二百卷，初与先友免解进士曾无疑三异纂集校正，篇帙既定，又得免解进士许志伯凌、乡贡进士彭清卿叔夏、罗次君尧宣相与复校，敬锓木以传。惟日记自绍兴戊寅，讫嘉泰（1158—1204年）甲子，录颇详，而书稿尤多，皆未容尽刻，宝藏惟谨，当俟他日。开禧丙寅中秋，子纶谨书。”周纶所刻《周益文忠公集》，加上周必大主持编刻出版的《欧阳文忠公集》和《文苑英华》，被后世称为“庐陵三绝”，是两宋乃至中国出版史上的亮点。

# 第五章　宋代出版图书的主要内容及出版思想

宋代出版之地遍及全国，据张秀民先生统计，光南宋的刻书出版就有183处之多。其中两浙东西路有48处，占26.6%；江南东西路有37处，占20.2%；荆湖南北路28处，占15.3%；淮南东西路、四川路各有17—18处，各约占10%；福建路22处，占12.2%。连烟瘴之地的柳州，孤悬海角的琼州，也刻印出版过图书。另外宋代全国兴修地方志约有718种，除少数是抄、稿本，其余大部分都由各该府州军县正式刊印出版。因此全国的出版处也就不只183处。如此众多、如此普遍的出版地，培育了比其自身不知多多少倍的出版机构和出版家，他们将两宋以前及当代产生的各个门类的图书，几乎都版行于世，所以使得宋代出版业空前繁荣。但仔细分析，全国出版重心主要集中在两浙、八闽、四川及江左江右，而就中央和地方各种出版机构及出版家所出版的图书内容来说，也有鲜明的倾向和特色。

## 第一节　宋代出版图书的主要内容

### 一、宋代刻印出版的经部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为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原因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所说：“经禀圣

裁，垂型万世。”宋代仍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对待儒家经典格外看重。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二月便“诏《诗》、《书》、《易》三经学究，依《三经》、《三传》资叙入官”[1]。太宗则继承五代国子监校刻出版《九经》的传统，于端拱元年至淳化五年（988—994年），先后命国子监校刻出版《三经正义》和《五经正义》，并予颁行。真宗专撰《崇儒术论》，因而于咸平中又命国子监校刻出版《七经正义》，景德至天禧（1004—1021年）中，又命国子监校刻出版《九经注疏》、《十二经传注》。咸平四年（1001年）六月丁卯，又“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2]。哲宗元祐（1086—1094年）时，又把《孟子》列入经典，《十三经》之名始出。南渡后，胄监《六经》缺了《礼记》，高宗令与其他书一道补全。此后南宋国子监又先后校刻出版《十二经正文》、《十二经正义》及《十三经传注》。嘉定十六年（1223年），国子监还刊定出版过《六经》。

朝廷如此，下必尤之。如南宋绍兴初年，叶梦得于建康刻印出版的《六经》；严州刻印出版的《六经正文》；四川刻印出版的《六经义疏》、《九经正文》；婺州刻印出版的《五经》、《八经》白文；两浙东路茶盐司及绍兴府刻印出版的所谓越州本《六经疏义》；兴国于氏刻印出版的《九经》；抚州公使库刻印出版的《六经》、《三传》；建阳余仁仲万卷堂刻印出版的《九经》；廖莹中世彩堂刻印出版的《九经》等等，举不胜举，都是宋代地方官、私出版经典的实例。元初岳飞九世孙岳浚校刻出版《九经》，曾谓：“世所传《九经》，自监、蜀、京杭而下，有建阳余氏、兴国于氏二本，皆分句读，称为善本。廖氏又以余氏不免误舛，于氏未为的当，合诸本参订，为最精。版行之初，天下宝之。”[3]“廖群玉诸书……《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校，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萆钞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褫至以泥金为签”[4]。可见众本中，确有精善之本。此为出版群经之概况。至于单经，则学校、书院、私宅、坊肆所刻之多，更无法枚举。光宋人说经、解经之书，被四库馆臣看中而收入《四库全书》者，就有185种

【1】《宋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2】《宋史》卷六《真宗本纪一》。

【3】[元]岳浚：《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原题宋岳珂撰。

【4】[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贾廖刊书》条。

之多，至今尚有宋时正式出版者仍不下四五十种。朱熹合《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之作集注，刻印出版于福建漳州，《四书》之名始出。此后影响日深，地方官署、学校、书院争相刻印，成为一时风尚。至于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之书，宋时刻印出版之多，已无法统计。

## 二、宋代刻印出版的史部书

史书乃博闻强记、疏通知远之士之所为，“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1]。特别是其中的正史，乃因“正史体尊，义与经配”[2]，故为历代君臣所重视。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下杭州镂板。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三国志》、《晋书》校毕，付国子监镂板。乾兴元年（1022年）十一月，刘昭《注补后汉志》校定，镂板颁行。天圣四年（1026年）十二月，《南史》、《北史》、《隋书》校毕，雕造。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诏选官再校《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二年（1035年）九月，诏翰林学士张观刊定《前汉书》，付国子监镂板颁行。秘书丞余靖仍请刊正《前汉书》，因诏靖尽取秘阁古本对校，翌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至此，又改旧日模板，重新刻印出版上述五史。嘉祐六年（1061年），《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后周书》七史校毕，如法书写样，渐次封送杭州镂板。《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于嘉祐五年（1060年）准中书门下省札子，亦奉旨下杭州镂板。欧阳修死后，其《新五代史》遗稿进呈，亦付国子监刻印颁行。以上总计16史，均由北宋国子监出版，杭州刊行。南渡以后，国家艰难，史籍多为地方所刻，取板于监中，便是南宋国子监本。如大字本《史记》，乃为淮南路转运司所刻，《三国志》为衢州州学所刻，《新唐书》、《五代史》为湖州思溪王永从家

【1】《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史部总序》。

【2】《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正史类小序》。

开雕《思溪圆觉藏》所剩余板开雕，取入国子监，便成了监本。北宋原刊南北朝七史，曾颁于民间学官。靖康之变，中原板荡，几乎全失。时四川五十余州皆无兵燹，绍兴十四年（1144年）井宪孟为四川漕司，始檄诸州学宫，搜求当日所颁之本，因命眉山地区重新版行，七史复全。淳熙十三年（1186年），潼州转运司又刻印出版《三国志》。十五年（1188年），陆游主持刻印出版《南史》。施元之在衢州郡斋刻印出版《五代史》。嘉泰四年（1204年），秋浦郡斋刻印出版《晋书》。绍兴十二年（1142年），浙东转运司刻印出版《旧唐书》。三十年（1160年）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刻印出版《新唐书》。建溪三峰蔡梦弼家塾刻印出版《史记》二家注合刻本。建安黄善夫家塾刻印出版《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汉书》也出版了十八个版本。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乃司马光奉敕编撰的编年体史书。为写好此书，他曾借阅天章阁、龙图阁、三馆秘阁等书籍，另采杂史书籍332种，并得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协助，用19年的时间，积草稿盈两屋，最后始克完成，神宗御制序。书成进览之后，奉旨下杭州镂板，元祐七年（1092年）版行于世。至绍兴三年（1133年），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又委托绍兴府余姚县印造版行。此外又有蜀广都费氏进修堂、建康、建宁、鄂州鹄山书院等，也先后刻印出版过《资治通鉴》。表明正史及《资治通鉴》这类史书，是宋代社会出版的重点书。《通鉴》过长，通读不易，故有江贽、吕祖谦之节本问世，南宋坊间一刻再刻。特别是朱熹将《资治通鉴》约为《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之后，由于其笔削义例颇拟《春秋》，颇为世人所青睐，故有乾道八年（1172年）刻本，又有夔州本，又有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本，嘉定年间（1208—1224年）又有温陵本等相继行世。至袁枢将《通鉴》之文分类排纂，以一事为一篇，各详起讫，开创史书之纪事本末体，而名《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之后，淳熙二年（1175年）首先由严陵郡庠刻印出版。宋宝祐五年（1257年），赵与 在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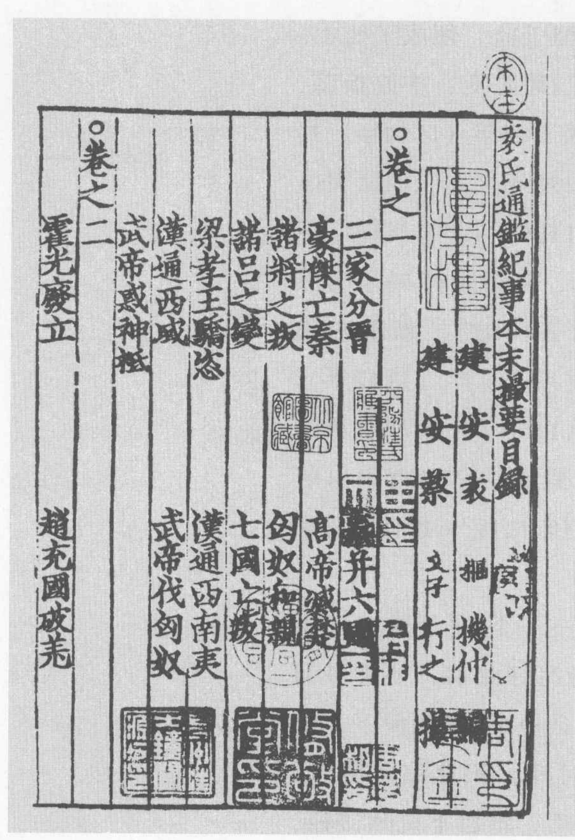

袁氏通鑑紀事本末撮要目錄
建安袁　樞　機仲　編
建安蔡　文子　行之　撮
○卷之一
三家分晉　秦并六國
豪傑亡秦　高帝滅楚
諸將之叛　匈奴和親
諸呂之變　七國之叛
梁孝王驕恣　漢通西南夷
漢通西域　武帝伐匈奴
武帝惑神怪
○卷之二
霍光廢立　趙充國破羌

图18
宋刻本《袁氏通鉴纪事本末撮要》

兴以严陵旧本《通鉴纪事本末》字小且讹，精加校雠，易为大字，出私钱再次刻印出版。目的是“非特便老眼，训子弟，庶与四方朋友共之”。建安蔡文子则再约《通鉴纪事本末》，而刻印出版《袁氏通鉴纪事本末撮要》行世（图18）。宋人私撰宋代史较多，如《东都事略》、《三朝北盟会编》、《隆平集》、《九朝编年备要》、《皇朝编年备要》、《皇朝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两朝编年》、《宋季三朝政要》、《四朝闻见录》等等，在宋代也都先后出版，有的还不只出版一次。他如诏令奏议、传记年谱、地理方志、金石、目录等史部之书，也层出不穷，陆续出版。

## 三、宋代刻印出版的子部书

### （一）宋代遍刻秦汉诸子

子书原只指先秦诸子之作品，后来专立为部，范围渐宽。《汉书·艺文志·诸子类序》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可见在古人眼里，诸子之说，乃《六经》之支裔，故历来为君臣所重视。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命杜镐等校《道德经》，六月毕。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校定《庄子》，并以《释文》三卷镂板。……祥符四年（1011年）三月，校《列子》，五年（1012年）四月上新印《列子》。十月校《孟子》，孙奭等言《孟子》有张镒、

丁公著二家撰录，今采众家之长，为《音义》二卷。七年（1014年）正月上新印《孟子》及《音义》"[1]。宋真宗为什么如此看重老、庄，盖因"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2]。《孟子》属儒家，更受重视，所以祥符七年由国子监刻印出版。与孟子性善论相反，荀卿则主张性恶论，强调后天教育，司马光要求将《荀子》及扬子《法言》一并出版，故在神宗熙宁、元丰中由国子监刻印出版了这二子。南宋淳熙八年，钱佃于江西漕台再次刻印出版《孟子》、《荀子》、《扬子》、《文中子》四书，其中《荀子》便以熙宁元丰监本为校本，得异同226条，视他本为善。今藏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同年，唐仲友在知台州任上，支公使库官钱，利用宁波能私雕东南会子楮币板的犯人蒋辉并王定等18人，为其开雕《荀子》、《扬子》和《文中子》等版片，其祖本也是熙宁元丰国子监本。唐本版片后收归杭州国子监，就成了南宋监本。闽刻《荀子》舛错较多，不足为重。其他如《颜子》、《曾子》，南宋国子监亦曾出版。贾谊《新书》有潭州州学本、建宁府陈八郎书铺本行世。刘向《新序》有北宋本、南宋本行世。《说苑》有淳熙本、镇江府学教授李士忱本行世。荀悦《申鉴》，尤袤于淳熙九年（1182年）出版于江西漕台。《孔子家语》北宋有汴京本、蜀大字本，南宋有监本、建康本行世。待朱熹之学盛行，《晦庵语录》则版行更广。兵、法、杂家之书，天文、类书、法令条格之书，也出版不少。

[1] [宋]王应麟：《玉海·景德校诸子》卷四十三。

[2]《汉书》卷三十《艺文志·道家类小序》。

（二）宋代重视科技图书出版

1. 天文算法图书的出版

宋代科技方面以天文算法、农医建筑较突出。天文学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终未摆脱迷信色彩，但它是与时俱进的门类，趋势是愈来愈科学。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三代上之制作，类非后世所及。惟天文算法则愈阐愈精。"[3] 宋代历法变换最频繁，反映出测算愈来愈精密。唐代有明算科，宋承唐制，"元丰七年，诏四选命官通算学者，许于吏部就试，其合格者，上等除

[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六《天文算法类小序》。

博士，中次为学谕。元祐元年初，议者谓‘本监虽准朝旨造算学，元未兴工，其试选学官亦未有应格。窃虑徒有烦费，乞罢修建。’崇宁三年，遂将元丰算学条制修成敕令。五年，罢算学，令附于国子监。十一月，从薛昂请，复置算学。大观三年，太常寺考究，以黄帝为先师，自常先、力牧至周王朴以上从祀，凡七十人。四年，以算学生併入太史局”[1]。表明算学书局的归属在宋代是有变化的。在《元丰官制格目》中，算学被列入国子、太学、武学、律学五学之一，崇宁三年（1104年）正规建造了算学书局，学生以210人为额，学习《九章》、《周髀义》及《算问》。而早在元丰七年（1084年），就有秘书省校书郎叶祖治及赵彦若等六人校定《九章算经》、《周髀算经》、《五经算法》、《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五曹算经》、《缉古算经》、《夏侯阳算经》、《算术拾遗》等算学十书，并经神宗批准，由秘书省刻印出版，史称秘书省本，或称元丰京监本。括苍鲍澣之知汀州，于嘉定六年(1213年）又重行刻印出版这十种书，今藏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者，即嘉定汀州本之遗存。明代大算学家程大位曾说算书：“元丰、绍兴、淳熙以来刊刻者多，且以见闻者著之。”又说：“嘉定、咸淳、德祐等年又刊各书。”[2]可知宋代正式出版的算书，比任何一朝都多。宋代秦九韶（约1202—1261）字道古，宋普州安岳人。幼随父宦，得读太史藏书，并从隐者受数学。因而精于律算、天文、营造之学，创立天元法，于“大衍求一术”和“正负开方术”皆有深入研究，著有《数学九章》，可以说是代数的发明者。而钱塘杨辉字谦光，则“以廉饬己，以儒饰吏，吐胸中之灵机，续前贤之奥旨”，可以说是三角法的发明者。这两项发明都比欧洲人要早。《数学九章》与《杨辉算法》宋时均已正式出版，清时尚有传本。

天文方面的名著如《景祐乾象新书》、王安礼的《灵台秘苑》、苏颂的《新仪象法要》，于观象、浑仪、浑象、水运仪象台都有新的设计和提高。有总图，有分图，凡63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机械图纸。苏颂设计的擒纵器，相当于今天钟表的卡子，因

【1】《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四》。

【2】[明]程大位:《算法统宗》卷十七。

此其水运仪象台的设计创造，可以说是欧洲天文钟的祖先。故其《新仪象法要》早于乾道八年（1172年）便由吴兴施元之刻印出版于衢州。天圣九年（1031年）燕肃发明莲花漏，用来计时。绍兴末年，四明郡守韩仲通又制成莲花漏。这种刻漏之书明州均有出版。关于潮汐的专书，如北宋燕肃有《海潮图论》，钱塘知县张君房有《潮说》，杭州予以刻印出版。

2. 农桑、建筑、冶炼、兵书的出版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最有价值的农书，涉及农艺、园艺、蔬菜、果木、畜牧、农产品加工诸方面，是南北朝以前农学的最高成果。天禧二年（1018年）政府已经出版颁行。同年还摹印出版了《四时纂要》。天圣中（1023—1032年）由崇文院再次校刻出版《齐民要术》，且非朝廷要人尚不可得。南宋绍兴中亦有刻本流行。宋人陈旉自撰《农书》三卷，内容涉及农事、养牛及种桑、养蚕，由真州知州洪兴祖首刻出版，高邮军知军汪纲再次版行。秦观《蚕书》于嘉定三年（1210年）由汪纲首刻于高邮郡斋，七年（1214年）再刻于真州郡斋。天台陈景沂撰《全芳备祖》前集二十七卷后集三十一卷，为明、清《群芳谱》、《广群芳谱》之蓝本。前集谈花，后集论果、卉、草、木、农桑、蔬、药，闽建麻沙书坊予以刻印出版，日本有此刻之残本。吴仁傑《离骚草木疏》四卷，虽为释《离骚》而作，但亦涉及草木的诠释，庆元六年（1200年）由罗田县庠刻印出版，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宋代园艺发达，蔡襄的《荔枝谱》、韩彦直的《橘录》、陈思的《海棠谱》、范成大的《梅谱》、赵时庚的《金漳兰谱》、史铸的《百菊集谱》，还有洛阳牡丹、扬州芍药等大量专著版行于世。和尚赞宁的《笋谱》、陈仁玉的《菌谱》、傅肱的《蟹谱》、高似孙的《蟹略》等食品方面的专著，也不断版行于世。我国饮茶历史悠久，唐代陆羽已有《茶经》之作，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至宋代，茶叶不但是贡品，而且是出口商品。宋徽宗有《圣宋茶录》、蔡襄有《茶录》、黄儒有《品茶要录》、熊蕃有《宣和北苑贡茶录》，皆论闽建茶叶的采造焙制之法，闽中皆曾出版。

宋朱翼中撰《酒经》三卷，已详叙作曲配方及酿白羊酒、地黄酒、菊花酒、酴醾酒、葡萄酒之法，此书当时也已版印流传。宋王灼的《糖霜谱》，不但叙述了唐代造糖的缘起，于甘蔗种植、造糖之器、结霜之法，也有详细的论述，是世界上造蔗糖的专著，宋时也已刻印出版。

建筑技术之书，宋代出现了喻皓的《木经》及崇宁二年（1103年）颁印全国的《营造法式》。《营造法式》始编于宋神宗熙宁时，后由郑州管城（今河南新郑）县人李诫重修，成《营造法式》三十四卷《目录看详》二卷，分为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图样五大部分，可以说是集古建筑之大成，是世界建筑史宝库中的巨大财富。李诫以博学多艺、精书画，得徽宗奖誉，官至匠作监，完成此书，遂于徽宗崇宁二年由内府刻印颁行。

宋代有胆水浸铁成铜之法，北宋哲宗绍圣初江西布衣张甲撰成《浸铜要略》一卷版行。这是冶炼方面的进步，是合金方面的一大提高。与泉司所撰《冶金录》一卷，同为冶铜铸钱方面之作。

北宋仁宗康定（1040—1041年）中，朝廷恐群帅昧古今之学，遂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凡五年而成《武经总要》四十卷，仁宗为之序。虽大部分内容古已有之，但其所记录的用焰硝、硫黄、木炭及松脂、沥青、蜡、药等三个火药的配方，及用人工磁化法制作的指南鱼，则均具科学价值。所以《武经总要》的编撰与出版，非但在军事上，在军事科学上也极具水平。

3. 医药、方剂之书的出版

医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至宋代则继续发展。首先是对先秦古医书进行整理并予以正式出版。北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命晁宗慤、王举正校定《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难经》二卷、《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五年（1027年）四月命国子监摹印颁行。“嘉祐二年（1057年）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以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并为校正。后又命孙奇、高保衡、孙兆同校正。每一书毕，即奏

上，亿等皆为之序，下国子监板行。并补注《本草》、修《图经》、《千金翼方》、《金匮要略》、《伤寒论》，悉从摹印。天下皆知学古方书"[1]。《本草》之名，始见《汉书·平帝纪》和《楼谟传》，旧只一卷，药365种。陶隐居增《名医别录》，亦365种，加注释为七卷。唐显庆中又增加140种，广为二十卷，谓之《唐本草》。五代蜀孟昶又尝增益。宋开宝中又增133种。嘉祐中掌禹锡、林亿等重加校正，更为补注，以朱墨书为之别，凡新药1 812种。唐慎微又有所增益而成《大观本草》，亦名《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刻印出版。医官王继先奉诏撰定《绍兴校定本草》二十二卷，二十九年（1159年）上之，刻板于修内司。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诏医官使尚药奉御王怀隐等撰集《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太宗御制序文。淳化三年(992年）书成，随后板行。徽宗政和（1111—1118年）中，敕撰《圣济总录》二百卷，被誉为"医经之会要，学者之指南，生民之司命"[2]。又有《太平惠民和济局方》，初创于北宋，重修、三修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又以《监本药方》之名刻印颁行诸路。尚药奉御太医令孙用和撰《孙氏传家秘宝方》三卷。其子孙兆为殿中丞，与其父皆以医名世，神宗熙宁、元丰间无出其右者，故这三卷《秘宝方》久为人望。元丰八年(1085年）吕惠卿帅并州，从河东漕孙兆之弟孙宰手中得此书，序而刻之。他如沈括的《灵苑方》二十卷、《苏沈良方》十卷、文彦博的《药准》一卷、王衮的《博济方》等也先后出版行世。知平江府的李朝正有《备急总效方》四十卷，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精刻行世。洪遵《洪氏集验方》，乾道六年(1170年）出版于姑孰。淳熙七年（1180年）江西漕司刻《陆氏续集验方》。五年（1178年）当途刻《徐氏家传方》。足见宋代出版医方不遗余力。陈直的《奉亲养老书》、初虞世的《养生必用书》、《尊生要诀》等养生书也先后行世。宋太医局已分九科，学生三百人，其中以大方脉人最多，达120人；次风科80人；其他各科一二十人不等。陈自明有《妇人大全良方》，旧有宋本。长乐朱端章以所藏诸家产科经验方编成八卷头的《卫生家宝产科

【1】［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外台秘要方提要》。

【2】［金］焦养直：《圣济总录序》，张秀民《中国印刷史》，1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备要》，淳熙十一年（1184年）自刻于南康郡斋，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建康刻有《钱氏小儿方》、《张氏小儿方》、《小儿宝生方》、《小儿疮疹论方》。而《小儿卫生总微方论》，自初生以至于成童，一一详备，嘉定间有太医局刻本行世。知潭州刘昉所撰《幼幼新书》四十卷《拾遗方》一卷，刊刻未毕而卒，由徐琫趣成之。

针灸是我国独创的医疗技术，宋仁宗以针砭之术传法不同，俞穴有差，或害人命，遂命医官王惟一考明堂气穴经络之会，铸铜人式二件，天圣五年（1027年）下诏一置医官院，一置相国寺。以为医学学生和医者实习之用，对针灸技术发展起过很好的推动作用。王惟一更纂集旧闻，订正讹谬，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天圣五年亦命摹印颁行，七年又颁赐诸州。王执中又有《针灸资生经》七卷《目录》二卷，嘉定十三年（1220年）由徐正卿刻印出版。绍定四年（1231年）赵纶又行重刊。

宋建宁建阳人宋慈（1186—1249）字惠父，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年）进士。初为信丰县主簿，曾参与镇压民变及汀州兵变。历任广东、江西、湖南提刑，多有能政。先后参与魏了翁、陈韦华幕府，颇多建树。理宗淳祐八年（1248年）为广东经略安抚使，知广州，卒于任上。由于多年提点刑狱，有实践经验，又总结前代法医成果，编成《洗冤集录》五卷，淳祐七年（1247年）奉旨摹印颁行。这是世界上最早最有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早于西方350多年。19世纪被译成七八种外文，流传世界。不难看出，宋代科技，特别是医学，是相当发达的，处在当时环宇领先的地位。

## 四、宋代刻印出版的集部书

### （一）宋代刻印出版的别集

集者，有别集，有总集；体者，有诗、赋、歌、词、曲、文；品评者，有诗品、文评。“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1]。表明我国有

【1】《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别集类小序》。

个人别集当始自东汉。然汉魏六朝，时代久远，有文集传世者屈指可数，充其量不过三十四五家。唐人文集三百余家。总计唐五代以前，有别集不过400家，两宋时几乎都曾刻印出版。宋人自著诗词文集，约有1 500种，绝大多数当时已正式版行。迄今，宋以前之文集而尚有宋版可考者，大约260余家。下面只能举例性地加以简要介绍。

汉魏六朝时代的别集，现知宋代广德军刻印出版过扬雄的《二十四箴》；天圣元年（1023年）刻印出版过蔡邕的《蔡中郎集》；元丰五年（1082年）万玉堂刻印出版过曹植的《曹子建集》，嘉定六年（1213年）又重行出版过此集；庆元六年（1200年）徐民瞻在华亭县学刻印出版过晋陆士衡、陆士龙的《二俊文集》，其中《陆士龙文集》十卷迄今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宣和四年（1122年）王仲良在信阳刻印出版过大字本《陶渊明集》，曾集于绍熙三年（1192年）在南康郡斋又刻印此集；南宋还刻印出版过带有吴仁杰编撰年谱的《陶靖节先生集》十卷，残存一至四卷，亦庋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淳祐元年（1241年）汤汉刻印出版自注《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补注》一卷，今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鲍照集》十卷，有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传世，表明宋时正式出版过，徐乾学传是楼曾有收藏；《谢宣城诗集》五卷，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楼炤在宣州郡斋刻印出版，今有影宋抄本传世；淳熙八年（1181年）尤袤在池阳郡斋刻印出版过梁萧统的《昭明太子集》五卷；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刻印出版过梁江淹的《江文通集》十卷。此为宋时出版汉魏六朝文集的概况。

前边说过了，唐五代别集300余家，宋时几乎都曾刻印出版。宋人喜韩、柳文，故两者板刻最多，韩集竟多至28个版本。廖莹中世彩堂所刻韩、柳集最为精绝。而在众多宋刻唐人文集中，规模大而又较有系统的出版，要算是蜀刻和临安陈宅书籍铺刻。蜀中刻过多少单行唐人文集，现已无法详考，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之《王右丞集》“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

【1】[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王右丞集提要》。

蜀刻《唐六十家集》多异于他处本"[1]的表述看，绝不少于60家。陈起、陈思以开书籍铺为业，所刻唐人文集可考知者也有32家，实际绝不止此数。他如元祐中曲江刻印出版的张九龄《曲江集》，乾道六年（1170年）吉州刻印出版的《杜审言诗集》，南宋高宗时建昌刻印出版的《王右丞文集》，元丰三年（1080年）晏知止在苏州刻印出版的《李翰林集》，南宋初年四川眉山刻本《李太白文集》，嘉祐四年（1059年）王琪姑孰郡斋、治平中太守裴集建康府、淳熙八年（1181年）成都、宝庆元年（1225年）广东漕司等刻印出版的杜工部集子，绍兴以后留元刚在永嘉刻印出版的《颜鲁公文集》，乾道九年（1173年）陆游摄犍为刻印出版的《岑嘉州诗》，乾道七年（1171年）平江府学刻印出版的《韦苏州集》，元祐八年（1093年）内府刻印出版的《陆宣公文集》，淳熙十五年（1188年）陆游在严州刻印出版的《刘宾客集》、《皇甫持正文集》、《刘梦得文集》，宣和六年（1124年）建安刘麟、乾道四年（1168年）洪适刻印出版的《元氏长庆集》，景祐四年（1037年）杭州刻印出版的《白氏文集》等等，不胜枚举。反映出两宋公私几乎将唐人文集全都出版，有的出版还不只一次两次，而是多次。雕板印书，唐人尚未盛为之。300多家唐人文集在两宋先后刻印出版，使每个人的文集化身千百，广泛传播，并大量流传后世，这是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后为出版事业作出的一大贡献，也是中国出版史上宋人继往开来的突出表现。

前边说过了，两宋320年所产生的自著诗文集大约1 500种，恐怕还不包括宋代皇帝的御制文集，差不多平均每年都有5部文集问世，远非唐时所能比。光《四库全书》著录宋人文集就有395种。而至今仍有739人的诗词文集存世。可考知的宋刻宋人诗文集大约有155种，单刻词集也有10余家。其中像苏东坡的《文集》也梓行过20多次，可与唐代《韩愈文集》的出版相媲美。至于宋代在何时何地由何人刻印出版过哪个人的文集，有很多目录可以参考，此不详述。

(二) 宋代刻印出版的总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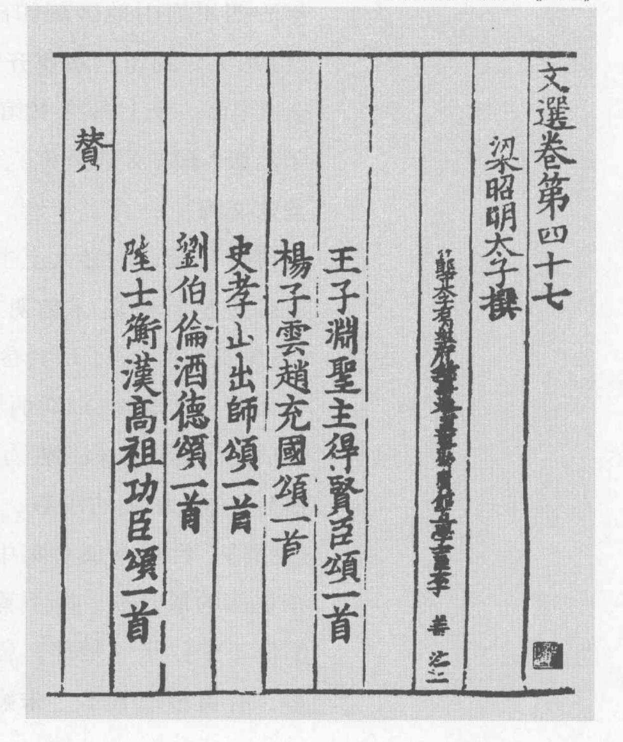
总集者，乃“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其产生乃因“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盖分体编录者也。《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1]。然挚虞之《文章流别》久佚，现存总集之最早者，属梁昭明太子萧统所辑之《文选》。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总集类小序》。

《文选》早在五代时就已刻印出版。后蜀宰相“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2]。进入宋代，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谚，可见《文选》对文人雅士的深远影响。什么书一有广泛的社会需求，便有了出版发行的诱力。《文选》有唐李善注本，又有唐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臣注本，又有合李善注文为六臣注本三个系统。李善注《文选》，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就有国子监刻本行世。又有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刻本。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残存二十一卷的北宋刻李善注《文选》，盖即所谓的天圣明道本（图19）。淳熙八年（1181年）尤袤于池阳郡斋再次刻印出版李善注《文选》六十卷《李善与五臣同异》一卷，并谓“俸馀锓李善注本，袁说友助其费，无四明、赣上裁节语句之病”。尤氏池阳本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部完帙，两部残帙。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影宋刻李善注《文选》，其底本即据此本。五臣注《文选》早在天圣四年（1026年）以前，两川、两浙就有印本

【2】[清]吴任臣：《十国春秋·毋昭裔传》注引《五代史补》。

图19
北宋刻本李善注《文选》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行世。后因其“模字大而部帙重，校本粗而舛脱夥”，故于天圣四年由四川书肆平昌孟氏又出版了“小字楷书，深镂浓印，帙轻可以致远，字明可以经久”的版本。绍兴八年（1138年）明州（今宁波）又刻印出版。另外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牋纸马铺钟家也刻印出版了五臣注《文选》三十卷，今存一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六臣注《文选》有元祐九年（1094年）秀州州学刻本行世，改错最多。崇宁、政和间又有四川广都裴宅刻本。还有咸淳十年（1274年）本、江南西路本、赣州本、建宁本及南宋监本。太宗命李昉等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编辑的《文苑英华》，直到南宋嘉泰元年至四年（1201—1204年）才由周必大刻印出版于庐陵。赵孟奎的《分门纂类唐歌诗》，收1 300余家4万余首诗，南宋咸淳间（1265—1274年）也刻印出版。《古文苑》九卷本，南宋孝宗淳熙间即已正式出版。后又经宋章樵重编，扩为二十一卷，端平三年（1236年）由常州军刻印出版，淳祐六年（1246年）盛如杞又修补重印，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庆元三年（1197年）四川眉山地区刻印出版《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绍熙改元（1190年）刻印出版魏齐贤、叶芬编辑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今上海图书馆仅存一册。乾道间（1165—1173年）刻印出版《圣宋文选全集》。临安书坊曾刻印出版江佃所编的《新雕圣宋文海》一百二十卷。淳熙四年（1177年）孝宗曾命本府校正后再行刊板，周必大上书言此书编次无伦，于是孝宗又命吕祖谦重编进呈，赐名《皇朝文鉴》，颁赐绢银，由此《文海》遂晦。《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有建宁书坊本，有新安郡斋本，有端平元年（1234年）刘炳序刊本。另外陈起编刻过《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陈思编刻过《南宋六十家名贤小集》。这些总集的出版，大大繁荣了整个宋代的出版事业。还有《楚辞》，性质本属总集中的地方总集类，但历来都把《楚辞》放在集部的最开端，既不算别集，也不算总集，这是目录学史上的旧例。宋代于《楚辞》曾有姚廷辉刊本，有武林刊本，有吴郡刊本，有黄伯思刊本。朱熹的《楚辞集注》，则有嘉定间同安郡斋、

章贡郡斋刊本，有端平间朱鉴刊本，有咸淳三年（1267年）刊本，还有建康府《重编楚辞》刊本。宋人爱作诗，也爱评诗，故诗话至宋而极盛。自欧阳修作《六一诗话》，此后评家无虑百数。阮阅、叶梦得、葛立方、计有功、胡仔、周必大、魏庆元、刘克庄等40余家，都有诗话的出版品留存。其中以严羽的《沧浪诗话》影响更大。

（三）宋代刻印出版的词集

词人词作，是宋代文学的主流特色。宋代词人百余家，晏殊、晏几道、柳永、欧阳修、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吴文英、周密等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宋代长沙书坊就刻印出版过《百家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著录词集凡128家。首为《花间集》十卷，收录自温飞卿以下十八人词五百首，并谓："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1] 可见词之产生和发展，乃是律诗走入绝境的"柳暗花明"，故宋时词人辈出，文学复盛。宋时的出版及时反映了这种文学的繁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更表达了这种盛况。《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到第92家临江郭应祥《笑笑词》时则谓："自南唐二主词而下，皆长沙书坊所刻，号《百家词》。其前数十家皆名公之作，其末亦多有滥吹者。市人射利，欲富其部帙，不暇择也。"可证这个长沙书坊本《百家词》在词人遴选和词作甄录上鱼目混珠，有射利之嫌。至于宋时出版的词别集也不少，如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刻印出版的苏轼《东坡乐府》、乾道间（1165—1173年）刻印出版之秦观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张孝祥《于湖先生长短句》、淳熙七年（1180年）强焕溧水县斋刻印出版的周邦彦《清真词》、严州刻本名《清真诗馀》、嘉定四年（1211年）刊本名《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淳熙十四年（1187年）宣城刻印出版的曹冠《燕喜词》、嘉泰二年（1202年）钱希武于云间刻印出版的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别集》、绍定元年（1228年）严州郡斋刻印出版的潘阆《逍遥词》等，都是宋人个人的词别集。

[1]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花间集提要》。

此外宋代于类书、丛书也很注意出版。唐代传下的几种类书，宋代都有出版，宋人自编的类书，刻印出版就更加及时。宋左圭编刻的《百川学海》，收书就有100种179卷，是跨部类跨学科地收书，是确切概念的丛书。总之从上述所举诸例，不难看出宋代出版书籍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是门类齐全，而官刻突出经、史，私刻则偏重子、集，偏重实用。两者互动，则是全面发展，重点突出，公私互补，出版繁荣。

## 第二节 宋代的出版思想

### 一、出版为推行教化

宋人刻书，归纳起来，反映在出版思想上，大概在行教化、存史鉴、精雠校、广流传、共享用、敢创新、便披阅等几个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

“行教化”。刻书出版为了推行教化，是封建社会出版业的主流思想，也是封建社会出版业的共同特点。西汉董仲舒曾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並出，刑罚不能胜者，其隄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1] 朱元璋也曾说过：“政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2] 而“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搢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3] 封建社会这种重教化的思想反映在出版图籍上，便是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校刻出版。宋代自太宗时便已命在太祖时九经及第的孔维与学官校定《五经疏义》，刻印出版。淳化五年（994年），兼判国子监李至又上言：“《五经》书疏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备，岂副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

【1】《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2】[明]黄佐：《南雍志》卷一。

【3】《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序》。

正、孙奭、崔偓佺皆励精强学，博通经义，望令重加雠校，以备刊刻。从之。”[1] 至真宗时，宋代立国已40余年，对儒术更加推崇。宋真宗自撰《文宣王赞》，歌颂孔子是“人伦之表”，孔学是“帝道之纲”。并撰《崇儒术论》，刻石立于国子监，谓“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一下子把儒学抬到了宋王朝统治的指导思想地位。故到景德二年（1005年）夏，真宗亲幸国子监视察书库时，问及当时的国子监祭酒邢昺雕印出版的经书情况时，邢昺不无骄傲地回答：“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并说：“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2] 40年的时间里，印书版片翻了25倍，可见当时国子监出版之盛。“先是，印书所裁余纸，鬻以供监中杂用，昺请归之三司，以裨国用。自是监学公费不给，讲官亦厌其寥落”[3]。此是景德二年真宗视察国子监时，邢昺为表示自己忠心报国而主动提出来的，结果闹得监学公费不敷用，教师队伍不稳。从这个侧面也能想象当时国子监印书数量之大，光印书装订所裁余纸卖出去就能补贴公费之不足，可想当时国子监的出版当是何等规模！难怪邢昺敢说“经、传、正义皆具”，“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士庶之家都有了，“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4]，但亦“彬彬乎进于周之文”了。

[1]《宋史》卷二六六《李至传》。

[2]《宋史》卷四三一《邢昺传》。

[3]《宋史》卷四三一《邢昺传》。

[4]《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序》。

## 二、出版为鉴古知今

“存史鉴”。存史以借鉴是一切史书编纂与出版行世的宗旨。正如司马光花19年之精力，弄得自己“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5] 而写成《资治通鉴》时所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6] “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7]。故历代人主亦特别重视史籍，以观其中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

[5]《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资治通鉴〉进书表》。

[6]《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资治通鉴〉进书表》。

[7]《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谢赐〈资治通鉴序〉表》。

[1] [宋]英宗御制:《资治通鉴序》。

之义”[1]。故宋代自太宗淳化五年(994年)七月起，便下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咸平三年（1000年）校《三国志》、《晋书》、《唐书》，乾兴元年（1021年）校定《后汉志》，天圣二年（1024年）校《南史》、《北史》、《隋书》，嘉祐六年（1061年）诏三馆、秘阁校理宋、齐、梁、陈、后魏、北周、北齐七史，前后迭经68年，中间反复雠校，多次出版，十七史基本出全。至于《资治通鉴》，则自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下杭州镂板之后，官私出版赓续不绝。南宋则有监本、余姚官本及私宅、坊肆刻本20余种。元朝则有兴文署、平阳晦明轩等刻本10种。明代刻本10余种。清代刻本大约有9种。一部史书有如此众多的版本，表明历代明君良臣，乃至史家士子都需要它。原因就是它与其他正史一样，都能存史鉴，法后王。

## 三、出版重视质量

“精雠校”。一书出版之前，精加校雠使之没有或少有讹文脱字，乃是封建社会官私出版者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至今仍是出版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北宋“端拱元年三月，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百八十卷，诏国子监镂板行之。《易》则维等四人校勘，李说等六人详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献。《书》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献。《春秋》则维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详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诗》则李觉等五人再校，毕道昇等五人详勘，孔维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献。《礼记》则胡迪等五人校勘，纪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详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献。是年，判监李至言：‘《义疏》、《释文》尚有讹舛，宜更加刊定。杜镐、孙奭、崔颐正苦学强记，请命之复校。’至道二年，至请命礼部侍郎李沆，校理杜镐、吴淑，直讲崔偓佺、孙奭、崔颐正校定。咸平元年正月丁丑，刘可名上言诸经板本多误，上令颐正详校。可名奏《诗》、《书》正义差误事，二月庚戌，奭等改正九十四字。沆预政二年，命祭酒邢昺代领其事，舒雅、李维、李慕清、王涣、刘士元预焉，《五

经正义》始毕”[1]。从太宗端拱元年（988年）至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十阅寒暑，反复校勘，最后才由国子监正式刻印出版，足见其对校雠的重视。经书如此，正史亦然。“淳化五年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杜镐、舒雅、吴淑、潘谨修校《史记》，朱昂再校。陈充、阮思道、尹少连、赵况、赵安仁、孙何校前后《汉书》。咸平中以校勘未精，命陈尧佐等复校《史记》。景德元年正月丙午，任随等上《复校史记勘误文字》五卷，赐帛。丁未，命刁衎、晁迥、丁逊复校前后《汉书》。二年七月壬戌，衎等上复校《前汉书》，板本刊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上之，赐器帛……。”[2] 所有这些，都能反映出宋代中央官署严谨的出版作风。

【1】[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三《端拱校五经正义》。

【2】[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三《端拱校五经正义》。

官署如此，带动私宅、坊肆至少在表面上也得仿效。如乾道七年（1171年）蔡梦弼所刻《史记》的《三皇本纪》后镌印木记两行：“建谿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时岁乾道七年春王正上日书。”而在《补史记序》、《六国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乐书》、《历书》后亦镌印木记两行：“建安蔡梦弼傅卿谨案京蜀诸本校理置梓于东塾。”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荣六郎书籍铺出版之《抱朴子内篇》卷第二十后镌有牌记：“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敢说“的无一字差讹”，虽有广告推销性质，但主要还是其校勘精审，敢夸海口。隆兴间（1163—1164年）王叔边所刻《后汉书》目录后镌有牌记五行，谓：“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证，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咨。”也说是“精加校证”，“的无差错”。绍熙二年（1191年）余仁仲万卷堂所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何休序后镌有识语六行，谓：“《公羊》、《穀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江浙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

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对于校勘中的文字异同，“不敢以臆见更动”，而是两存之，“以俟知者”，显得十分谨慎。这种例子在宋代出版的书籍中举不胜举，反映出宋时出版者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精雠校”。

四、出版为传播学问

“广流传”。书籍出版，目的就是要使其传播久远，使更多人能够得以披阅，舍此便可以藏之宛委，弃之西山了。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饶州董应梦集古堂刻印出版的《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卷二十八后镌有刻书题记：“饶州德兴县庄谿书痴子董应梦重行校证，写作大字，命工刊板，衠用皮纸印造，务在流通，使收书英俊得兹本板，端不负于收书矣。绍兴庚辰除日因笔以记志岁月云。”明确说是“命工刊板”，“务在流通”。“广流传”之意溢于言表。建阳龙山书院刻印出版的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总目后镌有牌记五行：“此书浙间所刊止《前录》四卷，学士大夫恨不得见全书。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帙四录，条章无遗，诚冠世之异书也。敬三复校正，锓木以衍其传，览者幸鉴。龙山书堂谨咨。”也声明“锓木”是为“衍其传”。可见此为宋时图籍出版的又一指导思想。

五、出版为资源共享

“共享用”。用当今时髦的话说，就是文献信息资源共享，这是指收藏单位之间都应将自己的藏品提供给读者享用。古时藏书家偶得珍本，常常秘不示人，这与出版家就很不相同。出版家偶得善本，则不欲私藏，而是将其刻印出版，以与天下人共享用。这里边虽蕴含着盈利目的，但正当盈利也可以拉动出版繁荣。宋乾道间（1165—1173年）麻沙镇刘仲吉宅刻印出版的《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就反映了这种“共享用”的思想理念。此书目录后镌有长方牌记，牌记谓：“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近求到《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计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

一。不欲私藏，庸镵木以广其传，幸学士详鉴焉。乾道端午识。”表明了“不欲私藏”，愿“广其传”，以与天下共享用。宋刻《东莱先生诗武库》目录前亦镌有长方牌记，云“今得吕氏家塾手抄《武库》一帙，用是为诗战之具，固可以扫千军而降勍敌。不欲秘藏，刻梓以淑诸天下，收书君子伏幸详鉴。谨咨。”也声明“不欲秘藏”，故出版“以淑天下”。当然，书铺子也常常说假话，明明是自编之书，硬说成是从哪儿得来的善本，以获取广告效应，推销出版品，从中牟利。但不管怎么说，其刻印出版图书是为了广流传，共享用，则无庸置疑。尤其是乾道六年（1170年）洪氏刻印出版的《洪氏集验方》，则完全反映了这种“共享用”的出版思想。该书卷末镌有洪氏刻书识语，谓：“右《集验方》五卷，皆予平生用之有著验，或虽未及用而传闻之审者。刻之姑孰，与众共之。乾道庚寅十二月十日番阳洪遵书。”此处之“刻之姑孰，与众共之”，乃是出版为了“共享用”思想的鲜明写照。

## 六、编刻出版方式敢创新

“敢创新，便披阅”，也是宋代出版的重要思想。“创新”几乎成了宋代出版的一大特色，它不仅表现在版式上，例如边栏、界行、象鼻、鱼尾、卷端上下题、版心标识、书耳题记等，都是宋代出版家创出来的，且多为后世所继承。还表现在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努力使自家的出版品更便于披阅上。众所周知，古人于经书、史书，乃至于子书、文集，常有注疏、考异、评论甚至纠谬。这些加工之作通常并不与原书原文相连，而是各自单行。读者想读某经某史，只好将经、史原书和各家注、解都找来，然后对照着读，麻烦之极。为解决这种不便披览的传统出版的固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司首先大胆创新，从经、注、单疏开始，一改以往各自单行的出版形式，而将经、注、疏合刻在一起，使注文、疏文分散在各自相关的经句之下，读者披览一目了然，免却长期以来读经左顾右盼、东寻西找之苦。今所存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出版之《礼记正义》卷末镌有当时提举黄唐的跋文，完全表达

了这种“敢创新，便披阅”的出版思想。这篇跋文写于绍熙三年（1192年）八月，当在《礼记正义》刻完付印之前。两浙东路茶盐司在南宋初期已将《易》、《书》、《周礼》三经的正经、注、疏合刻在一起，开创了新的出版形式，便于披绎。绍熙二年（1191年）冬天，三山（福州）黄唐来任提举，则继续本司前三经的出版模式，又合刻出版了《毛诗正义》和《礼记正义》。至于《春秋》一经则未来得及操作，只好寄希望于后来的同志。果然，这个后来同志不久就等来了，这就是绍兴府知府沈作宾。沈氏于庆元间（1195—1200年）继承黄唐的未竟之功，照他的出版方式，刊行了《春秋左氏传正义》，从而合五为六，完成了《六经》疏义的合刻出版任务。两浙东路茶盐司官署与绍兴府官署，都在绍兴。绍兴古称越州，故史称“越州本六经”。今存五经，均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经书开了此例，史书也紧跟其后。首先是乾道七年（1171年）蔡梦弼东塾刻印出版的《史记》，便是正文与《史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的合刻本。此盖为《史记》二家注合刻的滥觞。其后不久，建安黄善夫便刻印出版了《史记》三家注合刻本。这种在正经正史编次出版形式方面的创新，由于符合读者意愿和需求，很快便在子书、文集中也实行开来。可见思想只要符合实际，很快便会形成行动的指南而推动事业前进。

纵观宋代这种行教化、存史鉴、精校雠、广流传、共享用、敢创新、便披阅的出版思想，可以说大至政治安危、国家兴替，小至精校正、便披览，嘉惠读者学林，形成了全方位的出版理念。这种理念，不仅符合当时的朝野需求，也表现为理念先进，放之四海，所以影响其后历代封建王朝。其实就是拿到今天，也不失当代出版准则，也仍有借鉴价值。这是宋代官、私出版为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 第六章　宋代出版图籍的装帧艺术

刻书出版，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其出版品的风格面貌，反映着彼时彼地的政治倾向、经济状况、文化风尚。书籍校勘的精粗、开本的大小、版式的规制、印纸的优劣、墨色的好坏、字体的风格、刀法的精疏、装帧的特点等等，也都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风格特征。书籍的装帧艺术包括版式设计、插图形式和装帧形制三方面内容。这三方面各又涉及许多内容，不可能样样都谈，只能就如下几方面加以阐释，以期勾勒出两宋出版图籍在装帧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第一节　宋代出版图籍的版式行格

根据我们所见到的，五代刻书的版面文字四周已镌印墨色单线边栏，但镌印粗糙，美与用结合的水平还不高。至宋代，刻书出版进入了黄金时代，版面设计与镌雕工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纵观两宋的版印图籍，前期多四周单边，后期多左右双边，少数亦有四周双边者。所谓四周单边，指的是在版面上沿文字四周镌刻一道粗黑栏线，形式上与五代版印图籍边栏没有什么区别。但在镌刻刀法、栏线匀直、四角转接、粗细程度等方面，都已超过了前代，有了严整而不呆滞的美感。所谓左右双边，指的

是在左右粗黑竖直栏线的内侧再镌刻一道较细的墨线，形成一粗一细两道竖直边线，所以称为左右双边，也称为文武边。所谓四周双边，指的是沿着四周粗黑栏线的内侧，再镌刻一道细墨线，使四周都形成一粗一细的双栏线，所以称为四周双边。左右双边也好，四周双边也好，都要比四周单边镌刻费事，但显得精细。如婺州市门巷唐宅版印的《周礼》、寇宅版印寇宗奭的《本草衍义》、廖莹中世彩堂版印的韩、柳集等，都是四周双边。其中廖刻韩、柳集，其字体之隽秀，刀法之剔透，边栏之匀直，行格之适度，加上历代递藏钤盖印鉴之琳琅，真可谓展卷赏心悦目，所以历来被誉为“无上神品”。

宋代刻书每版版面当中还出现了书口，这是所见五代版印图籍所没有的。所谓书口，也称为版口，也称为版心。书口是指一版中间分离上下两版的隔行，目的是为折叶时取作标准的中缝线。如果简单处理，刻上一道细线完全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但宋人没有采取简单从事的办法，而是将用与美巧妙地结合起来，精心设计版口形象。两宋刻书几乎都是白口，少数是细黑口，个别是粗黑口（也称为大黑口）。所谓白口，是指版心除了镌刊本版大小字数、简化了的书名、卷第、叶码、刊工姓名等文字外，其余版心多余的板木都要铲去，这样刷印出来的印张书口才不粘墨，呈空白纸色，所以才称为白口。所谓细黑口，也称为线黑口，是指版口上鱼尾的上方至上边栏这一段，居中再镌刻一道细线，目的仍是为折叶时取作中缝标准。这样印出的印张折叶后书口上端就出现一道细墨线，所以称为细黑口或线黑口。装订成册之后，看去墨色就更明显。所谓粗黑口或大黑口，是指版口上鱼尾上方至上边栏一段、下鱼尾下方至下边栏一段的板木根本不予剜刻，故印出来的纸张版口呈粗黑条块，折叶装订成册后，书口粗黑，故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两宋版印图籍，白口者多，细黑口者少，粗黑口几无，这是镌雕精细、版面讲究的表现。

版口宽窄本如行字之宽窄，真可谓方寸之地，两宋刻书在这块方寸之地却倾注匠心，除了前边所说的书口形式之外，值得一

提的还有鱼尾。所谓鱼尾，指的是版心骑中缝线所镌刻的鱼尾形的饰物。清朝赵慎畛在《榆巢杂识》中说：“书中间缝每画◤◥，名鱼尾，象形也，始于唐太宗。”此话不知所据为何。由于没见过唐初实物，所以既不能轻易肯定，也不能轻易取信。到了南北两宋，版印书籍大兴，随着版面的讲究，几乎书书有鱼尾，版版有鱼尾。鱼尾有单鱼尾、双鱼尾、三鱼尾之分。后世刻书还有六鱼尾者。单鱼尾者，位置多在版口上方1.5寸左右的地方。双鱼尾又有顺鱼尾、对鱼尾之分。所谓顺鱼尾是指版口上下两个鱼尾，鱼尾都朝下。对鱼尾则上部的鱼尾朝下，下部的鱼尾朝上，两者相对。鱼尾的用意有二，一是标识作用，二也是为了折叶时标识中缝线。完全不用如此费事也能居中折叠，可古人非要将其雕成鱼尾状，使鱼尾的叉心成为中缝，这无疑是美与用的巧妙结合。最近有人研究认为，鱼尾不是为了标示中缝线，而是简策书籍时代为了编牢每根字简，特在每简上下编绳处挖刻缺口，并在赘简上下缺口之间标示篇名、书名的遗意。虽然未必有这么远的演化承传渊源，但也可以算是一家之说。宋刻书的版口，上鱼尾的上方镌本版的大小字数，上鱼尾的下方或上下两鱼尾之间镌印简化了的书名、卷次、叶码。下鱼尾的下方镌印刻工姓名。刻工姓名与本版大小字数相结合，便实现了刻工责任制和按版计字发工钱的管理机制。

版口上鱼尾的上方至上边栏之间这一段，也有以中缝为准再左右对称各镌一道细线者，刷出来的纸张，将这两道线与鱼尾结合起来一道审视，确如象鼻下垂，故又有象鼻之称。你看，一条窄窄的版心，古人在这儿倾注了多少匠心！

为了方便读者披阅，宋版书还常在版框外左上角紧贴边栏竖着雕出一长方形框围，像是边框长了耳朵，所以称耳子或书耳。耳中镌印本卷主要内容之事目，有些类乎现在的主题词或关键词。如建安虞氏家塾所刻之《老子》第一叶书耳内便镌“修道养身”，实为第一篇二章的篇名。这种书耳中的文字称为耳题或耳记。

宋版书，特别是北宋的版印书籍，卷端首行题名仍有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者；序文目录和正文之间不隔开，而是互相联属。这既有时代特色，又有历史渊源。

大家知道，中国书籍的发展是经历了很多阶段的。从简牍书籍出现以后，虽然书籍的书写材料和装帧方法不断革新，但书籍的基本形式却代代相因。简牍的书是用一条条的竹、木片作为书写材料制成的。一部书的若干篇卷，可能要写很多根竹、木简。为了把一部书的竹、木简联缀进来，古人就用麻绳或丝线绳，把一根一根的竹、木简从上下两端编连起来。并且为了查找方便，每编完一篇一章一节，就可算一单元，卷成一卷，古人就称此为篇为卷。同时，为了显示不同书或不同篇之间的区别，又常在每篇之前用一根单简标注篇名。为了显示哪篇属于哪书，于是又在篇名下标注所属书名。这就是所谓的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是因为以竹、木简写书一书要用许多竹、木简，所以多以篇为单位编简成策。这样篇就显得特别重要，故写在前边赘简的上半部分，以便醒目。而将该篇所属之书的书名写在篇名的下面。等到宋代版印书籍大兴，书籍虽然由手写变成了版印，材料也由竹、木简变成了纸张，但在书籍的形式上却仍然模拟简牍书和手写帛、纸书。宋代前期所刻书之所以有些多白口、四周单边，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就是因为它继承了这种竹、木简书的基本形式。这是中国书史研究中的内容之一，此处无须多讲。

清人江标著有《宋元行格表》一书，称宋版书行少者每半叶四行，行八字，小字双行，行十四五字，如《干禄字书》。五行有《字通》，大字十八，小字夹行二十字。其实也有三行，行十字者，也有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九、二十行的。其目的是想从行款规格上摸索出鉴定宋、元书籍版本的规律，其心也善，其功则难成。有人讲宋代国子监所刻书是八行十六字的款式，其实并不尽然。现存宋刻《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毛诗》，就不是八行，而是十行。咸淳元年吴革私人刻印出版朱熹的《周易本义》，反倒是六行，看去行

格疏朗，字大如钱。而蔡琪家塾刻印出版的《汉书集注》，绍兴十二年汀州宁化县学刻印出版的《群经音辨》，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印出版的《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疏》、《礼记正义》、《事类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印出版的《春秋左传正义》，同年寻阳郡斋刻印出版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解》等，反倒都是八行的款式。而现存宋刻《陶靖节先生诗》则是七行。可见宋代刻书出版，无论经、史、子、集，也不论官刻、私雕，并没有一定的款式规格，因而也就难以找出刻书行款上的规律。如果一定要从中归纳出什么脉络，倒似乎是有这样一条规律：即刻书出版的行格疏密，取决于刻书出版单位或个人的财力物力和崇尚信仰。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之书多是行宽字大，原因是茶盐司主茶盐专卖，财力充裕。江南东路转运司所刻印出版的《后汉书注》也只有九行的款式，原因是转运司负责转输各地赋税到中央，其财力可想而知。但婺州市门巷唐宅刻印出版的经书《周礼注》却为每半版十三行，绍熙二年余仁仲万卷堂刻印出版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礼记注》，也只是十一行。可见私宅、坊肆即或是刻经书也达不到八行的规格，其原因无疑是他们的财力不敷和想降低成本以求定价低廉，速销牟利。而咸淳元年吴革刻印朱熹《周易本义》却取了六行的款式，其原因则无疑是对朱熹理学的崇信。所以，探讨宋代版印图籍的版面款式，只能从经济条件和思想崇信上去找原因。反过来，人们也只能从版式风格和行格疏密上，大体推断其为官刻或私刻的可能性。今天出版图籍仍然逃不脱这种规律。作者名头大，地位高，影响深广，出书之后营销看好，出版社便肯投资，出书开本大，天头地脚宽，行字疏朗，装帧精美；反之，开本就小，行字就密，装帧也不讲究。此为古今通理。通理就是规律。

## 第二节　宋代出版图籍的插图版画

随着版印图籍的兴盛，宋代版画及书籍插图也进一步发展

和提高。此从画稿、镌刻、刷印以及插图形式诸方面都表现了出来。

20世纪60年代初，在日本发现了一幅北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雕印的佛像画，镌、印均十分精美。画面上方镌印“待诏高文进画，越州僧知礼雕”文字两行。中间是佛像。佛像右边框内镌印像赞文字四行；左边框内镌印“甲申岁十月丁丑朔十五日辛卯雕印普施，永充供养”落款。显得整洁优美，雕印精熟。考高文进，成都人。父祖都是知名画家，文进自幼耳濡目染，画艺更高，尤其善画神佛像。太宗时为翰林院待诏，以画艺供奉内廷。曾经奉命绘东京大相国寺壁画。这幅版画的佛像画稿出自他手，弥足珍贵。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著录《三朝训鉴图》十卷，谓：“学士李淑、杨伟等修纂。庆历八年（1048年），伟初奉旨检讨三朝事迹，乞与淑共编，且乞制序。皇祐元年书成。顷在莆田有售此书者，亟求观之，则已为好事者所得，盖当时御府刻本也。卷为一册，凡十事，事为一图，饰以青赤。亟命工传录，凡字大小、行广狭、设色规模，一切从其旧，敛衽铺观，如生庆历、皇祐间，目睹圣作明述之盛也。”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南宋理宗端平中为浙西提举，改知嘉兴府，终侍郎。尝在福建莆田为官，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多至51 180多卷，之后才有条件编写《直斋书录解题》。所谓《三朝训鉴图》，实际当是仁宗太后取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宝训一百条，编成一书。并命绛州画家高克明绘图。所绘人物“一寸多高，而宫殿山川、仪仗器物无不具备”[1]。目的是为了训导十岁登极的小皇帝仁宗赵祯，令其有文字故事，又有表现文字故事内容的插图，图文并茂，以便增强育效。陈振孙所谓“庆历八年，伟初奉旨检讨三朝事迹”，与李淑共编《三朝训鉴图》，当是宋仁宗受益之后，于36岁那一年令李淑、杨伟等正式修纂，并由内府正式刻印出版的。该书每卷为一册，每事为一卷，每事配一图。并饰以青赤。盖图中又以红、蓝饰色，以增强人物事件的真实性。“饰以青

【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1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赤”，概念比较模糊。如果是印饰青、赤，则那时已有了套色印刷技术；如果绘饰青、赤，则唐末五代已有的墨印彩绘技法，到宋代还在流行。陈振孙得见此书后，照原样翻刻。证明南宋末福建莆田又有了陈氏翻刊的《三朝训鉴图》。高克明还奉命绘刻《卤簿图》三十卷，极为精妙，版印于大内禁中。天圣初年，王曾尝诠录古先圣贤事迹凡六十卷，绘事以进。仁宗下诏嘉奖，并令镂板模印，赐予近侍。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真宗咸平中由乡贡试礼部、廷对皆第一。仁宗冲龄即位，刘太后听政。王曾以中书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身份，编录古圣先贤事迹，绘以插图，于内府出版，显然是为了教育小皇帝的。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三记载宋仁宗自已也会画画。宋太宗之女献穆公主眼病失明，仁宗尝亲画龙树菩萨，命待诏传模，镂板印施。

此外，《皇祐新乐图记》中也镌有钟、磬、鼓、鼎等图形。《新定三礼图》镌有服饰、乐器、车舆、器具图近百幅。《古列女传》镌有妇女形象。《营造法式》镌有建筑规制。《经史证类大观本草》镌有各种草药形象。绍兴间（1131—1161年）刘待诏绘进《耕织图》，以枣木雕印。《梅花喜神谱》镌有梅花百图。《新仪象法要》镌有机械图。《武经总要》镌有兵器图。《考古图》、《宣和博古图》镌有鼎彝器物图。《产宝方》镌有十二月产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有多寡不同的插图。

宋代插图版画的形式，已打破了唐五代卷首扉画的单一模式，出现了在经卷或书籍中间插图或连续插图的形式。如北宋崇宁间（1102—1106年）江苏地区版印的《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就是一幅图版分数段描写故事内容的连环画。这种卷中连续插图的形式，开了以后书籍插图连环形式的先河。元建安余氏靖安翻刊宋勤有堂的《列女传》，则在一叶中取上图下文形式，与五代佛画上图下文形式显然有继承关系。使人读完一节文字，就能看到表述这段文字的形象插图。依文视图，内容活灵活现，形象生动；依图解文，形象诠释内容，理解更加深刻。全书共8篇123节，插图123幅，蔚为大观。其他如宋刻礼书、子书等，

也多取上图下文形式。宋伯仁编绘、嘉熙二年（1238年）初刻印出版的《梅花喜神谱》，则是双刀平刻的梅花画谱，分上下两卷，分绘梅花从蓓蕾到结实过程中八个不同的花态。每个花态配以雅题和诗文，如“烂漫”之花态下的雅题，便有“新荷溅雨”、“老菊披霜”、“林鸡拍羽”、“松鹤唳天”等；“欲谢”之花态下的雅题，又有“喜鹊摇枝”、“游鱼饮水”、“蜻蜓欲立”等名目。似乎是未看到画面，已美不胜收了。距嘉熙二年后22年，即景定辛酉二年（1261年），金华双桂堂又重刊此谱。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煞费苦心，搜求宋刻二谱，双桂堂重刊之《梅花喜神谱》，便是二谱之一。此本今藏上海博物馆。

总之，宋代刻书出版已很讲究版式、款式、字数、行数、中缝、边框、版口、象鼻、鱼尾、书耳等的规划与镌雕，对于插图格式也匠心独运，有上图下文之式、前文后图之式、前图后文之式、不规则插入等。目的是“使读者看了文字之后，即能一目了然地看到与这段文字有关的插图。或是看了插图，即能看到与这插图有关的文字。这说明绘图者与编排文字者是有过全盘计划的”[1]。至于插图上的款识，则对五代时期独幅佛画款识颇多继承。如“文字在小方框内，刻于画之上边正中的；以小长方框刻于画边上的；以文字的多少，作长方形刻于画边；文字不用方框，且不规则地刻在画上；在画中人物或器物旁边刻上名字等”[2]不少形式，五代时已经出现，到宋时则更显得多样和精美得体。刀法则是自有雕版印书以来就很讲究的艺术。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年）明宗“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版，广颁天下”[3]。可见那时已注意召雇“能雕字匠人”了。能者技术高，刀法圆润，能反映书字的神韵。至宋代，则越发讲究刀法。宋代版印典籍的插图版画，其特点犹如绘画的单线勾勒，都以阳刻为主。而阳刻又多以双刀平刻，力求刻线稳健流利。这就要求用刀的疾迟转换、点划起伏、折转顿挫，都得精熟巧丽，都得将原画忠实地镌刻在版片上，古人所谓“刀头具眼”、“老

【1】王伯敏：《中国版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

【2】王伯敏：《中国版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

【3】[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经籍》。

马识途”、“良马之奔于平原”、“蝙蝠之夜游”，都是形容镌板良工刀法之精熟的。他们操刀刻木，能跟写字一样，笔走龙蛇，显得十分流畅。所以宋代的版画，无论形式、款识以及刀法，都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价值。

## 第三节　宋代出版图籍的字体与符号标识

宋代刻书出版的字体，据明代张应文在其《清密藏》中说“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绝有欧、柳笔法”。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说：“凡宋刻有肥瘦两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明高濂在其《遵生八笺》中说：“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细审现存宋版书的字体风格，确实有如上述评论者。

宋承五季之乱，在刻书出版兴起之时，宋朝自己的书法大家，如苏、黄、米、蔡，还尚未形成，影响刻书字体的还是唐代的欧、柳、颜诸家。唐代在书法上的最大成就，即是把楷书楷法推向了高峰。而刻书的字体又恰恰需要这种端庄凝重的楷体字，因而唐代诸大家的字也就被选为模仿对象而应用于刻书出版了。并且由于各地所宗的书家不同，又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特点。如四川宗颜，福建学柳，两浙则崇欧，江西则兼而有之。廖莹中世彩堂在临安所刻韩、柳集，其秀雅似欧，历来被誉为神品；宋蜀刻《开宝藏》、《眉山七史》以及唐人文集等，其端庄厚重，古朴类颜，特色鲜明；福建黄善夫所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后汉书注》、《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其笔势间架，棱角峭厉，刚劲似柳，一看便知。当然，坊间所刻之书由于书手造诣不深，加上追求速售牟利，也有其特点不明显甚至恶劣者。但总的看，宋代刻书出版的字体是很有特色的。特别是经书，字体大多严整端庄，楷法有则。北宋国子监刻《五经正义》，便由赵安仁写样。“赵安仁，字乐道，河南洛阳人……幼时执笔能大字……雍熙二年登进士第，补梓州榷盐院判官，以亲老弗果往。会国子监刻《五经正义》板本，以安仁善楷隶，遂奏留书之”[1]。

【1】《宋史》卷二八七《赵安仁传》。

雍熙二年即公元985年，是宋太宗的第二个年号。可证那时国子监刻书出版就很讲究字体好坏了。这只是就大体而言，具体还有学苏东坡字、学宋徽宗瘦金书写样上板的。字形则有方体、长体、扁体、圆活体。另外还有学古体字和用简体字者。字型的大小，有人将宋代刻印出版之书的字型分为细字、小字、中字、大字四种型号，不过就所见记载和实物而言，并不是什么法定的规制和约定的习俗。“大字本便于老眼，但因多费板木、纸墨材料，增加成本，不适合普通读者的购买力。大本巨册携带又不便，故常改刊为小字本，如北宋监本医书，初多为大字本，医士往往买不起，乃重刊小字本。又监本经书字大难售，巾箱本又字小有不便，卖书者遂别刻不大不小之中书《五经》，所谓中书，就是不大不小之中字体。宋本中以中字体为多，有的把小字改为中字，如广德郡斋用蜀小字体本《史记》改中字本。宋戴埴《鼠璞》云：‘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起于南齐衡阳王钧手写《五经》，置巾箱中，诸王从而效之。古未有刊本，虽亲王亦手自抄录。今巾箱刊本无所不备，嘉定间从学官杨璘之奏，禁毁小板，近又盛行，第挟书非备巾箱之藏也。’南宋书坊盛行细书小本，供士子考试夹带之用，无所不备，虽有禁令，亦不能止。王荆公《百家诗选》细字轻帙，不过出斗酒金，而直挟之于怀袖中。本小价廉，携带便利，是其优点。巾箱本体积小，字体随之而小。宋板最小者过去有所谓高3寸半、宽2寸之《隋书详节》等……而《太学分门增广圣贤事实》宽只4厘米余，高8厘米，板框小于掌心，可纳之手袖中，故亦称袖珍本”[1]。

【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161~1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这是张秀民先生关于宋代出版书籍字体大小的一段议论，只是就所见所闻而描述了一些情况，尚不算是出版用字的型号类分。其实宋代刻书出版的字体大小，与行款一样，取决于出版家的财力和崇尚。行宽字小，不成比例，浪费板材，徒糜楮墨，固不上算；行窄字大，体必变形，版面离奇，亦不成体统。所以用字大小要视行款而定，求其比例协调，版面才整齐美观。宋代出版的图籍，每半版的字数常是行数的2倍，如8行16字，9行18字，

10行20字等，当然也有不成倍数的。这样就使版面显得整齐、大方。宋代刻书字体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文大字、注文小字同时出现在同一版面上。这种现象盖始于两浙东路茶盐司于南宋绍兴间经、注、疏合刻在一起的《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注疏》，为每半版8行，行19字，注、疏文则用小字，在正文一行中刻两行，每行字数也是19字，全双行便成为38字，看上去大小搭配适中，版面十分协调。这一字体大小搭配的刻书出版形式，横向很快荫及经、史、子、集四部要书，纵向则为其后的金、元、明、清所继承。这样既省材料，降低成本，又便于披阅，是出版形式和技术上创出来的新路。这种形式甚至东渐影响到日本和高丽。

宋代图书的出版，还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一题，那就是有些书上出现了类似标点的标示符号。宋代袁采《袁氏世范》中有所谓“次可以习点读（逗），为童蒙之师”之语。“点读”也就是“句读”，即对古书读到该停顿的地方，用一个实黑圆点“·”或小圆圈“。”标识一下，表示一个意思至此应该了断。袁氏觉得这是小事，算不得大学问，故水平低一些的人“可以习点读”，教童蒙。其实这是很错误的，很大的学问家标点出错误闹笑话是常有的事。就是《袁氏世范》自身，虽然每句都用小黑点“·”断句，也并不一定都很准确和规范。所以到元岳浚校刻《九经》时便说：“世所传《九经》自监、蜀、京、杭而下，有建阳余氏、兴国于氏二本，皆分句读，称为善本。”[1] 尽管如此，岳氏还要“圈点必校”[2]。原因就是圈点也有误，所以也得随同文字一并勘校。谚曰“学问何如观点书”[3]，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其它还有些符号，如长线“——”称为墨掷，大概是类乎“墨等”，即刻板时某字某句尚未定稿，刻划一长线表示不等了，扔掷了。“——”这种符号有时出现在要句旁，有时出现在行中，代替引用的文字，类乎现在的省略号。还有其他一些符号，如类乎后世圈点精要之句的句旁墨线，本是读书人随读随用墨笔抹画墨线，以作为自己再读或别人用读时的提示，宋朝人称此为“标抹”。书铺子

【1】[元]岳浚：《九经三传沿革例》。

【2】[元]岳浚：《九经三传沿革例》。

【3】[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上。

刻书出版时，为提示读者，连这种"标抹"也刻上去，旨在迎合读者，拓展市场，可谓用心良苦。还有些标识，不类标点，无庸赘述。

总之，宋代的刻书字体一般都有所宗；刻字的大小已根据书需、时需、人需而有大、中、细、小之分；镌刻的符号已有了表示停顿的句读圈、点及墨掷、标抹等标识。这些，都是宋代在出版方式上的一种创新。

## 第四节　宋代出版图籍的用纸

宋代版印图籍的用纸，过去搞版本的人多称是白麻纸、黄麻纸或竹纸。近年来据有关研究造纸技术发展史的专家多次取样分析鉴定，过去人们所谓的白麻纸或黄麻纸，是就其眼观纤维形似而言的。实际进入宋代以后，在南方印书多数已不采用麻纸了。原因是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出版事业的繁荣，对纸的需求越来越大，用麻纤维造纸十分昂贵，难以满足社会需求，所以多就地取材，采用桑树皮和楮树皮等以为造纸原料。福建闽北盛产竹子，于是竹子被广泛采伐造纸。因此，专家们认为宋代图籍出版的用纸，尽管名色很多，但就其质料而言，多数都是皮纸和竹纸。用普通放大镜观察多种宋版书的印纸，都可找出某些造纸时未捣碎的树皮或竹筋，甚至连桑树皮和楮树皮外表的黄颜色也还依稀可见。进一步证明了专家们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前边说过了，宋代刻书有三大中心：两浙、四川和八闽。这三大地区均地处江南，桑、楮生长相当普遍。闽北盛产竹子，就地取材，造纸印书，既经济又方便。还有个江西，出版图籍用纸也多是上好皮纸。据目前所见宋版书，浙刻本与蜀刻本多用皮纸，闽刻本多用竹纸。江西出版图籍用纸则更为讲究。过去有人说，帘纹够一扁指半或二扁指宽者为宋纸；只有一扁指宽或更窄者，则已是元代以后的印书用纸了。这种说法不但早已为大量事实所驳倒，就是他们所说的帘纹，连称谓也不确切。帘纹当指漂滤纸浆所用竹帘

或草帘的极细密的竹纹或草纹。这种纹，在经过砑光的纸上通常是看不出来的。我们能看出来的那种一道道的纵纹，实际是编织造纸帘子的丝线纹。它就像人们屋门上所挂的竹帘，竹篾之间的纹称帘纹，一道道径路之间的编绳纹当称线纹。这种线纹的宽窄并无一定规制，它的宽窄取决于编帘所用竹篾的粗细或草茎（北方造纸帘子有用草茎编织的）的粗细。竹篾或草茎越细，编帘线纹之间就越窄，也就是径绳要打得密，否则它就承受不住纸浆的压力。相反，如果竹篾或草茎粗，径绳就可以打得稀一点，之间线纹也就显得宽。从这一原理出发，研究造纸的质地，则应是线纹窄者，帘子密，造出来的纸质也就更匀细；线纹宽者，帘子粗，造出来的纸质也就显得粗糙。过去人们之所以凭这种线纹宽窄来判断是否够宋纸宋版，并不是建立在什么科学基础之上的，而是唯心地认为入元以后，一切不如宋朝，连造纸的线纹都变得狭窄拘谨了。就跟有人分析赵孟頫的字一样，说赵孟頫投降元朝以后，连字也变得松软和媚气了。其实这都是唯心之谈，并无科学根据。

古人还有用旧公文档册或账簿纸反过来印书的，版本学上的术语称为公文纸印本。过去有人认为公文纸正面所反映的年代，是鉴定版刻年份的最可靠证据，这个问题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不排除当时刻板就用当时的公文纸反过来印书的可能。这种实例节省，但不普遍。我们应该知道，所谓公文纸就是各级官府的文书档册，能把这些纸反过来用以印书，在当时恐怕是很难办到的。因为任何官府的文书档册，至少都要有一段时间的存档保留价值，不可能随时处理。要处理这些东西，至少要经过一段时间，最大可能是发生在改朝换代之后。原因是新朝始立，多经战争创伤，各方面都感困难。而前代某些文书、账簿又已失去现实意义，于是拿来用其反面印书，倒是常理中的事。所以说以公文纸正面痕迹作为版刻年份的确证，大可推敲。结论应当是，公文纸正面痕迹所反映的年代，正可说明其版刻年份或印刷年份已是后朝后代了。这种现象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第五节 宋代出版图籍的装订形式

书籍的装订形式，与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用竹、木简和缣帛制作的书，其装帧只能是卷起的形式。到了采用纸张写书，有很长一段时期也仍然是卷轴的形式。其原因有二：一是纸张仍具有缣帛的柔软性，可卷可舒；二是唐以前的纸书仍以抄写的方式制成，不必分成版面。今天存世的数以万计的敦煌遗书，大多是卷轴形式，就是有力的明证。但用纸写书究竟与用帛写书不同，纸虽具有帛的柔软，但缺乏帛的坚韧。来回卷舒，不但阅读和检索文字不便，也很容易断裂。所以进入唐代以后，卷轴式的装帧形式就逐渐向旋风装和经折装等册叶形式演变。这固然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人们需要查找的文献日渐频繁有关系，但与制作书籍的材料普遍采用纸也很有关系。原因是纸虽无缣帛的坚韧，但比帛硬，折叠起来更易成型，并且翻阅方便。北宋欧阳修在其《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正说明了唐代书籍装帧形式的演变过程。

宋代，版印书籍大兴，制作书籍的技术由手写变为雕版印刷。书籍的形式也不再是手写时那样毫无间隔地一行行连写下去，而是一版一版地间隔开来。这种书籍制作技术的变革，必然影响到书籍装帧形制的变化。唐以前长期采用的卷轴式、唐代出现的旋风装和经折装，对于一版一版印刷出来的书籍来说，都不尽适用，于是出现了蝴蝶装和包背装。不可想象，一版一版印刷出来的书叶，还能再将其一叶一叶地接粘起来，然后再加轴卷收而成为卷轴装！所以在两宋出现册叶式的蝴蝶装和包背装，是书籍制作方式改变的必然产物。宋代出现的这种蝴蝶装和包背装，把册页装帧的方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宋代对书籍装帧形制的大胆革新，是书籍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明史·艺文志》卷一《总序》记载明代"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

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这段话中的“装用倒折，四周外向”指的就是蝴蝶装（图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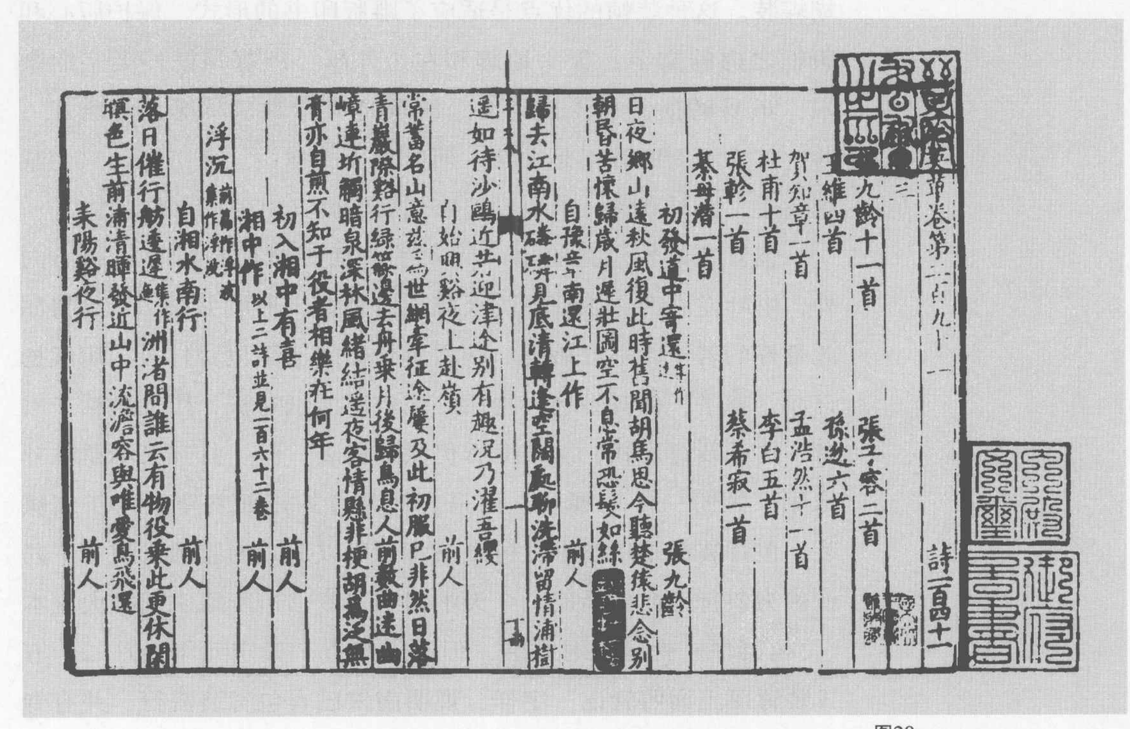

華卷第二百九十一　詩一百四十一
張九齡十一首　張子容二首
王維四首　孫逖六首
賀知章一首　孟浩然十一首
杜甫十首　李白五首
張軫一首　蔡希寂一首
綦毋潛一首
初發道中寄遠　張九齡
日夜鄉山遠秋風復此時舊聞胡馬思今聽楚猿悲念別
朝昏苦懷歸歲月遲壯圖空不息常恐鬢如絲
自豫章南還江上作　前人
歸去江南水磷磷見底清轉逢空闊處聊洗滯留情浦樹
遥如待沙鷗近若迎津途別有趣況乃濯吾纓
自始興谿夜上赴嶺　前人
常蓄名山意茲為世網牽征途屢及此初服已非然日落
青巖際谿行綠篠邊去舟乘月後歸鳥息人前數曲迷幽
嶂連圻觸暗泉深林風緒結遥夜客情懸非梗胡爲泛無
實亦自煎不知于役者相樂在何年
初入湘中有喜　前人
湘中作　以上二詩並見一百六十二卷　前人
浮沉
自湘水南行　前人
落日催行舫逶遲洲渚間誰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閑
瞑色生前浦清暉發近山中流澹容與唯愛鳥飛還
耒陽谿夜行　前人

图20
宋嘉泰元年至四年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蝴蝶装

蝴蝶装是随着版印技术大兴，适应书籍雕印成一版一版的新形式而出现的新的装帧方式。其刍型或者叫作过渡形式，在敦煌遗书的小册子中，可以找到源头。当然，这种装订办法的出现与当时流行的图书排架习惯，也不无关系。我们知道，卷轴装的书籍上架是平放插入，所以叫插架。每卷轴头露在外边，挂上书签，写上该卷书名，以便检阅。待到蝴蝶装出现以后，排架方式并未马上改变，而是仍用卷轴装的插架方式，这也决定其必得用这种“装用倒折，四周外向”的蝴蝶装，以便插进拉出磨的都是框外余幅，而不伤框内文字。这种装订方法，是将一版一版印好的书叶，以印字的一面为准，字对字地相对折齐，形成版心在里，四周朝外的形式。然后把若干如此折好的书叶戳齐，使折边向右形成书脊，然后将右边相互粘联，再用一张厚纸对折之后粘于书脊作为书衣或叫作书皮，最后将上下左三面剪齐，一书就算

装订完毕。从表面看，这种装帧形式很像现在的精装书。但翻开后每叶正文都得朝两面分开才能披阅，状似蝴蝶展翅，所以称为蝴蝶装。这种装帧的优点是适应了雕版印书的形式，保护版心和版框之内的文字；天头地脚和左边外露，但都是框外无字的余幅，虽易磨损，却无伤正文。缺点是书叶均是单层，每翻开一叶，首先看到的并不是文字，而是背面的空白。且书脊处只用浆糊粘连，容易脱落，所以到了宋代后期就又出现了“包背装”。

包背装的特点是将书叶无字的一面面对面地折叠，版心向外，书叶左右两边版框外的余幅向着书背，形成书脊，然后将如此叠好的若干叶书叶戳齐，在右边余幅的适当位置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裁齐右边，再用一张较厚的纸对折，用浆糊粘于书背。这种装订形式，从表面看仍象蝴蝶装，但一打开已不是单叶像蝴蝶翅膀一样地展开，而是合叶装订的正面文字。由于蝴蝶装、包背装都是用整书皮包裹书背，所以那时的装帧官员和工匠就称为包背臣或裱褙臣。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就是宋时蝶装，但卷末却有“景定元年十月二十五日装背臣王润照管讫”字样，说明南宋已有包背装流行，并有专人管理了。

当然，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宋版书，多数已由后人改装成线装形式了。从直观的装帧特点上已很难看出宋版书装帧的原貌。但了解宋版书装帧上的这些特点，仍然可以启发我们从版口、余幅上找出一些当时装帧的蛛丝马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宋代书籍的装式，有助于版本的辨别与考订。

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喜爱宋版书如命，故号称“佞宋主人”。他对收集到的宋、元版书，蝶装已坏，恢复原装极难，于是便将书叶全幅裱在比其宽大的厚纸上，再将每幅裱底粘连，然后骑每版版心中线折叠，再绕过书右脊背粘包一张整纸，就又成了一种装帧，叫作黄尧圃式蝴蝶装。其实与宋元蝶装已不大相同了。

# 第七章 宋代出版物的发行流通概况

宋代的出版业，是中国出版史上的第一次大勃兴。什么事物都一样，凡有其兴，必有其因，必有其由，也必有其用。因与由固然是某一事物始兴的背景，但其发展繁荣往往要靠“用”的拉动。有市场则兴，无市场则衰，这是中外古今永恒不变的经济学原理。宋代出版事业之所以空前发达，与广阔的文化市场紧密相关。有出版，有用向，能发行，可流通，便成了活水。归纳起来，宋代出版品的发行流通方式，无外是朝廷宣赐、书贾经销和外贸出口等几种形式。

## 第一节 朝廷宣赐价卖促进出版流通

“淳化五年，判国子监李至言：‘国子监旧有印书钱物所，名为近俗，乞改为国子监书库官。’始置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1]。国子监刻印出版经史群书，其用途渊源得上溯到东汉的熹平石经，意在为天下读经之人提供范本。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2]。后唐明宗李亶批示“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版，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需依所印敕本，不得更

【1】《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

【2】[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经籍》。

【1】[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经籍》。

【2】《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3】《宋史》卷八《真宗本纪三》。

【4】《宋史》卷六《真宗本纪一》。

【5】《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一》。

使杂本交错”[1]。作为敕本广颁天下，也是旨在提供范本，不使经义舛误。宋代尊经崇儒有过于前，“庆历四年，诏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可谓博矣。’”故“仁宗时，士之服儒术者不可胜数”[2]。思想政策上如此尊经崇儒，加速了国子监校刻经史群书的脚步。至景德二年（1005年），距改国子监印书钱物所为书库官仅11年，国子监刻出的书籍版片就有10余万块，较国初翻了20余倍，并且是“经、传、正义皆具”。这就为朝廷的宣赐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十一月辛亥，幸元偁宫视疾。癸丑，赐御史台《九经》、诸史”[3]。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六月“丁卯，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並赐《九经》”[4]。这样一来面就大了，发行数量也就很可观了。宋得天下为渐进式，太祖开宝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十六，户三百九万五百四。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献地，得州二，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钱俶入朝，得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四年，平太原，得州十，军一，县四十，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七年，李继捧来朝，得州四，县八。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迨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5]。路、府、州、县加起来，总计是1 611个地方行政区划。而宋制，则在每个路府州军县都立官学，一个行政区划有一所学校，全国就有1 600余所。再加上书院和聚徒讲诵之地，将大大超过此数。北宋前后有过三次兴学运动：第一次是范仲淹为相时的庆历兴学，第二次是王安石为相时的熙宁兴学，第三次是蔡京为相时的崇宁兴学。第二次距第一次，不过20余年；第三次距第二次，也是20余年。半个世纪中三次兴学重教，学校当然兴盛。而在这股兴学之风吹起之前，真宗居然下诏凡“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並赐《九经》”，这非但是得风气之先，亦为国子监所刻经书的发行打开了广阔的用场。当然，宋代各州府军县学校的设立是逐渐发展的，

真宗下诏赐《九经》时天下学校还并不多。

此外“宋时国子监板，例许士人纳纸墨钱自印。凡官刻书，亦有定价出售。今北宋本《说文解字》后，有雍熙三年中书门下牒徐铉等新校定《说文解字》。牒文谓‘宜付史馆，仍令国子监雕为印板，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钱收赎’等语”[1]。其实“收赎”并不意味着自印，当是依纸墨成本价花钱自买。因为书版繁重，不可能谁花了纸墨钱，就能立刻为谁清版刷印。必是先期印好，装帧完毕；或是凑多少人要买，再行刷印。所以“许人纳纸墨钱收赎”，实际就是定价出售。前引判国子监李至所言国子监书库官“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也证明了宋代国子监所刻之书是发卖的。只不过是收钱的方式比较灵活，收钱的目的也只是归于公，看来实行的是收支两条线政策。国子监出版的图籍既然可以发行价卖，则各级各类公署单位出版的图书，也上行下效，照此施行。淳熙三年（1176年）舒州公使库刻印出版曾穜辑的《大易粹言》十二卷，该书前镌有该公使库雕造所贴司胡至和的具文告白，称：“今具《大易粹言》壹部，计贰拾册，合用纸数、印造工、墨钱下项：纸副耗共壹仟叁百张，装背饶青纸叁拾张，背青白纸叁拾张；檄墨糊药印背匠工食等钱，共壹贯伍百文足；赁板钱壹贯贰百文足。库本印造见成出卖，每部价钱捌贯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贴司胡至和具。”[2] 这份告白类似广告，又公布了定价，还说了所用纸墨工食钱，以及书板的租赁费用。既告诉成本，也公开利润，信用当头，以便行销。此书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但此告白已失。又淳熙十年（1183年）象山县学刻印出版宋林钺辑的《汉隽》十卷，有杨王休题记云：“象山县学《汉隽》，每部二册，见卖钱六百文足。印造用纸一百六十幅，碧纸二幅；赁板钱一百文足，工墨装背钱一百六十文足。”又题云：“善本锓木，储之县庠，且借工墨盈余，为养士之助。”[3] 非常诚实的广告，连借刻书出版，经销盈余，以为养士助学的用意都告诉于人。这种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表明宋代刻书出版，包括各

【1】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

【2】《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及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

【3】《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及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

级各类官刻之书，已作为文化产品而进入了商业流通领域。什么东西一成为商品，其流通的范围就会无分远地扩大，从而拉动事业的发展。

民为国本，食为民天。食五谷杂粮，难免生病染疾，故自神农、黄帝便尝百草，救生灵。《四库全书馆》总纂官纪晓岚曾说："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1]又说："农家、医家，旧史多退之于末简，余独以农家居四，而其五为医家。农者，民命之所关；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故升诸他艺术之上也。"[2]可见重农尚医，乃中国封建社会为政者的传统。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十二月癸酉，购求医书"[3]。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秋七月"壬子，赐广南《圣惠方》，岁给钱五万，市药疗病者"[4]。四年（1007年）九月"壬申，赐畿县《圣惠方》"[5]。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二月癸酉，颁《庆历善救方》"[6]。皇祐三年（1051年）五月"乙亥，颁《简要济众方》，命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7]。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春正月"庚子，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鍼经》于天下"[8]。这一系列的举动，表明宋代朝廷是很重视民瘼民疾而不断颁赐医书、药书的，故宋代国子监除奉旨校刻经史外，还特别重视医书。原因是医关民命，且校刻必须精审，方书一字之讹，可致人于死命，故国子监特镌医书。叶德辉《书林清话·宋监重刻医书》称："吾所藏明仿宋本王叔和《脉经》十卷，前有公牒，略云：'国子监准监关准尚书礼部符，准绍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敕，中书省、尚书省送到礼部状，据国子监状，据翰林医学、本监三学看治任仲言状。伏睹本监先准朝旨，开雕小字《圣惠方》等共五部出卖，并每节镇各十部，余州各五部，本处出卖。今有《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王氏脉经》、《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五件医书，日用而不可缺。本监虽见出卖，皆是大字，医人往往无钱请买，兼外州军尤不可得。欲乞开作小字，重行校对出卖，及降外州军施行，本部看详。欲依国子监申请事理施行，伏候指挥。六月二

【1】《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子部总序》。

【2】[清]纪昀:《纪文达公集》卷八《济众新编序》。

【3】《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

【4】《宋史》卷七《真宗本纪二》。

【5】《宋史》卷七《真宗本纪二》。

【6】《宋史》卷十一《仁宗本纪三》。

【7】《宋史》卷十二《仁宗本纪四》。

【8】《宋史》卷十七《哲宗本纪一》。

十六日奉圣旨，依。钞如右牒刊奉行’云云。盖当时朝廷本重医学，故请乞必得依行。”这段牒文表明，因朝廷重视医药，期得州郡遍传，大字本劳师费材，成本高，售价昂，医人买不起，一不能普救苍生，二发行也不普遍，于是改为小字重新镌板印行，这在经销上也是一种新思路。这种思路影响到儒家经典，便出现了所谓字体不大不小的中书《五经》，发行十分广泛。降低成本，降低售价，扩大发行，扩大受众面，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取得了更好的经济效益，这是值得借鉴的出版经营之道。

## 第二节　坊肆书贾经销促进出版流通

前边谈到过，宋代的东京汴梁、杭州、婺州、成都、眉山、广都，建阳的崇化、麻沙等市镇，多是商贾云集，书坊林立，书籍出版流通十分红火之地。这种红火，跟宋代“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紧密相关。读书应考，考中得第，得第为官，成为社会时尚。文化人一多，藏书、买书者就多。如御史中丞赵安仁“尤嗜读书，所得禄赐多以购书。……三馆旧阙虞世南《北堂书钞》，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诏褒美”[1]。吕大防字微仲，兰田人，元祐二年（1087年）拜尚书右丞，后来当了宰相。“大防既拜相，常分其俸之半以录书，故所藏甚富”[2]。朱昂字举之，“朱遵度好读书，人号之为‘朱万卷’，目昂为‘小万卷’。……昂前后所得俸赐，以三之一购奇书，以讽诵为乐”[3]。刘仪凤字韶美，普州人，绍兴二年（1132年）登进士第。“仪凤在朝十年……，人尤其傲。俸人，半以储书，凡万余卷，国史录无遗者”[4]。宋代这种为官而又肯买书者，举不胜举。加上一些学者、读书人，乃至隐士，嗜书如命，以藏书为乐者，人数就更多。湖州归安县东林隐士沈思字东老，喜藏书，时人赋诗说他“黄金散尽为收书”。开封隐士蔡致君，“不事科举，不乐仕宦，独喜收古今之书。空四壁，捐千金以购之，常若饥渴然”[5]。“黄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经，聚书数千卷，学者多从之游”[6]。

【1】《宋史》卷二八七《赵安仁传》。

【2】［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吕汲公文录》。

【3】《宋史》卷四三九《朱昂传》。

【4】《宋史》卷三八九《刘仪凤传》。

【5】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引苏过：《夷门蔡氏书目》。

【6】《宋史》卷四五八《隐逸中·黄晞传》。

《涑水纪闻》说他家贫，衣不蔽体，得钱辄买书，所费殆数百缗。《曝书杂记》说宋代藏书家许棐少安于贫，壮乐于贫，老忘于贫，但“市有新刊，知无不市”。正是这一社会群体，构成了宋代书籍出版流通的广阔市场，吸引私宅、坊肆竞相刻书，大大繁荣了宋代的出版事业。

汴梁是五代梁、晋、汉、周四代旧都，赵匡胤在此发迹，亦都于此，当时称为东京开封府。有汴水，南与淮河、长江相接，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太宗时居民达百万，且地“当万国之要会，升平日久，比屋富庶，四海内外宝货所聚，有阛阓之喧所不及处，已不可多得”[1]。城内店铺比屋相接，九行八作，应有尽有。琴铺、画店、裱褙铺、书籍铺也不少。集贤堂书铺高挂“兑客书坊”红边白地的幌子，“发兑古今书籍”的招牌，招览买主。大相国寺庙会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更显热闹。寺东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铺。殿后资圣门，亦皆是书籍玩好字画。相传宋初文学家穆修买到了韩、柳《文集》的善本，自己出资召雇匠人刻印出版，就在大相国寺出卖。有士人来买，但议价不相当，穆修便说你若“但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2]。相国寺卖书还有变相赌博的方式，买者下注，然后几个买主掷骰子，胜者得书，败者花钱。“李易安（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云：‘予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3]。表明北宋的都城开封，确是书籍流通的一大市场。

【1】［宋］杨杰：《无为集》卷十四《水磨记》。

【2】［宋］朱弁：《曲洧旧闻》四。

【3】《四库全书》本《金石录后序》。

杭州在五代时便是吴越的王城。南宋于绍兴八年（1138年）以临安为“行在”，正式定都于此。一时北方的官僚、地主、商贾、僧侣和广大黎民百姓，纷纷避地南来，使杭州人口剧增。在此后百余年间，人口增长二三倍，咸淳《临安志》统计有124万多人，成为十二三世纪世界人口众多、屈指可数的大都市。南宋政府在扩建都城、皇宫的同时，还拓展了临安城郭，最终形成了南跨吴山，北抵武林门，左接钱塘江，右接西子湖的宏伟大城。城内从皇宫和宁门外向北，直至武林门中正桥，是一条纵贯南北

的御街。御街两旁，工商店铺连门俱是，而无虚空之屋，百货云集，十分繁荣，是府城的经济中心。而官巷口至羊坝头一带御街，是京师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御街北段以棚桥、众安桥至观桥一带，是城北闹市区。它因紧邻南宋的太学、武学、宗学及礼部贡院，故书籍铺、瓦子、饮食等行业最为集中。在街路与河道之间，分设九厢八十余坊，此为都市居民的住宅区。商业区则称“市”。市内开有“井”字形道路，将市内划分为若干方块区域，小方块内又划成几行，称为“肆”，凡经营项目相近的店铺都集居一行，故有“行业”之称。宋代的文教事业本来就很发达，绍兴十三年（1143年）复建太学，学生最多时达两千余人。和太学临近的是最高军事学府——武学，学生也有一百多人。睦亲坊区建有专供皇族子孙读书的宗学。三者合称“三学”。此外还设有算学、书学、医学和画学。围绕着太学，左有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经）铺、中间是太学前陆家、右为众安桥北杨家、众安桥南街东开经籍铺贾官人宅、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修文坊相对王八郎经籍铺、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所有这些书籍铺，都离三学不远，师生常来光顾，生意兴隆。特别是陈起家所开经籍铺，就在棚北睦亲坊巷口，里边就是宗学，独得地利，生意更好，名气也大。而洪桥街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猫儿桥河东岸开牋纸马铺钟家、中瓦子张家、中瓦南街东印输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清河坊北街西面东双桂赵宅书籍铺、大隐坊等书肆，又隔街分布在南宋秘书省迤右。表明南宋临安书籍铺不但十分兴盛，而且铺面地点多开在学校附近和文化机构周围，有销售对象和购买市场。嘉泰三年（1203年）来杭州投考太学的就有3万7千多人，这些应试的各路生员，也是书籍销售的很大人群。另外，绍兴十三年（1143年）在杭州修建的国子监，其实就在钱塘县岳飞的旧宅（今昭庆寺东）上更建。监设之初，书少版缺，于是乃取临安府、湖州、台州、泉州、四川等地所刻书版归于监中，就算是监版。国子监书版库设在中门之内。印书的地方称为“印文字所”或“印书作”。据李

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六记载，早在绍兴五年闰二月，“尚书兵部郎兼史馆修撰王居正言：‘四库书籍多阙，乞下诸州县将已刊到书板，不拘经史子集小说异书，各印三帙，赴本省。系民间者，官给纸墨工赁之值。’从之”。这也促进了私宅坊肆出版书籍的流通。

前边已经说过，福建的刻书出版业最为发达，这固与本省的人文环境有关、自然环境有关，与私宅坊肆的出版者能策划善经销也有关。下列几幅刻书牌记，就能看出他们的经营理念。《张子语录·后录下》末有两行题记：“后学天台吴坚刊于福建漕治”，此为福建官刻书牌记，只是记载，而无推销广告之意。蔡梦弼刻印出版《史记》，其牌记也只称：“建谿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时岁乾道七年春王正上日书”、“建安蔡梦弼傅卿谨案京蜀诸本校理置梓于东塾”，虽已带有广告自吹色彩，但毕竟还是私宅，尚不是完全的书商。而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刻印出版之《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的长方牌记则云：“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近求到《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计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鑱木以广其传，幸学士详鉴焉。乾道端午识。”其广告推销色彩已十分浓重。所以朱熹说：“建阳板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1]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亦说：“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可见福建书商的经销能力要强于他处。

[1]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88页。

## 第三节　对外宣赐与行销促进出版流通

两宋图书的出口，大概有朝廷宣赐、回赠以及民间市场经销三个渠道。日本、高丽等国的僧人，不断来华，访求佛经和各类图书；宋与辽、西夏、金之间在和平时期于边境榷场互市；东南泉州、四明港口与东南亚海上往来等，都是图书随同其他商品销往境外的渠道。

北宋时期日本僧人来华的人数较唐代大为减少，但来华的也

有奝然、寂昭、诚寻等20多人较有名。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纪》各一卷。……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以书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其国多有中国典籍，奝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皆金缕红罗褾，水晶为轴。《孝经》即郑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贞，《新义》者，记室参军任希古等撰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二年，随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船归其国”[1]。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能清楚地知道，日僧奝然这次来华带来了中国久已失传的郑注《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带回释教大藏一藏。此时的释家大藏无他，显然是《开宝藏》，表明《开宝藏》于北宋太宗时就已传到了日本。

“景德元年（1004年），其国僧寂照等八人来朝，寂照不晓华言，而识文字，缮写甚妙，凡问答并以笔札。诏号圆通大师，赐紫方袍”[2]。他留宋时间较长，久居苏州，与中国文人过从甚密。期间，日本的藤原道长给他捎来黄金百两，让他购买一切经论、各宗章疏和文化典籍，由他的弟子念救等人将购到的图籍陆续带去日本。

“熙宁五年（1072年），有僧诚寻至台州，止天台国清寺，愿留，州以闻，诏使赴阙。诚寻献银香炉、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饰念珠，及青色织物绫。神宗以其远人而有戒业，处之开宝寺，尽赐同来僧紫方袍”[3]。同时还应其请，诏印经院将新译经413卷赠他。他还到市场上采买佛画和大量四部书，第二年由他的弟子赖缘等五人带回日本。

南宋来华的日僧增多，有文献可考的就100多人，不可考者当远远超过此数。其中福州版、湖州思溪版、苏州碛砂版释家大藏，前后为他们输出在10藏以上。日僧还在临安、苏州、明州、泉州等地购买大批经论章疏、禅籍儒书、诗文集和医书运回日

[1]《宋史》卷四九一《外国传七·日本》。

[2]《宋史》卷四九一《外国传七·日本》。

[3]《宋史》卷四九一《外国传七·日本》。

本。嘉定四年（1211年），日本名僧不可弃俊芿来华购回释家典籍、儒书、杂书、法帖2 013卷。他的弟子阳湛海来华，也购去各种图籍数千卷。非但如此，还有些日本僧俗将自己的著作携来杭州镂板。

高丽向与中国往来密切，入宋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的202年中，高丽先后派使者来华达30余次。太宗端拱二年（989年）高丽王王治遣使来贡。“先是，治遣僧如可赍表来觐，请《大藏经》，至是赐之。仍赐如可紫衣，令同归本国”。淳化“二年（991年），遣使韩彦恭来贡。彦恭表述治意，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秘藏诠》、《逍遥咏》、《莲华心轮》赐之。……四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1]。这种有求有赐的出版品流通，《宋史》中还多有记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高丽王王询遣御事民官侍郎郭元来贡，九年（1016年）辞还。“赐询诏书七函，袭衣、金带、器幣、鞍马及经史、历日、《圣惠方》等。元又请录《国朝登科记》及所赐御诗以归。从之”[2]。天禧五年（1021年）“询遣告奏使御事礼部侍郎韩祚等一百七十九人来谢恩，且言与契丹修好。又表乞阴阳地理书、《圣惠方》，並赐之”[3]。询卒，其孙徽嗣立，是为高丽文王。徽卒，其子勋嗣立，百日而卒，其弟运嗣立，是为高丽宣王。“运仁贤好文，内行饬备，每贾客市书至，则洁服焚香对之。（元丰）八年（1085年），遣其弟僧统来朝，求问佛法并献经像。哲宗立，遣使金上琦奉慰，林暨致贺。请市刑法之书、《太平御览》、《开宝通礼》、《文苑英华》。诏惟赐《文苑英华》一书。以名马、锦绮、金帛报其礼”[4]。元祐七年（1092年），“遣黄宗慤来献《黄帝鍼经》，请市书甚众。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入贡，无丝发利而有五害，今请诸书与收买金箔，皆宜勿许。’诏许买金箔，然卒市《册府元龟》以归”[5]。此事《宋史·哲宗本纪》亦有记载，谓元祐八年（1093年）正月庚子“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鍼经》于天下。……二月……辛亥，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使乞买历代史及《策府

[1]《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三·高丽》。

[2]《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三·高丽》。

[3]《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三·高丽》。

[4]《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三·高丽》。

[5]《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三·高丽》。

元龟》等书，宜却其请不许。’省臣许之，轼又疏陈五害，极论其不可。有旨：‘书籍曾经买者听。’”[1] 由于意见不一致，只好照皇帝的旨意办，所以《册府元龟》等书还是被他们买走了。苏轼认为“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2]。担心他们所得书中记载之中国山川险要悉被所知，不利宋之防守，故三上其札，陈其五害。皇帝表面上虽说书籍流通听任买者，但此后多年中断了这种宣赐形式的图书出口。可是高丽与中国毕竟只是一海之隔，海陆之间的商贸往来从未间断。南宋很多书肆知道高丽人喜欢中国书籍，常用船载书去高丽，在开京销售，或献给高丽王。朱熹的三传弟子熊禾在替朱熹家翻盖书肆——同文书院时写上梁文就说:“儿郎伟，抛梁东，书籍日本、高丽通。”正反映出南宋中国出版品，特别是民营书肆的出版品，以盈利为第一要义，并不完全按照朝廷的意志去办，而自办外销，售往日本、高丽等国。

交阯亦作交趾，是旧时对安南、越南的别称。自10世纪30年代越南独立立国后，北宋称其国为交趾，南宋虽先后改称为安南和越南，但以其国本古交趾地，故也别称交趾。宋徽宗“大观初，贡使至京，乞市书籍。有司言法不许，诏嘉其慕义，除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外，余书许买。政和末，又诏以交人自熙宁以来全不生事，特宽和市之禁。……（淳熙）二年，赐安南国印。三年，赐安南国历日”[3]。可证宋代的出版物也出口至越南。

至若宋与辽、西夏、金、大理、于阗、高昌、回鹘、大食、龟兹、沙州、党项、吐蕃等，虽也有宣赐和互市中的书籍流通，但在今天看来，本质上当不属出口性质，故不赘述。

总之，宋代出版的图书，在国内外广阔的市场上，以多种形式广泛流通。它不但作为朝廷的宣赐恩典、回赠礼物在海内外流通，更作为商品在市场销售。它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宣扬思想，阐述主张，表明观点，承传文明等特殊商品功能，推动着两宋社会的进步，也为邻邦传输了治国经验、中土文化，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1】《宋史》卷十七《哲宗本纪一》。

【2】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24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宋史》卷四八八《外国传四·交阯》。

# 第八章　宋代朝廷对图籍出版流通与版权的管理

书籍是人们交流思想、传播知识、介绍经验、宣扬主张的重要工具，所以历代的王朝对书籍的传播都很重视。雕版印书出现以前，书籍主要靠手写流传，它的流通范围受到一定限制，影响所及还不像后来那么广泛，但只要书籍内容有碍当时政治，朝廷还是要严加管理的。诸如秦始皇的焚书、三武对佛教经典的剪除，直至清代乾隆皇帝对图书的禁毁等，虽然都是封建专制主义对文化的扼杀，并为后世所诟骂，但从彼时彼地讲，也可以看成是当时朝廷对书籍出版流通的一种管理。

版印书籍出现以后，书籍的流通范围扩大了，好坏影响也就随之更加深广了，朝廷对书籍出版流通的管理也就更加具体了。唐代是版印书籍刚刚兴起的时代，但只要某书的印行有乖朝廷政令的推行，朝廷就要出面干涉。唐文宗大和九年冯宿出使剑南两川，见“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他认为这种做法“有乖敬授之道”，于是上疏请求禁断。同年“十二月壬申朔……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1]。这是唐朝对版印书籍禁印的实例。宋代这方面的实例就更多。

【1】《全唐文》卷六二四。

# 第一节 宋代对图籍出版流通的管理

进入宋代以后，一方面是版印书籍大兴，一方面又要极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别是宋代政权从建立到最后灭亡，始终与北方的少数民族处于对立的状态。“和”、“战”政策的矛盾与斗争，反映在对版印书籍的流通管理上，就是凡涉及时政、边机，违背儒家经义，有伤社会风化及谣言惑众等书籍，都在禁印、禁毁之例。

## 一、禁止雕印流通事干国体、军机边政等文书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秋七月丁亥，禁民间私写编敕、刑书”[1]。可证法律、敕令格式等有关国家法规政令等书籍，民间不得私自传写模刻。原因是这种文件代表着国家的权威和皇帝的尊严，一字之差，会误伤千百，必得国家职掌。

北宋仁宗时，北方的辽和西夏同时南下侵扰，宋朝的边事日益紧张。为了防止国家机密泄露于外，避免给朝政边机造成不必要的被动，仁宗于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下诏，称：“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版鬻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鞫闻奏。”[2]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闰十一月，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上言：“窃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乞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从之。”[3]

北宋仁宗、神宗时，辽、西夏或同时，或更迭南下扰宋，使宋朝的边事日益紧张，造成了宋朝朝野“和”与“战”的激烈争论。反应这种争论的评论时政得失、军国利害的文字，也就随之多了起来，并为人们所乐见。坊间书肆于此时则迎合人们心理，编刻印卖各种政论书籍，借以销售盈利，致使朝廷不得不明令严禁，这是宋朝对出版事业实行管制的信号。

[1]《宋史》卷十《仁宗本纪二》。

[2]《宋会要辑稿》第一六五册《刑法》二之二四。

[3]《宋会要辑稿》第一六五册《刑法》二之三四。

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为庆贺辽主生辰，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奉命使辽。苏辙在辽国遇到很多人问及他哥哥苏东坡的情况，并在燕都（今北京）看到了他们家的家谱。这些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所以他在归途中，刚到今涿州，就寄诗给他的哥哥，谈及“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貊，恐防他日卧江湖”[1]。辽人为什么那么关心苏东坡？其文学影响可能是原因之一。恐怕主要还是因为苏东坡是个政界人物。他在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中，最初是站在对立面的。这一点从情理上讲，应当是深受辽人欢迎的，所以辽人关心他。但这却引起了他弟弟的注意。他一方面寄诗劝他哥哥“莫把声名动蛮貊，恐防他日卧江湖”，一方面也把辽国的这种极力想刺探中原情况的事实，向哲宗做了全面的报告，认为“朝廷得失，军国利害，臣僚奏章及士子策论，若使得流传北界，则泄漏机密”[2]。于是他建议朝廷应严加防范，妥筹对策。

【1】［清］厉鹗：《辽史拾遗》卷十引陆嘉淑：《辛斋诗话》。或《日下旧闻考》卷一二九。

【2】［宋］苏辙：《栾城集》卷四一。

根据苏辙的这个建议，于次年，即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便由礼部拟定了对刻书出版的管理原则，制定了具体的管理条例：“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3] 礼部的这个规定大概是四个方面的内容：凡批评时政和议论边机的文字，连传写都不许，何谈雕印出版；本朝会要、实录，涉及国家的典章制度和朝廷机密，既不许传写，更不许雕印出版，违者判刑，并鼓励告发；其他有关学术的一般书籍，虽许雕印，但雕印之前需要有选官审查，雕印之后还得送秘书省审定。就是说一般书籍的印行都要经过两道关口，一道是雕版之前需有选官审查通过，方可镂板，一道是镂板之后还需秘书省复审。两道审查都通过了，才能印行出版；至于黄色戏谑之文，则根本不许雕印，违者要受刑法处置，并由州县监司和国子监时时

【3】《宋会要辑稿》第一六五册《刑法》二之三八。

监察。礼部的这个规定，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施行，并形成了宋代对版印图籍实施管理的纲领，以后的历次禁令，都不外这几个方面。

宋徽宗时代，北宋王朝已临近末期，北方的辽国也逐渐衰落，但另一支北方的少数民族——金人，则日益崛起。他们虎视眈眈，觊觎中原，并不断用金戈铁马扣打中原大门，因而使宋朝的边防更趋紧张。这种紧张的政治、军事形势，反映在对图籍出版的管理上，也就更加严格。

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朝廷再次颁布命令，称"访闻虏中多收蓄本朝见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其间不无夹带论议边防兵机夷狄之事，深属未便。其雕印书铺，昨降指挥，令所属看验，无违碍然后印行，可检举行，下仍修立。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应贩卖、藏匿、出界者，并依铜钱出界罪赏施行"[1]。

大观四年（1110年）又令"近撰造事端，妄做朝报，累有约束，当定罪赏。仰开封府检举，严切差人缉捉，并进奏官密切觉察"[2]。朝报是朝廷编印发行的一种报纸，在宋代由朝廷设置的新闻发布机构——进奏院主管。任务是负责宣告王朝的法令、章奏及人事任免等事宜。其职责类似于现在的新闻办公室或新华社。这种报纸本来是比较严肃的，传之要实。但由于北宋政治日趋腐败，边事又日渐紧张，光靠朝廷利用朝报发布的那点官样消息，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猎取新闻的心理。加之当时印刷技术又已普遍应用，所以就出现了所谓"奸佞小人，妄作朝报"的事情。这种妄作的"朝报"，宋朝人又称之为"小报"。这种小报又常常"始自都下，传之四方。甚者凿空撰造，以无为有，流布近远，疑误群听"。朝廷认为这种小报所传布的若系"常程小事，传之不实，犹未害也；倘事干国体，或涉边防，妄有流传，为害非细"[3]。所以从宋徽宗时候起，就明令严禁这种小报，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治和军国机密。徽宗之后，历朝关于这种小报的禁令屡见不鲜，说明宋朝的政治形势已江河日下，朝廷权威一天不如一天，

[1]《宋会要辑稿》第一六五册《刑法》二之四七。

[2]《宋会要辑稿》第一六五册《刑法》二之五四。

[3]《宋会要辑稿》第一六六册《刑法》二之一二五。

社会秩序混乱，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有了“妄作朝报”的土壤。

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金人早已取代了辽国，扣打中原的刀兵声一天紧似一天。宋朝廷对外保密，对内限制也一天紧似一天。权知密州赵子昼奏：“窃闻神宗皇帝正史，多取故相王安石日录以为根柢。而又其中兵谋政术，往往具存，然则其书故亦应密。近者卖书籍人，乃有《舒王日录》出卖，臣愚窃以为非便，愿赐禁止，无使国之机事传播闾阎，或流入四夷，于体实大。从之。仍令开封府及诸路州军毁板禁止。如违，许诸色人告，赏钱一百贯。”[1] 封建社会君举必书，除史官负责记录外，尚有近臣将皇帝每日所谈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记录下来，称为《日录》。王安石卒于元祐元年（1086年），赠太傅。绍圣（1094—1098年）中定谥号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1104年）追封为“舒王”。所谓《舒王日录》，指的就是王安石的《日录》。王安石身居相位，与北宋神宗朝夕相处，是变法的主将，他的《日录》自然事干“兵谋政术”，“流入四夷”，确实“于体实大”，故行毁版查禁。

[1]《宋会要辑稿》第一六五册《刑法》二之八五。

次年，中书省又上言：“勘会福建等路，近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等，诏令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以违制论。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著为令。见印卖文集，在京令开封府、四川路、福建路，令诸州军毁板。”[2]

[2]《宋会要辑稿》第一六五册《刑法》二之八八。

可见宋徽宗时，由于边事紧急，为了严守国家机密，连文集、日录、小报等，统统都在禁印之例。而且在诏令中还特别指明京师开封、四川路、福建路等，原因是汴梁、四川、福建等地，都是当时刻书出版的中心，由这些地区刻板印刷，泄露机密的可能性最大。

然而靠禁止是挽救不了失败命运的。在宋徽宗对版印图籍紧锣密鼓地严下禁令声中，他和钦宗赵桓一块被金人掠去，到北国坐井观天，北宋也就宣告灭亡了。这说明版印图籍的混乱，是社会政治和经济混乱的反映，反过来再用政治的手段加以限制当然是必要的，但这种限制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政治

形势之上，否则仅靠限制是无济于事的。

进入南宋以后，金人进占中原，南宋偏安江淮以南。高宗任用奸相秦桧，对金人妥协求和；高宗后期，金人内部也发生政变，无力南侵，于是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江南本来风物繁茂，刻书出版历有传统，此时偏安，出版业更兴。为了防止泄密，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六月，臣僚们又进言："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今乃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于是诏"四川制司行下所属州军，并仰临安府、婺州、建宁府，照见年条法、指挥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刻板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具已焚毁各件，申枢密院。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1]。这篇官样文章的措辞，不像北宋末期所颁刻书出版禁令那么严厉，一看就是防范性质的条款。这是金、宋南北对峙，金无南下吞宋之力，宋也无北上收复中原之能，两相对垒，互相防范的形势所决定的。但等到宁宗继位，韩侂胄为相当政，力主抗战。于是定议伐金，主战空气再度高涨。因而严防泄密、间谍、汉奸等活动，也就随之而加紧。反映在对出版图籍的管理上也就再度严格了起来。

宋宁宗使用的年号之一是"庆元"，在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中，对版印图籍就有了严格的规定："缘边事应密，凡时政、边机文书，禁止雕印"；"诸雕印御书、本朝会要及言时政、边机文书者，杖八十，并许人告"；"诸私雕文书，不纳所属详定即印卖者，杖一百"；"诸举人程文辄雕印者，杖八十"；"事及敌情者，流三千里，并许人告"。这几条对版印图籍的规定比光宗时的官样文章，一看便知严厉多了。其原因是政治气氛变了，备战形势紧了，保密的要求高了。

到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举国上下备战气氛更加浓厚，出师北伐的声浪愈来愈高，防止泄密，对刻书出版的管理也愈益严格。嘉泰二年七月政府再次下令："应有书坊去处，将事干国

[1]《宋会要辑稿》第一六六册《刑法》二之一二五。

体及边机军政利害文籍，各州委官看详。如委是不许私下雕印，有违见行条法，指挥并抑拘收，缴申国子监。所有板本，日下并行毁劈，不得稍有隐漏及凭藉骚扰。仍仰沿边州军常切措置关防，或因事发露，即将兴贩经由地分乃印造州军不觉察官吏根究，重作施行。委自帅、宪司严立赏榜，许人告捉，月具有无违戾闻奏。”[1] 可见主战的空气越浓，兴师北伐的战鼓越紧，对版印图籍的管理也就越严了。

【1】《宋会要辑稿》第一六六册《刑法》二之一三二。

只可惜，费九牛二虎之力组织起来的十几万北伐的王师，在符离集一战，全军溃败，金兵进踏淮南，威逼宋朝必须交出抗战的主谋者，方能停战议和。宋宁宗只得杀了韩侂胄向金人求和，从此南宋更加速了自己的衰亡。与此同时，北方蒙古族兴起，与金人和西夏相互攻战，使得金人再也无力南侵，南宋王朝又得以乘隙苟安。此时对刻书出版的禁令，也不再是过去的所谓边防、军机、会要、实录等，而是禁止宣扬北伐、收复失地的文字印行，以免引起金人误会，招来交涉麻烦。所以又有臣僚上言：“国朝令甲，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近日书肆有《北征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关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华岳文字，尽行毁板。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缴纳，当官毁坏。从之。”[2] 足见这时禁印的重点，虽然还是有关时政、边机的文字，但前期禁印是怕泄密，此时禁印则是怕惹祸。所以连谈论北征和国家安全的文字也不准雕印了。这就是书籍的雕印出版随政治风云变幻而兴废的事例。

【2】《宋会要辑稿》第一六六册《刑法》二之一三八。

## 二、禁止雕印流通违背儒家经义等文书

前边说过了，宋代的任人政策是大量使用文人。其原因，先者是为了避免武将拥兵作乱，后来就是为了“以文德致治”。宋太宗的“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然终须以文德致治”的论断，可以看成是封建社会对国家施行统治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确定之

后，任人的组织路线就是决定的因素。所以宋代自建国之初起就开始用科举考试的办法，选拔统治阶级所需用的人才。但宋初的科举考试内容并不专主儒学经义，太宗时还曾对生徒考试刑律。但自真宗崇儒以来，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了。到宋徽宗时，不但贬低本朝文人的诗赋，连陶渊明、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仙诗圣，也遭到了诋毁。甚至连给皇帝歌功颂德的诗，也不敢径直称诗而改称"口号"了。"政和末，李彦章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自陶渊明至李、杜，皆遭诋斥。诏送敕局立法。何丞相执中为提举官，遂定命官传习诗赋，杖一百。是岁莫俦榜，上不赐诗而赐箴。未几，知枢密院吴居厚喜雪御筵进诗，称口号"[1]。这种连作诗都认为有害经术的倾向，反映在刻书出版上就是排斥其他一切不符合这种要求的书籍版行。

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七月二十五日，新差权发遣提举淮南西路学事苏棫札子称："诸子百家之学非无所长，但以不纯先王之道，故禁止之。今之学者程文短晷之下，未容无忤。而鬻书之人急于锥刀之利，高立标目，镂板夸新，传之四方。往往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忘本尚华，去道逾远。欲乞今后一取圣裁，倘有可传为学者，式愿降旨付国子监并诸路学事司镂板颁行，余悉断绝禁弃，不得擅自卖买收藏。从之。"[2] 这就是说，诸子百家虽各有所长，但以其不纯先王之道，遭到了禁止。那种专供晚进小生、场屋士子投机取巧的程文短晷，则更在禁印之例了。

到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六月十五日，国子监又上言："已降指挥，风谕士子，专以《语》、《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毋得复传语录，以滋盗名欺世之伪。所有进卷待遇集，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板。其未尽伪书，并令国子监搜寻名件，具数闻奏。今搜寻到七先生《奥论发枢百炼真隐》，李元纲《文字》，刘子翚《十论》，潘浩然《子性理书》，江民表《心性说》，合行毁劈。乞许本监行下诸州及提举司，将上件内书板当官劈毁。从之。"[3]

【1】[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

【2】《宋会要辑稿》第一六五册《刑法》二之四八。

【3】《宋会要辑稿》第一六六册《刑法》二之一二七。

庆元四年（1198年）二月五日，国子监又言："福建麻沙书坊见刊雕太学总新文体内，丁巳太学春季私试都魁郭明卿问定国事、问京西屯田、问圣孝风化，本监寻将案藉施。照得郭明卿去年春季策试，既不曾中选，亦不曾有前项问目。及将程文披阅，多是撰造怪辟虚浮之语。又妄作祭酒以下批凿，似主张伪学，欺惑天下，深为不便。乞行下福建运司，追取印板发赴国子监缴纳。及已印未卖，并当官焚之。仍将雕行印卖人送狱根勘，依供申取旨施行。从之。"[1]

【1】《宋会要辑稿》第一六六册《刑法》二之一二九。

同年三月二十一日，又有臣僚上言："乞将建宁府及诸州应有书肆去处，辄将曲学小儒撰到时文，改换名色，真伪相杂，不经国子监看详及破碎编类有误传习者，并日下毁板。仍具数申尚书省并礼部。其已印未卖者，悉不得私买。如有违纪，科罪惟均。从之。"[2]

【2】《宋会要辑稿》第一六六册《刑法》二之一二九。

宋宁宗是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他不但想兴师北伐，收复中原，在治理内政上也立法甚严，希图治内攘外。所以这一时期反映在对版印图籍的管理上，不但对言时政得失、边防军机的书禁印禁卖，对违背儒家经义有害士子的程文短晷，以及恣意伪作，宣扬异端的书籍，同样禁止刊行。可惜宋代统治到宁宗时已病入膏肓，他立法多、禁令严，一方面说明宋代统治者还想力挽残局，另一方面也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混乱。

## 三、禁止雕印流通妖言惑众等文书

宋代政权从建立到灭亡，始终处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中。公开的武装起义，如王小波、李顺、钟相、杨幺、宋江、方腊等领导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如火如荼；暗地里还有利用宗教制造舆论，宣传宋世的气数末劫，动摇宋王朝的统治，所以宋朝廷对这类书的禁印也非常严格。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四月十九日，中书省、尚书省勘会："近据廉（一作维）州张寿之缴到无图之辈撰造《佛说末劫经》，言涉讹妄，意要惑众。虽已降指挥，令荆湖南北路提点刑

狱司根究印撰之人，取勘具案闻奏。其民间所收本，限十日赴所在州县镇寨缴纳焚讫，所在具数申尚书省。窃虑上件文字亦有散在诸路州军，使良民乱行传诵，深为未便。诏令刑部实封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州军，仔细告谕民间，如有上件文字，并仰依前项朝旨焚毁讫，具申尚书省。”[1]

【1】《宋会要辑稿》第一六五册《刑法》二之四三至四四。

政和四年（1114年）六月二十七日，开封府奏：“太学生张伯奋状奏，乞立法禁止《太平纯正典丽集》，其间甚有诈伪，可速行禁止，仍追取印板缴纳。诏已卖在诸处者，许限一月缴纳。所在官司缴申尚书省。如违，杖一百。赏钱五十贯，许人告。”[2]

【2】《宋会要辑稿》第一六五册《刑法》二之六二。

同年八月三十日又诏：“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致此。虽非大文图谶之书，亦宜立法禁戢。仰所收之家，经州县投纳，守令类聚缴申尚书省。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应有似此不根经文，非《藏经》所载，准此。”[3]

【3】《宋会要辑稿》第一六五册《刑法》二之六三至六四。

宋徽宗是有名的道君皇帝，终日迷于声色玩乐或琴棋书画，根本不问国政朝纲。所以北宋王朝发展到徽宗时，已经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宋江、方腊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一些编造出来宣扬北宋王朝劫数的舆论，也从侧面给北宋王朝念起了丧经，弄得统治者们不得不一再下令禁刻禁印禁藏。然而正如一座大厦失去了基础，想从半空中补救是无济于事的。封建统治者们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那些现象，他们只晓得骂起义为作乱，斥邪说为惑民。殊不知这些现象的出现，正是他们的政治腐败，积弱欲摧的必然反应。所以在他们还在继续堵塞各处漏洞，妄图苟延残喘的时候，呼啦啦，大厦倾，金人大举南犯，二帝同时被俘，北宋王朝便宣告覆灭了。

有宋一代，把雕版印刷技术锤炼得炉火纯青，把刻书出版事业推向了历史的高峰，把对版印图籍的管理与国家政治、文化风尚和边塞烽火紧紧联系在一起。整个宋代，不但继承并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光辉的篇章，在技术传递和刻书出版的管理上，也给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在研

究宋代刻书出版事业时，应透过社会看刻书出版。刻书出版乱了要进行管理，禁例多了亦可看出社会的混乱。这样辩证地看待宋代刻书出版事业，宋代社会与宋代刻书出版事业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

## 第二节　宋代对图籍版权的管理

宋罗璧《识遗》卷一云："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就是说，北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以前，图籍刻印出版尚不能擅自镌刊，必须申报国子监看详批准，故盗版翻刊绝无仅有。自神宗熙宁（1068—1077年）开释此禁之后，官私刻书出版业大兴，特别是各地书坊有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书坊性质乃若后世的出版商，选题、编辑、出版、发行、零售集于一身，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就是必须盈利。为了盈利，非但有时违禁出书，有时也不择手段地盗版出书。一盗版，原出版者利益受损，便会告白于官，申请根究，乞求保护，于是产生了最初的版权意识和版权管理。其形式有自己声明不许翻版者；有自己开书坊出版自己著作，免遭他人侵犯著作权者；更多的则是申报地方相关政府机构，求其保护。

宋眉山程舍人刻印出版的《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其目录后镌有长方牌记性告白："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此为自己声明，用以昭告、预防同行翻版，从而保护自己版权的实例。

朱熹在建阳崇化开设同文书院，经营刻书出版，一是为了养家糊口，维持生存、生活的基本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避免自己著作再被别人盗印出版，从而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在建阳最初编撰《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其稿尚在推敲过程中，便被书商所获，出版发行，弄得朱熹恼怒而又无可奈何地对弟子杨

道夫说："《论语集注》盖某十年前本，为朋友间传去，乡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间多所未稳，煞误看读。"[1] "既而约其精粹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为《或问》。其后《集注》删改日益精密，而《或问》不复厘正。……黄氏曰：'朱子《集注》于一字未安，一语未顺，覃思静虑，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未已。'"[2] 他呕心沥血反复修改的这部《四书集注》，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决定进行大的修改之前，又一次被书商盗印出版。朱熹在给友人苏晋叟的信中说："《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3] 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周易本义》，也是在成书不久便被书贾窃印发卖。此为书稿正式出版前便辗转为书商窃印之实例。可见那时，特别是福建建阳地区，盗版翻刊、窃稿私印等侵犯著作权的现象，已屡见不鲜。朱熹无奈，但并未告到官署。而是自己在崇化镇也以同文书院名义开了一家书铺子，自刻出版自己的著作，从而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是朱熹的做法。其他著作者或出版家为维护个人的正当权益，则采取"申上司"、"挂晓示"等办法，保护版权。官署也承认私家书坊之"版权所有"，采取措施，维护版权人利益。

宋刻祝穆的《方舆胜览前集》四十三卷、《后集》七卷、《续集》二十卷、《拾遗》一卷，其自序后便有向两浙转运司申请版权保护的录白："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刊《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凡数书，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积岁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板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纪胜》等书为名，翻开挽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板之患。乞给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治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今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板施行。故榜。嘉熙二年十二月日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

[1]《朱子语类》卷一九《语孟纲领》，中华校点本，438~439页。

[2]［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一《淳熙论语孟子集注或问》。

[3]［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五《答苏晋叟书二》。

转运副使曾台押。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 浙江之衢州、婺州，在宋代皆书坊林立。福建建阳、崇化、麻沙，书坊更是鳞次栉比，故特申请约束这几个地区，勿使翻雕，以保护自己的版权。这里表现出来的版权意识已经相当明确。

淳祐八年（1248年）七月出版之段昌武《毛诗集解》三十卷、《学诗总说》一卷，卷前有行在国子监禁止翻版公据，曰："行在国子监据迪功郎新赣州会昌县丞段维清状：'维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诗经》而两魁秋贡，以累举而擢第春官，学者咸宗师之。印山罗史君瀛尝遣其子侄来学，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东莱《诗纪》，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足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独罗氏得其缮本，校雠最为精密。今其侄漕贡樾锓梓以广其传。维清窃惟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非惟有辜罗贡士锓梓之意，亦重为先叔明经之玷。今状披陈，乞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 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淳祐八年七月日给。" 这是南宋行在临安国子监为段维清乞禁翻版而出具的公据。罗樾执此公据，便可向两浙、福建等路转运使状告翻版之人。这又是一件宋人申请版权保护的例证。还可以举出类似的实例，但大同小异。由此不难看出，宋代不仅有了版权意识，而且有了版权保护的方式方法。尽管这些"陈乞地方有司禁约书坊翻板，并非载在令甲，人人之所必遵。特有力之家，声气广通，可以得行其志耳。虽然，此风一开，元以来私塾刻书，遂相沿以为律例"[1]。的确如此，虽然前述那些录白、声明、告示、公据，既未构成版权管理的条例，更未构成国家法律条文，但它们是人类最早的版权管理办法。表明十二三世

【1】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

纪，中国已经有了明确的版权意识，著作权人及出版者，已懂得向有司申请版权保护。至于为什么非要申报转运司，这是因为转运司有这方面的职责。宋代各路转运使司，其职权是总一路利权以归国家，并兼行州郡的官吏纠察。经度本路租税、军储；分巡所部，检查储积，审校账册，荐举贤能，刺举官吏优劣，条陈民瘼，兴利除害，劝课农业，并将收集到的情况直接报告给皇帝。实则是一路的总管。向这样的机关申请版权保护，理所当然。无疑，这是人类版权法的先声。当今，版权管理久已扩大成为知识产权管理，成了维护、激励人们创造、发明热情的根本保障。殊不知，早在八九百年前，中国人已在这方面为人类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 第九章　宋代雕版印刷术的高度成熟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以雕版印刷为主要技术载体的宋代出版业，反过来也将雕版印刷技术推向了高度成熟，同时又催生了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

## 第一节　宋代雕版印刷术的高度成熟

自初唐有了雕版印书术，迭经五代国子监的官方采用，至宋代盛行，中间经历了将近400年。特别是进入宋代以后，官私出版几乎全部采用雕印技术，因而使这一技术逐渐炉火纯青，高度成熟。

雕版印刷技术包括三道主要工序：第一道工序是写样画式；第二道工序是上版镌刊；第三道工序是敷墨铺纸刷印。如果加上折叶装订，也可称为四道工序。

第一道工序是预备性工序，但却十分重要。它的好坏决定着未来版式的面貌形象，所以讲究的出版机构和出版家，都特别重视这道工序。这道工序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依原稿内容工整地写出版样；另一部分是由画匠设计并画出边栏、界行、版心、鱼尾、象鼻、书耳等版式形象。版样写得如何，版式设计画得如何，直接关系着出版质量。北宋太宗端拱（988—989年）年间国子监校刻《五经正义》，至真宗咸平元年（998年）才校定《五经正义》始毕。而“国子监刻诸经正义板，以赵安仁有苍雅之学，奏留书之，逾年而毕”[1]。赵安仁何许人也？赵安仁字乐道，河南

【1】[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三《端拱校五经正义注》。

洛阳人。五代后周显德（955—959年）初举进士。雍熙二年(985年）登进士第。“安仁生而颖悟，幼时执笔能大字，十三通经传大旨，早以文艺称。赵普、沈伦、李昉、石熙载咸推奖之。……补梓州榷盐院判官，以亲老弗果往。会国子监刻《五经正义》板本，以安仁善楷隶，遂奏留书之”[1]。本欲出判梓州榷盐院，却奏留为国子监书写《五经正义》版样，原因为何？原因就是他长于书法，善写楷隶。楷隶者何？楷隶，即楷书又带有隶意的字体。《御定佩文斋书画谱》曰：“瘗鹤文非少逸字，东汉末多善书，惟隶最盛。至于晋魏之分，南北差异，钟、王楷法，为世所尚。元魏间尽习隶法。自隋平陈，中国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有楷隶笔。”[2] 正说的是这种楷隶相间的字体。中国主要指中原一带，赵安仁生于斯，长于斯，做官于斯，遗风渐染，故善为楷隶。由他来为国子监出版《五经正义》操笔写样，不难想象宋代国子监首刻之《五经正义》是多么的端庄厚重而又秀美多姿！其字体楷中兼隶，铁画银钩，藏锋蕴力，令人看了当倍长精神。宋代刻书，非但国子监注意书手写样，就是民间刻书也很注意延聘书家写样。廖莹中世彩堂刻韩、柳集，其书写字体似欧，既端庄又秀美。唐仲友在台州刻《荀子》，以北宋监本为祖本，用能刻伪楮币版的犯人蒋辉操刀，其书之端庄隽美可想而知。所以此书版片后来归了行在国子监，再印便成了南宋国子监本。

还有就是描绘版式，这是画匠的职责。他们要根据出版者的意愿，设计出版式行款及每行大小字数，每半版总计字数，还要设计版框大小、边栏样式、版心鱼尾，乃至于牌记形式、所在部位。草图有了，然后画出笔直粗黑的外框边栏，细致匀净的左右内线边栏或四周内线边栏，画出细直匀称的界行，绘好鱼尾及相关标识符号图样，这一叶才算基本完成。若有插图，还需设计位置、形式，临摹或创作描绘在版样稿纸上。这一切都准备停当了，才能翻过来贴在事先预备好的版片上，操刀镌刻。因为刻出来的版面，唯有字是反字，图是反图，画是反画，刷印出来的书叶才一切是正的。所以明朝司礼监刻书，光画匠就有76名。清朝

[1]《宋史》卷二八七《赵安仁传》。

[2]《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八《瘗鹤铭》。

武英殿修刻书处设有书作和刷印作。书作司界划、托裱等职；刷印作管理写样、刊刻、刷印、摺配、装订等职。另设书匠、界划匠、平书匠、刷匠等匠役若干，分办各作之事。这些虽是明、清时的设置，但反映的是环节性实际工作，人数可以有多寡，但什么时候环节也不可或缺。

版式描画以及文字书写都完成了，第一道工序，即版样书、画也就算完成了。而后才能进入第二道工序，即雕版镌字阶段。其实远在雕版刻字之前，还有一个备木开板过程。从唐以来，刻书镌板之木多取梓木，故出版又称为付梓、梓行。后来发展则多用梨、枣，故出版又称付之梨枣、授之梨枣。书无价值还要出版，就称为徒费梨枣，滥用楮墨。宋代刻书镌板已多用梨、枣，取其木质硬，刻出来的笔划、线条清晰耐磨，刷出来的印纸也就清晰匀净秀气。福建书坊为牟取暴利，据说有用榕树开板镌字的，取其便宜、松软、易成、速售。但其字迹笔画有的根本立不住，加之容易磨损，所以刷出来的印纸划肥字胖，毫无精神。当然，即或是好木硬木，也很讲究砍伐季节和背干情况。曝干易裂，不干易翘。必须完全背干，去其烈性，再开板镌字，则平而不翘，整而不斜，刷出来的印纸才严整精神。刻书版片准备好了，版样也写好了，下边就看刻字工人的手艺了。

早在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依据中书门下省刻《九经》印版的请示，明宗李亶便“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1]。表明唐、五代时社会上已有专门从事刻板的“雕字匠人”。他们是自由职业，可以受雇于任何人，为人佣工，开板镌字。至宋代，巴蜀、两浙、江右、福建等地都有大批刻字工人，他们在一定地域内游动佣工，为出版者雕版镌字。其中尤以杭州、绍兴、婺州、明州等两浙东路地区，出良工为多。他们技术娴熟，操刀如走笔，表现出良好的镌刻艺术素质。刻字镌画，其笔划、线条都很讲究流畅。一撇一捺，一竖一勾，左提右弯，不但要求刻字工人如实反映书手画工的原

【1】[宋]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经籍》。

意，还得为书手画工的败笔做挽救工作。今天我们评论某篆刻家的作品，不仅看他篆字的间架结构，还要看他的刀法是否也能笔走龙蛇而富于动感。那时雕版镌字，也很讲究刀法。跟写字一样，潇洒的一撇，速出的一竖，稳健的一横，甩出的右勾，均见刻手的功力。行刀稍有迟滞，这一笔便死无生气。我们看宋版书，特别是好的宋版书，如廖莹中世彩堂刻的韩、柳《集》、陈起书籍铺刻的唐宋人文集、眉山地区的蜀刻唐人文集、浙刻《荀子》、周必大吉州刻本的《文苑英华》、苏诩筠州公使库刻的苏辙《诗集传》、福州开元寺刻的《毗卢大藏》、建安黄善夫家塾之敬室刻的三家注《史记》、《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建谿蔡梦弼东塾刻的二家注《史记》、余仁仲万卷堂刻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等等，不但字好，刻工刀法也好。玲珑剔透，一丝不苟。完全反映出宋代开板镌字这道工序已十分精熟。

敷墨覆纸刷印是第三道工序。这道工序当由黑墨匠和刷印匠配合完成。宋代制墨业十分发达，张邦基云："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陈瞻、张谷名振一时之后，又有常山张顺、九华朱觐、嘉禾沈珪、金华潘衡之徒，皆不愧旧人。宣、政间如关珪、关瑱、梅鼎、张滋、田守元、曾知微，亦有佳者。唐州桐柏山张浩制作精致，妙法甚奇。"[1] 有的还被内府雇去造墨，如李世英造德寿宫墨，叶邦宪造复古殿墨，刘士先造缉熙殿墨，便是实例。宋代不特墨工造墨，士大夫亦喜藏墨、品墨，乃至造墨。司马光藏墨至数百斤，苏东坡搜藏有七千铤。苏氏本人在儋耳令潘衡所造的墨，铭曰："海南松烟，东坡法墨。"造墨的基本材料是松烟或桐油的油烟，宋人尤贵黄山松，故徽墨最为有名。沈括又创用延安一带的石油烟煤造墨之法，名曰"延州石液"，且"黑光如漆，松墨不如"。宋代这种精良的造墨工艺，也是雕版印刷技术高度成熟的必备条件。有好墨固然重要，但印刷用墨靠墨砚相研恐怕不行，得靠调制成汁才好受用。所以古时刷印作中的黑墨匠，主要职责盖是调制稀稠适用的墨剂。稠了印不好，稀了四处湮，必须适度才能刷印。中国墨的特点是不变色，不褪色，一经写、印

[1]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

纸上，一两千年仍漆黑发光，且遇水亦不湮染。

有了质量好且浓淡适度的墨，剩下的环节就是刷印了。古时刷印匠的工艺有三个方面要掌握：一是敷墨要匀，在一块书版上不能这儿墨多那儿墨少，这儿稠那儿稀，那样刷出来的印张，字迹就会显得深浅不一，浓淡不一，成了花脸。必须涂墨均匀，刷出来的印纸才墨色一致，显得干净整洁。并且在多块书板上敷墨都要保持均匀，印纸之间才能墨色一致。若是这块板墨重，那块板墨轻，刷出来的印纸墨色就会很不一致，也影响书的品位。所以刷印工首先要掌握的，是敷墨手法和工艺。二是覆纸要正，上纸不正，刷出来的印纸板框行字就会歪斜，那就是废品。必须覆纸快且正，才能保证刷出来的印张是成品。三是刷印力度要匀称适度。敷墨覆纸后就差一刷，这一刷也很要功夫。用力不匀，印纸着墨程度就不同。用力大的地方，墨色会湮透纸背；用力小的地方，墨色又会显得淡薄不实。因此刷印时必须掌握用力技巧，务使印纸着力均匀，墨色一致。这方面，宋代所表现出来的刷印工艺也高度成熟。

最后一道工序是装订，这要摺配匠与裱褙匠默契配合。装订虽是印刷以外的环节，但也是出版当中必经的步骤。装订不仅是收拾印好的书叶以成册，便于典藏和阅读，亦有如为人梳妆打扮，是典雅还是低俗，是大方还是小气，书品之格调，装帧要负很大责任。所以古人于书籍装帧也单要配备摺配与裱褙两方面的工匠来加以保障。

另外能表明宋代雕版印刷技术高度成熟的实例，就是宋代已掌握雕版套印楮币的技术。朱熹于南宋孝宗淳熙八、九年(1181—1182年）曾出任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当时浙东大旱，百姓民户流移，朱熹巡检至台州，发现台州知州唐仲友贪赃枉法，欺害灾民，连上六状举告唐仲友。其中第六状第四款，谈到他窝藏因私自刻印会子（纸币）而发配台州牢城的犯人蒋辉，继续为自己雕版印制假会子的罪行。状称：“仲友使三六宣教令辉收拾作具入宅，至后堂名清属堂安歇，宿食是金婆婆供送饭食。得三日，

仲友入来，说与辉称：'我救得你在此，我有些事问你，肯依我不？'辉当时取复仲友：'不知甚事，言了是。'仲友称说：'我要做些会子。'辉便言：'恐向后败获，不好看。'仲友言：'你莫管我，你若不依我说，便送你入狱囚杀。你是配军，不妨。'辉怕台严，依从。……次日，金婆婆将描模一贯文省会子样入来，人物是接履先生模样。辉便问金婆婆，言是大营前住人贺选在里书院描模，其贺选能传神写字，是仲友宣教耳目。当时将梨木板一片与辉。十日雕造了。金婆婆用藤箱子乘贮入宅，收藏。……至十二月中旬，金婆婆将藤箱贮出会子纸二百道，并雕下会子板，及土朱、靛青、棕、墨等物付与辉，印下会子二百道了，未使朱印。再乘在箱子内，付金婆婆将入宅中。至次日，金婆婆将出篆写'一贯文省'并'专典官'押三字。又青花上写'字号'二字。辉是时方使朱印三颗。……至十二月末旬，又印一百五十道。今年正月内至六月末间，约二十次，共印二千六百余道。"[1] 这段文字不仅说明那时雕印会子需要套印，其中的面值、专典官及字号还必须雕成一组一组的活字，以便同一票面印制不同的面值。从这个角度讲，雕刻活字而印制纸币的技术久已有之。

宋代缺铜铸钱，四川地区便以铁铸钱。但铁质过重，故"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2]。于是民间用雕版刷印楮币"交子"。但很快暴露弊病，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便于益州立"官交子务"，发行交子。南宋铜钱铸造剧减，楮币发行剧增。其中有一种楮币叫东南会子，也称行在会子或京会，行于铜钱区。绍兴末年，行在临安禁私营便钱会子，"夺其利以归于官"，发行官会子。初由临安府掌管，旋即归隶户部。至孝宗隆兴（1163—1164年）初，官会已有一贯、五百、三百、二百文几种面额。既禁私印，则私印者即是犯罪。从古至今，凡伪造货币，必是私仿官币，即官币什么样，私者必尽力模仿，以便以假乱真，妄图行用或转卖。因而私币的模印技术，更反映着官行真币雕印技术的高超。因为任何真币都得在图案、花纹、印色、面额、编号、官印等方面做防伪处置，否则不堪设想。唐仲友强令蒋辉为其雕版

[1]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九，明嘉靖刻本。

[2] [宋]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

伪印会子，其人物像、面额、官印便是贺选在里书院描模的。至于金婆婆送来的土朱、靛青、椶、墨，则是印刷的材料和工具。土朱，显指红的印色；靛青，则指蓝青的印色；墨，则指黑的印色；椶，则指棕刷。可见唐仲友伪造的东南会子，是红、蓝、黑三色套印的，说明他仿印的母币——真官会，当然也是红、蓝、黑三色套印的。这在雕版印刷术上显然是一大进步，表明这种技术已高度成熟。如能套印楮币，当可分辨图案、花纹，故意复杂其印技，以便防伪。可想，有如此成熟的雕印技术来承担图书的出版，出版的图籍其工艺何以不精湛！出版业何能不兴盛发达！反过来，宋代兴盛发达的出版事业，又何能不带动雕版印刷技术更加炉火纯青！所以宋代的出版业在各方面都为后世留下了可以遵循的轨迹。

## 第二节　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什么技术都一样，发展到高度成熟、炉火纯青的时候，其自身所固有的优长最容易充分显示，但其弱点也更容易充分暴露，因而也就埋下了否定自己的基因。雕版印书比用手写书、抄书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写书或抄书，一次只能抄写一部，劳师费时，而且容易出错。雕版印书就优越多了，一种书只要雕一套版，要印多少可以从心所欲。而且木板经久耐用，保存得法，多少年后仍然可以洗板刷印。但雕版印书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那就是一种书必须雕一套版，一套版只能印一种书，它只能在一种书的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刻一套版，劳师费材，工本极大。刻一部《开宝藏》，就得13万版。国子监刻经、传、正义也要10万版。何等惊人的规模和耗费！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宋人面前重大的技术创新课题。事实证明，勤劳智慧的宋朝人民，用他们的伟大实践响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了又一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就是布衣毕昇发明的泥活字排版印书法。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门》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1042—1048年）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溶，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灰烧之，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溶，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宝藏。"

沈括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卒于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享年65岁。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进士。曾参与王安石变法。晚岁知延州，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元丰五年（1082年）以徐禧失陷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连累坐贬。这一年他才51岁。先是坐贬均州团练副使，元祐初，到润州居住，居润八年而卒。这就是说，他退居润州，筑梦溪园（今江苏镇江东郊），是在他57岁那一年，即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在遭贬的八年中，他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也就是说，《梦溪笔谈》是1087—1095年之间写成的。沈括曾提举司天监，改制浑仪、景表、五壶浮漏等仪器。又招卫朴造《奉元历》。于天文、地理、化学、生物、音乐、律历、医药、典制等，都较在行，也很感兴趣，是封建社会士大夫中比较重视科技的人物。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引起他的重视，写入他的著作，顺理成章，十分可信。

《梦溪笔谈》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排版印书法的记载，一共300字。"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

已后典籍皆为板本”。这显然是对泥活字印书法发明背景的交待。没有这个雕版印书法盛行的背景，谁怎么能凭空想出来活字印书法呢？正是因为盛行的雕版印书法暴露了自身固有的缺点，人们才想起要改进它，改变它。怎么改变？这就为科技创新家提出了思考的课题，提供了思维的空间。任何一项科技发明，都是思维与实践完美结合的结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背景是起因，创新是结果。所以沈括开头便用27个字交待背景。“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庆历”是北宋仁宗的第六个年号，正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1]的年代。这是对时代背景的交待。没有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科技是难有发明创造的。“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这是交待毕昇的制字材料和制字方法。材料是胶泥，方法是在其平正的一端刻字，字的笔划深浅则“薄如钱唇”。最近有异国学者，故意曲解“薄如钱唇”，并亲自实验，制出一版“薄如钱唇”的泥字，用火去烧，未能成功，于是便心怀叵测地结论：毕昇泥活字印书法的发明是失败的。这纯属歪曲。“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这是完整的一句话。前者交待毕昇是以“胶泥刻字”，后者紧接着便说明在胶泥平正一端所刻字划的深浅“薄如钱唇”。钱唇者何？钱唇就是钱边儿。宋代铜钱有大铜钱、小铜钱。面额大份量重，其钱就厚就大。字划深浅，包括木板上的刻字，其实真与大铜钱钱边儿厚薄相仿。“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是接着前边“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这句话继谈制字方法的。“每字为一印”，是说所刻之字是有字身的，字身高度虽未作说明，但没有一定高度也就不能跟玺印那样称为一颗一印了。所以这“每字为一印”，乃是为了区别玺印多字为一印而特别强调此是一字为一印。因而这“一印”之义，便是一颗印之意。下面是谈排版、固字、印刷、虚字常用多备、印少不简易、印多才神速、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以及用纸粘贴每印无字一端，注明该印之字，然后分韵藏入木格等诸环节，令人感觉到毕昇发明的泥活字排版印书法，除了尚显古拙原始外，其在工序原理上已与后世铅字排印没什么多

【1】[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大区别。而在他之后四百年，德国谷腾堡才掌握活字印刷法。这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又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的伟大贡献。毕昇之后不久，其法传入西夏，为西夏人所发扬光大。南宋则有名相周必大、元初名臣姚枢先后实践过。直到清代，还不断有人践用此法而印书。当今，根据沈括《梦溪笔谈》所记北宋毕昇制字、排版、印刷技术，制成了新的泥活字，并用它来排版印制了新的样书，进一步用实验和实践验证了当年毕昇泥活字排版印书法的可行性和可信性。

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是原理、原创性的发明，其后海内外相继出现的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铁活字、铅活字排版印书法，虽然每一新法在排版、印制等方面也都克服了不少困难，解决了不少技术上的难题，但不管怎么说，那只是制字材料上的更新和改进，并不是原理性的发明，不属原创之功。有人故意将某种制字材料更新说成是发明，那是小题大作，是另有别的想法。平心而论，不管哪种材料制成的活字，其排版印书的真谛，都不出最初泥活字印书法的原理。

当我们将宋代出版业的方方面面描述后，几道史的轨迹已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一是宋代出版者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官刻私雕共同发展的格局贯彻始终，为其同时的辽、西夏、金，为其以后的元、明、清，开创了出版业的模式与格局。二是知识不据为私有，而是资源共享，公诸同好，以广流传，嘉惠学林，这种出版思想尽管有时也难免流于口号，但毕竟是出版者不能不高扬的旗帜。这一点影响到元、明、清。三是官方出版行教化，重经、史；坊刻看销路，重实用，应世需。这也深深影响到元、明、清。四是对出版流通管理的原则，不离稳固政权，不离稳定社会秩序，不离尊经崇儒，不离正面的社会教化。这也深深影响其后的元、明、清三代。还可以归纳出若干细节，主要的大概就是这几点。中华民族有个优良的传统，这就是它的承传性。反映在出版活动中，宋代出版的若干范式，也多为后世所承传。这就是我们研究两宋出版史所得出的结论。

# 第十章　辽代出版事业的概况

## 第一节　辽代图籍出版的社会背景

辽是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政权。契丹族，是长期以今辽宁省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为活动中心的古老民族。这个民族，很长时期以来就是由八个部落组成，各部落共同选出一个可汗作首领，每三年改选一次。公元907年，即唐哀帝李柷天祐四年，也就是李唐王朝的最末一年，亦即五代后梁开平元年，耶律阿保机当选为八部落可汗，成了契丹族的领袖。他突破了这个民族传统的选举制度，一直占据着可汗的宝座。到公元916年，即五代后梁贞明二年，阿保机索性预谋杀害了各部落的首领，自己公开做了皇帝，建立了契丹国，并且以皇位世袭制代替了可汗选举制。阿保机就是历史上的辽太祖。至辽太宗耶律德光时，又建国号为“大辽”。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983—1012年）年间又改称“大契丹”。辽道宗耶律洪基咸雍二年（1065年）以后又复称“大辽”。

契丹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以游牧和渔猎为主要社会生产活动的民族。阿保机建国号之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便随着汉化的过程急剧发生变革。阿保机任用一批汉人作他的政治顾问，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汉族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向汉人学会冶铁、种田和其他生产技术。对于从中原过去或掠去的汉人也不再

作为奴隶，而是将他们安置在乡村或城镇，让他们从事农业或手工业生产。在官制上也采取南院、北院分治的办法。南院官统治汉人，管理州县租赋军马等事，由汉人和契丹人充任。北院官统治契丹人和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都由契丹人充任。阿保机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国势很快兴盛起来，有力量四出征讨，扩大领域。故辽在最兴盛时期，领有东到日本海，西抵阿尔泰山，北到克鲁伦河，南至今河北省雄县一带的广大地区，是当时亚洲东部强大的帝国之一。

辽景宗耶律贤保宁十一年（979年）和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四年（986年），辽军两次大败宋兵，终于在统和二十二年，即公元1004年，辽宋签订澶渊之盟。辽每年可从宋取得大量银、绢，宋真宗还得称辽的萧太后为叔母，并与辽圣宗兄弟相称，以此换取了与辽政权并存及相对和平的局面。此后，宋在边境开辟榷场，用茶叶、丝织品、麻布、粳糯、瓷器、图书、犀角、象牙、香料等产品，换取辽的羊、马、骆驼和皮毛。这种互市的发展，加强了契丹与宋的联系，丰富了契丹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至于契丹人学习汉族文化的事例，则始自辽太祖时代。而辽代的刻书出版事业也多在这个汉化的过程中逐步发展。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号为大辽。是年春天，辽太祖阿保机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彻底改变契丹族固有的可汗选举制，代之以汉人教给他的帝位世袭制。“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1]。这段记载说明三个问题：一是表明契丹人本有“事天敬神”的思想基础，故做了皇帝便认为是奉天承运，君权神授，要问明祀之谁先。二是“皆以佛对”，表明契丹人有奉佛的群众基础，有信佛的社会习俗，否则不会都说先祀佛。三是太子力排众议，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故宜先祀。结果是太祖大悦，立即诏建孔子庙，命太子春秋释奠。这表明辽人也是奉以孔子为首的儒学

[1]《辽史》卷七十二《宗室·义宗》。

为官方哲学的。这一年即神册元年（916年）。表明辽代立国伊始便有崇儒、奉佛的社会基础。

“神册三年（918年）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四年……秋八月丁酉，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1]。表明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辽代政权，辽太祖在崇尚儒术的同时，亦颇为尊崇释、道两家。皇帝谒孔子庙，皇后、皇太子分谒佛寺、道观，显然是以儒家为主，以释、道为辅的统治思想。这比北宋真宗在撰《崇儒术论》的同时，又著《崇释论》，主张三教归一，儒家为主，释、道为翼的思想还要早。这一年，辽太祖还在上京设置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等官领之，开始培养人才。

【1】[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肇兴》。

契丹族原无文字，有事便以刻木为约。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未几成，颁行之。陶宗仪《书史会要》云：‘辽太祖用汉人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2] 这是契丹人建国之后采取的一项重大文化措施，目的在于提高整个契丹族的文化素质。

【2】[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肇兴》。

上述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实施，为辽代刻书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 第二节 辽代图籍的出版概况

“契丹建国之初，以鞍马为家，太祖阿保机经略方内，未遑艺文之事。逮东丹王监抚东藩，始好典册。德光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制度渐修。至圣宗与宋盟好，科目日隆，雅辞相尚，一时以文学名者，如王鼎、张俭、萧韩家奴、耶律孟简之流，斐然成章”。这是陈述先生在《辽文汇序例》中对辽代文化事业起步、渐进和发展的概括。这段概括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辽代社会演进的史实，也是我们研究辽代刻书出版事业发展状况可以遵循的轨迹。事实表明，辽代的雕版印书，从辽圣宗耶律隆绪，到辽道宗耶律洪基这一百余年间较为发达。这也可以说是对陈述

先生前边那段概括的科学反馈。

“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因此僧徒纵恣，放债营利，侵夺小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1]。这是北宋苏辙出使辽国之后，写给北宋皇帝的奏章之一。苏辙头脑清醒，洞察北方的社会风情。指出“北朝皇帝好佛法”修寺纳僧而造成的弊端，认为“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所以才上书言事，陈述利弊得失，供朝廷参考。然而在这里引用这段文字，并不想褒扬苏辙其人，而是因为他这道札子，反映了一个史实，解释了一种社会现象。这就是迄今所知辽代刻书出版为什么释藏佛经为多。皇帝好佛，群臣答谁祀为先亦“皆以佛对”，表明以皇帝为首的上层人物确实崇信释教。上行则下效，自然会形成社会风气。辽代公、私之所以雕印佛经和与佛教有关的书籍为多，实为风气使然。

[1] [宋]苏辙:《栾城集》卷四十一《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

## 一、《辽藏》的雕印出版

辽自圣宗统和元年至道宗清宁十年（983—1064年）的82年中，尝以“契丹”为国号，故《辽藏》又称为《契丹藏》。《契丹藏》在我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大藏经》，但由于过去未见实物流传，谁也难以言状。1974年7月，于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四层主像——释迦牟尼像腹内，发现了12卷《契丹藏》，为我们考证《契丹藏》的版印情状，提供了实物证据。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木结构佛塔，故又习惯称为应县木塔。应县木塔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规模宏伟，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瑰宝。这12卷《契丹藏》分别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七》，东晋天竺佛陀跋陀罗译，《千字文》编号为“垂”，每纸27行，行17~18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四》，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六》，唐实叉难陀译，《千字文》编号为“爱”，以上两种每纸28行，行15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

五十一》，唐实叉难陀译，《千字文》编号为“首”，《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图21），姚秦鸠摩罗什译，《千字文》编号为“在”，每纸28行，行17字；《称赞大乘功德经卷第一》，唐玄奘译，《千字文》编号为“女”，每纸28行，行16~17字；《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译，《千字文》编号为“靡”，《大方广佛报恩经卷第一》，《千字文》编号为“欲”，以上两种每纸27行，行17~18字；《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东晋罽宾三藏瞿昙译，《千字文》编号为“清”，每纸27行，行17字；《阿毗达摩发智论卷第十三》，唐释玄奘译，《千字文》编号为“弟”，每纸27行，行17~18字；《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中印度沙门法天译，《千字文》编号为“刻”，每纸27行，行17字；《一切佛菩萨名经卷第六》，《千字文》编号为“勿”，每纸28行，行12~21字。

就版式而言，其中绝大多数为四周单边，少数上下双边。而现存《开宝藏》则每纸23行，行14字。两者版式行款截然不同且

图21
辽刻《契丹藏》本《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同经的译者、卷数也很不相同。而勘以直接覆刻《开宝藏》的《赵城金藏》，则知《契丹藏》前480帙忠实于《开元录藏》，而与《开宝藏》前480帙迥然有别。可证，《契丹藏》并不来源于《开宝藏》，而来源于唐代的《开元录藏》；上述《契丹藏》的款式、经文也反映的是《开元录藏》。在汉文《大藏经》的历史上，《契丹藏》的价值和地位应高于《开宝藏》。

"关于《契丹藏》雕印年代，国内外专家众说不一。叶恭绰先生《历代藏经考略》以为'约为兴宗（1031—1045年）迄道宗时（1055—1064年）'。木塔发现的《契丹藏》中，《称赞大乘功德经》卷尾题记云：'燕台圣寿寺……时统和贰拾壹祀癸卯岁季春月蓂生五叶记，弘业寺释迦佛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四人同雕。'可以推知《契丹藏》是在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983—1012年）年间用汉字书写雕印于辽的南京（今北京）。又据此经编号为'女'字，在《千字文》中为一六一，则卷一至卷一六〇应雕印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之前。又十二卷《契丹藏》无一避讳缺笔，同时发现之其他辽刻经，如辽圣宗统和八年雕印的《上生经疏科文》和太平五年（1025年）雕印的《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均无避讳缺笔，而辽道宗咸雍七年（1071年）雕印的《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则'光、明、贤、真'四字避讳缺笔。这是否也可以说明，辽圣宗时不避讳，辽道宗时避讳。而不避讳的《契丹藏》正是书写雕印于辽圣宗时期，不会晚至辽道宗时期。总之，《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仅晚于《开宝藏》，而早于国内其他任何《大藏经》"[1]。这段较为精当的考证，是阎文儒、傅振伦、郑恩淮三学者在他们共同发表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一文中发出的议论。这段议论解决了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契丹藏》的种种推测，明确回答了《契丹藏》雕印年代即辽圣宗时期的问题。故直接引用来，借之以表明我们对《契丹藏》雕印年代的看法。

但据专家考证，这只是辽代雕版印制的第一部《契丹藏》，

【1】阎文儒、傅振伦、郑恩淮：《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文物》，1982(6)。

可以称为《统和藏》。全藏共505帙，包含《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全部480帙，及《续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的266卷、25帙。山西大同（辽金称为西京）华严寺薄伽藏殿内现存有金大定二年（1162年）段子卿撰写的《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碑刻一通，文曰："异哉佛教化若此以大兴，教之简牍亦从而浸广，故纂成门类，即造颁宣……至大唐咸通间，沙门从梵者集成《经源录》以纪续之。其卷帙品目、首末次第，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可使后人易为签阅。尔及有辽重熙间复加校证，通制为五百七十九帙，则有太保大师《入藏录》具载之云。"这是说辽兴宗于重熙间（1032—1055年）又对统和藏重新校证，厘为579帙，雕版印造。这部《契丹藏》比《统和藏》多出74帙。太保大师的《入藏录》就是这部大藏的入藏目录。北京《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中镌有"燕京右街检校太保大卿沙门觉苑"之名。觉苑本人所撰《大日经义释觉演密钞序》中自己落款衔名为"燕京圆福寺崇禄大夫检校太保行崇禄卿总秘大师赐紫沙门"。可知参加复校并撰《入藏录》的太保大师就是觉苑。清宣统二年（1910年）刊本《畿辅通志》卷一五〇所记《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作者志延，曾于辽大安九年（1093年）又撰《陈宫山观鸡寺碑记》，其落款衔名为"燕京右街天王寺讲经律论前校勘法师"，可知志延也参与了这部大藏的校正工作。因推知《重熙藏》亦当版刻于北京。朝鲜《东文选》卷一二〇有高丽僧密庵《丹本大藏庆赞疏》一文。说"念兹大宝，来自异邦，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殆非人功所成，似借神巧而就"。可证《重熙藏》应是狭行密字的方册本。

1976年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丰润县城西南天宫寺塔被震歪。修整时，于7、13层的两个塔心室内发现了辽刻《契丹藏》数册。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卷，黄绫函套。每册长26.5厘米，宽17.5厘米，厚4厘米。内有"时重熙十一年岁次壬午孟夏月甲戌朔雕印记"。《一切佛菩萨名集》，长26.8厘米，宽15.7厘米，厚5厘米。内有"皇朝七代岁次癸巳重熙二十有二年"年款。《大乘

妙法莲华经》八卷，长31.5厘米，宽19厘米，厚8.5厘米。内有“弘法寺都勾当诠法大德沙门云矩提点雕造，天王寺文英大德赐华沙门志延校勘，时咸雍五年十月十五日记”落款。《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三卷红绫函套，长26.5厘米，宽15.5厘米，厚4厘米。有“咸雍六年十月奉宣雕印”款，为蝶装方册式。证实了上述推测，即辽重熙——咸雍间所刻大藏，的确亦开雕于辽之南京，也就是今北京的早期出版物。

关于统和《契丹藏》的刻印地点，同关于《契丹藏》的刻印年代一样，过去谁也不大说得清楚。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12卷《契丹藏》和其他辽代刻经，也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例如《千字文》编号为“女”字的《称赞大乘功德经》卷尾，镌有“燕台圣寿寺……时统和贰拾壹祀癸卯岁季春月蓂生五叶记，弘业寺释迦佛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四人同雕”题记十行。不但透露出雕印出版时间，也透露出雕印出版地点和雕印人。燕台即指辽的南京，也称燕京，就是今天的北京。南京是辽的五京之一，虽非辽的首善之区，但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实际它是辽代五京中最发达的一京，也是辽代实际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且处于辽与北宋的交汇处，易于接受宋的影响，故刻书出版也较为发达。“辽在燕京设有印经院，专门从事刻经”[1]。这说明《契丹藏》的雕印很可能由印经院主持，由于是大藏，各经可能聘请不同人书写上版，召集不同的刻字工匠开雕。这卷《称赞大乘功德经》，则是聘请燕京弘业寺释迦佛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写，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等四人操刀雕造。应县木塔佛腹内发现的辽刻《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卷首扉画右上角有“燕京雕历日赵守俊并长男次弟同雕记”字样，因知赵守俊是燕京有名的刻工。历日就是历书，雕印历书历来是政府很重要的活动，赵守俊以雕印历书知名，而又应召参与《契丹藏》及其他佛经的雕印事宜，足见《契丹藏》当是出自燕京的名工之手。在相距仅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北京居然雕造了两部《大藏经》，可见北京当时刻书出版之盛。《契丹藏》

【1】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山西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山西省雁北地区文物工作站、山西省应县木塔文物保管所：《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辽代珍贵文物》，《文物》，1982(6)。

的刻印年代与刻印地点已如上述，故《契丹藏》问世之后影响颇深，前后有各大寺院集资刷印构藏，以充供养。大同华严寺为重熙七年（1038年）九月建造，其中庋藏统和《契丹藏》505帙。到金兵攻打大同时，殿阁楼观化为灰烬，《大藏》虽然幸存，经本亦损失过半。金初又依照《辽藏》目录，采集遗经，花了三年工夫才修补完毕。其卷轴式样，新旧不殊，字号诠题，先后如一[1]。

沙门"志智，字普济，国舅大丞相楚国王之族……年二十四，重和十三年（1044年）也，公主为师陈言乞戒，兴宗御批，许登戒品……师素蕴大愿，欲营大刹一区，而胜处未获。且先如法造经一藏，止以燕都。随缘诱化，旬月之间，费用充足。凡役匠厘事，各给净□斋戒随酬价□言者……以糯米胶破新罗墨，方充印造。白檀木为轴，新罗纸为幖，云锦为囊，绮绣为巾，织轻霞为条，斲苏枋为函。用钱三百万，谈笑之间，能事毕□。在后安厝于寺中。适值天火焚寺，□□间运经于阡陌，即日无暇收寘。火后遍语诸人，请经还寺，惟欠《般若》一轴，卒难询访。月余，有村翁梁永於惠济寺道周之左，获经一卷，如神力所策，直□师前拜纳，即所失之经也……□清宁五年，大驾幸燕，秦赵长主首参大师，便云弟子以所居第宅为施，请师建寺"[2]。妙行大师志智，是辽室皇族，于建寺之前，先募钱三百万造印藏经一部，收贮在燕京。并用糯米胶调和朝鲜墨，采用高丽纸，并以白檀木为轴，云锦为囊，绮绣为巾，织轻霞为条，斫枋木为函，足见是一部纸墨精良、装帧讲究的大藏经。惟不知妙行大师这次刷印的是统和《契丹藏》，还是另行雕版印刷的新藏。不过从文中所说"谈笑之间，能事毕□"看，似不会是新雕。新雕《大藏经》版，要到咸雍四年（1068年）才完成，"谈笑之间"无法竣事。故妙行大师所印造者，最大的可能仍是统和《契丹藏》。

"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有寺僧潜奥与悟开上人，鸠集净财，缔结信士，与邑人尹节、李敬、张士禹、高耸等购经一藏，用广流通。二十四年（1055年），建九圣殿以龛置焉"[3]。这是潜

[1] 张民：《辽金夏刻书简史》，台湾出版《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集续编》。

[2] 陈述：《辽文汇》卷八。沙门即满乾统八年撰：《妙行大师行状碑》。

[3] 陈述：《辽文汇》卷八。耶律劭撰：《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铭并序》。

奥与悟开等集资请的一部《大藏经》，藏于九圣殿，也该是统和《契丹藏》。九圣殿当在中京道兴中府安德州（今辽宁朝阳县东南）灵岩寺内。灵岩寺创建于耶律延禧乾统八年（1108年），盖先有殿后扩建成寺。

“旸台山者，蓟壤之名峰；清水院者，幽都之胜概……虽竹室华堂而卓尔，而琅函宝藏以蔑如……今优婆塞南阳邓公从贵，善根生得……咸雍四年（1068年）三月四日，舍钱三十万，葺诸僧舍宅……乃罄舍所资又五十万，及募同志助办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创内外藏而龛措之”[1]。清水院就是现在北京西山的大觉寺，今天游览大觉寺，还可看到旸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的著名辽碑。邓从贵舍资及募同志助办印造的这部《大藏经》，便是重熙—咸雍再刻的《契丹藏》。高丽于“咸雍七、八年来贡，十二月，以佛经一藏赐徽”[2]。徽就是高丽朝文宗王名。《高丽史·世家》亦载文宗“十七年三月丙午，契丹送《大藏经》，王备法驾，迎于西郊”。有接有送，证明《契丹藏》当时已传入朝鲜。辽再刻《契丹藏》完成于咸雍五年（1069年）。高丽来辽进贡是咸雍七、八年，因此所得经藏亦当是重熙—咸雍藏。前边所引高丽僧密庵“念兹大宝，来自异邦，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之说，指的就是此藏。后来朝鲜又依据《契丹藏》开雕为《高丽藏》，再传入中国，中国也校勘颁行。《辽史·道宗纪》记载大康九年十一月“甲寅，诏僧善知雠校高丽所进佛经，颁行之”便是明证。

大安五年（1089年）撰著的《安次县祠垡里寺院内起建堂殿并内藏碑记》称辽“国家尊居万乘，道贯百王。恒崇三宝之心，大究二宗之理。处处而敕兴佛寺，方方宣创精蓝……燕京析津府安次县长寿乡西南隅一小墅也，名曰祠垡里。田园靡广，人物非稠。其间虽有祇园，惟存旧址。前有古殿一座，然用柱石，全乏梁栋……后有宽闲之地，内乏立像之堂。（刘）惟极等遂诱多人，同集上善……玖于当院特建东西堂二座，正位殿三间，于大安五祀春三月启土……日往月来，堂殿方成，远而视者如云住

[1] 陈述：《辽文汇》卷七。沙门志延咸雍四年撰：《旸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

[2]《辽史》卷一一五《二国外记·高丽》。

空，近而瞻者从地涌出……更于殿内复建内藏一所……内置千帙之教，后留万载之名"[1]。这里的"千帙之教"指的就是藏经。是什么藏，也可能就是重熙——咸雍《契丹藏》。也就是俗说的小字《契丹藏》。

【1】陈述：《辽文汇》卷七。大安五年撰：《安次县祠垡里寺院内起建堂殿并内藏碑记》。

"涞水县西北一舍之外，有巨镇名曰金山。其山之左有精蓝，古老相传，号演教院。……时（景福至乾统）有县之（高）士董生，数诣参访。仰师德之孤高，嗟山坊之阒寂，遂罄其家产，构大藏一座，印内典五百余帙，在中龛置"[2]。这五百余帙内典，指的也可能是统和《契丹藏》。

【2】陈述：《辽文汇》卷八。韩温教乾统三年撰：《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

"下至五代，降及宋、辽，历夷险而其教弥光，经隆替而斯以愈振。凡所贮藏有五千四十八卷，遂卜胜地，以建佛宫，置以藏经，其来也久"[3]。宜州厅峪道院所藏之5 418卷的藏经，大概也是统和《契丹藏》。

【3】张金吾：《金文最》卷六六。皇统八年撰：《宜州厅峪道院复建藏经千人邑碑》。

讲到这里，我们对《契丹藏》大体可以勾画个轮廓了。

第一，应县木塔所出《契丹藏》于辽圣宗统和年间（984—1012年）雕印出版于燕京。此即俗说之大字《契丹藏》。

第二，统和《契丹藏》有五千余卷，505帙。

第三，全部用汉字书写雕印，大字楷书，工整有力。未见契丹字。

第四，每版印成一整纸，由数纸至数十纸粘连成一卷，每卷各纸行数、每行字数基本一样。

第五，全部为卷轴装，圆木轴，竹制杆，缥带为丝织品。

第六，每卷用千字文编号。

第七，每卷有译者名（残缺者除外）。

第八，行格疏朗，排列整齐，版式统一。

第九，均用硬黄纸。纸质极好，光洁坚韧，入潢避蠹。

第十，不避讳。

第十一，卷首有精美的木刻佛画[4]。

【4】阎文儒、傅振伦、郑恩淮：《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文物》，1982(6)。

第十二，第二部《契丹藏》雕印出版于辽兴宗重熙至咸雍四年（1032—1068年），579帙，卷数也比统和藏多。但狭行细字，

册不满于一千，为燕京沙门觉苑等校刻，蝴蝶装，俗称小字《契丹藏》，曾传往高丽。北京大觉寺所藏者，当即此藏。

## 二、辽代经卷的雕印出版及与佛经有关的其他书之出版

辽代崇佛，不仅表现在大型释教丛书《契丹藏》的两次雕印出版上，还雕印出版了许多单经和与佛经有关的其他书。山西应县木塔在发现12卷辽刻《契丹藏》的同时，还发现了35件辽刻其他单经，就透露出辽代这方面的出版状况。这些辽刻佛教单经分别为《妙法莲花经卷第一》、《妙法莲花经卷第一》(Ⅰ)、《妙法莲花经卷第一》(Ⅱ)、《妙法莲花经卷第一》(Ⅲ)、《妙法莲花经卷第三》(Ⅰ)、《妙法莲花经卷第三》(Ⅱ)、《妙法莲花经卷第四》(Ⅰ)、《妙法莲花经卷第四》(Ⅱ)、《妙法莲花经卷第四》(Ⅲ)、《妙法莲花经卷第四》(Ⅳ)、《妙法莲花经卷第五》、《妙法莲花经卷第七》、《妙法莲花经卷第八》(Ⅰ)、《妙法莲花经卷第八》(Ⅱ)、《妙法莲花经卷第八》(Ⅲ)、《大方广佛报恩经优波离品第八》、《佛说大孔雀咒王经卷上》、《佛说八师经一卷》、《佛说观世音经》、《高王观世音经一卷》、《佛名集》、《大方广佛花严经疏卷第四下》、《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一上》、《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一下》、《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五上半》、《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五上》、《大花严经钞卷第一上》、《上生经疏科文一卷》、《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成唯识论述记应新抄科文卷第三》、《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二》、《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六》、《涅槃义记第八》、《八师经报应记》。

这批雕印出版的佛经中卷首镌有扉画者凡七件，为《妙法莲花经卷第一》、《妙法莲花经卷第三》(Ⅱ)、《妙法莲花经卷第四》(Ⅰ)(图22)、《妙法莲花经卷第四》(Ⅳ)、《妙法莲花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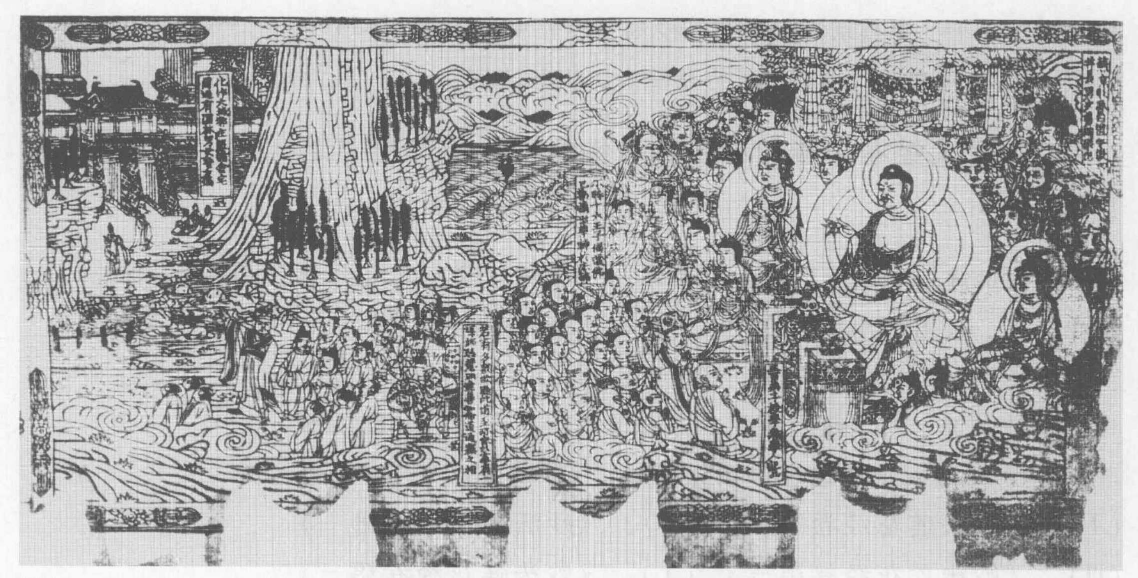


图22
辽燕京雕历日赵守俊刻《妙法莲花经》卷第四卷首扉画

卷第八》(Ⅱ)、《妙法莲花经卷第八》(Ⅲ)、《高王观世音经一卷》。其中《妙法莲花经卷第四》(Ⅰ)和《妙法莲花经卷第八》(Ⅲ)两卷经的卷首扉画最完整，无论构图、布局、线描、人物形象勾勒，到镌刻刀法、印纸墨色，都显示出辽代雕版印刷的高超技术。

这批雕印出版的佛经以《上生经疏科文》雕印出版得最早(图23)，以其卷尾镌有“时统和八年岁次庚寅八月癸卯朔十五日戊午故记，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三行题记可证。“统和”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年号，八年即是公元990年，相当于北宋开国后的第30年，即宋太宗淳化元年。《妙法莲花经卷第四》(Ⅰ)的卷首扉画右上角镌“燕京雕历日赵守俊并长男次弟同雕记”条记。这里的历日雕印家赵守俊，与《契丹藏》中《称赞大乘功德经》卷尾所镌题记“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四人同雕”中的赵守俊，显然是同一个人。而《称赞大乘功德经》雕印于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则这卷《妙法莲花经》的雕印年限去此亦不会甚远。《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六》卷尾镌有“五十六纸，云州节度副使张肃一纸，李寿三纸，许延玉五纸，应州副使李胤两纸，赵守俊等四十五人同雕”题记。“按云州于重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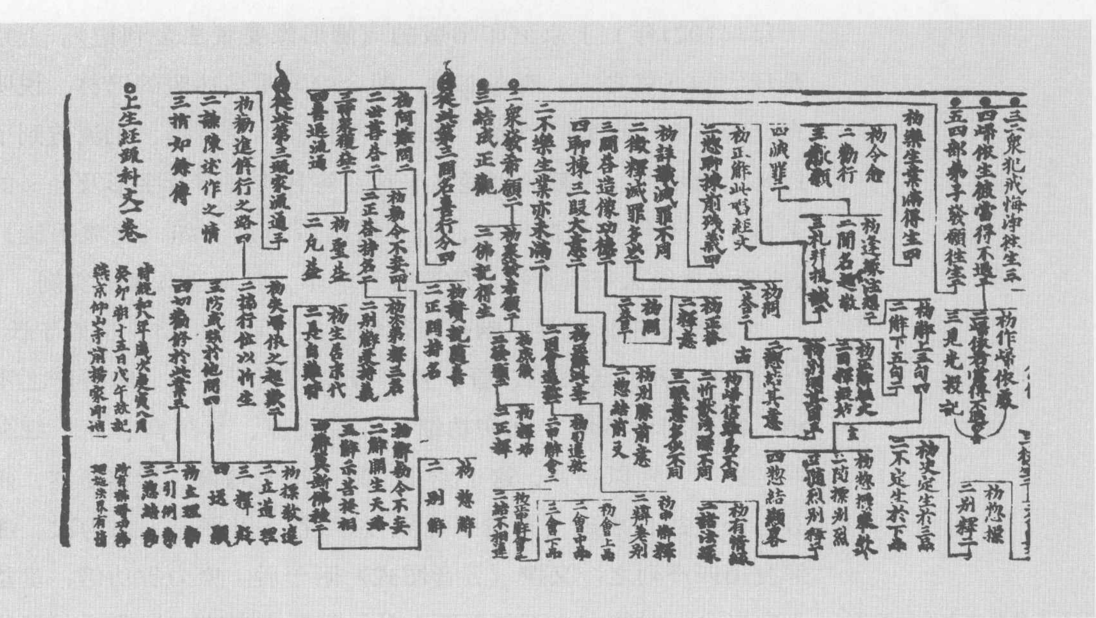


图23
辽统和八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刻本《上生经疏科文》

十三年（1044年）升为西京，节度使改西京留守，知此经刻于重熙十三年以前”[1]。但《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五上》避讳“光”、“明”、“真”三字；《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避讳“光”、“明”、“真”、“贤”四字；《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亦避讳“光”、“明”、“真”、“贤”四字，且卷尾镌有“咸雍七年十月日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年款。我们知道，“光”是避太宗耶律德光名讳；“明”是避讳穆宗耶律璟（后更名明）名讳；“贤”是避讳景宗耶律贤（小字明扆，故亦讳明）；“真”是避兴宗耶律宗真名讳。表明这批经的雕印出版盖完成于统和八年至咸雍七年（990—1071年）之间，正是辽代最兴盛发达的时期。

应县木塔除发现上述12卷《契丹藏》和35件单经以外，还发现有燕台大悯忠寺雕印出版的《诸杂赞》一册、《玉泉寺菩萨戒坛所牒》、《菩萨戒坛所牒》及所附牒封等。

应县木塔发现的大藏、单经及佛画，集中反映了辽代佛教的兴盛。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前些年在内蒙古庆州巴林右旗白塔发现了辽燕京刻印出版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开泰

【1】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山西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山西省雁北地区文物工作站、山西省应县木塔文物保管所：《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辽代珍贵文物》，《文物》，1982(6)。

十年（1021年）上京刻印出版的《佛形像安置法舍利记》。上京是辽代的五京之一，地在临潢，即今内蒙昭乌达盟的巴林。说明在辽南京刻印出版的单经、大藏，不仅在本地传播，也流传到了辽的上京地区。佛教的兴盛又表现在解释佛经字音字形及经义的著作上，不但被编撰出来，而且被出版行世。如《龙龛手镜》、《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的撰著和雕印，就是这方面的实例。

《龙龛手镜》四卷，幽州僧行均撰。行均字广济，俗姓于氏。"派演青、齐，云飞燕、晋，善于音韵，娴于字书。睹香严之不精，寓金河而载缉。九仞功绩，五变炎凉，具辨宫、商，细分喉、齿……矧以新音，遍于龙龛，犹手持于鸾镜。形容斯鉴，妍丑是分，故目之曰《龙龛手镜》。总四卷，以平上去入为次，随部复用四声列之。又撰《五音图式》附于后。庶力省功倍，垂益无穷者矣。时统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癸亥序"[1]。这段话是辽代燕京悯忠寺沙门智光于统和十五年（997年）为行均所撰《龙龛手镜》写的序文，表明此书在此前后已雕印行世。"熙宁（1068—1077年）中有人自虏中得之，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帅浙西，取以镂板……观其字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后世殆不以其为燕人也"[2]。表明此书问世80年后传入了北宋，并由蒲传正在浙西镂板复刻行世。复刻本不再称《龙龛手镜》，因要回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嫌名讳，故改称《龙龛手鉴》。

《龙龛手镜》，是"辽代幽州僧人行均为研读佛经而编撰的一部字书……每字下详列正体、俗体、古体、今字以及或体，并作简单的音释和义释。六朝以至唐五代时期俗字盛行，唐写本经卷中俗字颇多。《龙龛手镜》辑录了写本经卷中大量的俗字、异体。这些字偏旁无定，繁简无定，字形无定。为了方便读者据形检字，行均依照写本所收俗字、异体的偏旁归部……后代学者，特别是清代文字学家，不了解该书的编写目的和作用，对该书多所指责，甚至认为其'俗谬怪妄'、'直是废书，不可用也'（清李慈铭跋语）"[3]。足见《龙龛手镜》的编撰与雕印出版，完全是应着当时佛教盛行、人们读经的需要而产生的。反过来，它的

[1] 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新修龙龛手镜序》，影印高丽本《龙龛手镜》，中华书局，1985。

[2]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

[3]《龙龛手镜·出版说明》，影印高丽本《龙龛手镜》，中华书局，1985。

雕印行世，也是佛教盛行的表征。

“时有总秘大师赐紫沙门觉苑，幼攻蚁术，长号鹏耆，学赡群经，业专密部。禀摩尼之善诱，穷瑜伽之奥诠，名冠宗师，召开讲会，最上乘之至理，由此发扬。因集《科文》五卷，通行于世。师自是谈演之暇，乘精运思，复撰成《钞》十卷，文无不周，义无不摄，镜先制之幽隐，烛后学之昏疑。意者，近报国恩，远弘佛道。亦既进奏，亟命雕镂”[1]。这里的所谓《钞》，即指《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是辽释觉苑大师的作品，是解释经义的专著。进奏之后，“亟命雕镂”。雕镂即是椠板刊行。但这部书究竟刻于何时？觉苑自序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越大康三年，忽降纶音，令进《神变经疏钞》，科则密教司南时至矣。于是敬酬圣泽，兼副舆情，强摭群诠，谬成斯解，目之曰《演密钞》。会于前冬，诏赴行在，面奉进呈，勒令雕印。坠典斯兴，仁王之力也”[2]。足见这部《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大约刻印出版于大康三年（1077年）稍后一点。

[1] 陈述：《辽文汇》卷七《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引文》。

[2] 陈述：《辽文汇》卷七《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序》。

### 三、辽代出版经史子集四部书

上述从大藏、单经乃至于读经解义的字书、演密等著作，都先后刊行于世，足见辽代刻书出版，佛教的经、律、论、赞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当然，除了佛经之外，辽代也还刻印出版过一些四部书。开泰元年（1012年）“秋八月丙申，铁骊、纳苏等送乌舍百余户至宾州，赐丝绢。纳苏乞赐佛像、儒书。诏赐《护国仁王佛像》一，《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3]。这是辽代在崇信佛教的同时，又尊崇儒家的具体表现。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六《西北部族属国叛服》考异引证《续通考》说：“辽一代内府书籍，重熙末始建秘书监收掌之。清宁元年十二月，诏设学，颁五经传疏。八年十月，禁民间私刊印文字。十一月，诏求乾文阁所阙经籍，命儒臣校雠。咸雍十年十月，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大安二年，召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命儒等讲《五经》大义。”这段记载大体可

[3]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六《西北部族属国叛服》。

以表明这样一种史实：开泰间，辽从北宋得到《五经》，经过30年的学习研究，到清宁元年（1055年）才设学颁行《五经》传疏。这种向学校的颁行，做为读经的范本，恐怕只能是雕印本，不可能是传抄本。到八年（1062年）十月，又下令禁止民间私自刊印文字，表明这时雕印出版书籍已扩展到民间，大概是相当普及并有碍于当时的政治了。同年十一月，又下诏搜求乾文阁所缺的经籍，并命儒臣校雠，表明儒家经典这时确已成了政府有用的典籍。到咸雍十年（1074年）十月，又下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表明反映汉人统治得失的史书也已版印行世。

"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1] 表明连北宋苏轼的诗选，辽代的燕京书铺子也已刊行。此外，乾统年间（1101—1110年）民间还雕印出版过《肘后方》和《百一方》，后来都被金人称为善本。政府还曾组织力量，用契丹文字翻译过《贞观政要》、《五代史》、《通历》、《白氏讽谏集》、《方脉书》等，并版行于世。清宁二年（1056年）三月，辽道宗耶律洪基曾御制《放鹰赋》赐群臣，估计也是雕印本。

【1】[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歌咏》。

此外应县木塔还发现有辽代刻印出版的儿童启蒙读物《蒙求》残本。"《蒙求》一书是封建社会儿童教育的启蒙课本，是唐代李翰编撰的。它是以历史典故为主要内容，采用对偶押韵的句子，每句四字，包含一个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的故事，上下两句成为对偶。这样的蒙书既可以帮助儿童多认识《千字文》以外的生字，又可以学些典故知识。这比以认字为主的蒙书又前进了一大步。李翰《蒙求》在蒙学史上是可与《急就篇》、《千字文》前后辉映，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对于此后的蒙书具有极大的影响"[2]。辽刻《蒙求》避讳"明"、"真"二字，表明刻印的时代当在辽兴宗耶律宗真朝（1031—1055年）或稍晚一点。这种蒙书的刻印出版，显然是为了满足当时儿童启蒙教育的需要而进行

【2】毕素娟：《世所仅见的辽版书籍——〈蒙求〉》，《文物》1982(6)。

的。现虽残而不全，却是仅见的辽刻佛经以外的四部书籍之一，其价值不言而喻。

辽代虽幅员辽阔，但地处东北、西北、华北三北地区的北疆。这些地区长期为少数民族栖息之所，多以渔猎、游牧为生，文化不甚发达。唯辽之南京，即今天的北京，地处要津，与中原接壤，文化发达，故辽代刻书出版亦多集中在此。如应县木塔发现之《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Ⅲ）式是“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佛说八师经》是“大昊天寺福慧楼下成造”。据《北平庙宇通检》：大昊天寺系辽道宗清宁五年秦越大长公主以舍棠阴坊第为寺，在今北京西便门大街西。《上生经疏科文》是“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都是“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妙法莲华经》（Ⅰ）式和《称赞大乘功德经》刻于“燕台”、“燕京”。杂刻中《新雕诸杂赞》雕印于“燕台大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这充分证明，辽代的燕京（即辽南京）的确是个刻书出版的中心地区。宋代以浙江、四川、建阳为刻书的中心地区。辽与北宋基本同时，其以燕京为中心开展刻书出版事业，使北京成了我国历史上北方的刻书出版中心。这在中国书史和中国出版史的研究上，具有极为突出的价值。如果再把西夏刻书出版的中心地区西北，金代刻书出版的中心地区山西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则10世纪至13世纪的300余年中，在神州大地，雕印出版事业已遍及大江南北、大河上下、西北边陲、燕山脚下，在当时的世界上，无疑它是最先进最辉煌的，占有绝对领先的地位。

## 第三节　辽代出版图籍的装帧艺术

辽代出版图书的版式有许多特别之处，很值得研究。其印纸多为唐人写经习用的硬黄纸。至宋代，印书逐渐多为皮纸所代替。特别是江南印书，皮纸更多。原因是南方麻科植物并不多，楮树、桑树、青檀等树木较多，其韧皮用来造纸印书，质量亦属

上乘。黄河以北正相反，麻类植物较多，楮树、桑树等树木较少，故仍用麻纸印造。辽立国早于北宋，而国祚与北宋相差不多，地处朔北，故仍多用麻类植物造纸。所谓硬黄纸，多是经过染潢的麻纸。所谓染潢，是对纸张进行加工，以便防虫避蠹。染潢所用的原材料，主要是黄檗树的皮汁。这种东西色黄、味苦、气香。色黄符合中国五行中的尚黄习俗，味苦则防虫蚀，气香则开卷书香，更添书卷气，更符合文人之雅意。辽代版印释家大藏《契丹藏》肯用硬黄纸，这在中国释家大藏雕印史上还是仅见的，足见其诚心恳到和不吝铺张的虔诚。

## 一、辽代刻书的版式

山西应县木塔所出辽刻《契丹藏》12单卷，均四周刻有边栏，行字之间无界行。但四周边栏的状况经与经之间却有不同。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七》是左右单边、上下双边。《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大方广佛报恩经卷第一》、《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阿毗达磨发智论卷第十三》、《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一切佛菩萨名集卷第六》，都是左右单边。表明辽刻大藏四周单边者多。应县木塔发现的辽刻单经，有15件都是左右单边，上下双边、左右单边者2件，上下单边、左右双边者4件，四周双边者6件。而上下双边的《妙法莲华经卷第一》（Ⅰ），在双栏线之间镌印有金刚杵及宝珠文饰。《妙法莲华经卷第三》（Ⅰ、Ⅱ）、《妙法莲华径卷第四》（Ⅰ、Ⅱ、Ⅲ）都是双边，四周的双栏线之间都镌印金刚杵及祥云文饰。金刚杵原为古印度的一种兵器，佛教密宗也采此器表示摧毁魔敌的法器。以金、银、铜、铁等为之，长8指到12指，中间为把手，两端有独股、三股、五股的刃头。镌印这种纹饰，目的是配合经文增强消灾祈福护法的愿望，但从边栏装饰的角度看，不啻为我国版印图籍花栏的滥觞。花栏起自明朝中叶的书铺子，所见有竹节栏、博古栏等，目的在于美备，意在易售而牟利。实则辽代已有这种花栏，这是辽代刻书版式设

计上的一大特点。

辽刻《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版式则完全是四部书的书叶状。四周双边，每半叶8行，行16、17字不等。行字之间没有界行。首行为空行，镌有界行线。这一行的上端则镌印墨色鱼尾。上下版之间已开雕版口，形成版心。版心竖直的中间通上到下镌印一道墨线，显然是当作折叶时的中缝线。版口上下的中间，骑着中缝线又镌印长方形线框，框内上镌"第一"，即"序品第一"之简化。下镌叶码。这显然是五代刻书至宋代刻书的过渡性版口形式。卷首扉画则为四周双栏，内外栏线之间镌印钱纹、鱼尾及金刚杵图饰。而燕京大昊天寺福慧楼下为李韩氏因应梦亡夫施奉而雕造的《佛说八师经》，则四周单边，无界行。虽分上下版，但未开版口，只在上下版之间竖直镌印一道墨线，作为折叶时的中缝线。道宗以后雕印的《佛名集》，则左右双边，开镌版口。版口上下的中间又上镌一道横线、下镌一道横线，两横线之间镌印叶码。燕台大悯忠寺常住院内新雕《诸杂赞》，则为四周双边，无界行。版口形式与《佛说八师经》相类。首行有界行，界行上镌鱼尾，鱼尾下镌"燕台大悯忠寺常住院内新雕诸杂赞随名各列如后"，字下又镌一横线。第七行上端又镌鱼尾，鱼尾下镌"诸杂独会赞四十五会"，隔三字又镌"毗卢佛赞一"。这里的鱼尾显然为标示题目而用的。这种版式极为少见，别具一格。辽兴宗之后所刻《蒙求》，为该书现存最早的孤罕刻本。版框高20.4厘米，广25.8厘米。左右双边，上下单边。每半叶10行，行16字。由于是韵文，每四字一句。每行每句之间都有间隔，所以整个版面横向形成3道未着墨的白空格，空格不整齐。中间开雕了版口，但版口极窄。版口中间镌印叶码，其余无任何镌饰。每卷卷端镌题"蒙求卷上、中、下"，这一行题名的左边竖直镌有界行。卷下首叶书楣镌饰手舞足蹈人像，为历来版印图籍所仅见。而丰润天宫寺塔发现的辽刻重熙——咸雍《契丹藏》，其版式为每半版12行，行27、28字不等。有的未开版口，只在上下两个半版的中间竖雕一道直线，显然为了折叶时取作中缝；四周单边。有的开雕了版

口，如《一切佛菩萨名集》，不但有版口，而且四周单边有界行。版口为上下版左右两道线构成，中间亦竖镌一道线。骑着这道中线于偏下的位置镌有长方形线框，框上镌经名，框中镌叶码。这种版式与应县木塔所出《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相类。每册外包裹蓝色书皮，书皮左上角竖贴雕印的书签，如《一切佛菩萨名集》上册，签题有四周双线的框围。过去都云佛经大藏方册始于明刻之《径山藏》，丰润所出蝶装《契丹藏》打破了这种人云亦云的俗说，表明11世纪的中国佛经大藏已经有方册装。且由统和藏和重熙藏可知，那时雕印大藏，其入藏经文与经之间版式行款也并不完全都一致。

上述这些图籍的版式，看得出是从唐五代刻书的版式脱胎而来，但较前精细。其特点是未定型，未定格，重实用，轻美备。但古朴大方，庄重肃穆，这本身也是一种美。

## 二、辽代出版图籍的插图版画

应县木塔发现的大藏、单经，有不少都带有卷首扉画，可见辽代版印图籍的插图形式仍以卷首扉画为主，至少卷轴装的大藏、单经是如此。同时还发现单独镌印的佛画数幅，如《南无释迦牟尼佛像》、《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炽盛光九曜图》等，都是极为珍贵的版画。《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刻画了药师佛向胁侍及十二药叉大将说法的盛大场面。木刻虽较粗糙，设色也较简单，但作者勾勒有法，使人物自有体姿，各具神情”[1]。《炽盛光九曜图》“画面三界结构整齐，人物布置得当，烘托出炽盛光佛的威德。在天界相接处，作者将二十八个星宿按四组想象成为天蝎、朱雀、巨蟹、金牛四种美术形象，将二界十分巧妙地联接起来。从画幅边际双线墨栏及纸素相接处观察，画面线条均一次印成。线条遒劲圆润，顿挫有方，反映了雕刻者挥刀自如的高超技艺”[2]。这些木版雕印的佛教版画中，价值最高、最值得称道的是彩印《南无释迦牟尼像》。“释迦扶膝端坐于莲台，披红色衣。头部光圈内红外蓝。肉髻之下微见白毫相。顶部华盖饰宝相

【1】侯恺、冯鹏生：《应县木塔密藏辽代美术作品的探讨》，《文物》，1982年(6)。

【2】侯恺、冯鹏生：《应县木塔密藏辽代美术作品的探讨》，《文物》，1982年(6)。

花，帛幔下垂。华盖两旁饰以天草，其外印有‘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字左反而右正。佛前四众（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合十肃立于下两角。另有合十肃立、头有钗饰者，似为供养人。两化生童子，身绕祥云。画面结构繁复，布局紧凑”。这幅画的“印制方法，我们认为属于丝漏印刷。似是以两套版印刷，先漏印红色，后漏印蓝色。至于字地上的黄色，则是用笔刷染的。这和我国民间镂孔印染花布的方法基本相同。由于漏印方法不容易印出精细的线条，因此以笔勾画眉、眼、口、鼻、手、足和服领，而身形穿着显得不甚清晰”。“我国彩色套印术始于何时，过去人们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有的断在元代，有的断在明代。断于元之说的主要根据，是湖北江陵资福寺元至元六年（1340年）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上的灵芝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彩色漏印《南无释迦牟尼佛像》较《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之朱墨两色套印要早300多年，较明末胡正言采用彩色套印制作的《十竹斋笺谱》要早600多年。它在彩色套印史上无疑居于先导的地位……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工艺结晶中有古代匠师包括辽代匠师的智慧和汗水”[1]。足见辽代在雕版印刷术上，特别是在套色彩印的技术上，在我国出版印刷事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光辉的篇章。

[1] 侯恺、冯鹏生:《应县木塔密藏辽代美术作品的探讨》,《文物》,1982(6)。

至于每幅佛画的人物形象、经幢莲台、祥云衣皱、侍女僧众、佛光烛影之生动流畅，不仅反映着画稿的艺术，更反映出镌刻的刀法娴熟、玲珑剔透，犹如笔走龙蛇。远在11世纪之前就能有如此精熟的印刷品，不能不说我们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是有美的造诣的民族。

辽代版印图籍的装帧形式，统和《契丹藏》为卷轴装式。应县木塔所出12卷此藏，轴、杆、飘带、别子还多为原物，证明了它们是卷轴装。35件单刻佛经，30件亦为卷轴装，而《妙法莲华经卷第一》、《佛说八师经》、《佛名集》、《八师经报应记》四件则是蝴蝶装。其中《妙法莲华经卷第一》（Ⅲ），原为卷轴装，后改为线装，即右上角用线横索穿连。而应县木塔所出杂刻中的

《蒙求》、《新雕诸杂赞》、《卜筮书》则亦为蝴蝶装。这说明辽代图籍，特别是佛经，大部分是卷轴装，少数佛经和四部书是蝴蝶装，和北宋图籍的装帧形式相近。也说明辽、宋虽然政治上对立，但文化上却相互影响，彼此借鉴。唐末五代已有线装，但尚未定型。宋朝人认为线缝一旦散乱后，寻其次第，恢复原状，非常困难，故扬弃了久已出现的缝缋之法，一直流行蝶装、包背装。明中叶以后再度兴起的线装，则定型为四眼线装。

# 第十一章　西夏出版事业的概况

## 第一节　出版事业的社会背景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一个重要的多民族王朝，它以党项族为主体，境内还有人数众多的汉族以及回鹘、吐蕃等族。西夏先与北宋、辽鼎立，后与南宋、金对峙。西夏历十代帝王，享国190年，有广袤而大体稳固的领土，有完备的典章制度。它武功赫赫，文教兴盛，在宋、辽、金、吐蕃、回鹘之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西夏的出版事业比较发达，这与它的历史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

### 一、西夏的历史概况

党项羌在南北朝时期主要分布在四川北部、青海南部地区。隋、唐时期其势力逐渐发展，唐初党项族最强大的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归唐，被赐李姓。中唐时期，因其西部吐蕃势力的强大和扩展，党项族不堪吐蕃的挤迫，在唐朝的支持下陆续北迁，从而拉开了党项族民族大迁徙的序幕。北迁后的党项族落脚在今甘肃南部、宁夏和陕西北部一带。唐中和元年（881年）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管领夏、银、绥、宥、靖五州之地，设治所于夏州（今属陕西省靖边县）。唐末、五代时期，作为藩镇之一的夏州党项政权势力，开始了事实上的地方割据。五

[1]《宋史》卷四八五、四八六《夏国传》(上、下),13981~14033页。《辽史》卷一一五《西夏外纪》,1523~1532页。《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2865~2879页。《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党项传》,1845~1846页。

代时期，夏州党项政权先后依附于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各王朝，并在与邻近藩镇纵横捭阖的斗争中，势力不断壮大。[1]

宋初，党项统治者臣属宋朝，被赐赵姓。因宋朝欲意统一党项占领的广大地区，而党项族统治者执意与宋朝分庭抗礼。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率部与宋朝征战二十多年，于宋咸平五年（1002年）夺取了宋朝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次年改灵州为西平府，这里便成了党项族政权新的统治中心。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承王位，他与宋朝大体上保持了友好往来，宋朝每年赐给大量银、绢、茶，还在保安军（今属陕西省志丹县）开设榷场，发展贸易。宋天禧四年（1020年）李德明将其统治中心移往贺兰山麓的怀远镇，改称兴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并逐渐将其发展成西北地区的一大都会。宋天圣六年（1028年）李德明派他的儿子元昊率兵向西攻占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凉州（今甘肃省武威）。不久，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县）也来降服。这样，李德明的党项政权又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奠定了建立西夏王国的版图基础。

元昊时期实力更加雄厚。他有雄才大略，早就提出“英雄之生当王霸”的主张。他采取一系列政治、军事、文化措施，进行正式建国的准备活动。他取消了唐、宋赐给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改变名号，自称“兀卒”（西夏语，皇帝意）；又突出民族风习，下秃法令；创制文字，翻译经典；还仿中原制度，建立官制；完善首府，升兴州为兴庆府；大力整顿军旅，在境内分设监军司。他还接连对北宋、吐蕃、回鹘用兵，进一步扩大了版图。宋宝元元年（103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元昊正式立国为帝，国号大夏，世称西夏，并公开上表于宋。西夏辖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成为当时能与宋、辽周旋抗衡的第三大势力。宋朝开始不承认元昊的地位，不断对西夏用兵，宋、夏双方接连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东）、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战，皆以宋军大败、损兵折将而告终。此后，军事上的攻防和

政治上的谈判交叉进行，经过反复较量，宋朝疲于奔命，无力征服西夏，西夏也财困民穷，锐气渐消。最后双方达成妥协，西夏向宋称臣，宋朝承认西夏的实际地位，每年赐给西夏银、绢、茶共255 000两、匹、斤。后元昊在宫廷内乱中被刺身亡，是为景宗。

元昊子谅祚在襁褓中即位，母后没藏氏和母舅没藏讹庞当政，与宋朝有战有和，谅祚14岁时在朝臣的支持下擒杀企图篡权的没藏讹庞，开始亲政。谅祚在位19年，是为毅宗。他死后儿子秉常也是孩提即位，母后梁氏和母舅梁乙埋执掌朝政。秉常16岁亲政，因想与宋媾和，与太后政见相左，被囚禁兴庆府。宋朝乘机起五路大军攻夏，最终因指挥失当而溃败。秉常在位19年，是为惠宗。秉常子乾顺3岁即位，母后梁氏（秉常母梁氏侄女）和母舅梁乞逋（梁乙埋之子）专权，15年后乾顺亲政，与辽结好。金灭辽后，西夏改事金朝，并在金朝灭辽攻宋的战争中，扩大了版图。乾顺在位长达54年，是为崇宗。这一时期三朝母党专权，西夏皇族和后族的矛盾高潮迭起。在经济上宋、夏之间互通有无，贸易往来频繁。每当宋、夏交战之际，宋朝常以停岁币、罢和市相要挟，这也反映出西夏经济发展的不完善。

乾顺子仁孝即位后不久，境内发生原投诚的契丹人萧合达的叛乱，又由于严重饥荒，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外戚任得敬在平定叛乱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渐握朝柄，升为国相，进位楚王、秦晋国王，最后欲分国自立。仁孝在金朝的支持下诛杀了任得敬并剪灭其党羽，度过分国危机。这一时期金朝南下侵宋，西夏依附于金而能自保。西夏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农牧业都有长足的进步，封建社会越趋完善。仁孝在位54年，是为仁宗。

仁孝死后，西夏内忧外患加剧，开始走下坡路，进入西夏晚期。这时蒙古已崛起于漠北，并不断侵掠西夏。在西夏晚期的30多年中，西夏外患不已，烽烟不断，蒙古六次入侵；内乱频仍，皇权不固，先后五易帝位：桓宗纯祐、襄宗安全、神宗遵顼、献

宗德旺、末帝晛。夏宝义元年（1227年）蒙古大军攻陷中兴府。末帝晛回天乏力，力屈请降，旋即被杀，这个长时间雄踞西北地区的西夏王朝终告灭亡。[1]

[1]［清］吴广成：《西夏书事》，清道光五年（1835年）刊本。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二、西夏的文字和文化

西夏的文化事业很发达。西夏统治者提倡民族文化，重视民族礼仪，保留原始民族宗教信仰，同时也大力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时而强调蕃礼，时而强调汉礼。所谓蕃礼就是反映党项民族特点的文化，而汉礼则是反映中原汉族特点的文化。一般后族掌权时提倡蕃礼，而皇族掌权时则提倡汉礼。西夏在不同时期强调蕃礼或汉礼的过程中，使汉族文化和党项族文化都能得到发展，交相辉映，融汇吸收而形成有民族和地方特点的西夏文化。

西夏文字的创制和推行，在西夏的文化事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突出的民族特点。西夏文字创制于西夏正式立国前两年（1036年），在元昊的倡导和支持下，由大臣野利仁荣创制。西夏文制成后不久便有了西夏文书籍的出版。西夏“教国人记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2]。所谓“蕃书”就是西夏文。当时既用西夏文记事，又用它翻译汉文典藉。西夏文的创制和西夏图籍出版关系极大。

[2]《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史载：“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番汉二字院。”[3] 其中的“易”字，说明西夏原来使用的不是西夏文，大概是汉文。西夏社会发展较快，从政府到社会都有对文化发展的强烈要求。对党项人来说只有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社会交际需要。元昊在称帝时向宋朝所上表章中强调指出，“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把创制民族文字看作是立国的一个基本条件[4]。西夏提倡佛教，包括西夏皇族在内的党项人多虔诚信佛。用党项人能听懂、看懂的西夏文翻译佛经是信仰、推行佛教所必需。西夏立国当年就着手翻译佛经，可以说创制西夏文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译经。

[3]［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二。

[4]《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西夏文属于表意性质的方块字，文字形式和汉字相近，共有

六千多字。西夏文在境内作为国字广泛流行，汉文也同时使用，有时也使用藏文。在西夏立国190年的时间内，出版了大量的西夏文、汉文书籍和一些藏文书籍。这些出版物是西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西夏在发扬党项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并发展了儒学。西夏建国之初，即蕃学、汉学并重。崇宗贞观元年（1101年）又设国学，教授汉学，立养贤务，供给廪食。仁宗人庆元年（1144年）令各州县立学校，弟子员增至三千人。二年，又在皇宫内建立小学，还建立大汉太学，仁宗亲临太学祭奠先圣先师孔子。三年，仁宗又尊孔子为文宣帝，下令各州郡立庙祭祀。中国自唐朝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后，代有封谥，而封为文宣帝的只有西夏一朝。人庆四年（1147年）又行唱名法，仿中原选举制度立进士科，策试举人。实际上西夏至少在崇宗时已经实行科举制度。西夏利用儒学治国，儒家思想已成为西夏统治的主导思想。儒学典籍的出版促进了西夏的文化发展。

西夏在推行儒学的同时，皇室还大力倡导佛教。元昊规定每一季度第一个月的朔日为“圣节”，下令官民礼佛。西夏前期曾六次从宋朝赎取《大藏经》，并用以作底本译经。后又从西部的吐蕃地区吸纳藏传佛教，并在中国首先封设帝师。佛经的出版成为西夏出版物的大宗。[1]

西夏的文化还表现在艺术方面。如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洞窟中精美的文殊变和普贤变图，有世上最早的唐僧取经图，有独一无二的国师像，有真实描绘西夏帝王、官僚、眷属及侍者的画像，有龙飞凤舞、气势生动的窟顶藻井图案，有栩栩如生的罗汉、菩萨、供养人彩色泥塑像。西夏陵园中9座高达数十米的帝陵和二百多座陪葬墓，星罗棋布地矗立在贺兰山下，蔚为壮观。陵园内出土的硕大鎏金铜牛、有民族特色的人像石碑座、造型生动的雕龙栏柱，都是稀世之宝。流失到俄国圣彼得堡的西夏艺术品中有世上仅存的分身彩塑佛像，有数量众多的早期藏传佛教绘画等。

【1】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西夏有较发达的科学技术。西夏建筑技艺高超，其中佛教建筑更为突出。如挺拔秀丽的承天寺塔、装饰华丽的拜寺口双塔、简洁朴实的拜寺沟方塔、密檐式康济寺塔、楼阁式与覆钵式相结合的宏佛塔、世上仅存的青铜峡黄河岸边的一百零八塔塔阵、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张掖大卧佛等，表现出西夏建筑的形式多样、结构精巧和技术成熟。西夏的天文历法也发展成熟，采取了印刷的方法出版以满足民众的需要。敦煌西夏壁画中反映的锻铁用竖式双木扇风箱，是当时先进的鼓风设备。流誉当时的"夏国剑"被称为天下第一。西夏的驼毛毡被见多识广的马可·波罗誉为世界之最。

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这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使西夏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当时西夏处于多种民族政权并存的中国的中央地带。在科学技术上西夏自东西方都得到实惠，一方面发展了自己，同时又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1] 西夏文化有多来源、多民族、多层次的特点，她以自己特有的风采和神韵令世人叹为观止。[2]

【1】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

【2】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随着蒙古军队在灭亡西夏初期对西夏文化的残酷破坏，在中国历史上曾雄据一方的西夏王朝的历史文化多被淹没。明清以降，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逐渐消亡，西夏文字也成了无人可识的死文字。长期以来，史学家只能凭借记载不多的汉文史料来间接地了解西夏的历史。

近代以来，西夏文物、文献多有发现。以П.К.柯兹洛夫为首的俄国探险队于1908—1909年在黑水城遗址首次发现大量西夏书籍，现存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共有八千多个编号，有写本和刊本书籍数千卷之多。它改变了世上没有西夏书籍的局面。这批书籍不仅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最重要的资料，也是了解西夏时期乃至我国中古时期书籍出版状况的重要材料。此后，西夏文献又不断陆续出土。1917年宁夏灵武县出土西夏文佛经两大箱，其中大部分后来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其余部分分藏于国内外多处。此外英国、法国、瑞典、日本、印度、越南也都藏有一些自中国流失的西夏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西夏文献又有新的发现。甘肃省天梯山石窟、武威张义下西沟岘和亥母洞、黑水城遗址、绿城遗址、宁夏贺兰县宏佛塔、贺兰县拜寺沟内方塔、莫高窟北区石窟都发现了西夏的图籍。这些珍贵的文献不仅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最有价值的资料，也是了解西夏出版事业最直接的实物材料。其中俄藏黑水城文献以其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版本复杂成为研究这一领域的资料基础。自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合作，陆续整理、编辑、出版了俄国所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献，为研究西夏出版提供了基本资料。[1]

【1】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7。

## 第二节　图籍的编撰

出版事业是西夏文化事业中很重要的一项。现存的西夏图籍近五百种，共有数千卷册。关于西夏图书的编撰出版，史书缺乏记载。研究西夏书籍的编纂和出版，一方面要尽量发掘和利用不多的汉文记载，另外主要是依靠出土的西夏出版物本身及其序言、跋尾和题款中的相关资料。[2]

【2】〔俄〕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著:《西夏书籍业》，1981。王克孝、景永时汉文译本，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该书介绍了俄藏西夏书籍的情况，以版本、质料、制作见详，有关编辑出版者涉猎较少。

### 一、中原地区典籍的翻译

西夏既能发展主体民族党项族的民族文化，也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特长来充实自己。在出版方面也是如此。西夏统治者深知中原王朝有源远流长的文化，有丰富的典籍，要提高和发展西夏的文化，必须大力吸收、借鉴中原地区的文化营养。因此，翻译、出版中原地区的著作成为西夏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不仅从中原汉族地区引进、翻译世俗著作和佛教经典，还把西部藏族地区的藏传佛教经典翻译过来，特别是还把本朝编纂的重要西夏文著作译成汉文。西夏出版中译著的繁荣不仅与同时的宋朝不同，与同是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辽、金王朝也很不相同。辽、金王朝虽也创有民族文字，但少数民族文字的应用和出版都难以和

西夏相提并论。

（一）儒学经典的翻译出版

西夏建国前，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西夏文字后，将《孝经》、《尔雅》、《四言杂字》译为西夏文。所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应是翻译著作，可能是西夏最早出版的书籍。

西夏毅宗谅祚曾于嘉祐七年（1062年）向宋朝求赐字画和经史书籍，“夏国主谅祚上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欲建书阁宝藏之。且进马五十四，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本朝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其马”[1]。可见宋朝在西夏前期曾应西夏之求，赐给其《九经》。西夏是否将《九经》全部翻译成西夏文，不得而知。但在现有的西夏文文献中已经发现了刻本《论语》(图24)，写本《孟子》、《孝经》。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嘉佑七年四月己丑条》。



图24 西夏文译《论语》

西夏人不仅翻译儒学经典，还为中原地区有影响的儒学著作注释解义。西夏仁宗时的国相斡道冲“八岁以《尚书》中童子举，长通《五经》，为蕃汉教授。译《论语注》，别作解义二十

卷，曰《论语小义》，又作《周易卜筮断》，以其国字书之，行于国中，至今存焉"[1]。斡道冲是番族（即党项族）人，儿时以《尚书》中童子举，当时《尚书》可能已译成西夏文，成为出版物，并进入学校教学。斡道冲长大通晓《五经》。《五经》包括《诗》、《书》、《礼》、《易》、《春秋》，这些书籍应是在西夏流传的书籍。斡道冲所作的《论语小义》和《周易卜筮断》属于西夏学者以中原经书为基础撰著的作品。

[1]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二）史书、类书和兵书的翻译出版

由于西夏统治者和社会的需要，西夏还将中原地区影响较大的史书和类书翻译或节译为西夏文本。唐代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总结了贞观之治的经验，是一部被历代统治者十分看重、流传很广的资治之书。西夏在接受儒学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原王朝治国的原则和理论。西夏把《贞观政要》节译为西夏文本，名为《德事要文》，刻印出版[2]。

[2]《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133~141页。〔俄〕克恰诺夫：《吴兢〈贞观政要〉西夏译本残叶考》，《国家图书馆学刊》增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

西夏后期编印出版的另一部重要书籍是番大学院教授曹道安编译的西夏文《德行集》，根据节亲嵬名渊计的序言可知，此书是奉敕命为刚登基不久的桓宗皇帝治国参考而编辑的，其序言明确写道："因此圣旨已出，乃命微臣纂辑古语，择抉德行可观者，备成一本。臣等……欲使圣帝察前后兴衰本，知古今治乱源。然无直入之门，无所行道，今悟不存。因得敕命，敬上顿首，欢喜不尽，结合众儒，纂集要领。……引古代言行以为本，名为《德行集》。谨以书写，献于丹池。"不难看出，作者编辑此书目的即摘译中原古代经史中有助于治国安邦的言论，供年轻的皇帝披览，以明治国之道，以利维护统治。当然此书的印刷出版又大大扩充了它的使用范围[3]。

[3]《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142~155页。参见聂鸿音：《德行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还有一部同名西夏文《德行集》是从汉文本翻译而来，其内容与前本不同，以儒学的观点阐述为人处世之道，是劝世著作。其书末题款有"此《德行集》者原本是汉本"，但至今未能找出它的汉文译本[4]。叙述春秋时代历史的《十二国》也译成西夏文刻印出版。还有编译了引用了20多种汉文古籍的佚名著作[5]。

[4]《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195~200页。

[5]《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82~111页。

《类林》是唐代于立政编撰的一部重要类书，分类记古人事迹，分十卷五十目，每一目下包括若干故事。除引用常见书外，还有很多现已罕见或已遗失的古书，十分珍贵。西夏时期该书被全部译成西夏文，刻印出版。在《类林》卷四末有“乾祐辛丑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刻字司印”题记，印书时间为乾祐十二年(1181年)，已近西夏晚期。因此书卷首已佚，序言不存，无从考察开始翻译出版此书的情况。此后中原地区汉文原书失传。近代在敦煌石室出土了汉文本《类林》残卷，但内容很少，不足以窥《类林》全貌。而西夏文本《类林》的发现并转译成汉文本，恢复了古《类林》原本，起到了《类林》失而复得的作用[1]。(图25)

【1】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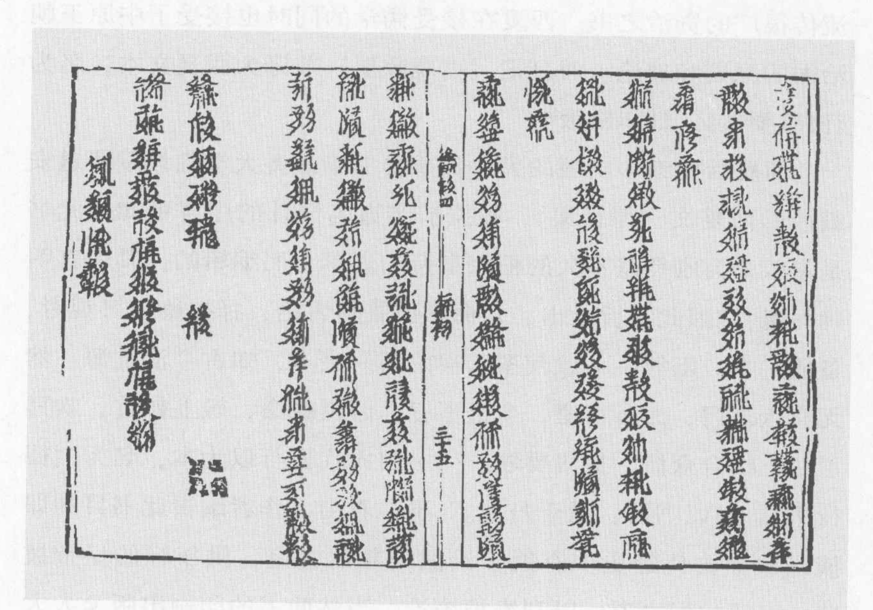


图 25
西夏文刻本《类林》

党项民族俗尚武力，西夏以军事兴国，建国前后不断与相邻的宋、辽、回鹘、吐蕃发生战争，因此对用兵特别重视。西夏已把中原地区的主要兵书翻译成西夏文刻印出版。如《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特别是《孙子兵法三注》不仅有刻本，还有抄本。目前已发现的西夏文兵书皆为残本[2]。(图26)

【2】《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156~221页。

图 26
西夏文刻本《孙子兵法三注》

（三）佛经的翻译出版

西夏大力提倡佛教，统治者率先尊崇，在政策上加意保护，佛教始终是西夏的第一宗教。元昊在佛教的发展方面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他通晓"浮图学"。西夏在11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曾先后六次向宋朝索取《大藏经》。此时，宋朝刻印完毕的《大藏经》只有《开宝藏》一种，其他几种《大藏经》均未印成。可见，宋朝赐予西夏的《大藏经》当是《开宝藏》[1]。

佛经是佛教传播的最重要的手段。在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发展佛教，在一般不懂得汉语的党项族群众中宣扬佛教，只有汉文佛经而没有党项族自己民族文字的佛经是难以为继的。西夏索取《大藏经》的目的一是珍藏供养，二是作为翻译成西夏文的底本。西夏文字创造后，大规模翻译出版佛经的事业就开始了，这为佛教在西夏进一步流传、发展打下了基础。

西夏文文献表明，就在元昊称帝当年，已开始把汉文佛经译成西夏文。当时的译经主持人是国师白法信。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记有："夏国风帝新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年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令依

【1】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59~6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番译。”又藏于德国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明确记载“风角城皇帝，依本国语言，兴起番礼，创造文字，翻译经典”的史实[1]。“风帝”和“风角城皇帝”都指元昊，“戊寅年”为元昊称帝的1038年。西夏建国初期用了50多年的时间将《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称作“蕃大藏经”。这部大藏经共有820部，3 579卷[2]。它是西夏王朝数量最大的出版物，在西夏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也有特殊的地位。

【1】《西夏佛教史略》，67页。

【2】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3(1)。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可见元昊在登基之初和被刺死亡之前都在支持译经事业。西夏首府东郊的高台寺是储藏汉文《大藏经》和翻译佛经的场所。回鹘僧人在西夏早期对佛经的传译和佛教的发展起到特殊作用[3]。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一幅珍贵的《西夏译经图》描绘了西夏惠宗时期译经的真实情况[4]。很多西夏佛经的题款表明西夏惠宗和崇宗时期是西夏译经的高峰。（彩图8）

【3】［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八。

【4】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文献》，1979(1)。

西夏仁宗仁孝时期的五十多年中，佛教比前代有了新的发展，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就目前所知，这一阶段突出的佛事活动是校勘佛经、重新出版和翻译藏传佛教经典。由于这时佛教的主要经典基本上都译成了西夏文，校勘这些佛经就成了一件繁难而重要的任务。《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在叙述了西夏译经的情况后，接着提到了西夏校经的史实：“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重校。”护城皇帝即仁宗。“南经”当指西夏之前的宋本，即《开宝藏》。西夏以北的辽、金先后刻印了汉文《大藏经》，一为《契丹藏》，一为《赵城藏》。此时均先后完工，所以“北经”应是辽的《契丹藏》或金的《赵城藏》。西夏系统地校勘佛经，同时以南、北两种藏经的版本为底本进行核正，其态度认真严肃于此可见。佛经的校勘标志着西夏文佛经的翻译整理出版朝着更加准确、细致的方向发展，这是佛教在西夏高度发展的反映。出土的西夏文佛教文献表明，所校经典大都出自这一时期。

除仁宗一朝校经外，也还有另外的皇帝在位时校过佛经。《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卷首有西夏文题款："天力大治、孝智净广、宜德纳忠、长平皇帝嵬名御校。"这一题名的尊号属哪一个皇帝尚难断定，但据这一尊号不同于已知的惠宗、崇宗、仁宗尊号，而校经又不可能很早，估计为仁孝以后的一位皇帝。

西夏大量出版佛经除社会上佛教信众很多，对佛经的需求量很大外，西夏佛教内部制度也是佛经大量需要的原因。西夏法典规定：要想成为在家僧人必须能诵读《莲华经》、《仁王护国》等二部及种种敬礼法，而要成为出家僧人更为严格，应能熟练诵《仁王护国》等十一种经颂，并要当场考核[1]。根据当时的政策，僧人不仅可以不劳作，还能蠲免赋税，很多人希望进入佛门。法典规定对僧人读经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西夏佛经的出版事业。

[1]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一一"为僧道修寺庙门"，法律出版社，2000。

总之，西夏翻译、出版中原地区的典籍，为其所用，满足了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首开西夏出版的先河，并从中取得出版其他典籍的经验。

## 二、西夏书籍的编纂

西夏社会的需要推动了西夏的出版。从出土的西夏图籍可以看出西夏本土撰著的书籍种类多，数量大，反映出西夏出版的规模和繁荣程度。

### (一) 西夏语文著作的编纂

西夏为了发展民族文化，推行西夏文，规范和扩大西夏文字的使用，便效法中原王朝和其他民族，编印多种类型的字书和韵书。

1. 西夏文韵书《文海宝韵》是类似汉文《切韵》的韵书，但它又有解释文字构造的内容，是字书和韵书的结合。刻本《文海宝韵》卷首残失，缺序言，有幸的是《文海宝韵》的略抄本还保留有书前的序言和卷末的题款。尽管序言和题款已成多枚残片，

经拼合后仍可知其大意。其序文中有“朕”的字样，知为御制序，可见西夏皇帝对编辑、出版西夏文字书的重视。以皇帝的名义作序，已彰显出本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御制序中又强调《文海宝韵》的作用，认为它是“全国要害”，是“增长智慧本”，它可以用来解释佛法经藏、王礼、律令，又是儒诗、阴阳、凶吉、季记（历法）、歌本集等行文之本源。其实这里所说包括了西夏文字和文献的作用。因为《文海宝韵》包括了所有的西夏文字以及字形、字义和字音的解释，在序言中强调此书在西夏社会文化中的作用也是很自然的事。序言还以比兴的手法，以大海、高山为喻，明确指出在各行各业中以“字宝”为上，这与中原儒学一脉相承。在抄本《文海宝韵》上声、入声代表字之后、正文之前有西夏字一行：“大白高国文海宝韵上声入声第二”，可见此书的名称是《文海宝韵》，全称为《大白高国文海宝韵》[1]。书名前冠有国名，应是官修书。更可见西夏统治阶层对民族语言、文字基本书籍编纂出版的重视。（图27）

序言第二面中记“……已遣罗瑞智忠等始为《切韵》……”，罗瑞智忠应是编纂此书的主要人员。序中接着又提到“遴选……

【1】史金波：《〈文海宝韵〉序言、题款译考》，《宁夏社会科学》，2001(4)。



图 27
西夏文韵书《文海宝韵》

等十六人"，可能以罗瑞智忠为首的一批专家共同编辑此书，此书是集体编撰的成果。

《文海宝韵》书后的题款存21行，每一行都是带有职官称谓的人名，他们是主持或直接参加编辑《文海宝韵》主要人员。可惜具名的下部皆残，所有人名全部阙佚。但是我们仍能从残存的题款文字结合《文海宝韵》的序言透视《文海宝韵》编辑人员的一些情况。残存的题款职官称谓有代表职官等级的官位，此外还有职事官称谓。[1] 其中前8人有中书或枢密等职位，属于职官的上品。首位被授予"业全"的官位，地位很高，可能他以宰相身份领衔编辑西夏韵书。书名前冠有"大白高国"，也可知是官修典籍。这样一批身居高位的官员参与了《文海宝韵》的编纂工作，证明了西夏对文字、文化的重视。他们当中一些人可能只是挂名，不是具体编辑《文海宝韵》的人。在这21人当中应该有这部重要著作的主要编者罗瑞智忠，罗瑞智忠可能是一位僧人，其名字带僧人法号常用的"智"字，西夏僧人涉足世俗著作的编撰不乏其人。第9名有功德司正的头衔是僧人，而罗瑞智忠可能就是这位精通佛典，善于译经，通晓音韵的僧人。题款人名职称中还有"提举功德司正经契译主"、"三藏国师"，可知参与《文海宝韵》编纂的不止一位僧人。译经时往往涉及到音韵和字义，西夏的译经僧人应是熟悉西夏语言的专家。题款中还有"提点大恒历司"、"小头监大恒历（司)"的称谓，"大恒历司"是编纂历书等事务的机构，也属文化部门。中原地区熟悉历法的专家中，也不乏熟悉音韵的人。从第13人至17人的称谓中都残留有"切韵"二字，西夏有切韵博士，应是谙熟西夏音韵的专家。《文海宝韵》本身就是切韵著作。可知题款中有这样多的专业人员直接参与了撰写《文海宝韵》的工作。[2]

《文海宝韵》包括平声、上声、入声、杂类几部分，并对每一西夏字的字形、字义和字音作了注释。[3] 刻本《文海宝韵》正文保存有平声和杂类的大部分，缺上声和入声。这种韵书的编辑形式在中原地区的韵书中尚无先例。《文海宝韵》具有很高的学

【1】史金波:《西夏文〈官阶封号表〉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三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2】史金波:《〈文海宝韵〉序言、题款译考》,《宁夏社会科学》,2001(4)。

【3】К.Б.Кепинг、В.С.Колоколов、 Е.И.Кычанов、А.П.Терентьев –Катанский : Море письмен(文海),1969,莫斯科。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3。《俄藏黑水城文献》第7册,122~176页。

术价值，它不仅反映了西夏学者对本民族语言认识和研究的深度，也反映了那一个时代对语言的认识和研究的水准。

据残序记载和推断，西夏毅宗䜩都辛丑五年（1061年）受梵文、吐蕃文和汉文字的影响，开始酝酿编纂《文海宝韵》，成书在天赐礼盛国庆年间（1069—1073年），属西夏前期。此御制序可推断为惠宗的御制序。惠宗时母后梁氏摄政，一反毅宗崇尚汉礼的政策，而是"复蕃仪"，推行党项族文化。系统地记录和解释"蕃文"和"蕃语"的《文海宝韵》，其编纂出版就是在这种大力推行蕃文化的背景下完成的。《文海宝韵》刻本以宋代公文纸背面印刷，其中一页背面有汉文"建炎二年"字样，可知传世的刻印本出版在建炎二年（1128年）以后，时在西夏中期。而写本的抄录时间当在刻本之后。

2. 西夏文字书《音同》全书将所有西夏字以声母分为9类，每类中又分为若干语音相同的字组，每组中包含多少不等的西夏字，也有部分没有同音字的独字。每字下以同义词、反义词和注释等方式解释字义。这种字书的编排方式也很独特。

《音同》主要编纂人员在重校序中有明确记载。该序始称"今《音同》者，昔切韵博士令六犬长、罗瑞灵长等创立"。《音同》有多种版本流传。据《音同》序、跋和重校序可知先后出版五种版本中涉及作者、改编、校勘者除上述两位外，还有：改编者学士浑□白、勿明犬乐，据前两种版本整理者学士兀罗文信，再次整理者义长，重新校勘者学士梁德养。[1]

《音同》的校勘者梁德养是西夏的著名学者，有多种著作流传于世，对西夏文化颇多贡献。他在《音同》重校序中明确提出："德养见此书（含有）杂混，乃与《文海宝韵》仔细比勘。"可能原来的《音同》没有比照《文海宝韵》校勘，平声、上声不分，自梁德养校勘后才出现了新的变化。《文海宝韵》编成一百多年后，西夏的语言学家仍需要以它来校勘《音同》，使之更加符合西夏语的语言实际。（图28）

《音同》版本很多，皆为刻本，可大体上分为两种，即义长

【1】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的版本与校勘》，《民族古籍》，1986(1)。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西夏文史论丛》(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的整理本和梁德养的校勘本。一般把前者称为甲种本，把后者称为乙种本。义长的整理本共56页，此书几经学者改编、整理，特别是受到身为节亲主(皇族)、中书、知枢密院事的嵬名德照的关注和参与，可见当时对此书的重视。据《音同》甲种本序言中称："依音立字，语及句成，乃世中大宝，为庶民所看之典。"《音同》的编纂目的是为了西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规范的需要[1]。

图28
西夏文字书《音同》

【1】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

两种《音同》版本都是同一种著作的整理、校勘本，因此体例上是一致的。但它们在同音字组的划分和独字的区别上有很大不同。《音同》这种西夏字书自编成后，一再修改、校勘，除学术上研究进展的原因外，表明了社会的需求量大，不得不一再刻印出版。

3. 包括韵图和韵表的《五音切韵》是西夏另一部重要的西夏文韵书，也出自黑水城。它有6种写本[2]。其中甲种本有一篇完整的序言。其内容与上述《文海宝韵》序言颇多重复之处："今观察（各）种文，西天、羌、汉之切韵已有，今文字之五音者，平上去入各自字母已明，清浊平仄分别，重轻分清，上下品明，切字呼问，韵母摄接，为文库本。集聚寻处，永远不忘，当传行也。以朕之功德力，今因切韵者依时而竟，全国之要害，真智慧增胜本，佛法经藏、王礼律令、儒诗、清浊、双阴阳、吉凶、季记、道教、医人、算法、巫歌本集等，行文之本源也。譬如大海深广，诸水积处不竭不涨，用寻皆有；日月普照，愚智悉解。各山中须弥最高，诸业中一切无比宝中文宝最上。是故建立《五音切韵》者，摄《文海宝韵》之字，名义不杂混用之纲纪也。此义当知。"[3]（图29）

【2】〔日〕西田龙雄:《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上)(中)(下),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81年3月–1983年3月。《俄藏黑水城文献》第7册,259~398页。

【3】此序西田龙雄教授曾全文翻译,见《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上),122~123页。后李范文教授录入《同音研究》,见该书23~26页。本文译文有所改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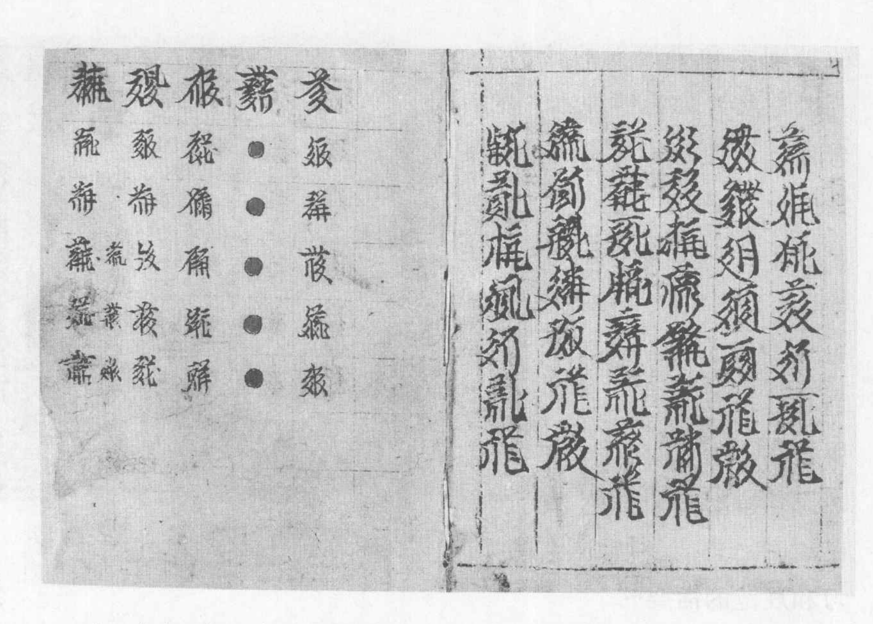


图29
西夏文写本《五音切韵》

《五音切韵》序有“朕”的字样，也应是御制序。由其内容不难看出，其末句“是故建立《五音切韵》者，摄《文海宝韵》之字”，证明《文海宝韵》成书在前，《五音切韵》编纂于后。《五音切韵》的序言也是大部分抄录《文海宝韵》的序言。看来《五音切韵》也作于惠宗时期。《五音切韵》的编撰和《文海宝韵》一样，也是在“复蕃仪”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们是西夏民族文化高度发展、出版事业兴盛的产物。

4. 还有一种集编西夏文同义词的《义同》，全书4卷，每卷7或8品，共32品，每品中集同义字或近义字为组，每组7言，间有8言者，共存32页，每页多为7行，有西夏字4 000余，无其他注释。[1] 从其书末题款有书者、年款、校阅者，后又有抄写者，前书者应为刻本的书写者，后抄写者是抄录刻本者。此书是著名学者御史承旨番学士梁德养阅校，原应有刻本，但至今发现的只有写本。此书便于举一反三地了解西夏文字义。

【1】《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70~107页。

（二）西夏史书和法典的编纂

1. 西夏重视西夏文的应用，既有掌管文字的番汉二学院，应对修撰本国历史有所作为，至少会积累、搜集相关的资料。西夏毅宗谅祚于嘉祐七年（1062年）向宋朝求赐《九经》、《唐史》、

《册府元龟》，但宋朝只赐予《九经》而不给《唐史》，因为其中记载了有关少数民族事，不愿让西夏知晓。当时西夏求赐中原史书也可能有参考借鉴编辑本国历史的用意。

记载西夏正式编次史书是仁孝时期。天盛十三年（1161年）仁宗“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彦、王签等为学士，俾修《实录》”[1]。焦景彦先后三次出使金国，时值权臣任得敬专权，焦景彦在朝刚直不阿，面斥任党，仁宗擢其兼枢密都承旨。后任得敬迫仁宗分国，仁宗派他到金国为任得敬请封，他抗疏求罢行。他主持编著《实录》应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然而西夏编修《实录》的具体情况并无详细说明，甚至这部《实录》也未流传下来。西夏的翰林学士院在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所有职司中并无记载，它也可能就是番汉二学院的一种汉文译法。

【1】《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仁宗时两次出使金朝的官员李师白尽得金国民风土俗，著《奉使日记》三卷[2]。内容当有夏金关系和金国社会状况。可惜此书也未传世。李师白在仁宗时任宣德郎，天盛十九年（1167年）出使金国贺正旦，“礼对闲雅，金主嘉之”，赏赐颇丰。后又两次出使金国[3]。

【2】[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七。

【3】[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六、三七。

西夏晚期罗世昌曾编撰《夏国世次》。罗世昌是银州人，在三朝为官，桓宗时任观文殿大学士，献宗时曾以南院宣徽使出使金国，后辞官归乡里，知国将亡，专心著书。“谱《夏国世次》二十卷藏之”[4]。看来这部重要的西夏史书当时没有印行，也未流传到后世。

【4】《金史》卷一三五《西夏传》。《西夏书事》卷三九、四十。

2. 编纂西夏法典是西夏出版史中的大事。《宋史·夏国传》上载西夏开国皇帝景宗元昊“案上置法律”[5]。这种法律书籍，是西夏自己编辑出版的本朝法典，抑或借鉴其他王朝的法律著作难以确定。在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比较完整的西夏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天盛律令》是一部系统、完备的王朝法典，是成书于12世纪中期、以西夏文刊印的大型法律著作[6]。此外又有以《天盛律令》为基础的《新法》、《法则》等。此外还有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

【5】《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6】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西夏天盛律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94。

《天盛律令》卷首的纂修大臣们的《颁律表》不仅提到编修和进呈，还涉及到颁行出版："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谆睦懿恭皇帝，敬承祖功，续稟古德，欲全先圣灵略，用正大法文义，故而臣等共议论计，比较旧新《律令》，见有不明疑碍，顺众民而取长义，共计成为二十卷。奉敕名号《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印面雕毕，谨献陛下，依敕所准，传行天下，着依此新《律令》而行。"《天盛律令》既称"改旧新定"，在此之前西夏已编定法律。西夏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第三卷中，有一条规定：对隐藏缴获敌对物者，按《律令》中受贿从犯判断[1]。可见西夏至少在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年）就有王朝法典《律令》，这要比天盛年间（1149—1169年）早四五十年。《颁律表》中有"用正大法文义"、"比较旧新律令"、"着依此新律令而行"等文字，皆可作为西夏早有《律令》的佐证。《颁律表》又指出，旧律有"不明疑碍"处，故而要加以修订。看来，西夏重新修律的目的是依据实际情况，使律令便于理解和实施，更加有利于王朝统治。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在保持法律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对原有法律进行修订是屡见不鲜的。看来西夏也是在编纂、出版《律令》后，不断修订。此次修律对旧律有哪些改动不得而知，但从政府十分重视可以看出，此次修订可能作了较多的修改，就连卷数也可能作了改动。《颁律表》中提到"一共成为二十卷"，西夏文"成"字是"变成"之"成"，推测旧律可能并非二十卷。

作为国家法典《天盛律令》的编纂组织人员更多，规格更高。卷首的《颁律表》后有纂定者19人，由北王兼中书令嵬名地暴领衔编制。嵬名地暴是皇族，所任北王兼中书令是皇帝以下最高的职位，但此人在汉文史书中无载。看来西夏王朝的法典也是宰相领衔官修。其他参加编纂的人员分别赐有官位。有中书、枢密职位的就有9人，其中皇族6人。其他也是各司首长。可见参与编纂的集中了不少政界、文化界的权威人物。法典编定后，进呈皇帝批准然后刊布施行，使这一法典更具权威性。

【1】陈炳应：《〈贞观玉镜统〉研究》，9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俄藏黑水城文献》第9册，345~365页。

“天盛”为西夏仁宗年号，共21年。由于《天盛律令》中未记有具体年款、干支，因而难以确定此律令颁行的具体时间。西夏天盛年间正是权臣任得敬入朝、专权、分国、覆灭的时期。从《天盛律令》的内容看，这部法典是极力维护皇权的，除规定对种种有碍皇权的行为处以重刑外，还规定得封王号者须是皇族嵬名氏，在番、汉官员的排列上，官位相同时，番人在前，汉人在后。这些规定对汉人任得敬来说，都是其升擢、篡权的障碍。在任得敬握有实权时，是不会下大力量去完善、肯定这种律法的。《天盛律令》很可能是在任得敬入朝不久、影响尚不很大的天盛初年颁行的。《天盛律令》是一部系统的王朝法典，是中国中古时期唯一保存基本完整原本的法典。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继《宋刑统》以后又一部印行出版的王朝法典，也是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颁行的法典。《天盛律令》20卷中有9卷完整，10卷各有不同程度的残缺，1卷全佚，现保存约为全书六分之五。书前有所谓“名略”，是各律条的名称，为全书的总目录。通过“名略”可大致了解残失条文的主述内容[1]。

【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华传世法典》之一,法律出版社,2000。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8册。

《天盛律令》从形式到内容都接受了中原王朝成文法的成熟经验，特别是《唐律疏义》和《宋刑统》都对西夏《天盛律令》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西夏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所修律令也有自己的特点。在内容上具有民族和地方的特色，更为丰富，并且在形式上也与唐、宋律有很大不同。

《天盛律令》在篇目设置上很有特点。它未明确区分为若干律，各部分内容排列次序与唐、宋律差别很大。它与《宋刑统》相近的是每卷有多少不等的门，共150门，分1 461条。形式上另一特点是全部为统一格式的律令条目，既没有条后附赘的注疏，也没有条外另加的令、格、式、敕。这样不仅使律条眉目清晰，易于查找，也可避免宋朝律外生律，编敕太多，轻视本条的弊病。西夏律法能依据本朝实际情况，别开生面，将律（刑法）、令（政令）、格（官吏守则和奖惩）、式（公文程式）系统地编入律令之中，使之成为整齐划一、条理清楚、比较完备的法典，便

于使用翻检。

《天盛律令》的又一个特点是创立了分层次的条款格式。一条中若包含几项不同情况，则分几小条叙述，若小条下再有几项内容，则再分几小款叙述，分条降格书写，其他依此类推。这种条文形式使内容纲目分明、层次清楚，很近于现代的法律条文形式。在中古时期西夏创造了这种一目了然、便于掌握使用的律令条目形式，是中国法制史和出版史上一次大胆的、成功的革新。可以说，《天盛律令》在出版形式上的系统性、层次性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西夏王朝虽也是封建社会，但它没有中原王朝那么多传统束缚，因此在编纂出版法典时能在融会贯通前代法典的基础上，突破旧的形格势禁，取得新的进展，在中国法制史和法学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后中国的王朝法典一直没有利用这种形式，直至清末受到西方法律格式的影响，才出现了类似的改革。[1]（图30）

【1】史金波：《西夏〈天盛律令〉及其法律文献价值》，《法律史论集》（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8。

3.《贞观玉镜统》是西夏贞观年间的一部专门的军律，黑水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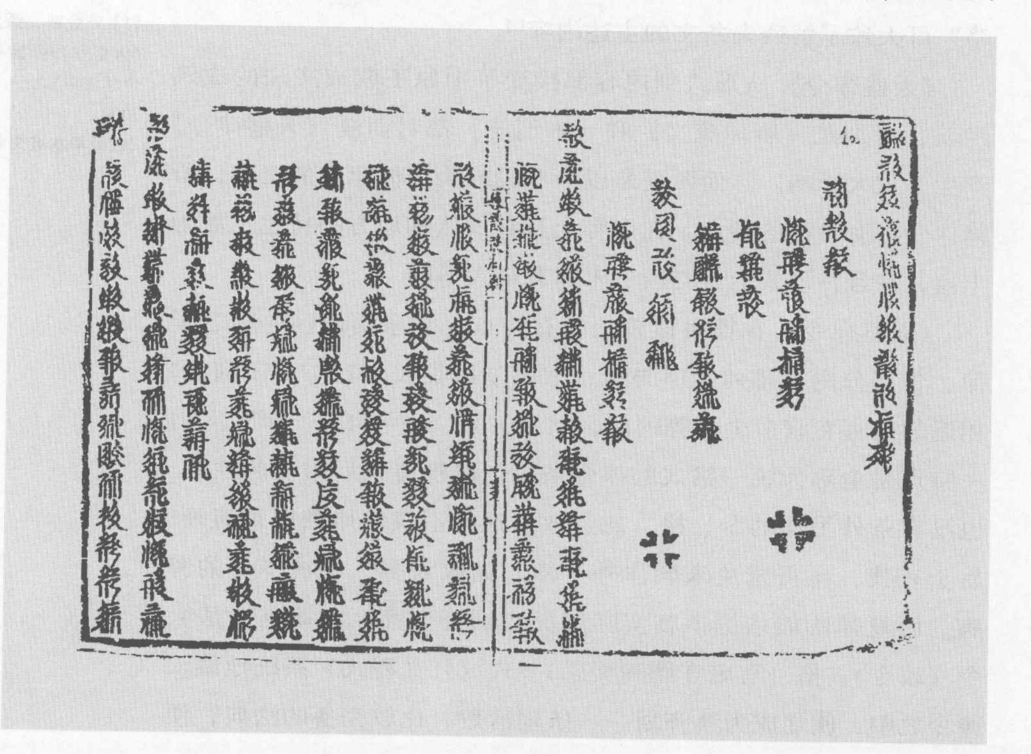


图30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出土有残刻本，版心有西夏文页码，各卷自成起讫。该刻本保留了残序半页，指明此军事法典的制订为正军令，明赏罚，规范将帅至士卒在用兵、行军、作战时的行为。内容有为将帅受命、牌印旗鼓、行军布阵、作战中杀敌、俘获的功赏、损失兵马、虚报隐瞒俘获罪、进攻和胜利的规定[1]。这种军法的制订目的是为刺激将士用命，保证战争的胜利。它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只能是官修。

【1】E.I.克恰诺夫、H.弗兰克：《十——十三世纪西夏和中国军事法典的渊源》，1990。陈炳应：《〈贞观玉镜统〉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国的军事著作很丰富，主要是兵书和兵制。至今稀见类似《贞观玉镜统》这样的专门军法文献。北宋曾公亮等奉敕撰《五经总要》载"罚条"70多条，文字仅数页。西夏的《贞观玉镜统》虽是残本，至少分为四卷，条款内容丰富，有罚有赏，且有具体时代。《贞观玉镜统》可以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专门军事法律著作，它的出版丰富了中国法律文献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文献和文物价值。（图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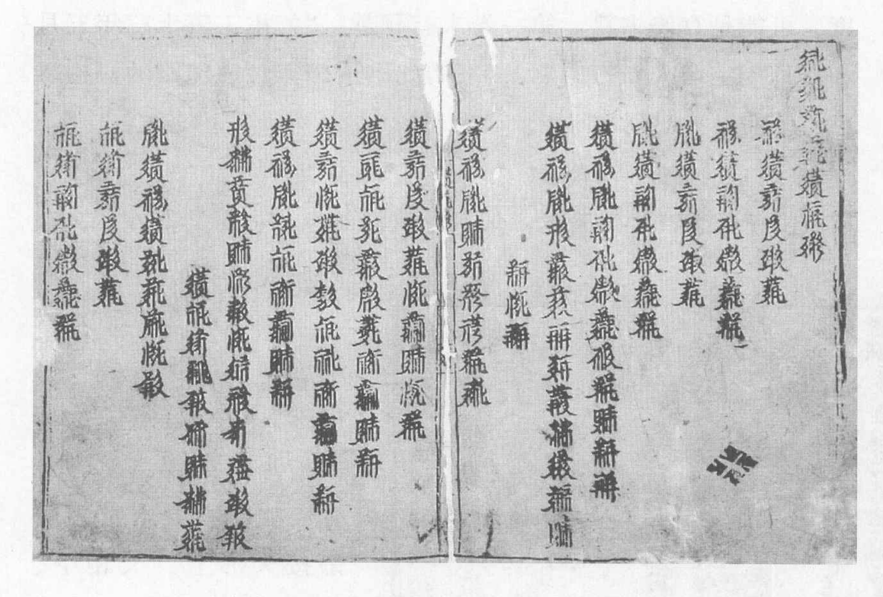


图31
西夏文刻本《贞观玉镜统》

（三）西夏类书的编纂

西夏还出版一种大型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它直接记录了西夏的自然状况和现实社会制度与生活。该书为五册，十五卷，每卷分为多少不同的类，共合一百四十二类，每类中有若干词语，每一词语下有双行小字为之注释。第一卷至五卷为星宿、

天象、时令、山川、草木，第六卷、七卷、九卷为农田、物产、耕具、畜产、野兽，第八卷、十卷至十二卷为服饰、饮食、皇室、官制、佛法、司事、军事，第十三卷至十五卷为人品、亲属、婚姻、贫富等。全书约计200页。该书存有残刻本，仅存原书四分之一左右[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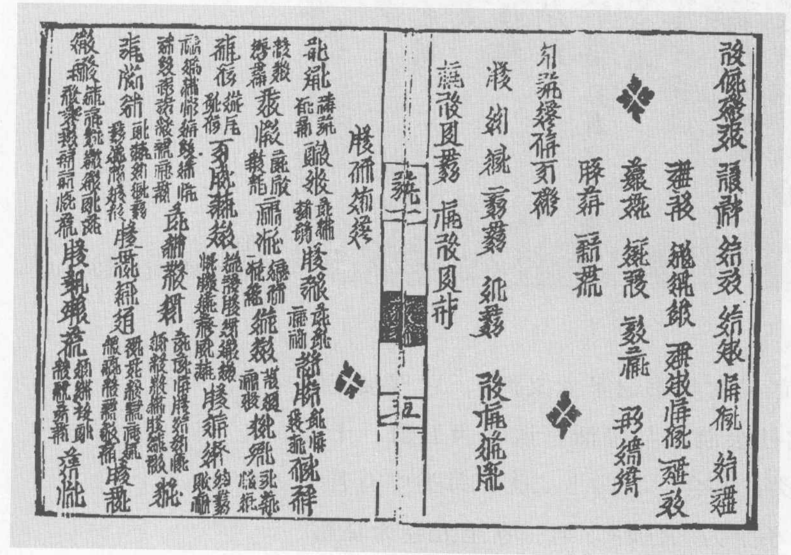
【1】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243~267页。

《圣立义海》书前有诗序，其中有关编辑出版意图的有："……世事名广以文记，国业多义以字显；佛法世经德行礼，王仪式歌诗赋中；选界察典顺辩才，决断义论依知做；天下诸物空边等，地上名号如大海；臣等智微讷辩才，义章不准后智合"。意为世上事物名目繁多，物品、国事、佛事、仪礼、典章等都要记录下来。残本中未见这部重要著作编著者的具名，只知是一些大臣，估计也可能是由权威大臣和学界名流编纂。这样内容丰富的类书，特别是其中有西夏的山川地理和包括皇室在内的典章制度，可能是官修书籍。第一卷末有题款："乾祐壬寅十三年五月十日日刻字司人新行印制"，证明此书由国家董理印刷的机构雕版，此前已有旧刻本问世。（图32）

（四）西夏蒙书的编纂

由于西夏社会教育的需要，除官修的经、史、类书外，又有多种蒙书出版。

图32
西夏文刻本《圣立义海》



1. 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很有特点。全书共37页，以天、地、人分类，将社会上常用词语按天形上、天相中、天变下、地体上、地相中、地用下、人体上、人相中、人事下分为九类，其中以人事下内容最多。书中每一词语都

有四项，中间两项分别为西夏文和相应意义的汉文，左右两项分别为中间西夏文和汉文的相应译音字。懂汉语文不懂西夏语文的人可通过此书学习西夏语文，而懂西夏语文不懂汉语文的人也可通过此书学习汉语文。西夏提倡番汉人民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番汉合时掌中珠》就是番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一部工具书。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说："然则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具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作者还直接阐明编纂此书的原则和目的："准三才集成番汉语节略一本，言者分辨，语句昭然，言音未切，教者能整。语句虽俗，学人易会，号为《合时掌中珠》。"显然这是一部用于两个民族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通俗著作。

一些有特色的蒙书类普及读物，往往是个人编撰。《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编写者是骨勒茂才。骨勒是番姓，知其为党项人，未记任何职称。此序末记载时间为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属西夏后期。尽管这时距西夏灭亡只有37年，此书也非一次出版，中间曾有修订。现所见至少有两种版本。在第7页有"此掌中珠者三十七面内更新添十句"，可见这是个增补本[1]。（图33）

【1】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1~3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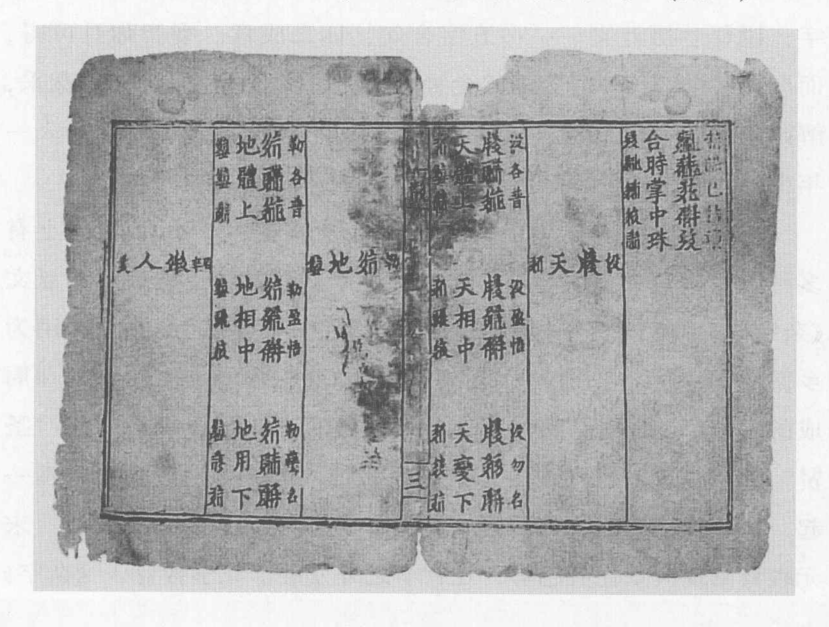


图33
西夏文汉文对照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

2.《新集碎金置掌文》（以下简称《碎金》）也是蒙书的一种，约成书于12世纪初期以前。全文一千字，每句五言。编纂者是宣徽正息齐文智。宣徽为次等司，主管职官名籍，息齐也是党项姓。编者巧妙地将1 000个不重复的西夏字编成了长达200句、100联的五言诗，编排方法和叙事列名的顺序与汉文《千字文》相仿，只不过本书每句五言，《千字文》每句四言。全书没有明显的章节，自然也无类目。书中正文开始是自然现象、时节变化等，后为人事，包括帝族官爵、番姓和汉姓、婚姻家庭、财务百工、禽兽家畜、社会杂项等。《碎金》反映了西夏的社会、民族、习俗、文学状况。如在第14联皇姓嵬名之后，罗列西夏王朝职官、职司，对研究西夏职官制度颇具参考价值。在第39联后有12联120个汉姓，不仅有姓氏本身的意义，还有隐含的双关意义。如"金严陶萧甄，胡白邵封崔"，隐含着"金银大小珍，琥珀少翡翠"；"曹陆倪苏姚，浑酒和殷陈"，隐含着"秋露宜酥油，浑酒和茵陈"。作者在编辑此书时匠心独运，形成本书一大特点。

关于《碎金》的编纂目的和方法其序言中已经阐明："夫人者，未明文采，则才艺不备；不解律则，故罪乱者多。今欲遵循先祖礼俗，以教后人成功，故而节略汇集眼前急用要义一本。不过千字，说释总摄万义。……五字合句，四二成章。睿智弥月可得，而愚钝不过经年。号为《碎金置掌文》。"该书编书目的是明文采，解律令，懂礼俗，教成功，聪明者一月可以学会，不聪明的人一年也可以学成。实际上是一本速成识读西夏文的蒙书[1]。(图34)

【1】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1995(2)。

3. 西夏文《三才杂字》（以下简称《杂字》）黑水城出土有多种版本，其中有刻本。后来在甘肃武威和敦煌也发现了西夏文《杂字》刻本残页。《杂字》在古代属字书一类，最初大多用为乡塾的识字课本。这种书肇兴于公元3世纪张揖的《杂字》和周成的《杂字解诂》，其后便逐渐风行民间。它很少讲到古代"圣贤"的言论，而专门搜集日常口语，把一大批零散的词语堆在一起，构不成完整的文章，所以始终不列学官，也和科举无缘。宋元教育出现大众化的趋势，在官学之外发展了私学教育，《杂字》



图34
西夏文写本《新集碎金置掌文》卷首

之类的蒙书在基层流行。元代明令限制使用“杂字”来教授乡塾，更导致其地位的跌落。此后除了后来明清官方组织编纂的“译语”类字书外，“杂字”到了清代均已亡佚殆尽。任大椿、马国翰将前人书中偶然引用的《杂字》条目，分别辑入《小学钩沉》和《玉函山房辑佚书》，但最多的一种亦仅零星二十余条。敦煌石室也出土汉文本《杂字》，虽有10种，都是残缺不堪的散页，作者不一，年代不详，篇幅短小，难窥见《杂字》类书籍的全貌。

西夏文刻本《三才杂字》虽有完整的序言，但未记载本书的编者。内容包括了西夏语的常用词语，以天、地、人分为三品，每品分为若干部，每部又包括若干词。其各部目录为：“上天第一”，包括天、日、月、星宿、闪、雷、云、雪、雹、霜、露、风、天河；“下地第二”，包括地、山、河海、宝、绢、男服、女服、树、菜、草、谷、马、骆驼、牛、羊、飞禽、野兽、爬虫昆虫；“中人第三”包括族姓、人名、汉族姓、节亲与余杂义合、身体、舍屋、饮食器皿、□日略类、诸司与余用字合、军杂物。其序言中强调此书为民庶学习而作：“彼村邑乡人，春时种田，夏时力锄，秋时收割，冬时行驿，四季皆不闲，又岂暇学多

文深义？愚怜悯此等，略为要方，乃作《杂字》三章。此者准三才而设，识文君子见此文时，文缘志使莫效，有不足则后人增删。”此书除有多种刻本外，还有多种写本，可见它的出版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是流行较广的一部书[1]。(图35)

【1】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三才杂字〉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5年(6)。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3)。

4. 西夏还编辑了一种汉文本《杂字》，这是西夏保存至今为数不多的汉文世俗著作之一。

汉文本《杂字》由于残失首尾而不知其编者。该书是以事门分类的词语集，分为二十部，有汉姓、番姓、衣物斛豆果子、农田、诸匠、身体、音乐、药物、器用物、居舍、论语、禽兽、礼乐、颜色、官位、司分、地分、亲戚长幼，反映了西夏的民族姓氏、生活用品、生产活动、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西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解西夏社会提供了很多第一手资料。西夏编写出版汉文《杂字》反映西夏的名物制度，说明汉文化和党项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2]。

【2】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二),167~185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图 35
西夏文刻本《杂字》



5. 西夏人还别出心裁地编撰了一部奇特的西夏文辞书，名为《纂要》。该书以事门分类，残本存第五类“器皿”，第六类“乐器”，第七类“花名”。其中每一个西夏文词语都用汉语注释，但这种注释并不用汉字，而是用为汉字注音的西夏字。此书对懂得汉语又粗通西夏文的人了解西夏词语的准确含义很有帮助。编辑出版这样的辞书同样表明当时西夏境内番、汉语言同时使用、互相交流的需要，也反映了编著者的匠心。

以上《番汉合时掌中珠》、《新集碎金置掌文》、《三才杂字》等出版物除在黑水城出土外，在敦煌等地也有出土，版本很多。可能在重视民族文字文化的西夏，初识文字、启蒙教育的蒙书在民间受到青睐，在西夏世俗著作的出版中占有重要地位。

(五) 西夏文学作品的编纂

1. 西夏重视民族文化，把流行于社会的谚语，编辑整理成书。西夏文谚语集《新集锦合辞》是仁宗时乾祐七年（1176年）梁德养初编，至乾祐十八年（1187年）王仁持增补刊印出版。书中共有364条谚语，每条谚语由两句前后对仗的文字组成，其中反映了很多的西夏社会习俗。西夏谚语内容十分丰富，反映出西夏人，特别是党项民族的聪明睿智和生活理念。如“权者宅门设恶人，富者院中闹恶犬”；“无德富贵天中云，非道贮财草头露”；“不敬有智敬衣服，不爱持信爱持钱”；“千羊中有疮便招引蛇虫，万牛中有兜咀便有些痕迹”[1]。这些富有哲理性的文句中，包括了不少具有民族特点、充满生活气息的内容，特别是一些与游牧生活有关的内容更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时代特点，有些诗句反映了当时阶级社会中贫富悬殊的现象以及对道德和金钱的朴素认识。

黑水城出土有乾祐年间刻本，基本完整。在作者梁德养死后，接续完成整理者王仁持写的序言也提及编纂此书的宗旨：“千千诸人不离礼式，万万民庶谚语何弃。虽如此爱信，然句数众多，诸本中因差异……因此德养引用诸文中各事，辩才寻句；中顺诸义，要择语词；句句相承，说智者道；章章合和，演愚俗

[1] 陈炳应：《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礼。如此各义诸事说用谚语虽大体已集，然首尾未全，及德养寿终去世，此书自然已晦搁置。仁持欲□先智之□□，成后愚者利益，使□□首末成篇，序文具全，以流传世间，若文意非准，智者莫嫌。”作者编辑谚语集的目的为“说智者道”、“演愚俗礼”，使之在世间流传。这种书籍的编纂、出版在中国的中古时期也很有特点，其宣扬民族文化、开启民智的意图显而易见。（图36）

2. 西夏重视本土文学也反映在西夏出版诗歌集上。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用西夏文撰写刻印出版的诗歌集。其中包括《赋诗》、《大诗》、《月月乐诗》、《道理诗》、《聪颖诗》等，题款载明为乾祐十六年（1185年）刻印。诗歌集背面是佚名的写本诗歌集，包括《巡行西方烧香歌》、《同乐万花堂歌》、《圣宫共乐歌》、《新修太学歌》、《天下共乐歌》、《君臣合和歌》、《君臣同德歌》、《比邻国夏德高歌》、《劝世歌》等28首。还有一写本诗歌集中有《有智无障歌》等7首，每首题目下有作者[1]。在无法掌握西夏诗歌全貌的情况下，这些诗作是透视西夏诗歌最重要的窗口。由西夏诗歌集中各首诗歌的署名知道西夏的诗人没西义显、

【1】《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267~315页。

图 36
西夏文刻本《新集锦合辞》



依力礼盛、梭嵬有志、没玉志长等。这些诗人虽属御用文人之列，也是目前仅知的诗人。（图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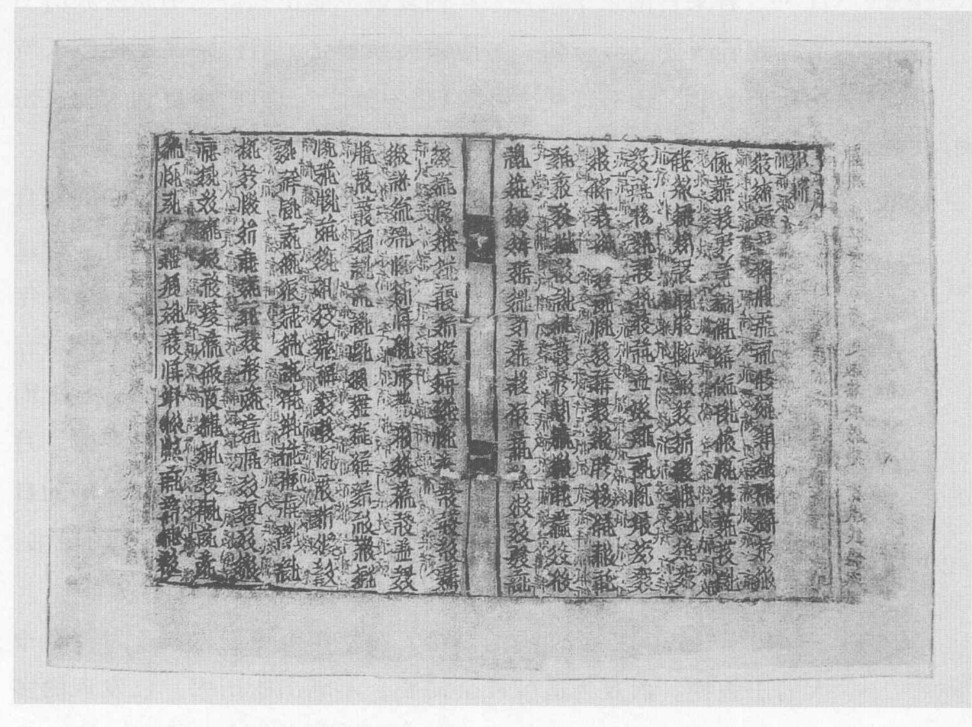


图37
西夏文刻本《大诗》

（六）西夏历书和医书的编纂

1. 党项羌至隋、唐之际，仍然“候草木以记岁时”[1]。党项羌北迁后建立的夏州政权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奉中原正朔，采用汉地历法。西夏前期所用历法为宋朝颁赐的历法。李德明时期请求宋朝颁给历书。《宋史》载：宋乾兴元年（1022年）曾向西夏“遣阁门祇侯赐冬服及颁《仪天具注历》”[2]。中原王朝向周边的王朝或政权颁赠历法，不仅说明中原王朝的科学发达、历法精审，更重要的是表明了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接受中原王朝历书的周边王朝或政权要遵从中原王朝的“正朔”。元昊称帝，宋朝视为叛逆，自然停止了颁历。这时，元昊“自为历日，行于国中”。至宋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达成妥协，西夏向宋称臣，翌年宋朝向西夏颁赐历书。《宋史》记载：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十月“辛未，颁历于夏国”[3]。可能宋朝每年颁给西夏下一年的历书，

【1】《隋书》卷八三《党项传》。《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

【2】《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3】《宋史》卷十一《仁宗纪三》。

而西夏为满足社会需求，在境内翻印出版。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因宋夏失和，八月宋高宗“诏以夏本敌国，毋复班（颁）历日”[1]。看来自南宋于绍兴二年西夏就不能正式得到中原所颁历书了。此后西夏臣侍金朝，与南宋关系紧张。后仁宗又派使臣入贺宋朝天中节，致送贺礼，并“自是岁如之”，自此西夏和宋朝又恢复往来[2]。但不知是否从宋朝得到历书。

西夏的历书目前见到的有多种，其中有写本西夏文—汉文合璧历书，为表格式。每年一表，右上角有该年的干支。有一种是从庚子年至癸亥年共连续84年的历书，也即从西夏元德二年(1120年）至天庆十年（1203年），历经西夏崇宗、仁宗、桓宗三朝。其中每年一表，表中每月一行，各行分为很多横格，自上而下为月序、该月朔日干支、日、木、火、土、金、水、罗睺、月孛、紫炁等星宿与该月时日的关系[3]。由此历书可知，各年的日干支和中原历书完全一致。这种用夏、汉两种文字制作的历书，也许说明在西夏党项人和汉人共同研究编辑历法。

历书是民间广泛使用的书籍，每年都要更新，属于发行量很大的出版物。西夏为适应社会需要，不断出版历书。已发现的多种汉文印本历书，皆为残片。其中既有刻本也有活字本。皆为具注历，一年中每月开始有1大竖格，又分为若干横格，横格自上而下为1—12月的月序、以颜色组成的月九宫、以干支表示的月建、该月的节气时刻等。1个月中每日占1竖格，也分为若干横格，横格自上而下为各日日期、日干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表示的纳音、建除十二客、有以星名表示的二十八宿、有表示月亮盈亏的上下弦、有类似星期的7日一注的蜜日注、有与节气对应的动植物变化的物候、有载明当日行为利弊的吉凶注、有当日日出日入时刻、有表明当日人神在身体某一部位的人神所在等，内容十分丰富。这与敦煌发现的宋代具注历日的形式基本上一样，并且增加了二十八宿。又有汉文乾祐十三（1186年）年刻本历书残页。两种残历书多处“明”字的右部的“月”缺中间两横笔，也即此字的最后两笔。这显然是避讳字。李德明名字中有“明

【1】《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

【2】［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十一。

【3】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NO.8085。

"字"，他的后辈确实避其名讳。说明这些残历书都是西夏出版的历书[1]。当时中国的历法计算和历书的制定具有先进水平。西夏出版的历书借鉴中原历法的成就，也有和中原地区相同的科学水平。（图38）

【1】史金波：《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文物》，2001(10)。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513~67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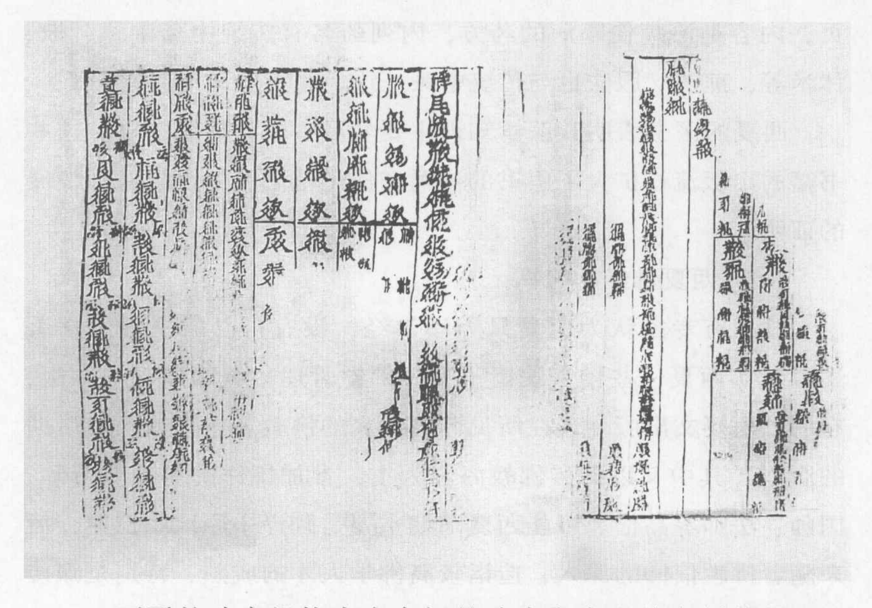


图38
西夏文刻本光定五年御制光明万年历

2. 西夏的政府机构中有专门的治疗疾病和从事制药的医人院、制药司[2]。表明西夏医学、医药受到政府的重视。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多种医书。如西夏文《治热病要论》存38页，主要内容是治疗妇女病、恶疮病等，中有病名、药品、药量、煎法、服法，一般不用多种药配伍，似属单方、验方之类。此医书很有特点，可惜不知何人、何时编写。又有封面题《明堂灸经》的写本，首页标题《新译铜人针灸经》，存19页。其序言提到"依孙思邈明堂经中说"，又有"诸人莫生疑，当依此作"，应是权威针灸著作，但与宋本《明堂灸经》不同，可能是西夏据中原著作改编的著作。还有西夏文医方残卷，有的包含有治疗牙齿病痛、消瘦不止、热寒恶暑、腰痛及胃寒、肾虚耳鸣、妇人乳痛、口疮、目眩、目赤等。每一药方中都有所治病症，若是成药还有药名，如四白丸、薯蓣栢皮丸、豆蔻香莲丸、返阳丹、豆滤丹、黄芪丸、乌贝丸等，有的则没有成药名；后列所用中药名及所用药

【2】《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司序行文门"，372页。

量，最后是制作方法和服用注意事项。黑水城遗址还出土有一件汉文医方残页，其药方中的形式，如医方名、所治病症、药名、用药量、制作方法和服用注意事项与前述西夏文医方完全相同。[1] 1971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遗物中，有一件西夏文写本药方残页，内容是治疗伤寒病的药方，内列药名有传统中药牛膝、椒、秫米等，煎法、服法也与传统中医一致。[2]（图39）

【1】《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174~189页。

【2】史金波《〈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质疑》，《考古》，197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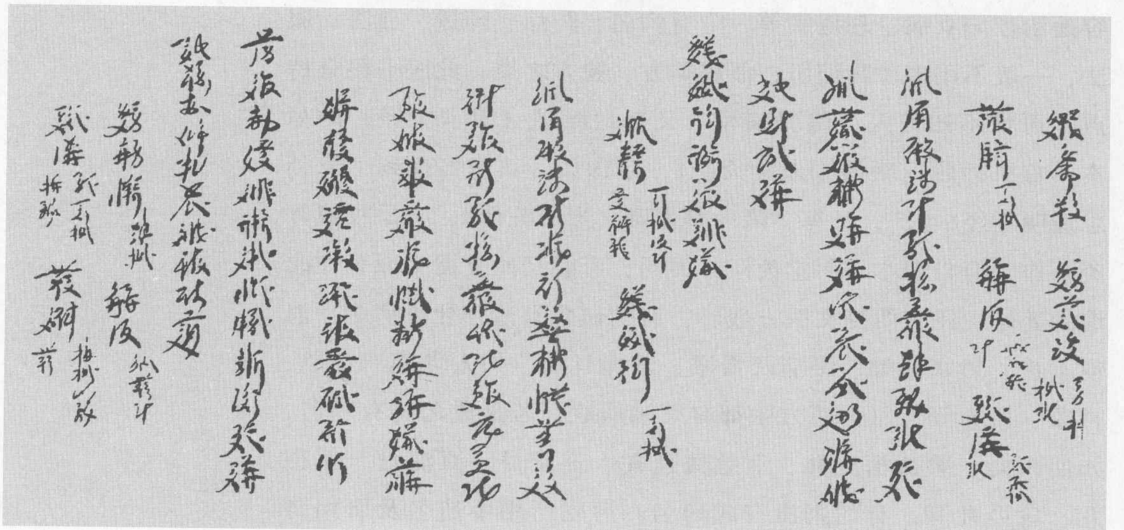
西夏的医书表明其医学知识主要学习中原的传统医学。这些书籍的出版流行扩大了医书的传播和使用范围，是西夏医学发展的证明。

（七）西夏佛经的编纂

过去有专家认为西夏只翻译佛经，没有自己编撰的佛学著述。其实西夏一些僧人编撰了不少佛学著述，有的以汉文出版，有的以西夏文出版。现在所见西夏编纂的佛教著作多为西夏后期的版本，其中又以藏传佛教内容为主，参加撰作的有西夏帝师、国师、法师等高僧。可能西夏前期主要是翻译中原地区佛典，后来随着佛教信仰的深入，造诣较高佛学人才的成熟，特别是藏传佛教的传入，使西夏本土撰著出版的佛教著作便丰富起来。

贤觉帝师是仁宗时的佛教领袖，有“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怀卧勒”的称谓。“怀卧勒”中“怀”为赐意，

图 39
西夏文写本药方



“卧勒”系西夏官位中的上品封号，可译为“俱全”，于臣宰封号中为最高，相当于大国王的地位。不难看出他在西夏的宗教地位极高，官位也很高[1]。他又被称做贤觉菩萨，他的传著要经过别的高僧译成西夏文。他不是党项人，而是西夏的吐蕃族高僧。他曾撰作《忏罪千种供养奉顺中已集当许文》、《圣观自在大悲心依烧食法事》、《圣观自在大悲心依净瓶摄受顺》、《三字咒曰颂以间禁绝要论及疾病中护顺要论》、《一切如来百字要论》、《默有自心自劝要论》、《禁绝顺要论》、《默有者随胜住令顺要论》、《奉敕修行者现在及转身利缘佛顶尊胜佛母依千种供养奉顺中共依略忏悔文》、《等持集品》等多种。

另一个撰著不少佛经的慧宣帝师有大波密坦的头衔，即博通五明学者。他也是在西夏的吐蕃人。他曾作《风身上入顺》及多种要论等。其著作也曾由德慧译成西夏文，目前所见都是写本，多为草书或行书，未见刻本。（图40）

《大乘要道密集》是一部由元、明、清宫廷流传的密藏佛法珍本，原被认定为元朝初年帝师八思巴给元世祖传密宗法本的汉译本。此集经整理后共有83篇，其中47篇未录传、译者，有传、译者的36篇中八思巴集撰的只有4篇，已知有17篇是西夏僧人所

[1] 罗昭：《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83(4)。《西夏佛教史略》，137~1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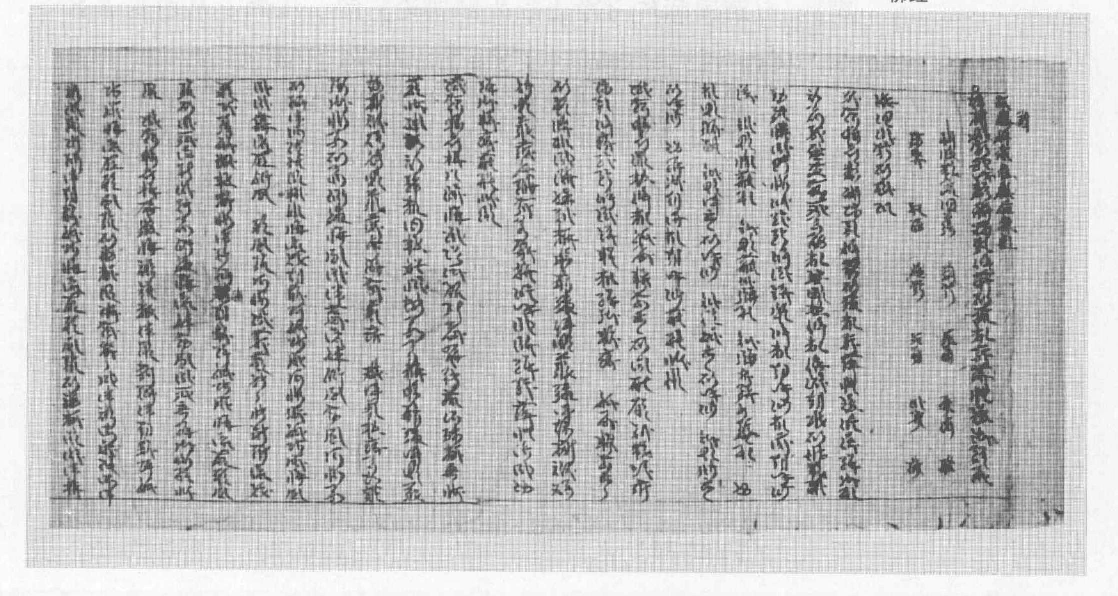


图 40
西夏帝师慧宣编撰的佛经

作。参加传译的有西夏的大乘玄密帝师以及其他国师、法师等。这样一部在中原地区流传的重要藏传佛教经典中，竟有这样多的西夏时期的作品，从经典的传播角度不难看出西夏对藏传佛教的撰著和出版的重要作用[1]。大乘玄密帝师，原为国师。在乾祐二十年（1189年）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的高僧有大乘玄密国师[2]。在天庆元年（1194年）为刚刚去世的仁宗皇帝所作法会中，又有大乘玄密国师参与[3]。他也是藏族僧人，后来升号为大乘玄密帝师。在汉文本《大乘要道密集》第66篇《大手印伽陀支要门》的师承次第中，记载着大乘玄密帝师是噶举派著名祖师米拉日巴的再传弟子。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吉有恶趣令净本续之干》，其题款为"羌中国大默有者幢名称师集"。《大乘要道密集》中有大瑜伽士名称幢师传述的多种著作《含藏因续记文》等9篇。此名称幢即上述题款中的吐蕃高僧幢名称，这应是西夏文与汉文译法的不同。

【1】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西藏大学学报》，2000(5)。
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1)。

【2】《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二卷，TK58。

【3】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Инф.№.592。

此外述作藏传佛教内容作品的还有觉照国师法狮子传《魔断问答要论》、《道之中禁绝顺要论》、《中有身要论》、《金刚王亥母随处施食奉顺要论》、《死亡回拒要论》。五明国师拶也阿难陀传《番语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圣观自在大悲心恭顺》。寂照国师传《净土求生顺要论》等。法狮子是西夏著名寺庙大度民寺的藏族高僧。

黑水城西夏文著作中还有不少因明学著作，系与藏传佛教一起传入西夏。作为古代印度逻辑学的因明，11世纪传入西藏，西夏也很快接受了因明学，并编译有关著作。已出土的西夏文因明著作如：《正理滴之句义显用》、《正理意暗除之文略释》、《正理滴特殊造他利比量品》、《正理滴特殊造》、《正理空幢要论》、《正理滴第一义释记》、《正理滴第三义释记》等。说明当时西夏已经有比较深厚的因明学基础。

天庆七年（1200年）西夏僧人金刚幢译，僧人智广、慧真所辑的《密咒圆因往生集》一卷，辑录了31种经咒。这是后来列入汉文大藏经的西夏人著述。集前有西夏中书相贺宗寿所作序，贺

宗寿史书无载。西夏人编辑的这部佛教著作，虽不过万言，但从序中得知当时还请西域和西夏的僧人，用汉本和梵本反复校译，以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雕印流行[1]。

【1】《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六，1007页。

西夏僧人兰山云岩慈恩寺护法国师一行沙门慧觉在夏元之交编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简称《华严忏仪》，共42卷。《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后世所做的注、疏、论、解，种类繁多，但此经的忏仪到夏、元之际才由西夏僧人作出。原来西夏后期大量接受藏传佛教，讲求仪轨，所以编撰《华严忏仪》正是当时的佛教信仰的特点。根据日本善福寺所藏元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刊《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的题款可知，此书在元代曾于杭州刻印，可能是西夏文本。[2] 现有汉文刻本传世。一行还编纂了《涤罪礼禅要文》。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西夏灭亡后刻印。其中有流传序系一行沙门慧觉作，记叙了该经在西夏翻译、校勘、流行的经过，以及西夏灭亡后此经毁灭和重新刊印的情形。国家图书馆藏另一部西夏文刻本佛经《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的发愿文中，记“至元七年化身一行国师，广生佛事，俱令校有译无”。可知夏末元初一行在译校佛经方面有不少成果[3]。

【2】〔日〕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二)，297页，座右宝刊行会，1966(4)。

【3】史金波：《西夏佛教新证四种》，《世界宗教研究》，1989(1)。

## 第三节　图籍的出版和流传

西夏的出版是在中国总体文化底蕴的基础上兴盛起来的，其出版形式也受到中原先进而多样出版形式的重要影响。西夏在文化事业迅速发展过程中，为了满足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重视图籍出版的复制技术，大力发展了刻印出版事业。西夏在当时宋朝发达的刻印出版的影响下，不仅应用了汉文书籍的出版，同时开创了西夏文字图籍的雕印出版。特别是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西夏很快将活字印刷应用于图籍出版，并形成相当规模，发展了活字印刷出版。与此同时，西夏还有不少图籍以写本的形式流传。

## 一、刻本图籍的出版

西夏境内的一些地区，早在五代和宋初，就已经有了发达的刻印事业。如在敦煌发现的五代后晋时期的观音像和《金刚经》，就是当时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使曹元忠发愿刻印的。证明西夏地区早有刻印书籍的基础。宋、辽、金发达的刻印事业和高超的刻印工艺，也会对西夏产生直接的影响。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就有不少宋朝出版而流传到西夏的图籍。与西夏邻近的山西平阳（平水），在金代印刷作坊林立，是当时北方的刻印中心。平阳出版的精美印刷品也流传到了西夏，有的还保存至今，如从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四美图》上镌明“平阳姬家雕印”，此外还有《关羽图》和剧本《刘知远诸宫调》等。

西夏刻本书籍很丰富，在文化发达的中古时期，西夏存留下这样多种类的刻本出版书籍，在少数民族王朝中是很突出的。西夏刻本出版文献反映着西夏书籍出版的总体水平，是西夏文化发达程度的重要尺度，同时也反映出西夏出版事业的重要特点。西夏的刻本书籍从文字种类分主要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类，此外还有少量藏文刻本。

### （一）西夏文刻本

西夏文刻本出版书籍品类多样、内容丰富。很多有重要价值的世俗著作都是刻印出版的书籍。已发现的刻本出版书籍有100余种。如语言文字类的《文海宝韵》、《音同》，法律类有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官阶封号表，识字蒙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三才杂字》，类书《圣立义海》，谚语《新集锦合辞》，诗歌集，劝世文《贤智集》，翻译著作《论语》、《十二国》、《经史杂抄》、《德事要文》、《德行集》、《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类林》等。

刻印出版的佛教著作更是种类繁多，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

《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经》、《佛说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菩萨地持经》、《大乘圣无量寿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维摩诘所说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大智度论》、《慈悲道场忏罪法》、《顶尊相胜总持功德依经录》、《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圣大乘大千守护国土经》、《圣大悟阴王随求皆得经》、《大寒林经》、《十一面神咒经》、《大密咒受持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达摩大师观心本母》、《西方净土十疑论》、《佛说百寿解结怨陀罗尼经》、《业障清净总持和令恶趣净顺总持》、《佛说调伏三灾经》、《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佛说消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佛说浊散节下经》、《圣胜慧集颂经》、《调伏集义补》、《佛顶心陀罗尼经》、《瑜珈师地》、《正法念处经》、《药师琉璃光七佛之本愿功德经》、《佛说禅源集都序》、《佛说圣佛母般若心经诵持要论》、《等持集品》、《龙树菩萨为忏陀迦王说法要偈》等。西夏刻印出版的佛教著作中有显宗经典，也有密宗经典；有的译自汉藏，有的译自藏文，有的还是西夏人自己编著的著作。

从现存的西夏文刻印出版的文献不难看出，西夏刻印出版书籍有较强的实用性。语言文字类书籍为推行民族文字，强调民族文化；法典类书籍更是明显为政府统治之用；儒学著作为推行统治者所重视的儒家文化；兵书显然是为了用于频繁的征战；佛教典籍为了推行统治者提倡的佛教。这些书籍是为了维护当时封建统治和社会需要，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需求量。

目前所知有年代可考的现存西夏文刻本书籍，最早的是惠宗大安十一年（1085年）刻印的《佛说阿弥陀经》。有的刻本书籍虽未载明出版时间，但据其他线索可大体推断其出版时间，如《圣立义海》、《六韬》、《黄石公三略》与《类林》的刻工颇多重复，可定为同时代，即乾祐年间。从有年代的西夏文刻本大致

可以看出，多属崇宗、仁宗时期，特别是仁宗天盛、乾祐年间最多。西夏晚期应天、光定年间的印刷作品尚未见到。大约西夏晚期社会动荡，难以组织程序较为复杂的刻印工作。

与黑水城大批西夏文献、文物同时出土的还有4块西夏文字雕版。西夏文字雕版中一块有经名，为《佛说长寿经》[1]。由这些雕版可见刀法纯熟，字迹清晰。还有一块双面刻有文字，能两面印刷，这样可节省木材，少占用保存空间。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天宫出土了西夏文木雕版残块两千块，最大的长13厘米，宽23.5厘米，绝大部分已经碳化，版厚约2.5厘米。其中经版形制和字体类型很多，以字体分大体可分大号字，每字1~1.2厘米见方；中号字，每字约0.8~1厘米见方；小号字，每字0.6厘米见方。很多是双面雕刻[2]。由西夏的木雕版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版面、不同的字体可见西夏的刻本种类之繁多，雕版之成熟，刻印之兴盛。

（二）汉文刻本

西夏的汉文刻本多为佛经，其中不少印制精美，也是西夏出版的书籍中很精彩的部分。按目前已知有年代可考的书籍最早的为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的《夹颂心经》、大安十年(1083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此后仍然是大量崇宗、仁宗时期的刻本[3]。已见西夏时期刻印出版的汉文佛经不少，印制质量也很高，如皇后罗氏印施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其中之一（图41）。但西夏时期是否刻印过汉文《大藏经》全藏，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4]。

在有年代可考的西夏汉文刻本书籍中，很少见到有世俗文献。可能有的西夏出版的汉文世俗文献，由于没有或残失了年款，目前又难以通过其他线索确定其时代。还

【1】牛达生、何继英：《贺兰县宏佛塔》，《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

【2】《西夏书籍业》，118~121页。史金波：《中国藏西夏文献新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三辑，2007年9月。

【3】《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6册。

【4】李际宁：《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文献》，2000(1)。

图 41
汉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未来諸佛所依處法界内衆生常願持般若天清鈔主週
向頌云欽讃甚深微妙理先憑衆聖与加持開演真宗
獲福田法界生靈普霑益
金剛般若經鈔第五
彫印功德廣大如虛空究竟如法界
皇庭宴壽率土豊登幻當者實相通神助緣
者弥靈積福飛行水陸帶角披毛俱沐良因齊
登覺岸　時大中祥符九年四月八日彫畢
朝散大夫行尚書駕部員外郎知丹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輕車都尉借紫梁國施一卷

有一种可能是西夏王朝出版世俗书籍以西夏文为主，汉文较少，因而留存于世的就很难见到了。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较完整的书籍大多发现于城外的一座塔内，看来是西夏末期所封存，其中的书籍多是西夏使用流传的书籍。但内中也保存着一些宋朝和金朝出版后流传到西夏的书籍。如：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的《金刚般若经抄》卷五、宋元丰六年（1083年）的《佛说竺兰陀心文经》、宋崇宁三年(1104年）的《镇阳洪济禅院慈觉和尚劝化集》、宋宣和癸卯年(1123年)的《真州长芦了和尚劫外录》以及《吕观文进庄子义》、《注清凉心要》、《大方广佛华严经梵行品》、《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妙华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平水韵》、《广韵》、《汉书》、《新唐书》、《具注历》残本等。金刻本有《南华真经》、《心经注》、《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六壬课秘诀》、《新雕文酒清话》、《刘知远诸宫调》等。这些从宋朝、金朝流传进入西夏的刻本汉文书籍，表明当时中原地区与西夏密切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原王朝对西夏出版事业的影响。

（三）藏文刻本

西夏不仅临近藏族地区，境内也有很多藏族居民。藏族有发达的文化事业，有自己的文字。藏族信仰藏传佛教，形成了大量的佛经。藏族佛教的发展，已经有了刻印佛经出版的需求，而在西夏地区又有发达的印刷事业，这就为藏文佛经在西夏的刻印创造了条件。然而以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藏文刻本出版书籍是明永乐版《大藏经·甘珠尔》，一直未发现15世纪以前的藏文早期印刷品。

在黑水城遗址发现的文献中除西夏文和汉文出版物外，也有一定数量的藏文文献。这些藏文文献中有写本，也发现有刻本。已知的藏文刻本出版书籍多为佛经，内容有《顶髻尊胜佛母陀罗尼功德依经摄略》[1]等，还有单叶《护轮图》[2]。（图42）

这些藏文雕版印刷品已经是很成熟、很精美的印刷品。在蝴

【1】史金波：《最早的藏文木刻本考略》，《中国藏学》，2005(4)。

【2】俄罗斯冬宫博物馆：《丝路上消失的王国》，274~278页，(台湾中文版)，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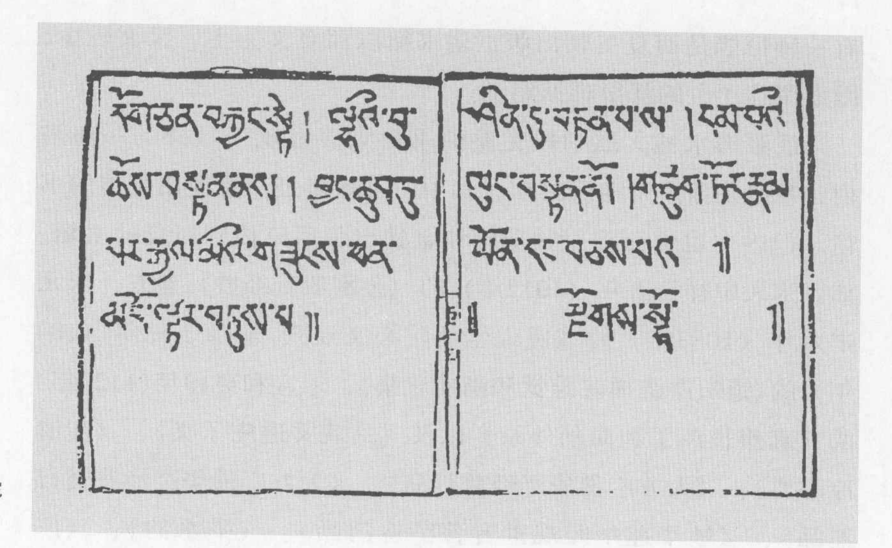


图42
刻本藏文《顶髻尊胜佛母陀罗尼功德依经摄略》

蝶装的佛经中，文字书写工整，字体秀美，雕刊精细，行次整齐，版面疏朗，也是木板印刷的精品。可以想见，这不是最早的藏文印刷品，此前藏文的雕版印刷已经走过了一段时间的路程。

这些藏文雕版图籍形成于西夏时代，发现于西夏的故城，它们却反映着当时当地的藏族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藏文印刷品，反映了藏文早期印刷出版的特点。看来藏族也较早地应用印刷技术于出版事业，与西夏文、汉文雕印出版书籍相映成辉。

（四）刻本书籍的数量

西夏雕印出版的书籍不仅种类很多，有的一种刻本就有很多卷册。如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共有二十卷，类书《圣立义海》也有十五卷之巨。不少佛经也是多卷本。有的刻本书籍还有不同的版本。如世俗著作《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都非只一种版本，西夏文佛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大乘圣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圣大乘大千国土经》等，汉文佛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也都有多种版本。可见现存的西夏刻本书籍数量之多。西夏当时出版的刻本书籍的数量就更难以估量了。

通过一些佛经的序言和发愿文可以了解部分西夏刻本，主要是佛经刻本的出版数量。西夏刻本发愿文中有的只记雕印，未记印数。如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陆文政印施汉文《夹颂心经》的发愿文、人庆三年（1146年）王善惠等人印施汉文《妙法莲花经》的发愿文，就只记了请工刻印施经，未载明出版数量。有的则记载了出版数量，如天盛四年（1152年）印施的《佛说父母恩重经》发愿文记载，“因发愿令雕印板，先已印一千卷”。又天庆七年（1200年）哀子仇彦忠等印施汉文《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印施此经六百余卷”。

官刻本出版印施佛经较多，往往在发愿文中记明印施数量，一般印刷数量很大。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印施《大乘圣无量寿经》发愿文记载，“遂发大愿，内宫雕刻印板，印一万卷，手绢一万帧，施放诸民庶处”。天盛元年（1149年）仁宗刻印《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和《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御制后序发愿文记载，“命工雕印番汉一万五千卷施放全国臣民”。天盛十九年（1167年）西夏仁宗为皇太后去世一周年而印施《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发愿文中记载：“仍集《真空观门》、《施食仪轨》附于卷末，连为一轴，于神妣皇太后周忌之辰，开板印造番汉共二万卷，散施臣民。”又乾祐十五年（1184年）仁宗于本命之年印施番汉文《佛说大乘三归依经》的御制发愿文中记载，“仍敕有司，印造斯经番汉五万一千余卷，彩画功德大小五万一千余帧，数串不等五万一千余串，普施臣吏僧民，每日诵持供养”。五年以后，乾祐二十年（1189年）仁宗在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时，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中记载“散失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在仁宗去世一周年之际，即天庆二年（1195年），罗氏皇太后发愿在三年之内兴种种利益，包括“散施八塔成道象净除业障功德共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九万三千卷”。

由上可以得看出：西夏刻印佛经总量很大，在西夏这样一个地域较窄、人口较少的王朝，印经数量动辄数万，甚至几十万卷，数量是很可观的。西夏刻经以官刻数量大，优以皇室下令刻印数量最多。西夏刻经以中后期数量大，优以仁宗和皇太后罗氏印经次数多，数量大。

## 二、活字印刷书籍的出版

和中原王朝一样，西夏随着印刷品需求量的增大，在发展雕版印刷的同时，逐渐认识到雕版印刷的不足，并寻找更为科学便捷的印刷的方法。在北宋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就开始使用活字印刷出版。西夏活字印刷出版书籍已发现有十多种，西夏使用活字印刷术在汉文文献中没有直接的记载。

西夏在继承北宋泥活字印刷出版的同时，还创造成功木活字印刷出版。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时也实验了木活字印刷，但没有成功。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毕昇泥活字的成功的过程，也如实地说明木活字印刷不成功的原委："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1] 然而从已经发现的西夏木活字印刷出版物来看，当时西夏已经成功地创造了木活字印刷，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其印刷质量也大大超过了泥活字印刷。

(一)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维摩诘所说经》（上、中、下卷)，共330余面。武威市亥母洞遗址也出土了西夏文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下卷)，共54面。两地所出都有西夏仁宗尊号题款"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仁宗有此尊号时为大庆二年 (1141年)[2]。这一时间可定为此经的上限。综合考证此印本可定为12世纪40年代以后的西夏中期。

这种西夏文佛经具有多项活字版特征。经面印墨以字为单位有轻有重，经背透印深浅有别，有的字形因排列不正而显得歪斜，还有印出的字一半轻，一半重，经卷中几乎所有页面行格歪斜，竖不成直行，行距宽窄也极不规则，这些都是早期活字印刷

[1]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板印书籍"条。

[2]《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字模大小不匀、排字不齐、固版不精的缘故。

有的专家认为，该经还显现出有泥活字印刷的特点。很多字笔画生硬变形，竖不垂直，横不连贯，有的笔画中间断折，半隐半现。有的字有明显的掉边角、笔画缺损痕迹，边缘不整齐，有断残现象。甚至有的字由于缺角而显得近于浑圆。印面文字墨色不匀，表现出泥活字吸墨不均匀的特点。文字笔画中有类似气泡、沙眼的痕迹。有的文字模糊，字的边缘形成蜡泪状，这是烧制活字时温度太高，造成流油现象。这些都体现了泥字印刷所具有的特殊之处[1]。专家们对于该经是何质料活字印刷，还在继续研究。

【1】孙寿岭：《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1994(3)。孙寿岭：《武威发现最早的泥活字版本西夏文佛经》，《陇右文博》，1997(1)。

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卷首的仁宗尊号题款一行字体较小，其中有的上下字有相接或相交插现象，且文字书写风格相同，为一人手笔。这些特点与活字版印刷特点不相符合，具有木雕版的特点。分析推断此行字是被刻在一整块长条木印上，检字排版时，将整条木印置于活字版的适当位置。这种木雕版条在排印有仁宗题款的佛经时都可以使用，省时省力。这种以字为单位的活字版中加有木雕版条，是活字印刷出版在特殊条件下的一种灵活运用，是西夏人对活字印刷出版的创新和发展。（图43）



图43
西夏文泥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既有写本，又有刻本，还有活字本，表明此经在西夏的需要量很大，也表现了西夏出版形式不拘一格，展示出多样性的风采。

（二）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是一部禅宗著作，发愿文为僧人道慧和其"尊友"慧照所作。从此书字型、行款、透墨、补字等方面分析都具有成熟活字印本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发愿文末尾有三行题款，明确记载了"活字"二字。这三行题款译文是："清信发愿者节亲主慧照，清信相发愿沙门道慧、活字新印者陈集金。"[1] 发愿文题款没有像其他刻本书籍题款那样，除发愿者外记载书写者和雕刊者的名字，而是明确记载"活字新印者陈集金"，由此更可确切的证明此经为活字版本。发愿文题款中记发愿者慧照是僧人，身份是"节亲主"，系皇族。节亲主这一称谓只有西夏才有。确切地证明这部活字版书籍属西夏时期。

（三）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德行集》，不仅印面有明显的活字特点，此书卷末题款中有三条人名题款，也能证明此书是活字印刷出版。题款为"印校发起者番大学院择明学士讹则信照、印校发起者番大学院学正学士未奴文佩、印校发起者番大学院学正学士节亲文高"。题款同样没有像其他刻本书籍题款那样，除发愿者外记载书写者和雕刊者的名字，而是以"印校发起者"这样笼统的称呼来概括印刷出版的负责人。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大不相同，活字不一定由一人写、刻，活字造好后可多次使用，在排印后已不能分清是哪个人的手笔。活字印刷时工序多，其重要程序已经变成排印和校对，因此"印校发起者"的称谓符合活字印刷的特点。第三人发起校印者之一文高有"节亲"的身份，是西夏皇族嵬名氏。又根据书前序言知此文献形成在西夏桓宗时期（1194—1205年），应属于西夏晚期印本[2]。（图44）

（四）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清理出的西夏文物中，有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共九册。其中有《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卷第三、第四、第五，《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干文》一卷、《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障疾文》、《吉祥遍至口和本

[1]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的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教授首先发现了此书中的"活字"记载，并认为西夏时期有活字印刷。

[2]《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142~155页。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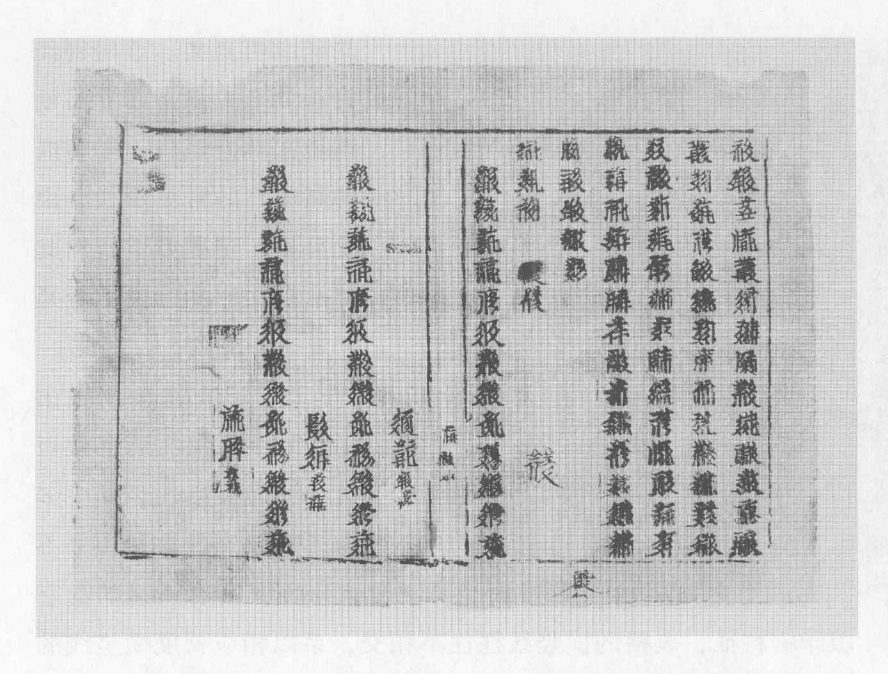


图 44
西夏文活字本《德行集》

续之解生喜解补》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共449面[1]。这些印本除版面印刷的活字版特征外，在文中标示页码的汉字中，正字、倒字形近的字如“二”、“四”等有倒置现象，系排字时不经心错排所致。这些是雕版印刷中不会出现、而在活字印刷中才有的现象。此经《干文》最后一页有题款，译文是：“印本勾管为者沙门释子高法慧。” “印本勾管为者”，是强调印本的组织者，正符合活字印本的题款惯例。“勾管”二字体现了活字印刷整体复杂过程，除制作活字外，还有拣字、排版、固版、印刷等工序。题款文字为其定为活字印本提供了新的证据[2]。

方塔清理的共出文物中有西夏仁宗御制施经发愿文，其年款为乾祐十一年（1180年），为此经的时代提供了参考依据。另外，从文献本身也可找出可供参考的时代标志。在《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正文首页经名后各有三行小字，记录“集经”、“羌译”、“番译”的职务和人名。“羌译”指译成藏文，“番译”指译成西夏文，可知此经先由梵文译成藏文，再由藏文译成西夏文。在《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障疾文》正文首页经名后，也各有三行小字，记录“集”、“传”、“番译”的职称和人名，此经也是由藏

【1】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文物》，1994(9)。

【2】牛达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学术价值》，《文物》，1994(9)。
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1)。



图45
西夏文木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障疾文》

文译成西夏文。这两种经首题款形式都是西夏时期自藏文翻译经典、书写或印制成书的常见形式。由此可见，宁夏方塔所出此套西夏文印本佛经，应是西夏时期所制。（图45）

（五）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汉文历书残页数纸，为表格式，其中多为活字版[1]。这些历书不仅印面文字有明显的活字版印刷特征，表格的横竖线往往不相交，系以相应长度横竖线的活版木条排版所致。特别是有的文字倒置，如5 469号第2竖行“吉日”二字中的“日”字、14竖行九月一日栏下“白虎”二字中的“白”字倒置，更证明为活字印刷出版。残历书中多处讳“明”字，且出土于西夏管辖的黑水城，可推断为西夏印制的历书。考证残历书时间为西夏神宗遵顼光定元年（1211年），为《西夏光定元年（1211年）辛未岁具注历》。因历书是为新的一年使用的，所以此历书印刷年代应是西夏襄宗安全皇建元年（1210年）。据此可知，当时西夏已经使用活字印刷具注历书了。在过去出土的文献中还没有见到有确切年代的早期汉文活字印刷品。此残历书上距活字发明印刷术的北宋庆历年间160年，是目前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汉文活字印刷品。（彩图11）

（六）近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贺兰山东麓山嘴沟石窟中，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其中有写本、刻本，也有活字印本。该所专家孙昌盛考证，认定活字印本计有三种：《妙法莲华经要集义镜疏》第八、《圆觉注之略疏》第一上半和《占察善恶业报经》，前两种为泥活字印刷，后者为木活字印刷[2]。《妙法莲华经要集义镜疏》第八，蝴蝶装，存大小38纸，四周子母栏，在此经卷末有6

【1】《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315~318、326页。

【2】孙昌盛：《贺兰山山嘴沟石窟出土西夏文献初步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571~60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本书对文献名称和题款在孙文基础上有所改补。

行题款，记录了参与印刷该经的人名及其分工情况。译文如下：

印面校者　梁释迦喇嘛　嵬古迎　慧治

选印字者　毗慧照　梁慧勇　段慧照　庞吉

慧盛　梁慧成　嵬名慧善　杨慧能

妹勒慧盛　魏慧善　勒慧光

居地慧胜　贯罗讹慧宝　梁那征

平字为田者　梁慧宝　六梁慧照

印本者　梁慧安

上述题款真实地记录了活字印刷的诸种分工，其中第6行的前五个字对译为“字、平、田、作、者”，“字、平”应译为“平字”，第3字西夏文可译为“房、舍”，有时也作译音字，音“田”或“天”。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布衣毕昇进行活字印刷的过程，记泥活字印刷时在铺好松脂、蜡和纸灰之类的铁板上、铁范内排好活字后，还要用火烤，使药（松脂、蜡和纸灰之类）稍熔，以平板压按，使版面十分平，以便印刷。也许我们可以把上述题款译成“平字为砥者”。由题款可知，选印字者即排版者工匠最多，计14人，这很符合活字排版印刷的实际情况，排版仍是占用人力最多的一道工序。题款表明印面校者、平字为田者、印本者分别为3人、2人、1人。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活字印刷各工序使用人工的大致比例。这种带有重要题款的活字本文献是中国活字印刷史的重大发现[1]。

【1】史金波：《泥活字印刷研究的新发现和新进展》，《中国印刷》，2007年（8）。

## 三、西夏写本书籍及其流传

尽管西夏印刷事业发达，仍然有不少书籍以写本形式出现、流传。在已发现的西夏图籍中，写本占很大比重，总数有200多种。其形成有以下原因：有的书籍是编撰、翻译的手稿，尚未正式出版流行。这种孤本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弥足珍贵。西夏虽然早已刻印书籍，但不可能所有的书都刻印出版，有的书籍没有

刻本，只以写本流传，这种书籍版本稀少，很多目前也成为孤本，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就是刻印的书也不是想得到的人都能得到，有人需要世俗或佛教的书仍然需要抄写。西夏写本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为了自己学习或诵读使用的。不少人虔诚信仰佛教，亲自抄写或发愿请人抄写经书是修习功德的一种方式，这也刺激了西夏佛经写本的增多。

（一）世俗著作的写本

西夏文字创造伊始，就曾翻译《孝经》，至今尚未发现西夏文的《孝经》印本。现存西夏文《孝经》是草书写本，系北宋吕惠卿注释的《孝经》译本。吕惠卿注释的《孝经》汉文本已失传，它的内容却大体完整地保存在西夏文文献中[1]。西夏文译《孟子》有三种写本，皆为蝴蝶装残本。至今未见印本。（图46）

【1】《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2~4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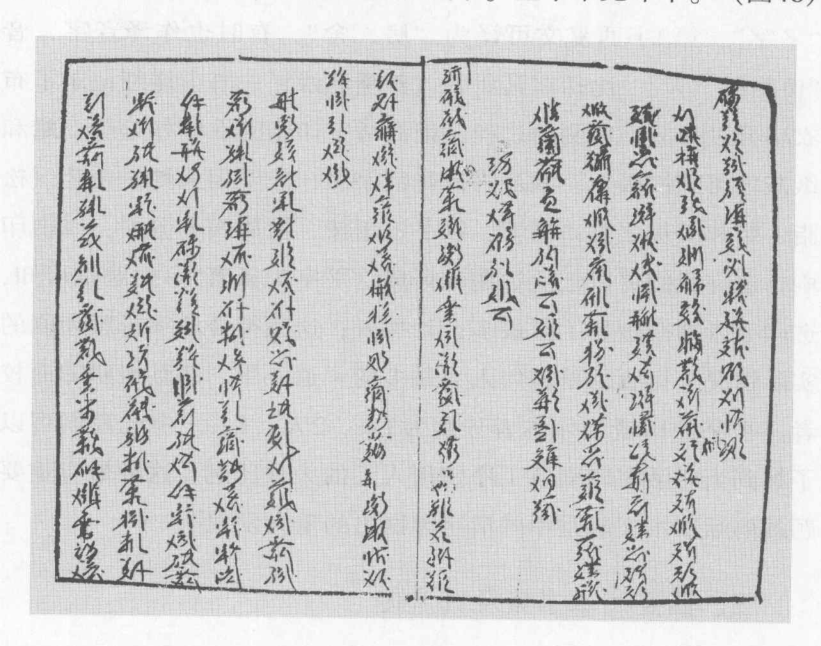


图 46
西夏文写本《孝经》

作为刻本《文海宝韵》略抄本的《文海宝韵》，因刻本《文海宝韵》只残存半部而具有重要价值[2]。还有一种佚名字书残抄本，暂名“音同文海合抄”。字序依梁德养校本《音同》，而字下注释如刻本《文海宝韵》，同时注名声调，是两本重要字书和韵书的结合。西夏文重要韵图和韵表《五音切韵》由皇帝作序，序

【2】史金波、中岛干起等：《电脑处理〈文海宝韵〉研究》，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0(1)。

言中未提及是否刊印。目前所见六种《五音切韵》都是写本。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除刻本外，还有多种抄本。可能这种常用的法律书，刻本数量不足，有人要抄写使用。有的写本名为《亥年新法》或《新法》，存多种版本，体例与《天盛律令》稍异，正文不立门类，文中多引《天盛律令》条文，并有补订之处。还有的法律著作名为《法则》，内容为《天盛律令》部分条文的补充和改订。

西夏汉文本《杂字》为手写本，保存相对完好。根据此书内容分析估计此书有刻本，但至今未见。西夏文《杂字》除前述刻本外，尚有乾祐十八年（1187年）、乾定二年（1224年）写本。此外，英国也藏有此书7纸残页。

俄藏黑水城出土的《新集锦合辞》除刻本外，另有写本两种，分别保存谚语53条、14条。英藏《新集锦合辞》系一手写长卷，前残，除俄藏刻本外，是保存谚语条目最多的版本。

(二) 佛教著作的写本

佛经的缮写、刻印和散施，是佛教流传的重要环节。西夏最大量的抄本书籍是佛经。其中最重要、数量最大的是西夏文《大藏经》。有记载的抄写全部《大藏经》是在西夏后期的桓宗时期，由皇太后罗氏发愿实施。西夏仁宗皇后罗氏是一个笃信并大力提倡佛教的人。仁宗死后，多次印施佛经，并命人精工缮写西夏文《大藏经》一藏。出土的西夏文《佛说宝雨经》和《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二卷首经名下有一长方形押捺牌记，内有西夏文五行，汉译文为“大白高国清信弟子皇太后罗氏新写全增番大藏经契一藏，天下庆赞，已入寺内经藏中，当作为永远读诵供养”[1]。(彩图9)

【1】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Инф.№.87、150号。

抄写《大藏经》的目的既为供养，也为诵读流通。此二经皆楷书写经，字体精绝，系书法上品。西夏文《大藏经》在西夏中期就已有3 700余卷，晚期卷数会更多。可见当时抄写全部西夏文《大藏经》是一件浩大的工程。除此二卷佛经，其余数千卷罗氏发愿写经都已散失。西夏统治者一方面把佛经的缮写作为发展

佛教，传布佛法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把缮写佛经作为自己信仰佛教、崇经行善的功德。抄写佛经的人，一般为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们无论是僧人还是世俗人，往往都经过较好的书法训练，加之他们书写佛经时都怀着虔诚、认真的态度，所缮写佛经大都极工整，特别是为皇室抄写的佛经，抄写精工，纸质优良，已成为优美的书法艺术品。

除上述《大藏经》外，多数保存至今的还是分别抄写的各种佛经。其中有的译自中原的汉藏，有的译自藏传佛教，有的则是西夏人自己的著述。传世的一些大部头重要佛教著作是抄本，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宝集经》、《大般涅槃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此外还有《妙法莲华经》、《慈悲道场忏罪法》、《佛说甘露经》、《佛说生来经》、《佛说诸佛经》、《十王经》、《圣摩利天母总持》、《大悲心总持》、《四十种空幢要论》、《正理滴之句要论》等多种。

西夏时期还有泥金写经。富有的佛教徒为了表示对佛教信仰的虔诚，有时用昂贵的金泥书写佛经。这种佛经不仅是极具价值的文献，也是珍贵的书法作品和艺术品。西夏的泥金写经已发现多种。西安市博物馆藏有泥金写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第五和第十的部分片断。经末有西夏第八代皇帝神宗遵顼的御制发愿文，文末有“光定四年”（1214年）年款[1]。甘肃省定西市藏有泥金写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8面，为该经卷第十五《贤首品》中的偈[2]。敦煌研究院在北区石窟中发现了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泥金写本1纸。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在黑水城遗址发现西夏文泥金写本1纸。俄藏黑水城文献中也有泥金字写经。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法国人毛理斯于北京得西夏文泥金写经《妙法莲华经》三册，绀纸金书，装璜华丽，青绢面上有被覆为薄函，里纫黄绢，外纫蓝绢，上描金花叶，经首有佛像一页，缮写精绝。当时法人贝尔多亦得是经三册[3]。后皆入藏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这是西夏文现存泥金写经的大宗。

综观所见有年代可考的西夏文写本书籍凡数十种，成书时间

【1】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

【2】陈炳应：《金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文物》，1989(5)。

【3】罗福苌：《妙法莲华经弘传序释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189~190页，1932。

最早的是天盛四年（1152年）的《圣胜慧到彼岸八千颂经》，世俗著作有乾祐四年（1173年）的《五音切韵》。其他为天盛、乾祐、天庆、应天、光定时期所写。西夏汉文写本书籍大部分为佛经残卷，不知其何时成书。

## 第四节　出版机构和人物

作为一个制度比较完备，重视文化发展的王朝，西夏有自己的出版机构，也涌现出一批出版人物。这也是西夏能出版大量图籍的重要原因。

### 一、出版机构与官私刻印出版

#### （一）出版机构

1. 西夏王朝主管出版的机构在汉文史籍并无明确记载，但在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的职司等级中有秘书监一司。中原王朝当时的秘书监主国家经籍之事，兼统著书修史。西夏所设秘书监当也是类似的职事。《天盛律令》又规定秘书监是西夏五个司等以外的机构，与殿前司、御史、中兴府等次等司平级。汉文史籍中有关于西夏秘书监任职官员的零星记载，如崇宗时的秘书监梁世显、濮王仁忠，仁宗时任秘书监的王举，任秘书少监的曾梁介、米元懿，神宗时的秘书监苏寅孙[1]。知秘书监的长官有监和少监。在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明确标示出秘书监主持、参与书籍出版的事并不多见。在《天盛律令》的颁律表后参加编纂者和译者署名的23人中第12人是“枢密承旨御史正秘书监汉大学院博士内宫走马杨□”。另西夏文刻本《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大寒林经》经末的题款有“新刻发愿者内宫前面南秘书监边上张尼印赎”。

2. 值得提出的是西夏王朝职司中的番汉大学院与出版有密切的关系。在元昊立国之初设立职司时，其官分文武班，设中书，枢密等十五司，其中有蕃学和汉学。这是番大学院和汉大学院的

【1】［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一、三三、三八、三九、四一。

简称[1]。番、汉大学院在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也是西夏五个司等以外的机构，与次等司平级。西夏番、汉大学院是西夏王朝特有的机构，大体上相当于中原王朝的翰林院，就中以番学院为重[2]。

【1】《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西夏书事》卷十二载：元昊在正式称帝前的大庆元年（1037年）十一月设番汉二字院，其秩与唐、宋翰林等。"字"或为"学"之误。

【2】《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司序行文门"。

关于番汉大学院的官员称谓在《天盛律令》没有记载，西夏文刻本佛教著作《和南裴休禅师随缘集》末页题款有：合文雠校者番汉大学院正、群牧司承旨、汉学士许讹文，重校审义者番大学院博士□□罗法广。可知番汉大学院的首长是番汉大学院正。《德行集》的译传者曹道安有番大学学正的头衔。"番大学"也既番大学院。《新集慈孝记》也是曹道安辑译，其署名职称是中兴府承旨、番大学院学正。在《德行集》卷末题款中记载印校主持人时有印校发起者番大学院择明、学士讹则信照，番大学院正习、学士味奴文佩，番大学院正习、学士节亲文高。其中"择明"、"正习"可能也是番大学院的官员。据《天盛律令》颁律表中编纂者和译者知番大学院、汉大学院都有博士。其中有秘书监、汉大学院博士杨□，汉大学院博士白坚，合汉文者汉大学院博士杨时中，译汉文者番大学院博士、学士苏悟力。

3. 西夏王朝机构中设立刻字司，专主刻印事业。《音同》的跋文中记载"今番文字者，乃为祖帝朝搜寻。为欲使繁盛，遂设刻字司"[3]。《音同》的编纂较早，刻字司之设也应在西夏前期。《天盛律令》卷十"司序行文门"中有明确记载，刻字司在西夏王朝五等机构中属末等司，并规定其主持人为头监，设两名。在西夏文刻本诗歌集的题款中有：乾祐乙巳十六年（1185年）刻字司头监、……御史正、番学士未奴文茂，刻字司头监、番三学院百法博士骨勒善源、执笔僧人刘法雨。可证西夏刻字司设头监是实。西夏的刻字司是印刷出版的主管机构。在朝廷机构中专门设立刻字司是西夏在印刷出版方面的一个创举。

【3】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西夏刻字司共刻印出版了多少书籍难以估量。现已知标明刻字司刻印的书籍已有不少。西夏文本《类林》在卷四末有题款记载为"乾祐癸丑十二年（1181年）刻字司刻"。《圣立义海》题

款记为乾祐十三年（1183年）刻字司新行刻印。西夏诗集中《赋诗》、《大诗》、《道理诗》卷末题款记为乾祐十六年刻字司刻印[1]。可知以上三种书都是刻字司刻印。又知前述刻本的刻工姓名与西夏文刻本《论语》、《六韬》、《三略》的刻工姓名互有相同，这些刻工大约都是属于刻字司的匠人，以上几种刻本书籍也应是刻字司刻印。上述《音同》跋文中有"遂设刻字司，以番学士为首，雕版流行于世"，可知《音同》开始也是刻字司刻印。

【1】《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271页。

4.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一种写本佛经，名为《胜慧到彼岸要论学禁现前解庄严论显颂》，应是抄录活字版印本。在其经末的题款中不仅记载了用活字印刷出版该经的重要史实，还记载了有关西夏活字印刷出版机构和人员。此经题款中年款"光定丙子六年（1216年）"前的两行，记录了印刷负责人是"御前注补印活字都案头监、出家功德司承旨云智有、御前注补印活字都案头监、工院正王忠敬"[2]。此经题款中两次记载"印活字"，证实此经原版确系活字印本，可惜我们无缘见到那种在西夏活字印刷的版本，只能以其抄本作为分析的对象。从云智有、王忠敬的称谓看他们应是活字印刷的主管，是有一定地位、主管活字印刷的人。王忠敬的职称是"工院正"。"工院"也是西夏王朝中的一个机构，管理工技制作之事，京师工院属中等司。由上述题款可以看出，在西夏后期，王朝机构中的工院已经管理活字印刷，并设主管"都案头监"，这说明西夏的活字印刷出版纳入了朝廷组织管辖，有了很大进展，有了一定的规模，在印刷出版行业中已经有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2】史金波、雅森·吾守尔：《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54~5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西夏有三学院，"三学"在佛教中指戒、定、慧三学，它不同于西夏的番、汉大学院。在佛经《医药光海生金刚王文》有卷末题款：功德司正副使三学院提点沙门慧照李番译[3]。李慧照是将此经译为西夏文的僧人，他有功德司副使、三学院提点的官衔。又西夏诗歌集有题款：刻字司头监番三学院百法博士骨勒善源。骨勒善源也是僧人，他有刻字司头监、番三学院百法博士的头衔。据此知三学院可能有番、汉两种，其中设百法博士。西夏

【3】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Инф.№2543。

的三学院在佛学著作的著述、出版方面可能有所作为。

《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大恒历司"，或主历算诸事[1]。在西夏法典中大恒历司属中等司[2]，又西夏汉文《杂字》中"司分部十八"有"天监"，可能是"司天监"的简称，但无"大恒历司"[3]。《天盛律令》成书于西夏天盛年间（1150—1169年），《番汉合时掌中珠》成书于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汉文《杂字》也是西夏晚期作品。或许12世纪30年代以后南宋不再向西夏正式颁赠历书，西夏便自设机构编印出版历书。西夏大恒历司或天监是编辑、出版历书的机构。

（二）官私刻印出版

刻字司刻印出版的书籍应是官刻本，多是世俗著作。此外有皇帝、皇后、皇太后作序或发愿文的出版著作，除《文海宝韵》和《五音切韵》等出版物外，最多的还是佛经。西夏皇室刊印佛经往往随大型法事活动进行。如：崇宗于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重修凉州护国寺和佛塔，竣工时大兴庆典[4]，同年梁太后和崇宗皇帝又发愿印施佛经；人庆二年（1145年）为使去世六周年的崇宗皇帝生入净土，而印施番、汉佛经；天盛十九年（1167年）于"皇太后周忌之辰"，仁宗大兴法事，又开板印造番汉佛经；乾祐十五年（1184年）在仁宗"本命之年"，刻印佛经，并作诸多法事；乾祐二十年（1189年）仁宗66岁，作法事活动凡七昼夜，刻印散施番、汉佛经；仁宗去世后，天庆元年（1194年）皇太后罗氏于"周忌之辰"印施番汉佛经，又作二大法会共十昼夜；天庆二年（1195年）罗太后于仁宗"二周之忌辰"印施番、汉文佛经；天庆三年（1196年）罗氏又于仁宗去世后三年的"大祥之辰"，发愿在三年之中，印施番、汉佛经；襄宗应天四年（1209年）散施佛经并作广大法事[5]。

除皇室外，有能力作大法会，印施佛经的，还有高官显宦。如天盛十九年（1167年）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任得敬，因疾病缠绵，药石无效，印施《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天盛二十一年（1169年）孝子枢密内宿等承旨、殿前匭匣司正库瑞忠

【1】[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6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2】《天盛改旧新定律令》，363~375页，法律出版社，2000。

【3】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期，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4】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25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5】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Инф. №.3780、683、5423；《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TK121、128；第二册，TK58；第一册，TK 12。

茂，因去世父亲已过“七七”，印施《佛说父母恩重经》千卷。西夏某一中书相亡故后，在七七之日，其子刻印《佛说父母恩重经》并请僧众等七千余员，作一系列法事活动。名为安亮的人，他母亲死后百日，刊印《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一万有八卷，并作广大法事[1]。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仁宗去世，“于先圣三七日时”请匠雕印《拔济苦难陀罗尼经》番、汉文二千余卷散施，并作法会七日七夜。仁孝去世后当年“三七”之时，西经略使便在凉州组织大法会悼念，刻印《拔济苦难陀罗尼经》为仁宗超度。

[1] 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Инф.№.8106、6843；《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TK124、120。

由于受到皇室和贵族的重视以及财力上的支持，佛经的雕印出版十分兴盛，印刷数量动辄数万，甚至一次印刷散施二十五万卷。在人口总量不多的西夏，其发行量非常可观。佛经的出版在西夏出版事业中占有最大的份额。这些刻本佛经是否多数在国家直接掌握的刻字司刻印，因这些佛经没有明确标识而难以确定。但我们发现在西夏文《圣大乘无量寿经》发愿文中记有“令内宫雕印板，印制一万卷”，可知在崇宗时期皇帝内宫中有从事刻印的场所。

西夏的坊刻本目前所见不多，《番汉合时掌中珠》封面书名下印有“□坊角面西张……”。这部书可能是张氏某人开设的刻字作坊所刻。在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题款中记“京市周家寺僧雕字僧王善惠”，周家寺具体方位不得而知，可能那里有刻印经典的场所。又汉文《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经末题款有“温家寺印经院”，明确指出此经为寺庙有印经院刻印。看来在西夏寺院内印经不是个别现象。

在西夏不仅达官显贵刻印出版书籍，普通僧俗私人发愿刻印书籍也不少，其中多为佛教著作。如：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陆文政刊印汉文《夹颂心经》，天盛四年（1152年）刘德真刻印汉文《注华严法界观门》，天盛四年（1152年）梁吉祥狗刻印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乾祐十五年（1184年）袁宗鉴等人刻印汉文《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佛陀罗尼经》，乾祐十

六年(1185年）僧人智通印施汉文《六字大明王陀罗尼经》，天庆七年(1200年）仇彦忠印施《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皇建元年(1210年）张盖利、僧人李智宝印施汉文《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和《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郭善正令人重刻印的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耿长葛发愿刻印《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这些私人发愿刻印的佛经是在作坊刻印，还是在寺庙刻印，不得而知。

一些尼僧也参与发愿出版佛经。如《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题款注明“新刻发愿者内宫前面南秘书监边上张尼印赎”，说明张姓尼僧是出资印经者。又《发菩提心及常作法事注》、《夜五更》的题款也都注明是“张尼印赎”。看来张尼印刷出版多种佛经，她还有职官称谓。尼僧张罗讹发愿印施的西夏文《大密咒受持经》，张罗讹是否与上述张尼为同一人有待考证。另有尼僧讹布慧渡与梵本校勘刻印《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也是尼僧印经的实例。

在发愿刻印佛经时，有的认为佛经有广大功德，欲宣扬佛法而雕刊佛经。如许讹瓜州乐雕刊《真实名经》[1]。有的因原有佛经错讹太多而重新刊印。如西安州归义刘德真见汉文《注华严法界观门》“传写者句文脱谬”，要给习诵者一种好的刻本，而出资刊刻[2]。天庆三年（1145年）张罗讹见《大密咒受持经》虽有刻本，但“因年日久，印板损坏遂大”，因此发愿刻印。酩布慧明刻印的《大白伞盖母之总持颂顺要论》也是因原有印板残破而重刻印行[3]。

【1】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Инф.№. 7034。

【2】《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295页。

【3】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Инф.№. 6849、7589。

## 二、译者和书写者

在西夏与书籍出版有关的人物中，除前述的编著者、出版组织者外，还有译者和书写者。

### (一) 译者

西夏作为多民族王朝，民族文化的交流需要把不同文种的书籍进行翻译。所以在西夏有关出版事业的人物中，译者显得十分

重要。西夏不仅需要从中原汉族地区引进、翻译世俗著作和佛教经典，把西部藏族地区的藏传佛教经典翻译过来，还需要把编纂的重要西夏文著作译成其他民族文字，主要是汉文。西夏出版中译著的繁荣和译者的众多不仅与同时的宋朝不同，与同是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辽、金王朝也很不相同。辽、金王朝虽也创有民族文字，但少数民族文字的应用和出版都难以和西夏相提并论。

现在见到的《天盛律令》是西夏文本，据卷首的《颁律表》纂定者后有合汉文、译汉文者4人：合汉文者奏副、中兴府正、汉大学院博士杨时中，译汉文者西京尹、汉学士讹名□□，译汉文纂定《律令》者汉学士、大都督府通判巴里居地，译汉文者番大学院博士、磨勘司承旨、学士苏悟力。可见《天盛律令》有西夏文本，也有汉文本。但至今并未发现汉文本。这四人中第1、3人的姓氏杨、苏是汉姓，第2、4人的姓氏讹名、巴里是党项人姓。可知当时的译者既有汉族，也有党项族，他们或为博士，或为学士，可能都熟悉番、汉语言，互相合作，完成西夏国家大法的翻译任务。

《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编写者通过其序言知是骨勒茂才。该书译文准确、通达，注音科学、精审，可以说骨勒茂才是一位兼通番、汉的党项族翻译家。

《德行集》和《新集慈孝记》都是番大学院学正曹道安辑译。另一种从汉文本直接翻译的《德行集》，在书末题款记"此《德行集》者原本是汉本"，之后一行，残留"智足"二字，是否是译者的名字有待考察。

在西夏的出版著作中翻译量最大、译者最多的当属佛经。传世的西夏文佛经中，一部分卷首有译者题款，题款表明译者是西夏的皇太后、皇帝。其中有三类。第一类如《佛说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维摩诘所说经》等，题款为："天生全能、禄番佑圣、式法皇太后梁氏御译，就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第二类有《佛说宝雨经》、《大乘圣无量寿经》、《佛说长阿含经》等，题款为："胜

智广禄、治民集礼、德圣皇太后梁氏御译，神功胜禄、习德治庶、仁净皇帝嵬名御译”。第三类《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圣大悟阴王随求皆得经》、《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等，题款为“天力大治、孝智净广、宣德纳忠、长平皇帝嵬名御译”。第一类题款中的大明皇帝和皇太后梁氏，是惠宗秉常和他的母亲。第二类题款中的仁净皇帝和皇太后梁氏为崇宗乾顺和他的母亲。第三类题款中的长平皇帝可能是仁宗以后的一个皇帝。

显然皇太后和皇帝不可能进行这种耗时费力、且需要专门佛学知识的译经工作。真正译经者另有其人。西夏文文献表明，在元昊时期开始把汉文佛经译成西夏文时，译经主持人是国师白法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记有：“夏国风帝新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令依番译。”[1] 国家图书馆还藏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其流传序中的有关此经传译经过时指出：“后始奉白高大夏国明盛皇帝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番。”[2] 明盛皇帝即大明皇帝。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一幅西夏《译经图》更形象地提供了西夏佛经真正的译者。该图在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图中刻僧俗人物25身，有西夏文题款12条计63字，记图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姓名。上部正中跏趺而坐的高僧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即译场主译人。旁列十六人为“助译者”，其中八僧人分别有党项人或汉人名题款，他们是北却慧月、赵法光、嵬名广慧、吴法明、曹广智、田善尊、西玉智园、鲁布智云。其中北却慧月、嵬名广慧、西玉智园、鲁布智云皆为党项人，嵬名广慧是皇族。图下部人身较大者，左为“母梁氏皇太后”，右为“子明盛皇帝”，为西夏惠宗秉常及其母梁氏皇太后。此图形象而真实地描绘了西夏时期译经的场面，明确地展现了主译者和助译者的身份，同时也表现了皇太后、皇帝重视译经，亲临译场的生动情景。

国师白法信和白智光等人是西夏早期翻译佛经的译者，他们可能都是汉文文献中提到的翻译佛经的“回鹘僧”[3]。皇帝、皇太

【1】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3(1)。

【2】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3)。

【3】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78~7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后只是下令译经，他们自己并未直接参加译经。然而西夏皇帝、皇太后在佛教经典翻译出版方面的贡献不容低估，甚至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在西夏参加翻译佛经的人很多，也有主管译经的职称。在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二十一卷末题款中有："发愿者番汉译主功德司承旨节亲主。"其中"番汉译主"可能是主管翻译佛经的职务，此人是功德司承旨，从"节亲主"知是皇族嵬名氏。

西夏中后期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由于在西夏地区传播藏传佛教经典，还需要将其移译成西夏文和汉文，这就要有通晓藏传佛教经典的党项人和汉人。在存世的西夏佛经中可以找到从事藏传佛教经典整理、翻译的党项和汉族高僧。智明国师沙门德慧是一位翻译大家，在仁宗印施《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御制发愿文中记载："朕亲睹胜因，遂陈诚愿。寻命兰山觉行国师沙门德慧，重将梵本，再译微言，仍集《真空观门》、《施食仪轨》附于卷末，连为一轴。"[1] 德慧是懂得梵文、西夏文和汉文的高僧，还曾传译《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佛说圣佛母般若心经颂持要语》、《吉祥护法大聚集供顺》等。他还把帝师波罗显胜传作的多种著述译成西夏文，译有《大乘默有者道中入顺大宝聚集要论》、《吉祥护法大聚集供顺》等。他也翻译另一位帝师慧宣的著述，如《风身上入顺》。同时也是佛教著作的撰著者，如曾撰著《三十五佛随忏悔要论》。他还校勘佛经如《无垢净光总持》等。

[1] 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Инф.№.817、610、6360。

慧照是五明出显寺僧人，他把藏传佛教的著述译成西夏文，是一位通晓藏文、西夏文的高僧，译经较多，译著有《六法混圆道次》、《茂盛定次主承次要论》等。前述禅宗著作《三代相照言集文》题款有"清信发愿者节亲主慧照"，若此二慧照是一人，他应是皇族嵬名氏。

周慧海也是翻译佛典的高僧，他可能是汉族，有显密法师的称号，有功德司副使的职衔，后升为国师，曾多次翻译贤觉帝师的著作，如《番语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注华严法界观

门深入记》等。沙门慧明也是把藏文本译成西夏文的译者，其译作有《道果语录金刚王句之解用记》、《圣多闻天王之宝藏论》、《心习顺次》等。贤觉帝师和仁宗详勘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中，参与翻译的有僧人诠教法师鲜卑宝源，鲜卑是西夏番姓（党项）之一。此外，沙门女年法海译《十王经》、《阎魔成佛受记经》。郭法慧为法师，后升号慧净国师，也翻译多部藏传佛教经典，如《隐藏变化解锁》、《瑞多恶趣令净本续之干》、《佛说阿弥陀经》、《等持集品》等。讲经律论沙门法律奉敕翻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此外，翻译佛经的僧人还有德源、慧护、法明等。

印度僧人也在西夏参加了佛经的翻译工作。11世纪末以后，伊斯兰教在印度强力推行，对原来的佛教造成重大威胁。不少印度僧人为躲避灾难，并宏扬佛法，到西藏传法。同时一些印度僧人也到佛教兴盛的西夏传法。在西夏时期印度正流行密宗佛教。《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题款中有高僧拶也阿难答（胜喜），题款为“天竺大钵弥怛、五明显密国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嚷乃将沙门拶也阿难答亲执梵本证义”，他有很高的宗教地位，同时也取得了相当高的西夏官位“乃将”，此官位是可赐予中书位的高官。他在译经时用梵文原本证义，以保证译文的准确。他还传译过《佛说阿弥陀经》、《番语顶尊相胜总持功德依经录》、《圣观自在大悲心恭顺》等。

西夏出版的佛典中有的要经过两道翻译手续，首先从梵文译成藏文（羌译），然后再从藏文译成西夏文（番译）。如西天大师意顺宝贤及黑发智慧奉敕将梵文《圣多闻天王之宝藏论》译为藏语，再由慧明依藏文本译成西夏文[1]。

（二）书写者

无论是写本还是印本书籍，书法都很重要，因此书写者在出版中有着重要地位。在一些西夏出版书籍中的发愿文或题款中有书写者的姓名。一般来说，抄写书籍者可以是书法精良的高手，也可以是普通的识字人。所以在西夏的写本书籍中书法参差不

【1】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Инф.№.2516。

齐，如皇室发愿书写的大藏经和泥金写经，多为书法精品。西夏在大量出版书籍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书法家。有的写本则书法一般，甚至抄写粗劣。

1. 写本的抄写者

在西夏写本中有的记有书写者。如《新集碎金置掌文》的写者是耶西般若茂，耶西为番姓，书写者当是党项族人。《义同》中记有书写者讹清舅茂势，讹清也是党项姓。

佛经的写本多，能找到的书写者也比较多。玄奘译《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也被译成西夏文，现存的西夏文《大般若经》从卷一至卷四五〇，其中大多有多种抄本，总数近二千卷，是众多不同写者的成果，但其书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卷末题款记有写者人名，如卷九三记“写者王伟德”，卷三六四记“书者讹劳那征双”，讹劳是党项性。

有的人抄写过不少佛经。如卷装《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册页装《种咒王阴大孔雀经》、贝叶式写本《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都记有写者是王吉祥合[1]。现存的西夏文佛经中，至少有三种不同装式的佛经由王吉祥合书写。他应是一个职业的写经手。此外还有不少写经者，如《大寒林经》写者翟牛嘉，《大乘百法明门本母略示》的写者僧人刘宝严，《佛说八大人觉经》的写者住家僧慧明，《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的写者杨阿盛，《菩提心及常作法事》的写者嵬移师，《大悲心总持》的写者却地房舍宝，《秘密供养典》的写者只移舅舅势，《般若义解记》写者沙门慧照，《正理滴之句义显用》写者移$_{合}$讹吉祥铁，《正理空幢要论》的写者移$_{合}$讹黑铁，《吉有世尊之总持紧魔障施调伏顺》写者宋阖斡犬。

注明书写者的西夏书籍仅是写本中的一小部分。从书写者看其中有党项族，也有汉族；有僧人，也有俗人。而且可能僧人所占比例不小。僧人和其他佛教信徒在西夏写本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1】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Инф.№.6349、5757b、4272。

2. 刻本书写者

西夏刻本的书法总的质量很高。刻印书籍一般书法工整，因为一次要印刷很多份，如有一定的财力，就不愿草率从事，而是要请擅长书法的人写底，请刀法纯熟的刻工雕印。有的西夏文刻本记载了书写者的名字。这些书写者是精美的西夏刻本的重要创造者。

据西夏出版书籍的题款知李阿显曾于乾祐十六年（1185年）写《大白伞盖母之总持颂顺要论》、乾祐二十二年（1191年）写《大乘默有者道中入顺大宝聚集要论》等佛教印面，刻印出版[1]。看来李阿显是仁宗时期的一名写经手。僧人梁习宝也曾书写《义同》、《大乘默有者道中入顺大宝聚集要论》中卷、《默有夜五更》等。他也是善于书法的僧人，他不仅写佛经，也书写世俗著作。

[1] 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Инф.№.7343、5031、7840。

此外刻本印面书写者还有写诗歌集的僧人刘法雨、写《贤智集》的罗瑞忠持、写《慈悲道场忏法》的赐绯僧人裴慧净、写《大乘圣无量寿经》的僧人柔智净、写《佛说阿弥陀经》的僧人马智慧、写《维摩诘所说经》的僧人移讹平玉、写《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裴阿势成、写《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罗瑞那征讹、写《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刘德智等。

从以上书写者的名字看，其中也是番人、汉人都有，他们训练有素，书写西夏文具有相当的水平。特别是对汉人来说，要学习和熟悉比较繁难的西夏文字，要下一番苦功夫，十分难得。比如裴慧净所写《慈悲道场忏法》，功力深厚，字体工整耐看，通篇整齐美观，是书法的上品。裴慧净堪称当时的书法家。

在有关西夏出版的人物中，僧人占据重要地位。僧人不仅在佛教经典的撰著、翻译、校勘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甚至在世俗著作撰著、编辑、出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僧人参与编著西夏重要图书，说明他们有很高的文化造诣。有的僧人有多方面的文化知识，有的兼通番学、汉学，有的谙熟儒释音律，是寺庙中的学者。西夏有多种类型的世俗学校，在西夏培养文化人才方面

堪称主力，但寺庙在培养文化人才上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寺庙不仅是传播佛教的场所，也是弘扬文化知识的基地之一。

## 第五节　西夏出版图籍的装帧艺术

西夏出版书籍数量大、种类多，因而它们的形制也是十分复杂，多姿多彩。

### 一、书籍的版面

#### （一）写本

西夏书籍版面大小不一，多种多样。写本书籍不像印本那样受到印板等条件的限制，其大小随意性较强。西夏蝴蝶装多数叶面大小相差不远。如西夏文《孝经》每面（一页为两面）宽和高为14.7×24厘米。有的极小，如西夏文《妙法莲华心经》为5.5×7.4厘米，可算作微型本。西夏经折装写本都是佛教著作，如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其大小与世俗著作相比稍高，为13.5×29厘米，很多高度超过30厘米。也有极小的版本，如西夏文《佛说长寿经》为3.5×4.2厘米，是目前所见最小的书。

长卷装除个别世俗著作外，绝大多数是佛经。其高度一般在30厘米上下，也有的在20厘米左右；其宽则因经文长短和书写情况而相差很大，有的几十厘米，有的几百厘米。这些长卷多是由很多幅纸前后粘贴而成，但因年代久远，粘连处多数已经脱节。

梵夹装一般宽50或60多厘米，但它又比藏文长条书高大，这可能与西夏文竖写有关，因为竖写时若叶面不高每行写不了几个字就要另起一行。

#### （二）刻本

西夏的木刻本蝴蝶装多为世俗著作，版面相近。如《文海宝韵》为18×29厘米，《音同》为18×24.5厘米或19×26.5厘米等。其版面与当时流行的宋、金版本很相近。一般说来，西夏文刻本经折装书籍宽在10~13厘米左右，高分别在20、25、30厘米左右三

个档次。

西夏木刻本也有个别卷轴装，如西夏文《诸说禅源集都序》因文中有类似图表的很多连线，不便分页而用卷装的形式，此经宽314厘米、高24厘米，由若干纸粘接成卷，每纸25行。

西夏活字版本书籍中俄藏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15.5×24厘米，西夏文《大乘百法明镜集》原为经折本，后铺平粘连为长卷，现高广为29×460厘米，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为11.5×27.5厘米。宁夏所藏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全页版框高19.4×30.5厘米。

## 二、书籍的装式

有多种多样的装帧形式是西夏书籍的一大特点。西夏书籍有卷装、蝴蝶装、经折装、缝缋装、包背装、梵夹装（长条书式）等，还有两种形式之间的过渡形式，其中以中古时期流行的卷装、蝴蝶装、经折装为大宗。

### （一）卷装

西夏卷装书多是写本，且大部分是佛教著作。如西夏文《魔断问答要论》是长380厘米、高20厘米的长卷，它如西夏文写本《金刚经》、《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多种。有的刻本佛经因有表、图，难以按固定页面折叠，便采用卷装形式，如前述《诸说禅源集都序》。这些长卷都是由一张张裁好的纸按顺序粘连而成，有很多现在还保存着完好的长卷形式，有的则因年代久远粘连处脱落而变成一页一页的单张。有的卷装书还保存有细轴。个别世俗著作也有卷装形式，如西夏文写本《孙子兵法三注》、写本西夏文诗歌集、草书医方、以《音同》为序的《文海》式字书等几种。

### （二）蝴蝶装

蝴蝶装在宋朝才开始出现，是西夏流行的装帧形式之一，西夏的写本和刻本都有不少蝴蝶装，尤以刻印的世俗著作为最多。写本中世俗文献有西夏文《文海宝韵》、《五音切韵》、《义同》、

《三才杂字》、《新集碎金置掌文》、《新法》、《法则》、《孝经》、《孟子》、《新集慈孝记》、《太宗择要文》、汉文《杂字》等。佛教文献有西夏文小本《妙法莲华经》、《佛说父母恩重经》等。刻本中有西夏文-汉文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文海宝韵》、《音同》、《天盛律令》、《贞观玉镜统》、《三才杂字》、《纂要》、《圣立义海》、《新集锦合辞》、诗歌集、《类林》、《德行集》、《贤智集》、《论语》、《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十二国》、《德事要文》等，佛教著作有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等。西夏文活字版《三代相照言集文》也是蝴蝶装。

有的蝴蝶装书背松散后为防止散乱、页面颠倒，便加线钉，如《圣妙吉祥真实名经》[1]。

（三）经折装

经折装也是当时常见的装帧形式，多用于佛经。写本如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此书共有几种写本，约两千卷。又有《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是多种卷册。再如西夏文《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圣胜慧到彼岸八千颂》等。刻本佛经中经折装所占比重很大，有《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多种。

（四）缝缋装和粘叶装

缝缋装是一种写本的装帧形式，把单页纸左右对折再上下对折，或上下对折再左右对折，将若干折叠好的单页在中缝线订成迭，然后再根据需要将数迭缝缀成册。装订后再书写。宁夏方塔出土汉文《诗集》、《修持仪规》就是缝缋装[2]。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大乘默有者道中入顺大宝聚集要论》、《灭时要论》等很多书籍也是缝缋装[3]。

粘叶装也是写本的装帧形式，将双叶纸对折后逐叶粘贴折缝的边缘，有时加粘单叶纸，纸质较厚，双面抄写。俄藏汉文《金刚亥母集轮供养次第录》、《拙火能照无明》等皆是[4]。

【1】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Инф.№.7578。

【2】牛达生：《从拜寺沟方塔出土西夏文献看古籍中的缝缋装》，《文献》，2000(2)。

【3】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Инф.№.2519、7102。

【4】《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册，236~258页。

（五）包背装

包背装是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册页装订形式。其特点是书页正折，版心朝外，在与版心相对的书页余幅处打眼用线捻穿钉，然后用一张厚纸对折后粘于书脊，把书背包起来。专家认为这种装订方式大约出现于南宋。查阅西夏书籍，这种装订形式已经很流行了，但多数没有包背，应是简陋的毛装形式。如西夏文写本《圣六字增寿大明王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经》等。有的写本原为蝴蝶装，后于书右侧上下穿钉毛线绳而成为蝴蝶装向包背装过渡的形式。西夏的刻本书应该说尚没有包背装，只有在刻本佛经中，可能由于长期使用书脊粘贴处脱落，为使其不致散乱，才在靠近书脊处打眼后用线捻穿钉。如《诸说禅源集都序》、《维摩诘所说经》、《等持俱品》等都是这种形式。这可以看成是由蝴蝶装到包背装的一个过渡形式。

还有一种原是经折装，大约也是长时间使用折页处断裂，不得已在右边的一行靠折线的空余处打眼穿钉线捻。这又是一种从经折装向包背装过渡的装订形式。如西夏文《拔济苦难陀罗尼经》、《圣佛母般若心经诵持顺要论》等。还有一种原为刻本经折装，因折页处部分断裂，后从背面托裱，而成为卷装形式。如《菩提勇情之业中入顺》、《慈悲道场忏法》。

（六）梵夹装

这种装式大约起源于印度的贝叶书，后来藏族借鉴这种书籍装帧方式，发展为长条书。西夏的梵夹装由又藏文长条书装式发展而来，在西夏书籍装帧中很有特点。这种书由很多规格相等的长条纸页组成。西夏的梵夹装不同于藏族的长条书。藏族的长条书是自上而下排行，自左向右横写的，西夏的长条书是自右向左排行，自上而下竖写。这种书纸质较厚，皆为两面书写。一种是写完第一面后，向上旋翻，在背面继续书写；另一种是写完第一面后，向右旋翻，在背面继续书写。这种装式主要在俄藏文献中保存，且多是西夏文写本。如《慈悲道场忏法》、《大方广佛华严经》、《圣大悟阴王随求皆得经》、《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

等。这种把用来书写横写拼音文字的长条书式改进成书写竖行方块字的书籍装帧形式，是西夏人的一种创造，它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黑水城出土的藏文书籍中多数为梵夹装。如写本《圣般若波罗蜜经》。有的叶中还有仿贝叶经用于穿绳线的圆孔[1]。

[1] 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TK24。

不难看出，西夏的书籍装帧形式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不但有中古时期几乎所有的装帧形式，而且有多种过渡形式，为研究中古时期的写本和印本书籍形式提供了大量的实际资料。西夏书籍在古籍装帧形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三、书籍的行款、边栏与版心

由于西夏书籍写本、刻本多种多样，版本大小不一，装帧形式复杂多变，这就决定了西夏书籍行款、边栏和版心的丰富多采。

### (一) 行款

西夏书籍的行款随意性较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例如：写本一般每面5~8行，每行十几字至二十几字不等。写本卷装佛经系由一纸纸粘连而成，每纸也因纸幅大小、字体大小而不同，每纸一般有30~40行左右，每行约在20字以上。然而有的本子很小，如《妙法莲花心经》每面只有3行，每行7字。写本长条书装一般每页纸幅较大，每页行数较多，如《大方广佛华严经》每面21~24行，每行字数不等，约为10~13字，有的每面30行，每行14字；《种咒王阴大孔雀经》每面30行，每行13字。也有纸幅小的如《圣摩利天母总持》每面17行，每行6~7字。看来西夏写本行款规格很不一致，这些书是依据其性质、用途纸张的大小、甚至抄写者的财力而定的。卷装和长条书装用于抄写佛经，其行款自不同于书册式书籍，其本身也因纸幅大小而不同。

印本书籍的行款比较整齐、规范，一般每页7~9行，每行13~17字左右。有的经折装每行字数更多一些。这种形式的行款和宋朝书籍的行款大体一致。存世的西夏刻本书籍也表明西夏书籍行款有多种规格。即便同是西夏刻字司刻印书籍其行款也可以是不

同的，如《类林》、《论语》、《圣立义海》等。

存世的几百种、数千卷西夏书籍的行款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我们只能通过举例的方式，使读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事实上西夏书籍的行款比上述介绍要丰富得多。

（二）边栏

书籍的边栏和界格不仅规范了书籍的行格，也美化了页面。西夏的边栏和界格的形式也很丰富，与宋朝的书籍一脉相承。由于它的种类很多，丰富了我们对中古时期书籍边栏和界格的认识。比如写本《文海宝韵》上下单栏，左右双栏；《五音切韵》有的四周单栏，有的上下单栏，有的则没有栏框；《新法》一般没有栏框，有的上下有单栏；《新集碎金置掌文》上下单栏；《义同》四周单栏；《新集慈孝记》四周单栏；《孟子》四周单栏，或上下单栏；《孝经》四周单栏；《太宗择要文》无栏框。写本卷装很多无边栏，如《常所作法事》；也有不少是上下单栏，如《诸说禅源集都序》、《菩提心之念定》。写本经折装多为上下单栏，写本蝴蝶装有的四周单栏，个别是四周双栏，如《圣慧到彼岸庄严注释补》。写本包背装有四周单栏，有的上下单栏。写本梵夹装有的无边栏，有的上下单栏，如两种《大方广佛华严经》；有的四周单栏，如《圣摩利天母总持》。

西夏书籍蝴蝶装刻本有的四周单栏，有四周双栏，有的上下单栏、左右双栏。刻本经折装一般上下单栏。刻本蝴蝶装佛经有上下单栏、左右双栏，也有的是四周单栏。

由上不难看出，西夏书籍写本的栏框比较简单，经书讲究一些，有的干脆就没有栏框。而刻本书籍就比较规范，至少是四周单栏，很多是上下单栏、左右双栏，有的书籍已经是四周双栏了。

（三）版心

版心又称页心，指书页折叠的地方。西夏刻本的版心与同时代的宋版书一样，有白口和黑口之分，其中为折叠作标记用的鱼尾以及版心中的书名、卷次、页码、刻工姓名等项内容，也很丰富。如刻本《文海宝韵》白口，上下皆无鱼尾，上部有西夏文书

名《文海宝韵》的简称“文海”二字，以及标志本页属该书平声部分、上声部分或杂类部分的简称标志“平”、“上”或“杂类”字样；下部有西夏文页码。《音同》白口，上部为西夏文书名“音同”，下部为页码。《天盛律令》白口，上部有西夏文书名简称“律令”二字，以及卷次“一第”（第一）、“二第”等，下部标写页码，有时用汉字，有时用西夏字，书名和卷次上下有界格，页码上下有时有界格。《三才杂字》白口，版心上部有书名简称西夏文“杂字”二字，下部以汉字标写页码。《圣立义海》版心比较复杂，上部是书名简称“立”字和表卷次的汉文数字，中部是刻工姓名，下部是页码，书名简称和卷次数字、刻工姓名、页码都有阴刻、阳刻两种。《论语》版心十分特殊，其版心较宽，上部横刻西夏文“论语”二字，其下是标写卷次的汉文数字，中部横刻刻工姓名二字，下部横刻相同的两个汉字标明页码，表卷次的字、刻工姓名和页码都有阴刻、阳刻两种，可以混合搭配使用。有的在折叠处有细线，成为小黑口。这样在版心中间折叠后，在每一面都能见到书名中的一个完整的字、刻工姓名中的一个完整的字、和表示页码的完整数字，而不是像其他书籍的版心那样，折叠后从一面只能看到半个字。

西夏文佛经蝴蝶装也有版心、书名简称和页码，如《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白口，上部有经名简称“大”字，下部为西夏文页码。

总之，西夏书籍，特别是刻本蝴蝶装书籍的版心内容主要是书名、卷次、页面和刻工，对于整理往往已不完好的西夏书籍是十分重要的。其形式上鱼尾较少，因有上下栏所以都有象鼻，白口多而黑口少，后世流传的大黑口尚未见到。像《论语》那样版心宽阔，书名、刻工横刻，版心中线两侧各有页码的形式，可以说是书籍版心的一大发展。

## 四、附件

西夏书籍和其他中国古书一样，有附带物件。有的为了使用

方便，如卷轴；有的附件为了保护书籍，如书皮、封面、系带；有的为了便于查找翻阅，如书皮上的签题。这些附件也可以起到装饰和美化书籍的作用。

西夏写本卷装很多有卷轴。如《佛说父母恩重经》等卷前有细木轴，写本卷装《菩萨业记》以未去皮木棒作轴。也有不少没有卷轴，也许原来有卷轴后来失掉了卷轴。

书皮和包背是册页书籍保护书籍的主要手段。西夏书籍有的有书皮和包背，有的已经没有了。现存西夏书籍的书皮和包背是多种多样的。如写本蝴蝶装《五音切韵》有羊皮书皮，写本包背装《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有深蓝色绢面包背，《秘密供养典》有绿绢包背，《大寒林经》以深蓝色细纱布包背。写本经折装《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有的用黑绢作书皮，有的用黄底花绢作书皮，内衬绿绢，有的包背装则前有纸封面，后有黄绢作皮，《大方广佛华严经》以黑绢作书皮，《大密咒受持经》黄底花绢作书皮，下部补缀褐麻布，《大寒林经》以黄底花绢作书皮。

刻本蝶装《和南裴休禅师随缘集》用黄纸作书皮，以绢裱边，书皮上粘有题签，上有刻印书名。《德行集》有纸作书皮。《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有紫缎书皮，系有黄缎带，带长22.4，宽1.2厘米。《维摩诘所说经》以蓝绢作书皮。刻本经折装《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以蓝缎作书皮，并有黄色缎系带。《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蓝绢作书皮，附蓝绢系带《圣大悟阴王随求皆得经》蓝绢作书皮，绢面上有经签。《十一面神咒经》以浅蓝色绢作书皮。（彩图10）

通过西夏书籍中五彩缤纷的绢帛书皮、包背，不仅能了解到西夏人对书籍的爱护和精心保管，还能通过这些绢帛了解西夏制造和使用绢帛的情况。西夏书籍的书皮衬纸中，一般都有几层纸，这些衬纸中不乏有价值的书页、经文和文书，对于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有重要意义。

## 第六节 元代西夏文书籍的出版

西夏灭亡后，其主体民族党项人在元朝属于色目人，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当时常称为唐兀人或河西人。有元一代西夏文仍在继续使用，称为河西字。当时西夏文是通用的几种文字之一。著名的北京居庸关过街塔云台门洞内的六体文字石刻，有梵文、汉文、藏文、八思巴字、西夏文和回鹘文。敦煌也有同样六种文字刻于一石的六字真言碑，在甘肃永昌也发现了刻于山石上的六体文字的六字真言。由于党项人在元朝有较大的势力，其文化还有很大影响。元朝统治者也信奉佛教，西夏的后裔在元代佛教发展中一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参与元代佛教管理的不乏其人。最著名的是杨琏真加，他于世祖时任江南释教总统（总摄），法号永福大师。又有杨暗普、高纳麟、韩嘉纳、哈蓝朵儿只、星吉、杨亦执里不花、日耳塞、尔禄等都曾主持管理佛教的宣政院。蒙、元时期，西夏书籍的出版都是佛教著作。

### 一、蒙古时期西夏佛经的出版

蒙古军队灭亡西夏后，西夏地区人民饱尝战争动乱之苦。西夏地区的僧人和佛教信众更希望通过信仰佛教摆脱离乱贫困，祈求安宁幸福。此时原有西夏文佛经大多损毁。因此西夏文佛经的出版有了新的需求。

国家图书馆藏有刻本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前有流传序，其中叙述《金光明经》在中原地区五次翻译的经过，又记述了在西夏时期译成西夏文并进行校勘的事实，还特别记载西夏灭亡后“此经沉没，年日为多”，所以再印此经。又该经卷十末附跋文一篇，其中记：“故大界国世界信众施主陈慧高，念此语故，发出大愿，番［弥］国旧印版国毁中失，因此施舍净物，令雕新字，乙巳年八月十五日始起，丁未年中刻毕，净制纸上得以印施。”“番［弥］国”即西夏国，国毁指西夏灭亡。此时正

是西夏已经灭亡、年号不再行用，蒙古王朝尚未有年号的时代，所以只有年干支，没有年号。此经雕刊时间是太宗窝阔台死后皇后乃马真称制的乙巳年（1245年），刊毕时间丁未年是定宗贵由二年（1247年）。发愿文后有发愿人名17行，包括已故和在世共31人，其中以施主陈慧高的眷属为主，内有不少党项人。他们发愿“以此善根，上报四恩，下救八苦，德法重盛，佛事为新”，“令灭十恶五（欲）罪恶，莫受三恶八灾极苦”。

此经为十卷本，经折装，存第一、三、四、五、六、八、九、十卷，第一、四、五、六、十卷有复本。卷一首有佛画4面，忏悔灭罪记18面，流传序10面，各卷经文页数不等。经题后有校经题款，译文为“奉白高大夏国仁尊圣德珠城皇帝敕重校”。“白高大夏国”为西夏国号，“仁尊圣德珠城皇帝”为西夏仁宗，证明此次刻印使用西夏仁宗时的校本。各纸衔接处的经名简称和页码皆用汉字，如“金光明序一”等[1]。说明当时参加刻印的工匠中有汉族人参加[2]。

流传序有题款1行，译文为“兰山石台岩云谷慈恩众宫一行沙门慧觉集”。一行沙门是西夏贺兰山云岩谷慈恩寺僧人，被封为护法国师，入元后仍继续著述、辑录佛经，曾辑录《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偏礼忏仪》42卷，此书曾以西夏文、汉文两种文字流行，并被编入汉文《续藏》中。国家图书馆还藏有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其中有《涤罪礼忏要文》4页，也是“兰山一行沙门慧觉集”[3]。

## 二、元代雕印西夏文《大藏经》及单部佛经

元代最重要的西夏文文献出版活动是由元政府雕印西夏文《大藏经》。元世祖忽必烈时就着手刻印西夏文《大藏经》，元成宗即位后曾一度“罢宣政院所刻河西《大藏经板》”[4]。不久又恢复刻印。此事在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有详细叙述：“至元七年（1272年）化身一行国师广生佛事，俱令校有译无，过如意宝，印制三藏新经。……至元三十年（1293年）万

【1】史金波：《蒙、元时期党项上层人物的活动》，《民族史论丛》，中华书局，1987。

【2】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3)。

【3】史金波：《西夏佛教新证四种》，《世界宗教研究》，1989(1)。

【4】《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寿寺中刻印，应用千种、施财万品数超过。成宗帝朝大德六年（1302年）夏始告完毕。”[1] 元代西夏文《大藏经》的刻印先后经过30年的时间，才在杭州万寿寺中完成。发愿文还记载了开始参与、主持刻印西夏文《大藏经》的有党项人鲜卑小狗铁、鲜卑土情等人。成宗时印施10藏，武宗在潜邸时印施50藏，即位后又于至大四年（1311年）又印施50藏。负责后一次印刷的有党项人皇使都勾管作者僧人那征大德李、御使台侍御杨那尔征、枢密院知院都罗乌日仡铁木尔。杨那尔征即辅佐武宗、仁宗夺取皇位的杨朵兒只[2]。（图47）

【1】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1)。

【2】《元史》卷一百七十九《杨朵兒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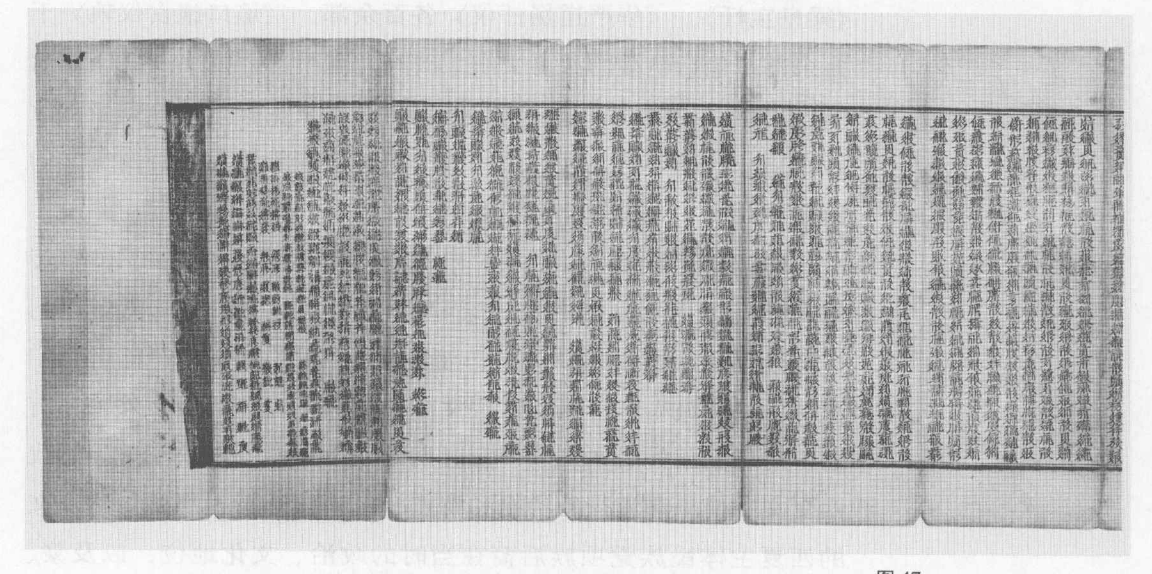


图 47
元刊本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

又日本善福寺所藏元代平江路碛沙延圣寺刊印的《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记载：“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寺院，永远流通。”此记载不仅再次证明元代雕印西夏文《大藏经》于大德六年完成，还具体指出这部大藏经有3 620余卷，比西夏崇宗时期翻译完成的西夏文《大藏经》3 570卷，多出了50多卷。由此还看到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又

印施西夏文《大藏经》30藏。关于元代印施西夏文《大藏经》的事还见于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卷九的牌记款识："奉诏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月二十二日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1] 据记载成宗于大德十一年正月癸酉去世[2]，上述印经完成时成宗已去世10天，武宗尚未即位，也许这与前述武宗在潜邸时印施50藏是一回事。这样在西夏文、汉文文献中有记载印行西夏文《大藏经》至少4次，共有140藏。

元代除刻印西夏文《大藏经》外，还刻印西夏文单部佛经。前述管主八印造30余藏《大藏经》的同时还印制《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包括整藏的西夏文《大藏经》和单部西夏文佛经印刷后"施于宁夏、永昌等寺院，永远流通"，看来主要是散施到西夏故地宁夏、甘肃等地。可知这些地区还是信仰佛教、流行西夏文的西夏后裔的主要居住地。

1917年宁夏灵武县修城时出土两大箱西夏文文献，后辗转传藏，于1929年大部分入藏于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计百余册，蔚然成为大观，少部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和甘肃、宁夏，一部分流失于日本。这些文献中除西夏时期的版本外，还有蒙古时期和元代版本。蒙、元时期的西夏文献，反映了这一时代西夏文字使用和流行的状况和特点，也间接地折射出使用西夏文的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后裔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地位，以及蒙、元时期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言文字政策。从这方面可以说，这些跨越几个历史时期的典籍有其特殊的文献价值。

国家图书馆馆藏有《悲华经》卷第九为元刻本，经折装。卷首有说法图一幅3面，祝赞4面，韦陀像1面。祝赞中西夏文题款译文为"奉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当今皇帝圣寿万岁，太后皇后与天寿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知这是前述大德十一年印刷50部西夏文《大藏经》中的一卷。经题后西夏文译、校经题款译文为

[1]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20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2]《元史》卷二十一《成宗纪四》。

“天生全能、禄蕃佑圣、式法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又有《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五、《经律异相》也是同类元刻本。另有《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也是元刻本，祝赞3面1纸，其中题款西夏文译文为“当今皇帝御印，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御印，正宫皇后御印”。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是元武宗和仁宗的母亲。知此经为武宗或仁宗时印制，比前稍晚。

《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卷第十八，前残，未记刊印时间，据其版式与前述几种相近，也应是元刻本。近年来在敦煌北区出土了一批西夏文文献，其中有刻本《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残页。汉文《大藏经》有唐义净译《龙树菩萨劝戒王颂》，异译本有刘宋求那跋摩的《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此次敦煌发现的西夏文本与后者同名。最重要的是经末有一长方形压捺印记，有墨色浅淡汉文两行：“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师利塔中永远流通供养。”管主八是元代一位僧官，为西夏后裔，任松江府僧录，其名为藏文译音，意为经学大师。他曾主持印制西夏文《大藏经》，并施于敦煌佛塔中。可能在他所施经中都压捺了这样的印记。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有一页西夏文佛经，也出自敦煌，上面也盖有同样形式和内容的印记。此残片当是施与敦煌的西夏文《大藏经》的一部分，为国内仅存，至为重要。由此可见，当年敦煌曾藏有一藏元代出版的3 620余卷的西夏文《大藏经》，是管主八大师印施的刻本。

元刊西夏文《大藏经》和汉文《大藏经》一样，每一函（一般为10卷）有一函号。汉文大藏经以《千字文》文字为序，而西夏文大藏经中是用另外一种编号。元刊西夏文佛经在卷首、卷末经题下有一字，即为函号。国家图书馆藏《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函号为“遗”，《妙法莲华经》函号为“号”，《悲华经》函号为“岁”。《龙树菩萨禅陀迦王之说法要偈》卷尾经题下有“言”字，是该经所在函号。（图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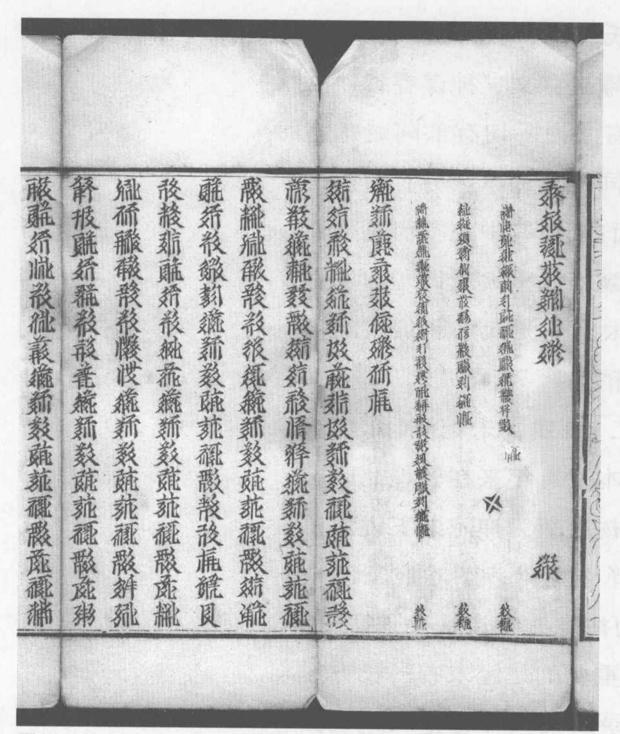


图48
元刊本西夏文《悲华经》

上述蒙、元时期的西夏文古籍，如《悲华经》、《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经律异相》、《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等都是国内外收藏西夏文献的部门所没有的佛教经典，属于海内外孤本。另有一些文献其他部门虽有收藏，但与国家图书馆所收版本不同，也应属于孤本。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华经》等皆属此类。这些古籍都十分珍贵。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刻本《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一序文最后一行下有西夏文双行小字刻款，译文为“此忏罪法出处地界者江南金陵建康府城中奉敕所集”，证明元代除杭州外，还在建康（今南京市）印刷出版西夏文经，并且也是皇帝的旨意。

## 三、元代西夏文活字版《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出版

宁夏灵武县出土的西夏文佛经中最多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批《华严经》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最富，共63卷[1]。故宫博物馆藏1卷，日本京都大学藏11卷[2]，甘肃临夏张思温先生藏有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5卷，即为其中之一部分，他介绍其父张质生先生得到这5册佛经之事甚详[3]。同一类型的西夏文《华严经》宁夏也有部分入藏。此经也有函号，每10卷一号，分别是“解、首、生、铁、出、源、河、穿”。

这批佛经都具有典型的活字版特点。有的页面中一行之内有字形歪斜现象，背面可以看到一些印字透墨深浅不一，系活字排版版面不平所致。有不少常用字与上下左右墨痕深浅差别明显，系后来补印的单字。这是因为在排字过程中常用的活字（熟字）

【1】史金波、王菡等：《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

【2】〔日〕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Ⅰ、Ⅱ、Ⅲ，京都大学文学部，1975年3月、1976年3月、1977年3月。

【3】张思温：《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卷十五简介》，《文物》，1979(10)。

用量很大，但备用不多，不够用时只好暂时空缺，后来再个别补印。

国家图书馆藏此经卷第四十末有西夏文题记两行，译文是："实勾管作选字出力者，盛律美能慧共复愿一切随喜者，皆共成佛道"。"选字"应是拣字、排字，"选字出力者"应是拣排活字的工匠。又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此经卷第五有西夏文题记两行，译成汉文是："都发愿令雕碎字勾管为印者都罗慧性，复共一切发愿助随喜者，皆当共成佛道"。"碎字"，即为活字。这两条西夏文题记是证实这种《华严经》为活字本的确凿证据[1]。

《大方广佛华严经》为经折装，上下双栏，一纸5面。有的卷前有佛像、祝赞，经题后有译、校经题款，译文为"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纸接缝处有西夏文经名。

仔细审视这些佛经的卷首还会发现，第一行的经名，第二行和第三行的译者和校者题款，上下字之间有相交相插现象，其文字排列和字体与后正文文字显然不同。这3行显然不是单个活字所印。原来此种《大方广佛华严经》有80卷，每卷卷首的经名、译者和校者都相同。印刷者便把这些每卷都不变的字雕制成一块版，排版时整个嵌入版中，等于一次拣排几十个字，然后再将各该卷的数目字以活字排上，前三行就这样十分便捷地排完了。这种以字为单位的活字版中加有木雕版，和上述《维摩诘所说经》活字版中嵌入木雕版条性质是一样的。

国家图书馆所藏此经不少卷有复本，从纸张分析应是不同的印本，可知此种活字本《华严经》并非只印刷出版一次[2]。

元代的西夏后裔党项人逐渐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使用党项民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少，文字也渐次废弃，西夏文献的出版也就风光不再，逐渐萎缩，至元代后期几乎绝迹。有的西夏后裔僧人参与了汉文佛经的印刷出版。如禅师李惠月是西夏入元的僧人，曾参与《普宁藏》的印刷出版发行[3]。

【1】史金波、黄润华：《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记》，《文献》，1985(4)。

【2】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2007年。

【3】李际宁：《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文献》，2000(1)。

## 第七节　西夏出版物的价值和研究意义

### 一、西夏出版物的价值

（一）民族古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西夏出版的书籍是西夏文化的重要载体。西夏的主体民族早已消亡，存留于世的西夏书籍是透视西夏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窗口。特别是当我们认识到汉文文献记载的西夏历史资料十分有限，元朝修正史时只编修了宋、辽、金三朝历史而未修西夏史时，尤其感到近代出土的这批西夏书籍的可贵。这些珍贵的文献从多方面展示了西夏的历史文化面貌，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考究西夏的历史。从以上介绍的部分西夏书籍不难看出，它们对研究西夏的语言、文字、历史、法律、文学、宗教、民族、民俗、医药、历法等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有多么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如此，西夏书籍还深刻地反映出西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内在的、密切的联系，表明了西夏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贡献。西夏书籍的史学价值显而易见。

（二）西夏出版的书籍皆为中世纪古本，图书馆、博物馆都以珍本、善本入藏。可以说，大批西夏书籍的发现改变了中国古籍的格局。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历代都形成了很多文献，但保存下来的并不很多。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使唐代古籍大为丰富。与西夏同时代的宋朝保存至今的古籍虽有相当数量，也不过一千多部。辽代书籍更是寥若晨星。金代书籍由于大藏经《赵城藏》的发现使其数量大增，然而世俗文献很少。而目前存世的西夏书籍有近500种、数千卷之多，其中仅世俗文献就有数百卷。八十多年前，世上还见不到一部西夏出版的书籍，现在西夏书籍已占中古时期书籍的相当比重，使学术界为之瞩目。从近些年出土的情况看，西夏出版的图籍还处于增加的趋势。这些七八百年前的出版物十分难得，不难想象其重要的文献、文物价值。

（三）西夏书籍不仅数量多，品类也十分丰富。西夏书籍从写印形式看有写本和印本。写本中又有楷书、行书、草书，有毛笔、竹笔写的书籍，还有极为珍贵的泥金字经书。印本有木刻版印本和多种极为罕见的活字印本。从装帧形式看几乎囊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出版图书的各种形式，如卷装、蝴蝶装、经折装、粘叶装、缝缋装、梵夹装、线装等。书籍的附件也丰富多彩。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印刷、装帧、出版不可多得的资料。可见，西夏书籍也还具有重要的印刷和版本价值。

（四）多种民族文字书籍的编纂出版是西夏图书出版的重要特点。中国境内使用民族文字编纂书籍，汉代以后多种文字竞出于西域，而后式微；唐朝时期繁荣于吐蕃，仅为一种。有宋一代，辽、金虽创制民族文字，但使用不广。惟在西夏以民族文字编纂出版书籍实用推广，常出不衰。西夏出版的大量西夏文书籍，以独特的西夏文字展示西夏文化，使中国古代的出版物增添了新的品类。西夏还出版汉文、藏文和回鹘文书籍。不同文种的书籍在同一王朝中争奇斗艳，实为中国中古时期一大文化景观。多种民族文字书籍的出版，繁荣了民族文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应该说，西夏书籍又有特别的民族文字和文献价值。

## 二、西夏出版物的意义

（一）西夏所在的西北地区，印刷出版已有一定基础，特别是在唐、五代时期又有所发展，但与中原文化发展地区相比，却有很大差距，仍显得落后不少。西夏在这里立国近两个世纪，发展了民族文化，繁荣了出版事业。可以说，这一地区的印刷出版当时有政府重视，有专门机构管理，出版多种民族文字书籍，形成了中国新的印刷出版中心。可以说，这一地区的出版从来没有这样兴旺发达过，西夏铸造了西北地区印刷出版业的辉煌。

（二）西夏活字本书籍的出版是西夏的一大特色。它在西夏有一个发展过程。泥活字出版书籍时间较早，虽也表现出活字印刷的优势，但仍有简略和粗糙的痕迹。随着西夏的活字印刷技术

的发展，便逐渐产生了印制优良的木活字印刷书籍。有的西夏活字印本包含四种大小不同型号的活字，还有比较复杂的表格，格中排字，技术含量更高，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西夏活字印本书籍是中国活字印刷术发明不久的早期活字印刷出版物，十分珍贵。西夏活字版书籍是研究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出版的制作、排版、印刷等工艺的主要资料。在今宁夏银川一带，甘肃武威、敦煌，内蒙古的额济纳旗等广大地区，都发现了西夏的活字印本书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活字印刷的过程后指出："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1]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后，当时宋朝并未得到大力推广。宋代虽也有关于活字印刷出版个别事例的记载[2]，但从遗存的出版物来看，西夏的活字印刷出版在当时各王朝中是最发达的。西夏借鉴中原地区活字印刷术印刷出版自己的民族文字文献，并且从泥活字演进为木活字印刷出版，是西夏在活字印刷出版上的突出贡献。中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活字印刷出版方面，衣钵相传，发明创新，后向东西方传播，表现出中华民族在出版领域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

（三）西夏的文化对后世有积极的影响，同样西夏的出版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西夏灭亡后，不少书籍为元朝所得。耶律楚材随元太宗征西夏，乾定三年（1206年）蒙古军队攻下西夏西平府灵武时，"诸将争取子女金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3]。党项人在元代为色目人，他们一部分人仍使用西夏文字，甚至用西夏文字印刷出版佛经。如蒙古时期曾校印《金光明最胜王经》，元朝时雕刊西夏文《大藏经》，并不断印施。元朝还刻印汉文《大藏经》施放于需要这些出版物的西夏故地。

【1】[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板印书籍"条。

【2】[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全集》卷一九八"札子"第十。

【3】《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 第十二章　金代出版事业的概况

## 第一节　金代图籍出版的社会背景

金代是女真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女真族是个极其古老的民族。西周时，这个民族还处在石器时代。战国时期的文献，已记载了这个民族，译名为“肃慎”。契丹族建立辽国之后，女真族便处在契丹贵族的统治之下，并确立了“女真”的译名。到辽兴宗即皇帝位之后，因其名耶律宗真，要行回避御名之法，故又改“女真”为“女直”，即真字缺末两笔。女真族长期生活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以狩猎和农耕为生。到完颜部统一各部落，阿骨打成为首领之后，便不甘契丹人的统治，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抗战争。公元1114年，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天庆四年，当女真军队连续攻克宾州、咸州后，阿骨打的弟弟吴乞买和撒改、辞不失等便拥戴阿骨打称帝建国。公元1115年，即天庆五年的正月初一，阿骨打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元“收国”。阿骨打就成了金朝的开国皇帝，史称金太祖。

女真人发迹于白山黑水之间，向来弓马娴熟，驰骋南北，纵横东西，未遑文事。然自太祖建国以后，文事渐洽，礼仪渐修，逐步发展，史家亦有不少描述。

阿骨打建立大金国之后，立即命欢都之子完颜希尹创制文字。《金史》卷七三《完颜希尹传》载：“金人初无文字，国势

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其后熙宗亦制女直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又颁女直小字。同年九月，金熙宗下诏，凡任命女真、契丹和汉人官员的诰命，都可各用该民族的文字书写。这表明契丹字、汉字和女真字，都是当时官方通用的文字。这种文字的通用，意味着女真人视野较宽，善于吸收比他发达的契丹文化和汉文化，从而很快地壮大了自己、提高了自己。

女真人建国后，非但在创制文字方面煞费苦心，在立官制、建都城、营宫室、定礼仪等方面，也极力模仿汉族制度。并且大胆利用汉人，参与谋立金朝的典章制度。特别是其中的文化、教育机构，则几乎与汉制无殊。例如国子监，本是汉族封建王朝历代都有的文化建置。金完颜亮天德三年（1151年），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正月甲午，初置国子监。四月丙午，诏迁都燕京。并谓“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大定六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学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处，共千人……”[1] 国子学及府学的设立，表明金人已按照当时比较发达的汉文化模式，来培养自己的人才和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了。

【1】《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

金初进军曲阜时，金兵将领中曾有人指着孔子像谩骂，并要放火把孔庙烧毁，还要掘孔子的坟，幸被制止。据《大金国志》卷五《太宗文烈皇帝三》载：“粘罕既破澶、濮，会窝里嗢之众同攻北京。继攻衮、郓。十二月，破袭庆府，有欲伐孔子墓者，诛之。时汉儿将启孔子墓，粘罕问曰：‘孔子何人？’通事高庆裔曰：‘古之大圣人。’曰：‘大圣人墓焉可伐？’尽杀之，故阙

里得全。”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即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二月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三月己未，上宴群臣于瑶池殿，适宗弼遣使奏捷，侍臣多进诗称贺。帝览之曰：‘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1] 这段记载，表明女真人的下层由最初的无知而侮孔蔑孔，到熙宗则已尊孔奉孔。尊孔必要读经，故熙宗夜以继日地诵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而历代统治者尊孔读经的目的，都是想从孔孟之道中汲取统治经验，即以武功取天下，以文德治平天下。故他说：“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这样，金朝的文化发展便建立在牢固的政治基础上了。

【1】《金史》卷四《熙宗本纪》。

尊孔崇经思想的确立，影响着兴学和教育内容、贡举和考试内容的变化。如《金史》载：“自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2] 这种以翻译过去的儒家经典为女真学校教科书的变化，从五经、三史内出题作为科举取士标准的变化，反映出女真人进一步向汉文化靠拢。非但如此，金王朝在天德三年成立国子监后，还对经、史、子书所要用的注本，一一加以界定，表明女真人至少是在女真族的上层中间，吸收发达的汉族文化，已是相当恳切了。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九月己巳，金世宗完颜雍尝对宰臣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3] 一语道破了金朝统治者译经、读经的真实目的，无非是想通过这种教育，纯风化、正礼仪、一道德、端仁义，从而加强和稳固自己的统治。

【2】《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

【3】《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起初，金太祖阿骨打和金太宗吴乞买在金戈铁马的征战中，只知伐人国而系其君。当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被攻破时，凡宗室、后妃，下至伎女、打筋斗等艺人，子女玉帛、金银彩缎及太医局灵丹宝药，无不人担车载，抢劫一空。表明此期他们还是

奴隶主的眼光，狭隘地盯在人、物上。后因宗翰建议，说是破人国后于人、物掠取太甚，会为天下后世所讥笑。“于是又取图籍文书及其镂板偕行，其所欲不在是也。靖康元年十二月十六日（金太宗天会四年），金人入国子监取书，凡王安石说皆弃之。建炎元年正月九日，始取国子监书板、三馆秘阁四部书。二十三日，金人索监书、藏经。如苏、黄文及《资治通鉴》之类，指名取索。仍移文开封府，令见钱支出收买，开封府直取书籍铺。二十六日，金人来索古器、秘阁三馆书籍、监本印板、古圣贤图像、宋人文集、阴阳医卜之书。国子监主簿叶将，博士熊彦诗、上官悟等，押书印板并馆中图籍，往营中交割。二十九日，差董逌权司业监，起书籍等，差兵八千人运赴军前。三十日，金人索秘书省文籍、国子监印板……盖宋汴京百余年官私所积之图书、国子监板片，至是为之一空矣”[1]。这种举动发生在金初，何所用心，虽未必有汉军入咸阳萧何取图籍那样的深谋远虑，然于有金一代，此举影响是深远的。泰和元年（1201年），完颜璟尝下购书诏曰：“购遗书宜尚其价，以广搜访。藏书之家有珍惜不愿送官者，官为誊写，毕复还之，仍量给其直之半。”[2] 这显然与金初破汴大量索取图籍是一脉相承之举。

【1】张秀民：《金源监本考》，《图书季刊》，1935年2卷(1)。

【2】《金史》卷一一《章宗本纪三》。

女真人建国后，从大小女真文字的创制，到兴学立教、尊孔读经、科举选士，乃至于大量索取宋刻图籍、版片，这一切，表面看来，似乎与金代刻书出版事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金朝政府这一系列的文化举措，却把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烘托了起来，构成了金代出版事业也在不断发展的社会背景。

## 第二节　金代图籍的出版概况

金代在太祖、太宗时期，还处在以武功开创基业的阶段，尚难顾及刻书出版事业。然自熙宗亲祭孔庙，尊孔读经，海陵王天德三年又置国子监以养士；贞元元年迁都燕京，到大定、明昌间，则典章礼乐灿然大备，其刻书出版事业亦随之而兴盛起来。

## 一、金代中央官署的刻书出版

金代中央朝廷刻书出版首推国子监。然在金代国子监建立之前，北宋汴京旧监仍在刻书，亦未尝不可视为金代监刻书籍的序幕。国家图书馆所藏明万历二年（1574年）李栻刻印出版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前，载有杨用道为《附广肘后方》所撰序文一篇，称："昔伊尹著汤液之论，周公设医师之属，皆所以拯救民疾，俾得以全生而尽年也。然则古之贤臣，爱其君以及其民者，盖非特生者遂之而已，人有疾病，坐视其危苦而无以救药之，亦其心有所不忍也。仰惟国家受天成命，统一四海。主上以仁覆天下，轻税损役，约法省刑，蠲积负，柔远服，专务以德养民。故人臣奉承于下，亦莫不以体国爱民为心。惟政府内外宗公，协同辅翼，以共固天保无疆之业，其心则又甚焉。于斯时也，盖民离兵火获见太平，边境宁而盗贼息矣，则人无死于锋镝之虑；刑罚清而狴犴空矣，则人无死于桎梏之忧；年谷丰而畜积富矣，则人无死于沟壑之患。其所可虞者，独民之有疾病夭伤而已。思亦有以救之，其不在于方书矣乎！然方之行于世者多矣，大编广集，奇药群品，自名医贵胄或不能以兼通而卒具，况可以施于民庶哉！于是行省乃得乾统间所刊《肘后方》善本，即葛洪所谓皆'单行径易，约而已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家有此方，可不用医'者也。其书经陶隐居增修而盖完矣。既又得唐慎微《证类本草》，其所附方皆洽见精取，切于救治，而卷帙尤为繁重。且方随药著，检用卒难。乃复摘录其方，分以类例，而附于《肘后》随证之下，目之曰《附广肘后方》，下监俾更加雠次，且为之序而刊行之。方虽简要，而该病则众；药多易求，而论效则远。将使家自能医，人无夭横，以溥济斯民于仁寿之域，以上广国家博施爱物之德，其为利岂小补哉！皇统四年十月戊子，儒林郎汴京国子监博士杨用道序。"

按：金熙宗皇统四年（1144年），还尚未设置自己的国子监。金代自己创设国子监是在海陵王完颜亮天德三年（1151年），较

皇统四年晚七年。金人破汴，虽将北宋国子监中图籍、版片劫掠而去，然并未破坏国子监。且很可能留用了一些降臣，继续经营监事，待天德三年之后，金人自己设监，汴京北宋旧监才停行监事。杨用道摘编《附广肘后方》，"下监俾更加雠次，且为之序而刊行之"，证明了上述这种历史事实。故谈及金代国子监刻书出版，不能不由此谈起。或者谈金代国子监刻书出版，似当以此为始。或者谈北宋国子监刻书出版，其余绪亦当以此为结。

中国历史上国子监刻书出版始于五代国子监刻印《九经》，北宋承之，南宋和金代继之。天德三年金人设立国子监，以为国家作养人才之地。其职能率由北宋国子监之旧章，除培养士子之外，还担任刻书出版的任务，尤其是正经正史，其标准的范本，盖皆由国子监雠校刊印出版。

《金史·选举志》称："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孤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祕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1]足见金代国子监设立之后，为了给士子确定读本，由国子监雕印出版了九经、十四史和三子，凡26种书。表明金代国子监设置伊始，就紧紧围绕教育的需要，刊行出版了经、史、子三部的重要图籍。这是金代国子监从事刻书出版业的事例与明证。

金世宗曾问左丞耶律履（字履道）宋名臣中谁最优秀，履道答曰苏轼最优。金世宗说："吾闻轼与王诜交甚款，至作歌曲，戏及姬侍，非礼之甚，尚何足道耶？"履道回答说："小说传闻，

【1】《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

未必可信，就使有之，戏笑之间，亦何得深责！世徒知轼之诗文不可及，臣观其论天下事，实经济之良才。求之古人，陆贽而下，未见其比。陛下无信小说传闻，而忽贤臣之言。”履道“明日录轼《奏议》上之，诏国子监刊行”[1]，表明到金世宗时，国子监将苏轼的《东坡奏议》也刊行出版了。按苏辙为其兄苏轼所作墓志，已说轼有奏议15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著录与之同，然均系全集本，并非单行本。金耶律履道录进国子监刊行出版者，盖为《东坡奏议》之初刻单行本。足见金人器重苏轼之政见治才并不逊于宋。

【1】[金]元好问：《中州集》壬集第九。

金太宗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平阳毕履道为刊印出版北宋王洙所撰《地理新书》写了一道序。称：“宅葬者，养生送死之大事也。自司马史分阴阳家流，至唐讫宋，屡诏儒臣典领司天监，属出秘阁之藏，访草泽之术，胥参同异，校覈是非，取合于理，而灾祥有稽者，留编太常，即今之颁行《地理新书》是也。俾世遵用，以裨政治，保生民跻于寿域，惠亡者安于泉下。示爱民广博之道，不其韪与！兵火之后，失厥监本，于是俗所传者，甚有讹谬。至于辞略而理乖，名存而实革，既寖差误，触起凶灾。仆深患斯文之弊，遂质诸师说，访求善本，参校以正之者，仅千余字，添补遗缺者，几十数处；兼有度刻步尺之差者，则以算法考而改之；有阴阳加临之误者，则以成法推而定之。至若四方正位，详说其准绳，表臬求影于星，取中之法四折曲路，细画其角，斜正方合勾股。入穴之图山水，列其吉凶，祭事分于坛壝。发挥经义，注释礼文，岁余方毕，藏之于家，以俟同道之能者踵门而采择焉，庶亦知余攻业之不忽也。时大定岁在阏逢执徐，平阳毕履道题。”

这篇序文，表明毕履道的新校本《地理新书》，只是“藏之于家，以俟同道之能者踵门而采择焉”，实则并未刊行。然则，这道序文却透露出一则消息：“自司马史分阴阳家流，至唐讫宋，屡诏儒臣典领司天监，属出秘阁之藏，访草泽之术，胥参同异，校覈是非，取合于理，而灾祥有稽者，留编太常，即今之颁行

《地理新书》是也。”说明由司天监提供材料，太常寺编撰的《地理新书》，亦可能是由国子监刊印颁行的。文中有“兵火之后，失厥监本”可证。“金制，凡司天台学生，听官民家年十五以上、三十以下试补。又三年一次，选草泽人试补。其试之制，以宣明历试推步及婚书、《地理新书》，试合婚安葬，并《易》筮法，六壬课，三命五星之术”[1]。盖因《地理新书》是司天台学生试补的内容，故由国子监刊印颁行。实则古今通理，凡与学生考试有关的书，向来销售面广，《地理新书》亦然。有金一代，此书除国子监雕印出版外，明昌间（1190—1196年），古唐、夷门、蒲阪、平阳等处书籍铺亦多有刊行出版。

【1】张秀民：《金源监本考》，《图书季刊》，1935年2卷(1)。

金元好问辑《中州集》丙集第三称：刘记室迎，“字无党，东莱人。初以荫试部掾，大定十三年，用荐书对策，为当时第一。明年，登进士第，除豳王府记室，改太子司经，显宗特亲重之。二十年，从驾凉陉，以疾卒。章宗即位，录旧学之劳，赐其子国枢进士第。无党自号无诤居士，有诗文乐府，号《山林长语》，诏国学刊行”。说明金代连刘迎的《山林长语》，在章宗时也已由国子监刊版印行。

《金史》卷六十六记载：完颜勗，“字勉道，本名乌野，穆宗第五子。好学问，国人呼为秀才……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军中往劳之。宗翰等问其所欲，曰：‘惟好书耳。’载数车而还……（皇统）九年，进拜太师，进封汉国王……大定二十年诏曰：‘太师勗谏表、诗文甚有典则，朕自即位所未尝见。其谏表可入《实录》，其《射虎赋》、诗文等篇什，可镂版行之。’”熙宗曾狩猎海岛，三日之间，亲射五虎获之。勗随狩，并献《东狩射虎赋》。到世宗大定二十年(1180年)，已事隔几十年，追崇他的道德文章，诏刻他的《射虎赋》及诗文等篇什。这是否也为国子监所刊行，史无明书，不敢断言。然以理推之，当是国子监刻印出版。

自皇统元年（1141年）熙宗亲祭孔庙，提倡尊孔读经起，华风渐染，故俗渐失。至海陵王都燕之后，此风更是愈演愈烈，金

主深以为患。开始禁止女真人改为汉姓，不许女真人学汉人装束，卫士不谙女真语者，并勒习学。还在京师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专用女真字教养学生。“大定四年（1164年），诏以女直字译书籍。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复进《史记》、《西汉书》。诏颁行之。”[1]

“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八月乙未，观稼于东郊。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九月己巳……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2]

“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谕宰臣曰：‘女直进士惟试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预备。今若试以经义可乎？’宰臣对曰：‘五经中《书》、《易》、《春秋》已译之矣，俟译《诗》、《礼》毕，试之可也。’上曰：‘大经义理深奥，不加岁月不能贯通。今宜于经内姑试以论题，后当徐试经义也。’”[3]“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4]。

上述种种事实表明，自大定四年起，金政府组织力量，用女真字先后翻译了不少汉籍中经、史、子书，并皆下令颁行。既是颁行，似当是刻印出版，用手写不可想象。但究竟是由什么机构负责梓行的，史无明言，不敢断定就是国子监刻本。因为翻译经史的工作由当时的弘文院主管。金代“弘文院，知院，从五品；同知弘文院事，从六品；校理，正八品，掌校译经史”[5]。弘文院既掌译经史，上述这些女真文译本书亦由它奉命刊行，也未可知。

现在所知，金代中央除国子监专司刻书之外，秘书监、史馆等机构似也兼事刻书出版。金代秘书监设监一员，从三品；少监一员，正五品；丞一员，正六品；秘书郎二员，正七品，通掌经籍图书。校书郎一员，从七品，专掌在监文籍。金代的著作局、笔砚局、书画局、司天台等，均由秘书监领属。著作局设著作郎

[1]《金史》卷九十九《徒单镒传》。

[2]《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3]《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

[4]《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

[5]《金史》卷五十六《百官志二》。

一员，从六品；著作佐郎一员，正七品，掌修日历。皇统六年以后又增设著作郎、佐郎各二员，专司编修日历，以学士院兼领之。从秘书监及其所属机构的性质任务来看，似也应主刻出版一些图书。但史无明书，只是推测。

金代史馆刻书，有例可证。泰和六年（1206年），宋李爽率兵围攻寿州。金刺史徒单义募人往斫爽营，寿州人魏全在募选之中。待魏全斫营时，为李爽所执捕。李爽对魏全说，你若能为我骂金主，便免你一死。执全至城下，反骂宋主。爽怒而杀之，全至死骂不绝口。事奏金帝，帝"赠全宣武将军、蒙城县令。封其妻为乡君，赐在州官舍三间、钱百万。俟其子年至十五岁，收充八贯石正班局分承应，用所赠官荫，仍以全死节送史馆，镂板颁谕天下。"[1] 表明金代史馆是刊印出版过这类忠义节烈性传记文字的。

【1】《金史》卷一二一《忠义传一》。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1180年）及章宗明昌四、五年（1193—1194年），黄河屡屡决口，金政府的都水监便刊印颁发了《河防通议》。按《河防通议》本为宋人沈立所撰之书。沈立字立之，治河讲分杀水势。又采摭黄河事迹及古今利病而成《河防通议》。金都水监所出版者，盖即此书。至元代沙克什，则折衷沈立及金刻此书，又成《河防通议》二卷。河患之后，常常又出现蝗灾，故章宗明昌间又出版颁行《捕蝗图》。

金代内府还设有印造钞引库，大安二年之后还兼管纸坊。钞引库设使，从八品；副使，正九品；判，正九品。专掌监视印造勘覆诸路交钞、盐引，兼提控抄造钞引纸。中国自有纸币以来，历代都有专门印刷交钞的机构和监察机构，因为此系金融通货，实关国计民生。金代特设专门机构，独掌交钞、盐引的印造。

## 二、金代坊肆的刻书出版

金代除有些中央机构从事刻书出版，还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设有专门的刻书出版机构。这种机构的性质，类乎后世清朝各省的官书局。但金代平阳的官书局究竟出版过多少书、刻过什

么书，已无从稽考其全。然由于官书局的带动，平阳麇集了很多刻书坊肆和出版家，很快发展成为中国北方出版中心。如此地刊印出版的《黄帝内经素问》、李子文刊印出版的《增广类林》，王宅中和轩刊印出版的《道德宝章》，刘仲敏校刻出版的《尚书注疏》，书轩陈氏刊印出版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晦明轩张存惠刻印出版的《滏水文集》、《丹渊集》、《通鉴节要》，以及金亡后仍用泰和甲子纪年刊印出版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姬家雕印出版的《四美图》等，都出自平阳书铺之手。其刊印之精，亦不下于南宋。如姬家雕印出版的《四美图》，便极为精致。《四美图》的正名称为《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是靖康之变以后平阳坊刻招贴版画的代表作。是用墨版印在一张高二尺五寸、横一尺有余的黄纸上，可以看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独幅招贴画。是我国木刻版画中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也是金代刻板印刷工艺高超水平的代表作。

平阳又称平水，即今山西临汾，地处河东南路，即所谓晋南地区，土地沃衍，人物丰盛，文化较为发达。其地又盛产麻纸，北边太原府有造墨场，纸、墨取材均较方便。加之宋辽、宋金兵戎相见期间，平水不当要冲，农业、商业、刻书出版事业均得以在战争的夹缝中独自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平水成为金代中国北方刻书出版中心的有利条件。故《金文最》卷二十八孔天监《藏书记》中描绘当时平阳、洪洞"家置书楼，人蓄文库"。足见此地刻书出版之盛，人文之盛。

仅次于平阳的有河北西路的宁晋县。宁晋县唐城荆里庄人荆祜，字伯祥，其上代本是在洨水旁做陶器的工人。到其祖父时则改业刻书，曾刻印出版《五经》等行世。其后发展迅速，不到20年间，"荆氏家籍，布满河朔"。贞祐（1213—1217年）年间蒙古骑兵策马南侵，荆家将所刻《五经》、《泰和律义篇》、《广韵》等书的版片隐藏于废墟中。兵后发掘出来，修补完善，再行印卖，仍是销路极广，遍及黄河以北。荆氏刻本流传至今的有《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十五卷，为崇庆元年（1212年）荆珍

开雕。此书序后有“洨川荆珍开板”木记一行可证。洨川即洨水，实为宁晋的别名。荆珍当是荆祜的族人。此书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存12卷（图49）。

中都（北京）、南京（开封）曾先后为金代都城，刻书出版历有传统。可考者有南京路刻印出版的《旧五代史》、《祖庭广记》及梁肃出公帑刻印出版的《贞观政要》。汴梁书坊还出售完颜琦自刊的诗集《如庵小稿》。

金代的行政区划分为十九路，有刻书出版地点可考的除中都路的中都（北京）、南京路的南京（开封）、河东南路的平阳、河北西路的宁晋外，尚有河北西路的真定府、邢台、浚州，河东南路的隰州、蒲州、泽州、山阳、河内，河东北路的太原府、五台山，大名府路的大名，南京路的亳姑、少林寺，京兆府路的同州、朝邑，山东东路的济南、宁海、莱州、山东西路的曲阜等，几乎遍及现在的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五省区。如太原刘氏书坊所刻印出版的《伤寒直格论方》，济南李德元所刻印出版其祖先的《窥豹集》，古泽陈氏所刻印出版的《法言微旨》，金人购刻宋胡铨《劾秦桧奏稿》，金人集辑刻印出版的北宋徽宗给金主的谢表等，都是这方面的实例。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金代刻印出版的《周礼注》十二卷、《新修参音引证群籍玉篇》三十卷、《泰和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十五卷、《新雕注疏珞琭子三命消息赋》三卷、《新雕李燕阴阳三命》二卷、《重编补添分门字苑撮要》、《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三十四卷、《栖霞长春子丘神仙磻溪集》三卷、《萧闲老人明秀集》六卷、诸宫调《刘知远》十二卷等等（图50），其刊印出版都不出上述地区。


崇慶新雕改併五音集韻序
[illegible]之術其來尚矣謐群經之義訓別使字之[illegible]
[illegible]音之輕重論四聲之清濁至於天地之始日
[illegible]星辰名號人間姓氏山川草木水陸[illegible]飛
禽走獸四方呼吸全憑字樣豈可離於聲韻者哉嘗
聞古者陸詞[illegible]本劉臻等八人隋朝進韻抱嘗歸家
人皆稱數流通於世豈不重歟又至 大[illegible]皇統年
間有洨川荆璞字彦寶善達聲韻幽微博覽群書奥
旨特將三十六母添入韻中隨母取切致使學流取
之易也詳而有的檢而無謬美即美矣未盡其善也
復至泰和戊辰有吾弟韓道昭字伯暉迺先叔之次
子也先叔者諱孝彦字允中況於篇韻之中最為得

图49
金崇庆元年荆珍刻本《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

图50
金刻本诸宫调《刘知远》

至于有关黎民生命安危的医药之书，如《本草》，《圣济总录》，张子和、刘完素的医学著作，成无已的《伤寒论注解》、《明理论》等，金代也有刊印出版。金刻《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亡编》一卷，则至今还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图51）。

## 三、金代刻印出版释道典籍

金代统治者，起初并不怎么崇奉佛教，直到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十四年（1174年），金主仍谕宰臣曰："闻愚民祈福，多建佛寺，虽已条禁，尚多犯者。宜申约束，无令徒费财用。"[1] 这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统治者对佛教，或者说对人民崇信佛教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人民对佛教笃信之深。历史上无数的经验证明，当限



崇慶新彫改併五音集韻序
夫聲韻之術其來尚矣證群經之義訓別使字之因
由辨五音之輕重論四聲之清濁至於天地之始日
月星辰名號人間姓氏山川草木水陸魚蟲飛
禽走獸四方呼吸全憑字據豈可離於聲韻者哉嘗
聞古者陸詞拂李劉臻等八人隋朝進韻抱賞歸家
人皆稱數流通於世豈不重歟又至 大皇統年
間有洨川荆璞字彥寶善達唠韻幽微博覽群書奧
旨特將三十六母添入韻中隨母取切致使學流取
之易也詳而有的撿而無謬美即美矣未盡其善也
復至泰和戊辰有吾弟韓道昭字伯暉迺先叔之次
子也先叔者諱孝彥字允中况於篇韻之中最爲得
[illegible]

图51
金刻本《黄帝内经素问》

【1】《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

制、反对人民的普遍信仰而可能引起社会混乱，动摇、干扰统治基础的时候，统治者又会反转过来适应百姓的积习，以维护自己的统治。金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据《大金国志》和宋洪皓《松漠纪闻》的记载，金代统治者在反对百姓愚民祈福，多建寺院，徒费财用的同时，又使“出家者无买牒之费”，致令贵族不但“多舍男女为僧尼”，平民落发者更多，一次度僧至5万人之多。当时的燕京（今北京）寺宇相望，“大者三十有六，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这均与金世宗“宜申约束，无令徒费财用”的禁令相矛盾。

金代的大寺院，几乎都是大地主和高利贷的发放者，蓄资之后，便想做功德，发愿刻经。皇统九年（1149年）太原府榆次县小冀村刻印出版《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大定四年（1164年）僧正明净尽出粟帛、赵统经酒官视局五台山捐金，合力刊印出版《清凉传》、《广清凉传》、《续清凉传》。百万和尚为纪念父母，在故乡同州朝邑镂板印施《大般若经》几千卷；晋阳明玘和尚以多年工夫刻印出版《华严经》，以新经千部施人。承安二年（1197年）章宗为六个月的儿子消疾祈福，刻印出版《无量寿经》上万件。泰和六年（1206年）玉田县大泉村忠武校尉通州税务都监李彪重刻出版《三昧华鲜经》。少林寺僧志明刻印出版《禅苑蒙求》。宜州厅峪道院藏的《辽藏》，金初被火为灾，皇统八年（1148年），郡人马祐与颜寿集千人立为一社，“募钱易经，鸠工构藏，随其卷帙，贮以柜匣”。贞元初年（1153年）善昶和尚在宝坻大觉寺“建内经一藏，漆函金饰，工制瑰玮”[1]。这些都是金人雕印补刊佛经的真实记录。

【1】《金史纪事本末》卷二三，金张瓒：《大觉寺碑记》。

刘伟毅先生1979年在《山西图书馆通讯》第7号上发表题为《我省新发现宋辽金刻书籍》的文章，文章说：“另一种是阜昌八年（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醴州（今陕西乾县）刻印出版的《成唯是论了义灯钞科文》卷中一卷，卷轴装，经尾刻有‘阜昌丁巳醴州乾明院比丘道溥愿心劝缘校勘重雕记’”，颇为引人注目。按阜昌为刘豫伪齐所用年号。刘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今属河

北）人。元符进士。北宋末年历任殿中侍御史，河北提刑等职。金兵南下则弃职潜逃。建炎二年（1128年）知济南府，杀抗金将领关胜，自己投降金人。建炎四年（1130年）被金册封为齐帝，建元阜昌，建都大名，后迁都汴梁。这是金的傀儡政权，用以统治汉人，抵抗南兵。绍兴七年岳飞与之战，岳以反奸计，促使金人废弃之。阜昌年号前后行用8个年头。《成唯是论了义灯钞科文》就出版在伪齐末年，显得极为少见。

但终金之世，朝廷似乎始终没有开雕《大藏经》，这也许与金朝皇帝于佛教“宜申约束”的思想不无关系。然民间信佛积习日深，朝廷不做的事，却由民间募化集资完成了，这就是迄今仍然传世的《赵城金藏》的雕印出版。

《赵城金藏》因长期收藏在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而得名，其实它就叫《金藏》。《赵城金藏》之开雕，是由潞州崔进之女崔法珍十三岁以断臂之苦行，先后带动五十人断臂，募化众缘，共同做成的大功德。她的虔诚与苦行，感动了河东南路也就是今天山西晋南地区的善男信女，使得这一地区的僧俗有钱的捐钱，无钱的捐献梨树、布匹，有的甚至捐献自己的驴骡。集资之后，大约从皇统九年（1149年）起，至大定十三年（1173年）止，前后历时24年才告完成。《大藏》由晋南解州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主持。天宁寺，在解州西20里中条山北麓，为唐宋古刹，至金不废。金代唯河东南路之平阳一带文物称盛，而解州地近平阳，就近利用平阳技术娴熟的刻工和当地盛产的纸张，乃是情理中的自然之事。

《金藏》依《千字文》编帙，起自“天”字，止于“几”字，凡782帙。“几”字帙收有《万善同归集》，这表示功德已经圆满之意，说明《赵城金藏》于大定时已经刻完。综计《金藏》应有7 182卷，今存4 800多卷。《赵城金藏》的开雕，以北宋初年在四川雕印的《开宝藏》为底本。《开宝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大藏经》，后来传入契丹和高丽，故朝鲜刻《高丽藏》也是以《开宝藏》为蓝本。后世《开宝藏》绝大部分失传，

故研究《开宝藏》者多凭借《高丽藏》。《赵城金藏》亦以《开宝藏》为蓝本，且传世尚有近五千卷，这就为对《开宝藏》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

现存《赵城金藏》4 800余卷，几乎全部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黄卷木轴，麻纸印造，卷首多有佛说法图扉画，状似收藏此经之赵城广胜上寺后殿之造像，因知其并非原经所有，而是广胜寺和尚装潢此经时刊印附加上去的。藏经版式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翻译过来的经、律、论、赞，版心高约22厘米，宽约47厘米，每纸23行，行14字。纸首加注某经及卷第、帙第和《千字文》编号。另一类是入藏著述，则版心较高较宽，每纸自22~30行，每行自15~27字不等，以示与译籍为别。间有经折式及书册线装式装帧者，盖因入藏著述皆由单行而收入大藏，遂版式不一。当然，《赵城金藏》经版于元时曾运往燕京弘法寺，又曾补刊付印过。明代也曾补过板。总之，此经历八百载星霜，遭日本侵夺及内战劫难，迄今虽不成完帙，然过半尚存，独具特点。故《中华大藏经》选此为底本，校以传世他经，由中华书局重行出版，实为发潜德之幽光，传佛门之盛事，亦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之泱泱大观者。（图52）《金藏》的出版，虽是民间僧俗的募刻

图52
金皇统九年至大定十三年山西解州天宁寺刻《金藏》本《摄大乘论释》

本，但工程浩大，是金代出版史上光辉的篇章，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光辉的一页。

金代除雕印佛教单经大藏外，对道教也很崇信，于道教典籍的刊印出版也很积极。这是与契丹、西夏所不同的地方。道教自从王喆创立全真教之后，谭处端、马铨、丘处机、刘处玄等到处宣扬教义，失业的流民入教的也很多。因为一入道观，非但可以解决衣食，逃避兵役和捐税，还可随时还俗。这比佛教的清规戒律要宽松得多，故教徒发展极快，势力日强，影响日深。道士道姑既众，宣传道教教义的道教典籍自然也就刊布日广。如谭处端的《水云集》，在百年之内竟刻印出版4次，流布非常普遍。至于道书的刊印，则更是空前绝后，雄视百代。据《鹿邑县志》记载，早在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以前，田子虚、韩元英在老子故乡亳县创修太清宫之太极殿时，便备"转轮大藏，仍印经以实之"。当然，这可能是根据宋代汴京旧版刷印的，未必是新雕的版片。中都（今北京）大天长观遭回禄之余，世宗出内府公帑巨万重加修葺。又以该观旧贮藏经尚不完备，故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下诏，以南京（今开封）《道藏》经板调往天长观。观中住持道士孙明道还指派道士到处收采遗经。道士赵道真负责向各方募化板材，鸠工镂板，不到两年，就已竣事。凡得遗经1 074卷，补版21 800块有奇，积经83 198卷。并造了35间房子，140个板架存贮经版。总共这部《道藏》为6 455卷，分为602帙，定名为《大金玄都宝藏》。所谓南京《道藏》版，指的当是北宋时从福建运往汴京的《飞天法藏》，又称政和《万寿道藏》的经版。汴京于金时称为南京，故有"南京道藏经板"之谓。孙明道就是根据这套道藏的版片加以增补而成就《玄都宝藏》。明昌元年（1190年）印经一藏；泰和七年（1207年），章宗元妃印施道经二藏，一奉栖霞太虚观，一送圣水玉虚观。这些都是《玄都宝藏》本的道藏。此藏与蒙古乃马真后时宋德方在平阳玄都观所刻印出版之《玄都宝藏》，井水不犯河水，完全是两回事。享国仅有120年的金代，道教是空前的发展，道书在金代也是广泛镌印

出版的。

前边我们对契丹族建立的辽，党项羌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女真族建立的金的刻书出版概况，做了个大体的考述。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在我国三北地区，幅员辽阔，横亘万里。从10世纪上半叶，到13世纪上半叶，前后300年的时间里，他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演出过威武雄壮的活剧。其千秋功罪，是史家笔下评论的内容，这里无需侈论。但就他们的刻书出版事业而论，他们是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的。可惜他们刻印出版的书，能流传至今者太少了。否则中国文化宝库，将会更加辉煌灿烂。

## 第三节　金代出版图籍的装帧艺术

据元代陆友的《墨史》记载，金代有杨文秀者，以善造良墨闻名。其法不用松烟，而用灯煤。这大概跟山西多煤有关，就地取材，刻意拓宽制墨材料，以应时用。《金史·地理志下》太原府下的注文，谓太原有造墨场，显然是官置，以供印刷交钞盐引和大量图籍。《金史·百官志二》记载贞祐二年（1214年）复置抄纸坊，设都监二员。抄纸坊使，从八品；副使正九品；判从九品。抄纸坊遍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子）、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宁城县西大名城）、京西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东平、大名、益都、咸平、真定、河间、平阳、太原、京兆（今陕西西安）、平凉（今甘肃）、广宁（今辽宁北镇县）等府，及瑞、蔚、平、青、通、顺、蓟等州。可见在金时东北、华北、西北各地都有造纸业。且北方麻科植物多，金时仍以造麻纸为主。迄今山、陕仍有麻纸生产，盖为传统之余绪。金时北方有如此优越的纸墨生产条件，为金代刻印出版纸墨精良的典籍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前边说过了，金人破汴时，不仅对公藏私弆的典籍及典籍版片，车载斗量地席卷而去，而且对各种工匠，其中包括刻字匠、刷印匠、装裱匠，也掳以北还。这些工人，特别是汴京的刻印工

人，他们训练有素，技艺高超。人虽为金人北掳，但到北方后却让他们旧业重操，继续进行刻板刷印工作。这就决定了金代刻书的版式、插图、装帧，均带有浓重的宋刻风格，品位也与宋刻方轨并驾。惜金刻图籍传世者极罕，科学概括它的装帧艺术尚有文献不足征之憾。

## 一、金代刻书的版式风格

存世的4 800多卷的《赵城金藏》，约开雕于金皇统九年(1149年)，相当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竣工蒇事于金大定十三年（1173年），相当于南宋孝宗乾道九年，7 000余卷，通为麻纸印造，卷轴装。全藏分为两种版式，属于翻译过来的经、律、论、赞为一种版式，每版框高22厘米，23行，行14字，上下单边，无界行；属于中土的入藏著述，每版框高25.2厘米，26行，行25~26字不等，上下单边，无界行。如隋释达摩笈多译的《摄大乘论释》，施主是为先祖父母存殁咸安。愿文称："美原县任张村惠志、惠保、惠直、惠彦，共舍净财，雕《论》一卷，各为答报先祖父母存殁咸安，然愿四恩三有，法界含生，俱沾此书。正隆三年十月日记。"美原即今山西的富平县，故城在今美原堡。前边说过《金藏》是崔法珍以断臂苦行募资镌刻而成的，然每经究由谁发愿出资，便镌刻愿主姓名，崔法珍决不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该经字体浑朴厚重，严谨肃穆，颇具唐人写经神韵，颜体风格犹存。镌刻刀法娴熟稳健，一丝不苟。本土佛学著作则又是另一种版式。

世俗著作如平水刻《南丰曾子固先生集》，框高15.2厘米，广10.5厘米。每半版15行，行25字。白口，左右双边，有界行。有版口，单鱼尾。鱼尾上镌本版字数，鱼尾下镌简化了的书名或类名。此本版式与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荣六郎在杭州所刻《抱朴子》相关。荣六郎北宋时在东京大相国寺开书籍铺，金人破汴时迁往临安中瓦南街，继续从事刻书出版事业。《抱朴子内篇》便是依照旧日汴京旧本翻雕，故仍带北宋版式风格。《南丰曾子

固先生集》所据祖本盖亦来自北宋旧椠，故版式风格仍有北宋韵味。

平水刻宋吕惠卿《壬辰重改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框高16.1厘米，广11厘米。每半版12行，行23~27字不等。注文双行，行28~30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有界行。单鱼尾。其版式仍是北宋风格。黑水城曾出过北宋本此书残帙，一看便知源流。其字体端庄厚重，风韵似颜。《刘知远》诸宫调，框高10.3厘米，广7.8厘米。每半版12行，行20字，白口，左右双边，有界行。出自张掖黑水城，当年为柯兹洛夫为首的探险队所得，携往俄国。上世纪50年代苏联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归还中国。为金时平水坊刻本。原书十二卷，今存五卷，凡42页。诸宫调是宋、金、元三朝民间的说唱文学，艺人边说边唱，颇受群众欢迎。其内容演五代后汉刘知远发迹，其妻李三娘磨房产子，苦难深重。后来南戏《白兔记》亦演此事。诸宫调《刘知远》与董解元《西厢记》齐名，是传世诸宫调两种最古的脚本。此书版口为双顺鱼尾，而这种鱼尾符号又用来标示“商调”、“回戈乐”、“尾”、“正宫”、“应天长缠令”等题调名称。又镌有句读圆圈“○”。这是我们见到的较早的文学书籍的版式。

平水刻《黄帝内经素问》框高18.3厘米，广13厘米。每半版13行，行约26字。注文双行，行30字。白口，四周双边，有界行。中医金元四大家，金占其三，表明金对医人治病十分重视，故出版印制医经、药书也较著名。此为医经之首。版式取白口，四周双边，足见其精雕细镂。

平水刻《重编补添分门字苑撮要》，框高18.3厘米，广13厘米。每半版13行，行约20字。注文双行，行约32字。白口，左右双边。《新修参音引证群籍玉篇》，框高23.2厘米，广15.5厘米。每半版14行，行21字。注文双行，行38字。白口，四周双边。金崇庆元年（1212年）宁晋川荆珍刻印《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框高20.5厘米，广13.8厘米。每半版13行，注文双行，行约41字。白口，左右双边。这三部字、韵书虽不是一地所刻，但版式有相

类之处。都在行文中用鱼尾或墨围白字标示开头或字头。这是字、韵书的特点。

金魏道明曾为《萧闲老人明秀集》作注，由平水刻印出版。萧闲老人指的是蔡松年。松年字伯坚，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金时曾官至尚书右丞相，寓南京汴梁，其第曰萧闲堂，因自号萧闲老人。元好问选其诗入《中州集》，说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此本便是蔡氏乐府诗集，并由魏道明作注。该书版式框高20.1厘米，广12.5厘米。每半版12行，行23字。白口，左右双边。有界行。双顺鱼尾。字体兼颜、柳风韵。

《天禄琳琅书目》金版史部著录金刻《贞观政要》十卷，为大定五年（1169年）南京路都转运使"梁公出公府之资，命工镂板"。《金史·地理志上》谓南京路金初称汴京，贞元元年(1153年）改称南京路，领8郡108县98镇。南以淮河中流为界，辖整个河南及安徽一部分。既称南京路都转运使出公帑镂板，谅刻板之地当不出南京路辖区，最大的可能就在开封。《天禄琳琅书目》此书叙录称"此本字宗颜体，刻印精良，与宋版之佳者无异。藏书家知崇宋本，而金版多未之及，盖缘流传实少，耳目罕经，似此吉光片羽，真为希世之宝也"。这里引用这几句话，因其可以概括金刻图籍的版式特点：一是字宗颜体，一是刻印精良，一是与宋版无异。上举之例，确然如此。

金人虽在天兴三年（1234年）就失去了国祚，蒙古人掌握了北方政权，建元立号，但究未统一全国。金人旧有的商业、手工业、刻书出版业，几乎都在照常运转，所以元代立国前，燕京、平阳所刻的书，与金版图籍在版式风格上并无本质差别。如道家大藏于蒙古太宗九年（1237年）开设雕版局于平阳玄都观，祖本是管州所藏《金藏》。至乃马真后三年（1244年）全藏版刻告竣，历时8年，凡7 800余卷，名《玄都宝藏》。其传世之《云笈七签》，每版框高21.3厘米，广56.2厘米，30行，行17字，四周单边。其版式风格颇类《赵城金藏》。他如蒙古定宗二年（1247年）淅川郑氏家塾刻印出版的《淅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集注》、定宗四

年(1249年）平阳张存惠晦明轩刻印出版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宪宗三年（1253年）平阳张宅晦明轩刻印出版的《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六年（1256年）京兆府龙兴院刻印出版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北京赵衍刻印出版的《歌诗编》等，都和金时图籍版式相类。特别是北京赵衍开版的唐李贺《歌诗编》，框高19厘米，广11.8厘米。每半版10行，行20字。白口，左右双边。刻字之隽秀，刀法之流畅，刷印之精良，可与任何一种宋版书相媲美。其版口形同空行，无鱼尾等任何镌饰，上镌一字，中镌贺×，下镌叶码，最下镌刊工姓氏，看去简洁大方。此为北京地区早期刻书出版传世之最优秀者之一。

纵观金代刻书出版的版式，大致与宋代刻书趋同，这是强势文化超越政治壁垒而产生的强大影响。辽与金，先后与两宋南北对立并峙，政治上水火不容，但文化上却逃不脱尊孔读经的儒家范式，刻书出版也跳不出中华文化底定的模式。我们无意模糊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个性，但历史个性却在相互渗透相互磨合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 二、金代刻书的插图版画

金刻图籍由于传世者少，对于插图形式、构图样式、镌印水平，向无专篇专著研讨者。传世4 000多卷的《赵城金藏》，由于采取传统的卷轴装，所以其插图形式仍是卷首扉插。且《赵城金藏》的卷首扉画，并非原解州天宁寺开雕经文时就已镌印，而是入藏赵城县广胜寺之后补雕补印而接裱上去的。其佛说法图，构图严谨而简洁。释迦牟尼佛端坐须弥座上，位置突出，背绕佛光，胸藏万法，怡然传教。两旁僧众神态各异，闭目聆听。天王手持金刚杵侍立两边。长老须菩提正面居中合十恭听。整个构图与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玠为给父母祈福而雕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首扉画相似，但较之简练。线描豪放，刀刻雄浑，一看便知是北方版画风格。其他如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平阳书轩陈氏刻印出版的《铜人腧血针灸图经》五卷，明昌三年

（1193年）平阳地区刻印出版的《新刊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十五卷，泰和四年（1204年）平阳晦明轩张氏刻印出版的《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贞祐二年（1214年）嵩州福昌孙夏氏书籍铺刻印出版的《经史证类大全本草》等，都有精美的插图。

前边我们在阐述金代出版图籍概况时，曾说金代刻过《祖庭广记》和《本草》。惜金刻的这两种书均未传下来，可是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年）刻印出版的《孔氏祖庭广记》、定宗四年（1249年）平阳张存惠晦明轩刻印出版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却流传了下来。透过这两种书，可以使我们看到金刻插图的影子。《孔氏祖庭广记》是孔元措的作品。孔元措字梦得，孔子五十一代孙。金明昌二年（1191年），袭其父孔揔衍圣公爵，补授文林郎。三年，以衍圣公视四品秩，特旨散官超授中议大夫。承安二年（1297年）兼曲阜令。贞祐三年（1215年）随朝任职事。天兴二年（1233年），累迁光禄大夫、太常卿。居住在金之南京，即今开封。蒙古骑兵攻破开封，让他回曲阜，令袭衍圣公，付以林庙地，主持祭祀。《祖庭广记》乃是他在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年）完成的著作，并在这一年刻梓出版于开封。待到蒙古人根据耶律楚材建议，奉圣旨将他请回曲阜，继袭衍圣公时，由于《祖庭广记》的版片太重，未能带回曲阜，故稍事增补，依原书版式于蒙古乃马真后元年重刻于曲阜祖庭。此书每图占半版，版式为左右双边，显然是随书相插。如孔子乘辂出游图、尼山图，均是这种版式。构图严谨，车、马、人物布置有绪。花纹、衣褶、人物形象、骏马神态，都能传神。线描、刀法都很流畅（图53）。《备用本草》的海盐图，大海的波涛、取水的长勺、肩挑的树枝、填柴入灶的叉铲、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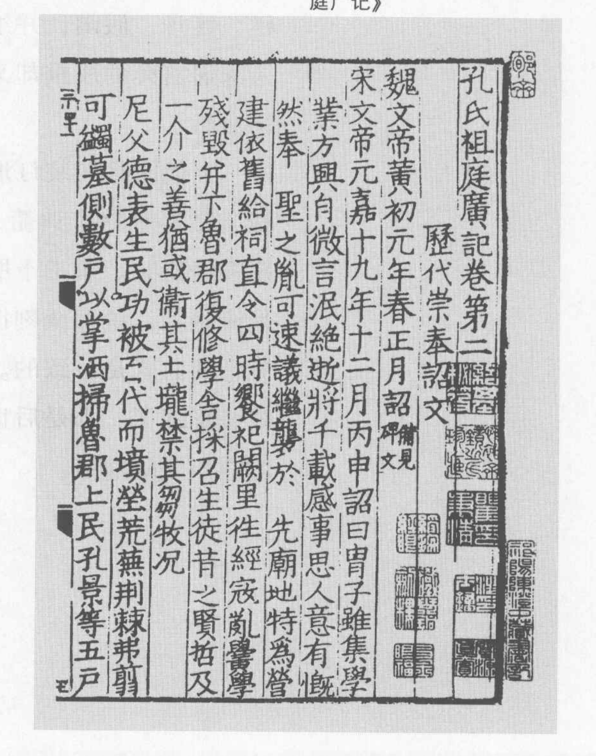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二
歷代崇奉詔文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詔 備見碑文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雖集學
業方興自微言泯絶逝將千載感事思人意有慨
然奉 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 先廟地特為營
建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黌學
殘毀并下魯郡復修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
一介之善猶或衞其丘壠禁其芻牧況
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翦
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

图53
蒙古乃马真后元年刻本《祖庭广记》

盐的锅灶，以及各种工种、各种神态的人物形象，都刻得精细逼真，似不亚于后世的熬波图。这两种书虽然都出版在蒙古时期，透过这两种书的插图版画，可以推想金代刻印此书时插图的风貌状况，当也是上乘之作。

当然，最能反映金代版画特点和水平的，还要算是黑水出土至今仍藏在俄国圣彼得堡的平阳姬氏所刻《四美图》及平阳徐氏所刻《关羽图像》。《四美图》描绘的是我国历史上四位不同时代的美人：一位是汉成帝时宫中女官婕妤、后来立为皇后、体态轻盈、能歌善舞的赵飞燕；一位是怀抱琵琶出塞和亲的王昭君；一位是才华出众、继班固完成《汉书》写作的班昭；一位是晋代石崇的爱妾绿珠。构图富于变化，人物形象生动自然。赵飞燕、绿珠居前，王昭君、班昭在后。绿珠面左朝正，其余三人均面右朝正。但衣裙向左飘斜，因而画面的视线既集中而仿佛都在微风中款步徐前，故画面又显得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跃然纸上，颇有呼之欲出的效果。人物的背后又布置有玉阶、雕栏、牡丹、假山，并细绘花边，饰以鸾凤，因而画面又显示贵夫人深居宫苑的庄重却又兴致萧然的气氛。线刻精致入微，墨印协调自然。

金代图籍的装订形式，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并行。《赵城金藏》等释家典籍，多取卷轴装。《玄都宝藏》等道家典籍，则取经折装。宋王十朋的《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之金刻本，则是蝴蝶装，说明金刻世俗四部书盖多取蝴蝶装式。这和当时宋代流行的装式是一致的。当然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金版图籍都已是线装形式了，那是后世改造蝶装而成的，并非原来的装式。原来均应当是蝴蝶装。

# 第十三章　元代出版事业继兴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元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

元朝，是起自朔漠的蒙古族贵族靠金戈铁马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起初，蒙古族只谙弓马，未遑文事。但随着蒙古族政权在全国的逐步确立，蒙古族贵族统治者也逐渐认识到夺取政权靠武力，稳固政权却还要靠文治。因此，元朝自“太祖、太宗即知贵汉人，延儒生，讲求立国之道”[1]。此后，元朝历代统治者对文治的设想更加系统化，先后采取了招贤纳隐、尊经崇儒、兴学立教、科贡并举、保护工匠等一系列文治措施，用来巩固他们以强弓硬弩打下的江山。

尊经崇儒。这是自汉武帝以来历代封建帝王所奉行的思想政治路线。元朝统治者也毫不例外。

早在蒙古太宗四年（1232年），大将速不台挥师南下，围攻汴梁。在刀光剑影、矢石横飞的战争中，太宗却能倾听耶律楚材的建议，“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并“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且“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2]。蒙古族统治者尊经崇儒，借以治国安邦的策略思想完全表露了出来。太宗九年（1237年），耶律楚材又建言：

【1】[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序》。

【2】《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太宗听后，表示如果真是这样，则可使这些儒臣为官。楚材“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1]。太宗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所采取的这一措施，实际上把尊经崇儒的思想付诸实施，推广到直接选用儒士为官。这不但在主观上起到了笼络知识分子，为自己选拔统治人才的作用，客观上也起到了提倡社会文化的效果。同时还为他以后的历朝树立了尊儒的榜样。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登上皇位。随着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发展，他越发重视文治。他在登基诏中明确指出：“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2]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忽必烈总结他以前“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历史经验，是因为“时有先后，事有缓急”，一时有一时的重点。透露出从他起，该是大兴文治的时候了。其实这并不是忽必烈的高明，只不过是到了他这个时候，全国政权似已唾手可得，如何用文治的办法巩固这个政权，比他祖宗时期更加迫在眉睫罢了。所以在他继承皇位后，进一步窥视中原的过程中，便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文治措施。

【1】《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2】《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

至元元年（1264年）二月，世祖“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3]。加紧总结历史经验，寻求立国之道，宣传和运用儒家思想。

【3】《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

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将经籍所由平阳迁至京师，改名宏文院，抓紧经、史书籍的纂集。

至元九年（1272年），置秘书监，命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渡江南下，攻破临安。世祖“命焦友直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伯颜入临安，遣郎中孟祺籍宋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图书，由海道舟运至大都”。并接受许衡的建议：“遣使取杭州在官书籍板，及江西诸郡书板，

立兴文署以掌之。"[1]

[1] [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序》。

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元世祖尊经崇儒的文治思想更加明朗，对历代图籍的重视也更加明显。其目的固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统治，但在客观上，却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兴学立教。是元朝统治者尊经崇儒，文以致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实施。元朝统治者对兴学立教极为重视。其原因完全是为了培养人才，维护自己的统治。在他们看来，"学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2]。"兴举学校，乃王政之所先"；"学校为之设，所以明人伦养贤，为政之要莫先于此"；"学校为治之本，风化之源……务要作成人才，以备擢用"；"农桑、学校为政之本。盖务家所以厚民，劝学所以兴化"；"学校之设本以作成人材，仰各处教官正官……主领敦劝，严加训诲，务要成材，以备擢用"[3]。所有这些，说明元朝统治者兴学立教的根本目的，也完全是出于治国兴邦的政治需要。

[2] [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

[3]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二《兴学校》。

然而，也正因为政治上需要，所以"元世学校之盛，远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4]。早在至元初年，元世祖忽必烈就设置国子监，以儒学大师许衡为集贤馆大学士、国子祭酒，教养国子与蒙古大姓四怯薛人员。选拔七品以上朝官子孙，并许随朝三品以上官员推选凡民之俊秀者入学，作为陪堂伴读。至元十四年（1277年）又置蒙古国子监，立蒙古国子学，选随朝百官、怯薛、蒙古及汉人官员之家子弟入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立国子学，置博士、教官掌教生徒。并规定在学生员二百人，伴读二十人。可见元王朝十分重视教育。

[4] [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

与此同时，元王朝还十分注意地方各级儒学的建置和生徒的培养。据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大司农司的统计，元朝立国不到20年，"诸路学校凡二万一百六十六所，储义粮九万五百三十五石，植桑枣杂果诸树二千三百九万四千六百七十二株"[5]。足见元朝学校之盛之富。元王朝除在全国各路、府、州、县普遍设立儒学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命在"其他先儒过化之地，

[5]《元史》卷一四《世祖本纪十一》。

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1]，以作为正规学校的补充。并规定各路、府及上中州儒学，由朝廷任命儒师，称为教授；各路、府、州、县儒学及书院，由礼部、行省或宣慰司任命儒师，称为学正、山长、学录或教谕。这样由上到下，在全国就形成了有系统的教育网点，使封建社会的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

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学校有足够的经费，供师生廪饩和其他开支，元朝廷还规定各学校都有学田，所收全部由学校支配。并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命中书省议行贡举之法时，又令“其无学田去处，量拨荒闲田土，给赡生徒，所司常与存恤”[2]。可见元朝对于学田的量拨，考虑是很周详的。这从至元二十三年大司农司统计各路儒学所储义粮的数字和种植树木的株数中亦可得到证明。而且为了确保学田不被官府以各种借口所侵占，于至元二十三年，朝廷还改变了“江南学田昔皆隶官”的旧例，下令学田一律交给所属学校，自行管理。并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诸赡学田土，学官职吏，或卖熟为荒，减额收租，或受财纵令豪右占佃，陷没兼并，及巧名冒支者，提调官究之……诸各处学校为讲习作养之地，有司辄侵借其钱粮者，禁之。”[3] 这样又从法律上保证了学校办学所必要的经费，以便真正达到兴学立教，培养人材，维护其封建统治的目的。元代这样大兴学校，并给以足够的学田作为办学经费，不但大大活跃了社会文化气氛，也为兴学校、倡出版，提供了市场条件和经济基础。

[2]《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二《兴学校》。

[3]《元史》卷一〇三《刑法志二》。

科举、贡举。科举、贡举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统治人材的主要途径和手段。但自唐代以来，选士的主要渠道是通过科举。而且各个封建王朝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条件、历史背景以及思想崇尚，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是不完全一样的。但像元朝，科举、贡举两者交替使用或同时并举的现象，在封建社会是比较特殊，比较突出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由文化比较落后的蒙古族入主全国政权所形成的社会和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所决定的。元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实行其野蛮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曾把

全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这种阶级等级制度决定了最高贵的是蒙古族，文化却很落后；最低下的汉人和南人，文化教养却比较高深。如果只采取科举考试的办法，学优则仕，那么元朝的各级政权，就要重新落在汉人手里。这在当时身为统治阶级的蒙古族看来，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然而，对于素称文明礼仪之邦的中原和江南，只用蒙古族原有的落后、野蛮的种族压迫实行统治，又达不到目的，因而又不得不"贵汉人，延儒生"，学习汉人的立国之道。这种矛盾的心理和社会现象，反映在选士方法上，就是科举、贡举交替使用，或科举、贡举同时并用。

如前所述，早在蒙古太宗四年，就曾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实行科举考试，得东平杨英等4 030人，皆一时名士。后来"廷议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至元初年，丞相和礼霍孙与留梦炎又建言："'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帝曰：'将若之何？'对曰：'惟贡举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帝可其奏。继而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会和礼霍孙罢，事遂止。"[1] 科举、贡举之争，于此端倪可见。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秋七月"诏申饬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举之廉访司，每道岁贡二人，省、台立法考试，中程者用之。所贡不公，罪其举者"[2]。说明仍然采用的是贡举方法。

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由中书省再次提出实行科举的建议，并谓"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十一月仁宗才下诏"……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举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3]，正式实行科举考试法。然而这个科举仍不过是经过改造的科举，即举人仍由本贯官司推举，而不是通过乡试考取。只是到京师会试，才采取考试的办法。所以实际上这仍不过是科贡参半的办法。元朝的科举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形式，原因还要到阶级关系中去寻找。举人仍由有司推举，实际上还是为给蒙古族人留下特权方便之门。因为元朝各级官吏的主角，也

【1】［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

【2】［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

【3】［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

就是一把手，都是蒙古人充任，举人由他们来推选，其徇私滥举，民族和阶级偏向昭然若揭。

到了元惠宗后至元初年，朝廷又废止科举法，复行贡举法，于是又引起了参政许有壬与丞相伯颜的一场激烈争论。直到后至元六年（1340年）十二月，由翰林学士承旨巙巙再次建言："古昔取人才以济世用必由科举，何可废也！"被皇帝采纳。"复诏行之。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一十八名"[1]，才算正式实行了科举法。

[1][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

然而，科举也罢，贡举也罢，只不过在选士方法上略有不同，目的都还是要选择儒吏兼通的人，来充当各级统治人材。在封建社会，这种科道仕途，对于一般人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因此，它在促使人读书，活跃社会文化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

招贤纳隐。招贤纳隐是封建帝王笼络知识分子，维护自己统治的常用手法。特别是每当朝代更替之初，旧一代知识分子常常以隐遁山林，躬耕垅亩，不求闻达的方式，表示对故国的怀念和对新朝的观望。尤其是新朝代由少数民族入主，旧一代知识分子在正统思想支配下，常常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所谓"高风亮节"，隐而不仕。这种现象元初和清初反映得就更为突出。

可是任何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要想使自己在旧的废墟上站稳脚跟，除了用武装保卫和政治高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外，还必须采取一系列怀柔的措施，用以笼络人心，收买帮办，消弭祸端。元朝建国之后，除通过兴学立教、贡举和科举考试等渠道，为自己选拔统治人才外，还采取举荐贤良，招徕隐士的手段，进一步加强其组织建设。

至元十三年（1276年）南宋的行在临安刚刚归附，世祖即下诏："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僧、道、儒、医、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实以闻。"并谕："该亡宋归附有功官员，并才德可用之士，穷居无力，不能自达者，所在官司，开具实迹，行移按察司体覆相同，申台呈省，以凭

录用。"[1]

延祐七年（1320年），元仁宗再次下诏："比岁设立科举，以取人材，尚虑高尚之士，晦迹丘园，无从可致。各处其有隐居行义，才德高迈，深明治道，不求闻达者，所在长官，具姓名行实，牒报本道廉访司复查相同，申台呈省，闻奏录用。"[2]

所有这些，充分表露了元朝统治者举贤招隐的实际动机。他们的主观愿望完全是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及前代遗民，收买帮办，维护自己统治。但于客观上，元朝政府这种抬高知识分子地位的做法，实际上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保护百工。百工即手工业者，是元朝统治者推行的一项很重要的政策。元朝统治者要想支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满足蒙古族贵族的生活享受，稳定社会情绪，光靠他们本民族原有落后的百工技术，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才有所谓保护工匠的政策。

蒙古族最初只有一些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专业性的"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到铁木真西征时，俘获了一批工匠，运用这批工匠，才逐步建立起一些制造兵器、军火及其他手工艺品的专门性质的手工业。军火、兵器是蒙古族贵族在征服战争和阶级镇压中所必须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一些高级消费品和奢侈品，则更是蒙古族贵族所喜爱的。因此，他们在灭金亡宋的战争中，逐步认识到各族手工业劳动者的重要性。"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3]。所以太宗四年围攻汴梁时，由于"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大将速不台便遣人请示太宗："城下之日，宜屠之。"但由于耶律楚材以城中"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为理由，谏阻太宗屠城之诺，太宗便制止了这次大屠杀，结果得到"避兵居汴者"147万人，其中就有很多是"奇巧之工"。此后便成为定例，各地屠城，"唯匠得免"。并于战争中还特别注意俘获匠户。1236年灭金之后，刮中原民匠72万户；1279年灭宋之后，又刮籍人匠42万户；1284年再次刮籍江南诸路匠户。而在这种"唯匠得免"，刮籍匠户的过程中，一些自宋朝就以刻书出版

【1】《大元圣政国朝典》卷二《举贤才》。

【2】《大元圣政国朝典》卷二《举贤才》。

【3】《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为业的书坊，如余氏勤有堂、叶氏广勤堂等保存了下来，并在元代继续发展。一些以刻书出版为职业的工匠也幸存了下来，继续从事刻书出版事业。这就构成了元朝刻书的人才和技术基础。

所以有元一代，虽然在他们所推行的野蛮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某些方面，出现了某些倒退，但由于他们要稳固自己的统治，希图长治久安，又不得不照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采取尊经崇儒、兴学立教、科贡选士、举贤招隐以及保护工匠的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推行，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都从不同的角度起到了提高知识分子地位，提倡社会文化的作用。这就给元代刻书出版事业的继兴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加之保护工匠政策的实施，又使宋、金的刻书工匠幸存下来，使刻书技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有了必要的技术力量和基础。因此，元代在刻书出版事业上，不但没有出现大的倒退，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前进和发展。

## 第二节　元代出版事业继兴的基本情况

蒙古族贵族享有全国政权，立国号为元，实际始于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至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退出大都（今北京），让权于明，充其量不过97年，国祚不足宋的三分之一。即便是从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称帝的那一年（1206年）算起，也不过162年，况且也不能这么算。然而国祚虽短，可版图疆域最大。其东、南到海，西至今新疆，西南包括西藏、云南，北面包括西伯利亚大部，东北到鄂霍次克海，真可谓“肇造区宇，奄有四方”[1]。“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2]。当时一个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要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实际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因此，它必须得向先进的文化和治国经验学习。故元世祖忽必烈一即皇帝位，便在登基诏书中说：“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

【1】《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

【2】《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

朝所能兼备也。……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1] 这实际上是向天下人做未遑修文的检讨，当然也就意味着自此诏书下发之后，朝廷要实行文治政策了。具体都施行了什么文治政策，前一节已作了梗概性的交待。也正是那些文治政策的陆续推行，才有了元代出版业继兴的可能。

[1]《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

蒙古人起自朔漠，是在陆续攻灭西辽、西夏、金、宋、大理并在吐蕃建立行政机构的过程中立国的。战争中虽对文化事业也有不少破坏，但各地旧有的文化事业也有不少保存了下来，有的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西夏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出版事业，蒙古族的金戈铁马攻灭西夏之后，反为西夏人用河西字在宋代刻书出版事业最发达最精到的杭州地区刊印他们需要的典籍。金时已经形成的山西平阳地区的刻书出版事业，金亡后不但保存了下来，而且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地区名副其实的出版中心，并影响到现在河北省的一些地方，乃至于整个腹里地区。辽时就是刻书出版中心的燕京析津地区，金时建都于此，元时则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大都，刻书出版业自然继续发展。而南宋旧有辖区内的两浙、八闽、江西、江苏、徽州、荆湖、广南等地区的刻书出版业，元兵进军过程中没受多大损失，待元朝立国之后，多数旧业重操，继续发展。这样，元代出版业从地域分布上讲，可以说是合宋、辽、夏、金之所有，遍布全国，完全是大一统的格局。

“世祖即位，始大新制作，乃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官制。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访司；有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食有常禄，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备”[2]。可见元代的行政机构设置是很健全很严密的。它的中枢机构是中书省，总揽全国政务。在全国又设腹里（直隶）、河南、江浙、湖广、陕西、辽阳、甘肃、岭北、云南等处11个行中书

[2]［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官制之定》。

省，也简称为行省。中国行省制的定型，便始于此。行中书省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上对中书省负责，下理各辖路、府、州、县之政务，承上管下，管理绩效较好。这就为朝廷对图书出版的管理提供了组织保证。“元时书籍，并由中书省牒下诸路刊行”[1]。“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2]。虽然这话未必全然可信，每部书的出版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重要书籍的编撰出版，有这么个管理程序则是可信的。因此，元代刻印出版的图籍，特别是官书、政书都是比较好的。

【1】《天禄琳琅书目·茶宴诗注》后补“栞编郑重牒文昌句注”。

【2】[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中华书局校点本,129页。

宋代刻书出版业发达且精到的地区在江浙，在江西。元时充分利用这些地区刻印技术的优长，将若干官修书的书稿下江浙、江西刊板印行。元代虽是少数民族入主全国政权，但对教育却特显重视。元朝全国分为185路，33府，359州，1 127个县，并特“设江南各路儒学提举司。……设提举儒学二人，统诸路、府、州、县学祭祀钱粮之事。……（世祖）二十八年（1291年）春正月，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3]。可以证明两宋时期教育就很发达的江南各路、府、州、县的儒学，入元后因受到重视而更加发展；而两宋已有的711所书院非但大多数得以保存和发展，且仅江西一省在元朝新建的书院就有94所，其中建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的就有49所，几乎每年都有4所书院诞生于洪都大地。这又为元代很多书下江南各路儒学和书院刻印出版提供了学术、经费和技术保证。

【3】[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

明初修《元史》匆忙成书，而未编艺文志，使一代藏书和一代著述难以稽考。元朝王士点、商企翁合撰之《秘书监志》十一卷，成书于元惠宗至正中，有元一代的史事基本没多少遗漏。该书卷五、卷六描述的都是秘书库的藏品事宜，卷五所记意义不大，卷六所记“至元十四年二月，裱褙匠焦庆安计料到裱褙书籍物色：书籍文册六千七百六十二册，裱褙绫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尺一寸。……至正二年五月，准监丞王奉议道关切，谓古之书库

亦各有目，画图亦各看题，所以谨贮藏而便披玩也。伏睹本监所藏，俱系金、宋流传及四方购纳古书名画，不为少矣，专以祗备御览也。然自至元迄今，库无定所，题目简秩宁无紊乱？若不预为，将经、史、子、集及历代画图随时分科，品类成号，傥时奉旨，庶乎供奉有伦，因得尽其职也。合无行下秘书库，依上编类成号，置簿缮写，诚为相应”[1]。正是在这位秘书监丞王奉议的建议下，秘书监派人清点缮成一部簿录式书目，计：“经一百二十一部，一千二十三册；史七十九部，一千七百二十四册；集五十七部，一千七百二十四册；道书三百三部，四百二册；医书一十四部，一百七十一册；方书八部，一百五十二册。先次送库书一十二部，四百七十八册：经六部，一百一十三册；史四部，七十五册；集二部，二百九十册。后次发下书一千一百五十四部，一万六百三十四册：经书二百四十四部，二千一百四十五册；史一百三十二部，一千八百四十三册；子一百二十二部，七百一十二册；集四百六十三部，五千九百三十四册；法帖四十二部，二百一十七册。续发下书六百四十二部，七千五百一十册：经一百六十六部，一千九百四十六册；史四十六部，一千二百七十册；子二十六部，七十三册；集一百二十部，二千五十三册；类书九十六部，九百三十一册；小学书六十八部，二百二十八册；志书三十三部，三百三十册；医书五十一部，四百六十一册；阴阳书一十五部，一百三十册；农书一十二部，三十七册；兵书五部，二十一册；释道书三部，二十二册；法帖一部，一十册。”[2] 总共经书537部，5 227册；史书261部，4 912册；子书148部，785册；集部书592部，10 001册；释道书306部，424册；医书73部，584册；法帖43部，227册；类书96部，931册；小学书68部，330册；志书33部，330册；阴阳书15部，130册；农书12部，37册；兵书5部，21册；凡2 189部，23 637册。这是秘书监为皇家收藏的库书，“俱系金、宋流传及四方购纳”者，可以反映出一代皇家藏书的基本情况。

至清代钱大昕，则以自身的学识和功力，撰《补元史艺文

【1】[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六《秘书库》。

【2】[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六《秘书库》。

志》，著录经部书804种，史部书477种，子部书763种，集部书1 098种，凡3 142种。这些书应当基本反映了元代著述及出版情况。宋代300多年，出书1万多种次；元代国祚不到它的三分之一，出书也不到它的三分之一，应该说出版情况是正常的，对于宋而言，呈现出继兴的状态。

# 第十四章　元代的编修机构、编修活动与私人撰述

## 第一节　元代的官方编修机构与编修活动

元代的官方编修机构，主要指元代中央所设的某些机构。有的是专职编修，有的是兼事编修，有的是常设，有的是临时，有的还兼事出版，这是封建社会机构设置及其职能综合性的共同特点，元代也不例外。

### 一、编修所与经籍所

早在蒙古太宗八年，即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的六月，蒙古人便在北方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这两个机构均属弘文馆系统的编修性质的机构。养士编修，先秦已开其端，迭经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逐渐成为定型的机构。至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始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626年）改名弘文馆。宋代因为要回避赵匡胤祖赵弘殷的名讳，改弘文馆为昭文馆，其职责没有太大的变化。金置弘文院，掌译经史。元人蒙古时期，虽金戈铁马，势力强大，但犹未定鼎中原，确立全国政权，中书令耶律楚材深悉文事之重要，便于太宗八年（1236年）建议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负责编译经史。至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年）二月，又敕令挑选儒士编修国史，详写经书。并起馆舍，给薪俸以赡之。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

烈已迁都燕京四年，但后距正式定国号还差四年，便诏改经籍所为宏文院。六年（1269年），徙平阳经籍所于京师，并入宏文院。这两个机构到底编纂过什么书，已无由详考。清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著录《元秘史》一部十五卷，无撰人姓氏。其纪年以鼠儿、兔儿、羊儿为纪，不用干支。内容仅记蒙古太祖、太宗两朝事迹，特为详备。这些特点，使我们推想也许为编修所时期的作品。无撰人姓氏，也许是机构奉敕编书无庸署名的缘故。鼠、兔、羊、猪等属性纪年，也恰是蒙古世祖忽必烈"中统"纪元以前的特点。仅记太祖、太宗两朝事，也当是编修所、经籍所、宏文院时期的职责。因此，推测《元秘史》也许就有可能是编修所、经籍所、宏文院时期编纂问世的书籍。蒙古史研究学者巴雅尔上世纪80年代曾撰《关于蒙古秘史的作者和译者》一文，考证该书作者很可能是在镇海右丞相总领下，由皇帝的左右史怯烈哥和薛彻兀儿完成，很有道理，但也仍是推测，尚不能当作定论。编修所与经籍所之成立，正是蒙古太宗接受耶律楚材建议开始重视文、史之始，与《元秘史》成书在时间上正相吻合，故说它是编修所的职务作品，也是一种推测。

## 二、秘书监

秘书监之设始于东汉，其职掌是典司图籍。晋设秘书寺，后称秘书省。唐代的秘书省还兼领太史局和著作局。宋代秘书省职掌扩大，"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1]。设官分职，负责纂修日历，掌集贤院、史院、昭文馆、秘阁图籍及校雠典籍等事。辽、西夏、金又都改称秘书监。元代秘书监之设，大体承三代之制。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设秘书监，秩从三品。大德九年（1305年）升为正三品。其监丞皆用大臣奏荐，选世家名臣子弟为之。"秘府奉图史，无倥偬之务，简牍希阔，公会有期；郎吏陟降，堂序进退，揖诸礼容甚都"。"视它职为华要"[2]。其职事仍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又兼领天文历数的部分职责。至元十八年的十一月，秘书监、太史院与司天台曾

【1】《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

【2】[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三《公移》。

合并为一，由大司徒领翰林国史集贤院、会同馆和秘书监。但次年却又革罢大司徒府，三者的隶属关系是掌天文历数的太史院仍与司天台并存，而使“颁历之政归院，学校之设隶台”。延祐二年，掌观象衍历的回回司天台也划归秘书监管领。至元十年集贤院辖下的掌雕印文书的兴文署也曾隶属又并入翰林院。但其每年印造历日的事务仍归秘书监领属。可见元代的秘书监不但是个职掌藏书和编纂的机构，同时也是刻书出版机构。特别是每年历书的印造，一直由秘书监承办。

元代秘书监还始终参与纂修《大元一统志》的工作。“至元乙酉，欲实著作之职，乃命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凡九年而成书。续得云南、辽阳等书，又纂修九年而始就，今秘府所藏《大（元）一统志》是也。因详其原委节目，为将来成盛之事法”[1]。至元乙酉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距掌握全国政权已有14年，原为兵部所掌管的郡邑图志，俱各不完。近年以来路、京、府、州、县多有更改。各处行省所辖地域也未曾取会核实。开坐沿革等事亦未遍行取勘。所以朝廷才下令秘书监编修全国总志《大元一统志》。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八月二十九日，秘书监钦奉圣旨：“编类地理图文字。”于是着手准备，启动工程。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三月二十一日，秘书监“切详，圣朝天下一统，疆宇宏远，州郡繁多，著而为书，比之前代浩瀚数倍。其著述也，必须稽考古来图书，凭准今日事迹，一一重加编类。若不加之岁月，广其文人，未易成就”[2]。于是就书、就物、就人陆续提出了若干要求，先后都得到了支持。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八月，“本监移准中书兵部关，编写《至元大一统志》，每路卷首必用地理小图，若于编写秀才数内就选，宗应星不妨编写彩画，相应关请。如委，必用图本，依准施行”[3]。显然这时每路卷首小图是否彩绘还未定夺。然至这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本监便准“中书兵部关，发到《至元大一统志》四佰五十册，呈解中书省，劄付发下右司收管”[4]。至此，显然已

[1] [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四《纂修》。

[2] [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四《纂修》。

[3] [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四《纂修》。

[4] [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四《纂修》。

经编完，时间用了九年。

然而事隔一年，即元成宗贞元二年（1296年）三月初五，秘书监又准中书兵部来文，照得云南发到地理沿革事迹，只好再编云南地理文字。“大德五年七月初二日准兵部关，奉中书省判送本部呈秘书监关，据著作郎赵炋呈，照得编类天下地理志书，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赐名《大一统志》。续有辽阳、云南远方报到沿革及各处州县，多有分拨陆改不同去处，除将《至元大一统志》重行校勘，添改沿革外，须选拣通儒能书人员，通行写静进本，以备御览，实为重事”[1]。至大德七年（1303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兵部见奉中书省州送行移，秘书监纂录天下地理总图，若今本人分画纂录彩画完备，实有可观。准此，照得先准翰林应奉汪将仕保呈，前鄂州路儒学教授方平彩画地理总图，已经移关秘监，依上彩画去讫。今准前因，一同彩画施行”[2]。表明《大元一统志》的地理图是彩绘的。至此，又延宕了九年，才算最后完成，前后历时18年。札马剌丁、虞应龙、孛兰肸、岳铉先后主持其事。全书1 300卷。沿唐、宋旧志成例，按中书省、行中书省和所辖各路行政区划分篇，以府、州为记叙单位，分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目。多取材于前代与当朝地志，部分内容出于编者辑纂。这是元朝初期由中书省下帝诏责令秘书监纂修的一部煌煌巨帙，是元代中央官方编修机构编纂大书的实例，惜至明朝中叶便已成残篇。今人赵万里等曾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佚，而成《大元一统志》，1965年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编辑所出版。

【1】[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五《秘书库》。

【2】[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五《秘书库》。

## 三、中书省及刑部

元制，中书省典领百官，会决庶务。其中参议中书省事，秩正四品，典左右司文牍，为六曹之管辖，军国重事咸预决焉。其下辖之左右两司，“右司所掌兵房之科有五：一曰边关，二曰站赤，三曰铺马，四曰屯田，五曰牧地。刑房之科有六：一曰法

令，二曰弭盗，三曰功赏，四曰禁治，五曰枉勘，六曰斗讼”[1]。可证元代掌管法令的是中书省下设之参议中书省事及其右司三科中的刑房科。而刑部则“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凡大辟之按覆，系囚之详谳，孥收产没之籍，捕获功赏之式，冤讼疑罪之辨，狱具之制度，律令之拟议，悉以任之”[2]。表明刑部有“拟议律令”之责。而“自古有天下者，虽圣帝明王，不能去刑法以为治”[3]。然而“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颇伤严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简除繁苛，始定新律，颁之有司，号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时，又以格例条画有关于风宪者，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至英宗时，复命宰执儒臣取前书而加以损益，书成，号曰《大元通制》。其书之大纲有三：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例。凡诏制为条九十有四，条格为条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断例为条七百十有七，大概纂集世祖以来法制事例而已”[4]。表明《大元通制》分三步历时二十三年才最后完成。

[1]《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一》。

[2]《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一》。

[3]《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

[4]《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

前边说过，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狱循用金律。中书省右丞何荣祖，字继先，“家世业吏，习于律令，乃以公规、治民、禦盗、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上之”[5]。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夏五月，“帝命刻板颁行”[6]。此为《至元新格》的编修成书过程。此后不久，又有王恽上《政事书》，谓“法者，辅治之具，一日阙则不可。君操于上，永作成宪；吏承于下，遵为定式；民晓其法，易避而难犯。……今国家有天下六十余年，小大之法，尚无定议。……臣愚谓宜将累朝圣训，与中统迄今条格，通行议拟，参而用之……”[7]。他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称许，为《大元通制》的编修做了舆论准备。既而又有郑介夫建言：“昔先帝时尝命修律，未及成书。近议大德律，所任非人，讹舛甚多。今宜于台、阁、省、部内选择通经术、明治体、练达时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参以先帝建元以来制勅命令，采以南北风土之宜，修为一代令典。”[8] 在此不断的建议之下，“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三月，诏以格例条画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

[5]［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一《律令之定》。

[6]［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一《律令之定》。

[7]［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一《律令之定》。

[8]［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一《律令之定》。

书，名曰《风宪宏纲》"[1]。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十一月，又有御史李端建言："世祖以来所定制度，宜著为令，使吏不得为奸，治狱者有所遵守。"[2]帝从其议，于"三年（1323年）二月，命完颜纳丹、曹伯启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损益之，凡为条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3]。《元史·英宗本纪》谓三年春正月辛酉"命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也可扎鲁忽赤不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听读仁宗时纂集累朝格例。……二月辛巳……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赦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4]。此盖为中书省或刑部主持修书的实例。完颜纳丹，枢密副使。曹伯启，字士开，济宁砀山人，善治狱。延祐元年（1314年）升内台都事，迁刑部侍郎。英宗立，召拜山北廉访使，俄拜集贤学士，御史台侍御史。就在这时，奉诏同纂《大元通制》。表明《大元通制》之编修，也是久淹岁月，逐渐成书的。

《元典章》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与《大元通制》几乎同期成书，内容也有部分雷同相似。"前集载世祖即位至延祐七年英宗初政。其纲凡十：曰诏令，曰圣政，曰朝纲，曰台纲，曰吏部，曰户部，曰礼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其目凡三百七十有三，每目之中又各分条格。《新集》体例略仿前集，皆续载英宗至治二年事，不分卷数，似犹未竟之本也。此书始末《元史》不载，唯载至治二年金带御史李端言：'世祖以来所定制度，宜著为令，使吏不得为姦，治狱有所遵守。'英宗从之。书成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计其时代，正与此书相同。而二千五百三十九条之数，则与此书不相应。卷首所载中书省劄，亦不相合，盖各为一编，非《通制》也"[5]。这是四库馆臣自己制造的疑虑。李端建言出自《元史·英宗本纪二》，乃《大元通制》编修之缘起，非《元典章》编修之缘起。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辛酉，帝曾命完颜纳丹、曹伯启、不颜、钦察、曹元用等，"听读仁宗时纂集累朝格例"，显

【1】［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一《律令之定》。

【2】《元史》卷二十八《英宗本纪二》。

【3】［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一《律令之定》。

【4】《元史》卷二十八《英宗本纪二》。

【5】《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三《元典章提要》。

然是让完颜纳丹、曹伯启等参考仁宗时所纂修的格例，以速成《大元通制》。

英宗是仁宗的嫡子。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夏四月辛丑，“命李孟等类集累朝条格，俟成书，闻奏颁行”[1]。这个李孟则很有可能是《元典章》的主修者。从《元典章》的内容看，虽也有律令格式和司法判例，但更多的是典章制度，属政书。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人。生而敏悟，七岁能文，倜傥有大志，博学强记，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成宗立，首命采访先朝圣政，以备史官之纪述。陕西省使孟讨论编次，乘驿以进。……孟宇量闳廓，材略过人，三入中书……知无不言，引古证今，务归至当”[2]。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夏四月己酉，“帝以《资治通鉴》载前代兴亡治乱，命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及李孟择其切要者译写以进”[3]。成宗时便受命采访先朝圣政，编类成书，乘驿以进，可谓有编类这类书的实践。又三入中书省，于历朝掌故制度熟记于心，有条件受命担当《元典章》编修工作。延祐七年（1320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孟亦因太师铁木迭儿的谗谤，降为集贤侍讲学士、嘉议大夫。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卒，御史累章辨其诬，诏复原官，追封为魏国公。他的地位，他的才华，他的功绩，使得英宗命完颜纳丹、曹伯启等所听读的仁宗时所纂辑的累朝格例，很有可能就是由李孟受命主修的《元典章》。

【1】《元史》卷二十五《仁宗本纪二》。

【2】《元史》卷一七五《李孟传》。

【3】《元史》卷二十五《仁宗本纪二》。

## 四、奎章阁学士院

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二品，天历二年立于兴圣殿西，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大学士二员，正三品。寻升为学士院。大学士正二品；侍书学士，从二品；承制学士，正三品；供奉学士，正四品；参书，从五品。多以它官兼领其职。至顺元年，增大学士二员，共四员。侍书学士二员……”[4] 其下有群玉内司，秩正三品。群玉司下有艺文监，秩从三品；监书博士，秩正五品；艺林库，秩从六品；广成局，秩七品。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九月戊辰，便“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辑

【4】《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四》。

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至顺元年（1330年）春正月丙辰，命赵世延、赵世安领纂修《经世大典》事”[1]。这是《元史·文宗本纪》的记载。《元史·赵世延传》又谓：“至顺元年，诏世延与虞集等纂修《皇朝经世大典》。”表明《经世大典》之编修，正式始于文宗至顺元年正月。至顺元年二月庚寅，又“以《经世大典》久无成功，专命奎章阁阿邻帖木儿、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译国言所纪典章为汉语，纂修则赵世延、虞集等，而燕铁木儿如国史例监修”（《元史·文宗本纪三》）。然开始编修之时，赵世延已奏：“臣衰老，乞解中书政务，专意纂修。”帝则曰：“老臣如卿者无几，求退之言，后勿复陈。”但到了这一年的秋天，他又以疾病“移文中书致其事，明日即行，养疾于金陵之茅山”[2]。《元史·虞集传》又称：“有旨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修《经世大典》，命集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总裁。……俄世延归，集专领其事，再阅岁，书乃成，凡八百帙。”可知实任其事者为虞集。虞集字伯生，任此事时为奎章阁侍书学士。《元史·文宗本纪》谓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乙未，“奎章阁学士院纂修《皇朝经世大典》成”。与《虞集传》中“再阅岁，书乃成”相吻合。所以此书之纂修，实为奎章阁学士院所操办，赵世延、虞集只是领衔而已。奎章阁学士院之建立，乃“陛下出独见，建奎章阁，览书籍，置学士员，以备顾问”。并说：“昔我祖宗，睿智聪明，其于治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岁跋涉难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3]可见奎章阁学士院一建立，就是文化机构的性质，旨在明史鉴，资治道，故建立后的第二年正月便受命编修《经世大典》。《经世大典》原称《皇朝经世大典》，也称《元经世大典》，凡880卷，目录12卷，《公牍》、《纂修通议》各一卷。分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10门。其中六典各系子目。体例仿《唐六典》和《宋

【1】《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纪三》。

【2】《元史》卷一八〇《赵世延传》。

【3】《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

会要》。于元代典制，如职官、赋役、礼仪、宗教、军事、刑法、造作诸制，无不详载。明初修《元史》诸志及《外夷传》多取材于此。惜明中叶后此书散失。

## 五、翰林国史院

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癸亥，初立翰林国史院”[1]。“以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秩正三品。六年，置承旨三员、学士二员、侍读学士二员、侍讲学士二员、直学士二员。八年，升从二品。十四年，增承旨一员。十六年，增侍读学士一员。十七年，增承旨二员。二十年，省并集贤院为翰林国史集贤院。二十一年，增学士二员。二十二年，复分立集贤院。二十三年，增侍讲学士一员。二十六年，置官吏五员，掌管教习亦思替非文字。二十七年，增承旨一员。大德九年，陞正二品，改典簿为司直，置都事一员。至大元年，置承旨九员。皇庆元年，陞从一品，改司直为经历”[2]。其职掌是起草诏令，奉旨撰写文件，撰修国史。一看便知是翰林院、国史院两院合署的职掌。起草诏令文件，当是翰林院的职责；修起居注、实录、国史，乃是国史院的事。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便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史天泽字润甫，中统二年五月，拜为中书右丞相。七月便受命监修国史。原因是他“尤熟于《资治通鉴》，立论多出人意表”[3]，是位出将入相的人物。至元元年（1264年）二月，世祖又“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4]。至元五年（1268年）十月乙未，“中书省臣言：‘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谟不至遗失。’即以和礼霍孙、独胡剌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5]。至元十年（1273年）闰六月辛未，“以翰林院纂修国史，敕采录累朝事实，以备编集”[6]。“十一月癸未，命布只儿修《起居注》”[7]。十二年（1275年）三月庚子，“其翰林兼国史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主之”[8]。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六月丁酉，“大司徒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兀鲁带进《定宗实录》”[9]。至元三十一年(1294

[1]《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

[2]《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三》。

[3]《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

[4]《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

[5]《元史》卷六《世祖本纪三》。

[6]《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

[7]《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

[8]《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

[9]《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十三》。

年）四月甲午，成宗铁穆耳即皇帝位。同年六月甲辰“诏翰林国史院修《世祖实录》，以完泽监修国史”。至元贞元年（1295年）六月甲寅，“翰林承旨董文用等进《世祖实录》”[1]。“元贞二年（1296年）十一月己巳，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2]。大德七年（1303年）十月庚戌，“翰林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3]。八年（1304年）二月甲辰，“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4]。所谓金书，盖即用泥金书写的书。通常用于写佛教经典，此处用来写《世祖实录节文》，意在表示尊崇。至大元年（1308年）三月己卯，“命翰林国史院纂修顺宗、成宗《实录》”[5]。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丙寅，“翰林国史院进《仁宗实录》”[6]。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十二月丙寅，“命翰林国史院修纂英宗、显宗《实录》”[7]。天历二年（1329年）十一月己卯“翰林国史院臣言：‘纂修《英宗实录》，请具倒剌沙款伏付史馆。’从之”[8]。所有上述这些事例，充分表明翰林国史院是一个常设的编修机构，职责是编修历朝实录和国史。

[1]《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一》。

[2]《元史》卷十九《成宗本纪二》。

[3]《元史》卷二十一《成宗本纪四》。

[4]《元史》卷二十一《成宗本纪四》。

[5]《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纪一》。

[6]《元史》卷二十八《英宗本纪二》。

[7]《元史》卷二十九《泰定本纪一》。

[8]《元史》卷三十三《文宗本纪二》。

元代享国时间短，疆域辽阔，天下一统，修史任务特别繁重。封建社会后代官修前代史历有传统，目的都是要总结前代兴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供本朝借镜，企望长治久安。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秋七月癸亥初立翰林国史院，以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请修辽、金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弘文馆，宋太宗设内外学士院，今宜除拜学士院官，作养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仍采访遗事。’并从之”[9]。中统元年夏四月世祖忽必烈即帝位，第二年七月便批准王鹗的奏请，同意编修辽、金二史，原因盖是辽、金均已成为过往，可以写他们各自的历史了。而宋此时还尚未灭亡，谈不上写宋史。待南宋灭亡，元朝定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但由于对“义例”意见不一，始终也未启动。争论的意见有两种：一种意见主张仿《晋书》体例，以宋为正统，以辽、金之史作为载记，附于《宋史》之后；另一种意见则

[9]《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

主张仿《南史》、《北史》体例，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辽、金为《北史》。这个问题争论了大约有六十年，直到元惠宗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才决定“各与正统”，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1]。原因是此时的政治形势日趋尖锐，总结借鉴前代经验，以利现实统治，显得十分紧迫。认识到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职专其事。集贤、秘书、崇文并内外诸司衙门里，著文学博雅、才德修洁、堪充的人每斟酌区用。纂修其间，予夺议论，不无公私偏正，必须交总裁官质正是非，裁决可否。遴选位望老成，长于史才，为众所推服的人交做总裁官。这三国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值，咨达省部，送付史馆，以备采择”[2]。可证辽、金、宋三史之纂修，也是由翰林国史院分局进行的，局名就是各称辽、金、宋史馆。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辽史》修成，由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筵事脱脱表奏进呈。《金史》也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告成，此时脱脱已经罢相，改由丞相阿鲁图任都总裁官，由他表奏进呈。至正五年（1345年）《宋史》告成，十月二十一日，亦由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筵事、提调宣政院、太医院广惠司事阿鲁图等上表进呈。这是翰林国史院编纂大书的实例。翰林国史院除编纂这些大制作外，也还编纂一些别的书，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五月戊寅，还奉命编纂过《平金录》和《平宋录》。此不一一列举。元代除上述这些专业编修机构各司其职，分别奉敕完成某些编修任务外，还有些政府职能机构也遵旨编修一些与所职有关的书籍，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三月甲戌，

【1】《元史》卷四十一《顺帝纪四》。

【2】《辽史·附录》，中华书局校点本。

"中书省下太常寺讲究州郡社稷制度，礼官折衷前代，参酌《仪礼》，定拟祭祀仪式及坛壝祭器制度，图写成书，名曰《至元州县社稷通礼》"[1]。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二月癸酉，"命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翰林集贤大学士许国祯，集诸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2]等。

【1】《元史》卷十《世祖本纪七》。

【2】《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十》。

## 六、太史院与司农司、太医院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六月甲戌，"以《大明历》浸差，命太子赞善王恂与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历，以枢密副使张易董其事。易、恂奏：'今之历家，徒知历术，罕明历理，宜得耆儒如许衡者商订。'诏衡赴京师"[3]。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乙巳，又"命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访求精天文历数者"[4]。据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载："至元初，刘秉忠言：'《大明历》自辽、金承用二百余年，浸以后天，宜在所立改。'未及用其议而秉忠没。至十三年，江南略平，天下混一，上思其言，遂议改修新历，立局以庀事，诏郭守敬与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测验。……守敬乃言：'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今司天浑仪，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与此处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极，差约四度。表石年深，亦复攲侧，宜尽考其失，更置之。'及择高垲之所，造木为重棚，创简仪、高表，用相比覆。……十七年，新历成，守敬与诸太史同上奏。"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月癸亥，"太史院上《授时历经》、《历议》，敕藏于翰林国史院"[5]。元代的太史院，秩正二品，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置太史令等官七员，掌天文历术之事。至大元年（1308年）设官增至十员。延祐三年（1316年）设官增至十五员。其属官中有掌历二员，腹里印历管勾一员；各省司历十二员，印历管勾二员。太史院下专门设有印历局，专事印造每年的历书。元代定鼎于燕，其初袭用金从宋获得的旧仪象之器，"而规环不协，难复施用。于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创简仪、仰仪及诸仪表，皆臻于精妙，卓见绝识，盖有古人所未及者"[6]。所以至元十七年太史院所上之《授时

【3】《元史》卷九《世祖本纪六》。

【4】《元史》卷十《世祖本纪七》。

【5】《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十一》。

【6】《元史》卷四十八《天文志一》。

历》，精于以前的历法，其中与郭守敬所创之各种测仪“皆臻于精妙”紧密相关。天文历法，非但关乎封建统治者“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也关乎到“敬授人时”，以利课农，所以历来十分重视，不准私造。“诸告获私造历日者，赏银一百两。如无太史院历日印信，便同私历造者，以违制论”[1]。可证太史是专职天文历算，负责制订历法，编修每年历书的专门机构。

【1】《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诈伪》。

其他如司农司，始立于至元七年（1270年）称“大司农司，秩正二品。凡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悉掌之”[2]。十年（1273年）三月甲寅朔，“诏申谕大司农司遣使巡行劝课，务要农事有成”。同年十一月丁未，“大司农司言：‘中书移文，以畿内秋禾始收，请禁农民覆耕，恐妨刍牧。’帝以农事有益，诏勿禁”[3]。就在皇帝这种崇本抑末，十分重视农业的思想指导下，司农司编纂了自己的职务作品《农桑辑要》七卷，并正式刊板颁行。初为小字本，览阅不便，至仁宗延祐二年（1314年）八月壬寅，又“诏江浙行省印《农桑辑要》万部，颁降有司遵守劝课”[4]。这次刊印出版，则将小字换成了大字，便于披览。英宗、文宗时亦一再申饬颁行。至顺三年（1332年）又刻印出版一万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司农司还编刻出版过《农桑杂令》。这是典型的职能部门编修职务作品的实例。《农桑辑要》分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十门，包括了从劝农、开垦、耕翻、播种、桑蚕乃至瓜果、竹木、草药、养畜等各项内容，是一部非常实用的农书。农业在元代被视为经国之要务，故一再出版。可见政治需要，社会需求，是出版频率及发行量大小必须遵循的规律。

【2】《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三》。

【3】《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

【4】《元史》卷二十五《仁宗本纪二》。

太医院，秩正二品。掌医事，制奉御药物，领各属医职。中统元年置宣差，提点太医院事。至元二十年（1283年）改称尚医监，秩正四品。二十二年（1285年）复为太医院，大德五年陞正二品，设官十六员。其下有广惠司，秩正三品。还有行御药局、御香局、大都惠民局、上都惠民司、医学提举司等机构。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九月庚戌，“太医院新编《本草》成”[5]。这也

【5】《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十二》。

是职能部门编修的职务作品。还可以举出一些，此不赘述。

## 第二节 元代的私人撰述

元代虽自“太祖、太宗即知贵汉人，延儒生，讲求立国之道”，但这仅指少数上层人物，甚而仅指少数几个皇帝懂得这个道理。就其民族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起初“其国无文字，其俗昧死生，其攻城略地无异草薙而禽狝之耳，生人之类不绝于其手者几希，彼且视仁义政教为何物哉！”[1] 加之其选官用人制度“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其策名于荐举者，有遗逸，有茂异，有求言，有进书，有童子；其出于宿卫、勋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于宣徽、中政之属者，重为内官。……至于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2]。因而弄得“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3]。故虽在至元初就以许衡为国子学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学者才十余人。衡既去，教益废，而学舍未建，师生寓居民舍”[4]。表明他们没有念书的习惯，提起念书就头痛。直到至大四年（1311年），元武宗以不忽木等蒙古族人学以成材者为诱导，“亲定国子生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员二十人，通一经者以次补伴读，著为式”[5]。又擢任四方儒士读书成材者为国学、翰林、秘书、太常、儒学提举等职，借以激励读书，此后才逐步有所改变。然翻遍《元史》本纪，亦不见有哪位皇帝有御制集问世，有一些译进、撰进之作，也无法和两宋时代相比肩。

### 一、元代个人群体译进撰进之书

跟入关前满族一些将领们读不懂《孙子兵法》，只好翻译《三国演义》，从中学习兵谋战略一样，蒙古族人用金戈铁马打下了江山之后要治理天下，也看不懂深奥的正经正史，只好先译、撰一些易懂的经书、史籍，借以治国平天下。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二月辛亥，“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

【1】[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序》。

【2】[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

【3】[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

【4】[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

【5】[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

给俸以赡之"[1]。至元五年（1268年）十月庚寅，"敕从臣秃忽思等录《毛诗》、《孟子》、《论语》"[2]。十九年（1282年）四月己酉，"刊行蒙古畏吾儿字所书《通鉴》"[3]。表明此时《资治通鉴》已被译成畏吾儿体蒙古文，并且正式刊印出版。大德十一年（1307年）五月甲申，武宗即帝位。六月诏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受金宝。同时"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像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4]。八月辛亥，也就是武宗即帝位后的第三个月，"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5] 其实《大学衍义》也好，《孝经》也好，均非《五经》、《六经》的范围。《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将《孝经》排在《论语》之后，即《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隋书·经籍志·经部》将《论语》、《孝经》掉换了一下位置，亦处在第七位，并非经书之要。武宗、仁宗如此看重此经，盖均与他们强夺帝位，本已不孝有关。自己不孝夺帝位，反过来就要教育诸王以行人之孝道，莫施逆，借以保护自己的帝位。《大学》乃《礼记》中的一篇，何时析出单行无须烦琐考订，自汉以来有以《春秋》以上为大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小经的说法，可证其别行亦久。北宋二程虽改窜旧文，但尚未分经别传，指为何人所作。至朱熹始作章句，改动章节，才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称为《四书》。至于《大学衍义》，乃南宋真德秀因《大学》之义而推衍成书。"首曰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本。次以四大纲：曰格物致知，曰正心诚意，曰修身，曰齐家。各系以目。格物致知之目四：曰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正心诚意之目二：曰崇敬畏、戒逸欲。修身之目二：曰谨言行、正威仪。齐家之目四：曰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大旨在于正君心，肃宫闱，抑权倖。盖

[1]《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

[2]《元史》卷六《世祖本纪三》。

[3]《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九》。

[4]《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纪一》。

[5]《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纪一》。

（南宋）理宗虽浮慕道学之名，而内实多欲。权臣外戚，交煽为奸"[1]。这段评论也道出了元武宗之所以吹捧"治天下，此一书足矣"的用意。就是自己"内实多欲"，而又怕诸王、权臣、外戚为奸篡逆，借此"肃宫闱，抑权倖"，以正别人之心。

延祐元年（1314年）四月己酉，"帝以《资治通鉴》载前代兴亡治乱，命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及李孟择其切要者译写以进"[2]。四年（1317年）四月乙丑，"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刘赓等译《大学衍义》以进，帝览之，谓群臣曰：'《大学衍义》议论甚嘉，其令翰林学士阿怜铁木儿译以国语"[3]。五年（1318年）九月己卯，"以江浙省所印《大学衍义》五十部赐朝臣"[4]。对《大学衍义》的吹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表明元代皇帝的经学水平就是这么个程度。泰定元年（1324年）二月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及择师傅令太子及诸王大臣子孙受学。遂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复敕右丞相也先铁木儿领之"[5]。他们用来教子孙的就是这么一些书。

至元十三年（1276年），国基初定，社会还在动荡，乐安郑松招吴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求贤江南，起澄至京师。未几，以母老辞归。钜夫请置澄所著书于国子监，以资学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录上"[6]。吴澄（1249—1333）字幼清，晚字伯清，抚州崇仁人。幼颖悟，长则博通经传。世祖遣程钜夫求贤于江南，被荐至京师。但始终不愿为官，向心学问，是元代的名儒。最能表现吴澄人格的还不仅在轻仕途上，还表现在他不畏强权，不信鬼神上。元英宗一即位，便迁吴澄为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可谓恩宠有加。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丁亥，曾"敕金书《藏经》二部，命拜住等总之"[7]。事未果，便使左丞速速诏澄为序。澄便说："主上写经，为民祈福，甚盛举也。若用以追荐，臣所未知。盖福田利益，虽

[1]《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二《大学衍义提要》。

[2]《元史》卷二十五《仁宗本纪二》。

[3]《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三》。

[4]《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三》。

[5]《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本纪一》。

[6]《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

[7]《元史》卷二十八《英宗本纪二》。

人所乐闻，而轮回之事，彼习其学者，犹或不言。不过谓为善之人死则上通高明，其极品则与日月齐光；为恶之人死则下沦污秽，其极下则与沙虫同类。其徒遂为荐拔之说，以惑世人。今列圣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荐拔！且国初以来，凡写经追荐，不知几举。若未效，是无佛法矣；若已效，是诬其祖矣。撰为文辞，不可以示后世，请俟驾还奏之。"[1] 这是何等的勇气和识略！不但不为准备用泥金书写的释家藏经写序，还说了这么一大段招皇帝不爱听且非常辩证的无神论的话，表现了一位当时经学家的大无畏精神和崇高品质。

王恽字仲谋，卫州汲县人。有才干，操履端方，好学善属文，中统元年左丞姚枢宣抚东平，辟为详议官。时省部初建，上令各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财者一人，恽被选至京师，上书论时政。第二年转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中书省左右司都事。"裕宗在东宫，恽进《承华事略》。其目曰：广孝、立爱、端本、进学、择术、谨习、听政、达聪、抚军、崇儒、亲贤、去邪、纳诲、几谏、从谏、推恩、尚俭、戒逸、知贤、审官，凡二十篇"。至元十四年（1277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成宗即位，献《守成事鉴》一十五篇，所论悉本诸经旨。元贞元年，加通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奉旨纂修《世祖实录》，因集《圣训》六卷上之"[2]。

畅师文字纯甫，南阳人。幼警悟，家贫无书，手录口诵，过目辄不忘。至元十三年（1286年），"编《平宋事迹》上之。……二十三年，拜监察御史，纠劾不避权贵。上所纂《农桑辑要》书"[3]。

袁桷字伯长，庆元人。童子时已有一定声名，部使者举茂才异等，起为丽泽书院山长。大德初年，由阎复、程文海、王构等推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时初建南郊，桷进十议曰：'天无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谓之天，作《昊天五帝议》。祭天岁或为九，或为二，作《祭天名数议》。圜丘不见于《五经》，郊不见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议》。后土，社也，作

[1]《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

[2]《元史》卷一六七《王恽传》。

[3]《元史》卷一七〇《畅师文传》。

《后土即社议》。三岁一郊，非古也，作《祭天无间岁议》。燔柴见于古经，《周官》以禋祀为天，其义各有旨，作《燔柴泰坛议》。祭天之牛角茧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群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当立从祀议》。郊，质而尊之义也；明堂，文而亲之义也，作《郊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用辛，鲁礼也，卜不得常为辛，作《郊非辛日议》。北郊不见于《三礼》，尊地而遵北郊，郑玄之说也，作《北郊议》。礼官推其博，多采用之。陞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1]。

【1】《元史》卷一七二《袁桷传》。

齐履谦字伯恒，年十一即晓推步星历。十三从师，闻圣贤之学，自此以穷理为务，非洙、泗、伊、洛之书不读。至元十六年（1279年）初立太史局，履谦便预修《历经》、《历议》。二十九年（1292年）授星历教授。大德二年（1298年）迁保章正，始专历官。他笃学勤苦，学问博洽，"自六经、诸史、天文、地理、礼乐、律历，下至阴阳五行、医药、卜筮，无不淹贯，尤精经籍。著《大学四传小注》一卷、《中庸章句续解》一卷、《论语言仁通旨》二卷、《书传详说》一卷、《易系辞旨略》二卷、《易本说》四卷、《春秋诸国统纪》六卷……"[2]。

【2】《元史》卷一七二《齐履谦传》。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赵秉温"编《国朝集礼》成，帝特命其子慧袭侍仪使"[3]。"英宗居东宫，塔失不花撰集前代嘉言善行，名曰《承华事略》，并画《豳风图》以进"[4]。泰定元年（1324年），王守诚"试礼部第一，廷对赐同进士出身，授秘书郎，迁太常博士，续编《太常集礼》若干卷以进"[5]。

【3】《元史》卷一五〇《赵秉温传》。

【4】《元史》卷一五三《塔失不花传》。

【5】《元史》卷一八三《王守诚传》。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东明人。至治元年（1321年）登进士第，授大名路濬州判官，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助教。泰定四年（1327年）除太常博士，则言："祖宗建国以来，七八十年，每遇大礼，皆临时取具，博士不过循故事应答而已。往年有诏为《集礼》，而乃令各省及各郡县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礼乐自朝廷出，郡县何有哉！"[6] 于是"白长院者，选僚属数人，仍请出架阁文牍，以资采录。三年，书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礼》。"[7] 至正四年（1344年）除为礼部尚书，又曾"取古史，

【6】《元史》卷一八三《李好文传》。

【7】《元史》卷一八三《李好文传》。

自三皇迄于金、宋，历代授受，国祚久速，治乱兴废为书，曰《大宝录》。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恶之所当法当戒者为书，名曰《大宝龟鉴》。皆录以进"[1]。

孛术鲁翀字翚，幼勤学。大德十一年（1307年）被荐授襄阳县儒学教谕。至大四年（1311年）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擢翰林修撰。帝猎柳林，曾献《驻跸颂》。预修《大元通制》。文宗时又"上《天历大庆诗》三章"[2]。这是蒙族中少有的人才。

苏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由国子学生参与公试，名列第一，释褐，授从仕郎，大都路蓟州判官。泰定元年（1324年），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应奉翰林文字，奎章阁授经郎，元统元年（1333年）拜监察御史，迁翰林待制，中书右司都事，礼部侍郎，累官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天爵自以起自诸生，进为师长，端己悉心，以范学者。……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记载，尝著《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类》七十卷。其为文长于序事，平易温厚，成一家言，而诗尤得古法，有《诗稿》七卷、《文稿》三十卷。于是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晚岁，复以释经为己任。学者因其所居，称之为滋溪先生。"[3] 苏天爵从20岁左右开始，就着手准备资料。入仕以后，更加看到了元代初创以来功臣列传独无片简只字之纪，几成阙典，因而大声疾呼："若复旷日引年，不复记载，将见勋旧盛烈泯没无闻。"[4] 于是他以个人之力搜集碑铭、墓志、行状、家传，以及当时的公文、私人文集、笔记，所用文献达120余种，撰辑《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收元初自木华黎到刘因共47人的事迹。其体例"盖仿朱子《名臣言行录》例，而始末较详。又兼仿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例，但有所弃取，不尽录全篇耳"[5]。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苏天爵又以个人之力，用20年之功，摭拾国初以至于他编书之前名人所作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等，类而聚之，而成《国朝文类》七十卷，使"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6]。论者谓是书"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

[1]《元史》卷一八三《李好文传》。

[2]《元史》卷一八三《李术鲁翀传》。

[3]《元史》卷一八三《苏天爵传》。

[4] 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19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5]《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元名臣事略提要》。

[6] [元]陈旅：《元文类序》。

鼎立而三。然铉选唐文，因宋白《文苑英华》；祖谦选北宋文，因江钿《文海》，稍稍以诸集附益之耳。天爵是编，无所凭借，而蔚然媲美，其用力可云勤挚。……终元之世，未有人续其书者，可以见其难能矣”[1]。苏天爵这两部书虽非直接撰进之书，但由于别人的推荐，不但进呈了，而且正式刻印出版了。例如《国朝文类》，于后至元二年（1336年）十二月初六日，由翰林国史院待制谢端，修撰王文烨，应奉黄清老，编修吕思诚、王沂、杨俊民等，联名推荐奏进出版。荐称："伏睹奎章阁授经郎苏天爵，自为国子诸生，历官翰林僚属，前后搜辑殆二十年，今已成书，为七十卷。凡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其文各以类分，号曰《国朝文类》。虽文字固富于网罗，而去取多关于政治。若于江南学校钱粮内刊板印行……以广其传，不唯黼黻太平，有裨于昭代，抑亦铅椠相继，可望于后人。”[2] 于是书进都省，下令刊行。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元文类提要》。

【2】《西湖书院书目·附录》。

贾鲁字友恒，河东高平人。曾入《宋史》局，参与《宋史》的编修。又为工部郎中，言考工一十九事。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白茅堤、金堤等处决口。“并河郡邑，民居昏垫，壮者流离，帝甚患之……特命鲁行都水监。鲁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图上进二策。……九年，太傅、右丞相脱脱复相，论及河决，思拯民艰。……十一年四月，命鲁以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章……是月鸠工，七月凿河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诸埽诸堤成，水土工毕，河复故道。……帝遣使报祭河伯，召鲁还京师，鲁以《河平图》献”[3]。

【3】《元史》卷一八七《贾鲁传》。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兰溪人。事同郡王柏，并由此登何基之门。基学于黄榦，而榦亲承朱熹之传，可以说是朱熹的三传弟子。曾“用邵氏《皇极经世历》、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断自唐尧以下，接于《通鉴》之前，勒为一书，二十卷，名曰《通鉴前编》。……他所著书曰《大学章句

疏义》二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书表注》四卷，谦（其门人许谦）为益加校定，皆传于学者。天历初，廉访使郑允中表上其书于朝"[1]。

李孝光字季和，温州乐清人。少博学，笃志复古，隐居雁荡山五峰下。"至正七年，诏征隐士，以秘书监著作郎召，与完者图、执礼哈琅、董立同应诏赴京师，见帝于宣文阁，进《孝经图说》，帝大悦，赐上尊"[2]。

还可举出若干如上的事例，来描述元代私人译进、撰进之书的情况。但仅上述诸例，已可表明元代撰进之书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点。其一，在数量上，与宋代相比显得要少得多。此与国祚短促有关，但与其主体阶级，即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文化程度不高更有关。其二，宋代没有译进之书，而元代译进之书则是其明显的特色。其三，译进撰进之书，绝大多数为汉人所为。一方面表明汉人有习文读经的悠久传统，另一方面也表明元人求贤招隐、向先进文化学习的宽容政策。所以表现在出版上，元代也有自己的特色。

## 二、元代的私人撰述

《元史·儒学传序》指斥前代史传皆将儒学之士一分为二：专精经义者入儒林，以文章名家者入文苑。认为《六经》乃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道者也。"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3]故《元史》不分儒林、文苑，而统称为儒学。且谓"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4]。今举其例，以见有元一代个人撰述之梗概。

赵复字仁甫，学者称为江汉先生，德安人。蒙古太宗时，兵围德安，城破，德安数十万民皆俘戮无遗。时遇姚枢奉诏在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赵复则在其中。在姚枢百般劝导之下，复勉强从之，归顺蒙古人。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此时杨惟中与姚枢谋建太极书院，"立

[1]《元史》卷一八九《金履祥传》。

[2]《元史》卷一九〇《李孝光传》。

[3]《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一·序》。

[4]《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一·序》。

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复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以标其宗旨。朱子门人，散在四方，则以见诸登载，与得诸传闻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师友图》，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使学者知所向慕，然后求端用力之方备矣。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复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1]。此盖为元代传程、朱理学的开山人之一。

张䇓字达善，学者称导江先生。其先乃蜀中导江人，蜀亡，侨寓江左。金华王柏得朱熹三传之学，讲道于上蔡书院，䇓从而受业。自《六经》、《论语》、《孟子》之传注，周、程、张氏之微言，朱子所尝论定者，无不潜心研讨，究其根柢。至元中，在江宁学官授业，中州士大夫子弟多去从学。其在维扬，来学者尤众。有《经说》及《文集》行世。吴澄曾序其书，赞美其书"议论正，援据博，贯穿纵横，俨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2]。

金履祥本为大儒，其著述已在撰进之书中表述过，此不重复。

许谦字益之，其先京兆人，至谦已居金华五世，故为金华人。学者称为白云先生。幼孤，受母教。长受业于金履祥之门。读《四书章句集注》而著有《读四书丛说》八卷，读《书集传》而著有《读书丛说》六卷，读《诗集传》而著有《诗集传名物钞》八卷，观史则著有《治忽几微》。又昼之所为，夜必书之，最后而成《自省编》。又有《白云集》四卷，其诗尤谐雅音，其文亦醇古雅正，绝不似理学家诗文惟涉理路者。

陈栎字寿翁，徽州休宁人。幼受祖母教，乡人皆师之。宋亡科举废，慨然发愤，致力于圣人之学。尝谓"有功于圣门者莫若朱熹氏，熹没未久，而诸家之说往往乱其本真，乃著《四书发

[1]《元史》卷一八九《赵复传》。

[2]《元史》卷一八九《张䇓传》。

明》、《书集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亡虑数十万言。凡诸儒之说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辞隐义，则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备者，复为说以补其阙。于是朱熹之说大明于世"[1]。

【1】《元史》卷一八九《陈栎传》。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朱熹的四传弟子。其学出于乃父胡方平，方平授业于沈贵宝、董梦程，沈贵宝受业于董梦程，董梦程受《易》于黄榦，黄榦乃朱熹的入室弟子，故胡一桂亦精于《易》，著有《周易本义附录纂疏》、《本义启蒙翼传》、《朱子诗传附录纂疏》、《十七史纂》等。其同郡胡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撰有《易本义通释》等。

黄泽字楚望，其先长安人，唐末其先祖舒艺知资州内江县，子孙遂为资州人。泽以明经学道为志，好为苦思，作《思古吟》、《颜渊仰高鑽坚论》、《易春秋二经解》、《二礼祭祀述略》、《十翼举要》、《忘象辩》、《象略》、《辩同论》、《三传义例考》、《笔削本旨》、《元年春王正月辩》、《诸侯娶女立子通考》、《鲁隐公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丘甲辩》、《易学滥觞》、《春秋指要》、《礼经复古正言》、《六经补注》、《翼经罪言》等。可谓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近代覃思之学，推泽为第一。吴澄尝观其书，以为平生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之者"[2]。

【2】《元史》卷一八九《黄泽传》。

萧㪺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为奉元人。博极群书，其行甚高，多次拜官而不受。教人必自《小学》始。为文立意精深，言近指远，"一以洙、泗为本，濂、洛、考亭为据，关辅之士翕然宗之，称为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礼说》、《小学标题驳论》、《九州志》及《勤斋文集》，行于世"[3]。

【3】《元史》卷一八九《萧㪺传》。

仝恕字宽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迁秦中，遂为奉元人。轻仕途，重学问。其学由程、朱上溯孔、孟。家无儋石之储，而聚书却数万卷，故匾所居曰"榘庵"。时萧㪺居南山下，亦道高当世，故士论称之曰"萧仝"。著有《榘庵集》二十卷。

胡长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被召至京师，待诏集贤院，累官将仕郎。其初师青田余学古，学古师

王梦松，梦松传龙泉叶味道之学，味道则朱熹弟子，所以长孺之学本质上宗朱氏。著有《瓦缶编》、《南昌集》、《宁海漫抄》、《颜乐斋稿》等。

韩性字明善，绍兴人。"及长，博综群籍，自经史至诸子百氏，靡不极其津涯，究其根柢，而于儒先性理之说，尤深造其阃域。其为文辞，博达儁伟，变化不测，自成一家言。……其所著有《礼记说》四卷、《诗音释》一卷、《书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1]。与韩性同时，还有程端礼、程端学兄弟业儒。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传朱熹明体达用之指，著《读书工程》，为国子监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端学，至治元年（1321年）进士，授仙居县丞，寻改国子助教。通《春秋》，著有《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辨疑》二十卷、《春秋或问》十卷。

【1】《元史》卷一九〇《韩性传》。

吴师道字正传，婺州兰溪人。善记览，工辞章。至治元年（1321年）进士。召为国子助教，寻陞为博士。"其为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许衡之成法，六馆诸生人人自以为得师。……所著有《易诗书杂说》、《春秋胡传附辨》、《战国策校注》、《敬乡录》，及《文集》二十卷"[2]。

【2】《元史》卷一九〇《吴师道传》。

陆文圭字子方，江阴人。博通经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历、医药、算术之学。学者称墙东先生。为文融会经传，纵横变化，莫测其涯际，东南学者多宗师之。著有《墙东类稿》二十卷。其同乡梁益，字友直，博洽经史，而工于文辞。著有《三山稿》、《诗绪余》、《史传姓氏纂》、《诗传旁通》，发挥朱熹之学。

孟梦恂字长文，黄岩人。至正十三年（1353年）以设策禦寇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兴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74岁，朝廷赐谥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书辨疑》、《汉唐会要》、《七政疑解》及《笔海杂录》五十卷。

宇文公谅字子贞，门人私谥为纯节先生。其先成都人，父挺祖徙吴兴，遂为吴兴人。至顺四年（1333年）进士，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丁内艰，改同知馀姚州事。累官岭南廉访司。其为

国子监助教时，日与诸生辨析诸经。著述有《折桂集》、《观光集》、《辟水集》、《以斋诗稿》、《玉堂漫稿》、《越中行稿》等。

伯颜一名师圣，字宗道，哈剌鲁氏，隶军籍蒙古万户府，世居开州濮阳县。其平生“修辑《六经》，多所著述，皆燬于兵”[1]。

【1】《元史》卷一九〇《伯颜传》。

赡思字得之，其先大食人，后定居真定。天历三年（1330年）被召为应奉翰林文字，赐对奎章阁，文宗问其是否有著述，明日进呈《帝王心法》，文宗称善，诏预修《经世大典》。“赡思邃于经，而《易》学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钟律、算术、水利，旁及外国之书，皆究极之。……所著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三十卷，藏于家”[2]。

【2】《元史》卷一九〇《赡思传》。

上述只是元儒中有代表性人物的一些著述，其特点是绝大多数都是汉人，且多为由宋入元之人，这很容易理解。因此，元代的经学，实为宋代程朱理学的继续并得到了强调，经过长期争论，至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才定下来的科举考试诏中充分反映了这一事实。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弘远矣。……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举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3] 表明不论是考得简单还是复杂，都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设问或出题，可证元代经学，乃继续发挥程朱理学。

【3】［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

元代史学，比起其前其后，都欠发达。特别是私人著述中的史撰之作，都不如宋、明人多且深。但“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1]。这种对内行中原汉法，对外开放交流的政策，又使元代的史学著作具有一定的特色。官修的史学著作，前边已经说过，他们除对宋、辽、金均视为正统而正式修史外，对本朝实录和典章制度亦格外重视。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有《五朝实录》、《世祖实录》、《顺宗实录》、《成宗实录》、《武宗实录》、《仁宗实录》、《英宗实录》、《泰定实录》、《明宗实录》、《文宗实录》、《宁宗实录》500余卷，13朝15帝都有实录，只缺顺帝36年的实录。而《大元通制》、《经世大典》、《元典章》的前后纂修，则不但使元代的律令、典章较为完备，还突破了“会要”体的桎梏，创造了“会典”体，为明、清两代所继承。其中以私人之力编纂典制方面的巨帙，当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1] 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励耘书屋丛刻》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82。

马端临字贵与，号竹洲，饶州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1253—1258年）间，卒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他是宋宰相马廷鸾之子，咸淳（1265—1274年）中举漕试第一。入元后历任慈湖、柯山书院山长、台州儒学教授。前后用20余年时间，以杜佑《通典》为蓝本，编成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等二十四考三百四十八卷的宏篇巨帙。是杜佑《通典》的五倍，郑樵《通志》的二倍。是《通典》、《通志》后最为通博的典章制度方面的通史巨著。此为元代私人史撰中之最有名者。

另外是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二百九十四卷，亦是史注方面颇负盛名的巨著。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又字元鲁，号梅磵，宋末元初台州宁海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入元后隐居不仕。《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司

马光门人刘安世尝撰《音义》十卷，世已无传。南渡后注者纷纷，而乖谬弥甚。至三省乃汇合群书，订伪补漏，以成此注”[1]。《通鉴》自身就部帙浩繁，全书300余万字，胡注字数接近正文。举凡《通鉴》记述的赋税、职官、舆服、刑法、天文、历法、乐律、地理等典章制度和有关名物，都详加音训注释，并指出原文或其他注文的谬误。尤其是官制、地理两项，考注更为精密。“元袁桷《清容集》载先友《渊源录》称三省……释《通鉴》三十年，兵难稿三失。乙酉岁留袁氏家塾，日手抄《音注》。己丑寇作，以书藏窖中得免。按三省自序，称乙酉彻编，与桷所记正合”[2]。乙酉，为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前推三十年，为宝祐三年(1255年)，即他中进士前即已着手音注《通鉴》工作，至至元二十二年完成，历经30寒暑。虽非史作，但音注中随处可见他对史实、史法的评论，及忧国忧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情怀。不是史作，胜似史作。而对于《通鉴》进行补作和续作的，元初则有金履祥的《通鉴前编》十八卷，元末则有陈桱的《通鉴续编》二十四卷。前者上起唐尧，下接《通鉴》，补写周威烈王以前事；后者第一卷述盘古至高辛，意在补金书之所未备；第二卷采契丹在唐、五代事迹，以记辽国之兴；第三卷以后则备记宋、辽、金三朝历史。意在使《通鉴》真正成为自盘古开天，直到元以前的编年通史。其用心不为不善。

对旧史改造方面，有元初郝经《续后汉书》九十卷。其书意在改陈寿《三国志》，变刘蜀为正统，以曹魏在闰位。这是王朝统绪上的改变。其重要价值在于特立了疆理、职官、食货等八录为志，补了《三国志》的缺憾。其余如王鹗的《汝南遗事》、刘敏中的《平宋录》、权衡的《庚申外史》、刘佶的《北巡私记》等，也是较有名的别史杂史。

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是元代杰出的史部传记之作。所记人物起木华黎，终刘因，凡47人的传记行实在书中都有翔实记载。“《元史》列传亦皆与是书相出入，足知其不失为信史矣”[3]。

【1】《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资治通鉴提要》。

【2】《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资治通鉴提要》。

【3】《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元朝名臣事略提要》。

还有元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也是一部非常著名的传记性史作。原本凡十卷，录397人。文房字良史，西域人。以一个少数民族文人，有这样不朽的著作，难能可贵。

元代史部著述中，还有地志与行纪方面较有成就。官修的《元一统志》一千三百卷，超迈前代，开启未来，前已叙述。私家撰写的全国性总志，则有虞应龙的《统同志》、萧㪺的《九州志》、郝衡的《舆地要览》、滕宾的《万邦一览集》、朱思本的《九域志》，还有佚名氏著的《元混一方舆胜览》等，这一点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成就突出。这跟元朝的大一统有关。

元代郡县方志之纂修，约有160种。其中浙江为最多，约有29种。奉化至元时修一次，延祐时又修一次。其次是江苏、江西、湖南、安徽、云南各有10余种。广东有《南海志》、潮州有《三阳图志》。今存者有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大德《昌国州图志》、至元《嘉禾志》、至正《金陵新志》（图54）、至顺《镇江志》（图55）、至正《昆山志》、至正《重修琴川志》、大德《南海志》等。另外还有李好文的《长安志图》、骆天骧的《新编长安志》、王桢的大德《旌德县志》等私人纂修或主持纂修的方志。此外还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等行记。

上述仅是举例，挂一漏万，无以概全。

元人之撰述，由于《元史》无《艺文志》，

图54
元至正四年集庆路儒学溧阳溧水州学刻本《至正金陵新志》

图55
清张金吾爱日精庐抄本至顺《镇江志》

向难窥其全豹。清钱大昕广辑元代文人著述，得经部著述804种，史部477种，子部763种，集部1 098种，总算给人一个具体概念。然于盛极一时的元曲之作，则付阙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的序文中曾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记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感焉。"王国维之论，颇有见地，它提醒人们注意元人在这方面的创作成就。

元代是杂剧和散曲创作的黄金时代，作品极为丰富。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酷爱元人院本，自言："'箧中收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种。'……长兴臧懋循家藏杂剧多秘本，又从麻城刘延伯家得抄本杂剧二三百种。刘氏录之御戏监，与坊本不同。臧氏参伍校订，摘其佳者百种，分前后集刊行，通称《元人百种曲》，或称《元曲选》。"[1] 已可证明元人杂剧著述之盛。关汉卿的《窦娥冤》、《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新刊关目诈妮子调风月》、《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新刊关目闺怨佳人拜月亭》、《杜蕊娘智赏金线池》、《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望江亭中秋切鲙旦》、《温太真玉镜台》、《单刀会》、《刘夫人庆赏五侯宴》、《邓夫人苦痛哭存孝》、《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山神庙裴度还带》、《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尉迟恭单鞭夺槊》、《状元堂陈母教子》等，都是很有名的杂剧。其他如马致远的《新刊的本泰华山陈抟高卧》、《新刊关目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孟浩然踏雪寻梅》、《江州司马青衫泪》、《半夜雷轰荐福碑》、《开坛阐教黄粱梦》；王实甫的《四丞相歌舞丽春》、《吕蒙正风雪破窨记》，也都很有名。还有王伯成、宫天挺、郑廷玉、尚仲贤、石君宝、张国宾、郑光祖、孔文卿、孟汉卿、杨梓、狄君厚、高文秀、范康、岳伯川、武汉臣、金仁杰、费唐臣、白朴、郑德辉、李文蔚、史樟、秦简夫等一大批作家，都有杂剧作品行世。使杂剧创作成了一时

【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304页。

时尚，一代风气。这是元代特有的著述，是有元一代文学的主流。国家图书馆所藏元刻本《古今杂剧》30种，明抄本《古今杂剧》224种，明万历刻本《元曲选》100种，是这方面代表性的出版品。元杂剧对明代的戏剧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代著述是一代出版的基础。出版固不只出版当代人的著作，也出版以前的著作。但以前的文化积淀，既靠再版而流传，也因长期无再版价值而被淘汰。而当代著述，凡有创新者必会得以正式出版，汇入书流，注入书海。所以出版肩负着文明的承传，智慧的积累，意识的物化，思想的张扬。以下所要阐述的元代刻书出版概况，能反映出这些特点。

# 第十五章　元代的出版机构与出版概况

## 第一节　元代的官方出版机构与出版概况

### 一、元代中央官署的出版概况

现代概念的出版主体，指的是出版家、出版社、出版者，其职责是为著作的出版而进行编辑加工、投资、主持。至于每部文稿编辑加工后发到哪个印刷厂去排版、印刷、装订，则无干出版者的固有身份。古代也一样，中央官署的出版物不一定就刻印在本官署，此风宋代已然。元代中央官署的著述而下各路儒学雕版印刷者，事例颇多。这就如同现代出版社同印刷厂之间的关系一样，拿到哪儿去雕版印刷，不影响出版主体的身份性质。讲明这重关系，有利于元代中央官署出版的表述，更能给人清晰的概念。

（一）兴文署的出版

元代“朝廷于京师创立兴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厚给禄廪，召集良工剡刻诸经、子、史版本，流布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可为识时事之缓急，而审适用之先务云云”[1]。可证兴文署一创立就在北京，且专司刻书出版事务。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称：“至元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太保大司农奏过事内一件：‘兴文署掌雕印文书，交属秘书监呵，怎生？奉

【1】《天禄琳琅书目》卷五《资治通鉴》叙录。

圣旨，那般者，钦此。'”可知兴文署之设最晚不会晚于至元十年(1273年)，因为这一年已由太保大司农奏请交由秘书监管理了。其职掌是在秘书监的统辖之下专事雕印出版文书。“本署元设官三员，令一员，丞二员，校理四员，楷书一员，掌纪一员。事故官一员杨时煦，校理二员，今改大都儒学教授孙奂、刘震；现任官二员，署令马天昭，署丞王鼎；校理二员，李嘉、古申；楷书吕最，掌纪赵谦；雕字匠花名计四十名，作头一名，匠三十九名；印匠十六名。”可证在秘书监辖属时期的兴文署有官12名，刻字工人40名，印刷工人16名，总共68名，已颇具规模。至元十三年十二月，中书省奏：“奉圣旨，省并衙门，内兴文署并入翰林院，王待制兼管。有印造每年历日事务，拨附秘书监亲管。王待制牒保都作头董济于本监依旧勾当。”[1] 又可证兴文署归秘书监领属只有三年，便并入了翰林国史院。但印制每年的历书事宜仍留属秘书监，都作头董济亦留在秘书监依旧勾当。亦证明秘书监时期的兴文署，还专司印制每年历书事宜。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己酉，刊行蒙古畏吾儿字所书《通鉴》”[2]。这是兴文署为翰林国史院领属时刻书出版的例证。蒙古新字是八思巴创制的，畏吾儿字是回鹘文的新字，回鹘乃西夏中的一族，虽国度为蒙古所灭，其人却助蒙古人又灭了南宋，故特受蒙古统治者依重。兴文署非但刻印汉字《资治通鉴》，还刻印蒙古畏吾儿字《通鉴》，可见当时于史鉴之书是何等的重视。《元史·世祖本纪·九》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月己酉，“刊行蒙古畏吾儿字所书《通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至元二十二年，翰林国史集贤院分立，又单设集贤院，下辖国子监、国子学和兴文署。兴文署又成了集贤院国子监下的一个机构，掌提调学生饮膳及文牍簿书之事，设署令、署丞、典簿等官。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正月，“复立兴文署，掌经籍板及江南学田钱谷”[3]。职权范围显然有所扩大。“至元二十七年正月，立兴文署，召集良工刊刻诸经、子、史，以《通鉴》为起端”[4]。可见复立后的兴文署，仍以刻书出版为事。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元代兴文署是元政府中央机构中典型的

【1】[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七。

【2】《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

【3】《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十三》。

【4】[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七。

刻书出版机构，也是当时北京的专门刻书出版机构之一。

据《元史·世祖本纪·六、七》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庚子，“宋主（赵）率文武百僚诣祥曦殿，望阙上表，乞为藩辅。……丁未，诏谕临安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曰：‘……百官有司、诸王邸第、三学、寺、监、秘省、史馆及禁卫诸司，各宜安居。……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一看便知是稳定人心的诏谕。“三月丁卯，……伯颜入临安，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暨郊天仪仗，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图书、祭器、乐器等物。”十五年四月庚辰，“以许衡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板刻至京师。”可见蒙古族上层还是很重视萧何入咸阳专收户口图籍所保留下来的优良传统的，于宋主投降后两度派人入临安搜罗图籍乃至印书版片。这些板片运至大都后，大概也是归兴文署管理，只是不清楚用这些旧版片又印什么书没有。依常理推之，应当是印过。因为朝代更迭之初，这是常事。

（二）艺文监广成局的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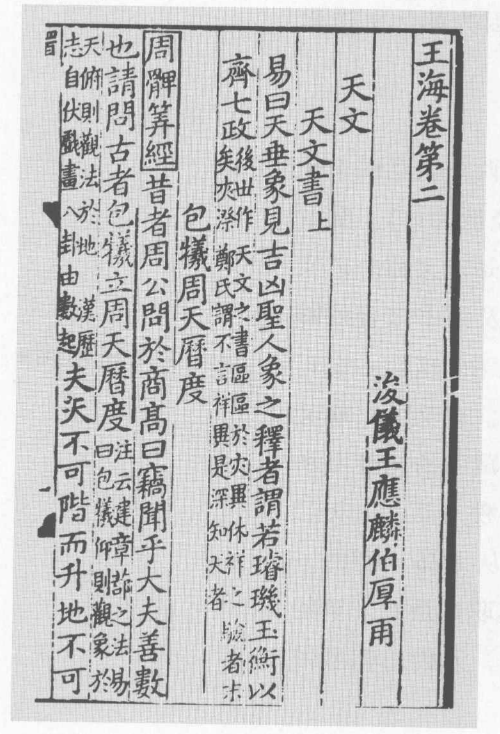
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始于大内兴圣殿西立奎章阁学士院，由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纂修《经世大典》。奎章阁学士院下辖两个机构，一个是群玉内司，一个是艺文监。艺文监秩从三品，其职掌是：“专以国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雠者俾兼治之。”[1] 后至元六年十二月，又改艺文监为崇文监。至正元年（1341年）三月，又奉旨由翰林国史院领属。艺文监下面又辖3个机构，即专司品定书画的监书博士、专管藏书的艺林库和专司刻印经籍的广成库。广成库也称为广成局，秩七品，天历二年随奎章阁学士院成立而成立。设大使一员，从七品，副使一员，正八品；直长二人，正九品；司吏二人。其职责是专“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其实广成局不仅传刻经籍，元代历朝皇帝的圣训也由广成局刻印出版。

【1】《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四》。

（三）国子监的出版

元代国子监属集贤院。集贤院，秩从二品。初属翰林国史集贤院，至元二十二年集贤院从翰林国史集贤院中分出独立，专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归它管。其下辖两个机构，一个是国子监，一个是兴文署。这时的兴文署秩从六品，置署令一员，以翰林院修撰兼之；署丞一员，以翰林院应奉兼之。至治二年（1322年）罢置兴文署，只置典簿一员，从七品，掌提调诸生饮膳与凡文牍簿书之事。可见集贤院领属时期的兴文署，不再是中央官署中专门的刻书出版机构了，与元初秘书监领属时期的兴文署，性质执掌有了很大变化。集贤院下的国子监置祭酒一员，从三品；司业二员，正五品，掌学校之教令。监丞一员，正六品，专领监中事务。典簿一员，令史二人，译史、知印、典吏各一人。国子监历来是作养之地，先王治道，先圣善教，先儒正学，都在传习之列，故历来兼事刻书出版。如延祐三年（1316年）国子监所刻之小字本《伤寒论》十卷，后至元六年国子监牒呈中书省批准，下浙东道宣尉使司都元帅府分派庆元路儒学召工镌刻的《玉海》二百卷(图56)、《辞学指南》四卷、《诗考》一卷、《地理考》六卷、《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汉制考》四卷、《践阼篇集解》一卷、《周易郑康成注》一卷、《姓氏急就篇》二卷、《急就篇补注》四卷、《周书王会补注》一卷、《小学绀珠》十卷、《六经天文篇》二卷、《通鉴答问》五卷等，都可算作元代国子监出版之书。可证元朝的国子监也是中央官署中重要的刻书出版机构。以刻印出版宋王应麟的《玉海》为例，即可看出元代国子监的出版职能。

图56
元后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刻本《玉海》


玉海卷第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天文
天文書上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釋者謂若璿璣玉衡以
齊七政
包犧周天曆度
周髀算經　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
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
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

后至元三年（1337年）十一月有一篇《元

刻玉海指挥》，录在《玉海》卷前，谓："皇帝圣旨里，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元帅得至顺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准国子监牒，据国子学呈准，博士赵承德关，窃见故宋尚书王厚斋著书一部，名曰《玉海》，纂辑百家，博综众理，用功精深，有补后学。虽尝传录于世，至今未曾刊行。如令所属学、院于学粮内置备笔札，就于其家真谨抄录发来，以凭施行。准此，行下庆元路依上抄录，解赴国子监收管外，至顺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据本道经历司呈备准都事牟承事……又据庆元路申备儒学申准前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程从仕牒：窃见故宋尚书厚斋王先生著述《玉海》、《困学纪闻》等书，凡三十种，皆有功于学者。其《玉海》一书二百卷，凡文献典故、制度名物见于经史子集，传注百家，悉加搜辑成编，钩玄摘要殆无遗者，可谓天下古今希有之奇书。上可备朝廷礼官之讨论，下可资学校士子之考索。若不刊行，深恐湮没，有负国家兴崇文教之美意……。"[1] 如此重要的一部类书，从至顺三年（1332年）准国子监牒文，下庆元路于本路儒学钱粮内各出赞助进行抄录、校勘、付梓，直至后至元六年（1340年）四月刻印出版，前后历时8年。从出版者的角度看当属国子监，原因是最初就是准国子监牒文起事，待由派官即王应麟孙王厚孙家抄录《玉海》全帙又解赴国子监收管，直到最后由看详所看详（即审查），都还控制在中央官署，所以本质上应属中央官署出版。另外，国子监还于元延祐间修补宋版重印过《国语》二十一卷、于泰定三年（1326年）刻印出版过《监本附释音十三经注疏》三三五卷。

（四）其他局院台司的出版

印历局的出版：太史院的职掌，前边在谈及中央官署的职能修撰时已涉及一些出版，此处则从出版机构的角度专谈太史院下属印历局的出版事宜。印历局属太史院。至元十五年（1278年）始置太史院，有太史令官七员。至大元年（1308年）升从二品，设官十员。延祐三年升正二品，设官十五员。后分职设官，各司其事。其中有掌历二员，正八品；腹里印历勾管一员，从九品；各省司历十二员，正九品；印历勾管二员，从九品。专掌天文历

[1]《玉海》前附《元刻玉海指挥》，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12月影印光绪九年浙江书局本。

数之事。院下有印历局，专事印造每年历书。时令历书，关乎观天象，察时变及农事，稍乖敬授，便被视为大事，所以历来政府严禁私造。元政府为了制止私印历书，不但设院立局，统一印制，还规定“诸告获私造历日者，赏银一百两。如无太史院历日印信，便同私历造者，以违制论”[1]。可见元代历书的印造是由太史院及其特置印历局垄断的。

【1】《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诈伪》。

太医院的出版：太医院，掌医事，制奉御药物，领各属医职。中统元年（1260年）置宣差，提点太医院事。至元二十年改为尚医监，秩正四品，设官十六员。以后额员不断增加，职掌细密。其下辖广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还在广惠司下分设了大都、上都回回药物院，秩从五品，专掌回回药事。与广惠司平行，还有御药院、御药局、行御药局、御香局、大都惠民局、上都惠民司、医学提举司、官医提举司等医药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主要管皇家医疗，但为表示惠民，有时也刻印医书、药书、方剂。大德四年（1300年）太医院刻印的《圣济总录》便是这方面的实例。（图57）


大德重校聖濟總録卷第二十一
傷寒門
傷寒可汗　傷寒可下
傷寒可吐　傷寒可温
傷寒過經不解
傷寒統論
論曰風寒暑濕飲食勞倦皆能爲病是謂五
邪冬傷於寒者春必病温春傷於風者夏必
飧泄夏傷於暑者秋必痎瘧秋傷於濕者冬
必欬嗽是乃四時之氣也然五邪所中雖不
同本皆外邪大率同類唯冬時嚴寒其毒厲
尤甚人或中之病在冬時則正名傷寒若邪
毒藏於肌膚至春之時乘温而發者爲温病
若留連日久至夏之時乘盛暑而發者爲暑
病所謂先夏至日爲病温後夏至日爲病暑
是也其病傳之次先客於太陽其病令人頭

图57
元大德三年至四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刻本《大德重校圣济总录》

御史台的出版：御史台是元代最高的监察机构，至治元年（1321年）却也根据监察御史的呈请，申报中书省，经礼部议准，委托江浙、江西行中书省刻印出版过王恽的《秋涧先生大全集》五十卷。至正八年（1348年）御史台又根据监察御史段弼、杨惠、王思顺、苏宁等呈请，申报中书省，送礼部议准，委托江浙省，发各路儒学刻印出版过宋褧的《燕石集》十五卷。此是元代御史台刻书出版的实例。

司农司的出版：元世祖即位后，诏天下崇本抑末，十分重视农业，特意成立司农司，以专管农桑。至元十年，也就是元朝定鼎确立全国政权后的第三年，司农司便官撰《农桑辑要》七卷，刊板颁行。初为小字本，读者不便，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又诏江浙省臣端楷大书，刻印1万部。英宗、文宗时亦一再申命颁布。至顺三年（1332年）又刻印万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司农司又刻印颁行《农桑杂令》。可见司农司也是刻印出版本专业书籍的机构。

徽政院的出版：元代徽政院最初和崇政院或詹事院交替立罢。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将詹事院之钱粮选法工役，悉归太后位下，改为徽政院以掌之。元统元年（1333年）十二月，依太皇太后故事，为皇太后置徽政院，设立官署三百六十六员。显然这是为皇太后服务的内廷官署。一成皇太后，意味着其子已当皇帝，自己则不再行枕边政治，然地位甚高，常以理佛行善为事。后至元二年（1336年）徽政院校刻出版《元官版大藏经》六千五百一十卷，盖即太后理佛为功的产物。近年国家图书馆有零帙入藏。

这种实例，在元代举不胜举，可以看出元代中央不少官署都兼事刻书出版，这种体制显然是宋代刻书体制的继续。“元时书籍，并由中书省牒下诸路刊行”[1]。“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2]。这指的应当是官方出版，私宅、坊肆所出版的书并没有这么严格的管理。而且就是官方刻书出版，也并不都是由中书省批准，而是根据不同书的不同情况，由各个

【1】《天禄琳琅书目·茶宴诗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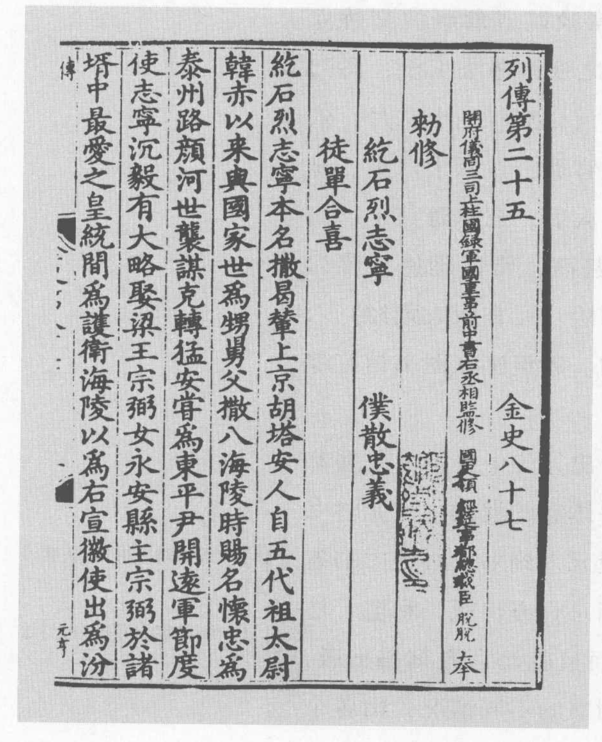
【2】［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

不同机关分别审批。

元朝的中书省是国家的政务中枢，或说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其职责是“典领百官，会决庶务”。最高长官为中书令，常以太子兼领，班在一切臣僚之上。其次则为左右丞相，“统六官，率百司，佐天子理万机”。中书省直辖山东西部及整个河北、山西，谓之腹里。而以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11个行中书省，分辖全国185路，33府，359州，1 127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它就都有了指挥权。元时官方的刻书出版事业，之所以中书省也管，正是由于这种政权体制所决定的，是封建集权统治所必须的，也反映出元朝对刻书的管理制度是严格的。

至正五年（1345年）江浙、江西行中书省奉旨开雕《辽史》一六〇卷、《金史》一三五卷。其卷前有给江浙和中书省的牒文，称：“准中书省咨……去岁教纂修辽、金、宋三代史书……令江浙、江西二省开板，就彼有的学校钱内就用，疾早教各印造一百部来呵……钦此。”六年（1346年）刻《宋史》四九六卷，目录三卷，其卷前亦有牒文，称：“精选高手人匠就用赍去净稿，依式镂板，不致差讹。所用工物，本省贡士庄钱内应付。如果不敷，不以是何钱内放支，年终照算。仍禁约合属，毋得因而一概动扰违错。工毕，用上色高纸印造一百部，装潢完备，差官赴都解纳。”这是由皇帝直接下令编纂、刻印出版书籍的实例。国家图书馆今藏有元至正五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所刻《金史》残帙，可为证明。（图58）

图58
元至正五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刻本《金史》


列傳第二十五　金史八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紇石烈志寧　僕散忠義
徒單合喜
紇石烈志寧本名撒曷輦上京胡塔安人自五代祖太尉
韓赤以來與國家世爲甥舅父撒八海陵時賜名懷忠爲
泰州路顏河世襲謀克轉猛安嘗爲東平尹開遠軍節度
使志寧沉毅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縣主宗弼於諸
壻中最愛之皇統間爲護衛海陵以爲右宣徽使出爲汾

延祐五年（1318年），由集贤院呈请中书省，札付礼部议准，发下江西

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各路儒学，刻印出版郝文忠《陵川集》三十九卷。此为集贤院通过中书省和礼部，行各路儒学刻书的实例。

前边表述过，后至元二年（1336年）十二月初六日，翰林国史院一批人，联名推荐奎章阁授经郎苏天爵选辑的《国朝文类》，谓："如蒙准呈，宜从都省移咨江浙行省，于钱粮众多学校内委官提调，刊勒流布。"中书省议准礼部咨文，便"将《文类》检草令收管，赍咨顺带前去咨请依上施行"。最后交由江浙行省下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书吏冯谅办理。冯谅亦觉得"上项《文类》纪录著述，实关治体"。于是交由西湖书院山长"计料工物价钱，所需赡学钱，遵依省准"，移文"福建、江东两道廉访司，催促疾早支拨起发"[1]。从表面操办者看，似乎是西湖书院出版，实则是发端于翰林国史院，由翰林国史院呈准实施的，视为翰林国史院出版更为确切。

[1]《四部丛刊》初编《国朝(元)文类》卷首，又《西湖书院书目·附录》。

上述是元朝中央有关官署，经中书省札付礼部，下各路儒学刻书出版的实例，亦反映了元朝廷刻书出版管理体制的严整性。

## 二、元代地方官署的出版概况

元代地方官署出版图书常与本路儒学或当地书院联系在一起，真正能确定为地方官署所刻印出版者，为数并不是很多。现仅就可以考知的图书举例性地加以概述，以示自宋以来地方官署刻书出版的历史传统。

### (一) 行中书省的出版

元代的行政体制是中书省为中央权力机构，地方除腹里为直隶外，又在全国设11个行中书省。中书省设中书令和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政、参议中书省事等官。行中书省设丞相一员，从一品；平章二员，从一品；右丞一员，左丞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二员，从二品。至元十四年（1277年）置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十五年（1278年）并入福建行省。十七年（1280年）福建自为行省，治所在泉州。二十二年（1285年）又并入江西。二十三年(1286年）又并入江浙。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参知

政事魏天祐在福建行省任上开雕《资治通鉴》二九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至二十八年（1291年）刻成出版。此事历来被看成是元代行省出版的事例。《通鉴》最早的版本是北宋元祐年间由国子监下杭州镂板，但久已失传。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又有余姚重刻本，《四部丛刊》便以此本为主而收录。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又有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后又有宋鄂州孟太师府鹄山书院刻本。该本卷六十八末叶镌有“鄂州孟太师府三安抚位刊梓于鹄山书院”牌记，世称孟本。至元二十六年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魏天祐在福建开雕的这部《资治通鉴》便以孟本为祖本。而孟本则出于广都费氏进修堂本，而费本世称龙爪本，故福建行省出版的《资治通鉴》，乃龙爪本之再传版本，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此本的残帙。

（二）肃政廉访司的出版

肃政廉访司在元代隶属御史台。元初立提刑按察司于山东东西道、河东陕西道、山北东西道、河北河南道，不但管监察刑狱，还管劝农。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改按察司曰肃政廉访司，道也增至22道，每道都设肃政廉访司，司设廉访使二员，正三品；副使二员，正四品；佥事四员，正五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正八品；照磨兼管勾一员，正九品；书吏十六人，译史、通事各一人；奏差五人，典吏二人。这种地方官署，职责要在按察，却也从事出版活动。例如后至元五年（1339年），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根据本道廉访使苏嘉的呈请，移文扬州路总管府，照行本路儒学刻印马祖常的《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此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图59）

图59
元后至元五年扬州路儒学刻本《石田先生文集》

石田先生文集卷第一
五言古詩
都門一百韻用韓文公會合聯句詩韻
詩中有二字非元韻蓋祖常荒學不能用古韻故也延祐五年八月作
逕躬操耒耜奉身寡帷幭田居水舂碓城宿霜
鳴柝凝塵尚況寘幽賞任飄泊行歌鮮同歡起
舞真獨作嘯詠氣頗雄攀躋力或弱樛木植幢
陰醜石掀獸惡心恥婦女仁志薄游俠諾校書
揚雄官入粟卜式爵娛情愜會嗁失意被蜂蠆
佩屨侍殿陛觝牘宴館閣傭童飼棧駒賤婢占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据平江路守镇分司牒请，下平江路儒学，刻印出版宋鲍彪注的《战国策》十卷。此书今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此为肃政廉访司下各路儒学刻书出版的实例。

在元朝，这种由各道肃政廉访司发起，下各路儒学刻书的实例还可举出很多，但其中最突出最有名的要算是九路儒学所刻印出版的十七史。

大德九年，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副使伯都，以为“经史为学校之本，不可一日无之。板籍散在四方，学者病焉。浙西《十一经》有全板，独十七史未也。职居风宪，所当勉励”[1]。由于伯都的提倡，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亦以“十七史书艰得善本，从太平路学官之请，遍牒九路。令本路以《西汉书》率先，俾诸路咸取而式之。置局于尊经阁，致工于武林。三复对读者耆儒姚和中辈十有五人，重校修补者学正蔡泰亨。版用二千七百七十五面，工费具载学记，兹不重出。始大德乙巳仲夏六日，终是岁十有二月廿四日，太平路儒学教授曲阜孔文声谨书；承务郎太平路总管府判官刘遵督工；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副使伯都提调……”[2]。考元时江东道所辖为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八路，另外加一个铅山州。其实所谓九路儒学刻印十七史，路既无九路，史也未刻十七史。据现在所知：大德九年太平路儒学刻印《汉书》一二〇卷；宁国路儒学刻印《后汉书注》九十卷，《志注补》三十卷；瑞州路儒学刻印《隋书》八十五卷；建康路儒学刻印《新唐书》二二五卷，《晋书》一三〇卷，《新五代史》七十四卷；大德十年（1306年）池州路儒学刻印《三国志》六十五卷；信州路儒学刻印《北史》一百卷，《南史》八十卷。总共是七路刻印了十史，其余诸史均未付梓。此即有名的九路儒学十七史本。其中《汉书》、《后汉书》、《隋书》、《南史》、《北史》等，中国国家图书馆至今仍有珍藏。这是各道肃政廉访司刻书出版的实例。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官署刻书出版，实际不过是由其提出或接受

【1】[元]集庆路刊《新唐书跋》。

【2】孔文声元大德九年宁国路刻《后汉书跋》。

别人建议，而后下令各路儒学，从学校钱粮内支拨，投资刻印出版。这种现象宋时没有，为元代所独有。

（三）其他地方官署的出版

官医提举司的出版：我们已经知道，元代在至元九年（1272年）于太医院下设医学提举司，秩从五品，职掌为考较诸路医生课义，试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验药材，训诲太医子弟，领各处儒学。置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又在各行省设官医提举司，秩从五品，掌医户差役、词讼等。这显然是个医疗医药方面的职能部门，但也从事出版活动。如大德十年（1306年）湖广官医提举司刻印出版的《风科集验名方》二十八卷；至正三年（1343年）江西官医提举司刻印出版的元代危亦林编的《世医得效方》二十卷，便是元代官医提举司刻印出版的实例。此书后至元三年有危氏自序、四年王充耘序、五年太医院序，有至正三年陈志刻书序。序后有官医提举司牒文。目录后有衔名三行：建宁路官医提领陈志刊行；南丰州医学教授危亦林编集；江西等处官医提举余赐山校正。表明它确是官医提举司的出版物。

另外，南京路转运使司于泰定二年（1325年）刻印出版过唐吴兢的《贞观政要》十卷，至正十五年（1355年）平江郡衙刻印出版过元代周伯琦的《六书正讹》五卷，山西平阳府刻印出版过唐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所有上述这些实例，表明元代地方官署同宋代地方官署一样，也从事刻书出版活动，这是历史的沿续，传统的继承，出版的轨迹。但元代享国时间短，表现出来的刻书出版现象不如宋代普遍、量大。另外经过连年的战争和蒙古族的毁田游牧破坏，元朝的社会经济也远不如偏安的南宋，刻书出版多数于学校钱粮内凑钱付梓出版，这就导出了两个现象：一是官署刻书出版并不发达；二是造成了元代各路儒学和各地方书院刻书出版极盛的特殊现象。

## 三、元代各路儒学的出版概况

元世祖的登基诏书，就向国民做过检讨，说过去“武功迭兴，文治多缺”[1]。透出了以神武定天下，以文事治国家的信息。至元六年（1269年）秋七月，置诸路蒙古字学。至元八年（1271年）春正月，便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二十四年（1287年）立国子学于国城之东，改南城国子学为大都路儒学。设江南各路儒学提举司。二十六年（1289年）八月，置回回国子学。这是中央一级的学校。而早在中统二年（1261年）便置诸路学校官。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正月，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可见各路，特别是江南各路，都有儒学。各县亦都有县庠县学。学校乃作养人才、研习学术之地，自宋以来，都非常积极地参与出版活动，元代尤盛。

（一）江浙行省儒学的出版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所辖路三十、府一、州二、属州二十六、属县一百四十三，在元代是个非常富庶、人文荟萃的行省。据至元二十七年统计，全省有360 850户，1 834 710人。该行省儒学刻书之多，出版之活跃，盖为各行省儒学之冠。现可考知该行省儒学尝于至大元年（1308年）刻印出版过元杨桓的《六书统》二十卷、《六书统溯源》十三卷；至大间（1308—1311年）该行省儒学还刻印出版了杨桓的另一种书《书学正韵》三十六卷。至顺元年（1330年）又刻印出版元刘因的《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六卷；至大间刻印出版元程端学《春秋本义》三十卷；元统三年（1335年）刻印出版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宋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续编》二十七卷；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又刻印出版宋叶时的《礼经会元》四卷；至正五至六年（1345—1346年）又奉命先后刻印出版《辽史》一一六卷、《金史》一三五卷《目录》二卷、《宋史》四九六卷；元统三年（1335年）又重修再版宋刻《通典》二百卷；大德三至四年（1299—1300年）刻印出版《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至大元年（1308年）刻印出

[1]《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

版金元好问编、郝天挺注的《唐诗鼓吹》十卷；延祐五年（1318年）刻印出版元郝经的《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三十九卷、首一卷；元统二年（1334年）刻印出版元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二十五卷《目录》二卷；至正四年（1344年）刻印出版元任士林《任松乡先生文集》十卷；至正八年(1348年）刻印出版元宋褧《燕石集》十五卷。元时该行省儒学还刻印出版过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一个儒学在60多年内能先后出版19种1 575卷的图书，实在是应该彪炳史册，在《中国出版通史》中大书而特书。这还只是举例，尚不是其全部刻书出版的确切统计，若是全部，当更是可观。

（二）集庆路儒学的出版

集庆路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建康路。初立行御史台于扬州，既而徙杭州，又徙江州，又还杭州。二十三年（1286年）自杭州徙治建康。天历二年（1329年），文宗潜邸，改建康路为集庆路。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八，口一百七万二千六百九十。领司一、县三、州二”[1]。这个辖区，即今南京长江以南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也是富庶之地，出版活跃。现可考知者，元大德间（1297—1307年）集庆路儒学刻印出版过宋欧阳修撰、徐无党注的《五代史记》七十四卷，南朝梁顾野王撰、唐孙强增字、宋陈彭年等重修的《重修玉篇》三十卷。至顺四年（1333年）该路儒学刻印出版过元王构的《修辞鉴衡》二卷，前有至顺四年王理序，谓：“命儒学正戚君子实掌板，郑懋刻之集庆路学。”至正元年（1341年）该路儒学又刻印出版宋郭茂倩辑的《乐府诗集》一百卷《目录》二卷，四年(1344年）该儒学又联合临川路儒学、溧阳州学、溧水州学共同刻印出版元张铉等纂修的至正《金陵新志》十五卷，十年（1350年）此儒学又刻印出版宋陈旸撰、林宇冲校的《乐书》二百卷《目录》二十卷、元丁复撰的《桧亭集》九卷。该路儒学还刻印出版过元张光大撰写的《救荒活命类要》不分卷。也有8种456卷，还有一书不分卷。救荒活命早先属政治，名为荒政，利用野生植物充饥救

【1】《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五》。

命，安定社会秩序。

（三）福州路儒学的出版

“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为福州路。十八年，迁泉州行省于本州。十九年，复还泉州。二十年，仍迁本州。二十二年，并入杭州。户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八十七万五千一百二十七。领司一、县九、州二。州领二县”[1]。福州自宋代读书习文便成风气，有的四五十岁还去上学读书，且不以为耻。“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正是此地的写照。文化发达，带动刻书出版也活跃。现可考知者，该路儒学于至正七年（1347年）刻印出版过宋陈祥道所撰《礼书》一百五十卷、宋陈暘撰、林宇冲校的《乐书》二百卷《目录》二十卷及宋楼钥《正误》一卷，卷末有“至正丁亥福州路儒学教授郡人杜光大合刻礼、乐书序”。十八年（1358年）该路儒学又刻印出版最早投降元人的程钜夫的《雪楼集》三十卷，合起来也有400卷。

【1】《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五》。

（四）宁国路儒学的出版

宁国在唐为宣州，又为宣城郡，又升宁国军。宋时升为宁国府。“元至元十四年，升宁国路总管府。户二十三万二千五百三十八，口一百一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领司一、县六”[2]。仍是江浙行省的富庶之地，现可考知其于大德九年（1305年）刻印出版过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的《汉书》一百卷，南朝刘宋范晔撰、唐李贤注的《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后镌有“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宁国路儒学云教授任内刊”题记。元泰定二年(1325年)，宁国路儒学刻印出版过宋洪适《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总计也有4种268卷。

【2】《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五》。

（五）嘉兴路儒学的出版

嘉兴在唐为嘉兴县。五代石晋时置为秀州。宋为嘉禾郡，又升为嘉兴府。元升为嘉兴路，有426 656户，2 245 742人，领嘉兴县和海盐、崇德二州，乃是江浙行省的繁富之地。现可考知其于至大四年（1311年）刻印出版过唐陆贽的《陆宣公文集》二十二卷，至治元年至二年（1321—1322年）刻印出版过元王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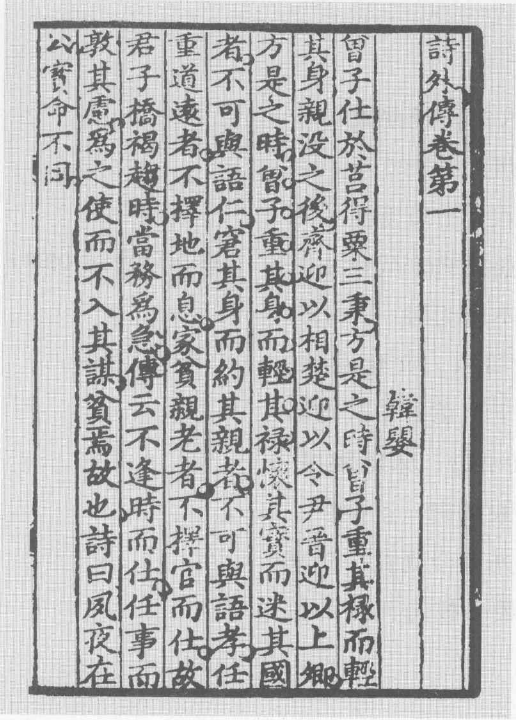

詩外傳卷第一
韓嬰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没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图60
元至正十五年嘉兴路儒学刻本韩婴《诗外传》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至治三年(1323年）刻印出版元龚端礼《五服图解》一卷，后至元四年（1338年）刻印出版元沙克什《河防通议》二卷，至正九年(1349年）刻印出版元刘因《静修先生文集》三十卷，十四年（1354年）刻印出版汉戴德辑、北周卢辩注的《大戴礼记》十三卷，晋孔晁注的《汲冢周书》十卷，十五年（1355年）刻印出版汉韩婴《诗外传》十卷（图60)，总共为8种188卷。另外还以嘉禾学宫名义，于延祐六年(1319年）修补宋宝祐版片再印之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至正六年（1346年）刻印出版秦吕不韦辑、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训解》二十六卷，总目后有镜湖遗老跋，郑元祐序后有“嘉兴路儒学教授陈泰至正六年”云云；至正十五年(1355年）刻印出版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十卷。总计11种266卷，规模相当可观。

(六）庆元路儒学的出版

庆元在唐为鄞州，又为明州，又为余姚郡。宋升庆元府。“元至元十三年，改置宣慰司。十四年，改为庆元路总管府。户二十四万一千四百五十七，口五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三。领司一、县四、州二”[1]。现可考知其于泰定二年（1325年）刻印出版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二十卷，前有至治二年（1322年）牟应龙序，泰定二年袁桷序，后有陆晋之后序。卷二十末镌有“孙厚孙、宁孙校正，庆元路儒学学正胡禾监刊”衔名二行（图61)。后至元六年(1340年）该路儒学又奉牒刻印出版宋王应麟《玉海》二百卷。王应麟本为庆元人，家乡儒学刻印出版本乡先贤遗著，自可理解。但该路儒学还于元统间刻印出版过元张养浩的《归田类稿》二十八卷，还刻印出版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十卷，这

【1】《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五》。

就不仅是本乡人的问题了，而是重视传播文化。

(七) 饶州路儒学的出版

隋于鄱阳置饶州郡，寻废。唐复置饶州郡，又改称鄱阳郡。宋曰饶州鄱阳郡。元升为饶州路，治所在鄱阳。现可考知其于元大德间(1297—1307年) 合刻出版司马迁撰、南朝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史记》一百三十卷，延祐间 (1314—1320年) 又刻印出版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还于至顺三年(1332年) 与瑞州路儒学、锦江书院合作刻印出版唐魏徵等撰《隋书》八十五卷 (图62)，总计也有3种463卷。

(八) 其他各路儒学的出版

另外还可考知：至元二十九年 (1292年) 赣州路儒学刻印出版过宋张轼的《南轩易说》三卷；大德五年 (1301年) 临江路儒学刻印出版过宋张洽的《春秋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同年又刻印出版张洽的《春秋集传》二十六卷，八年(1304年) 广州路儒学刻印出版元陈大震、吕桂孙纂修的大德《南海志》二十卷，九年 (1305年) 太平路儒学刻印出版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的《汉书》一百卷，同年，无锡州学刻印出版汉班固的《白虎通德论》十卷，十年 (1306年) 绍兴路儒学刻印出版汉袁康的《越绝书》十五卷，同年，本路儒学又刻印出版汉赵晔撰、元徐天祐音注的《吴越春秋》十卷，十一年 (1307年) 无锡州学又刻印出版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十卷，同年，平江路、嘉兴路两儒学合作刻印出版宋欧阳修等撰的《新唐


困學紀聞卷之一　浚儀　王　應麟　伯厚甫

易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慮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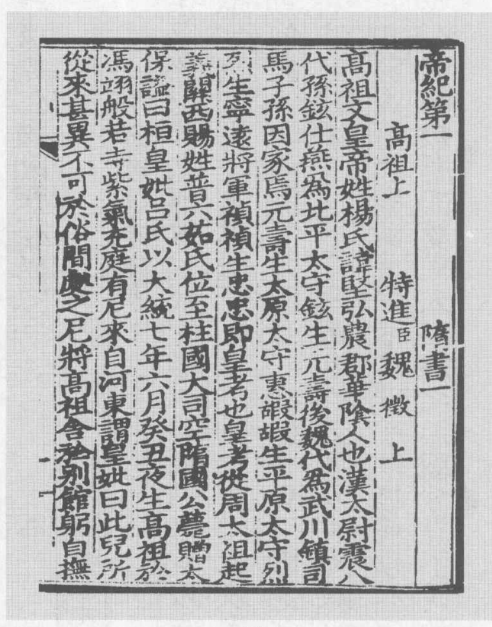
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為誠脩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

辭非心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

图61
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刻本《困学纪闻》


隋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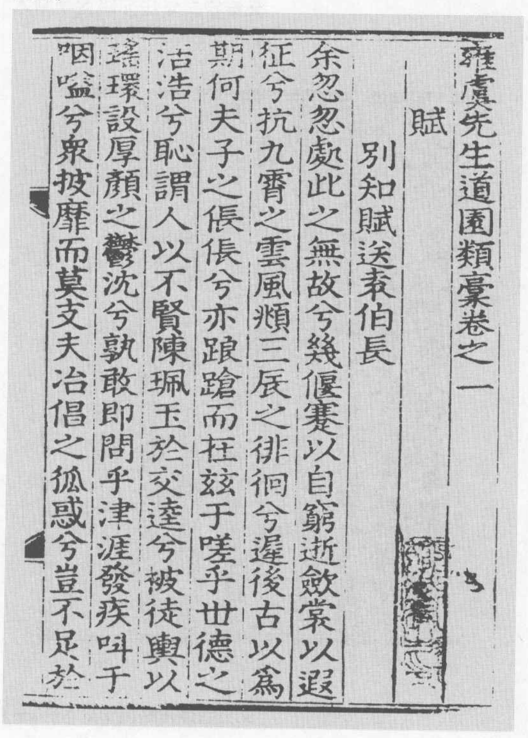
帝紀第一　高祖上　特進臣魏徵上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鉉仕燕為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後魏代為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薨贈太保諡曰桓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

图62
元大德饶州路儒学刻本《隋书》

书》二百五十五卷，同年，庐陵学宫刻印出版宋郑汝谐的《东谷郑先生易翼传》二卷；大德间，龙昌路儒学还刻印出版过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一百三十卷，杭州路儒学刻印出版过《梁皇宝忏》；皇庆二年（1313年）武昌路儒学刻印出版过元王申子《大易辑说》十卷；至治二年（1322年）福州路三山郡庠刻印出版宋郑樵《通志》二百卷；泰定元年（1324年）龙兴路儒学刻印出版唐长孙无忌等撰的《唐律疏义》三十卷；同年，杭州路儒学刻印出版元龚端礼的《五服图解》一卷；四年（1327年）龙兴路儒学又刻印出版王叔和《脉经》十卷；天历二年（1329年）平江路儒学刻印出版元陆森编集的《五灵聚义》五卷；后至元元年(1335年）漳州路儒学刻印出版宋陈淳《北溪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外集》一卷；三年（1337年）婺州路儒学刻印出版元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十卷；五年(1339年）中兴路儒学刻印出版宋沈棐《春秋比事》二十卷；同年，扬州路儒学刻印出版元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至正二年（1342年）四明郡庠刻印出版元曾先之《十九代史略》十八卷；五年（1345年）抚州路儒学与临川郡学合作刻印出版元虞集《雍虞先生道园类稿》五十卷（图63）；六年（1346年）江北淮东道儒学刻印出版元萧𣂏《勤斋集》十五卷，今存八卷；七年（1347年）杭州路儒学刻印出版元孛兰肸、岳铉等纂修《大元大一统志》一千三百卷；二十三年（1363年）平江路儒学刻印出版宋沈枢《通鉴总类》二十卷；二十五年（1365年）平江路儒学刻印出版鲍彪注、元吴师道补正重校的《战国策》十卷；二十七年(1367年）临川路儒学刻印出版唐杜佑《通典》二百卷；元徽州路儒学还刻印出版过《历代蒙求》一卷，卷前有徽州路儒学教授王萱序，又有郑镇孙序、

图63
元至正五年抚州路儒学与临川郡学刻本《雍虞先生道园类稿》


雍虞先生道園類稾卷之一

賦

別知賦送袁伯長

余忽忽處此之無故兮幾偃蹇以自窮逝斂裳以遐
征兮抗九霄之雲風瞬三辰之徘徊兮遲後古以為
期何夫子之倀倀兮亦踉蹌而在兹于嗟乎世德之
浩浩兮恥謂人以不賢陳珮玉於交逵兮披徒輿以
踰環設厚顏之鬱沈兮孰敢即問乎津涯發疾呌于
咽嗌兮衆披靡而莫支夫治倡之孤惑兮豈不足於

马速序、薛超吾序，卷末则镌“徽州路儒学学录上饶游詹校正”题记一行。总计涉及28路儒学，5所郡学，凡刻印出版图籍82种6 246卷，这还是仅可考知者，在儒学范围内可谓出版普遍，出版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元代显得特别突出。而这些能够参与出版活动的儒学，绝大部分集中在江浙、江西、福建行省，少数在湖广行省。这些地区宋代就处于刻书出版的中心地位，至元代仍不减其优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地区经济富庶，文化发达，构成元代出版业的轴心地区。

## 四、元代各地书院的出版概况

我国的书院兴于唐，成于宋，盛于元。元代书院之所以兴盛发达，与元代将书院官学化的政策紧密相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命在“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1]。这明显是将书院官学化了。并规定“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札付”[2]。也就是说中原州县书院的山长，与州县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同受礼部任命。行省所属州县书院的山长，亦与州县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同受行省及宣慰司的任命。这就从本质上将书院划归官学了。并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七月，政府下令告谕中外百司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照依世祖皇帝圣旨，禁约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于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亵渎饮宴、工役造作、收贮官物等。其赡学地土产业及贡士庄田，外人毋得侵夺。所出钱粮，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师生廪膳。贫寒老病之士为众所尊敬者，月支米粮，优恤养赡。庙宇损坏，随即完修。”[3] 也将书院视同孔庙与官学。而对书院学生的出路，亦“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

[1]［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

[2]《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

[3]《通制条格》卷五《学令》。

【1】《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

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1]。也同官学学生待遇一样。正是在这一系列政策激励下，元代书院显得格外发达。书院本为授学研习之所，故于有关学问图书的出版活动，也显得极为活跃。

（一）古迂书院的出版

古迂书院又称东山书院，陈仁子营建并讲授其中。陈仁子字同備，一作同甫，号古愚，一作古迂。衡州茶陵人。宋人陈天福之孙。博学好古，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举漕试第一。入元不仕，营别墅于湖南茶陵之东山，称东山书院，陈氏专事讲学、著述、刻书出版于其间。今可考知者，其于大德三年(1299年）以茶陵东山陈氏古迂书院名义刻印出版宋吕大临编、元罗更翁考订的《考古图》十卷，同年刻印出版陈仁子自己增补的《增补六臣注文选》六十卷；九年（1305年）又刻印出版宋沈括撰的《梦溪笔谈》，名《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二十六卷。《梦溪笔谈》在宋代有两个系统的传本，一为三十卷本，一为二十六卷本。三十卷本早已失传，无以言状。最早的二十六卷本，刊印出版于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扬州州学，卷末镌左迪功郎充扬州州学教授汤修年跋文。陈氏古迂书院刻印出版者，即以此宋本为祖本，是二十六卷本系统的传承本。开本极为宏朗，版心又极为小巧，别具特色。宋本失传后，陈氏古迂书院所刻本便成了《梦溪笔谈》现存最早的刻本。另外在元大德间（1297—1307年），陈氏古迂书院还先后刻印出版汉荀悦《申鉴》五卷、汉刘向《说苑》二十卷、宋叶梦得《叶先生诗话》三卷，及陈仁子自己编的《文选补遗》四十卷、自己撰著的《牧莱脞语》二十卷《二稿》八卷。另外还刻印出版过《韵史》二百卷、《迂褚燕说》三十卷、《唐史卮言》三十卷。还刻印出版过《古迂陈氏家藏尹文子》二卷。此本清末为孙诒让玉海楼插架之物，孙氏定为宋本，视为珍玩，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不离行篋。1975年由其后人孙孟晋捐给中国国家图书馆。总计陈氏东山古迂书院在元大德间刻印出版图籍12种454卷，且极具特色，是元代书院出版史上耀眼的

一页。

（二）西湖书院的出版

元初西湖书院山长为胡石塘，至正间为范祖干。杭州的西湖书院“创建之初，恒产阙然”，“越二年，松江瞿运使尝一再助田，合四百五十三亩四十六步，岁得米一百三十石，院中经费浩瀚。延祐戊午五年（1318年），续置杭之仁和田六十八亩一角，收米五十四石六斗，犹未及用。次年（1319年），周廉使特为劝率，有高訾乐助者，并取补刊书板，余力及以赢粮转售，共得中统钞六百余锭。于是宪府知事赵将仕与经历宋从事建议增产，力言于廉使洎阖司官，同主其说。佥曰：‘是当为者。’遂置湖州乌程、平江昆山二庄，其田十一顷二十九亩三十五步有零，岁除优放，实收米七百五十二石一斗一升五合。山地共二十一亩二角一十步，房廊一十二间，岁得租钱中统钞二定三十八两九钱八分”[1]。新建的西湖书院经过接受赠拨、自己增置，至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以后，学田已增至1 650亩1角81步，另有山地21亩2角10步可以出租，财力已十分可观，有钱刻印出版图书。现可考知者，泰定元年至四年（1324—1327年）杭州西湖书院刻印出版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后至元至至正二年（1336—1342年）杭州西湖书院刻印出版苏天爵选编的《国朝文类》七十卷《目录》三卷，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刻印出版宋岳珂的《鄂国金佗粹编》二十八卷《续编》三十卷，另外在至正间（1341—1368年）该书院还刻印出版过元程文的《蚊雷小稿》一卷、《师音集》、《黟南生集》若干卷，总计7种480余卷。实数决不止此。

[1]［元］汤炳龙：《两浙金石志》卷十五《西湖书院增置田记》。

上述元代书院刻书出版的实例还可以举出很多。据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的统计，元朝约有书院296所，其中官办的51所，民办的181所，情况不明的63所，浙江还有1所为道士所建。至今仍可考知曾从事过刻书出版活动的在50所左右，尚知刻印图籍102种3 891卷，还有6种不明其卷数。如此众多的书院若对其出版活动加以一一介绍，失之过繁，现将

徐梓先生所著《元代书院研究》一书中《元代书院刻书表》引录如次，以见元代书院出版活动的盛况。

应该说明的是，有些虽也用书院之名，但实为坊肆者也有一些。如宗文书院实际就是宗文堂，明州的梅隐书院实际就是梅隐书堂，圭山书院实际就是程庆堂，安正书院实际就是安正书堂等。这些坊肆性质的书铺子，为了使自己所刻印出版之书取信于人，获得社会的认可，从而畅销牟利，因而便将自己的书坊取名书院，以争取好的学术声誉。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元代有，宋代朱熹在建阳崇化建同文书院，便是利用朱熹的学术影响和书院固有的学术声誉而行刻书出版、畅销牟利的先例。前边说过，元代的真正书院，官学化倾向十分突出，官办的自不必说，就是私办的，其山长也有不少是由地方政府委任的，亦带有浓重的官方性质。官办固有缺乏自由的弊病，但也有经费保障的优越，所以元代书院是元代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活跃在出版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且出版之书一般来说是质量较高，书品较好的。所以清初顾炎武称："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1]

【1】[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

顾炎武所谓的"宋元刻书，皆在书院"，虽然未必是事实，但其评论书院刻书的优点，则是较正确的。以国家图书馆所藏大德九年（1305年）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所刻《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为例，即可证明这一点。此书每半面10行，行17字，白口，左右双边。开本极大，版心甚小，天头地脚极宽，蝴蝶装，别具风格。陈仁子刻书序后，仍附刻乾道二年（1166年）左迪功郎充扬州州学教授汤修年跋，说明其刻祖于宋版，所以在文字上有很多胜于通行本处。尤其是它的开本之铺陈，装帧之考究，版刻之精湛，风格之迥异，过去使人望而不解。待研究了元代书院之背景，就清楚地知道它的确是元代书院刻书的代表作品。陈仁子，号古迂，以他为山长的东山书院，注重学问，勤于校雠，可

想而知，故其所刻《梦溪笔谈》在文字上颇有优胜处。又因书院本身有钱，所以“不惜费而工精”，故此书刻印精湛，开本铺陈，装帧考究。因此，顾炎武对元时书院刻书的评论，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后人对元时书院刻书尤为重视，也是完全有根据、有理由的。现借用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的一些成果，结合自身掌握的新材料，将元代书院刻书出版概况表列于后，以见元代书院刻书之盛。

（三）元代书院刻书表

**元代书院刻书表**

| 书院名称 | 刊刻年代 | 刊刻书名 |
|---|---|---|
| 古迂书院（东山书院） | 大德三年 | 宋吕大临《考古图》10卷 |
| | 大德三年 | 唐李善等《增补六臣注文选》60卷附《诸儒议论》1卷 |
| | 大德九年 | 宋沈括《梦溪笔谈》26卷 |
| | 大德间 | 汉荀悦《申鉴》5卷 |
| | 大德间 | 汉刘向《说苑》20卷 |
| | 大德间 | 《尹文子》2卷 |
| | 大德间 | 元陈仁子《文选补遗》40卷<br>元陈仁子《牧莱脞语》20卷、《二稿》8卷<br>宋叶梦得《叶先生诗话》3卷<br>《韵史》200卷<br>《迂褚燕说》30卷<br>《唐史卮言》30卷 |
| 圆沙书院 | 延祐二年 | 宋董楷《周易程先生传义附录》20卷 |
| | 延祐二年 | 宋程颐《程子上下篇义》1卷 |
| | 延祐二年 | 宋董楷《朱子易图说》1卷、《周易五赞》1卷、《筮仪》1卷 |
| | 延祐四年 | 宋林駉《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10卷、后集10卷、续集10卷，又宋黄履翁别集10卷 |
| | 延祐四年 | 宋林駉《皇鉴笺要》60卷 |
| | 延祐七年 | 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66卷、后集65卷、续集56卷、别集25卷 |
| | 泰定二年 | 宋陈彭年等《广韵》5卷 |
| | 泰定二年 | 宋陈彭年等《大广益会玉篇》30卷 |
| | 泰定二年 | 宋潘自牧《记纂渊海》195卷 |

续表

| 书院名称 | 刊刻年代 | 刊刻书名 |
| --- | --- | --- |
| 西湖书院 | 泰定四年 |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 |
| | 至正二年 | 元苏天爵《国朝文类》70卷《目录》3卷 |
| | 至正二十三年 | 宋岳珂《金佗粹编》28卷《续编》30卷 |
| | 至正间 | 元程文《蚊雷小稿》1卷 |
| | 至正间 | 元程文《师意集》 |
| | 至正间 | 元程文《黟南生集》 |
| 宗文书院（宗文堂） | 大德六年 | 宋唐慎微《经史证类大观本草》31卷，又宋寇宗奭《本草衍义》20卷 |
| | 至顺元年 | 元刘因《静修先生文集》22卷 |
| | |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100卷 |
| | | 宋欧阳修《五代史记》75卷 |
| | | 宋陈彭年等《大广益会玉篇》30卷 |
| | | 宋陈师文《太平惠民和剂局方》10卷附宋许洪《指南总论》3卷 |
| 梅溪书院（古邢张氏） | 大德十一年 | 唐孙思邈《校正千金翼方》30卷 |
| | 泰定元年 | 元马括《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前集25卷、后集25卷、续集22卷 |
| | 泰定四年 | 元陈栎《书集传纂疏》6卷 |
| | 元统二年 | 元阴时夫撰、阴中夫注《新增说文韵府群玉》20卷 |
| | 后至元三年 | 元蒋易《皇元风雅》30卷《杂编》3卷 |
| | 后至元间 | 元王幼学《资治通鉴纲目集览》59卷 |
| 梅隐书院（梅隐书堂） | 至元二十四年 | 《明本排字九经直音》2卷 |
| | 至正十二年 | 《魁本大字详音句读周易》2卷 |
| | 至正间 | 《魁本大字详音句读毛诗》6卷 |
| | 至正间 | 《魁本排字通并礼部韵注》5卷 |
| | 至正间 | 《魁本足注释疑韵宝》5卷 |
| | | 宋蔡沈《书集传》6卷 |
| 梅溪书院（平江刘氏） | | 宋郑思肖《郑所南先生文集》1卷 |
| | | 宋郑思肖《百二十图诗》1卷 |
| | | 宋郑思肖《锦残余笑》1卷 |
| | | 宋郑起《清隽集》1卷 |
| 紫阳书院 | 至元二十五年 | 宋魏了翁《周易集义》64卷 |
| | 至元二十五年 | 宋魏了翁《周易要义》10卷 |
| 虚谷书院 | 大德三年 | 元释园至《筠溪牧潜集》 |
| | 大德九年 | 元释园至注《笺注唐贤三体诗法》20卷 |
| 临汝书院 | 大德十一年 | 唐杜佑《通典》200卷 |
| | 至正初年 | 《临汝书院兴复南湖诗》 |

续 表

| 书院名称 | 刊刻年代 | 刊 刻 书 名 |
|---|---|---|
| 环溪书院 | 大德间 | 宋杨士瀛《新刊仁斋直指方》13 卷 |
| | 大德间 | 宋唐慎微《经史证类大观本草》31 卷 |
| 建阳书院 | 大德间 | 宋林駉《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 10 卷、后集 10 卷、续集 10 卷、别集 10 卷 |
| | 至正八年 | 《千家注分类杜工部集》25 卷 |
| 屏山书院 | 至正二十年 | 宋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52 卷 |
| | 至正二十年 | 宋刘学箕《方是闲居士小稿》2 卷 |
| | | 宋刘子翚《屏山文集》 |
| | | 《传忠录》 |
| 南山书院 | 至正二十六年 | 宋陈彭年等《广韵》5 卷 |
| | 至正二十六年 | 宋陈彭年等《大广益会玉篇》30 卷 |
| 安正书院（安正书堂） | 后至元六年 | 元萧士《分类补注李太白诗》25 卷 |
| | 至正元年 | 宋陆九渊《象山先生文集》28 卷《外集》4 卷 |
| 雪窗书院 | | 晋郭璞《尔雅注》3 卷 |
| | | 宋邢昺《尔雅注疏》11 卷 |
| 杜洲书院 | | 《袁氏蒙斋孝经》<br>《耕织图》 |
| 兴贤书院 | 至元二十年 | 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45 卷 |
| 师山书院 | 至元间 | 元郑玉《春秋经传阙疑》45 卷 |
| 明道书院 | 大德间 | 《释音》25 卷 |
| 泳泽书院 | 后至元间 | 魏何晏《论语集解》10 卷 |
| | 后至元间 | 宋朱熹《论语或问》2 卷 |
| 广信书院 | 大德三年 | 宋辛弃疾《稼轩长短句》12 卷 |
| 中溪书院 | 大德间 | 宋朱熹《周易本义》附录集注 11 卷 |
| 九峰书院 | 至大间 | 金元好问《中州集》10 卷、《乐府》1 卷 |
| 阳平书院 | 皇庆二年 | 元祝明《声律发蒙》2 卷 |
| 苍岩书院 | 泰定元年 | 元王广谋《标题句解孔子家语》3 卷 |
| 武溪书院 | 泰定三年 | 宋祝穆《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 60 卷、后集 50 卷、续集 28 卷、别集 32 卷，又元富大用新集 30 卷、外集 15 卷、遗集 15 卷 |
| 龟山书院 | 至顺四年 | 宋李心传《道命录》10 卷 |
| 椿庄书院 | 至顺间 | 宋陈元靓《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前集 13 卷、后集 13 卷、续集 8 卷、别集 8 卷 |
| 连鳌书院 | 至正七年 | 元高耻传《群书钩玄》12 卷 |
| 圭山书院 | 至正八年 | 宋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25 卷《文》2 卷 |
| 建安书院 | 至正九年 | 元赵居信《蜀汉本末》3 卷 |

续 表

| 书院名称 | 刊刻年代 | 刊 刻 书 名 |
|---|---|---|
| 崇川书院 | 至正十一年 | 元李廉《春秋诸传会通》24 卷 |
| 鳌峰书院 | 至正十三年 | 元熊禾《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7 卷 |
| 鄞江书院 | 至正十四年 | 元毛直方《增广事联诗学大成》30 卷 |
| 豫章书院 | 至正二十五年 | 宋罗从彦《豫章罗先生文集》17 卷 |
| 化龙书院 | | 宋刘爚《云庄刘文简公文集》12 卷 |
| 龙山书院 | | 晋杜预撰、唐陆德明释文《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30 卷 |
| 凤林书院 | | 元凤林书院编《精选名儒草堂诗余》3 卷 |
| 桂册书院 | | 宋宋咸注《孔丛子》7 卷 |
| 鳌溪书院 | | 《鳌溪群诗选》 |
| 石峡书院 | | 《石峡书院诗》 |
| 象山书院 | 大德十年 | 三书院及稼轩书院（即广信书院）与信州路儒学、上饶县学、玉山县学、弋阳县学、贵溪县学、永丰儒学合刻唐李延寿《北史》100 卷 |
| 道一书院 | | |
| 蓝山书院 | | |
| 初庵书院 | 至顺三年 | 四书院与瑞州路儒学、饶州路儒学合刻唐魏徵等《隋书》85 卷 |
| 长芗书院 | | |
| 忠定书院 | | |
| 锦江书院 | | |

书院刻书，是元代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元代整个出版业的重要特点，它有点类似其后明代的藩府刻书，构成了一代出版的特殊角色。

## 第二节　元代的民间出版概况

前边说过，元朝统治者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和统一全国之后，对当时中国的各族人民，尤其是对汉人和南人，实行了野蛮的、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镇压，使很多无辜的民众残遭杀害。但有一条，就是对各行各业的工匠，在屠杀中可免于死。虽然他们在身份上难免沦为奴隶，但究竟保全了性命，所以为整个社会还是保存了一定的技术力量和基础。其中包括刻书出版。自宋代以来雕版印书就很发达的江浙、福建与江西，在这一政策的保护下，一些刻书的私宅与坊肆，也就得以维持和发展。而且在它们

的影响下，一些新的刻书出版企业还不断产生，从而又繁荣了元代社会的刻书出版事业。

## 一、元代私宅的刻书出版概况

### （一）元代的私宅刻书出版

耶律楚材（1190—1244）是蒙古时期有名的才相。他本为辽东丹王的八世孙，金右相耶律履之子，深得蒙古太祖、太宗的信任。丁亥（1227年）破汴后蒙古人大事收集经籍和书籍版片至燕都，就是由于他的建议。蒙古时期用旧版片刷印的一些书，就是在燕京进行的，这可以视为元朝早期在北京进行的印书出版活动。耶律楚材是金末万松老人行秀和尚的入室弟子，笃信佛教。甲申年（1224年）他虽西行在西域阿里马城（今新疆霍城县永定镇西北），仍致函身在燕京的法弟从祥，让他主持刊印其师万松老人的《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耶律楚材西游万里，著有《西游录》，专记西北山川地理、风土人情，是研究西北地理及中西交通的重要典籍，己丑年（1229年）的元旦刊于燕京私邸。己丑时耶律楚材已为宰相之副，故该书末有镌书题记“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字样。元朝中央机构是中书省，中书省最高长官是中书令。中书令通常由皇太子担任。设右丞相、左丞相各一人，秩正一品，是中书省的实际长官。这里的中书侍郎，实际就是副中书令，亦即副首相。可证耶律楚材的私宅刻印过《西游录》。可能还刻印出版过他自己的《心经宗说》。太宗三年（1231年），耶律楚材升为中书令，即首相，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又在甲午年（1234年）于燕京刻印出版了其师行秀和尚所著的《释氏新闻》。耶律楚材的朋友李屏山著有《楞严外解》，蒙古骑兵攻克汴梁时，其子李仝携其父遗稿跑到燕京，万松老人又出资锓木，刊行于世，耶律楚材为之序。可见燕京早在蒙古时期就兴私宅刻书出版。

早在蒙古族贵族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就很注重尊经崇儒、举贤招隐。虽然其主观动机是为了政治，但于客观上，无

论是对于抬举儒家，或是对于提倡社会文化，都还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元朝著名的大儒、宋代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姚枢和许衡，就都早在太宗时被聘为上宾，成为元朝高级统治集团中运筹帷幄的人物。

太宗七年（1235年），蒙古大军挥师南下，诏姚枢与杨惟中一道，于战争中寻求儒、道、释、医、卜等人才。等到大军攻破德安，寻找到名儒赵复，并因他而得到了程颐、朱熹之书。太宗十三年（1241年）赐姚枢金符，让他做了燕京行台郎中。会蒙古族牙鲁瓦赤行台徇私舞弊，枢因弃官。“遂携家来辉，垦荒苏门，粪田数百亩，修二水轮，诛茅为堂……又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版小学书、《论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版《四书》；田和卿尚书版《声诗折衷》、《易程传》、《书蔡传》、《春秋胡传》，皆脱于燕。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板，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1]。这是元朝定鼎之前就有私人私宅刻书出版的又一实例，也是现知北京及河南辉县刻书出版的较早记载。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姚枢还请他的弟子杨古“为沈氏活板”，摆印《小学》书及《近思录》、《东莱先生经史论说》。这里所谓的“为沈氏活板”，指的应当就是按照宋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毕昇的泥活字摆版印书的方法。因此，姚枢和杨古当是在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之后二百年，又一次大胆进行实践，而且是搞成功了的人。他们比清代李瑶仿毕昇之法，用泥活字排版印刷《南疆绎史》、《校补金石例四种》，及翟金生仿毕昇之法，用泥活字摆印《泥版试印初编》、《翟氏宗谱》、《仙屏书屋诗集》等书，大约要早六百年；比元代王桢用木活字排版印制《旌德县志》也要早半个世纪。因此，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尤其是印刷出版史上，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元朝统一全国之前，在蒙古族的管辖范围之内，印刷出版事业上出现的一件大事。虽然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也无法窥其风貌，更无法描绘其版式特征，但这是历史的事实。

蒙古壬寅年即乃马真后元年（1242年），山东曲阜阙里孔元

【1】[元]姚燧：《牧庵集》卷十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措在家乡据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年）所刻《孔氏祖庭广记》再行刻印出版。此本有插图12幅，底稿为太学生马天章所画，浮光季噺镌刻，极为精美。亦是元朝定鼎前私宅刻书出版之实例。

蒙古定宗二年（1247年）析城郑氏家塾刻印出版宋聂崇义集注《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二十卷。该书首题“析城郑氏家塾重校”，卷末“长南阳山王履重刊”，后题“久藏是图，欲刊之梓，家贫未能。丙午，讲《易》于葛庐，王文举谋之大将军郑侯。郑侯不忘乎旧，能成故交之心。”丙午，即蒙古定宗二年。葛庐，即诸葛草庐。长南阳山，盖即南阳书院山长。析城，即邓州之淅川。邓州即南阳。此亦是元朝定鼎之前私宅刻书出版的实例。（图64）

图64
蒙古定宗二年析城郑氏家塾刻本《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

蒙古宪宗六年（1256年），赵衍刻印出版唐李贺的《歌诗编》四卷，版印极精。赵衍行实不详。《元史·耶律希亮传》记载：“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孙，铸之子也。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归铸，生希亮于和林南之凉楼……。宪宗尝遣铸覈钱粮于燕，铸曰：‘臣先世皆读儒书，儒生俱在中土，愿携诸子至燕受业。’宪宗从之。乃命希亮师事北平赵衍。时方九岁，未浃旬，已能赋诗。岁丙辰，宪宗召铸还和林，希亮独留燕。”由此可知赵衍乃北平人，是耶律希亮的老师。盖亦硕学鸿儒而又长于诗者，否则耶律希亮不能那么快就会赋诗，也不会专门刻印出版李贺的《歌诗编》。此书赵衍后序称：“龙山先生为文章，法六经，尚奇语，诗极精深，体备诸家。”“龙山入燕，吾友孙伯成从之学。余继起海上，朝夕侍侧，垂十五年，诗之道颇得闻之。”“双溪中书君，诗鸣于世，得贺最深。尝与龙山论诗及贺，出所藏旧本，乃司马温公物也，然亦不无少异，龙山因之校定，且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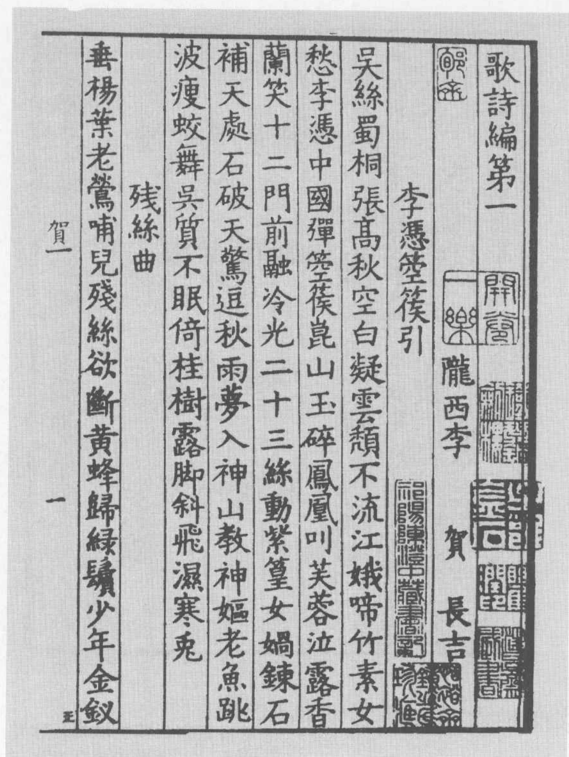

歌詩編第一
李憑箜篌引 隴西李賀長吉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白凝雲頹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崑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脚斜飛濕寒兎
殘絲曲
垂楊葉老鶯哺兒殘絲欲斷黃蜂歸綠鬢少年金釵
賀一　一

图65
蒙古宪宗六年碣石赵衍燕京刻本《歌诗编》

喜贺者尚少，况其作者耶！意欲刊行，以广其传，冀有知之者。会病不起，余与伯成绪其志而为之……丙辰秋日，碣石赵衍题。”序中的“双溪中书君”，指耶律铸丞相；“龙山先生”，则指吕鲲，皆元初人。可证耶律铸与吕鲲论诗而谈及李贺时，就要依据宋司马光所藏旧本校定而刻之以传，然因染病不起，便由赵衍和孙伯成绪其志而付梓。这是此书由赵衍、孙伯成主持付梓出版的直接证据。丙辰秋日，即宪宗六年秋天。这一年，宪宗召希亮的父亲耶律铸回和林，赵衍便在燕京刻印出版了《歌诗编》。此本刻印极精，且堪称海内外孤本，弥为珍贵。此亦是元朝定鼎之前私宅刻书出版的又一实例。（图65）

世祖中统元年（1261年），平阳道参幕段子成刻印出版了两家注《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这也是元朝建立全国政权之前私人刻书出版的实例。此盖为《史记》两家注合刻在元朝最早的刊行本。

元代私人私宅刻书出版者甚众，有两家名声更巨：一是范氏岁寒堂，一是荆溪岳氏家塾。

岁寒堂是范仲淹家塾的堂号，自宋至清一直沿用。至八世孙范文英已届元代，尝于天历和元统间以岁寒堂名义刻印出版过几种范仲淹及其子范纯仁的著作。范文英字彦才，今江苏吴县人。元时尝被任用为绍兴路教授，后以平江路教授致仕。现知其在元天历元年（1328年）刻印出版了范仲淹《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尺牍》三卷，序后镌有“天历戊辰改元褒贤世家重刻于家塾岁寒堂”牌记；《范文正公集附录》十四种十八卷，及《年谱拾遗》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褒贤碑铭》一卷、《褒贤祠记》二卷、《文正书院记》一卷、《朝廷优崇》一

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洛阳志》一卷、《西夏堡寨》一卷、《诸贤诗颂》一卷、《论颂》一卷、《祭文》一卷；这一年，还刻印出版了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另在天历间（1328—1330年）还刻印出版过范纯仁、范纯粹编集的《范文正公遗文》一卷。元统二年(1334年）岁寒堂又刻印出版《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二卷，目录后镌有“元统甲戌褒贤世家岁寒堂刊”篆文亚字形牌记。三年(1335年）又刻印出版宋楼钥撰《范文正公年谱》一卷，并附刻《年谱补遗》一卷《遗迹》一卷



范文正公集卷第一
古賦
明堂賦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巳之方
廣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
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于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須金
玉之宏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
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巢穴
以革棟宇以植徹太古之弊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
宮室斯美爵復崇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
乃聖大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壁廓
焉而四達殿巋焉而中峙禮以素而儉必表之以茅

图66
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范文正公集》

《鄱阳遗事录》一卷，后有天历三年（1330年）八世孙范国儁识语及元统三年八世孙范文英刻书识语。这是比较典型的私宅刻书出版，也是后人为其家族先贤刻印出版家集的家刻本。(图66)

荆溪家塾是元代岳浚的读书、校书、刻书的堂号。岳浚字仲远，宜兴人，宋鄂王岳飞的九世孙。博学好古，与当时文士交游过从甚密。大德间曾任石门县尉，至大中（1308—1311年）为象山书院山长，后乞归家侍亲。家塾积书万卷，延致名儒雠校群经，梓行《九经》、《三传》。后起为绩溪主簿，泰定间(1324—1328年）迁汉阳尹，坐掠死非辜降职，郁郁而卒。明万历《宜兴县志·人物》谓：“岳浚字仲远，飞九世孙。博学好义，为石门尉。未几，乞归侍亲。积书万卷，延好学之士，恣其检阅，一时名士多游其门。”郑元祐《侨吴集·送岳山长序》亦谓：“至元仍继元之四年，义兴岳君德操由县学教谕改授绍兴路和靖书院山长，行有日矣。某尝馆于其长兄汉阳君之家，见其家丘园室庐，

篁树封植，莫非数百年故物也。人言其完盛时延致名德巨儒，雠校群经，锓诸梓。且订定音训，传各经以海内，海内号《岳氏九经》。”这些材料都能说明岳氏荆溪家塾刻印出版的经书在元代是比较著名的出版品。现可考知者，其刻印出版的有《周易》九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释文，《略例》一卷，唐邢璹撰，卷末有“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亚字形牌记，有书耳；《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晋杜预注、唐陆德明释文，每卷末有“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隶书牌记，有书耳；《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春秋二十国年表》一卷，蜀冯继先撰；《孝经》一卷，唐玄宗李隆基注，有书耳；《论语》十卷，魏何晏集解、唐陆德明释文，有书耳；《孟子》十四卷，汉赵岐注、宋孙奭音义，有书耳；《周礼》十二卷，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释文，有书耳；《桯史》十五卷，宋岳珂撰；《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等。这也是元代私宅中从事刻书出版活动的著名典型。

还有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学者称为滋溪先生，真定人。至顺三年累官至南台御史，入为奎章阁授经郎，改监察御史。尝预修《武宗实录》、《文宗实录》。后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明年改吏部尚书，升参议中书省事。十二年卒于军中，年59岁。“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尝著《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类》七十卷。……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1]。所以他利用公余之暇不但为文撰书，还注意传刻出版典籍。如后至元五年（1339年）苏天爵刻印出版了元马祖常的《石田集》十五卷《附录》一卷；至正三年（1343年）苏氏又在武昌郡学刻印出版宋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十四卷；九年（1349年）又在江浙吴学刻印出版宋林虙编、楼昉续编的《两汉诏令》二十三卷。可知其主持出版的书虽不是很多，但在元代的高官中也颇具代表性。元代的私宅出版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为节省笔墨，现将可考知者依年代前后表列如次，以示元代私宅刻书出版之概况。

【1】《元史》卷一八三《苏天爵传》。

（二）元代私宅刻书出版表

元代私宅刻书出版表

| 出版者 | 出版年代 | 编撰者 | 书名卷数 |
|---|---|---|---|
| 杨 威 | 蒙古宪宗元年(1251) | 金刘完素 |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3卷 |
| 罗天益 | 至元十三年(1276) | 金李杲 | 《兰室秘藏》3卷巾箱本 |
| 阎 复 | 至元二十四年(1287) | 元刘秉忠 | 《藏春集》6卷《杂文》4卷 |
| 彭寅翁 | 至元二十五年(1288) | 汉司马迁 | 《史记三家注》130卷 |
| 郭 晦 | 至元二十五年 | 元徐硕 | 《至元嘉禾志》32卷 |
| 张 仁 | 至元二十六年(1289) | 金韩道昭 | 《改并五音集韵》15卷 |
| 李春叟 | 至元间 | 宋李昴英 | 《文溪存稿》20卷 |
| 朱士立 | 元贞元年(1295) | 宋朱元升 | 《三易备遗》10卷 |
| 何士清 | 元贞二年(1296) | 宋李昌龄传 郑清之赞 | 《太上感应篇》8卷 |
| 郑昭祖 | 元贞间 | 宋鲍云龙 | 《天原发微》18卷 |
| 周天骥 | 大德元年(1297) | 元曾先之 | 《十八史略》2卷《纲目》1卷 |
| 王 桢 | 大德二年(1298) | 元王桢 | 《大德旌德县志》 |
| 王 常 | 大德五年(1301) | 宋王安石 | 《王文荆公诗笺注》50卷《目录》3卷《年谱》1卷 |
| 陆 懋 | 大德五年 | 宋陆游 | 《涧公精选陆放翁诗集前集》10卷、《须溪精选陆放翁诗集后集》8卷 |
| 刘将孙 | 大德七年(1303) | |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20卷《文集》2卷《附录》1卷《年谱》1卷 |
| 冯德秀 | 大德七年 | 宋真德秀 | 《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20卷(修补重印宋刻本) |
| 丁思敬 | 大德八年(1304) | 宋曾巩 | 《元丰类稿》50卷《续附》1卷 |
| 杨学文 | 大德九年(1305) | 元许衡 | 《鲁斋遗书》6卷 |
| 刘震卿 | 大德十年(1306) | 汉班固 | 《汉书》120卷 |
| 朱天锡 | 大德十年 | 晋陈寿 | 《三国志》65卷 |
| 刘世荣 | 大德十年 | 宋赵大中 | 《新刊风科集验名方》28卷 |
| 庞 龙 | 大德十年 | 元陈樵 | 《鹿皮子陈先生文集》4卷 |
| 张伯颜 | 大德间(1297－1307) | 南朝梁萧统 | 《六家文选》60卷 |
| 张伯颜 | 大德间 | 唐许浑 | 《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集》2卷《续集》1卷 |
| 陈桂轩 | 大德间 | 唐杜甫 | 《杜工部草堂诗笺》40卷 |
| 陈 才 | 大德间 | 宋吕大临 | 《考古图》10卷 |
| 王 都 | 至大三年(1310) | 元俞琰 | 《周易集说》10卷 |
| 赵国宝 | 至大三年 | 金元好问 | 《翰苑英华中州集》10卷 |
| 陈 泰 | 至大四年(1310) | 宋林至 | 《易裨传》1卷《外篇》1卷 |

续表

| 出版者 | 出版年代 | 编撰者 | 书名卷数 |
| --- | --- | --- | --- |
| 陈　才 | 至大间(1308－1311) | 宋王黼 |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录》30卷 |
| 孙和伯 | 至大间 | 元刘祁 | 《归潜志》14卷 |
| 曹仲立 | 至大间 | 宋钱闻礼等 | 《类证增注伤寒百问歌》4卷 |
| 胡思绍 | 延祐元年(1314) | 宋王应麟 | 《韩鲁齐三家诗考》6卷 |
|  | 延祐元年 | 元胡一桂 | 《易学启蒙翼传》4卷 |
| 张庭坚 | 延祐元年 | 宋张洽 | 《春秋集传》26卷 |
| 王万庆 | 延祐元年 | 元耶律铸 | 《双溪醉隐集》6卷 |
| 张　炜 | 延祐四年(1317) |  | 《佛果圜悟禅师碧岩录》10卷 |
| 李怀素 | 延祐六年(1319) | 元姬志真 | 《知常先生云山集》5卷 |
| 朱　霁 | 延祐六年 | 宋罗愿 | 《尔雅翼》32卷 |
| 郭　贯 | 延祐间(1314－1320) | 元郝经 | 《续后汉书》90卷 |
| 钱良祐 | 延祐间 | 宋陈与义 | 《简斋诗外集》1卷 |
| 赵钟秀 | 至治元年(1321) | 宋江贽 | 《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56卷《外纪》4卷 |
| 陈　樅 | 至治二年(1322) | 元熊良辅 | 《周易本义集成》12卷 |
| 陆　友 | 至治三年(1323) | 汉徐干 | 《中论》2卷 |
| 曹　惠 | 至治三年 | 宋黄仲元 | 《四如集》6卷 |
| 谭善心 | 至治二年 | 宋程颐程颢 | 《二程文集》13卷《附录》2卷 |
|  | 至治三年 | 宋程颐程颢 | 《河南程氏文集》12卷 |
| 吴　鼎 | 泰定元年(1324) | 元刘谧 | 《三教平心论》1卷 |
| 胡元衡 | 泰定三年(1326) | 元刘弇 | 《龙云先生文集》32卷 |
| 段　辅 | 泰定四年(1327) | 金段成己、段克己 | 《二妙集》8卷 |
| 郑元祐 | 天历元年(1328) | 元陈澔 | 《礼记集说》16卷 |
| 何道坚 | 天历元年 | 元刘大彬 | 《茅山志》15卷 |
| 陈忠甫 | 天历三年(1330) | 宋朱熹 | 《楚辞集注》8卷《后语》6卷《辩证》2卷 |
| 燕山嘉氏 | 元统元年(1333) | 宋朱熹 | 《小学集解》6卷 |
| 董　僎 | 元统二年(1334) | 元董真卿 | 《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14卷《朱子易图附录纂注》1卷《朱子启蒙五赞附录纂注》1卷《朱子筮仪附录纂注》1卷 |
| 余　谦 | 元统三年(1335) | 元杨桓 | 《六书统》20卷(修补重印) |
| 陈　宝 | 元统间(1333－1335) | 元黄公绍、熊志举 | 《古今韵会举要》30卷《附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1卷 |
| 叶　森 | 元统间 | 元刘敏中 | 《中庵集》20卷 |
| 孙礼之 | 后至元三年(1337) | 宋黄震 | 《古今纪要》19卷 |
| 沈　逵 | 后至元三年 | 宋黄震 | 《慈溪黄氏日记分类》17卷 |

续表

| 出版者 | 出版年代 | 编撰者 | 书名卷数 |
| --- | --- | --- | --- |
| 曹复亨 | 后至元四年(1338) | 元曹伯启 | 《汉泉曹文贞公诗集》10卷《后录》1卷 |
| 陆　德 | 后至元五年(1339) | 唐陆龟蒙 | 《笠泽丛书》4卷 |
| 沈　璜 | 后至元五年 | 元赵孟頫 | 《松雪斋文集》10卷《外集》1卷《附录》1卷 |
| 余　谦 | 后至元五年 | 元马端临 | 《文献通考》348卷(补修重印) |
| 赫国宝 | 后至元六年(1340) | 元潘仁 | 《唐丞相陆宣公奏议纂注》12卷 |
| 白　榆 | 至正元年(1341) | 元杜思敬 | 《济生拔粹方》19种20卷 |
| 张士弘 | 至正二年(1342) | 宋陈直 | 《寿亲养老新书》4卷《养老奉亲书》1卷 |
| 陈　志 | 至正三年(1343) | 元危亦林 | 《危氏世医得效方》20卷 |
| 叶　敦 | 至正三年 | 宋释惠洪 | 《冷斋夜话》10卷 |
| 潘　诩 | 至正五年(1345) | 元潘昂宵 | 《苍崖先生金石例》2卷 |
| 张　彩 | 至正六年(1346) | 元张伯淳 | 《养蒙先生文集》10卷 |
| 杨维贞 | 至正七年(1347) | 元吕诚 | 《吕敬夫诗》1卷 |
| 欧阳必学 | 至正八年(1348) | 宋郭熙 | 《林泉高致集》1卷 |
| 俞氏读易楼 | 至正九年(1349) | 元俞琰 | 《周易集说》40卷 |
| 谢　池 | 至正九年 |  | 《晦庵先生朱文公行状》3卷 |
| 费　彝 | 至正九年 | 元刘因 | 《静修先生文集》28卷《附录》2卷 |
| 刘衡甫 | 至正九年 | 元刘桢 | 《联新事备诗学大全》30卷 |
| 薛　懿 | 至正十年(1350) | 元蒲道源 | 《顺斋先生闲居丛稿》26卷 |
| 张惟远 | 至正十年 | 元丁复 | 《桧亭稿》9卷 |
| 于　潜 | 至正十一年(1351) | 元于钦 | 《齐乘》6卷《释音》1卷 |
| 都　璋 | 至正十二年(1352) | 宋朱熹 | 《朱文公大同集》10卷《年谱》1卷 |
| 汪泽民 | 至正十三年(1353) | 元谢宗可 | 《咏物诗》2卷 |
| 李俊民 | 至正十四年(1354) | 元吴澄 | 《仪礼逸经传》2卷 |
| 刘　贞 | 至正十四年 | 晋孔晁 | 《逸周书》10卷 |
| 金伯祥 | 至正十四年 | 元虞集 | 《道园遗稿》6卷 |
| 宇文公谅 | 至正十五年(1355) | 元周伯琦 | 《说文字原》1卷《六书正伪》5卷 |
| 刘　瑛 | 至正十五年 | 宋鲍彪注<br>元吴师道校 | 《战国策校注》10卷 |
| 西园余氏 | 至正十五年 | 金成无己 | 《伤寒论注解》10卷《图解》1卷 |
| 虞　堪 | 至正十九年(1359) | 元虞集 | 《道园遗稿》6卷《续稿》6卷 |
| 徐仁文 | 至正二十年(1360) | 元汪汝懋 | 《山居四要》4卷 |
| 徐达左 | 至正二十一年(1361) | 元徐达左 | 《传道四子书》8卷 |
| 顾　逖 | 至正二十一年 | 元陈桱 | 《通鉴续编》24卷 |

续表

| 出版者 | 出版年代 | 编撰者 | 书名卷数 |
| --- | --- | --- | --- |
| 杨维贞 | 至正二十二年(1362) | 元赖良 | 《大雅集》8卷 |
| 朱元祐 | 至正二十三年(1363) | 宋岳珂 | 《鄂国金佗粹编》28卷《续编》30卷 |
| 杨维贞 | 至正二十三年 | 元袁华 | 《可传集》1卷 |
| 顾道珍 | 至正二十四年(1364) | 宋释普济 | 《五灯会元》20卷 |
| 孙道明 | 至正二十五年(1365) | 宋董逌 | 《广川画跋》6卷 |
| 刘祥卿 | 至正二十七年(1367) | 魏王肃注 | 《新编孔子家语句解》10卷 |
| 许源堂 | 至正二十七年 | 宋罗从彦 | 《豫章罗先生文集》17卷 |
| 潘元明 | 至正间(1341－1368) | 汉郑玄注、宋杨复 | 《仪礼》7卷《仪礼图》17卷《房通》1卷 |
| 宋　璲 | 至正间 | 元吴莱 | 《渊颖吴先生集》12卷《附录》1卷 |
| 潘维梓 | 至正间 | 元同恕 | 《榘庵集》15卷 |
| 陈存礼 | 至正间 | 元杨维贞 | 《新刊丽则遗音古赋程式》4卷 |
| 吴　当 | 元时(1271－1368) | 元吴澄 | 《易纂言外翼》12卷《礼记纂言》36卷《春秋纂言》12卷《总例》7卷《吴文正公集》100卷《私录》2卷 |
| 龙阳寿 | 元时 | 元龙仁夫 | 《周易集传》8卷 |
| 谢子祥 | 元时 | 汉郑玄注、宋杨复旁通 | 《仪礼》17卷《仪礼图》17卷《旁通》1卷 |
| 韩国正 | 元时 | 宋王质 | 《诗总闻》20卷 |
| 罗祖禹 | 元时 |  | 《诗经旁注》4卷 |
| 罗祖禹 | 元时 | 元刘瑾 | 《诗传通释》20卷 |
| 洪焱祖 | 元时 | 宋罗愿 | 《尔雅翼》32卷 |
| 云衢张氏 | 元时 | 宋李焘<br>宋刘时举 | 《续资治通鉴前集》18卷<br>《后集》15卷 |
| 游　明 | 元时 |  |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36卷《宋季朝事实》2卷 |
| 张　雨 | 元时 | 元刘大彬 | 《茅山志》15卷 |
| 赵孟频 | 元时 | 题汉华陀 | 《华氏中藏》3卷《道德宝章》1卷 |
| 穆虎彬 | 元时 | 元徐元瑞 | 《史学指南》8卷 |
| 张　引 | 元时 | 元张养浩 | 《牧民忠告》2卷《经进风宪忠告》1卷《庙堂忠告》1卷 |
| 杨惟德 | 元时 |  | 《茔原总录》11卷 |
| 王　愈 | 元时 | 元王愈 | 《蕃牧纂验方》2卷《新刊监本安骥药方》8卷 |
| 高楚芳 | 元时 | 唐杜甫 |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20卷 |
| 危　素 | 元时 | 宋王安石 | 《临川王先生荆公文集》100卷 |
| 陈士元 | 元时 | 宋严羽 | 《沧浪严先吟》3卷 |

续 表

| 出版者 | 出版年代 | 编撰者 | 书名卷数 |
|---|---|---|---|
| 陈世隆 | 元时 | 宋陈思编<br>元陈世隆补 | 《两宋名贤小集》157 卷 |
| 冯师虞 | 元时 | 唐李翱 | 《李文公集》18 卷 |
| 萧　洵 | 元时 | 元刘岳申 | 《申斋刘先生文集》15 卷 |
| 顾　瑛 | 元时 | 元顾瑛 | 《草堂雅集》13 卷 |
| 杜　本 | 元时 | 元任士林 | 《松乡文集》10 卷 |
| 徐守铭 | 元时 | 宋吴淑 | 《事类赋》30 卷 |
| 以下是元朝民间私宅刻书出版中的自刻本 | | | |
| 刘应李 | 大德十一年(1307) | 元刘应李 |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10 集 194 卷 |
| 吴弘道 | 大德间(1297－1307) | 元吴弘道 | 《中州启札》4 卷 |
| 何元寿 | 大德间 | 元何元寿辑 | 《绍兴州县释奠仪图》8 卷 |
| 洪景修 | 至大间(1308－1311) | 元洪景修辑 | 《新编古今姓氏遥华韵》10 集 97 卷 |
| 元明善 | 延祐元年(1314) | 元元明善 | 《龙虎山志》3 卷 |
| 邱　葵 | 泰定元年(1324) | 元邱葵 | 《周礼补亡》6 卷 |
| 曾世荣 | 天历二年(1329) | 元曾世荣 | 《活幼新书》3 卷 |
| 周　旉 | 至正四年(1344) | 元周旉辑 | 《皇元大科三场文选四书疑》1 卷《周易疑》1 卷《易疑》2 卷《书疑》1 卷《书义》1 卷 |
| 杨士弘 | 至正十四年(1354) | 元杨士弘 | 《唐音》14 卷 |
| 刘　履 | 至正二十五年(1365) | 元刘履 | 《风雅翼》12 卷《诗选补注》8 卷《续编》4 卷 |
| 夏文彦 | 至正二十六年(1366) | 元夏文彦 | 《图绘宝鉴》5 卷《补遗》1 卷 |
| 张惟志 | 元时 | 元张惟志 | 《古今集论字学新书》7 卷 |
| 贾　亨 | 元时 | 元贾亨 | 《算法全能集》2 卷 |
| 陈绛曾 | 元时 | 元陈绛曾 | 《新刊增入文筌诸儒奥论策学统宗前集》5 卷《后集》3 卷《古文小谱》1 卷《诗小谱》2 卷 |
| 谭金孙 | 元时 | 元谭金孙 | 《精选诸儒奥论策学统宗前集》5 卷《后集》8 卷《续集》7 卷《别集》8 卷 |
| 何士泰 | 元时 | 元何士泰 | 《新编历法集成前集》1 卷《后集》1 卷《续集》1 卷《别集》1 卷 |
| 罗天益 | 元时 | 元罗天益 | 《东垣试效方》9 卷 |
| 苏应龙 | 元时 | 元苏应龙 | 《新编类意集解诸子琼林前集》24 卷《后集》16 卷 |
| 祝　尧 | 元时 | 元祝尧 | 《古赋辨体》8 卷《外集》2 卷 |

上述这张私宅刻书出版表，在历史空间上有两个密集区：一个是元代大德年间，一个是元仁宗皇庆以后的年代。前者成宗大德年间尚能继行世祖忽必烈的政策余绪，继续提倡文治；后者仁宗皇庆以后施行了科举选官的惯用制度，激发了社会上读书应举的文化热情。适应着这种社会风尚的转变，反映学术文化发展的出版事业也就随之发展，这似乎已经成了出版事业兴衰的规律。当然，中国封建社会私宅刻书出版与坊肆刻书出版，其目的、性质不完全相同，但两者有时又很难区分，因为私宅有时也会发展变化成为坊肆，坊肆有时也在名号上雅其所称，难以识别。上表只能作为大概的参考。

## 二、元代坊肆的刻书出版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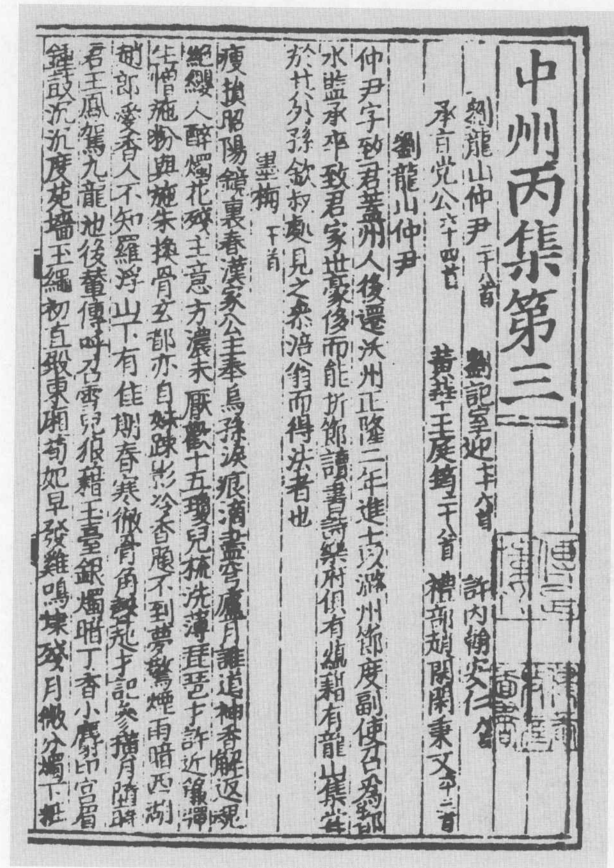
唐代已有书肆出现，两宋书肆已成为繁荣出版业的重要力量。元代则承前启后，继续发展。元代幅员辽阔，万象更新，百业待举。其中刻书出版业也出现了新格局。自唐末五代刻书出版业就很发达的四川，不知道什么原因入元后一蹶不振，戛然失去了以往的辉煌。而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北移，及辽、金经营刻书出版的实践，北方以平水为中心的刻书出版业，很快在山西、河北、大都等范围内发展了起来，形成为新的刻书出版中心。而在两宋时期就以刻书出版而驰名的江浙，特别是杭州；福建，特别是建阳，刻书出版业则继续发展，仍然处于中心地位。这些地区不乏上述的官刻私雕，但坊肆的刻书出版，在这几地却承担了主要角色。下面就可考知者对平阳、建阳、杭州等地书坊的刻书出版概况做一简明的描述。

### （一）平水地区的坊肆刻书出版

平水又称平阳，即现在的临汾，地处山西晋南，物阜民丰，经济、文化生活都比较发达，有刻书出版的社会基础。现可考知，早在蒙古时期此地就刻印出版过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陆德明释文的《尚书注疏》二十卷（图67），汉毛苌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陆德明释文的《毛诗注疏》二十卷。此地最有名的

书铺之一就是晦明轩。晦明轩主人张存惠，字魏卿，平阳人。他在蒙古定宗四年（1249年）便刻印出版了宋唐慎微撰、寇宗奭衍义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定宗时张氏晦明轩还刻印出版过金赵秉文的《滏水集》二十卷、宋文同的《丹渊集》四卷及文鼍编的《拾遗》二卷《年谱》一卷《附录》二卷。还在蒙古宪宗三至五年（1253—1255年）刻印出版宋吕祖谦编的《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张氏在平阳开书籍铺经营出版业，盖始于金朝。蒙古人夺取全国政权在至元八年(1271年)，这中间尚有65年的蒙古时期。张存惠以晦明轩名义出版图书虽已届蒙古时期，却仍用金时泰和纪年。如《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之碑形牌记便说“泰和甲子下己酉冬日南至晦明轩谨记”、“泰和甲子下己酉岁小寒初日辛卯刊毕”字样，卷端题名下又有“己酉冬日南至晦明轩重修本草谨记”、“泰和甲子下己酉新增衍义”字样。翻开历史年表，自泰和甲子下数到己酉，恰是蒙古定宗四年。《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序后有“泰和甲子下癸丑岁孟冬朔日平阳张宅晦明轩谨识”，卷末有“泰和甲子下乙卯岁季秋工毕，尧都张宅晦明轩谨记”字样。泰和甲子下之癸丑恰是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而乙卯恰是蒙古宪宗五年(1255年)。这种纪年方式极为少见，大概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对故国之思吧。也许是当时元朝尚未定鼎，还没有建立纪年之号。

图67
蒙古刻本《尚书注疏》



中州丙集第三

劉龍山仲尹 二十八首　劉記室迎 十六首　許内翰安仁

承旨党公 六十四首　黄華王庭筠 十一首　禮部趙閑閑秉文 二十三首

劉龍山仲尹

仲尹字致君蓋州人後遷沃州正隆二年進士歷潞州節度副使召爲都水監丞卒致君家世豪侈而能折節讀書詩樂府俱有蘊藉有龍山集行於世外孫欽叔獻見之恭潛翁而得法者也

墨梅 十首

瘦損昭陽鏡裏春漢家公主奉烏孫淚痕滴盡香魔月誰道神香解返魂

絕纓人醉燭花殘主意方濃未厭歡十五瓊兒梳洗薄琵琶才許近雕彈

先憎施粉與施朱換骨玄都亦自殊蹤影冷香魂不到夢驚煙雨暗西湖

謝郎愛香人不知羅浮山下有佳期春寒微有角聲苑手記參横月墮時

君王鳳駕九龍池後輦傳呼召雪兒狼藉玉臺銀燭暗丁香小麝印宮眉

鍾鼓沉沉度苑墻玉繩初直殿東廂蜀妃早發雞鳴埭殘月微分墻下粧

图68
元至大三年曹氏进德斋刻本《中州集》

另外，平阳王氏中和轩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刻印出版过金王文郁的《新刊礼部韵略》五卷，卷五末有“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轩王宅印”牌记可证。元统二年（1334年）刻印出版过金赵秉文的《滏水文集》二十卷。这也是比较有名的平水本。平阳府梁宅于元贞元年（1296年）刻印出版过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的《论语注疏》二十卷。平水许宅于大德十年（1306年）刻印出版过宋唐慎微的《重修证类本草》三十卷。平水曹氏进德斋于大德三年（1299年）刻印出版过晋郭璞注的《尔雅》三卷，序后有“大德三年已亥平水曹氏进德斋”牌记可证。至大三年（1310年）又刻印出版金元好问编《中州集》十卷《乐府》一卷，以卷末有“至大庚戌良月平水进德斋刊”牌记可证（图68）。平阳司氏颐真堂元时刻印出版过《御药院方》十一卷。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山西平阳地区在金、元时期的确是北方的刻书出版中心。《金史·地理志下·河东南路·平阳府》条下，特别注明“有书籍”三字，显然出版书籍已成了此地的特别产品。这种传统延续至元末，至明而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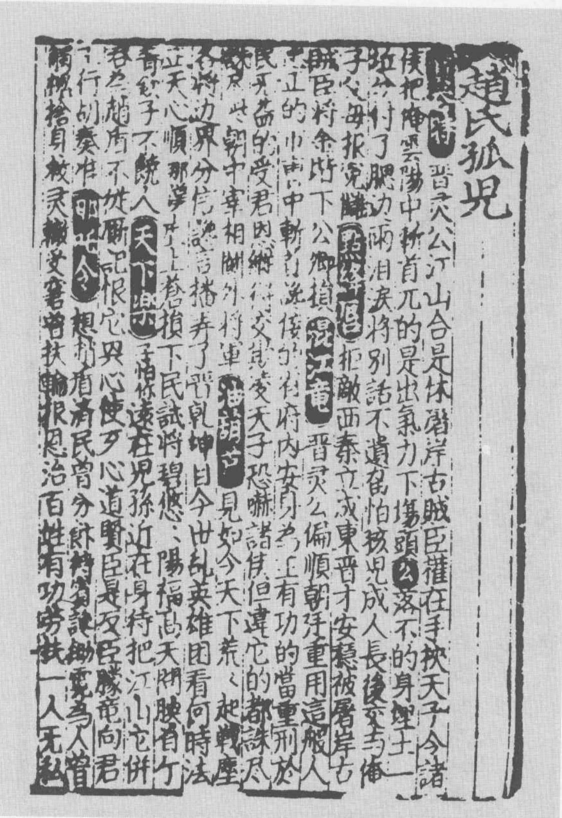
（二）京杭地区的坊肆刻书出版

元曲杂剧是元代文学创作的主流，反映这方面著作的出版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大都和杭州。如元代关汉卿的《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一卷，元郑廷玉的《大都新编楚昭王疏者下船》一卷，元张国宝《大都新编关目公孙汗衫记》一卷，元金志甫的《大都新编关目的本东窗事犯》一卷等，就都是由大都的书

铺子刻印出版的。燕山窦桂芳活济堂于至大四年（1311年）刻印出版过《黄帝明堂针灸经》三卷、皇庆元年（1313年）又刻印出版过《针灸四书》八卷。这是大都坊肆刻书出版的实例。

杭州自两宋就是刻书出版中心的中心，入元后两浙地区的各路各级儒学、各地书院出版了许多书，而且质量上乘，此在前边已经说过了。而书肆历来是赶潮流，应民需，抢占商机。元人的杂剧创作，在文学上是新体裁、新形式、新生事物，很有社会市场，于是杭州的一些书铺子也就争相刻印，适应民需，从中牟利。现可考知元时杭州各书铺先后刻印出版过关汉卿《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一卷（图69），尚仲贤的《古杭新刊的本尉迟公三夺槊》一卷、《新刊关目汉高皇濯足气英布》一卷，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一卷（图70），石君宝的《古杭新刊的本关目风月紫云亭》一卷，王伯成的《古杭新刊关目的本李太白贬夜郎》一卷，杨梓的《古杭新刊霍光鬼谏》一卷，郑光祖的《古杭新刊关目辅成王周公摄政》一卷，佚名氏的《古杭新刊小张屠焚儿救母》一卷等。至于元时刻印出版的《古今杂剧》三十种三十卷，盖亦为书铺子的出版物。而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抄本《古今杂剧》242种，其中52种都是元朝人的作品。可见元人杂剧创作得多，出版也多。只可惜流传至今者，已成吉光片羽，鲁殿灵光。

图69
元刻本《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



趙氏孤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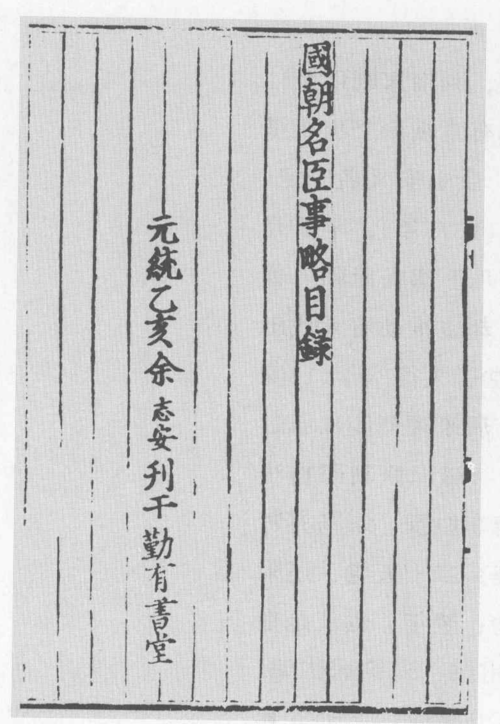
图70
元刻本《赵氏孤儿》

（三）建阳地区的坊肆刻书出版

书铺子最集中、刻书也最多而又行销天下者，还是福建，特别是福建的建阳地区。现在仍然可以考知者有建安余氏勤德堂、余彦国励贤堂、建安刘氏云庄书院、建阳刘君佐翠岩精舍、建阳书林刘克常、麻沙刘通判仰高堂、建安虞信亨宅、虞氏明复斋、建安郑明德宅、建阳吴氏友于堂、建安朱氏与耕堂、建安高氏日新堂、詹氏建阳书院、建安张氏中溪书院、建安书堂李氏、建安同文堂、麻沙万卷堂、熊氏卫生堂、书林魏家、崇化余志安勤有堂（或称勤有书堂）、建安余氏双桂书堂、建安书林刘锦文日新堂（又称刘叔刚日新堂）、麻沙刘氏南涧书堂、建安刘承父、建阳刘氏书肆、书市刘衡甫、建安虞氏务本书堂、建安虞氏、建安郑天泽宗文书堂（又称郑希善）、建安叶日增广勤书堂、富沙碧湾吴氏德新书堂（富沙即建州）、建安陈氏余庆堂、建安詹璟、建安蔡氏、建安傅子安宅、建安万卷堂、建安玉融书堂、麻沙明德堂、杨氏清江书堂、博文书堂，益友书堂、德星书堂、崇川书府等也可能是此地的书铺，这样加起来就有43家了。13世纪后半叶，到14世纪中叶，在一两个县的弹丸之地就同时有这么多出版商云集于此，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盛况。其实细考，还知有建安熊氏武夷书堂、詹氏建阳书院、陈氏留耕书堂、椿庄书院、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建安熊氏种德堂等，加起来已达49家。还有些已考不出来的书铺。现将建阳地区有代表性出版商的出版情况概述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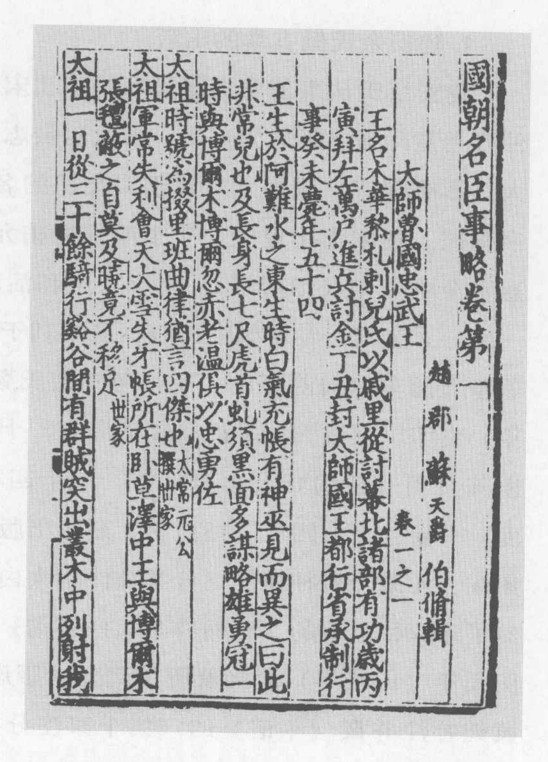
1. 建安余氏勤有堂的出版

建安余氏从事刻书出版活动始于北宋末期，到南宋则以余仁仲万卷堂刻书出版最为知名。入元后余志安勤有堂则刻书出版量大，影响深广，成为元时建阳崇化镇的名肆。余志安又名安定，字栎庄。建阳崇化里人。生于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卒于元惠宗至正七年（1347年），整个人生和活动期几乎都在元朝。他一生心无旁骛，专事刻书出版，虽牟利于心，却也推动着元代出版事业的车轮向前滚动。现可考知余氏勤有堂于大德八年(1304年）刻印出版过《太平惠民和济局方》十卷，后来还刻印出版过宋陈自明《新编妇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辨识修制药物法度》一卷；至大四年（1311年）刻印出版过唐李白撰、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二十五卷，还附刻了宋薛仲邕编的《唐翰林李太白年谱》一卷；翌年，也就是皇庆元年（1312年）紧接着便又刻印出版唐杜甫撰、宋徐居仁编、黄鹤补注并撰《年谱》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二十五卷《文》二卷《年谱》一卷，将唐代同时并驾齐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诗人李、杜二人的作品，相继版行于世。延祐五年(1318年）刻印出版元董鼎的《书集传辑录纂注》六卷、《朱子说书纲领辑录》一卷；致和元年（1328年）刻印出版《三辅黄图》六卷，目录后有“致和戊辰夏五余氏勤有堂刊”牌记二行；泰定三年(1326年）刻印出版元胡炳文的《四书通》二十六卷；天历二年（1329年）刻印出版元张存中的《四书集注通证》六卷；天历间（1328—1330年）刻印出版元程复心的《四书章图纂释》二十卷；至顺三年（1332年）刻印出版唐长孙无忌等撰、佚名释文、元王元亮纂例的《唐律疏义》三十卷《纂例》十二卷；元统三年（1335年）刻印出版元苏天爵编撰的《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目录后镌“元统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书堂”条记一行(图71)；后至元二年（1336年）刻印出版宋邵伯温的《易学辨惑》一卷、《易源奥义》一卷；至正三年(1343年）刻印出版《汉书考证》六卷、《后汉书考证》六卷；至正四年（1344年）刻印



國朝名臣事略目録

元統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書堂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一

趙郡 蘇天爵 伯脩輯

太師魯國忠武王　卷一之一

王名木華黎札剌兒氏以戚里從討蔑北諸部有功歲丙寅拜左萬户進兵討金丁丑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癸未薨年五十四

王生於阿難水之東生時白氣充帳有神巫見而異之曰此非常兒也及長身長七尺虎首虬須黑面多謀略雄勇冠一時與博爾术博爾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佐

太祖時號爲掇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 太常元公撰世家

太祖軍常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王與博爾术張氈蔽之自莫及曉竟不移足 世家

太祖一日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有群賊突出叢木中列射我

图71

元元统三年余志安勤有书堂刻本《国朝名臣事略》

出版宋辅广的《诗童子问》二十卷《附诗传纲领》一卷《师友粹言》一卷《诗传序》一卷；至正五年(1345年）刻印出版元陈师凯撰、朱万初校正的《书蔡氏传旁通》六卷，隐字审音末镌“至正乙酉岁四月余氏勤有堂印”条记。还能考知其在元时还刻印出版过宋严灿的《诗辑》三十六卷，《春秋后传》十二卷，汉郑玄注《仪礼》十七卷、宋杨复撰《仪礼图》十七卷《旁通图》一卷，《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五卷，《普济本事方》十卷，《洗冤录》五卷，《琼琯白玉蟾武夷集》八卷等。尤其是余氏所刻《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特别有名。上图下文，图文并茂，过去向被说成是宋刻本，实为元余氏勤有堂刻本。清阮元之子阮福《文选楼丛书》影刻本中有此书，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江藩跋曰：“《列女传》八卷，宋建安余氏所刻。余氏名仁仲，曾刻注疏，何义门所谓万卷堂本也。卷末有余靖庵模刊款，靖庵岂仁仲之号?”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乱猜测，误导了几代人。该书目录后镌内圆外方木记，中镌草书“建安余氏”

四字；卷二、三后有“靖庵余氏模刊”条记；卷五后有“余氏勤有堂刊”一行；卷八后有黑地白文木记“建安余氏勤有堂刊”一行；卷八后有黑地白文木记“建安余氏模刻”木记。证明是元代余氏勤有堂的出版物。余仁仲是南宋前期人，刻过经书，很有名。余志安是元时人，不但时间相隔甚远，实际也不是一个世系。《书林余氏重修宗谱》在焕公派上庠房、书坊文兴公派下世系谓：“二十四世勤有居士余文兴，二十五世余安定，二十六世余资，二十七世……。”二十五世余安定即余志安，其父即勤有居士余文兴。余志安生后五年南宋灭亡，长则以其父之别号“勤有”颜其书坊之名，这在古时是常有的事。所以“勤有堂”乃元代余志安的肆名。至其子余资则又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重校再版《唐律疏义》，仍用“勤有堂”之名。

余氏勤有堂的刻书出版活动衰于元末，“一些书版被继之而起的叶日增广勤堂所购去，广勤堂改其牌记而出版。如余氏勤有堂刻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二十五卷，原本目录后有：‘皇庆壬子余志安刊于勤有堂’12字木记。版片归叶氏广勤堂后，即将原有的牌记挖出，改刻为‘广勤堂新刊’5字鼎式牌记。版片传至他的后代叶景逵时，书坊改名‘三峰书舍’，又将广勤堂鼎式木记改刻为‘三峰书舍’钟式木印。到了明正统间，叶氏又将书版转归金台汪谅，牌记改为‘汪谅重刻’4字。同一刻本，经过两次书坊易主，三次改换牌记，使一书变成了四种不同的版本”[1]。这种现象在古代，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并不稀见。古人没有现代人的版权观念，当时的出卖书版，并不像现代出版社之间的版权交易，那时卖出的书版只是作为一种财产转让了，一经卖出，一切权利归新主所有，改剜旧有牌记，镌印自己牌记，重行刷印，就似乎又出了新的版本。这种行为虽带有出版商的欺诈手段，但跟房屋、土地、器具一样，既卖给了别人，新主人便有权将其更名改姓，这当中也带有合法性。应该说这是封建社会财产正式私下交易在出版业中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版权贸易。只是那是木板，但雕了字的书籍版片，其价

【1】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18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钱绝非平常木板所能比。

建安还有余氏双桂书堂，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刻印出版过宋蔡沈撰、元邹近仁音释的《书集传》十卷《音释》一卷；同年还刻印出版宋朱熹撰、元许谦音释、罗复纂辑的《诗集传名物钞音释纂辑》二十卷，凡例末镌有“至正辛卯孟夏双桂书堂重刊”牌记二行；还刻印出版过宋陈彭年重修的《广韵》五卷。另外还有余氏勤德堂于元至正四年（1344年）刻印出版过《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皇元风雅》三十卷、《广韵》五卷。《广韵》序后镌“余氏勤德书堂鼎新刊行”木记。还刻印出版过宋季《十八史略》，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有记载。然德勤堂余氏盖久已移居杭州，称古杭余氏。总之，建阳余氏从事出版者众，延续的时间长，由宋经元，长盛不衰。中国封建社会的很多行业都带有地区特色和宗族特色。一个宗族中只要有一人在某个行业成功，对同族中其他支派的后辈晚生，乃至于同乡同族中的人便多有提携。待到同族中从事某行业的人多了，则更是互相依重，推动这个行业前进。例如余氏勤有堂至元末衰落了，但仍属于勤有居士余文兴派系下的又有余彰德、余象斗、余泗泉、余应虬、余昌祚、余元熹等，相继从事刻书出版业，构成明代一股非常重要的出版力量。

2. 建阳刘氏翠岩精舍的出版

建阳刘氏参与从事刻书出版业始于北宋，历宋元明三代而不衰。其影响声誉绝不低于余氏。宋代刘氏刻书出版的大本营在麻沙。宋末元初由于战火，麻沙书坊被焚过半，大伤元气。刘氏贞房十四世刘君佐于元初举族迁至书林，开始了刘氏刻书出版业在元代的复兴。据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引证《贞房刘氏宗谱》卷三所载君佐世系，称“君佐，稀十公。字世英，号翠岩。咸淳六年庚午（1270年）进士，任南思道判。采订谱牒，著《传忠录》。葬永忠（里）新溪桥头，挂壁金钗形。迁居书林，为书林始祖”。可知翠岩精舍刻书出版始于刘君佐。现可考知其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刻印出版过《翰苑集》三十卷；延祐元

年(1314年）刻印出版过宋程颐、朱熹撰的《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十卷《易图集录》一卷，《易图集录》末有“延祐甲寅孟冬翠岩精舍新刊”牌记二行；泰定四年（1327年）刻印出版元胡一桂辑的《诗集传附录纂疏》二十卷《诗序附录纂疏》一卷《诗传纲领附录纂疏》一卷《语录辑要》一卷，王应麟辑《韩鲁齐三家诗考》六卷，序后镌有“泰定丁卯仲冬翠岩精舍新刊”篆文牌记二行，篇目后镌有七行广告性告白，谓“文场取士，《诗》以朱子《集传》为主，明经也；新安胡氏编入《附录纂疏》，羽翼朱传也；增以浚仪王内翰《韩鲁齐三家诗考》，求无遗也。今以《诗考》谨锓诸梓，附于《集传》之后，合而行之。学《诗》之士，潜心披玩，蜚英声于场屋间者，当自此得之。时泰定丁卯日长至，后学建安刘君佐谨识”。（图72）众所周知，元代决定用科举取士始于仁宗皇庆间，每三年一科，至泰定四年，正好是五科之后，六科之前，举子们正在准备功课，此时出版，正是热销牟利之时。刘君佐本人就是进士出身，深知举子心理及所需为何，出版有的放矢，当然轰轰烈烈。泰定五年(1328年）刻印本朝苏天爵编的《国朝文类》七十卷《目录》三卷；天历元年(1328年）刻印出版《新刊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三卷《后集》五卷；至正元年(1341年）再次刻印出版苏天爵选编的《国朝文类》七十卷《目录》三卷；至正十四年(1354年）刻印出版元董鼎的《书集传辑录纂注》六卷；同年还刻印出版唐陆贽撰、宋郎晔注的《注陆宣公奏议》十五卷；十六年（1356


詩攷卷之一
韓詩
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漢
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
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
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梁有韓詩譜二卷唐藝
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隋志韓詩
存無傳者崇文總目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與毛說絕異○正
義云齊韓之徒以詩經為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據○晁說之曰說韓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晁
公武曰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關雎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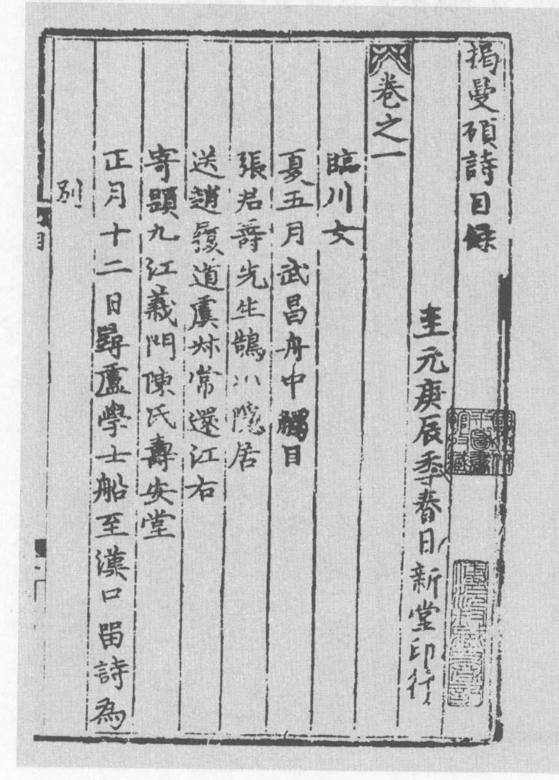
图72
元刻本《韩鲁齐三家诗考》

年）刻印出版宋朱熹撰、元王侗笺注的《大学章句》一卷《或问》一卷，《中庸章句》一卷《或问》一卷。另外在元时刘君佐翠岩精舍还刻印出版过《广韵》五卷，《重修玉篇》三十卷，《陆宣公文集》三十卷，《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等。刘君佐自己就是进士，有文化学识基础，又善抓读者心理，捕捉市场商机，所以经营几十年，成为元代著名的出版家之一。

3. 建阳刘氏日新书堂的出版

日新书堂的主人是刘锦文，是较刘君佐翠岩精舍略晚崛起的一家书肆，自元末迄明中叶从事刻书出版活动，前后近200年。刘锦文字叔简。嘉靖《建阳县志》卷十二说他"博学能文，教人不倦，多所著述。凡书板磨灭，校正补刊。尤善于诗。有《答策秘决》行世"。可见也是个文人而从事出版者。现可考知该书堂尝于元统三年（1335年）刻印出版过《广韵》五卷，序后镌"元统乙亥仲秋日新书堂梓"牌记二行；后至元四年(1338年）刻印出版《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后至元六年(1340年）刻印出版元揭傒斯的《揭曼硕诗集》三卷，目录后镌"至元庚辰季春日新堂印行"木记（图73）；同年刻印出版元虞集、吴全节《题叶氏四爱堂诗》一卷；同年再刻印出版元虞集的《伯生诗续编》三卷。此书行书写刻，别具风格。该书所收虞氏诗，《道园学古录》中仅见4首，至正十四年(1354年）虞堪辑遗诗时多所采录，盖为虞诗中最古之本，故罗振玉影印《云窗丛刊》时即收此本。至正元年(1341年）刘氏日新堂刻印出版元黄瑞节编的《朱子成书》十卷；至正二年（1342年）刻印出版元倪

图73
元后至元六年日新堂刻本《揭曼硕诗集》



士毅《四书辑释》三十六卷；同年又刻印出版元毛方直辑的《增广事联诗学大成》三十卷；七年(1347年）刻印出版元朱倬撰、赵德附编的《诗经疑问》七卷《附编》一卷；八年（1348年）刻印出版元汪克宽的《春秋胡氏传纂疏》三十卷；九年(1349年）刻印出版元赵天麟撰、刘锦文自己编的《太平金镜策》八卷《附答案秘决》一卷；十二年（1352年）刻印出版元刘瑾的《诗集传通释》二十卷《纲领》一卷《外纲领》一卷，卷一后有"至正壬辰仲春日新书堂刻梓"牌记二行；十四年（1354年）刻印出版宋蔡沈传、元邹近仁音释的《书经》六卷；十五年(1355年）刻印出版宋毛晃注、毛居正重增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十六年(1356年）刻印出版元阴时夫编、阴中夫注的《韵府群玉》二十卷，凡例后镌有告白："瑞阳阴君所编《韵府群玉》，以事系韵，以韵摘事，乃韵书而兼类书也。检阅便益，观者无心称善。本堂今将元本重加校正，每字音切之下，继增许氏《说文》以明之。间有事未备者，以补韵书之编，诚为尽美矣。敬刻梓行，嘉与四方学者共之。至正丙申暮春，刘氏日新堂谨白。"这是一篇文雅高明的广告，没有自吹自擂，却有本书编辑方法的告白；观者无心称善，却又便于披阅。让人读了这篇告白，便想看看其书的体例、方法，待你手翻其书，购买之心便会油然而生。可见那时书商的广告意识、宣传手法，已经很符合市场运作规律了。至正十八年（1358年）该肆还刻印出版过唐韩愈的《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至正间还刻印出版过金元好问编、元郝天挺注的《唐诗鼓吹》十卷。可能还出版过其他不少书，无须一一予以考证，仅就上述已足以表明刘氏日新书堂，是元代建阳地区的名肆，经元到明200年老店，经久不衰，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营理念和经验。

4. 建阳虞氏务本堂的出版

建阳虞氏也是刻书出版名家，务本堂盖是虞平斋的书肆名号，元时也是值得称道的出版家。现可考知其于泰定四年(1327年）刻印出版过元萧镒的《四书待问》二十二卷，目录后镌"泰

定丁卯仲春虞氏务本堂"木记一行；至元十八年(1281年）刻印出版元赵孟頫的《赵子昂诗集》七卷，目录后镌"至元辛巳春和建安虞氏务本堂编刊"木记一行；至正六年（1346年）刻印出版《周易程朱传义音训》十卷《易图》一卷，序后镌"至正丙戌良月虞氏务本堂刊"牌记二行。另外务本堂于元时还刻印出版过《伤寒直格方》三卷《后集》一卷《续集》一卷，《心镜》一卷，《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四卷，《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上图下文。最有名者，是务本堂刻印出版之宋苏轼撰、王十朋集注、刘辰翁批点的《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东坡纪年录》一卷，在"集注姓氏"后镌有双行篆文"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刊"牌记，卷末亦有同样牌记，表明务本堂确属虞平斋。该书有增注则附刊于诗尾，或补刊于行间空白版面上，并标以"增刊"字样。但虞本有时为插入"增刊"的注文，则不惜删削宋人旧注；有时虞本增添新注却又不标明"增刊"字样，与旧注相混，令人难以分辨，其质量较南宋黄善夫所刻《苏诗类注》远甚。然此本之所以有名，是因此本自《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为宋本以来，杨绍和、傅增湘等也随之误定。直至《四部丛刊》收印此书时仍定为宋刻本。叶德辉《书林清话·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伪》："又《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姓氏后有篆文条记'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坊刊'，此为元刻本，虞氏所刻他书有年号者可证。"今核以各书，叶氏所说为是。

前提之务本堂刻印出版的《全相平话三国志》，最值得注意。其实虞家书肆刊印出版的不只这一种平话，现在能考见的还有《新刊全相武王伐纣平话》、《新刊全相七国春秋后集平话》、《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新刊全相续前汉书平话》。这五种平话是中国小说史上非常重要的材料，也是中国书籍插图版画史上重要的出版物。它代表了元时建阳版画镌印的艺术风格。

5. 建阳郑氏宗文堂的出版

宗文堂也称宗文书院，由元至明经营出版也有200年。元时

主人是郑天泽，明时主人是郑希善。现可考知其在元代大德六年（1302年）刻印出版过宋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三十一卷《目录》一卷、宋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二十卷，卷末有“大德壬寅宗文书院刊行”牌记（图74）；至顺元年（1330年）刻印出版元刘因的《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卷一后有“至顺庚午孟秋宗文堂刊”牌记；同年还刻印出版唐欧阳询等编的类书《艺文类聚》一百卷，日人河田羆《静嘉堂秘籍志》有著录，且谓“有墨云，‘至顺庚午宗文堂刊’木记，每叶28行，行28字。明小字本即从此出。”这两书的出版都很重要，刘因的《静修先生文集》，


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卷一
序例上
補註總叙
舊説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録焉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樓護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而英公李公勣等註引班固叙黄帝内外經云本草石之寒温原疾病之深淺此乃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録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爲始斯爲失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爲似張仲景華佗輩所爲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

图74
元大德六年宗文书院刻本《经史证类大观本草》

民国年间涵芬楼据以影印而收入《四部丛刊》；《艺文类聚》在类书中很重要，至明嘉靖九年（1530年）宗文堂又重新刊印此书，序后镌有“时嘉靖九年岁在庚寅孟春穀旦，书坊郑氏宗文书堂重新刊行”牌记。此书虽狭行细字，但刻印精良，故常被书贾剜去牌记，冒充元刊。皕宋楼当年藏一部就误定为元刻本。另外宗文堂于元时还刻印出版过宋欧阳修的《五代史记》七十四卷，卷末镌有“宗文书院”五字；还刻印出版过顾野王的《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目录后有“宗文”鼎式记和“建安郑氏鼎新绣梓”牌记，还刻印出版过宋陈师文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宋许洪的《指南总论》三卷，目录后镌“建安宗文书堂郑天泽新刊”条记一行。表明元时郑天泽宗文堂确是一家很有实力的坊肆出版机构。这家出版机构一直延续到明嘉靖时仍很兴盛，历史已经有200多年了。在中国出版史上，官署出版有时是职责所系，有时附庸风雅，有时为了创收，故某一官署在刻书出版上缺乏内在的连贯性。倒是这些出版商，他们在习惯、利益、生存、发展

的共同目标下，辈辈相沿，踏出中国出版史的道道轨迹。

6. 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的出版

詹光祖字良嗣，号月崖。福建崇安人。宋时为紫阳书院山长，入元后晋为紫阳书院教授。终生以教书讲学和刻书出版为己任。这家书堂不完全同于坊肆，但也很难说就是私宅。现存该堂刻印出版之书只知有两种，一为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刻印的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目录后有“武夷詹光祖重刊于月崖书堂”木记一行，卷一、卷五十九后有“建安宋慈惠父校勘”一行。还在这一年他又刻印出版了宋黄希集、黄鹤补、黄鹤撰年谱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两书今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后者原为宝礼堂插架之物，经张元济鉴定为宋刻本。进入国家图书馆后编目著录，仍定为宋刻本。70年代初，山东发掘明初鲁荒王朱檀墓，出土文物中有此书。这部书曾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所谓宋本此书校对过，发现两者在行款字数、字体风韵、刀法技巧，乃至于黑钉断板等方面，均完全一样，证明两者确实是相同版本。但朱檀墓出土的那一部，在第三十二卷末叶的下半叶镌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条记一行，证明此书实系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福建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由此再细审国家图书馆原藏此书，则发现第三十二卷末叶下半叶那行刻书条记早已被书贾割裂后用相近的印纸粘补过了。这一挖补，把本为元刻本的书提升为宋刻本了。这也算是一段书林趣事吧。武夷还有詹天祥，崇安黄村人，于大德间刻印出版过宋叶士龙编的《朱子语录类要》十八卷。此书初编为十九卷，名《格言》，后删去兵事，厘为48类，成此18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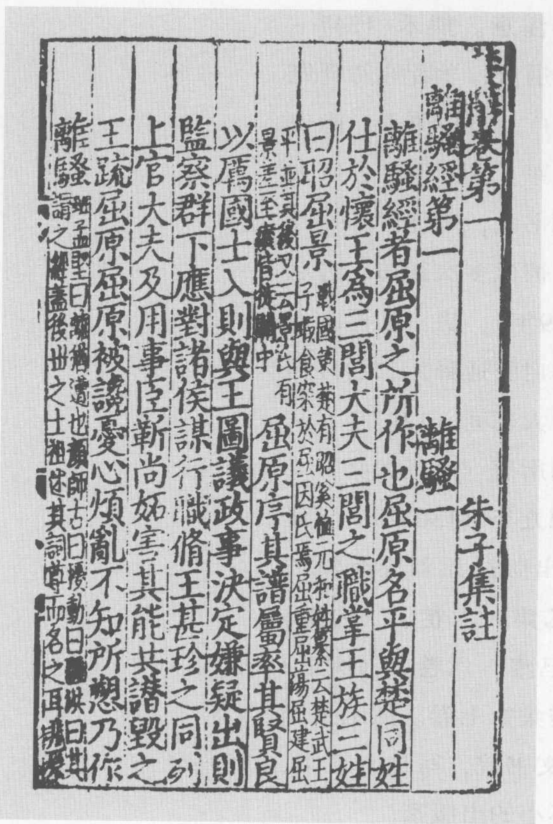
7. 建阳熊氏的出版

建阳熊氏也是个出版世家，盖起于南宋，历元，迄明，延续200多年。元代主要有熊氏万卷堂、博雅堂、卫生堂等坊肆。现可考知熊氏万卷堂于至元二十一年（1285年）刻印出版过《山谷外集诗注》十四卷；而熊氏卫生堂刻印出版过《新编西方子明堂

灸经》八卷。熊禾的武夷洪源书堂最值得注意。熊禾(1247—1312）字去非，号勿庵，又号勿轩，晚年号退斋，学者称勿轩先生。建阳崇泰里熊屯人。熊禾是朱熹弟子辅广的再传弟子，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进士，授宁武军司户参军。入元不仕，束书入武夷山隐居，于武夷五曲晚对峰麓筑洪源书堂，聚徒讲学。与谢枋得及江西著名学者胡一桂，都是好友，彼此多次往访，过从甚密，进行学术交流。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胡一桂再次入闽拜访熊禾，将其父胡玉斋平生力作《易学启蒙通释》二卷拜托熊禾代为出版，熊禾便倩工予以刻印行世。大德间（1297年）又有董真卿等慕名而来，拜托熊禾将其父董鼎所著《孝经大义》一卷予以出版，熊禾则委托其族兄熊敬在大德九年（1305年）于建阳版行。大德十一年（1307年），熊禾还出版过元刘应李辑的《新编事文类聚启札云锦甲集》六卷、《乙集》六卷、《丙集》六卷、《丁集》六卷、《戊集》六卷、《己集》六卷、《庚集》六卷、《辛集》五卷、《壬集》九卷、《癸集》七卷。熊禾是朱熹的三传弟子，为朱熹重修过书肆——同文书院，写过上梁文，自己也从事刻书出版活动，也是一位名气不小的出版家。

8. 建阳其他坊肆的出版

建阳除上述这些名肆外，还有很多书肆，如郑氏积诚堂、郑明德宅、朱氏与耕堂、陈氏余庆堂、李氏建安书堂、高氏日新堂、建安同文堂、建阳书林刘克常、建安傅子安、建安蔡氏等等，都还比较有名。这些书肆都刻印出版过一些书，为元代出版事业，特别是建阳地区的出版事业作出过贡献。如皇庆元年（1312年）建安陈氏余庆堂刻印出版的《宋季三朝政要》五卷《附录》一卷，目录前有“陈氏余庆堂刊”一行，目录后有“皇庆壬子”四字；此堂还刻印出版过宋刘时举编撰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后集》十五卷，目录后亦有“陈氏余庆堂刊”字样。天历间（1329—1330年）建安郑明德宅刻印出版的元陈澔的《云庄礼记集说》十六卷；后至元二年（1336年）李氏建安书堂刻印出版的元傅习、孙存吾辑的《皇元风雅前集》六卷《后集》六卷；同


楚辭卷第一

離騷經第一　　離騷一　　朱子集註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

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

曰昭屈景　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

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

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

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

王疏屈原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

離騷

图75
元后至元二年建安傅子安刻本《楚辞集注》

年，建安傅子安刻印出版的朱熹的《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图75），《后语》叙目后有“建安傅子安宅重刊，至元丙子孟春印行”牌记二行，今存国家图书馆；后至元三年（1337年）富沙碧湾吴氏德新书堂刻印出版的《四书章图纂释》二十卷，序后有“富沙碧湾吴氏德新堂印行”牌记，《大学》卷末有“至元岁次丁丑菊节德新堂印”牌记。富沙乃建州之别称，建阳在宋时隶属建州。南宋杨万里《谢建州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诗曰：“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称道的是建刻用枣木开板镌雕。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先选用梓木，其后随着印刷技术的普遍应用，梨木、枣木也成为了镌板的选用木材，原因是这些木材木质均较硬，纹理细腻，雕字之后笔画不豁不断，刷印时耐磨，能长期保持印出来的书叶笔画清秀。后世常有人批评建阳书商刻书，为了速成易售，不惜用榕树雕版。此种情况不敢断然说没有，但讲究质量肯用上好木材的出版家也大有人在。后至元六年（1340年）郑氏积诚堂刻印出版的元陈元靓编撰的《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四十二卷，总目后有“至元庚辰良月郑氏积诚堂刊”牌记二行。《事林广记》是当时的新型类书，分53门，是日用百科全书，很有市场。书中还刻有大小不一的许多插图，浑朴厚重，是建安版画的代表作品之一。至正十一年（1351年）崇川书府刻印出版的元李廉辑的《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自序后有“至正辛卯腊月崇川书府重刊”牌记。崇川即指崇化。同年，建安同文堂刻印出版的《四书经疑问对》八卷，后有刊书跋，称“相传以为进士董彝宗文所编……至正辛卯仲夏建安

同文堂谨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高氏日新堂刻印出版的宋陈师文等撰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目录后题“建安丙午年高氏日新堂刊”。二十七年（1367年）建阳书林刘克常刻印出版的《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前集》目录后有刘克常识语：“《源流至论》一书，议论精确，毫分缕析，场屋之士得而读之，如射之中乎正鹄，甚有赖焉。然此书板行于世久矣，先因回禄之余，遂为缺典。本堂今求到邑校官孟声董先生镛抄本，欲便刊行。惟恐中间鲁鱼亥豕者多，更于好事处访购到原本，端请名儒重加标点，参考无误，仍分四集，敬寿诸梓，嘉与四方君□□之幸鉴。□□疆圉协洽之岁仲夏，建阳书林刘克常敬识。”(见原书）一看便知此识语带有强烈的广告性质。原本既遭火灾，仅得董镛抄本便欲重刊。只是因为怕错字太多，才又更访到原本，进行校刊。哪那么容易访到原本？这是骗人的话，是炒卖点的话，书肆出版的本质——牟利，由此可见一斑。所有上述这些出版实例表明，建阳名肆外，确还有一批不太知名的出版商，他们与名坊一道，构成了元代民营出版事业中的有生力量。

叶德辉《书林清话》说元代“朝廷以道学笼络南人，士子进身儒学与杂流并进”（见该书卷四《元时书坊刻书之盛》条)。这跟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重行科举取士前的吏治杂乱有关。丞相伯颜与参政许有壬为是否实行科举有过激烈的争论：“伯颜曰：‘科举取人，实妨选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余名，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科举于选法果相妨乎？否也。”[1] 由于在取士用人的路线上有长期的争论，故元代之官“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赀进，至于工匠皆入班资，而舆吏亦跻流品。……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欤”[2]。所以各地书坊对大部头的经史之作，在出版上并不十分积极。相反，盛行于元代的散曲，由于它形式简单，坦率真挚，清新活泼，故为很多人所喜爱。建阳书坊与大都、古杭书坊眼光一样敏锐，善于捕捉商机，

【1】[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

【2】[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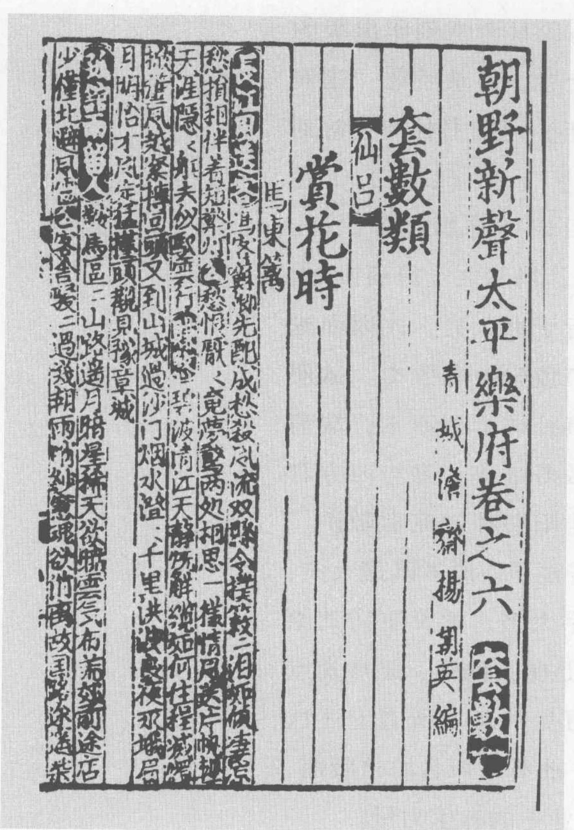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卷之六 套數
青城隱 楊朝英 編
套數類
【仙呂】賞花時
馬東籬

图76
元刻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

刻了不少元人的北散曲。如元人杨朝英辑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九卷（图76）、《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前集》五卷《后集》五卷，建阳书坊就都曾刻印出版。建阳书坊还刻印出版过《梨园按试乐府新声》三卷。仁宗皇庆重行科举之后，士子为了进身，又不得不读经阅史，于是类书及帖括经义的辅导考试用的书籍，又成了书坊倾心出版的猎物。如《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诗传通释大成》、《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联新事备诗学大成》等书，都由书坊出版，方便举子备考。更有所谓《启札截江网》十集六十八卷，《群书会元截江网》、《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等场屋用书，先后由建阳书坊出版。这些书很多是程文策论，应付科场的辅导材料。这些书的编辑出版，有方便举子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坊主的出版思想在赚钱。这就是坊肆与官署、私宅、学者个人在刻书出版思想上本质的区别。

元代坊肆刻书出版除大都、平阳、古杭、建阳等地比较集中比较突出外，还有江西庐陵胡莒节的古林书堂于后至元五年（1339年）刻印出版过《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十二卷，六年（1340年）又刻印出版《新刊黄帝内经灵枢》十二卷，至正十六年（1356年）刻印出版《新刊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还刻印出版过《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指南总论》三卷《图经本草》一卷；庐陵书肆竹坪书堂于至正九年（1349年）刻印出版过《周易程朱先生传义附录》二十卷，《程子上下篇义》一卷，《朱子易图说》一卷《五赞》一卷《筮义》一卷，《永类

钤方》三十二卷；庐陵孙氏益友书堂于后至元间刻印出版过《范德机诗集》七卷，《新编翰林珠玉》六卷；庐陵泰宇书堂于至正三年（1343年）刻印出版过《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前集》二卷《后集》二卷。其他地方，如金华、明州等地也有书坊，不再例举。

元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有的百年老铺，旧店新张；有的开业新营，不让旧铺。这些书肆有的集选题、编纂、刻印、发行于一身，独立全方位经营；有的多承应刻印，少自办出版；有的只办经销，少营出版。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才正常，这才能繁荣出版事业。至于出版倾向、出版思想，各坊各肆不完全一样，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于是才有生气，有生命力。一纸广告宣传读了我出版的书便“场屋用之，如庖丁解牛，不劳余刃”，多大的诱惑力！商战如兵战，“兵不厌诈”，有时也难以责备。只要出版品不粗制滥造，广告宣传上说些大话，自古有之。这已成了规律。

## 三、元代寺观僧人的刻书出版概况

元朝廷在思想上笃信佛教，盖始自元世祖忽必烈对土番僧人八思巴的尊信。八思巴的祖父朵栗赤，便以其法佐国主，霸西域十余年。“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年十五，谒帝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幸。中统元年，即帝位，尊为国师，授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至元六年，诏颁行天下。……遂升号八思巴曰大宝法王。十一年，请告西还，乃以其弟亦怜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死。……亦怜真嗣，凡六岁，至是死，复以答儿麻八剌嗣位。自是每帝师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为嗣，终元世无改焉”[1]。“按元自太祖起朔方时，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且险远，俗犷好斗，思有以柔服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尽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帅臣以下，亦僧俗并用，军民尽属统理。于是帝师之命，与诏勅並行

[1]［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八《佛教之崇》。

西土”[1]。这种宗教信仰与政治杂糅而生出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与策略，从社会现象上看，就是上面尊崇，下面肆行。寺院遍天下，僧侣满域中。表现在刻印出版单经大藏上就显得尤为频繁。元代寺院所刻单经大藏，有的是朝廷出资，有的是施主发愿，有的是寺田积累，有的是募化众缘，不完全都是民间性质。

（一）朝廷泥金书写释家单经大藏

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二月丙申，“敕镂板印造帝师八合思八新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路僧人”[2]。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二月戊午，“给书西天字《维摩经》金三千两”。三月癸未，“赐钞万锭，命晋王也孙铁木儿赈济辽东贫民。晋王内史拾得闾加荣禄大夫，封桓国公。给金九百两、银百五十两，书金字《藏经》”[3]。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三月乙酉，“宝集寺金书西番《波若经》成，置大内香殿”[4]。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丁亥，“敕金书《藏经》二部，命拜住等总之”[5]。这是明确无误的朝廷出公帑书写金字《藏经》的实证。泰定二年（1325年）七月庚午，“以国用不足，罢书金字《藏经》”[6]。泰定三年（1326年）二月丙申，“建显宗神御殿于卢师寺，赐额曰大天源延圣寺，敕以金书西番字《藏经》”[7]。至顺二年（1331年）四月戊辰，“诏以泥金畏兀字书《无量寿佛经》千部”[8]。拜住是英宗朝的中书左丞相，故受命总领泥金书写《藏经》事。然英宗在位只有三年便过世，故于泰定帝掌国的第二年，便以“国用不足”为由，下令停止了这项工程。然延祐五年三月癸未“给金九百两、银百五十两”敕书的那部金字《藏经》完成了没有，史未明书。但不管其成与否，不只一次由朝廷下令命工用泥金书写大藏，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仅见的。它只能说明，元代从皇帝起便对佛教崇信至深。写刻单经大藏，都是为了表示对佛祖的虔诚。为了进一步表示虔诚笃信，于是就出现了嗑破中指以血来写经者；乃至用泥金书写单经大藏者。元代用泥金所写的佛经虽未得见，明代青海玉树权贵几十年陆续用泥金书写的藏文《大藏经》却至今还有留存。其后历代宫廷、施主以泥金所写单经则赓续不断。这无疑是为了做

[1]［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八《佛教之崇》。

[2]《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八》。

[3]《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三》。

[4]《元史》卷二十七《英宗本纪一》。

[5]《元史》卷二十八《英宗本纪二》。

[6]《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纪一》。

[7]《元史》卷三十《泰定帝纪二》。

[8]《元史》卷三十五《文宗本纪四》。

大公德，以求佛祖保佑，死后成佛，享受清福。朝廷如此，个人如此，各地寺院更是如此。

（二）元代寺院刻印出版释家单经大藏

蒙古人不堪金人压迫，起兵先打金人的朋友西夏，结果金人未管，使蒙古骑兵得势灭了西夏。西夏人清逸俊秀，帮助蒙古人灭金绝宋，颇著功绩。然西夏人笃信佛教，已成民俗。为迎合西夏人的信仰，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便由朝廷筹资于杭州路大万寿寺开雕河西字即西夏文的《大藏经》。此次开雕河西字《大藏经》，由藏族经学大师管主八总领其事，党项羌人昔毕小狗铁、昔毕土情、杨朵尔只等参与其事，在杭州路大万寿寺开雕《大藏经》。翌年六月世祖崩，成宗铁穆耳即位。这一年，也就是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巳，成宗下令“罢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经》板”[1]。宣政院初设于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名总制院。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名宣政院，秩从一品，专管全国佛教事宜和藏族地区的军政事务。此次在杭州路大万寿寺开雕河西字《大藏经》，就是由宣政院主办的，所以才有成宗“罢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经》板”之敕。然不久又恢复，至大德六年（1302年）夏雕版工竣，共刻经3 620卷，前后印造100多部，广施西夏人生活的西北地区。这是入元以来由宣政院主办、大万寿寺承办刻印出版的第一部河西字《大藏经》。（图77）其工程规模较大，对各方面的影响也很深远。这是元代中央职能部门出资并主持刻印出版的第一部西夏文《大藏经》，而具体操办其事者则是杭州的大万寿寺。可见那时的出版者宣政院，与付梓印制者已分而行之，已有些类似今天出版社与印刷

[1]《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一》。

图77
元大德杭州路大万寿寺刻本河西字《大方广佛华严经》

厂的关系。

自至元六年（1269年）起，杭州路余杭大普宁寺开始镌雕《普宁藏》版，由道安、如一、如贤诸禅师总领其事。普宁寺初名传灯院，创建于南宋绍兴初年。至淳熙七年(1180年) 改名普宁寺。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经板雕镌告竣，共刻经6 010卷，587函。《千字文》编号始“天”终“约”。每版框高25.3厘米，每开6行，行17字，经折装。此为元代寺院刻印出版汉文大藏的实例。

南宋理宗时，曾在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开雕《碛砂藏》，因宋元易代未能完成。元大德五年（1301年），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朱文清，同他的儿子朱显祖一起施财舍入碛砂延圣院，刊造《大藏经》1 000卷。大德十年（1306年），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中统钞二百锭，又募缘施入钱财，助刻1 000余卷。至大三年(1310年)，寺僧慧联等施其先师遗财，助刻1 000卷。这样，从宋绍定四年（1231年）开雕的这部大藏，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才算告竣。迭经宋元两代，历时91年，共刻经6 362卷，591函，1 532部。此为元代寺院续刻汉文大藏的实例。

元大德十年（1306年），福州开元庄严禅寺住持沙门，募缘补刊《毗卢大藏经》板一副。英宗至治间（1321—1323年），比丘祖意又募缘补刊东禅寺经板多至万板。此亦为元代补刻汉文大藏的实例。

元武宗至大间（1308—1311年），曾开雕西藏喇嘛乔依奥爱尔同蒙古、维吾尔及汉人学者共同译出的蒙文大藏。此为最早的蒙文大藏之刻印。

元世祖曾下令雕造河西字、吐番字《大藏经》版。河西字大藏由宣政院主持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竣，前已表述。宣政院是朝廷中专门主管佛教事务和西藏军政事务的职能机构，长官由西藏来的帝师担任。既奉旨开雕了河西字《大藏经》，藏文大藏当也由该院执行，可史无明书。但有一种说法，西藏嘉木样于元仁宗时（1312—1320年）发愿，在后藏札什伦布寺西南的奈塘寺，刊

刻了完备的藏文《大藏经》，称为奈塘古版。所谓完备，那就应该是《甘珠尔》、《丹珠尔》俱全。若果真如此，则早在元代已有了藏文大藏问世。

当然，还有些寺院虽未刻印出版过大藏，但也刻印出版过一些单经，乃至于世俗的四部著作。如大明禅寺于至正二年(1342年）便刻印出版过宋释法润的《天童觉和尚颂古集》一卷，宋释重显、远尘的《雪窦显和尚颂古集》一卷，宋释从园的《投子青禅师颂古集》一卷，宋释庆环的《丹霞淳禅师颂古集》一卷；五文寺刻印出版过宋黄庭坚撰、任渊注的《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二十卷；中兴路资福寺至正元年（1341年）刻印出版过无闻和尚注释的《金刚经》套印本；嘉兴路福源禅寺刻印出版过元释清珙的《石屋和尚嘉兴福源寺语录偈颂》二卷等，都是这方面的实例。

还有和尚也参与刻书出版，意在广传教义，绝无牟利之心，这是不同的出版思想。现可考知者，至大二年（1309年）吴城西幻住庵比丘永中刻印出版过宋释契嵩的《镡津文集》二十卷，后有永中跋，称："《镡津文集》诸方板行已久，惟传之未广，因细其字画，重新锓梓。工食之费，荷好事者助已成之，其名衔具题各卷之末。惟冀义天开朗，性海宏深，庶有补于见闻，抑普资于教化者矣。至大已酉孟春吴城西幻住庵比丘永忠谨志。"这种出版思想较之坊肆绝对不同。后至元二年（1336年）明悟和尚刻印出版过《梵网经卢舍佛说心地法门品菩萨戒本》一卷。至正七年(1347年）嘉兴路大中祥符寺住持念常募资刻印出版过元释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二十二卷。延祐三年(1316年）苾蒭和尚刻印出版过宋释道原的《景德传灯录》三十卷《西来年表》一卷。后至元六年（1340年）高会和尚刻印出版过元释可观编、高会重辑的《宋史岳飞传》一卷、《岳忠武庙名贤诗》一卷。后至元间(1335—1340年）京师大慈仁寺沙门真空刻印出版金韩孝彦编、韩道昭重编的《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十五卷，他自已撰的《新编篇韵贯珠集》八卷《玉钥匙门法》一卷。至正二十年（1360

年）绍明和尚刻印出版过元释了通的《大颠和尚注心经》一卷。圆至和尚刻印出版过宋周弼编、自已注的《唐三体诗说》二十一卷。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慧钦和尚刻印出版过《缁门警训》二卷。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宝生和尚刻印出版过《新刊万僧问答景德传灯录》三十卷。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释觉岸刻印出版自已编撰的《释氏稽古略》四卷。至正间（1341—1368年）继祖和尚刻印出版《建康路崇因禅寺语录》一卷、《集庆路蒋山大崇禧万寿寺语录》一卷。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奉佛信人顾道珍自已写样上版刻印了宋释普济的《五灯会元》二十卷。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元代僧人也积极参与了社会上的出版活动。

（三）元代玄都观刻印出版道家大藏

蒙古太宗九年（1237年）山东掖县（今莱州市）道士披云真人宋德方在平阳主持醮事，回忆起他师傅丘处机长春真人的嘱托，决心雕印《道藏》。乃与门人陵川通真子秦志安等共谋其事。丞相胡公捐白金千两作为启动费，乃立局镌板。由秦志安在平阳玄都观总领其事，召雇雕印工人500多人，每天校雠开板。到八年后的公元1244年全部工竣，凡七千八百余卷。因在平阳玄都观刊雕，故名《玄都宝藏》（图78）。版藏观内，后移贮平阳永乐

有常耶俱無常耶常無常耶非常非無常耶
爾時天尊安心含笑荅海空言善哉善哉善
男子一切凡夫有身無身煩惱之身何以故
煩惱身者囊裹膿血障於道性是故衆生不
悟煩惱有眞道眞道之性不在內耶不在
外耶不在中間亦不有耶亦不無耶非過去
耶非見在耶非未來耶非色心耶非自他耶
非有命耶非無命耶非有身耶非無身耶非
有常耶非無常耶爾時海空稽首作禮白天
尊言如是所説非有身耶非無身耶云何煩
惱障於道性道性之身從父母耶從微塵耶
從幻化耶從自然耶從虛空耶從變易耶從
善生耶從惡生耶從畜生耶從地獄耶從天
上耶若從父母生道性者云何父母是煩惱
耶非煩惱耶若是煩惱云何能生眞道性者
若是眞生眞性應常云何眞性從煩惱生若
從煩惱煩惱之障或墮於地獄道性之生亦

图78
蒙古乃马真后三年刻《玄都宝藏》本《云笈七籤》

镇纯阳万寿宫。此藏与金明昌年间（1190—1196年）中都大天长观之《大金玄都宝藏》名同而实异。此为元代道观刻印出版《道藏》之实例。元初，释、道交恶，互相斗争，由皇帝下令毁掉《道藏》版片，所以留传至今的《玄都宝藏》零帙，已屈指可数，吉光片羽，寥若晨星。上述便是元代寺观及僧人出版的基本情况。

佛教寺院与道教宫观参与出版活动由来已久，至少在唐代已然，甚至中华民族首先发明雕版印刷术都与佛教的促进有关，并且形成了传统。什么事物一形成传统，它就有了发展延续的自身内在的动力。有了这个动力，它就会滚动出赓续不断的轨迹，而这道轨迹就是历史。中国封建社会寺、观参与刻书出版事业的历史轨迹，表现得就十分明显。

# 第十六章　元代出版图籍的装帧艺术

## 第一节　元代出版图籍的版式设计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习俗和文化风尚。这些社会习俗和文化风尚反映在书籍出版的版刻风格上，也会形成若干不同的时代特点。元代定鼎前蒙古时期所刻的书，不是出版于北京，便是出版于山西平阳。这两个地区，辽、金时都是刻书中心，各有风格。蒙古时期仍在此地刻书出版，风格自然延续金源，比较精细考究。推其原因，跟金人破汴梁后移来一些北宋书坊到平阳老店新张，继续从事刻书出版事业有关。但纵观元代所刻之书，一般而言，其特点大略可用八个大字概括：黑口、赵字、无讳、多简。现就这四个方面，分述如下。

所谓黑口，系指每版的中缝线为粗大黑线，书史和版本学上称其为黑口。当然，元代刻书白口者也有，但不多。特别是元初南方所刻的书，多为宋代遗民所主持，其风格特点也就多存宋版遗韵。如前边所说的大德九年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刻印的《梦溪笔谈》、至元二十四年武夷詹光祖月厓书堂刻印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就都是白口。但就一般而言，元代刻书绝大多数还是黑口。

书口是雕版印书的产物。雕版印书之前，书籍的生产主要是靠手写。手写的书用不着分成若干版，一章一篇一卷，只要一行

接一行地写下去即可。雕版印书出现以后，书籍的生产方式改变了，书籍的形式也随之变化。雕版印书不好照手写那样，一章一篇一卷毫无间断地镌刻下去。因为照手写那样，既无那么长的木板，而且实际上在写样上版、工匠镌雕、敷墨印刷、装帧方式等方面，也都要受到限制，甚至根本无法实施。因此，雕版印书出现以后，书籍的形式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即从手写时代毫不间断的书写方式，变成一版一版之间首尾相联的形式。而且随着书籍的装帧形式逐渐由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向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过渡，书籍的每一版又从中间一分为二。右边称为上半版，左边称为下半版。而这上下（或称前后）两个半版中间那一行不刻正文的地方就叫书口，也称为版口。书口的作用有二：一是镌刻书名、本版大小字数、卷第、刊工姓名；二是标定本版书叶的中缝线。宋代刻书多是白口，其中缝线则以鱼尾凹心正中为准。到了南宋，书籍的装帧形式开始由蝴蝶装向包背装发展，书口也就随着由内向书脊处转变为外向的边口处，这样每版的边栏和中缝线就越发要要求美观和准确。所以到了南宋，书口就出现了细黑口，或称线黑口，目的是为折叶时有更准确的标志。但白口也罢，细黑口也罢，书口都需要细致地剔挖。每版如此，其劳师费时可想而知。

到了元朝，雕版印书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刻书技术固然更加成熟，但镌刻工艺则已不如起初那样严肃认真，精益求精。事物大率都是这样，开始时虽然技术未必纯熟，但由于工作态度一丝不苟，产品质量和工艺却往往很考究。但到了后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普及和生产量的加大，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掉以轻心或偷工取巧，结果使产品的工艺和质量反而有所下降。元朝刻书之所以多是黑口，原因就是刻书的主持人或工匠们，或是贪图节约成本，速成易售；或是不甘于奴役的地位；或是对技术掉以轻心，苟且敷衍；或是因经济困惑，无力精雕细镂。总之一句话，元朝社会政治、经济的某些倒退，反映在雕版印书上，非但在镌刻刀法、印纸敷墨上显得毛糙，即使在书口上也借用铺陈

夸张的手法，将宋朝出现的细黑口加以夸张，一下改变为粗黑口，或称大黑口，借以偷工取巧，节时省工。此为元朝刻书多是黑口的内在原因。这虽然是不好的现象，但如果社会上的刻书都采取这种形式，那么也就形成了一代刻书的版式特色。这是元代刻书出版在版式上的一大变化。在版本学上也将其当作一大特点，掌握了这一点，对于考定元刻本书亦可得一佐证。但绝不可胶柱鼓瑟，生搬硬套。明初刻书，乃至明嘉靖以前的明代公私刻书，其书口仍沿袭元版遗风，亦多是大黑口。这既是历史的沿袭，也为版本考定提出了鉴别上的挑战。

所谓赵字，系指元朝刻书大多数都是模仿赵孟頫的字，即所谓的吴兴体。此为元朝刻书版面风格的又一明显特点。元版书的字体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的风格特点，这与赵孟頫的身世、地位、学问以及在书画方面的高深造诣有直接的关系。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宋太祖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宋朝的宗室。他自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到江南搜访遗逸，得孟頫以之入见元世祖，世祖顾之甚喜。当时正遇朝廷要立尚书省，世祖便命孟頫草拟诏书，颁行天下。帝览而喜之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自此宠信日盛。一天，赵孟頫骑马行走在东御墙外，因为路险，马跌坠于河。皇帝闻知此事后，竟下令将御墙向西移筑二丈许。且令孟頫出入宫门无禁。仁宗即位后，诏除孟頫为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1314年），改授翰林侍讲学士，资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此后帝待之愈厚，以字呼之而不直称其名。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赵孟頫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后来赵孟頫尝累月不至宫中，帝问其故，皆谓其年老畏寒。于是帝命御府赐予貂裘。至治二年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为魏国公，谥文敏。一位受皇帝如此尊重嘉许的人，这本身就给他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加之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

天下"[1]，所以，"元代不但士大夫竞学赵书，如鲜于困学、康里子山；即方外，如伯雨辈，亦刻意力追，且各存自己面目。其时如官本刻经、史，私家刊诗文集，亦皆摹吴兴体。到明初，吴中四杰高、杨、张、徐，尚沿其法。即刊板所见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狭行细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赵体"[2]。可见，元刻本书多作赵字，实是一时的风气。其原因固然与赵孟頫的身世、地位、学问、修养有密切的关系，但主要的还是由于他在书法造诣上成了唐代以后的集大成者。"宋时惟蔡忠惠、米南宫用晋法，亦只是具体而微。直至元时，有赵集贤出，始尽右军之妙，而得晋人之正脉。故世之评其书者，以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又曰：自右军以后，唐人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韵；米南宫得其神韵而不得其形似；兼形似神韵而得之者，惟赵子昂一人而已"[3]。这就是说，赵孟頫的书法成就，实系晋王羲之之后的第一人。因此，在元代社会，不但士大夫竞学，即是一般文人也刻意摹仿。直至版印图籍中的官刻私雕，也附庸这种社会风气，皆以效法赵字为美备。所以元代所刻的书，无论官刻私镌，几乎都是赵字的风貌。这也是元刻书籍版面上的风格特点。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宋代刻书的字体风格，浙刻宗欧，蜀刻崇颜，闽刻学柳，江西刻书则兼而有之，那是因为宋代雕版印书兴起之时，本朝自己有影响力的书家还尚未形成，故各地所宗均到唐人那里去寻找偶像。至元，赵孟頫则独擅书坛，影响域内外，故形成了一代刻书版面的字体特色。

所谓无讳，系指元朝刻本书不像宋版书版面那样，皇帝的嫌名御讳处处可见，而是没有讳字。

避讳，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习俗，大约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旁涉辽、金，沿及明、清，前后垂2000余年。但于元朝，则为特例。《元史·程钜夫传》称："程钜夫名文海，避武宗庙讳，以字行。"元武宗名海山，程文海为避武宗御名而以字"钜夫"行，看来元朝似也避讳。其实不然，程钜夫生当宋朝，忽必烈挥师南进，程钜夫随其叔父程飞卿以建昌城降，自己很快

[1]《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2] 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

[3]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七。

从千户除为翰林文字，又进翰林修撰，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且到江南竭诚为元朝统治者搜招隐逸，如赵孟頫就是他给招来的。皇庆元年（1312年），程文海受命修《武宗实录》。他之所以避武宗庙讳，一方面因为他是宋人，积习使然；另一方面他以降臣身份深受元朝的恩宠，又预修《武宗实录》，所以不得不表示自己的阿谀与尊重，故将自己的名字隐去，而以字钜夫行。其实元初诸帝不习汉文，且其名字为音译，无所谓避讳。即以海字为例，在元代的人名、地名、官名中可谓比比皆是，根本不避讳。原因是元朝在玺书颁降、公文往还中，除全用皇帝的御名须回避者外，涉及御名中任何一个单字均可不行回避。"延祐元年十一月，行省准中书省咨，陕西省咨禀科举事件送礼部约会翰林院官议得：拟作称贺表章，元禁字样太繁，今拟除全用御名庙讳不考外，显然凶恶字样，理宜回避。至于休祥极化等字，不须回避。都省请依上施行"[1]。"延祐三年八月，行台劄付准御史台咨奉中书省劄付礼部呈翰林院国史院议得表章格式，除御名庙讳，必合回避，其余字样，似难定拟。都省仰钦依施行"[2]。由此可见，元代讳例只限于全用御名。而元代诸帝的名字又多是音译多字的长名，这样在前代旧籍以及当代学人的著述中，碰上全用御名的地方就极为少见，甚至是没有。加之元人礼制观念薄弱，查禁不严，所以在元代出版的图籍中，就几乎见不到讳字的痕迹。这也是元代刻书在版面上呈现出来的特色。当然也有宋讳缺笔者，那是元人翻刊宋本，或宋末遗民刻书不改旧习所致。

所谓多简，系指元朝刻书多用简体字或俗字，这与宋版书相比，应该说是个弱点，也可以算是一个特点。中国汉字当中，有些字笔划过多，结构过繁，写起来劳神费时。如果将这些字贴在版面上，再操刀镌刻，其费时费工不说，还极易刻穿笔画，故自南宋末期书铺子刻书，就大量使用简体字、异体字和俗体字。进入元朝，非但书铺子，某些官府、儒学、书院，刻书也常用一些简、俗、异体字，目的无他，就是为了节省刊版工本。什么事情一普遍出现，便会形成特点。

【1】《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二十八。

【2】《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二十八。

元朝自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以后，即以蒙古新字为国字，对于汉字就不那么重视。中统元年，忽必烈刚登皇位，就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至元六年（1269年），诏颁行天下。其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寖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1]

【1】《元史》卷二〇二《释老·巴思八传》。

这就是说，元朝早在定鼎之前就创造了蒙古新字，并明文规定以这种字为通用国字，所以对汉字书写和传刻的要求就不那么注意，也不那么严格。加之书铺子图快，书手图简，刻工图省，于是在刻书过程中，特别是一些书铺子所刻的书，就将平时一些常用的简体字或俗体字也用上了。这种现象在元朝以前的宋版书，以及元朝以后的明、清版书中，都是比较少见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可以说是元代刻书在版面上表现出来的独有特点。当然在它前后的刻本书中，尤其是坊本书中，用简体字的现象也有。但总的说，都不像元代刻书在版面上反映得那么普遍。

## 第二节　元代出版图籍的插图版画

在宋、金刻书事业的基础上，元代的版印图籍呈继续发展之势。其在版式风格、插图艺术等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元代的山西、北京、杭州、建阳等各地，刻书出版业都很发达，插图版画也有新貌。在构图绵密和刀锋线条的净练深厚上，都显示了时代的风格。

由于宋元时期版印图籍的普遍发展，版画，尤其是书籍的插图版画也开辟了新天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宋元文学渐渐地面向市民，因而使版画也摆脱了宗教的羁绊，开始为广大群众所需要的文学书和日用书服务。就是此期的佛画，也开始世俗

化，好像更多地表现人间的故事。如元至顺二年（1331年）嘉兴路顾逢祥等刻的《妙法莲华经》版画，变相便有僧有俗了。除了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场面外，也有信民进香，马童肩鞭牵马，也有祥云神女，也有工匠修造殿宇。显然这时的画师和雕工是在结合着现实生活来雕绘佛画（图79）。元代有几部颇具代表性的插图书籍，都和群众的思想教养、精神生活、文化活动有关系，很值得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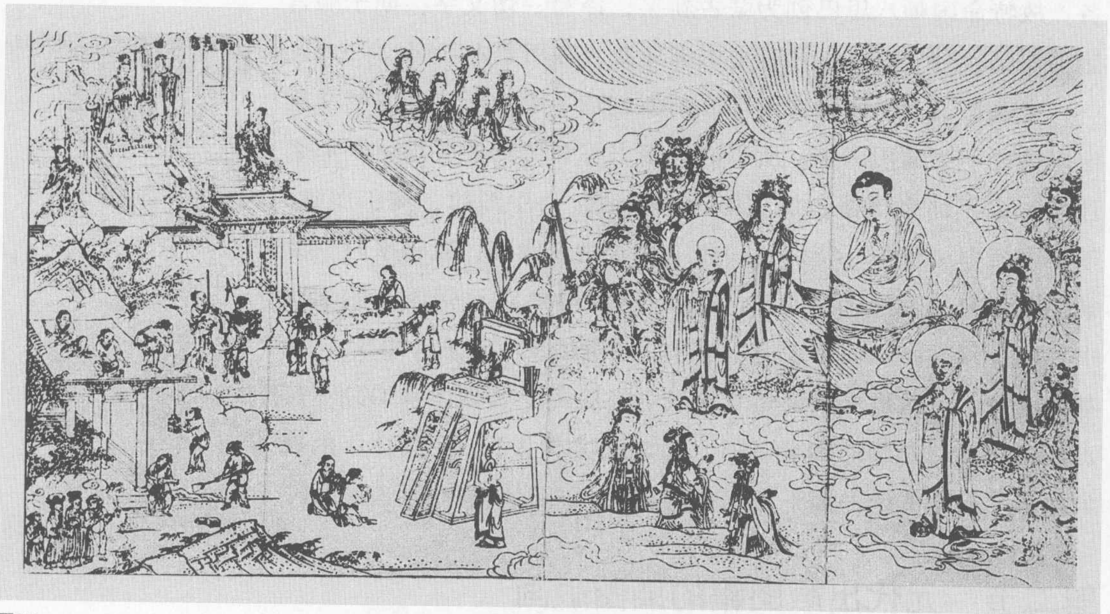


图79
元至顺二年嘉兴路顾逢祥等刻本《妙法莲华经》

至大元年（1308年）贯酸斋主人序刻的《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其插图就很有代表性。贯酸斋是小云石海崖北庭成斋的别名。小云石海崖，是元代宣武将军两淮万户府的达鲁花赤。他序刻的这部《孝经直解》，书版共15叶，图版占版面的三分之一，上图下文。图版据《孝经》15篇章的内容而构绘镌雕。始于“仲尼居曾子侍”，终于“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一图有的连续三五页。人物形象比例适度，位置布列也颇具匠心。配景中的栏楯、几案、竹木、云水等与人物形象也很协调。进一步发展了宋代已经出现的连环插图的版画形式。

元代至治年间福建建安虞氏务本堂先后刻印出版了《全相武

王伐纣平话》、《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全相续前汉书平话》、《全相三国志平话》等有关讲史的平话小说。这几种书图式相同，刀法一致，盖均出自良工吴俊甫、黄叔安等人之手。每页一图，上图下文。每图约占版面的三分之一。每图各有小标题，或居页前，或居页后。图中的主要人物，也用小长方围镌印姓名。在绘图方面，人物形象、动作，生动活泼，变化传神。绘者一般是民间艺人，他们往往根据街头巷尾的民间传说，或书场说书人的叙述，结合自己的生活体会和丰富想象，运用传统的画法，绘制成一幅幅内容丰富的插图，所以这些插图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民间艺术风趣。如《三国志平话》中“孙学究得天书”一图，据原文，学究应在地穴中。但完全身处地穴，别人无法看见，画面也就无需表现了。据文，读者听众能够想象；据画，身居地穴观者便无法透视了。为了既表现身处地穴，又能让观众看见并加以理解，绘者运用舞台台面剖视的手法，将孙学究画成坐于洞门石席上的形态，周围又布刻家人寻找他的画面。使观者既能看到他的朦胧形象，又用家人寻找表现了他又确在穴中。其他如“玄德作平原县丞”、“张飞见曹操”等，在构图上也都很妥贴。在人物的处理上，民间绘刻的版画有两种风格：一种是细腻入微，使人看了“面面是景，处处是花”；另一种是抓住本质，描模大体，放松细节。这两种风格，在元代的版画中都有，这里说的建安虞氏所刻平话，则属后一种。但整个图版制作却极为精细，如《全相武王伐纣平话》中的“汤王祝纲”、“纣王纳妲己”；《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平话》中的“田单火牛阵破燕兵”；《秦并六国平话》中的“焚书坑儒”；《续前汉书平话》中的“吕太后宴十王”诸图，构图布景精细稳定，黑白对照鲜明。总之，这上图下文连续形式的插图版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明代典籍的插图形式、绘制风格、镌刻技法打下了基础。

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之元陈元靓辑撰，元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刻印之《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42卷，是元时人民群众

日用的百科全书，分农桑、花品、果实、竹木、货宝、医学、文籍、器用、音乐、文艺、武艺、算法、技术、茶果、酒曲、面食、饮馔、禽兽、牧养、地舆、胜迹等53门。其后屡刻屡增，分集分门亦各不全同。整版插图，随事连续类插。构图合理，刀刻浑沦古朴，黑白对照鲜明。人物、面形、衣着、几案、房舍、耕织等，都能反映元时的生活风貌。如贵官双陆之戏图，画两位贵官对坐，做双陆之戏。床后立侍者二人，一人捧仗，一人以左手举帽盔。旁陈一几，上杂设酒茗杯箸。人物背后，以屏风作衬景。屏风上画有孔雀和牡丹。一只黑狗正从屏风后面转出。另一幅饮宴图，也是两位贵官分左右坐，侍者正跪地呈献酒果。床侧有捧乐器的乐队在演奏。床左右立着黑狗白狗各一只。这两幅元人贵官宴乐的插图，反映着蒙古统治者的现实生活。主仆尊卑的鲜明对照，以及游牧民族喜爱猎狗的旧习，均跃然纸上。而另外的耕获图、蚕织图，则反映的是田园和蚕织生活。烟云缭绕的远山下，圩堤围绕着水田。堤外有头戴斗笠的农夫在扬鞭扶犁耕作；堤内一壮年赤脚淌水在播洒；几只鸭子悠闲地游出堤外；戴斗笠、担熟稻的农夫泰然行走在回家的路上；主妇提壶携儿送水正前往田间，一幅农家乐的画面，给人以浓郁的田园气息。另一幅是在幽静的农家院子里，突出一座高台阶的房舍。房舍有高大的屋顶，有高挑的飞檐。屋内方砖漫地，屋外有围栏。屋内一妇人在煮茧缫丝。一人在盘丝，一人在纺织。院内仿佛落下两颗黑球，使得家养黑狗翘尾昂头回首在观望，使静中有了动。这完全是一幅男耕女织的农家画面。（图80）

至大重修的《博古图》，是一部古器物的图录。其临绘之逼真，其刀刻之稳健，其敷墨之匀净，其刷印之平实，均足称道。

元代李衎于大德三年（1279年）编绘，延祐末年（1320年）刻印的《竹谱》7卷，是可以与宋刻《梅花喜神谱》媲美的画谱。作者李衎，字仲宾，号息斋，又号息斋道人，蓟丘（今北京房山区宛平城北，亦名北城关）人。他虽生于北方，却到过云南、交趾，深入竹乡，细致观察、深切体验竹子的生长和形态特性，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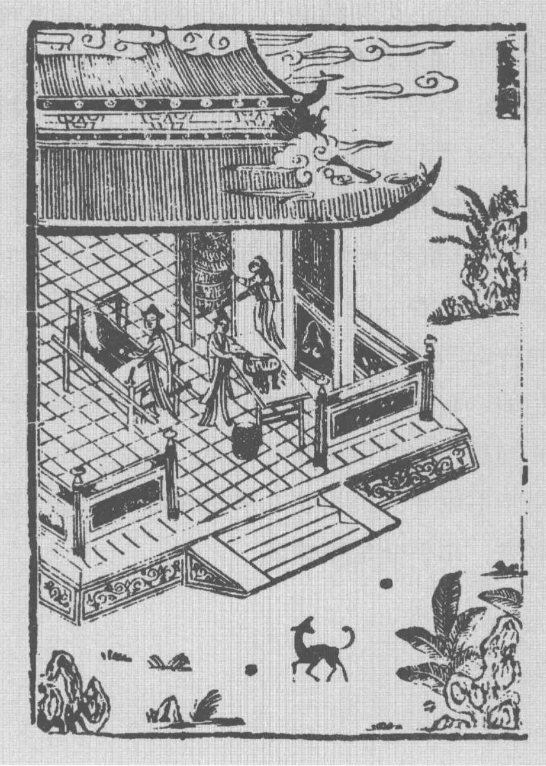



图80
元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刻本《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

以他画的竹一枝一节，一梢一叶，均极生动逼真。全书7卷，分画竹谱、墨竹谱、竹态谱、竹品谱5类，每类前有总说。如竹态谱中便说："若夫态度，则又非一致，要辨老、嫩、荣、枯、风、雨、晦、明一一样态。如风有疾慢，雨有乍久，老有年数，嫩有次序，根、竿、简、叶各有时候。"这种重视描绘对象在客观环境里的变化，仔细观察，抓住特点，然后施笔的作风，是科学的，也是画稿成功的基础。他在每谱总说之后，便分别绘图以示范。如墨竹谱中即图示画竿、画节、画枝、画叶等方法。竹态谱中又图示根、萌、渐长、初篁、成竹等生长过程及过程中的各种形态。还图示竹遇疾风、乍雨、久雨、风翻时的形态变化。所以李衎的《竹谱》，堪称明末十竹斋《竹谱》的前身，《芥子园画谱》的滥觞。

元代带有插图版画的图籍决不止上述几种，但仅就这几种，我们便可以看出元代版画在取材方面更加广泛了，在构图方面更

带有生活气息了，在刀刻技法上更加精熟了，在插图方式上也将卷首扉插、上图下文连续插图以及整版连插等形式固定了下来，对其后的明代插图版画影响极深。特别是小说、平话、戏曲书籍的插图，几乎成了书籍内容不可分割的部分，与读者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日本学者所说："中国元明版画，与戏曲传奇分不开。读了《三国志平话》，不能不看全相本的绘图；看了黄应光所刻'里正夺粮'等，不能不想看看《琵琶记》。所以中国古代的插画，正可与有名的戏曲传奇同存千古。"[1]

【1】王伯敏：《中国版画史》，42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引日本昭和五年《艺文》杂志。

元代版印图籍的装帧形制，无庸多言，可以说是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并行，并均趋于定型而更臻于完美。但此期的卷轴装不但用于佛经，也用于书画了。经折装几乎是专用于大藏，而经、史、子、集四部群书，几乎全是蝴蝶装。

# 第十七章　元代出版物的发行流通概况

## 第一节　朝廷宣赐促进出版流通

封建社会的出版，特别是官署的出版，尤其是朝廷官署的出版，其目的或是资治，或是训导，或是劝戒，或是恤民，所以出版之后的去向也或是进览，或是宣索，或是颁赐，或是庋藏。这是官刻，特别是朝廷官署刻书出版书籍主要的目的和流通方式。

中统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即帝位。三年（1262年）正月庚午，"赐高丽国历"[1]。元初承用的是金代的《大明历》，虽在太祖时就已经发现该历法有误差，但也未采用耶律楚材建议修订的《西征庚午元历》。直到至元四年（1267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十三年（1276年）平宋，遂诏前中书左丞许衡、太子赞善王恂、都水少监郭守敬改治新历"[2]。可证中统元年世祖忽必烈宣赐给高丽的历书，仍应该还是金代的《大明历》。

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二月丙申，"敕镂板印造帝师八合思八新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路僧人"[3]。前边说过，八思巴是西藏人，自其祖朵栗赤即以其法佐国主，霸西域十余世。八思巴年十五谒见忽必烈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幸。中统元年忽必烈即帝位，尊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令其统管天下佛教徒。

【1】《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

【2】《元史》卷五十二《历志一》。

【3】《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八》。

至元元年，又令他领总制院，统辖藏区事务。表明他在僧众和佛教信徒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在藏区事务中亦有极高的权力。其后元朝诸帝都有僧人帝师，且尊崇日隆。然“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薰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有杨琏真加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杂宝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论也”[1]。这是极为典型的僧人作恶的事例。其他僧人不守戒规，践踏国法者也愈来愈多。元世祖忽必烈之所以亲敕刻印出版帝师八思巴新译的《戒本》，颁降诸路僧人，大概就与有些僧人胡作非为有关，旨在用佛教戒律约束僧众的不轨行为。

【1】[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八《佛教之崇》。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月癸亥，“太史院上《授时历经》、《历议》，敕藏于翰林国史院”[2]。这是敕藏的实例。

【2】《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十一》。

大德十一年（1306年）五月甲申，武宗海山即帝位于上都。八月辛亥，“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3]。海山乃顺宗答剌麻八剌的长子，母亲是兴圣皇太后弘吉剌氏。他自己颇有战功，封为怀宁王。大德十一年春，成宗铁穆耳崩。在成宗病中的正月，安西王阿难答与诸王明里铁木儿荧惑中宫，潜谋推成宗皇后伯要真氏称制，由阿难答辅之，实擅重权，变在旦夕。故待武宗即帝位后，深觉安西王阿难答、诸王明里铁木儿、皇后伯要真氏等，从国家来说他们要篡逆乱政，从家族世系来说他们也大逆不孝，篡位乱常，所以他对《孝经》十分看重，于即帝位后之第三个月便下令中书省刻印出版，于诸王以下人等皆宣赐之。目的大概就是要以孝道来伦次内廷。

【3】《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纪一》。

还是这一年，五月乙丑，武宗胞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奉母后会

武宗于上都。甲申，武宗即帝位。六月癸巳，诏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受金宝。且“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象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1]。这次宣赐，有讲资治的《大学衍义》，有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长幼关系的《孝经》，有讲女范懿行的《列女传》，资政、训导之意昭然若揭。

延祐二年（1315年）夏四月辛丑，“命李孟等类集累朝条格，俟成书，闻奏颁行”[2]。这是法令条格、典章制度方面的著作，是事有急需，所以命李孟等分类编集累朝条格，一俟成书就要奏闻颁行。后来成书的《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大元通制》，盖以此为起端，果然成书后刊印颁行。同年八月庚子，“诏江浙行省印《农桑辑要》万部，颁降有司遵守劝课”[3]。那时一次就能印行万部，今天看来也是不小的印数。显然是国家出钱印刷发行，否则也不易达到这个数字。封建社会向来承认民为国本，食为民天。元朝专设大司农司，主管全国农桑。《农桑辑要》就是大司农司组织孟祺、畅师文、苗好谦等共同编纂的农书。全书七卷，分别论述各种作物的栽培及家畜、家禽、蚕、蜂、鱼的饲养。其中栽桑、养蚕各占一卷，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一。对棉花、苎麻尤其提倡种植。成书于至元十年（1273年），曾经刻印颁行，这是又一次刻印颁行。延祐五年（1317年）九月癸亥，“大司农买住等进司农丞苗好谦所撰《栽桑图说》，帝曰：‘农桑衣食之本，此图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间”[4]。可以看出，元朝廷是十分重农的。同月己卯，“以江浙省所印《大学衍义》五十部赐朝臣”[5]。同年十一月丙子，“集贤大学士、太保曲出言：‘唐陆淳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书，有益后学，请令江西行省锓梓，以广其传。’从之”[6]。元仁宗其人“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其孜孜为治，一遵世祖之成宪云”[7]。所以在这一朝宣赐版印的图籍次数最多，

【1】《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纪一》。

【2】《元史》卷二十五《仁宗本纪二》。

【3】《元史》卷二十五《仁宗本纪二》。

【4】《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三》。

【5】《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三》。

【6】《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三》。

【7】《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三》。

数量也最大。

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正月辛酉，“命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也可扎鲁忽赤不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听读仁宗时纂集累朝格例”[1]。至二月辛巳，“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赦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2]。《大元通制》是元代的主要法典。元初沿用金律，世祖时开始制定新律，其内容多参照唐律，而在形式上则多采用宋时的编敕方式，称为条格。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颁行的《至元新格》，就多是编敕形式。这是元初的法典。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完成的《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是元代的行政法典。此次出版颁行的《大元通制》，将世祖以来的诏制、条格、断例重新加以厘正编纂，成为元代的主要法典。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颁行《至正条格》，则是增删《大元通制》而成，共2909条，比《大元通制》又多出370条。法律条格是要众所周知的，所以一成书便要出版颁行。

【1】《元史》卷二十八《英宗本纪二》。

【2】《元史》卷二十八《英宗本纪二》。

泰定元年（1324年）正月甲辰，“敕译《列圣制诏》及《大元通制》，刊本赐百官”[3]。这是个很大的工程，但也要在翻译成蒙文之后刊印出版，宣赐百官。二年（1325年）二月丙戌，“颁《道经》于天下名山宫观”。元初曾扬佛抑道，令毁《玄都宝藏》经版，至此，于道经的看法上有所缓和。这一年的十二月壬寅，“右丞赵简请行区田法于内地，以宋董煟所编《救荒活民书》颁州县”[4]。《救荒活民书》南宋董煟撰，共三卷。卷一分析救荒史迹；卷二论述具体救荒措施；卷三引述宋代有关救荒的议论和事迹。事涉荒政，封建社会历代都很看重此书。特别有灾之年，更易想起此书。泰定二年就有灾，所以向州县颁行此书。致和元年（1328年）正月甲戌，“命绘《蚕麦图》。……丁丑，颁《农桑旧制》十四条于天下，仍诏励有司以察勤惰”[5]。还是跟农事有关。

【3】《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本纪一》。

【4】《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本纪一》。

【5】《元史》卷三十《泰定帝本纪二》。

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九月甲申，“命艺文监以《燕铁木

儿世家》刻板行之”[1]。燕铁木儿曾随武宗镇朔方、备宿卫十余年，特受宠幸。泰定帝致和中累进佥书枢密院事。泰定帝崩，主策立武宗子文宗，捕治奸党，讨平叛乱，卓著勋劳。封太平王，官中书右丞相，加太师。文宗之所以命艺文监刻印出版《燕铁木儿世家》行世，是因为他于策立自己为帝有关。至顺三年（1332年）四月戊午，“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要》，锓板模印，以赐百官”[2]。所谓国字，指的应当是元世祖让帝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中统元年忽必烈一即帝位，便命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3]。所谓以国字译，就是以蒙古新字翻译《贞观政要》。《贞观政要》的内容很多人都知道，完全是一部以史为镜而可资现实之政的杂史之书，所以才翻译，才模印出版，才宣赐百官。

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二月壬寅朔，“颁《农桑辑要》”[4]。六年（1346年）四月癸丑，“颁《至正条格》于天下”[5]。

上述材料，足以表明元代自世祖起，几乎每朝每帝对书籍典章都有宣赐、颁行。从本质上说，这完全是帝王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政治，并不是要推动书籍的出版发行。但历朝帝命宣赐和颁行的书籍很多，却也成了官版书籍发行流通的重要渠道，客观上是促进了书籍的出版发行。这种由皇帝根据各种需要不时宣赐颁行典籍的方式，是其前历代王朝常行的惯例，只是进入宋代刻书出版事业勃兴之后有了更方便的宣赐条件，因而宣赐也就显得更加频繁。元代历朝皇帝对图籍的宣赐，完全是其前历史的延续。这还只讲的是国内，对于周围邻邦，或因索要而宣赐，或作为礼品而赠送者，为数也不少，此留待其后有关章节再讲。

[1]《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纪三》。

[2]《元史》卷三十六《文宗本纪五》。

[3]［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八《佛教之崇》。

[4]《元史》卷四十《顺帝本纪三》。

[5]《元史》卷四十一《顺帝本纪四》。

## 第二节　元代出版物的市场营销

元代出版物市场营销的主体，是各地书肆；元代出版物的消费主体，是童蒙学生，是场屋举子，是有识的官员，是学问家、藏书家，是平民百姓。两者以“销”、“消”二字为纽带而结合

在一起，构筑了元代的图书市场。营销者追求的是销售盈利，因而在选题、出版和发行策略上，都得瞄准市场需求；消费者追求的是求知获益、消遣娱悦、研究问学、收藏鉴赏，因而在选书、购书、藏书上各有所侧重。而能满足所有这些需求的市场中介，就是书肆、书店。元代书肆遍布全国各地，特点是集选题、出版、发行于一身，实行综合经营。这些书肆，熟悉出版的各个环节，每个环节的成本高低、工料多少、售价高低，全能谙熟于心，操作起来得心应手。

## 一、蒙学教材的营销

教材向来是发行量大、用户多的出版品。特别是村塾义学，几乎是每个乡村都有。家里再穷，家长也想让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总要入塾读几年书，识些字。儿童8岁入学，除每天描红临字外，就是念书。一所村塾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不分年级，也分不开班次。采取孔老夫子教学的方法，不是所有学生都由塾师教，而是由先学者教后学者，塾师只教少数先学者，古时这叫登堂入室。念书须循序渐进，不能跳跃。元初有个叫程端礼(1271—1345)的，他字敬叔，号畏斋。浙江鄞县人。他的弟弟程端学，字时叔，号积斋，泰定元年（1324年）进士。端礼治朱子之学，当过建平县学教谕，迁建康江东书院山长，除铅山州学教授，以台州州学教授致仕。一生未离开教育事业，所以于教学有发言权，著有《读书分年日程》三卷，自序说是“一本辅汉卿所萃朱子《读书法》修之”[1]。而朱子《读书法》共有六条：“一曰居敬持志；二曰循序渐进；三曰熟读精思；四曰虚心涵泳；五曰切己体察；六曰著紧用力。端礼本其法而推广之，虽每年月日读书程限不同，而一以六条为纲领。史称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县，即此书也。”[2] 他特别强调读书要循序渐进，盖即一种接一种地读。我们儿时读村塾，读书顺序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名贤集》、《六言杂字》，这叫六本小书。这六本书依次读熟了，倒背如流了，才能添《大

【1】《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三《读书分年日程提要》。

【2】《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三《读书分年日程提要》。

学》、《中庸》、《孟子》、《论语》，即所谓的《四书》。《四书》读完了，再添《诗经》、《书经》、《易经》。其实在一般村塾谁也读不了这么多，也没人教得了这么多。但这些都是课本，学生每人必备。那时专有走乡串村卖书的，叫书倌。书倌一来，学生便蜂拥而上，买自己要添的课本和所需的纸、墨、笔、砚等什物。元时这类教材，以及《童蒙须知》、《幼学故事》、《千家诗》等课外读物，大概就是这么个流通法，书倌成了教材课本的推销人。每种不值多少钱，但需要量大，薄利多销，仍有利可图。

## 二、场屋用书的营销

前边我们在揭示元代刻书出版概况时，已谈到了坊肆为盈利而大量编刻举子考试用的所谓场屋用书。元代铨选官吏到底通过什么途径，争论很久。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才作出最后决定，下诏宣示天下："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弘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举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

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三甲皆正八品。两榜并同。”[1] 诏书一下，天下皆知，士子读书应考的热情被激发了起来，而书肆编刻出版举子们的场屋用书也随之热闹了起来。首先是朱注《四书》，频繁出版。其他类书及帖括经义的书籍也随之不断出版，如《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诗传通释大成》、《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联新事备诗学大成》等等，都跟场屋用书有关。建阳麻沙书坊还刻印出版过一种叫作《启札截江网》的书，10集68卷，前有岁在乙未正月元旦前进士陈元善序。这完全是为适应场屋应用而编刻的。建阳书坊还刻印出版过一部《群书会元截江网》，不署编纂人姓氏，所收内容都是宋理宗时的程式策论之文，是应付科场的参考书。在这类书中，以建阳书坊刻印出版的《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最为典型。是书23卷，附《中兴讲义》1卷，是元蔡柄编校的，首署黄甲省元等名。目录前镌告白：“吕府教旧游庠序，惯熟国史，因《资治通鉴》摘其大纲，分为门类，集为讲义，场屋用之，如庖丁解牛，不劳余刃。昨已刊行，取信天下学者有年矣。今旧板漫灭，有妨披览，重加绣梓，视原本大有径庭，幸鉴观。”这纸告白我们在前边引证过，放在这里，更加能够反映书坊推销的本领。先说这个书“取信天下学者有年”，意在昭示读者自可相信，不必犹豫；再说“旧板漫灭，有妨披览”，所以才“重加绣梓”；但又怕读者手中已有旧本，不肯买新，故紧盯一句“视原本大有径庭”，这就使有无原本的举子都得考虑采买。古今时异而理通，凡涉考试、晋身等与人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导向性活动，都会造成相关书籍的出版与热销。这是市场规律。

【1】[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

## 三、公私收藏构成图书的营销市场

前边表述过一种材料统计，说是元代刻印出版的图书，经部为804种，史部427种，子部763种，集部1 098种，总共3 142种。

这个数字来自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未必全然可信，但总是可以作为参考。假定这些书每种平均印500部，那就有1 571 000部书在社会流通。如果各印1 000部，那就有3 142 000部书在市面流通。几百万部书在不到百年的时间段里共存，在那个时代已是相当可观了。这些书都流向何方，换句话说何处是它们的归宿，其中公私收藏便是一个很大的销售市场。公藏中上至内府，下至各地儒学、书院，都有各自的藏书。比如秘书监，也称为宏文院，就是个刻书和藏书的地方。这个单位有为皇帝收藏御览之书及书法、名画的职责。“至正二年五月，准监丞王奉议道关切”，编制过一部藏书目录，登录：

**在库书**

经，一百二十一部，一千二十三册。

史，七十九部，一千七百二十四册。

集，五十七部，一千七百二十四册。

道书，三百三部，四百二册。

医书，一十四部，一百七十一册。

方书，八部，一百五十二册。

**先次送库书一十二部，四百七十八册**

经，六部，一百一十三册。

史，四部，七十五册。

集，二部，二百九十册。

**后次发下书一千一百五十四部，一万六百三十四册**

经书，二百四十四部，二千一百四十五册。

史，一百三十二部，一千八百四十三册。

子，一百二十二部，七百一十二册。

集，四百六十三部，五千九百三十四册。

法帖，四十二部，二百一十七册。

**续发下书六百四十二部，七千五百一十册**

经，一百六十六部，一千九百四十六册。

史，四十六部，一千二百七十册。

子，二十六部，七十三册。

集，一百二十部，二千五十三册。

类书，九十六部，九百三十一册。

小学书，六十八部，二百二十八册。

志书，三十三部，三百三十册。

医书，五十一部，四百六十一册。

阴阳书，一十五部，一百三十册。

农书，一十二部，三十七册。

兵书，五部，二十一册。

释道书，三部，二十二册。

法帖，一部，一十册。

**书画二千单八轴**

法书，四百八十二轴。

法书，八十三轴。

手卷，三百九十七卷。内府取三十五卷，今在库三百六十四卷。

**名画一千五百五十六轴**

名画，一千一百五十五轴。内府取八十三轴，今在库一千七十二轴。

手卷，三百七十一卷。内府取出三十卷，今在库二百三十七卷。

看册，七帙。

这就是截止至正三年（1343年），元代秘书监秘书库所藏的全部藏品。其中有金、宋时流传下来的，也有“四方购纳”的。表明当时皇家秘书库也花钱四方买书。这是较大型的国家藏书。国家收藏，固然有不少是继藏的前朝旧物，但新刊出版之书，当也在授藏和购藏之列。其他如奎章阁、翰林国史院也藏书。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若干种宋蜀刻唐人文集及元大德陈仁子东山书院

刻《梦溪笔谈》，书上均钤有“翰林国史院”关防，可证这些单位确实藏书。翰林国史院是个专事编修性质的单位，当然需要藏书，也当然需要不断补充新书。至于各地儒学、书院，一般都有尊经阁，用以收藏必备的书籍。这些书籍有的是自己刻印的，大部分也是购买的。所以公藏是图书购买的一大市场。

私人藏书家在元代不算多，但也不算少。元代藏书家有事迹可考者约有127人，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能有这么多的藏书家，数量不能算少。但元代幅员辽阔，版图最为广大，有这么一点藏书家，且分布极不均匀，其数量又不能算多。当然这只是有事迹可考者，无考者当比此数量要多。现将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中关于元代藏书家的几张分析表逐录于此，便于我们下边做藏书家购买分析。

**元代藏书家地区分布表**

| 地区 | 浙江 | 江苏 | 河北（大都） | 江西 | 山西 | 河南 | 山东 | 陕西 | 安徽 | 甘肃 | 其他 |
|---|---|---|---|---|---|---|---|---|---|---|---|
| 人数 | 35 | 25 | 18 | 12 | 6 | 4 | 4 | 3 | 2 | 2 | 16 |
| 比例% | 28 | 19.7 | 14.2 | 9.4 | 4.7 | 3.1 | 3.1 | 2.7 | 1.6 | 1.6 | 12.6 |

**元代藏书家家世分析表**

| 家世情况 | 仕宦 | 世儒 | 富家大族 | 农家贫民 | 商贾 | 不详 |
|---|---|---|---|---|---|---|
| 人数 | 58 | 36 | 15 | 9 | 4 | 5 |
| 比例% | 45.7 | 28.3 | 11.8 | 7.1 | 3.1 | 3.9 |

**元代藏书家本人成分分析表**

| 仕履情况 | 县级以上官员 | 县级教官以下官吏 | 下级军官 | 未仕 | 不详 |
|---|---|---|---|---|---|
| 人数 | 62 | 12 | 4 | 40 | 9 |
| 比例% | 48.8 | 9.4 | 3.1 | 31.5 | 7.1 |

这三张表告诉我们很多问题：第一，藏书家分布集中在江浙，共有60家，占47.7%，这有历史传统和经济繁荣的原因。此地区历来经济富庶，人文荟萃，文化发达，自然出藏书家就多。河北，特别是大都，有18家，占14.2%，这也很正常。辽时南京、

金时中都，都指的今北京地区。那时这里实际是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出版业也发达。至元代，在这里建都，成为全国的首善之区。自然藏书家也较多。江西，历史上要么属两浙，要么属福建，要么自为行省，本也富庶，被刻书出版业包围，自己刻书出版也很发达。藏书家较多也很容易理解。山西有6家，跟金、元时期这里是刻书出版中心也有关。至于藏书家中仕宦、世儒占了74%，更易理解。县级以上官员差不多占一半，也十分正常。封建社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讲气节，特别是少数民族入主，他们不能认同，故入元不仕而以业儒讲学、研讨撰述为事，因而成为藏书家者，也占到了31.5%，也很正常。这些人，构成了元代藏书家中的骨干，收藏都极为宏富。例如袁桷（1266—1327）能“承祖父之业，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1]。苏天爵（1294—1352）家也是四世为学，代代藏书，积书至数万卷，是河北正定著名的仕宦、世儒型的藏书家。贾辅（1192—1254）字元德，今河北固安人。虽从张柔南北征战，却生平喜为学，聚书数万卷。郝经（1223—1275）为贾辅撰《万卷楼记》，谓：“金源氏末，天造草昧，豪杰哄起。于是拥兵者万焉。……积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侯（贾辅）则独不然，息民保境，礼贤聚书，劝学事师而已。于是取众人之所弃以为己有，河朔之书尽往归之，故侯之万者独书焉。……故南北之书皆入侯府，不啻数万卷焉。”[2] 而各类型的藏书家搜购群书，都离不开书肆作为中介桥梁。例如元代藏书家张雯，字子昭，浚仪人。郑元祐撰写的《张子昭墓志》，说他“家临市衢，构楼蓄书，自经传子史，下稗官百家，无不备”。他之所以能“无不备”，其中有个原因就是他“家临市衢”，靠近市场，又住通衢，自己亲莅市场选购群书，或书肆掌柜、学徒登门送书供选，都极为方便。宋刻《草窗韵语》的自跋中就说：“至正十年（1350年）三月，浚仪张雯得之于高文远书肆。五月，重出于吴下乐志斋。”元代藏书家俞琰曾自抄宋李心传《丙子学易编》。此书本15卷，高斯得曾将

【1】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别业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元］郝经：《陵川集》卷二十五《万卷楼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与李心传之《诵诗训》合刻版行于桐江，后散佚。元初俞琬手抄此书后跋云："此书系借闻德坊周家书肆所鬻者，天寒日短，老眼昏花，并日而抄其可取者云云。"[1] 显然是借周家闻德坊所卖宋版传抄，但不是全抄，只是"抄其可取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所抄"盖所存不及十之一矣。然琬邃于易学，凡所采摭，皆其英华，则大旨犹可概见也"[2]。明陆深《俨山外集·豫章漫抄》卷二谓："元至正初，史官遣属官驰驿求书，东南异书颇出。时有蜀帅纽璘之孙，尽出家资，遍游江南，四五年间，得书三十万卷，溯峡归蜀，可谓富矣。""东南异书颇出"，正表明浙、闽出版家云集，刻书多，异书当然也就不少，吸引大户之家专程采购。可证藏书家的确是书籍的营销对象，而藏书家是书籍出版发行的一大流向。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丙子学易编提要》。

[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丙子学易编提要》。

## 第三节　元代出版图籍的外贸流通

蒙古贵族虽以金戈铁马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并在沿路设立了许多驿道、驿站，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商队往来起过便利作用，但就图书对外贸易的流通对象，主要还是高丽、日本、安南及东南亚的周边国家。

### 一、与高丽的贡赐及榷场图书贸易

蒙古骑兵在灭金亡宋的过程中，也马踏了朝鲜半岛。高丽虽曾被迫称臣于辽、金，但对辽、金并不看重，而视为狄夷之邦。至蒙古势力侵入后，他们深知"鞑靼于夷狄最凶悍"，且素无通好之旧，因而竭力抵御一段时间以后，只好调整策略，除一般的称臣纳贡外，还向元帝求婚，使两国变成姻亲关系。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壬辰，"高丽国王王禃遣使奉表，为世子愖请昏"[3]。七月乙酉，"高丽世子王愖入质，珍岛胁从民户来降"[4]。九月癸亥，"高丽世子王愖辞归，赐国王王禃西锦，优诏谕之"[5]。至元十一年（1274年）五月丙申，"以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

[3]《元史》卷七《世祖本纪四》。

[4]《元史》卷七《世祖本纪四》。

[5]《元史》卷七《世祖本纪四》。

高丽世子王惃"[1]。从此高丽与元就变成姻亲关系。高丽能在元代保持宗庙、百官、刑赏、赋税等主权，"万国独一焉"[2]。这种关系确立之后，非但来往频繁，关系也日益深化。

【1】《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

【2】[元]姚遂：《牧庵集》卷三《高丽沈王诗序》。

高丽素称文物之邦，又与元廷有这种特殊的关系，又有向中原搜讨典籍的传统，所以多次有使臣、士人、僧人、商贾来中国求赐或搜购图书。为了兴学立教，早在元成宗、武宗时期，高丽的成钧馆提举司就曾派遣博士柳衍、学谕俞迪前往中国东南购买书籍，回去的时候船翻物落，柳衍赤身登岸，空手而归。虽然如此，他们专门派人到中国东南出版业最繁荣地区采购过书则是事实。此行失败后，洪论又"遣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3]。这是又一次大规模的购书活动。有了这些书籍，高丽忠肃王元年（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六月，高丽大臣安于器等才有可能会于成钧馆，"考阅新购书籍，且试经学"[4]。高丽成钧馆，类似中国古代的国子监，专掌儒学教诲之任。洪论的行实不详，只知他后来封为益城君，任密直，来往于高丽与元代中国之间。而益城君的首封者是高丽重臣洪奎，洪论盖是洪奎后人，才得以袭封益城君，又任判典校寺事，故对收集典籍，广搜异本十分热心。柳衍首来购书而落海，他就再给他钱让他再次来华采购。不仅如此，据说还是因洪论之奏请，高丽忠肃王还曾于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七月派使来朝，索要图书。元仁宗一次就宣赐给高丽"书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册，共计一万七千卷，皆宋秘阁所藏，因洪论之奏也"[5]。元代虽起朔漠，不谙文事，但自1236年接受耶律楚材建议在平阳设经籍所、在燕京设编修所以降，便对文化典籍特别注意。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月丙申，"括江南诸郡书版及临安秘书省《乾坤宝典》等书"[6]。至元十三年(1276年）三月丁卯，"伯颜入临安，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暨郊天仪仗，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图书祭器乐器等物"[7]。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庚辰，"以许衡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8]。三年时间三次搜括故宋书籍及书籍版片，所以元初内

【3】郑麟趾：《高丽史》卷三十四《忠肃王世家一》。

【4】郑麟趾：《高丽史》卷三十四《忠肃王世家一》。

【5】郑麟趾：《高丽史》卷三十四《忠肃王世家一》。

【6】《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

【7】《元史》卷九《世祖本纪六》。

【8】《元史》卷十《世祖本纪七》。

府收藏宋代的出版物当是极为丰富的，元仁宗赐给高丽的4 371册书籍，大概就是从宋秘阁劫掠来的战利品。另外，延祐元年（1314年）高丽中宣王入元访问，亲自在大都购书，且派人至江南购书万卷而归。元与高丽曾在两国边界集镇开设榷场，进行互市贸易，其中中国出版的图书也通过榷场传入高丽。这些情况皆表明，高丽是元代图书行销海外的重要市场。

## 二、与日本的商船贸易和日僧购书

元初，元与日本关系不通，元政府虽透过高丽多次遣使造访，有时未到达，有时到达了也没有修睦结果，故世祖忽必烈时曾两次派大军征伐，因而更加交恶。终世祖之世，元日关系仍未正常。直到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元政府“遣僧宁一山者，加妙慈弘济大师，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1]。官方关系仍然未通。但两国民间的商船往来不但从未间断，而且还很频繁。元朝的庆元（今宁波）港，日本的博多港，是元、日之间的贸易港。两港之间，航海时间一般10天即可到达。当时“中国商人向日本出口的商品以铜钱、香药、经卷、书籍、文具、唐画、什器以及金丝织品、金纱、唐锦、唐绫、毛毡等商品为主”[2]。宁波地处东南，濒临大海，江浙、福建、江西出版的图书，都可以经这里销往海外，其中日本就是个主要出口市场。

元朝时期正值日本的镰仓幕府时代。镰仓是古老的名城，属日本神奈川县，在本州中南部相模湾东北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1190年源赖朝任右大将军，参照中国古代将军出征时以营幕为府署的惯例，将自己的幕府设在镰仓。日本建久三年（1192年），又任征夷大将军，是为日本历史上幕府政治的开端。直至1333年，140余年间，称为镰仓幕府时期。所谓幕府，实际是日本封建时代一种军事集权的政治形态。其特点是统治大权全归幕府，天皇则形同虚设。镰仓幕府时期却很重视文化教育，日本“五山的出版事业很盛，但印的多半是禅僧的语录和诗文集，儒、道诸子百家的书、历史书以及其他杂书，似乎都是从

【1】《元史》卷二〇八《外夷一·日本传》。

【2】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2】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303~30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元史》卷二○九《外夷二·安南传》。

元朝输入的"[1]。可证从元朝输入日本的书数量是不小的。"当年日本学者写的《导制庭训往来》载有劝学书目，上列《毛诗》、《尚书》、《周易》、《礼记》、《左传》、《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老子》、《列子》、《庄子》、《史记》、《前汉书》、《后汉书》、《扬子》、《荀子》、《墨子》、《淮南子》、《文中子》、《吴子》、《孙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山海经》、《尔雅》、《神仙传》、《老子传》、《先贤传》、《列女传》、《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群书治要》、《玉篇》、《广韵》等书。这些书都是元代江南书坊刊行，通过商船贩运到日本的"[2]。

此外日本僧人来华者也不少，在日本史册上留名的入元僧就有220余人。这些僧人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历访江南名刹，学法修禅；同时也饱览中华壮美山川，怡情养性。但当他们回国时则会带回佛经和其他书籍。泰定三年（1326年）日本僧安禅来华，购求福州版《大藏经》。天历间（1328—1330年），日本的近江三井寺又委托商船从中国购得《一切经音义》。日僧安公入元、十禅客等人，还先后从中国购回元版《大藏经》。十禅客"经历三年得到二部而回国"[3]。此外，入元僧人还从中国购买《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宗镜录》、《禅林类聚》、《佛祖统纪》等书。同时也买去了不少宋元名画。总之，元与日本关系比较紧张，官方往来虽极疏远，但商贸往来，特别是民间的商贸往来，从来没有间断过。另外就是求法僧，也常常不论政府间关系，彼此相通，照常来华。这两条渠道，是元代社会出版书籍流入日本的主渠道。

## 三、安南使臣来华购书

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征服安南。二年（1261年）安南"光昺遣其族人通侍大夫陈奉公、员外郎诸卫寄班阮琛、员外郎阮演诣阙献书，乞三年一贡。帝从其请，遂封光昺为安南国王"[4]。自此安南与元有了正式的官方往来。至元二年（1265年）七月安

南来使还，“复优诏答之，仍赐历及颁改元诏书”[1]。大德五年(1301年）二月，“太傅完泽等奏安南来使邓汝霖窃画宫苑图本，私买舆地图及禁书等物，又抄写陈言征收交趾文书，及私记北边军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诏责以大义。三月，遣礼部尚书马合马、礼部侍郎乔宗亮持诏谕日燇”[2]。可以证明安南来华使臣中有注意购买图书的。使臣跟仕人不同，使臣更多地注意政治，故能擅自绘制宫苑图本，私下购买中国舆地之图，抄写有关征交趾的文书，暗记北边军情及山川要塞形势，还专门购买元朝严令禁止流通的图书。这显然与来使的身份不符，其用意也是司马昭之心，故引起了太傅完泽的高度警惕。完泽，族土别燕氏，祖和父都是灭金亡宋的功臣。完泽初“以大臣子选为裕宗王府僚属。裕宗为皇太子，署詹事长，入参谋议。出掌环卫，小心慎密。太子甚器重之。……裕宗薨，成宗以皇孙抚军北方，完泽两从入北。至元二十八年桑哥伏诛，世祖咨问廷臣，特拜中书右丞相。完泽入相，革桑哥弊政。……三十一年世祖崩，完泽受遗诏，合宗戚大臣之议，启皇太后，迎成宗即位，诏谕中外，罢征安南之师。……大德四年，加太傅，录军国重事，位望益崇”[3]。这样一位出将入相、功绩显赫的政界老臣，其政治嗅觉自然不低于安南使臣邓汝霖，所以当他发现邓汝霖以购书为名而暴露了上述那些不轨行为，便毅然上书建议朝廷遣使安南，持诏责以大义。由于安南与元的关系时好时坏，因而互相防范，图书贸易显得不如元与高丽的规模。

另外，元代福建的出版业最为发达，而福州、泉州又都是对外贸易的商港。尤其是泉州更是闻名于世的大商业都市。金、银、食糖、生姜、瓷器、丝绸、棉布、茶叶，其中也应当包括书籍等商品；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进口商品，都在这里集散和起运。元人吴澄就说过：“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4] 所以它在元代成了中外政治联系和文化的枢纽。许多中外使节、教士和旅行家都由这里出海或登岸。马可·波罗

[1]《元史》卷二〇九《外夷二·安南传》。

[2]《元史》卷二〇九《外夷二·安南传》。

[3]《元史》卷一三〇《完泽传》。

[4] [元]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十八《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奉忽必烈之命出使伊儿汗国，就是从泉州登船出海的。只是在这种频繁的商贸、文化往来中，中国出版的图书是如何运营的，尤其是向东南亚各国是怎么经销的，目前尚缺乏有力的文字材料，但绝不会没有，只是因文化习俗不同，出口不如高丽、日本那么多。

# 第十八章　元代朝廷对书籍出版与流通的管理

## 第一节　元代朝廷对书籍出版的管理

元代关于图籍出版的管理机构及其管理政策，似乎比较严整。前引"元时书籍，并由中书省牒下诸路刊行"[1]，"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有司，乃许刻印"[2]。正反映了这种情况。又前述至正五年，江浙、江西行中书省奉旨开雕《辽史》一一六卷，《金史》一三五卷。其前均镌有牒文，称："准中书省咨……右丞相奏，去岁教纂修辽、金、宋三代史书……令江浙、江西二省开板，就彼有的学校钱内就用，疾早教各印造一百部来呵……钦此。"六年，刻《宋史》四九六卷《目录》三卷。其前亦镌有牒文："精选高手人匠就用赍去净稿，依式镂板，不致差讹。所用工物，本省贡士庄钱内应付。如果不敷，不以是何钱内放支，年终照算。仍禁约合属，毋得因而一概动扰违错。工毕，用上色高纸印造一百部，装潢完备，差官赴都解纳。"元朝是修史任务最重的一朝，它要负责修撰辽、金、宋三朝史，其实还应该撰写西夏史。宋、辽、西夏，几乎同时享有政权。金灭辽，并未灭夏。按常理金应负责修辽史。然金虽立国，却与宋、西夏鼎足，并未获取全国政权，无暇顾及修前朝史。元立国，奄有四海，一统江山，按中国历史的常规习惯，故承担撰修宋、辽、金

[1]《天禄琳琅书目·茶宴诗注》。

[2]［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中华书局校点本,129页。

三朝史的重任。但西夏史为什么不修，至今不得而知。元人修毕宋、辽、金三史，便由皇帝下令，中书省牒文，由江浙、江西两行中书省开雕。可证元人刻书，特别是官书，确由中书省牒下诸路刊行。

又如前述后至元二年（1336年）十二月初六日，由翰林国史院待制谢端，修撰王文烨，应奉黄清老，编修吕思诚、王沂、杨俊民等，进呈了奎章阁授经郎苏天爵编辑的《国朝文类》，并建议开板印行。翰林院接到他们的奏章后很快转呈礼部。礼部又转呈中书省，并谓："若准所言锓梓刊行，以广其传，不唯黼黻太平，有裨于昭代，抑亦铅椠相继，可望于后人。如蒙准呈，宜从都省移咨江浙行省，于钱粮众多学校内委官提调，刊勒流布。"结果，中书省批准了礼部的咨文，下令"检草令收管，赍咨顺带前去咨请依上施行"。最后由江浙行省下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书吏冯谅。冯谅阅后认为"上项《文类》，记录著述，实关治体"，于是移交西湖书院山长"计料工物价钱，所需赡学钱，遵依省准"。且移文"福建、江东两道廉访司，催促疾早支拨起发"[1]。再一次证明元朝的礼部、中书省确实也管理刻书出版事务，尤其是要管理雕刻有关政治教化的官书。

[1]《四部丛刊》本《国朝文类》卷首。

延祐五年（1318年），由集贤院呈请中书省，劄付礼部议准，发下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各路儒学，刻印了郝文忠的《陵川集》。

至治元年（1321年）御史台根据监察御史的呈请，申报中书省札付礼部议准，发江浙、江西行中书省刻印了王恽的《秋涧先生大全集》。

至正八年（1348年），御史台又根据监察御史段弼、杨惠、王思顺、苏宁等呈请，申报中书省札付礼部议准，牒下江浙行省，发各路儒学刻印了宋褧的《燕石集》。

后至元六年（1340年），国子监牒呈中书省批准，下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派庆元路儒学召工镌刻了《玉海》二百卷、《辞学指南》四卷、《诗考》一卷、《地理考》六卷、《汉

书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汉制考》四卷、《践阼篇集解》一卷、《周易郑康成注》一卷、《姓氏急就篇》二卷、《急就篇补注》四卷、《周书王会补注》一卷、《小学绀珠》十卷、《六经天文篇》二卷、《通鉴答问》五卷等。再一次证明，元朝中书省真是做到了"典领百官，会决庶务"。所以元代各行省、各道肃政廉访司、宣慰司、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所刻的书，很多都有高头背景。当然各行省、各廉访司等，有时也直接批准刻印出版书籍。如后至元五年（1339年）扬州路儒学刻印的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便是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批准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平江路儒学刻印的宋鲍彪注《战国策》十卷，便是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批准的。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元代从中央，到各行省的官府，同时也兼行管理版印图籍。这在封建社会，其前其后都差不多，只是元代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严整。这大概跟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狭隘心理和政治防范有关系。元代各级官府在图书出版前，特别是由各级官署、儒学出版的图籍，其书稿要经过有关机关看详审查，审查合格后再逐级报批，最后才能刻印出版。这种管理实际上最多只能管到官书或官刻之书，而于私宅、坊肆等民间出版，是怎么也管不了这么细的。

## 第二节　元代朝廷对书籍流通的管理

元朝廷不仅对图书出版表现为上述严格的审批手续，对于有碍政权巩固和蛊惑民心、亵渎教化的图书，非但禁止其出版，也禁止其流通。

### 一、禁止天文图谶阴阳伪书的流通

据《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三年（1266年）十一月辛亥，"诏禁天文、图谶等书"[1]。

"至元三年七月，钦奉圣旨，道与中书省据随路军人匠不以

[1]《元史》卷六《世祖本纪三》。

是何投下诸色人等，应有天文图书及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圣旨到日，限一百日赴本处官司呈纳。后限满日，收拾前项禁书，如法封记，申解赴部呈省。若限外收藏禁书，并私习天文之人，或因事发露及有人告首到官，追问得实，并行断罪。钦此"[1]。此为《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的记载。这类图书多属阴阳五行的迷信作品，无非是通过占卜而谶说内外灾祸、水旱兵丧、饥馑疾疫，乃至古今治乱兴亡。这些宣说有时利于封建统治，但也有时蛊惑人心，制造思想混乱，不利于封建统治。故在这一年的七月先下密旨给中书省及各路道，先开始禁止行动，而后到十一月份正式下诏，明示天下，所以正史才有"诏禁天文、图谶等书"的明断。

【1】《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三十二。

至元九年（1272年）三月甲戌，"括民间《四教经》，焚之"[2]。

【2】《元史》卷七《世祖本纪四》。

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己未，"禁鹰坊扰民及阴阳图谶等书"[3]。

【3】《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

"至元十八年三月，中书省咨刑部呈奉省判御史台呈行台咨都昌县贼首杜万一等指白莲会为名作乱。照得江南见有白莲会等名目。五公符、推背图、血盆及应合禁断天文图书，一切左道乱众之术，拟合钦依禁断。仰与秘书监一同拟议连呈事奉此移准秘书监关议得拟合照依圣旨禁断拘收外，据前项图画封记发来事，本部议得若依秘书监所拟，将五公、推背图等天文图书，并左道乱正之术，依上禁断拘收到官封记，发下秘书监收顿，相应都省天下禁断拘收，发来施行"[4]。

【4】《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三十二。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五月庚午，"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5]。针对这些事件，元世祖制定了一条法令："诸妖言惑众，啸聚为乱，为首及同谋者处死，没人其家；为所诱惑相连而起者，仗一百七；诸假托神异，阴谋犯上者，处死。"

【5】《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十》。

"元贞二年二月初五日，中书省咨准河南行省咨陕州路远安县太平山无量寺僧人袁普照，自号无碍祖师，伪造论世秘密经

文，虚谬凶险，刊板印散，扇惑人心，取讫招伏”[1]。“诸告获私造历日者，赏银一百两。如无太史院历日印信，便同私历造者，以违制论”[2]。

从上面引述的这些禁例看，元朝对于图书的流通管理，主要集中在防止利用旁门左道、天文图谶等蛊惑民心，煽动民情，并以此号召组织群众起而反抗元朝统治的图书宣传上。这就和两宋禁印的图书内容不完全一样。两宋十五传，终未独统中华大地，辽、西夏、金、元前后与其对峙，因而军国机密、边界动向便成了禁印的内容。元朝是大一统国家，奄有四海，八方来朝，无多少军国机密对外可守，只怕人民起来从内部动摇、瓦解其统治。故对煽惑民心，鼓动人民造反；或谶说元朝气术短长，伪推天时朔晦，不利元人运祚的图书，都在禁印禁行之列。事实是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二月，漳州陈桂龙及其侄陈吊眼聚众数万起兵反抗；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广王以诳民，谋作乱；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十一月，兴化路仙游朱三十五寇青山；处州青田刘甲、乙等聚众至万余，建名号；至正十一年五月，颍州刘福通、萧县李二兵起。“有韩山童者，栾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言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3]。所有这些，说明元自定鼎那天起人民就不断反抗，而号召人民起而反抗者，则往往利用这些迷信的说教制造舆论，号召群众。这就是元朝廷对这类图书加以严格管理的根本原因。

为此，元朝廷还处分一些执行不力的官员。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十月甲子，“南人林都邻告浙西廉访使张珪收藏禁书及推算帝五行；江浙运使合只亦言珪沮挠盐法，命省、台官同鞫之”[4]。“张珪字公端，弘范之子也。少能挽强命中……至元十六年，弘范平广海，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将赴水死，弘范救而礼之，命珪受学。光荐尝遗一编书，目曰《相业》，语珪曰：‘熟读此，

[1]《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五十二。

[2]《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

[3][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四。

[4]《元史》卷二十《成宗本纪三》。

后必赖其用。'……二十九年入朝。……帝曰'……是家为国灭金、灭宋，尽死力者三世矣。……'拜镇国上将军、江淮行枢密副使。……大德三年……珪得盐司奸利事，将发之，事干行省，有内不自安者，欲以危法中珪，赂遗近臣，妄言珪有厌胜事，且沮盐法。帝遣官杂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盐官欺罔状，皆伏罪。召珪拜佥枢密院事……"[1]。显然这是一次蓄意诬告，且张珪家有开国之功，故非但未受惩罚，反而继续升官。

【1】《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又"张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后徙平州……力学、工文辞。至元二十九年，用荐者授将仕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预修《世祖实录》，陞应奉翰林文字，寻陞修撰，历兴文署令，迁太常博士……至大初，改太常寺为太常礼仪院，即除昇为判官。久之，外补知汝宁府。民有告寄束书于其家者，踰三年取阅，有禁书一编，且记里中大家姓名于上，昇亟呼吏焚其书，曰：'妄言诬民，且再更赦矣，勿论。'同列惧，皆引起。既而事闻，廷议谓昇脱奸轨，遣使穷问，卒无迹可指，乃诘以擅焚书状，昇对曰：'事固类姦轨，然昇备位郡守，为民父母，今斥诬诉，免冤滥，虽重得罪不避。'乃坐夺俸二月"[2]。这两例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元朝廷严禁天文图谶、阴阳伪书政策所误导出来的诬告，并且涉及到了封疆大吏的安危。元初，阶级划分不但带有歧视性，而且采取高压政策，所以阶级反抗也此伏彼起。这类伪妄之书常常被用来当作舆论和号召，鼓动民众啸聚反抗，禁毁这些书，是想从源头上杜绝作乱起因。

【2】《元史》卷一七七《张昇传》。

## 二、禁毁道藏道书的流传

道教在金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重阳子王嚞创立全真教以后，发展很快。原因是全真教"识心见性"、"正心诚意"、"少私寡欲"的教理主张与儒家理学相似，颇多信徒。重阳子传教重点在山东，所以山东人从其教者甚众。门徒长春子丘处机、长生子刘处玄、长真子谭处端、丹阳子马钰称为四友，与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邻、重阳子王嚞合称七真人。其中尤以长春子

丘处机最有名。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便派人到山东莱州延请全真教派首领丘处机。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丘处机率领的18位弟子赶到了成吉思汗的行营，为成吉思汗讲道3次。从此，道教得到蒙古贵族的信任。蒙古太宗九年（1237年），莱州掖城道士披云子宋德方在山西平阳主持醮事，想起师傅丘处机曾嘱托他汇刻道经，于是乃与门人陵川通真子秦志安商办此事。丞相胡公捐白金千两为创始之资，乃立局二十有七，雇五百多名工人开雕《道藏》。秦志安坐镇平阳玄都观，总领其事。到乃马真后三年（1244年），全藏雕印蒇事，名曰《玄都宝藏》，凡7 800卷。至此，道教得宠达到了极点。但什么事都一样，优宠至极，便容易得意忘形，有恃无恐。先是伪造伪印《老子化胡经》，把释迦牟尼说成是老子的化身，引起了释、道两家的激烈斗争。宪宗八年（1258年）皇帝召见道士，令“将先生每（即道士们）说谎做来的《化胡》等经并印板，教烧毁了者”[1]。这当中也包括《道藏》中的此书。至元十七年（1280年）“长春宫里先生每与和尚每争夺观院，其间里聚着伍佰个来先生每，把着棍棒，打和尚们去来……为头儿的杀了两个也，别个的割了耳朵、鼻子的割了也，打的打了也，其余的教做了军也，这般断了也”[2]。显然斗争愈演愈烈。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下令除《道德经》外，《道藏》经文并印板尽行烧毁。十月壬子，“集百官于悯忠寺，焚《道藏》伪经杂书。遣使诸路，俾遵行之，分付差去官眼同焚毁”[3]。这一年，朝廷主管佛教事务的都功德司官员向世祖报告各地道士仍藏伪道经及印板，世祖便派曾任秘书监后升任枢密副使的张易，召佛教长老及道教全真派首领祁志诚等人，同赴道教长春宫检查道教书籍。在检查过程中，佛、道二教首领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易深知世祖笃信佛教，已尊藏族喇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帝师，故张易上疏说：“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余皆后人伪撰，宜悉焚毁。”[4] 这才有了上述“除《道德经》外，《道藏》经文并印板尽行烧毁”之令。还集百官于大都悯忠寺，焚《道藏》伪经杂书。并向诸路

【1】[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忽必烈诏书》。

【2】《元通制条格》卷二十九《寺观僧道数目》。

【3】[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

【4】《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八》。

派遣专督使者，监督焚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灭道毁典事件。表面上看，好像只是《化胡经》把释迦牟尼说成了老子的化身，贬低了佛祖的身份和尊严，实则是忽必烈笃信佛教可以帮他治国安邦，将教与政紧密联系了起来，故教与教之间的斗争，本质上反映的是政治斗争。

## 三、禁止恶言犯上的词曲流通

元代是杂剧创作的黄金时代，作家多，作品也多。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酷嗜元人院本，尝自言“箧中收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种”[1]。“长兴臧懋循家藏杂剧，多秘本。又从麻城刘延伯家得抄本杂剧二三百种。刘氏录之御戏监，与坊本不同。臧氏参伍校订，摘其佳者百种，分前后集刊行（明万历四十三年至四年，1615—1616年），通称《元人百种曲》，或称《元曲选》”[2]。可证元人杂剧创作是非常繁荣的。

【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3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304页。

元代是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都很残酷的时代。有压迫就一定会有反抗，这是永恒的规律。元杂剧则是反映这种压迫与反压迫斗争的很好的文学形式，这不能不引起政府的严切关注。《元史·刑法志三·大恶》中规定：“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这是一款十分严厉的法条，对“伪撰词曲”而恶言犯上的，要处以死刑。但到目前为止，究竟哪位元曲作家因为恶言犯上而被处死了，尚不清楚。其实蒙古贵族统治者长期陶醉于军事上的胜利和金戈铁马的威风，生活逐渐奢糜腐化，追求享乐，杂剧表演通俗易懂，是他们所喜爱的艺术。词曲中对封建统治阶级恶势力的鞭笞，对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控诉，多采取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手法，蒙古贵族中的那些赳赳武夫并没有更多弯弯曲曲的想法，不十分计较，所以虽有法律规定，真正执行起来却又是另一码事。

元代对“诸僧、道伪造经文，犯上惑众，为首者斩，为从者各以轻重论刑”[3]。“诸阴阳家伪造图谶，释、老家私撰经文，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4]。“诸妄言禁书

【3】《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

【4】《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

者，徒”。“诸以阴阳相法，书符呪水，凡异端之术，惑乱人听，希求仕进者，禁之，违者罪之”[1]。还对“诸写匿名文书，所言重者处死，轻者流，没其妻子，与捕获人充赏。事主自获者不赏。诸写匿名文字，讦人私罪，不涉官事者，杖七十七。诸投匿名文字于人家，胁取钱物者，杖八十七，发元籍。诸见匿名文书，非随时败获者，即与烧毁，辄以闻官者，减犯人二等论罪。凡匿名文字，其言不及官府，止欲讦人罪者，如所讦论”[2]。不难看出，元代法律规定还是比较细密的，目的是为了防范，以求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已有政权。

[1]《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

[2]《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

元人在版权管理上比宋人是否有进步，没有资料可以证明。今宁波天一阁收藏一部《元诗》，存三册，为后至元二年(1336年）虞集校选、孙存吾编。该书现存一征稿启事：“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四方吟坛多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李氏建安书堂谨咨。”既然征稿，恐怕对撰稿寄稿人就得付一定报酬。果如此，版权意识上也算是一种进步。

# 第十九章　元代对出版印刷技术的推进

元代在出版印刷技术上有两大进步，一是活字印刷，包括泥活字、木活字的排版印刷；一是套色印刷。这两大技术，一似中间施肥、加油，促进它的发展壮大；一似拾遗补缺，试制成功，不断成长，终于使其登峰造极。元代在出版印刷技术上的推进，既承前启后，又推陈出新，不容低估。

## 第一节　元代对活字印刷术的推进

### 一、元初对泥活字印刷术的实践

泥活字印书术，北宋毕昇已经发明，但他究竟印了什么书，史无记载。南宋周必大进行过实践，自己按沈括《梦溪笔谈》所记北宋毕昇泥活字印书法，又造出了泥活字，排版印制了《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表明泥活字印书法是绝对施之有效的，是完全成功的。

蒙古时期，姚枢曾被聘为皇帝谋士，并做过一任官职。后因蒙古族同僚贪赃枉法，徇情受贿，不忍同流合污，"遂携家来辉，垦荒苏门，粪田数百亩。修二水轮，诛茅为堂……又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自版小学书、《论孟或问》、《家礼》；俾杨中书版《四书》、田和卿版《尚书》、《声诗折衷》、《易程传》、《书

蔡传》、《春秋胡传》，皆脱于燕。又以小学书流布未广，教弟子杨古为沈氏活板，与《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诸书散之四方”[1]。这里所谓的“为沈氏活板”，实则指的仍是根据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毕昇的泥活字印书的活版。姚枢字公茂，柳城（今河南西华西）人。生于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卒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1280年）。据神道碑可知，他在河南辉县粪田农耕，并化民成俗，雕版印书，教弟子杨古制胶泥活字排版印制《小学》书及《近思录》、《东莱经史论说》时，是在庚戌年（1250年），这时姚枢47岁，时代仍在南宋淳祐间。这是目前所知，继周必大之后第二个仿效毕昇用泥活字印书的人。而这些书，也是目前所知次早的泥活字印本。前距周必大在潭州用泥活字排印自己的《玉堂杂记》仅晚57年。这是用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正是这种赓续不断的实践，才激发了其后明代铜活字、清代李瑶、翟金生泥活字印刷技术的继续发展，并在后来与世界接轨，走上铅字排印的共同道路。

[1]［元］姚遂：《牧庵集》卷十五。

## 二、元代木活字印刷技术的成熟

自宋代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之后，虽然发展缓慢，但根据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基本原理，创制不同质料的活字，改进排版技术和检字方法，提高印刷质量的实践活动，却一直赓续未断，直到近代铅字排印大兴，才走上世界共同发展的道路。

毕昇在创制泥活字排版印刷的过程中，就曾试制过木活字。他之所以“不以木为之者”，是因为木材“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看来是因为固版与拆版上的技术问题不易解决，用木质材料制造活字的方法才为毕昇所扬弃。但他制造过木活字，并用它排过版，这大概是毫无疑问的。否则，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不出上述那样切理而中肯的话。

木活字既是因为固版拆版上的技术问题为毕昇试而未用，那么从改进排字、拆版方法入手，能否使木活字印刷试制成功，并不断发扬光大呢？这在雕版印刷盛行的时代，是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和经济意义的课题。事实证明，对于如此重大的科研课题，西夏人以大胆的实践作了正面的回答。前面我们谈及西夏活字排版印书时，曾引证史金波先生考证俄罗斯所藏中国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为12世纪下半叶的木活字印刷品。《大乘百法明镜集》、《三代相照言文集》，也是西夏时的木活字印本。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的《吉祥皆至口和本续之干文》、《吉祥皆至口和本续之障疾文》、《吉祥皆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补》以及近年甘肃武威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等，也都认为是12世纪中、下半叶的活字印刷品。可证11世纪中叶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之后，其原理有人继承，其扬弃的木活字则由西夏人试制成功。

只可惜西夏人并未留下更为翔实的制字材质、制字方法、排印技术等方面的文字资料，使后人无以言其状，倒是在毕昇之后的250年，即元大德二年（1298年），由农学家王桢试制成功并有了详细的记载。

王桢，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元贞元年（1295年）至大德四年（1300年），任安徽旌德县尹，在任6年。王桢是农学家，生活简朴，在旌德县时，捐薪俸修桥补路，施药救人。同时教人种植树艺，改进农具，提高生产。调任江西永丰后，继续提倡桑、麻、木棉的栽培，并用自己的薪俸购买桑苗及木棉子，教人种植。由于他为官清廉，故深受两地人民爱戴，口碑载道。

王桢到旌德县一上任，就了解当地的县置沿革、人丁地亩、道路桥梁、风土人情、乡贤先哲、物产资源等基本情况，以便纂修新的志书，掌握全县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故到任不久，便组织力量纂修《旌德县志》。与此同时，他还不辍所专，总结多年积累的知识，开始撰写自己的专著——《农书》。《文渊阁书目》著录王桢《农书》一部，十册；钱曾《读书敏求记》说《农书》为“农桑通诀”六，“谷谱”四，“农器图谱”十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22卷，并说“其书典瞻而有法……引据赅洽，文章尔雅，绘画亦皆工致，可谓华实兼资”[1]。而实际上《农书》盖为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二该书提要。

37卷，存36卷。这样一部规模可观的著作，若是自己出资，用传统的办法雕印行世，对王桢这样一个比较廉洁的区区县官来讲，无疑是很沉重的负担，故他别生技巧，试制木活字成功。同时他把制造木活字印书的方法，撰成《造活字印书法》，记录整个过程，附在自己《农书》的卷尾。

该文称："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榍掮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印刷之。"这是王桢从制字、排版到印刷程序的简要概括。关于具体步骤，又进一步作了如下的阐述：

"写韵刻字法：先照监韵内可用字数，分为上、下平、上、去、入五声，各分韵头，校勘字样，抄定完备，择能书人取活字样制大小，写出各门字样，糊于板上，命工刊刻。稍留界路，以凭锯截。又有语助辞'之'、'乎'、'者'、'也'字及数目字，并寻常可用字样，各为一门，多刻字数。约有三万余字。写毕，一如前法。

锼字修字法：将刻讫板木上字样，用细齿小锯，每字四方锼下，盛于筐筥器内。每字令人用小裁刀修理齐整。先立准则，于准则内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令贮别器。

作盔嵌字法：于元写监韵各门字数，嵌于木盔内，用竹片行行夹住，摆满，用木榍轻掮之，排于轮上，依前分作五声，用大字标记。

造轮法：用轻木造为大轮，其轮盘径可七尺，轮轴高可三尺许；用大木砧凿窍，上作横架，中贯轮轴，下有钻臼，立转轮盘；以园竹笆铺之，上置活字，板面各依号数，上下相次铺摆。凡置轮两面，一轮置监韵板面，一轮置杂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俱可推转摘字。盖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此转轮之法不劳力而坐致字数。取讫，又可铺还韵内，两得便也。

取字法：将元写监韵另写一册，编成字号，每面各行各字，

俱计号数，与轮上门类相同。一人执韵，依号数唱字，一人于轮上元布轮字板内取摘字只，嵌于所印书板盔内。如有字韵内别无，随手令刊匠添补，疾得完备。

坐盔安字印刷法：有平直干板一片，量面大小，四围作栏。右边空，候摆满盔面，右边安置界栏，以木榍掮之。界行内字样，须要个个修理平正。先有刀削下诸样小竹片，以别器盛贮，如有低邪，随字形衬甃掮之，至字体平稳，然后刷印之。又以棕刷顺界行竖直刷之，不可横刷。印纸亦用棕刷顺界行刷之。此用活字板之定法也。”

王桢这六步活字印刷法，讲得既概括又具体。从写样刻字，到镂字修字；从作盔排字，到造轮摆放；从唱字摘字，到排版印刷，讲得十分清楚，既是他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具体施工的蓝图，较毕昇泥活字印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王桢创制这套木活字的目的，本是为了排印自撰的《农书》。但当大德二年（1298年）木活字制成时，先用它来试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六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百部齐成，效率极高，效果甚好。这是目前所知我国历史上较早的一部木活字排印的志书，可惜这一百部木活字本《旌德县志》，据说传到明朝万历年间就全部散佚了。1987年冬季，福建建阳物资局方彦寿先生来京晤谈，他说王桢木活字本《旌德县志》没有完全失传，近已有发现，听后喜出望外。如果真有此事，收藏单位或个人应该著文披露，为书林增一佳话。

元大德四年（1300年），王桢从安徽旌德县调任江西永丰县，还称“前任宣州旌德县尹时，命匠创造活字，二年而工毕。后二年，迁任信州永丰县，挈而之官”[1]。显然这时他的《农书》还尚未写成，故将活字也带往江西，以便《农书》脱稿后排版印刷。然待他到了江西任所，《农书》脱稿后，江西方面则用传统的办法将《农书》雕版印行了，故带去的活字只好收藏起来，以待别用。然而此后，不见文献记载用这套活字还印过什么书，更无实物和印本流传，故这套活字只印过一种《旌德县志》，便沉埋无

【1】［元］王桢：《农书自序》。

闻了，这也是中国印刷史和出版史上的一件憾事。但这是铁定的事实，不容怀疑。并由此拓展了中国活字印刷的道路，在印刷、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王桢创制木活字印书法试制成功之后20余年，有个广平人马称德，字致远，在浙江奉化知州的任上，也制造了一套木活字，并用它摆印了《大学衍义》等书。

据顺治《奉化县志》卷十三及康熙《奉化县志》卷十一载，元李洧孙所作《知州马称德去思碑记》称："广平马侯称德，字致远，作州于庆元之奉化，兴利补弊，无事不就正……活书板镂至十万字，教养有规。"至正《四明续志》亦称："知州马称德任内置到活板□万字……活字板印到《大学衍义》一部，计二十册。"乾隆《奉化县志》卷十二载元邓文源撰《建尊经阁增置学田记》称："及今次刊到活字书板印成《大学衍义》等书，庋其上……至治二年立石。"所有这些记载，都能证明马称德在奉化知州任上制造了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43卷的《大学衍义》及其他书籍，藏于新建的尊经阁上。这表明元代安徽、浙江一带，确实出现了木活字印书。

木活字印刷术，还相继影响流传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敦煌千佛洞中曾发现过几百个用硬木刻制的回鹘文活字，大部分为法人伯希和携走，只剩下两个，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外，敦煌研究院也还藏有几个。最近有人写文章，从回鹘文字语言学的角度，阐述了其干词、缀词、词组拼合上的排版技术，论定其外传影响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颇有见地，有力地纠正了活字印刷术欧洲发明说的错误论调。

蒙古骑兵征服西夏之后，为了笼络西夏各民族的人心，曾顺应他们信仰佛教的民习，在杭州万寿寺开雕西夏文《大藏经》四千多卷。还出现过西夏文木活字印制的单经。今仍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据王静如先生鉴定，就是木活字印刷的单经。其实早在王先生之前，即1932年，罗福苌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到1972年，王静如先生又据宁夏送来的材

料，再次发表《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一文，进一步论证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木活字印本。

所有这些，表明元代从初期到末期，木活字印书赓续未断，地域上从东到西，文字上从汉文到回鹘文到西夏文，印书虽然不是很普遍，但已初具规模，呈现出不断发展之势。待元亡之后，新的大一统局面形成，正统之势恢复，伴随着雕版印书事业的空前高涨，木活字印书也日益普遍。对于雕版印书来讲活字版印书虽是涓涓细流，但自身的河床却是越流越宽了。

“明胡应麟云：‘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清魏松云：‘活版始于宋……明则用木刻。’清龚显曾云：‘明人用木活字版刷书，风乃大盛。’”[1] 这是用明清人的话，来概括明代木活字印刷比元代大为流行的根据。的确是，明代从内府到藩府，从书院到私宅，乃至于民间，都曾流行木活字印书。从地域上讲，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四川、云南等南方各省，也都先后出现过木活字印书。直至今日，有书名可考的木活字印本书，仍有一百多种，比元代确是大大发展了。根据张秀民先生的考证，依时间顺序比较一下明代木活字印书的年份，不难看出明代木活字印书的步伐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大了。

【1】张秀民：《明代的活字印刷》，《史学史资料》，1980(1)。

## 第二节　元代对套色印刷技术的推进

### 一、套印技术产生的历史原因

套印技术，是雕版印刷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的发生，既是对手写本书籍形式的继承，又是对雕版单色印刷的突破；它的发展，既是在雕版印刷技术上的发展，同时又是对这种固有技术的大胆革新。它使中国特有的雕印技术之花根深叶茂，异彩纷呈，为人类艺术的百花园增添了特色。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书史灿烂辉煌。要探讨套印技术产

生的历史原因，既要到中国书籍发展史中去追寻，也要到早期丝漏印花布中去探索。

中国书籍，如果从初期书籍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早期石刻文字算起，则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而在这些初期书籍中，其书写颜色已有朱墨之分。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文字，已发现有用朱红颜色涂写的。殷墟甲骨文字的契刻中，也发现有朱红颜色，且有尚未镌刻的朱色字迹。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侯马盟书"，除墨书之外，绝大部分也是朱书。至于进入正规书籍阶段，采用缣帛和纸张之后，朱、墨套写的书籍更是屡见不鲜。

据《隋书·经籍志一》著录，汉代贾逵所撰的《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大概是朱、墨套写书籍的最早记载。盖以朱色写经，墨色写传，朱墨灿然，经传分明，赏心悦目。按贾逵撰《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当在公元76年以后。《后汉书·贾逵传》载：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命贾逵讲授《左传》，"与简、纸经、传各一通"。可见那时经、传是各自单行的。贾逵大概是在讲授的过程中，为了使经、传分清而又能读一书经、传俱见，才用朱色写经，用墨色写传的。如果此种推测不错，则此书当是我们现在所知最早的经文与单注的合抄本。且是朱墨分明，套色合抄的实例。

六世纪初，有人将《神农本草经》与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合抄为一书，也是用朱色抄录《本草经》经文，用墨色抄录陶氏注文。传世既久，朱颜退色，经、注再次混淆，故唐代刘禹锡曾经叹称《神农本草》朱书，《名医别录》墨书，传写既久，朱墨错乱，遂令后人视为非神农书。

七世纪初，陆德明撰著《经典释文》，经文墨书，音义朱书。且在该书叙录中说："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经由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混而音之，寻讨未易。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辨注，用于分别，使较然可求。"足见《经典释文》的最初写本，也是经注分明、朱墨判然的套写本。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唐写本《道德真经疏》，也是朱书经文，墨书疏语的。当时初写成书，纸新墨黑，朱颜醒目，经、疏分明，一定是读来易晓，看来悦目的好书。据宋周煇的《清波杂志》卷十二记载："淳化五年（994年），翰林学士张洎献重修《太祖记》一卷，以朱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采摭事，即以朱别之。"

所有这些记载，表明中国古书自手写本时代就有套色合抄的传统。这种优良传统，便构成了以后套印技术产生的历史渊源。

我国是首先能生产丝织品的国家，雕镂木板或纸板往丝织品上印染花色文饰，也是中国人的早期发明之一。"唐代有位聪敏的女子又在丝织品上印花染色。她叫工人雕镂木板，成为各种花卉，染成夹结（也叫夹缬），乘她的姊姊婕妤生日，献给王皇后一匹。唐明皇见了很欣赏，就叫宫中依法制造。当时保守秘密，后来慢慢传开了，并且传到日本……这种雕板印染法与木刻版画、彩色套印，有密切关系，所不同的一个是印在丝绸或棉布上，一个是印在纸上而已"[1]。这段话说明，中国的套印技术也久有传统。这种传统，便构成了以后产生套色印制书籍和套版印制鸟兽虫鱼、花草器物等画面的技术原型。

【1】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

一个是中国古书久有朱墨套写的传统，一个是中国久有印染绸布的传统技术，这种传统与技术的合力，便是套色印书印画技术产生的原动力。但是，推动力还只是事物前进的外因，事物自身的发展，还是离不开其内在的演进规律。套印技术也是如此。

## 二、套印技术的演进过程

中国的雕版印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沿袭于元、明、清。雕版印书，比起手写，就生产效率而言，有无比的优越性。但受版面墨色印刷技术的限制，对模仿和继承以前朱墨套写的形式，就十分困难。早期雕版的版画，有墨印彩绘的方法。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收藏着一幅出于我国敦煌五代时期刻印的菩萨像，便是墨印完了之后，将面容、衣巾、裙带，再用不同颜色分别饰染。这大概是雕版印刷兴起之后，人们想区别不同色

彩的初期尝试。到北宋初年，"四川民间流通的交子，'制楮为券，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间错。'"[1] 这种纸币的印刷，已是"朱墨间错"，似已有了套印技术。但其细节如何，无以稽考，难以言状。南宋初期，唐仲友知台州，勾结因私刻楮币版而获罪发配台州牢城的犯人蒋辉，在台州公署内为唐仲友继续私雕东南会子版。会子类似纸币，其上刻有人头像、图案、面值，印以不同颜色。蒋辉雕板进行几天之后，唐仲友派奴仆送来"土朱、靛青、墨等物，付与辉，印下会子二百道了"（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429朱熹弹劾唐仲友第三状）。可证南宋时印东南会子，已用红、蓝、黑三种颜色敷印了。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彩印的《南无释迦牟尼像》，"释迦牟尼扶膝端座于莲台，披红色衣。头部光圈内红外蓝。肉髻之下微见白毫相。顶部华盖饰宝花，帛幔下垂。华盖两旁饰以天草，其外印以'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字左反而右正……印刷方法，我们认为属于丝漏印刷。似是以两套版印制，先漏印红色，后漏印蓝色。至于字地上的黄色，则是用笔刷染的。这和我国民间漏孔印染花布的方法基本相同。由于漏印方法不容易印出精细的线条，因此以笔勾画眉、眼、口、鼻、手、足和服饰，而身形穿着显得不甚清晰"[2]。这可以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套版印刷品。但其套印技术，是借用民间套版丝漏印染花布的技法，尚不是后来套版印刷技术的正宗。1973年8月，陕西省文管会修整《石台孝经》，在碑身背面与中心石柱连接处发现女真文书残叶及《东方朔盗桃版画》等。版画高108厘米，宽55.4厘米，浓墨淡墨，浅绿色套印，是坊间印卖的年画，类似山西平水系风格，很像是单版敷彩印刷的作品，且为宋金时实物。但年画多为民间印制，历来墨印彩绘者众，故这件东西究竟是彩印还是彩绘，也很难定论。然而上述这些史实，可以充分证明，当我国雕版印刷术兴起之后，人们是在不断地摸索套印途径的，以期印出色彩分明的印刷品。

到元代，雕版印书越发普及，套印技术终于施于印书，印出了如同以前手写图籍时朱墨灿然、经注分明的图书。其代表作，

【1】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

【2】侯恺、冯鹏生：《应县木塔秘藏辽代美术作品的探讨》，《文物》，1982(6)。

也是举世孤罕、海内外知名的作品，便是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刻印资福寺无闻和尚注释的《金刚经》。

这部《金刚经》，于1947年为南京中央图书馆购藏，后携往台湾。每半叶五行，行大字十二，小字二十四。凡三十七版，每版印五半叶。版心记有版次。经折装。经文大字，印以朱丹，注文双行，印以墨色。圈发、句读符号，亦多朱色。卷首释迦牟尼说法图、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及《韦陀像》，亦为朱色。后有至元六年刘觉广跋文，称："师在奉甲站资福寺丈室注经，庚辰四月间，忽生灵芝四，茎黄色，紫艳云盖。次年正月初一日夜，刘觉广梦感龙天聚会于刊经所谶云。"今观无闻和尚《注经图》，确是地生四茎灵芝，信刘氏跋语为不诬。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现存最早的利用印书的普通版片，套色印出来的书籍。它的问世虽然大大晚于辽代用丝漏方法套色印制的《南无释迦牟尼像》，但在技术上它却跳出了墨印彩绘及移用民间印染花布的窠臼，使雕版套色印刷获得了成功。然"惟就此印本细察研究之，实系一版而先墨后朱分两次印成"[1]。这是台湾故宫博物院昌彼得先生的鉴定意见。1996年春夏之交，笔者造访台湾中央图书馆，卢锦堂先生慨然以该经见示，笔者有幸目睹其状。从印纸留下的红色湮染和错位擦染的墨迹看，该经确是一版分朱墨两色敷彩套印的印刷作品。说明我国早期套版印刷，实际只是一版而套色印刷。标志着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虽然在技术和印制质量上还不能和以后的真正套版印刷相比，但它毕竟在雕版上继承了朱墨套写书籍的传统，重新使印本书籍也能经、注分明，朱墨灿然。

【1】昌彼得：《元刻朱墨本金刚经题识》。

2001年笔者再次赴台，于台湾"中央图书馆"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沈津先生又一次共同审阅了这件作品，发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令人怀疑它到底是一版分色套印还是两套版分色套版套印。比如有朱色经文版面断板，而断板裂痕所经之墨色注文版面则不断；墨色注文有的又压盖朱色同样注文；墨色注文四周似有边线痕迹等，又令人想象它是两套板，或是一套板刻好

后用小锯将注文部分锼开，变成经文、注文两套犬牙交错的版片，而后分色分版刷印。可是仔细推研，两套版不可能，若是两套板，墨色注文部分不应在其周围显现类似边线的痕迹。若朱印经文前就已将注文部分板锼开锯下，则又不可能出现墨色注文压盖同部位浅淡一点的朱色注文。因而推断它还是一块整板，在刷印朱色经文之前，先将注文部分随形用纸贴盖，这样刷朱色时就不至于摊到注文的版面部分去。但盖纸不能过厚，过厚了会使版面不平，影响印刷。这样在为经文版面涂刷朱色时，难免会在经、注文上下左右连接处，冒界刷到注文盖纸上。又因盖纸纸薄，朱色透过盖纸，显出其下模糊的注文字形，于是印出的大字的经文印纸上，特别是在经文、注文上下衔接的部位上容易印出几个浅淡的朱色注文，待到印墨色注文时，几个浅淡的朱色注文就会被墨色压盖而又露着痕迹。这种用纸贴盖注文先印朱色经文的办法，用来回答经文断板为什么到所经注文处不断的现象，也是容易认同的。至于注文周围似有边线痕迹，那是印注文前要将经文版面随形用纸贴盖，这种盖纸应当厚一点，否则已印好的朱色经文会重被浸染。但这一厚，便会使墨色注文周围好像有了边缘。这种大胆的推测，也许正是单版敷彩分色套印阶段手工印刷的实际技术水准。这种印刷水平虽然不高，但却是起点，是创新。其后的套版多色印刷，当源于此。正是元代大胆实践了这种单版分色敷彩印刷技术，并获得成功，才使其后的套色和套版印刷技术日臻完美，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多姿多彩的不朽作品。

纵观有元一代，其在中国出版史上的突出贡献，一曰对图书出版的管理制度更加严整；二曰将木活字排版印刷技术试制成功，并由此得到推广；三曰真正有了木板套印的出版品，使古已有之的朱、墨套写在雕印的木板上得到了实现。其后明、清两代进一步发展元时印刷技术的成果，将活字的制字材料、固版技术、印制水平继续拓展和提高；将木版印刷技术推向极致，出现了饾版和拱花，套印技术达到高峰。

# 第二十章　宋元时期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出版业的繁荣

10世纪中期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但急于统一中国的宋朝并没有真正建立像汉、唐那样大一统的王朝。中国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宋朝北部早于宋朝建国的契丹国（后称辽国），是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辽宋两国不断交战，后双方达成“澶渊之盟”，成为兄弟之国。西北部的党项族于11世纪初建立了夏国（世称西夏），先附辽抗宋，后成为当时三足鼎立的一方。后来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崛起于东北，随即取代辽朝占据北方，形成新的三分局面。契丹、党项、女真族和汉族一起在中国北部广大地区，不仅发展了社会生产，也创造了具有时代和各自特色的民族文化。

当时在西夏的西部尚有回鹘于田李氏王朝和黑汗王朝，在西部、西南则有吐蕃、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宋朝在岭南的部分地区授予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知州、知府、知峒等官职。

元朝是中国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全国性的王朝，主体民族是蒙古族。它结束了多个政权长期并立的局面，建立起空前规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土官，推行土司制度。设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事务，借鉴并发展了西夏的帝师制度，先后封藏族高僧为帝师，密切了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但元朝把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实行民族压迫和奴役制度。元朝统治时间并不长，在14世纪随着农民起义的兴起而土崩瓦解。

## 第一节 契丹文文献的出版

### 一、契丹文的创制及汉籍的翻译

契丹族是我国古代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强大民族，早在公元4世纪，契丹人就游牧于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但见诸史书却是6世纪的《魏书》。契丹的族源历来有东胡说和匈奴说两种，一般认为契丹源出东胡族系的鲜卑，是宇文别部的一支。

契丹族在隋末唐初之前为古八部，为了抵御外族的侵略，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从7世纪上半叶起为大贺氏时期，至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大贺氏被亲突厥的遥辇氏取代。这一时期契丹依附突厥，天宝四年（745年）回鹘灭突厥后又依附回鹘近百年。唐开成五年（840年）回鹘王国覆灭，契丹耶澜可汗附唐，被封为云麾将军。从此契丹在唐的支持下，开始快速发展。其八部中迭剌部经济发展最快，势力最强。契丹国的开国皇帝阿保机就出生在这个部落，从其七世祖起均任迭剌部酋长，实际操纵着部落联盟的军事大权。阿保机于天复元年（901年）任迭剌部夷离堇，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即契丹汗位，后梁贞明二年（916年）称帝，建国号契丹，建元神册，从此契丹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契丹会同元年（938年）阿保机之子耶律德光改国号大辽，契丹王朝历九主，前后凡209年，与五代及北宋对峙，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

契丹原无文字，阿保机称帝后，于神册五年（920年）正月，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等创制契丹文字。这种文字受汉字影响很大，沿用了汉字的横平竖直、拐直弯的书写特点，还直接借用了一些笔画简单的汉字。契丹大字的创制不但参照了汉字，也

受到了汉族文人的影响，汉族文人参与了创制契丹大字。最早记载契丹字的汉文史书《五代会要》载："契丹本无文字，唯刻木为信。汉人之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加减，撰为胡书。"[1] 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辽太祖多用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契木之约"[2]。《辽史》记载神册"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3]。这种文字约有三千多个，历史上称为契丹大字。契丹大字并不适合契丹语音节较多、语法中有粘着词尾的特点，所以到天赞年间(922—926年）辽太祖之弟迭剌借鉴回鹘文创制了另一种契丹文字，史称契丹小字。

【1】[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十九。

【2】[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八。

【3】《辽史》卷二《太祖纪下》。

契丹小字与回鹘文有密切关系。阿保机称帝后不久，即对回鹘等民族发动战争，征服了河西、高昌等地的回鹘，并在当地设立"甘州回鹘大王府"、"高昌回鹘大王府"等机构进行统治。契丹上京设有回鹘营，供入居契丹的回鹘人居住。回鹘向契丹朝贡不断。契丹建国之初的天赞年间，回鹘使者来契丹进贡，但其语言无人能懂，契丹太后对太祖阿保机说，你弟弟迭剌十分聪敏，可用。太祖派迭剌接待回鹘使者，相处二旬，迭剌果真不负使命，学会了回鹘文和回鹘语，于是迭剌借鉴回鹘文创造了契丹小字[4]。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后世研究者称其最小单位为原字，由一个原字构成的文字叫单体字，由两个以上的原字构成的叫合成字[5]。

【4】《辽史》卷六十四《皇子表》。

【5】[清]格尔泰、刘凤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契丹大小字创制后，与汉文同时流行于辽国，但契丹文使用的范围并不广泛，很多契丹文人习惯使用汉文。金灭辽后，契丹字还通行一段时间，直到金明昌二年（1191年），金章宗下令废止契丹字。此后，西辽地区仍使用这种文字。蒙古灭掉西辽后，契丹字终于被废弃。

契丹字创制后，辽王朝组织编译了不少汉文典籍，据《辽史》记载，萧韩家奴译《贞观政要》、《五代史》、《通历》，耶律义宗译《阴符经》，耶律庶成译《方脉书》等[6]。其他文献中也有以契丹文翻译汉文典籍的记载，如曾译《辨鸑

【6】《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辽史》卷七十二《宗室传》。《辽史》卷九十八《耶律庶成传》。

录》[1]。甚至辽朝皇帝也参加译书，辽圣宗耶律隆绪曾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2]。契丹字还用于外交书函、著诸部乡里之名、书写诗歌、刻石记功，甚至还用于考试。

[1]［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卷五。

[2]《契丹国志》卷七。

辽代刻印的汉文、契丹文图书除辽藏等个别印本后来被发现外，其他都没有流传下来，其中的原因，除当时刻印较少，后代特别是金、元二代加以禁灭外，其自已实施的书禁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目前能见到的契丹文主要存于碑刻之中。

## 二、契丹字碑刻文献

从13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契丹字似乎已经退出人们的记忆，除了宋人王易在《燕北录》中描摹的符牌上留下五个契丹字外，不再有任何契丹字的信息[3]。立在陕西乾陵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已经历了800多年风雨，可能是因为此碑立于金代，也可能是望文生义，明清两代的金石学大家赵崡、王昶、钱大昕、毕沅等一直将此碑上的五行非汉字当作女真文，《石墨镌华》、《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关中金石记》等著名的金石著作均是这样著录。直到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凯尔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庆陵发现辽兴宗及仁懿皇后哀册后，1930年又发现了道宗皇帝和宣懿皇后的哀册，契丹字的真容方被了解，用确切无误的出自辽墓的哀册与《郎君行记》碑对照，纠正了误读了几百年的公案。辽庆陵契丹字的发现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认为是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学上的重大发现。1933年首批研究性文章开始发表，从此被称为“20世纪之谜”的契丹字研究掀开了第一页。（图81）

[3]《书史会要》卷八转录。

史书上对契丹字分大小两种早有记载，但何为大字何为小字却并没有说明。因此庆陵契丹字哀册出土后，仅知其为契丹字，但辨不清是大字还是小字。1935年《满蒙》杂志发表了《静安寺碑》碑阴的另一种契丹字，但世无识者，因风化太甚，漫漶不清，长期未引起人们重视。1939年9月发表了另一种契丹字石刻被发现的消息，1942年4月公布了这件石刻的拓片，这一石刻文

图 81
契丹小字辽道宗哀册

字与《静安寺碑》同而与庆陵哀册异，但何种为大字，何种为小字，在学术界仍继续争论了几十年。这场争论十分热烈，中国、日本等国的学者都发表了不少论著，直到20世纪70年代，对契丹大小字的认定方基本上趋于一致。

经过半个多世纪中外专家的潜心研究，主要利用契丹文与汉文对照的方法，解读出了一批契丹字的字义，如年号、干支、年、月、日、数字等近400个单词，对契丹小字的构音作了探讨，1975年以后，中国的专家从契丹文与汉文对译的《郎君行记》入手，找到了利用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进行拟音的突破口，构拟出140多个原字的音值，解读出300多条词语，分析了几十种语法成分，并发现了契丹语有元音和谐律，在契丹语的研究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面对已发现的大量契丹字铭刻，这些成果还难以完成解读契丹文的任务，"20世纪之谜"留给了21世纪继续破解。

从1922年发现庆陵契丹字哀册以来，几十年来契丹文铭刻时有发现。重要文献如下：

（一）契丹大字文献

1.《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漫漶不清）

2.《故太师铭石记》，原石与拓片均失，仅有照片。

3.《萧孝忠墓志》，辽大安五年(1089年）刻石，1951年辽宁锦西县西孤山出土，志盖背面为汉字，志文契丹大字18行约500字。(图82)

4.《耶律延宁墓志》，1964年辽宁朝阳县柏树沟出土，志文上半部有契丹大字19行，约270字，下半部为汉文，两种文字不对译。

5.《北大王墓志》，1975年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沙日温都发现，志盖为汉文，志文为契丹大字27行，约790字，不对译。（图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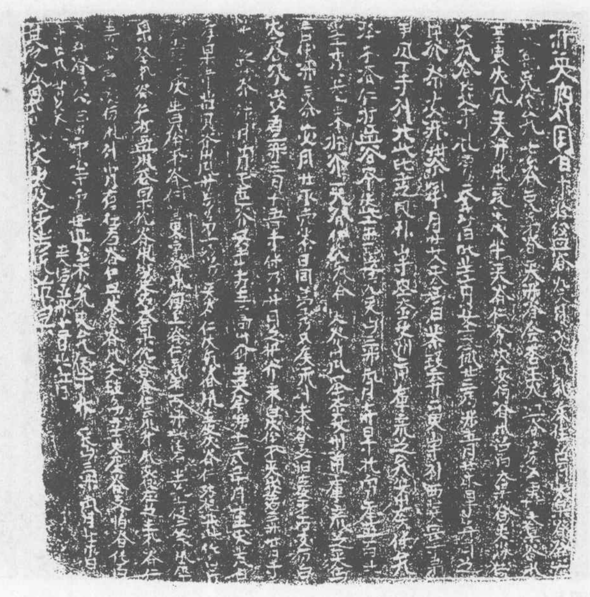


图 82
契丹大字《萧孝忠墓志》

6.《萧袍鲁墓志》，1965年6月出土于辽宁省法库县林树沟乡前山村。志铭为汉文，志盖背面刻契丹大字15行。不对译。

7.《耶律习涅墓志》，辽天庆四年（1114年）刻。1987年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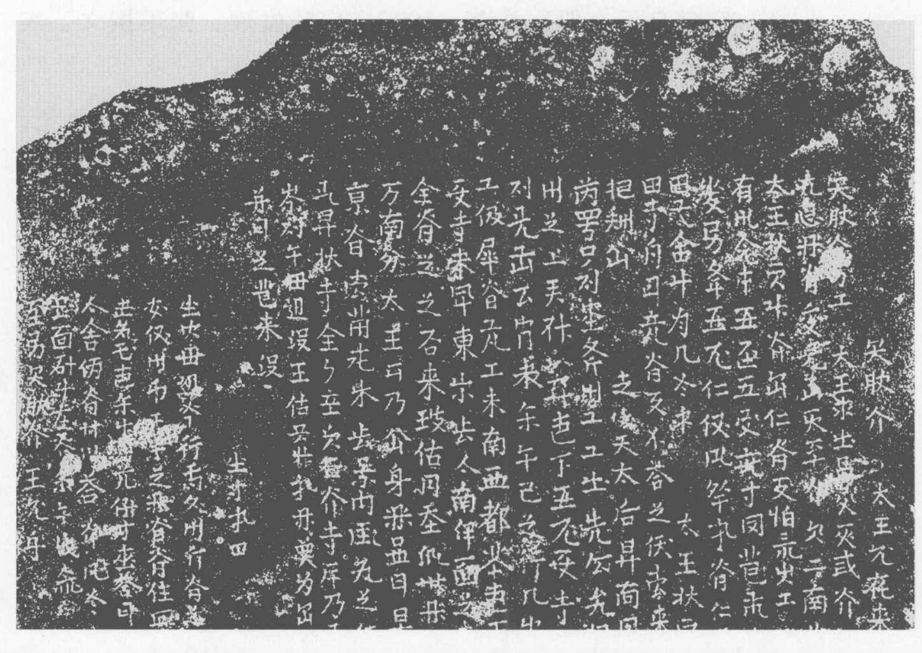


图 83
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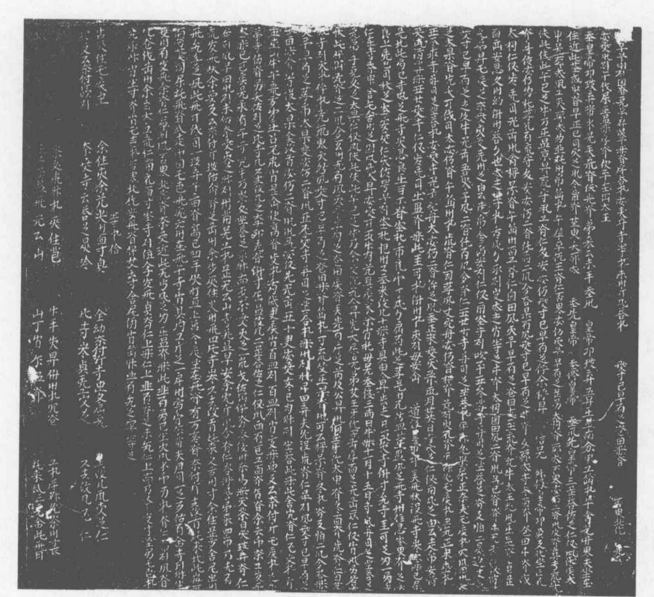


图 84
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

于内蒙古巴林左旗乌兰坝苏木浩尔吐村小罕山。正面刻汉字"大横帐节变副使墓志"，志盖背面刻契丹大字墓志37行，共1 608字。（图84）

8. 已故贾敬颜先生旧藏墓志拓片，原石出土及下落均不明，墓志刻大字16行约392字。

9. 辽太祖陵及辽上京的契丹大字残石及镜、钱币、印章等。

（二）契丹小字文献

1.《兴宗皇帝哀册》，1922年在庆陵发现，契丹文36行。原石已佚，仅存抄本。

2.《仁懿皇后哀册》，1922年在庆陵发现，契丹文32行，汉字33行，原石已佚，仅存抄本。

3.《道宗皇帝哀册》并盖，1930年在庆陵发现，耶律俨撰文，契丹字37行，重叠复刻9行，汉文36行。碑藏辽宁省博物馆。

4.《宣懿皇后哀册》并盖，1930在庆陵发现，张琳撰文，契丹字30行，汉字34行，碑藏辽宁省博物馆。

5.《萧令公墓志》（残），1950年在辽宁阜新县清河门出土，刻契丹字32行，存约594字。碑藏辽宁省博物馆。

6.《故耶律氏铭石》，1969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毛不沟出土，刻契丹小字25行，699字。碑藏赤峰市文物站。

7.《萧仲恭墓志》，1942年在河北省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1972年归省文管处收藏。志盖刻契丹小字3行9字，志文刻契丹小字50行，2 442字。

8.《许王墓志》，1975年辽宁阜新县流井沟出土，志盖刻汉字和6个契丹小字，志石四面刻字，一面为汉字，三面为契丹小字，共64行，存2 163字。

9.《郎君行记》，在陕西省乾县唐乾陵献殿遗址发现，有汉字

碑额，契丹小字碑文5行，汉字碑文6行。

10.《耶律仁先墓志》，1983年在辽宁北票莲花山出土，刻契丹字71行，共5 000余字。碑藏辽宁省博物馆。

11.《耶律宗教墓志》，刻于辽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1991年5月出土于辽宁省北镇满族自治县高起村西北辽墓。志盖正面刻汉字“大契丹国广陵郡王墓志铭记”3行，志盖内侧刻契丹小字36行，共计一千余字。

12.《耶律敌烈墓志》刻于辽大安八年（1092年），1995年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嘎亥图镇附近辽墓出土，今藏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志盖正面刻汉字“南瞻部洲大辽国故迪烈王墓志文”3行。志石刻契丹小字32行，志盖内侧续刻契丹小字9行，共41行，约1 740字。

13.《韩敌烈墓志》，刻于辽乾统元年（1101年），1996年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白音乌拉乡白音罕山的韩匡嗣家族墓地出土。墓志刻契丹小字34行，共1 350字，作者为耶律陈团奴，原石存内蒙古巴林左旗博物馆。

14.《耶律永宁郎君墓志》，约刻于辽大安四年（1088年），1995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郑家窝铺村辽墓，志石已断为两块，刻契丹小字43行，现存1 062字。

15.《耶律智先墓志》，刻于辽大安十年（1094年），1998年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小塔子乡莲花山村耶律仁先家族墓群。墓志盖内侧刻汉文墓志20行，作者为赵孝严。志石边刻契丹小字墓志27行，约1 000余字，作者为耶律固。

16.《耶律奴墓志》，刻于辽寿昌五年（1099年），1999年发现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板镇腰衙门村北山辽墓中。志石刻契丹小字24行，又志盖背续刻24行，共48行，总计1 274字。原石存辽宁省阜新市博物馆。

17.《韩高十墓志》，1995年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乌拉乡白音罕山韩匡嗣家族墓地出土。刻契丹小字26行，因志盖无存，墓志有头无尾，故撰刻年代不详。墓志作者为耶律固。原石存巴林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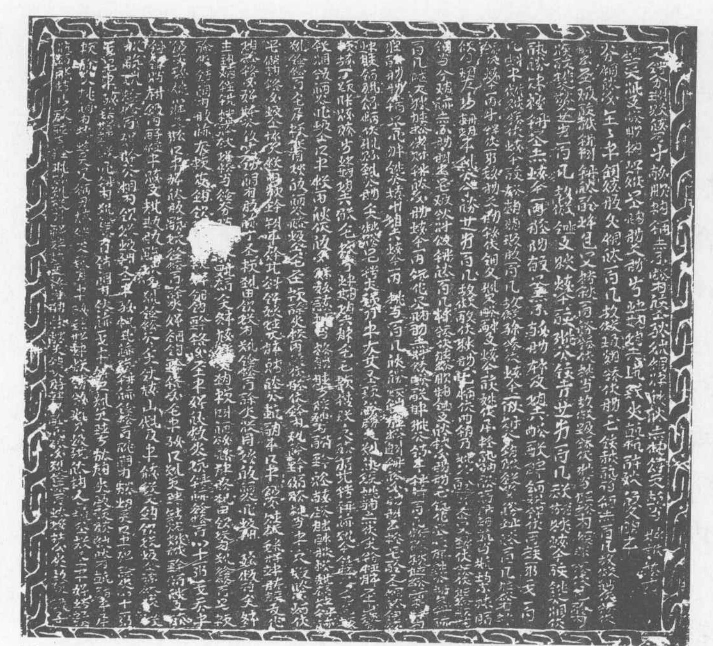


图 85
契丹小字《耶律(韩)高十墓志》

旗博物馆。(图85)

18.《宋魏国妃墓志》，刻于辽乾统十年（1110年），1997年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瓦林茫哈辽墓。志盖台面中央刻篆体契丹小字原字四行，每行5字，共20个原字，拼成八个单词，意为“故宋魏国妃之墓志铭”。志石刻契丹小字24行，共642字。墓志作者亦为耶律固。与契丹小字墓志同时出土的还有汉文《宋魏国妃墓志铭》一合，但与契丹字不对译。原石存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

19.《耶律弘辨墓志》，刻于辽寿昌六年（1100年），1996年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乌日根塔拉农场4号辽墓。志石刻契丹小字32行，志盖上刻十二生肖像，无文字。墓志作者为耶律陈团奴。原石存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

20.《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1993年内蒙古敖汉旗新地乡老虎沟村出土，志石刻契丹小字51行，现存48行，满行42字至57字不等，约残700余字，现存1 570余字。因志题皆残，不确知墓主是谁，有《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残石》、《金镇国上将军移剌斡里朵墓志铭》（残石）两说。

21.不知名造像碑，1990发现于辽宁阜新萨本山，存契丹字13行。

另有铜镜、钱币等器物铭刻、壁画及洞壁题字等契丹小字资

料[1]。

“契丹”一词作为民族见诸于史籍，自4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前后历经约千年，契丹所建辽国存世200多年，在中国北方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国历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有关辽代的史料与其历世的时间和产生的影响相比显得十分单薄，一部《辽史》草草编就，其中错漏很多。契丹的文物存世也较稀少。因此有关辽代的文献和文物资料更凸现其重要意义。契丹字的纸质文献已荡然无存，这在中国古代民族文献史上是很罕见的事，因而契丹字的石质文献更为珍贵。契丹字的研究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存储在契丹文献中的大量历史信息仍是一个谜。这种情况相信随着契丹字研究的进展会有所改善。

【1】刘凤翥、于宝林：《契丹字研究概况》，《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3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金永田：《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考释》，《考古》，1991(4)。刘凤翥、王云龙：《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燕京学报》，新第17期，2004。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五探》(台北)《汉学研究》，1995年第13卷第2期。卢迎红、周峰：《契丹小字“耶迪烈教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1）。石金民、于泽民：《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2)。赵志伟、包瑞军：《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3）。刘凤翥：《契丹小字“韩高十墓志”考释》，《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郑晓光：《契丹小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2(2)。唐彩兰、刘凤翥等：《契丹小字“韩敌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2（6）。刘凤翥、清格勒：《契丹小字“宋魏国妃墓志铭”和“耶律弘用墓志铭”考释》，《文史》2003(4)。刘浦江：《近20年出土契丹大小字石刻综录》，《文献》，2003(3)。

## 第二节　女真文书籍的出版

### 一、女真族和女真文的创制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女真族历史悠久，其先民早在商周时便见于史册，当时称肃慎，汉代称为挹娄，南北朝时为勿吉，隋唐时为靺鞨，自辽代起称女真。

辽太祖征服女真后将其一部分迁至其直接统治之下，是为熟女真和回霸女真，另有一部分发展缓慢的女真称为生女真。生女真中以完颜部为核心的部落联盟最为强大，逐渐统一了生女真。金朝的开国皇帝阿骨打即是出自完颜部。景祖乌古乃被辽封为“生女直部族节度使”，这一称号在政治上为部落联盟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限、秃答，金盖盛于此”[2]。辽天庆三年（1113年）十月康宗死，其弟阿骨打袭“都勃极烈”位。翌年六月，辽朝任命阿骨打袭生女真节度使，九月，阿骨打起兵誓师反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金，国都会宁（今黑龙江

【2】《金史》卷四十七《食货二》。

阿城市白城）。金朝建国后，攻辽军队势如破竹，十年后即与北宋联合灭辽，两年后又灭北宋。金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燕京，国界北至外兴安岭，南至淮河，东临大海，西与西夏、蒙古相邻，与西夏、南宋分掌中国100余年。

金朝立国后，迅速推进女真族的封建化进程。金朝采用汉官制，大量吸收汉文化，按汉法开科取士，创制文字。种种措施使金朝的经济、文化在北宋和辽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女真族原来只有本族语言，而无文字。在与辽、宋交战过程中一些人学会了契丹文和汉文。有的人学习成绩斐然，如宗雄“卧两月，因学契丹大小字，尽通之”，这种学习外族语文的速度可以说是惊人的[1]。

在金朝对汉文化的仰慕与追求自王室至百姓都成为风尚。女真统治者对俘虏中的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拜之为师，聘为高官，请其为金朝制定法令制度，甚至扣留宋朝使臣，请其授以汉族文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六载洪皓出使金国被扣十余年，辞不就官，为金人所敬。他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默写于桦树皮上，教当地女真人读书，被称为“桦叶四书”[2]。

阿骨打建国后，命丞相完颜希尹创制文字。女真当时与契丹为邻，受契丹文化的影响很大，汉文化对其的影响更为深远。因此女真文字是在契丹文字的直接影响下，在汉文字的间接影响下创制而成的。据史载完颜希尹“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3]。据史载，女真字有大字、小字两种，但传世的女真字只有一种，难以判定其为大字还是小字。当时规定女真、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所以女真字制成后与契丹字、汉字在金朝境内同时流通，金章宗二年（1191年）“诏罢契丹字”，只准用女真字和汉字。金王朝为了推行女真字，在上京和各路府设立了专门学校，置教官教授文字。据统计，各路府学达22所之多。这些学校中学习女真语的课本是完颜希尹编撰的《女真字书》。为了培养女真官吏，从大定十一年(1171年）起，专设女真

【1】《金史》卷七十三《宗雄传》。

【2】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六,879页，中华书局，1981。

【3】《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希尹传》。

进士科，选拔官吏。大定十三年还设立女真国子学，学习女真文翻译的儒家经学[1]。

[1]《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

## 二、女真文图书的翻译和出版

由于文化教育的需要，女真文字图书的翻译出版也十分兴盛，从编译的女真文图书内容来看，大多为儒家经典，这与金代对女真人进行儒学教育是分不开的。为了使不懂汉文的女真人学习儒家经典，特地建立了译经所。弘文院也是负责译书的机构，《金史》载“弘文院，知院，从五品，同知弘文院事，从六品，校理，正八品，掌校译经史”[2]。当时女真文译本有《易经》、《书经》、《孝经》、《论语》、《孟子》、《老子》、《刘子》、《扬子》、《列子》、《文中子》等典籍[3]，还有史籍类图书《贞观政要》、《新唐书》、《史记》、《汉书》、《盘古书》、《孔子家语》、《太公书》、《伍子胥书》、《孙膑书》、《黄氏女书》等。有的女真文译书发行量还较大，如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翻译的《孝经》一次就印刷了上千部付点检司，分赐给护卫亲军。山西平阳是金代的刻书中心，除了国家刻印图书外，私人也刻印了不少书籍，女真文图书有一部分也可能是在平阳刻印的。

[2]《金史》卷五十六《百官志二》。

[3]《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女真文图书大多是金世宗在位时（1161—1189年）翻译和刻印的。金世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在其统治下，“南北讲好，与民休息”，出现了少有的安定局面。他重视农业，经济得到发展，严肃吏治，使“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禀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4]。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他在位期间将很多汉籍译为女真文并大量刊印，对此他解释道：“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5] 他重视的是要女真保持“国语骑射”的固有习俗而避免汉化。但事情的发展却与其愿望完全相反。随着汉族儒家文化的传播，很多女真人在思想、风俗、生活习惯上也逐渐发生变化，改用汉姓成为风气，穿汉族服装成为时尚，汉族儒生赋诗弈棋、焚香品茶等一套生活方式也被女真贵族仿效。

[4]《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5]《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金世宗对此十分不满，屡屡下诏："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禁止"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金世宗大力提倡女真语，在宫中命歌者用女真语唱歌，并告诫诸王和皇太子说："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1] 他还身体力行，多次用女真语唱歌，教育臣下。有一次回到上京，大宴宗室诸亲，世宗道，我回来数月，没有听到一个人唱女真歌，今天我来唱，于是"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听上自歌。其词道王业之艰难及继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声，歌毕泣下"[2]。尽管世宗竭力维护女真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但汉族的先进文化对女真人的吸引力是难以割断的，儒家经典的翻译不仅使汉文化中的仁义道德观念深入女真人心，而且使汉文化得以普遍在女真族中传播，考古发现在黑龙江省出土的金代铜镜图案大多取材于唐宋传奇故事，可见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至女真腹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了。

【1】《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

【2】《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金天兴三年（1234年），金王朝在蒙古和南宋军队的夹击下灭亡。在金王朝统治地区通行一百多年的女真文也逐渐走向衰落。

## 三、现存的女真字文献

女真文文献通行于世100多年，尽管金代各朝皇帝竭力倡导，但留存至今的文献却是屈指可数。这些文献绝大多数是金石资料，如今存世的女真字文献情况如下：

（一）石刻碑铭

1.《海龙女真国书摩崖》，又称《杨树林山女真国书摩崖》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三月刻。字面高200厘米，宽110厘米，8行存99字。记金太祖授谋克事。

2.《大金得胜陀颂碑》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刻，碑额高79厘米，宽100厘米，碑身高177厘米，宽85厘米。下有碑

座。碑额阳面汉文篆字“大金得胜陀颂”，阴面女真字。碑身阳面汉文，30行，存800余字，楷书，碑阴为女真文，32行，存1500余字。碑文分序文、献文两部分，序文记阿骨打1114年誓师起兵反辽之事，献文为颂词。碑在吉林省扶余县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

此碑在道光三年（1823年）由吉林堂主事萨英额首录碑文，光绪十三年（1887年）候选州判曹廷杰重又发现，著文介绍并首拓此碑。此碑是迄今保留汉、女真两种文字对照的唯一碑铭，全碑有1 500余个女真字，也是保留女真字最多的碑铭，对研究早期金史和女真字有特殊重要的价值。

3.《奥屯良弼饯饮碑》，又名《泰和题名残石》刻于金大安二年（1210年），碑高85厘米，宽67厘米。全碑主要部分为汉文，是奥屯良弼于泰和六年（1206年）的题记，左下方为3行女真字跋文约60余字，是其友人卜修洪所补题跋，题于金大安二年（1210年）七月，汉、女真文不对译。原碑出处不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图86）




图86
女真文《奥屯良弼饯饮碑》

4.《北青摩崖》金兴定二年（1218年）七月刻，字面高133厘米，宽67厘米，5行40余字，字迹漫漶不清，记有关佛教事。摩崖在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1911年日本鸟居龙藏发现。

5.《女真进士题名碑》，又名《宴台女真国书碑》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刻，碑高233厘米，宽85厘米，碑阳为汉文，明代将原文磨平，改刻顺河庙碑记，碑阴为女真文，记金哀宗御隆德殿举行女真科进士考试及进士名录。此碑在宋周密《癸辛杂识》、明李濂《汴京遗迹志》、清王昶《金石萃编》中已经著录，道光九年（1829年）为刘师陆、麟庆重新发现。碑原立开封郊外宴台，现藏开封博物馆。

6.《庆源碑》刻碑时间不详，原石方柱体，四面刻女真字，存500余字。碑石已折为两段，仅存下段，高194厘米，宽58厘米。为建寺之功德碑，记修寺经过及化缘者题名。

碑在朝鲜咸镜北道庆源郡东原面禾洞佛寺，1918年日本今西龙等发现，现藏韩国首尔博物馆。

7.《奥屯良弼诗石碑》刻石年代不详，碑高60厘米，宽70厘米，正面刻女真文诗一首，有上下款，共100余字，原碑在山东蓬莱佑德观，后移入蓬莱阁天后宫，20世纪60年代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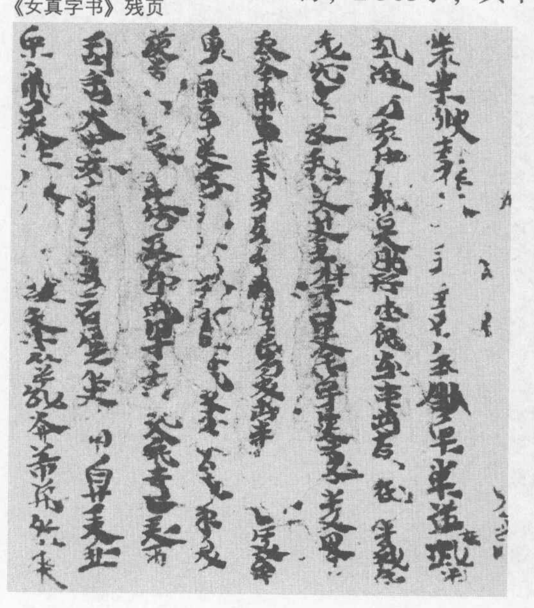
8.《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刻石年代不详，原碑出土于吉林省舒兰小城子完颜希尹家族墓地。刻女真文一行21字。原石现存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纸质文献

【1】金启孮：《陕西碑林发现的女真字文书》，《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1、2)。
乌拉熙春：《西安碑林女真文字书新考》，《碑林集刊》第5辑，陕西美术出版社，1998。

1. 碑林出土《女真字书》，1973年8月在陕西西安碑林发现，共11件，残页，页大小不一，大张残页高21厘米，宽45厘米，竖书21行，行约25字，小张残页高17厘米，宽22厘米，竖书14行，行约18字。此11件残页原已揉成一团，塞在《石台孝经》碑内石柱的卯眼中，1973年8月整修时发现。这11件残页写女真字共237行，2 303字，其中不清者566字，完整者1 757字，其中重写之处甚多，实有字数仅一千字以内。根据女真字专家金启孮先生研究，这11件残页，出自二位女真人之手，书写时间应在金代初年，最晚应在金世宗大定年间以前。内容是抄录完颜希尹编撰的《女真字书》，是学习女真文字启蒙读物的练习之作。其内容和分类与明代编的《女真译语》的杂字部分极相近似[1]。(图87)

图87
《女真字书》残页



2. 俄藏女真字残页，共6张，原夹在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的文献里，其中两张残件1968年2月6日俄国专家在整理时发现。系一页的两段，背面有汉字

一行“大定七年七月十六日”，可知为金世宗大定七年（1163年）所抄。另4纸女真文残页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专家在1997年整理俄藏黑水城文献时发现。（图88）



图88
黑水城出土女真文残页

（三）其他

1. 题字类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万部华严经塔内壁，科尔沁右翼前旗和中旗境内石崖均发现有女真字墨书题记。

2. 器物铭文　日本古籍《吾妻镜》，载一银简及俄国赛金古城出土银牌上有女真字。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录有女真字，方于鲁《方氏墨谱》卷一载一方墨锭图案，有女真字8字，意为“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图89) 铜镜有《咸平府谋克官造镜》、《叩畏猛安铜镜》、《绶带纹铜镜》等。印章有《可陈山谋克印》、《移改达葛河谋克印》、《夹浑山谋克印》、《河头胡伦河谋克印》、《和拙海蛮谋克印》等。



图89
女真文墨锭(摹本)



## 第三节　回鹘文书籍的继续出版

### 一、写本书籍的出版流行

宋元时期在维吾尔历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公元840年，位于漠北的回鹘王国由于天灾、内乱和外敌进攻而崩溃了。一般认为回鹘人分三支西迁，一支迁到甘肃河西走廊，是为河西回鹘，曾投吐蕃，后又依附张义潮，11世纪时大部分为西夏占据。一支进入七河流域，后来建立了黑汗王朝。作为漠北回鹘王国王室的嫡传，也是最主要的一支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10世纪下半叶，高昌回鹘王国的版图东逾哈密，西与

黑汗王朝邻接，北至古尔班通古斯沙漠，南抵塔克拉玛干沙漠，与于阗国相望。王国境内绿洲遍布、水源充沛，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吐鲁番、敦煌地区在丝绸之路上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商贸中心，也是中外文化交融渗透、互相影响的地方，各种宗教也交汇于此，地域的特殊性给回鹘王国的宗教、文化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回鹘人在东西方文化的滋养下，形成、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回鹘文化。

回鹘西迁之前，主要信仰摩尼教，当迁至吐鲁番地区时，当地佛教已经十分兴盛，回鹘人逐渐接受了佛教，但摩尼教仍受到保护和信奉。在敦煌地区，由于回鹘王室贵族的推崇和提倡，佛教也进一步得到发展，修寺庙、建洞窟，盛极一时。与此相适应的是，大量佛教、摩尼教的经典被翻译、传抄。

元代的西域，天山南北得到统一，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元代的高昌回鹘地区佛教及其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朝廷在那里专门设有官员管理僧人，大都等地有很多回鹘的著名僧人从事佛教活动。至正年间，元世祖诏令对《大藏经》进行整理，主要是以藏文佛经校勘汉文佛经，并作部分增补。有一批回鹘高僧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在西夏文佛经的翻译工作中，也有回鹘僧人参加。这不仅对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推动了佛教典籍的出版和传播。《宋史·夏国传》载："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1]

【1】[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八。

宋元时期，随着回鹘地区佛教的宏扬，佛经的翻译和传播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批学识渊博、翻译水平高超的大师。如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传》）上面注明"又幸福、伟大的中国国中精通三藏经的慧立大师受教用汉语制成，名叫彦悰法师的经师扩展之。又别失八里人僧古萨里都统重新从汉语译为突厥语"。这位僧官都统古萨里便是一位水平很

高的译经大师，除了《玄奘传》外，在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上也留下了他的名字。（图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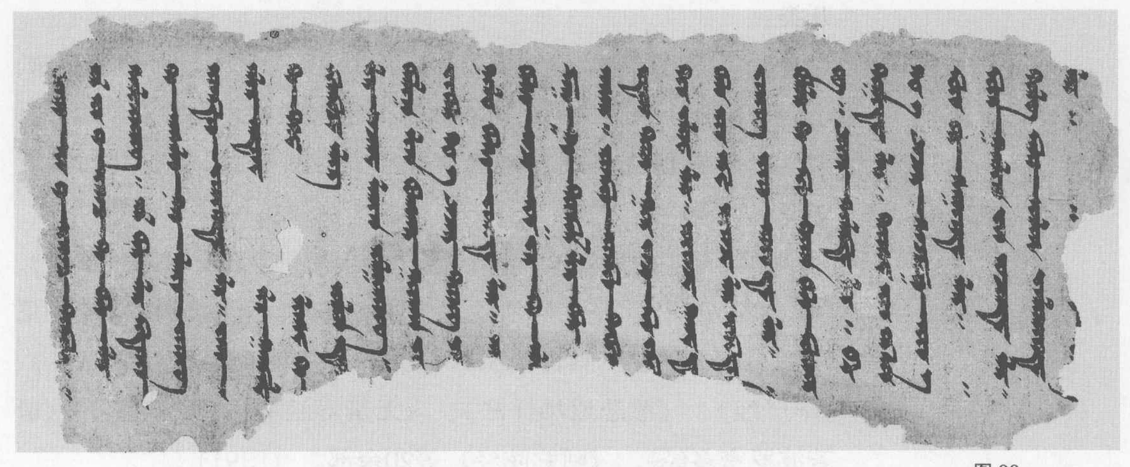


图 90
回鹘文《玄奘传》

已发现的回鹘文文献多数是手抄本，多以硬笔黑墨写成，少数是用硃笔书写，并有硃、墨两色兼书的。

回鹘文文献装帧形式是多样的，从出土的文献看，以卷轴装和梵夹装为主。如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即为卷轴装，此件被斯坦因携至英国，现藏英国图书馆。《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则为梵夹装，这种装帧的书页在左侧都有一个红色的圆圈，圈的中间则是一个洞，以便用绳子穿过扎紧。也有个别是每叶双圈双洞的。除这两种常见的装帧形式外，还有册页装。如《阿毗达摩俱舍论实义疏》，原藏于敦煌藏经洞，现存英国图书馆，此书分装两册，第一册67叶，第二册82叶。此外亦有经折装的，这种装帧形式多为刻本佛经。由于时代久远，特别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非伊斯兰文化被大量毁坏，回鹘文文献遗留至今的不但是凤毛麟角，而且是支离破碎，不论是何种装帧形式，要找到一件完整的回鹘文文献是很难的。19世纪末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绝大部分都收藏在英、法、德、俄、日等国家。

回鹘文文献还有一部分碑铭，如《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高昌图都木萨里造寺碑》、《酒泉文殊寺碑》、《大元肃州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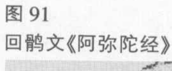
可达鲁花赤世袭碑》、《乌兰浩木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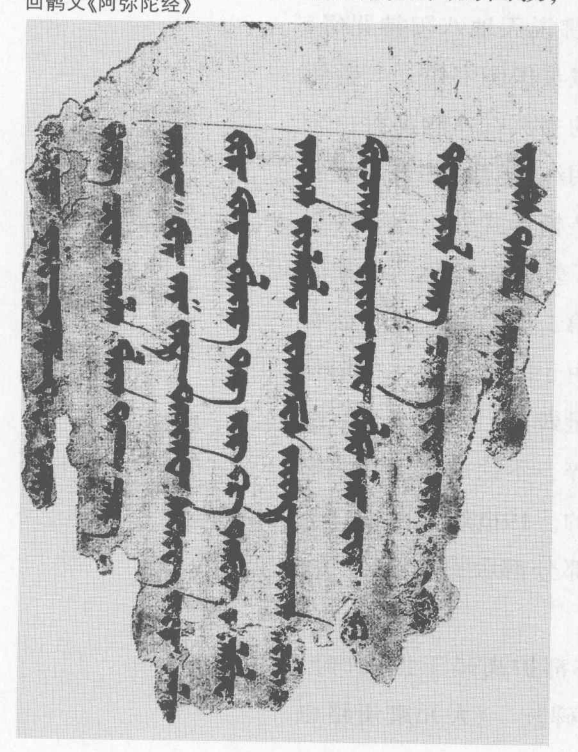
回鹘文文献，从目前遗存的情况看，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佛教经典　这是数量最多的一类，主要是大乘教典藉，也有一部分小乘教文献，再有一部分密宗经典。除密宗经典译自藏文外，其他佛经或直接译自梵文，或从焉耆–龟兹文和汉文转译。

比较重要的回鹘文佛经有《金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观无量寿经》、《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佛顶心大陀罗尼经》、《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华严经》、《慈悲道场忏法》、《无量寿经》、《阿含经》、《般若波罗密多经》、《阿弥陀经》等20余部。（图91）

（二）摩尼教典籍　摩尼教在公元3世纪由波斯人摩尼创立，主要教义是光明与黑暗相斗争的二元论。摩尼教在9世纪成为漠北回鹘王国的国教，回鹘西迁至高昌、河西后，继续受到推崇，摩尼教寺院林立，教徒上自贵族，下至百姓，人数众多。因此摩尼教的经典普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些经文从19世纪末以来，在新疆的考古发掘中不断出土。在敦煌藏经洞中也有发现。其中最著名的是《摩尼教徒忏悔词》、《二宗经》和多种赞美诗等。


图 91
回鹘文《阿弥陀经》



（三）景教典籍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因其继承了聂斯脱里的宗教主张，又名聂斯脱里派。景教于公元635年传入长安。到达吐鲁番和敦煌的时间应更早些。回鹘人西迁后，一部分人接受了景教。现在遗留下来的景教内容的回鹘文文献有《福音书》、《圣乔治殉难记》等。

（四）伊斯兰教典籍　有一部分早期的伊斯兰教文献也用回鹘文写成。黑汗王朝在公元10世纪接受伊斯兰教以后，开始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突厥语。但回鹘文仍在一定时期内使用。《圣徒传》、《升天记》、《心之烛》、《幸福书》、《帖木耳世系谱》等都是用回鹘文写成的

（五）文学作品　《福音智慧》（维也纳写本，1439年在赫拉特城抄成），《真理的入门》（回鹘文抄本，1444年由再奴里·阿比丁、苏里唐·拜合提、玉赛音等人在撒马尔罕抄成）、《乌古斯可汗传说》（13—14世纪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抄成）、《伊索寓言》残卷、古代吐鲁番民歌等。一些宗教作品从文学的角度看其实是充满艺术情调的文学作品。《弥勒会见记》作为早期的戏剧作品已尽为人知，在其跋文中说"《弥勒会见记》由圣月大师从印度文译成古代焉耆语，智护法师又从古代焉耆语译为突厥语"。这部经每叶标明幕次，每幕开始标明演出场地，全经由1幕序文、25幕正文组成，全文极具文学色彩，具有原始剧本性质。20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地区发现，1959年在新疆哈密又发现一部抄本，是个残卷，共586页。抄写时间是1067年。

1930年在新疆发现了回鹘文《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这是由玄奘弟子慧立所著汉文《玄奘传》翻译的，译者是著名的回鹘僧人胜光法师僧古萨里。这部文献被发现后，被文物商人分成几部分，一部分流出国外，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当时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闻讯后，派其弟袁复礼先生前往新疆收购，共购204叶，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另有94叶被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在佛经和摩尼教经典中也有非常出色的诗歌作品。（图92）

（六）医学文献　如《医理精华》(Siddhasara）等[1]。

[1]《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4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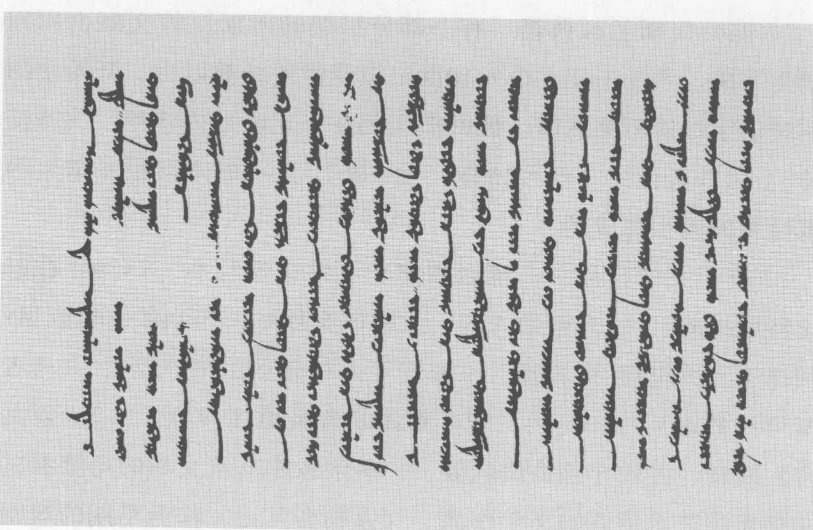


图 92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 二、回鹘文的雕版印刷

随着佛教在高昌王国的传播和快速发展，作为佛教三宝之一的佛经需要量也愈加增大，僧侣要用它做功课，信徒要用以诵读，王公贵族要作为功德施舍，一般平民要为统治者和自己的祖先祈福，传统的抄写远远赶不上社会的需求。而雕版印刷术在内地早已应用，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遗书中有题为“大晋开远四年(947年)”、“天福十五年（949年）”年款的印刷品，现收藏在英、法等国的汉文敦煌遗书中有几件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捐资刻印的残卷，其中一件观音说法图，有一段题记：“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版。……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另一件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题记为：“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此卷刻印日期为“天福十五年已酉岁五月十五日记”。第一件为公元947年的印刷品，第二件雕印时间为949年，可见至少在10世纪中叶敦煌地区已有了雕版印刷的场所。敦煌地区与吐鲁番地区地理相近，人员往来密切，雕版印刷技术对高昌王国自然会产生启迪作用，另一与高昌关系密切的西夏至少在11世纪也掌握

了雕版印刷术，并印行了大量佛教典籍。许多回鹘僧人参与了西夏的译经活动，西夏先进的印刷技术不能不对回鹘人发生影响。尽管现在还没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出土实物能揭示出回鹘雕版印刷的全貌，但可以判断当时高昌王国已有了一定规模的雕版印刷业，到元代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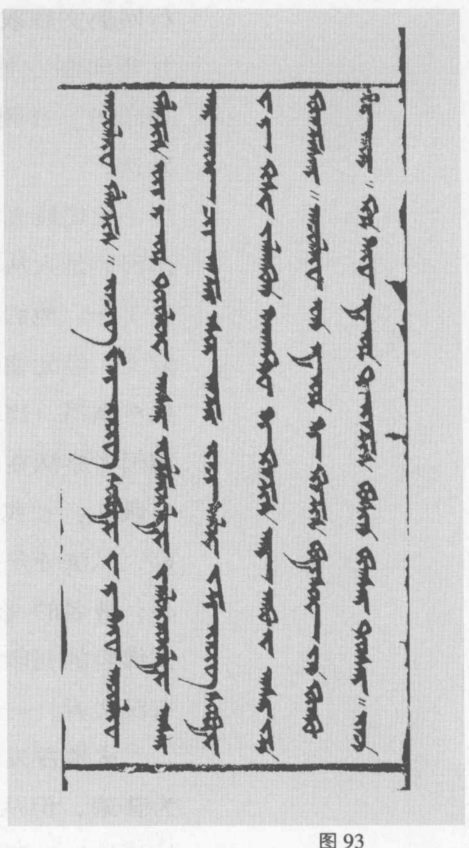


图 93
回鹘文刻本残页

从内容上看，回鹘文雕版印刷品都是佛经，除纯文字的以外，还有很多文图并茂的佛经，这些图像有的是经文中的插图，有的是经首扉画。这些佛像图雕刻精细，线条流利，形象逼真，体现了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十分高超的水平。有一幅已残的佛经卷首扉画，上面印有回鹘王室家族礼佛图，共有47位人物，下面都标有姓名，其中有元代宰相蒙速思及其妻曲帖伦等。此画现藏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

从回鹘文佛经印本的装帧形式看，大多为经折装，也有少数是梵夹装。

从印刷的时间看，少量是宋刻本，如1980—1981年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出土一批刻印的佛像残件，根据其内容和其他出土文物分析，应是宋代刊印。大多数回鹘文印刷品是元刻本。(图93)

回鹘文刻本的刻印地点现在还不能了解得很全面，但从现有资料看至少有三处。一是高昌王国本地。在20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胜金口石窟寺遗址、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等地发现了一批木刻雕版和印刷工具。有的印版上雕刻着精细图案或花纹，刻工十分精巧、细致。这显示当时的高昌王国不但雕版业比较普遍，而且在技术上已达到很高水平。

回鹘文刻本的另一刻印地点是甘肃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如目前保留在日本京都有邻馆的一件回鹘文佛经刻本残片上有四

行回鹘文题跋："愿成就圆满。至正二十一，牛年，三月一日于甘州印制。善哉，善哉。"由此可知这件刻本是1361年在甘州刊印的。甘州当时是回鹘人的活动中心，回鹘文刻经事业也很发达。

元代最大的回鹘文佛经刊印地应该是大都。当时在大都有很多回鹘僧人从事佛教活动，其中有一批著名的回鹘僧人参与了译经工作。他们将许多佛经从梵文、汉文、藏文等文字译成回鹘式蒙文，经元朝皇帝批准后刊行。回鹘文佛经也被大量刻印并流传远至高昌。当时大都的弘法寺是回鹘文佛经刊印中心。20世纪初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得到的一页回鹘文佛经印本残页上，印有如下跋文："我发愿用中都城弘法寺所藏印版印制。"中都即元大都，弘法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寺庙，辽金时代就是佛经的刻印中心，著名的《赵城金藏》的经版也收贮在这里，元代又成了回鹘文佛经的刊印和保留印版的重要场所。回鹘文佛经刊印本上页码有汉文者，一般都是内地或北京刊印的。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回鹘文佛经刻本发现较多，分布较为普遍，但从出土的文献看，都是残本，有的破损严重。经过初步统计主要有《金刚经》、《八十华严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观无量寿经》、《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佛顶心大陀罗尼》、《八阳神咒经》、《入菩萨行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这些佛经包括了大乘、小乘和密宗等教派的典籍。

应当说现在对回鹘文雕版印刷情况的了解仅仅是冰山一角。很多有关回鹘文的论著往往是从语言文字、历史宗教等角度来研究，对回鹘文图书雕版刊印情况往往一带而过。在回鹘文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方面，雅森博士首次作了专门的详尽考察与论述，这对回鹘文书史研究来说是开创性的工作。当然要研究回鹘文雕版和活字印刷在客观条件上有很多困难，首先是资料太少，且大多已是残片；其次大部分资料都在国外，使用不便。

## 三、回鹘文的活字印刷

20世纪初，随着敦煌藏经的发现，一批回鹘文木活字也惊现天下。这些回鹘文木活字埋藏在敦煌莫高窟北区的第181窟（伯希和编号）的积沙堆里，被伯希和发现后携回法国。伯希和曾用几枚活字在一张纸上进行试印，后将这批活字交巴黎吉美博物馆。这批回鹘文木活字共960枚。

新中国成立后，敦煌研究院在敦煌石窟北区清理时，又发现48枚回鹘文木活字，加上原来收藏的6枚，现存世的回鹘文木活字达1014枚。根据我国学者雅森·吾守尔于1995年对现藏巴黎的回鹘文木活字的考察，除少数几枚外，绝大部分活字字面的笔画与线条都无损毁，刷上油墨在宣纸上进行印刷取样，印文字迹清晰，无湮墨现象，与现存的回鹘文印本实物相比，效果几乎一样。

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木活字大多为宽1.3厘米，高2.2厘米，字面长短不一，依文字而定。文字皆为阳文反字。与汉文、西夏文的活字有很大的区别，回鹘文活字并非全部以单独的字或词为单位，而是充分考虑到回鹘文的语言特点来设计的。首先回鹘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其次它与一般的拼音文字不尽相同，又是一种粘着型语言，在词中有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词根或词干同附加成分的结合不甚紧密，如名词的八种不同的格、单复数的区别等都是在词干后加不同的后缀表示，动词的变化更为复杂，回鹘文活字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表现了回鹘人的高超智慧。

回鹘文活字与15世纪德国谷登堡的以字母为单位的金属活字又有区别，但回鹘文本身也是一种拼音文字，其中也有以字母为单位的活字，所以我国专家指出其中已蕴含了西方字母活字形成的基本原理。

汉字的活字印刷术在11世纪中叶已经发明，大约在12世纪40年代西夏人创造了西夏文的活字印刷术，现存最早的西夏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大约刊印于12世纪40年代以后。根据我国

学者雅森博士的考证，存世的回鹘文木活字的年代应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1]。

【1】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目前在史料方面还缺乏回鹘文活字发明与应用的具体记载，也没有发现回鹘文活字印刷品的实物，这对回鹘文活字印刷研究造成很大困难，但回鹘文木活字的发现不仅说明活字印刷术已在回鹘人中间得到应用，而且也昭示了回鹘人在印刷术由中国传播到欧洲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表明了回鹘在中国和世界印刷史上的重要贡献。

## 四、喀喇汗王朝的书籍出版

喀喇汗王朝又称黑汗王朝或伊利汗王朝，是10世纪中叶（约940年）至13世纪初（1211年）在新疆南部与中亚一带建立的封建汗国。这个汗国的族属至今争论不休，未有定论。喀喇汗王朝最盛时期疆域西至阿姆河，东至阿克苏、拜城，北至巴尔喀什湖，南抵且末、若羌。1041年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部喀喇汗王朝与宋、辽王朝关系密切。

公元955—956年，巴伊塔什继承汗位，称阿斯兰汗。他的父亲萨图克是一名穆斯林，巴伊塔什继承汗位后大力传播伊斯兰教，终于使20万帐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从此喀喇汗王朝成为中国境内第一个由突厥民族建立的接受伊斯兰教的封建汗国，这给回鹘历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回鹘文化从此开始伊斯兰化，在喀喇汗王朝近4个世纪的统治中，伊斯兰—阿拉伯文明逐渐成为主流文化，除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影响外，希腊、罗马、伊朗、阿拉伯等文化在这里得到传播和发展，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喀喇汗文化。

喀喇汗王朝境内，同时流行多种语言，回鹘语是王朝的通用语，由于受葛罗禄人的影响，其语言逐渐成为回鹘-葛逻禄方言。此外还有粟特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相应的文字也同时应用。

回鹘人的文字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语也传入喀喇汗王朝，于是回鹘人开始用阿拉伯字

母来取代原来的回鹘文字母，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回鹘语文字，被称为哈喀尼亚语，这是王朝主要的官方书面语。回鹘文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并用。这种文字的过渡、变化也体现在一些作品中，如著名的《福乐智慧》现发现有3个抄本，其中一个是回鹘文，另外2个是用阿拉伯字母抄成。

喀喇汗王朝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促使文化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他们熟练地用回鹘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进行写作、翻译，出现了大批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真理的入门》、《警言集》等作品。

《福乐智慧》是喀喇汗王朝的一部经典之作，作者是著名的诗人和思想家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此书于1169—1170年在喀什噶尔写成，全书由两篇序言、85章正文及两个附篇组成，共13 000余行。作者在书中塑造了一个理想王国，通过日出国王、月圆和贤明两大臣及隐士觉醒的对话、辩论，讨论了如何安邦治国，抒发了作者宏大的政治抱负。此书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宗教、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数学等各个方面，为研究中世纪突厥民族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十分丰富生动的历史资料。

《福乐智慧》有三个抄本传世，一个是回鹘文本，是哈桑·喀喇·沙依勒·谢米斯在1439年于阿富汗赫拉特城抄成，1474年在伊斯坦布尔发现，现收藏在维也纳国立图书馆，所以也称维也纳本。另外两个是阿拉伯文本，其中之一是公元14世纪上半叶用苏鲁斯体抄成，1896年在埃及开罗发现，被称为开罗本，已残。另一个是用纳斯赫体抄写，约公元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抄成，是最古老最完整的一个抄本，1913年在费尔干地区纳曼干城的一家私人藏书室发现，又称费尔干本或纳曼干本。

《突厥语大词典》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突厥语词典。作者为马赫穆德·喀什噶里，11世纪人，出生在喀什噶尔。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深入七河地区、伊犁河谷和锡尔河流域进行考

察，收集资料，终于在1072—1074年四易其稿，完成了这部煌煌大作。全书共八卷，卷分上下，卷内分门，门下分类，每类再按词形、语言特征、词尾字根进行编排，全书结构完整，条理清晰，编纂严密，共收词近7 500条，引用诗歌、谚语各200余条，较全面地介绍了11世纪突厥民族的政治、军事、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情况，是当时中亚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是11世纪突厥民族生活情景的唯一历史文献，同时在语言学上又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是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突厥语大词典》是在巴格达编纂完成的，原书一直保存在哈里发的王宫图书馆里，社会上有不少手抄本辗转流传。后来这部书便遗失了。直到1914年，土耳其学者阿里·艾米尔无意中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此书的一个抄本，抄写者是波斯萨微地方的穆罕默德·本·阿布巴克尔，他是在1265—1266年根据作者的原稿抄写而成的。这一抄本一直保存在奥斯曼帝国一名大臣的家族中，后因经济拮据出售。现在这一抄本保存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国家图书馆中。

《真理的入门》是回鹘文文学中另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它成书于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这时处于喀喇汗王朝末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喀喇汗王朝逐渐走向衰落。作者阿合买提·玉格乃克是一位盲人，他对动荡不安的现实十分厌恶，向往安定富裕的幸福生活，作者用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来劝诫世人，希望以此达到理想、安定的社会。全书共14章484行诗，另有跋诗三首，共512行。《真理的入门》是古代回鹘文的重要文献之一，它为研究喀喇汗王朝末期的历史、语言、文化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部作品的语言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使用的是回鹘语，但其中有很多察合台语因素，两者混用显示出正从回鹘语向察合台语过渡的进程之中，这也是喀喇汗王朝后期语言的特点。

《真理的入门》成书后，在新疆、中亚一带广为流传。现在

所知有三个较全的抄本。第一个是回鹘文抄本，1444年由再奴里·阿比丁等人在撒马尔罕抄成，现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索菲亚清真寺图书馆。第二个是回鹘文与阿拉伯文合璧的抄本，由阿不都热托克等于1480年在伊斯坦布尔抄写，现藏伊斯坦布尔图书馆。第三个本子用阿拉伯文与维吾尔文抄成，抄写时代不详，现藏于伊斯坦布尔托布卡甫图书馆，回鹘文抄本于20世纪初被发现。

喀喇汗王朝时期是回鹘人接受伊斯兰教以后的第一个文化繁荣期，人才辈出，学术著作与文学著作不断涌现。较为有名的还有《箴言诗集》，又译为《警言集》。作者艾合买提·亚萨维是一位苏菲神秘主义神学家，此书写于12—13世纪之间。艾合买提·亚萨维的学说对突厥民族伊斯兰观念的形成有巨大影响，在伊朗等伊斯兰世界也有一定地位。作品的语言很口语化，在连接喀喇汗王朝语言和察合台汗国语言的过渡状态中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1]

【1】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主编:《维吾尔文学史》,290~300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

在史学方面有《喀什噶尔史》，作者是阿勒马伊，为11世纪喀什人，这部史书已经失传，但其中一些片断在14世纪维吾尔历史学家杰马尔·卡尔西编著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中得到保留，成为今天研究早期喀喇汗王朝的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宗教方面有《古兰经注释》，作者佚名，这是第一部用突厥语解释《古兰经》的专著，约在12世纪成书，在喀喇汗王朝有一定影响。

喀喇汗王朝时期的图书都是以抄本形式流传，没有发现印刷品问世。

## 第四节　藏文书籍的继续出版

宋统一中国后，西藏地区仍处于分裂状态，很多奴隶主、新兴的农奴主各霸一方，战乱频仍。宗教方面大小支系林立，逐渐

开始了后弘期的发展。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吐蕃赞普朗达玛的曾孙吉德尼玛衮率众逃到阿里，其后裔在阿里和拉达克建古格王朝、拉达克王朝。吐蕃部落首领唃斯罗在青塘（今青海西宁）一带建立地方政权，被宋封为宁远大将军，抗衡西夏，与内地建立茶马互市。西藏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仍在继续发展。

13世纪蒙古族崛起，在蒙古定宗二年（1247年）藏族领袖、萨迦派大师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与蒙古宗王阔端会见，双方议定西藏归附蒙古的各项事宜。萨迦班智达从凉州给西藏各地首领写信，劝说他们缴纳贡赋、呈报户籍，降附蒙古汗国。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吐蕃地区军政。并在藏区分设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元朝的大一统局势，有力地推动了藏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当时西藏能从元大都获得大量纸、墨，使藏文书籍的刻印和流通更加兴盛起来。

## 一、佛教经典的继续翻译出版

### （一）藏传佛教的后弘期继续翻译、著述佛经

藏传佛教经过了长时间的消沉，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0世纪后期开始了后弘期的发展，逐渐深入民间。10世纪70年代吐蕃桑耶寺主陆续派僧人到佛教保存完好的康丹底（今青海西宁一带）学佛取经。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学成归来的鲁梅·喜饶楚臣等人在桑耶、噶迥寺授徒传法，佛教在西藏地区再度传播。一般以此年作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之年。佛教在再度流传中出现了许多教派和教派支系，并开始具备了藏传佛教的基本特征。重要教派有吐蕃时期传入的宁玛教派，后来新创的噶举派（俗称白教）、噶当派（俗称黄教）、萨迦派（俗称花教），其中噶举派又派生出帕主噶举派和噶玛噶举派等“四大八小”的众多支派。这一时期很多人从事翻译和编译佛经，形成了大量藏文佛教著述，在藏族地区流行。

当时翻译、编著佛教著作影响很大、成就很高的是仁钦桑波(958—1055)。他出生于西藏古格地区，早年出家，被阿里古格小王派往克什米尔留学，学习梵文和佛教，经过7年，学到不少显密经典，后又两次前往留学。他一生翻译显教经17部、论37部、密教怛特罗108部。他翻译的密教经咒和怛特罗，被称为“新密”。他的著作把密教提高到佛教理论的高度。由于他在翻译佛经方面的突出成就，被后人尊称“大译师”（藏语为“洛钦”）[1]。

除本土的僧人翻译、著作佛教经典外，被请到吐蕃来传教、译经的境外僧人也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底峡（982—1054)，原是克什米尔（今属巴基斯坦）人，为摩竭陀地方超严寺上座。宋庆历二年（1042年）他来到西藏阿里地方，三年后应邀到前藏传教并定居，后成为吐蕃的僧人。他一生著有30多种著作，其中以《菩提道灯论》影响最大。书中说人要修行成佛，需要修习“三皈依”（皈依佛、法、僧）和“三学”（戒、定、慧），还把人分为“下士”（天乘）、“中士”（小乘）、“上士”（大乘），把学问的阶位分为“五道”、“十地”。书中这套把人划分成等级森严、贵贱有别的理论被吐蕃佛教界和新兴农奴主所接受，在吐蕃地区产生很大影响[2]。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喀且班钦在塘波且写造《佛教大事记》。

佛经的翻译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佛教。佛经译完后，便会抄写流传。统治者和寺庙抄写佛经是当时佛教书籍流传的主要方式。比如西藏佛教后弘期在阿里地区的统治者扎巴德崇信佛教，以大量金银修造佛像，并以“白银十二千升造弥勒像，书写许多经典”。扎巴德的孙子阿南默供养金刚座，并以金汁书写《甘珠尔》经[3]。证明当时请人书写经典是要花银钱的。

在藏族地区佛教经典作为崇敬之物，一般由寺庙或贵族、头人作为功德善事，请佛经供养、阅读，但要向抄经的寺庙僧人布施钱财，作为回报。这是广泛信仰佛教的藏族地区特殊的出版物的流通方式。在藏族地区一直没有形成内地那样的书籍流通方式

【1】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78~79页，民族出版社,1983。

【2】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31~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蔡巴·贡噶多杰著、东噶·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译:《红史》,3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和销售市场。

（二）西夏地区藏文书籍的流传

西夏临近藏族地区，中期以后和青塘一带的藏族政权关系密切。西夏境内也有很多藏族居民，藏传佛教在西夏逐步发展，很多藏传佛教经典被译成西夏文或汉文，形成了大量的藏传佛教经典。同时藏文佛经也在西夏广泛流传。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国境内番、汉、羌中僧人"可量才为座主。"羌"即指吐蕃。这不仅证明西夏有藏族僧人，藏族僧人还可以作寺庙主持。《天盛律令》规定番、汉、羌中僧人行童为出家僧人必须能诵十一种经，又分为两种：番、羌所诵经和汉人所诵经。两相比较，番、羌所诵经多出《文殊真实名经》、《乾陀般若》、《无垢净光》、《金刚般若陀罗尼经》[1]。这些经典皆为藏传佛教经典。由此可见在西夏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以藏族和党项族为多，而汉族主要还是信奉汉传佛教。西夏乾祐二十年（1189年）在大度民寺作一大法会，散施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在该经的御制发愿文中，记载了在大法会上"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其中的"西番"就指藏族。西夏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刊印的西夏文《拔济苦难陀罗尼经》的发愿文提到"使诵读番、汉、羌三藏经各一遍"。西夏应天四年（1209年）的一佛经发愿文中有"诵读经文：大藏经文番、羌、汉一百八藏，诸大部帙经及余杂经等共二万五十六部。"西夏的汉文佛经《佛说父母恩重经》的发愿文记述法事活动时也有"开阐番、汉《大藏经》各一遍，西蕃《大藏经》五遍"的记载。可见西夏作法事活动时，所读诵的佛经中除西夏文、汉文外，还有藏文佛经[2]。

事实上在黑水城、敦煌、武威等地都出土了一批西夏时期的藏文经典，多是12—13世纪的藏文文献，这些书籍是这一时期硕果仅存的藏文书籍，其中有写本，也有刻本。

藏文写本形式多样。有传统的梵夹装，即从贝叶经发展而来的长条书.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每面7行字，无边栏（图94）；《辩法法性论》每面5行，左右有竖边线，左边线外有页码（图

【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一，403页，法律出版社，2000。

【2】史金波：《西夏的佛教信仰和风俗》，台湾《普门学报》，2003(1)。

95）。藏文写本佛经还有线装和缝缋装。一种内容为“给欢喜佛供‘措’的经书”，先将纸上下对折，再左右对折，在折叠处线订，成12面，每面高19.4，宽9.6厘米，单面书写，面8行。

图94
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图95
藏文写本《辩法法性论》

西夏黑水城还出土有一种特殊的手写本西夏文佛经，其中每一个西夏字都用藏文为之注音。这种佛经仅发现有数纸，为俄国科兹洛夫和英人斯坦因自黑水城遗址掘获。这种注音形式便于懂藏文的人学习、诵读西夏文佛经，表明了西夏党项文化和藏族文化的互动。此外斯坦因还在黑水城遗址发现有“汉文而用西藏文注释”的残页。由此可以推想当时西夏境内几种主要民族在文化交流中的密切关系。[1]

（三）元代藏文书籍及目录的编著

八思巴（1235—1280）是元代著名藏族高僧，曾被忽必烈封

【1】俄罗斯冬宫博物馆：《丝路上消失的王国》，274~278页，台湾中文版，1996。

为国师、帝师，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蒙古宪宗八年（1258年）就著成《道果法明鉴》，是阐述萨迦派特有的主要教法《道果法》的著述。翌年写成《密宗行部所说无量寿佛修行法》[1]。八思巴还有很多藏传佛教著作。有一部《大乘要道密集》是一部由元、明、清宫廷流传的密藏佛法珍本，原被认定为元朝初年帝师八思巴给元世祖传法密宗法本的汉译本。此集经整理后共有83篇，有传者、译者的36篇中八思巴集撰的有4篇。八思巴的这些著作原皆应是藏文书籍[2]。

【1】［唐］景福：《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92~104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

【2】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西藏大学学报》，2000(5)。

14世纪初，炯丹日贝热智等人编写了藏族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藏文大藏经的目录。佛教大师布顿·仁钦珠负责审定的《蔡巴甘珠尔》，成为当时最具权威性的精审本。经过多次整理、编定形成了《甘珠尔》和《丹珠尔》，藏区各地辗转传抄，出现了琼巴达孜写本、江孜天蚌玛写本、唐布且写本等许多藏文《大藏经》的缮写本。

元初菊登日比惹墀等人把已经译出的所有经典，删繁去伪，择善存真，编成了一部藏经目录，存于那塘寺中，成为大藏经的蓝本。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邬坚林巴在桑耶和协扎掘出《五部遗教》和《莲花遗教》。忽必烈命达玛巴拉等高僧在大都勘校藏汉文佛教典籍，编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这部藏、汉文对勘的佛教《大藏经》目录，是一项大的文献编辑工程，当时在元朝政府的主持下，由藏、汉、畏兀儿等民族的学者一道，对藏、汉两种文字的佛经认真核对，校勘异同。以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为主纂，诸高僧分任证义、证明，用了3年的时间，方才竣工，校出佛经5 386卷，完成了这部为后世重视的重要对勘目录，至大德十年（1306年）才刻板流行。

至正八年（1348年）蔡巴·贡噶多吉出资写造《藏文大藏经》。至正十三年（1353年）蔡巴·贡噶多吉迎请布敦·仁钦珠为蔡巴《藏文大藏经》开光。

布顿大师（布顿·仁钦珠，1290—1364）博览群书，精通五明，修学兼优，是藏传佛教史上的一代名师，夏鲁派的创始人。

他一生翻译、撰著书籍很多，历时多年首次校勘、修订、编辑出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目录。此目录是对《那塘版目录》的扩充，不仅在数量上增补很多，在质量上也堪称上乘，明代以后刊刻《丹珠尔》皆以此目录为蓝本。在他著作的《布顿佛教史》中还有《甘珠尔》、《丹珠尔》总目录。总分《甘珠尔》、《丹珠尔》两大类，是藏传佛教对佛教典籍的独特的分类法，此后便成为定式。《甘珠尔》又名佛部，为藏文《大藏经》的正藏，相当于汉文《大藏经》中的经和律，据称均为释迦牟尼亲传，主要是佛教的原始经典，有1 108种经典，收显乘、密乘两大部分的经、律。其中显乘收佛陀“三转法轮”所说经典，即初转法轮于鹿野苑所说的四谛法及戒律等；中转法轮于灵鹫山所说的无相法，如《般若经》等；后转法轮于毗舍离等处所说的分别法，如《华严》、《宝积》等经。密乘收诸种咒经。《丹珠尔》又名祖部，也称续藏，主要是历代佛门弟子、大译师对《甘珠尔》的阐释和论著，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有3 461种经典。此外还有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的有关著述。除佛教经、律、论外，尚有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等。其中属于密教的经轨及论藏等，十之七八是汉文大藏经中所没有的，因此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它实际上是一部汇集各科知识的大百科全书。

另外，还有一位为宁玛派的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人物，就是宁玛派史上享有崇高威望的隆钦饶降巴（1308—1363），本名叫智美奥色，出家后在当时的诸多大师前修学宁玛派以及其他宗派的密法。同时，又在桑浦寺学习“慈氏五论”和“法称七因明”等显宗经论。后得到持明大师的教授，苦志专修，成为当时藏传佛教界显、密兼通的著名人物，著述颇丰。解释密藏经义，又造宁提法类35种，总名喇嘛漾提。又造《胜乘藏》、《实相藏》、《要门藏》、《宗派藏》、《如意藏》、《句义藏》、《法界藏》等七大藏论，分别阐扬大圆满的教义，尤其是宁提中最重要的论典[1]。这些著述不仅涉及新密、旧密，而且包含许多显宗方面的

[1] 释法尊撰、吕铁钢、胡和平编：《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0。

教理。隆钦饶降巴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宁玛派的教理教法，而且为宁玛派培养了诸多高僧大德，甚至还为扩大宁玛派的势力作出了杰出贡献[1]。

当时还有藏文手写体本教《大藏经》，是藏族本教文献的集大成。它是藏传佛教和印刷技术传入藏区之前研究藏族的第一手重要藏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2]。

元代吐蕃地区已经形成并积累了大量藏文书籍。著名萨迦寺有南北二寺，北寺主要是《甘珠尔》部分，保存有大量的藏文、梵文、汉文的佛教经典，其中的梵文贝叶经，数量巨大，为世人所重；南寺主要是《丹珠尔》部分，有天文、历算、医药、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地理、文法等方面的书籍和一些著名僧人的传记。在大经堂殿中竖立着特制的大书架，从地面直到殿顶放满了书籍，据统计有8万多卷，10余万册，其中多数是元代手抄的古书。据考证，这些书籍大多数是元代八思巴时期集中吐蕃各地大批抄书人和工匠在萨迦寺抄写、装帧而成[3]。

（四）译著因明著作

作为佛教逻辑的因明学，源自古代印度，原名正理，与佛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随着佛教从印度一起传到中国的西藏，研究哲学思辨，包括逻辑学和认识论两部分，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早在佛教的前弘期就已经用藏文翻译了因明大师陈那的著作《因轮论》，赞普赤松德赞在听受佛法和因明的基础上，自己著作了《经教佛语正量论》，书中有现量、比量和圣教量等专章论述。这时因明著作的译介还是凤毛麟角。赤松德赞时期随着译经的高潮，因明著作的翻译有所增加，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如噶瓦贝孜翻译了法称的《因滴论》、律天的《因滴论疏》、陈那的《观所缘缘论疏》、莲花戒的《正理滴前品摄》等。当时还建立了讲习院、诤理院等专门研习因明的场所。

在后弘期因明在西藏有了较大的发展，大师层出不穷，著述硕果累累，不仅翻译了很多因明著作，一些大师还写出了自己的因明著述。与仁钦桑布一起到克什米尔学习的玛·雷贝喜饶是在

[1]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46~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 阿华：《藏文手写体本教〈大藏经〉及其相关典籍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02(3)。

[3] 吕伯涛：《萨迦寺的藏书》，《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8月9日。

阿里地区重兴因明的第一人。首次将法称的重要因明著作《释量论》部分译成藏文，此书共有一万二千颂，因此藏族有时称之为《一万二千颂》。后来又翻译了释迦慧的《释量论疏》和《释量论颂》及法称的《诤正理论》。在翻译的基础上他还讲解和注疏，培养了不少因明学者，对因明在西藏的传播有重大贡献。此后阿里古格王孜德请克什米尔学者真扎惹呼那和藏族学者旦真让波共同翻译陈那的重要因明著作《集量论》。

吐蕃时期俄氏贵族后裔俄·雷贝喜饶在拉萨以南建立桑朴寺，除显密经典外还特别重视因明的传授。其侄子俄·洛登希饶继任堪布后重译了不少因明著作，称为"新译本"，在藏区广泛流行，他教授的弟子很多，对因明在藏族地区的发展贡献很大。

恰巴·曲吉僧格（又译法狮子，1109—1169）是俄·洛登希饶的三传弟子，博学多才，尤其擅长中观和因明学，著作宏富。在因明方面的著作有《量论摄义祛蔽论》、《定量论广注》、《量论摄义颂》等。《量论摄义祛蔽论》是专门为圆满理解因明概念术语而写的教科书，此书今已失传。据传书中提出的辩论概念有18项，每项中包含若干概念辨析。成书后受到各地的广泛推崇，成为后世藏区因明著作的鼻祖。

萨迦派对因明也有重大贡献，特别是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在著述佛学和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深入研习因明，青年时代就学习《定量论》、《释量论》等重要因明著作，终成为大师，后撰著《正理藏论》。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因明著作，是他在深入研究、融会贯通印度量论思想的基础上，以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理论写成的一部书，影响深远。该书有颂本、作者自译本和索朗论珠的疏解本问世。颂本共3 685句（约合921颂），由"镜论"和"量论"两大部分组成，分为11品。为后人全面了解因明要义及其渊源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由于萨迦·贡噶坚赞本人和此书的重大影响，萨迦寺成了西藏显密兼传的因明学重镇。

## 二、其他藏文书籍的出版

### （一）史学、文学著作

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藏族历史著作多以叙述佛教传入藏区的过程为主线，突出提倡和推行佛教的领袖人物以及对佛教传入和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上层僧侣。宋元时期，除藏文佛经外，还形成了很多其他重要古籍，如史学、文学、哲学、医学著作等。藏族文献中，往往文史不分。一部著作既是历史著述，又是文学作品，有的甚至还阐释了宗教的哲学观点，形成文史哲合一的风格。这些著作一般先讲述宇宙的形成，再讲述印度先王、释迦牟尼家族世系以及释迦牟尼创建佛教，然后依次记述藏族族源、藏族古代诸赞普、吐蕃王朝兴佛灭本的经过、蒙古诸王史、中原王朝史等。

《善逝教法史》全称《善逝教法源流大宝藏论》，亦称《布顿佛教史》，藏传佛教夏鲁派创始人布顿·仁钦朱（1290—1364）著，成书于1322年。全书212页，分四章：第一章按古印度造论风格，概述讲经闻法的功德和闻、思、修的关系，对佛教的各种基本教法、教义，所传经典的基本内容、意义及其修炼方法、仪式作了简要的说明。第二章记述释迦牟尼诞生、三转法轮及灭寂后的三次结集，经律论三藏的出现和佛教在印度、尼泊尔传播的历史，对各教派的演变、传承、佛陀及诸高僧的平生著述作了详细的记载。第三章从叙述吐蕃王统世系起，到佛教传入西藏，分前弘期、后弘期止。对当时吐蕃赞普选派王室、贵族子弟到印度、尼泊尔和汉地学经，迎请高僧传教、译经，建立僧伽制度等情况，记述比较详细，是研究吐蕃宗教史和各族人民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料。第四章以大量篇幅对藏地所译典籍作理论性的分析和编目，是布顿对前人译著的整理和总结。其中有佛教在印度、尼泊尔发展、流传的历史，有佛教在藏族地区传播史，特别是对藏传佛教后弘期直至元代初期的历史记载详细，资料十分珍贵，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成型的教法史，在藏族史学上具有极高的价值。此书以木刻本传世[1]。

[1] 布顿·仁钦朱著、郭和卿译：《布顿佛教史》，《雪域文化精要》丛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

此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萨迦派喇嘛丹巴·索南坚赞开始撰写《西藏王统世系明鉴》。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蔡巴·贡噶多杰（1309—1364）撰写藏文史学著作《红史》。贡噶多杰原为蔡巴万户长，17岁时进京朝见元泰定帝，任万户长28年，其间修建寺庙，迎请高僧。曾受布顿·仁钦珠大师之请，校勘那塘版《甘珠尔》，编纂成265函，世称《蔡巴甘珠尔》。后出家为噶举派喇嘛，讲经著书。著作有《红史》、《红史续集》、《白史》等。在《红史》中他依据文献、档案等资料和神话传说，分别叙述印度古代王统及释迦世系、汉族地区历代王朝帝系、蒙古王统、吐蕃王朝至萨迦派掌政等部分内容，比较其他藏文史书，叙述史实清晰，语言简洁明快，宗教成分较少。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成书。其中引用汉文史料较多，突出了汉藏关系[1]。

在编写史书的同时，西藏地区也有文学著作问世。当时翻译、介绍了一些著名的印度文学著作。如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雄译师多吉坚赞遵八思巴之命译出《诗镜论》。《诗镜论》是印度檀丁撰著，原贡噶坚赞曾在《智者入门》中作过简要介绍和阐释，多吉坚赞翻译全书。此书主要论述修辞和写作知识，以诗为重点，分三章，分别叙述文章体裁、意义修饰、文辞修饰、隐语修饰和写作缺点，除论述外各有诗例105首、365首、186首。此著作对藏族作家的培养、藏族书籍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还将印度文学剧本《龙喜记》译成藏文。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邦译师在萨迦本钦南喀丹资助下将印度长诗《云使》译成藏文。

在当时的史学著作中有一种叙述本教历史的著作《本教源流》，全称《本教源流·弘扬明灯》，作者是芭·丹杰桑布，约成书于11—12世纪。本教又称本波教，是西藏地区古代盛行的原始宗教，起源于自然崇拜。吐蕃时期佛教传入后，与佛教进行了长期斗争，因吐蕃王室兴佛抑本，势力渐衰。本教吸收了佛教部分内容，改佛经为本经，繁衍教理教义。而本教的部分仪式和内容也被佛教吸收，成为藏传佛教的一种来源。《本教源流》系统地叙

[1] 蔡巴·贡噶多杰著、东噶·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述了本教的起源、发展、教义、佛本之争和本教兴衰时期的断代年限，其中对本教在吐蕃的发展和本教史上五大伏藏的形成和发掘过程等记述尤详，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对后世本教史的研究和撰述产生了很大影响。该书以抄本传世[1]。

[1] 芭·丹杰桑布：《本教源流弘扬明灯》，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藏族的文学著作很多。其中《萨迦格言》在西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在藏族中广为流传，且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萨迦格言》又称《善说宝藏》，是哲理诗集，作者萨班·贡嘎坚赞是萨迦教派的第四代祖师，出生于后藏萨迦王室，精通五明，号称萨迦班智达（萨迦派的大学者）。他一生有很多著述，《萨迦格言》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萨迦格言》共9章457首诗，后人白登曲吉等添著释文故事五十一个。《萨迦格言》产生于西藏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时期，当时佛教哲学、文学呈现繁荣景象。书中虽不乏宣扬佛教的内容，但也有不少触及时政，抨击社会弊端，颂扬正义勇敢的内容，不少格言至今仍能给人以教益。在艺术上运用丰富的比喻、推理来说明主题。这些比喻包括鱼鸟兽虫、花卉草木、山川日月、刀剪钗环以及许多典故、故事、谚语等。作者以简炼的语言、浅显易懂的语言形式阐述社会伦理，形象生动，色调鲜明，寓意深刻，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此书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被誉为生活的教科书。此书问世不久，便有了木刻本，后不断翻印。很多印经院都刻印此书，有萨迦版、那塘版、拉萨版、北京嵩祝寺版、德格版、塔尔寺版等流传。

著名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也有诗作问世。至元三年（1266年）他在萨迦寺写诗遥寄世祖忽必烈祝贺新年。同年2月他又在萨迦寺写诗题为《珍宝之鬘》（珍宝串珠），共254颂寄给阔端之子启必帖木儿。

（二）医书

藏文经典医学著作《四部医典》初成于吐蕃时期，当时没有正式版本。12世纪中期《四部医典》作者宇妥·云丹贡布的后人宇妥萨玛·云丹贡布得到《四部医典》的伏藏本，加以增订注释，

使《四部医典》广泛流行于世。

《四部医典》的第一部分为总则，共6章，介绍人体生理、病理、诊断及治疗的一般知识；第二部分为论述本，共31章，介绍人体解剖、疾病发生的原因和规律、卫生保健知识、药物性能、诊断方法及治疗原则；第三部分为密诀本，共92章，论述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第四部分为后疗本，共28章，介绍了触诊和尿诊，各种配方功效，用途及外治疗法（擦身、按摩、火灸、艾灸、拔火罐、牛角罐、热敷、冷敷、药水浴、穿刺、放血等）。各章都配有彩图。此书集中地展示了藏族医学的特点和水平以及汉、藏医学的互相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对印度古代医学的吸收[1]。

[1] 蔡景峰、王春林：《〈四部医典〉考源》，大象出版社，1999。

## 三、雕版印刷的应用和那塘版大藏经

藏族有发达的文化事业，有丰富的藏文典籍，但过去一直未能发现早期的藏文印刷品。对藏族使用印刷术在不同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如有的记载“吐蕃王朝崇奉佛教，曾专设译场，宋代自内地传入雕版刻经”[2]，“13世纪后又引进了雕版印刷术，大规模地刊印佛经译本等”[3]，但都未载明具体内容。有的则认为“永乐版《甘珠尔》的刊印，开创了藏文木刻之先例，对后来藏文雕版印刷有着深远的影响”，把藏文木刻时间定为明代[4]。以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藏文刻本文献是明永乐版《甘珠尔大藏经》，一直未发现15世纪以前的藏文早期印刷品[5]。

[2]《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530页。

[3] 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4] 彭学云：《藏文雕版印刷浅探》，《西藏研究》，1993(1)。

[5] 蔡巴·贡噶多杰著、东噶·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译：《红史》，254，25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实际上，随着藏族地区社会上对书籍需求的增加，特别是对佛经的大量需求，雕版技术也较早地传入藏族地区。

### （一）西夏的藏文雕版印刷

大约从12世纪末、13世纪初印刷术开始传入藏族地区，此后藏族地区逐渐开始雕版印刷书籍，随着雕版事业的进展，各地出现了多所印刷场所。早在西夏时期，已经出现了藏文刻印本。藏传佛教的发展，已经有了刻印佛经的需求，而在西夏地区又有发达的印刷事业，这就为藏文佛经在西夏的刻印创造了条件。近些年随着对西夏文献整理和研究的进展，在丰富的西夏文献

中不仅发现了西夏时期的藏文佛经写本，也惊喜地发现了西夏时期的藏文刻本。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藏文经典有数十种，其中有多种刻本。这些12—13世纪的刻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藏文刻本，从印刷和版本两个方面看，都十分珍贵，具有重要意义。

西夏时期的藏文刻本佛经有梵夹装和蝴蝶装两种，雕刊精细，是很成熟的印刷品，反映了藏文早期印刷出版的特点。

藏文梵夹式刻板书籍双面印刷，规格有多种。一般长66~77厘米，宽11~18厘米；最大的长110厘米，宽70厘米；最小的长仅30厘米，宽6、7厘米。封面书题多为藏文、梵文对照，正面和背面文字朝向相反，四周有栏框，左侧有书名和页码，双面算一页。有的书籍首尾印有插图。章节段落不另起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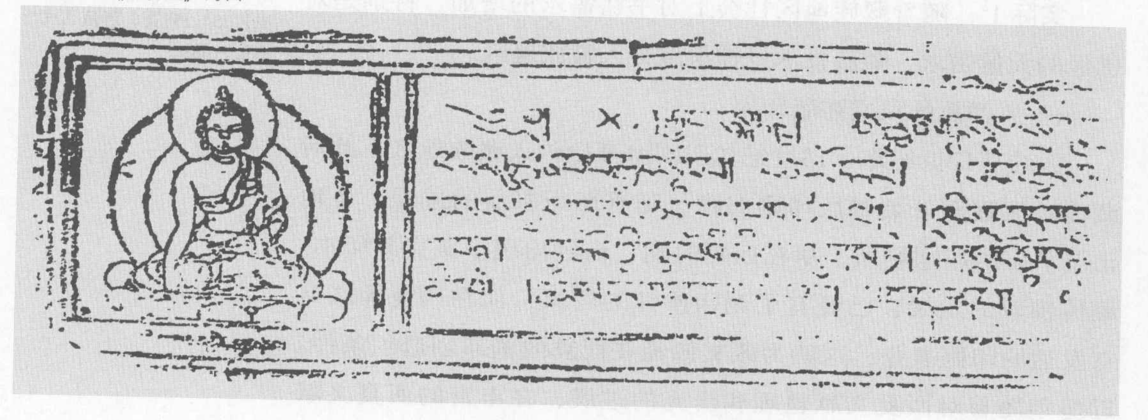
【1】王尧、陈践：《吐番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张公谨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63页，民族出版社，1997。

黑水城出土藏文刻本有多种传统的长条书式（梵夹装）。一种写本内容为《圣般若波罗密经》，稍残，两个编号，共存42页，高9.1、长22.5厘米。左右有竖栏线，左栏线外侧有页码。两面有字，面5行。字体极为工整，其藏文的拼写形式也表明是古代版本。（图96）

一种藏文刻本仅有1页，内容是向莲花生祈祷的经文。是长条装式，高6.8、宽22厘米，上下单栏，左右双栏，栏高5、宽16.4厘米。两面有字，面5行。

西夏的藏文刻本也有其他装帧方式。有一种藏文刻本是蝴蝶

图96
藏文刻本《般若经》封面



装，编号XT–63、67、68，为《顶髻尊胜佛母陀罗尼功德依经摄略》（即《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其中67号存残本，存24页，46面，纸幅高12.7、宽17.5厘米，上下单栏，左右双栏，版心高9.4，宽15.8厘米。版心白口，中有汉文页码。每面横写藏文6行。（图97）

图97
藏文刻本《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

无论是梵夹装还是蝴蝶装的藏文刻本佛经，都表现出文字书写工整，字体秀美，雕刊精细，行次整齐，版面疏朗，是木刻本的精品。由其印刷纯熟和精美的程度可以想见，这是很成熟的印刷品，很可能这不是最早的藏文印刷品。估计在这之前，藏文的雕版印刷已经走过了一段时间的路程。

此外还有刻本藏文护轮。一种护轮高24.5厘米，宽19.5厘米，画中张开的公猪皮内有一大圆圈，内有藏文，中又有正方形，四角有藏文，内又有一小圆，有藏文6行。另一种护轮高24厘米，宽24.5厘米，画一背部张开的陆龟，内有7个同心圆，各圆圈内有藏文、梵文。两种护轮图，能雕出复杂的动物图案和方、圆形，文字也清晰、流利，特别是圆周内雕刻藏文，难度更大，达到了纯熟精美的程度[1]。（图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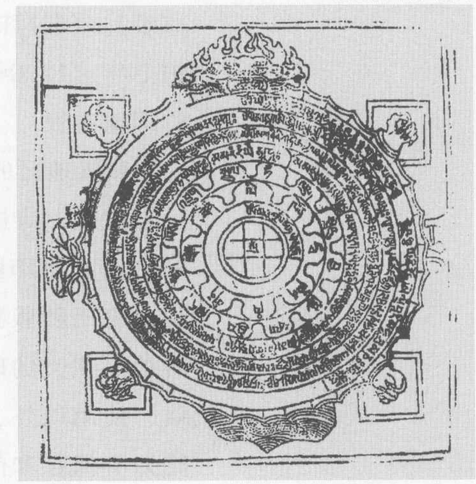


图98
藏文刻本护轮图

【1】黄润华、史金波：《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近年在敦煌莫高窟北区也发现了多种藏文刻本残页[1]，可能是早期藏文刻本，或属西夏时期，也十分珍贵。

【1】黄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0。

形成于西夏时代的藏文雕版图籍，发现于西夏故址，它们却反映着当时当地的藏族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藏文刻本，反映了藏文早期出版的特点。看来藏族也较早地应用印刷技术于出版事业，与汉文、西夏文雕印出版书籍相映成辉[2]。

【2】史金波：《最早的藏文木刻本考略》,《中国藏学》,2005(4)。

（二）那塘版大藏经的雕刊

西藏本土的文献很长时间都是手抄。据有关典籍记载，13世纪蔡巴噶举僧人蔡巴·噶德贡布先后七次到祖国内地学习，他把刻板印刷技术传入西藏[3]。但当时雕印了哪些经典，不得而知。元代僧录管主八于大德六年（1302年）曾印装西番字《乾陀般若》、《白伞》30余种，经咒十余种[4]。西番字即藏文。这些佛经都散施西藏等处，流通诵读。这是继西夏时期刻印藏文佛经后，元代较早地刻印藏文书籍的记录。

【3】张天锁：《西藏古代科技简史》,19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

【4】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王国维遗书》第二集,上海古籍书店,1983。

14世纪初西藏本土的那塘寺开始大规模的藏文雕版印刷。那塘寺位于西藏日喀则西南，兴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当时寺院规模很大，尤以编译佛经闻名全藏。寺内设印经院，是藏区最早的印经院。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该寺主持觉丹热智利用弟子从大都送来的财物、纸墨等编定抄写成那塘《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元皇庆二年（1313年）至延祐七年（1320年）间，在那塘寺雕印木刻本藏文《大藏经》，后称那塘古版。

藏族地区的寺庙中，僧人很多，特别是一些大的寺庙中有数千名僧人。寺庙有严格的学经制度，因此需要大量的藏文佛经。未使用雕版印刷以前，藏文典籍靠抄写，流传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应用雕版技术印刷书籍，目的显然是为了满足书籍大量的需求。藏文的印刷品以佛经为主，这些经书除印经的本寺庙收藏、使用以外，多作为功德赠送其他寺庙。有的寺庙和佛教信徒为了保存和阅读佛经，自己出资给印经院，请印经院印刷所

需佛经，同时也是作为一种功德。这是藏文佛经印刷品一种特殊的流通方式。

当时除佛经外，也有刻印藏文世俗著作的记载。如八思巴的弟子汉僧胡将祖将《新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唐纪》译成藏文，由仁钦扎国师于泰定二年（1325年）在临洮刻版印行。看来汉族僧人也参与了藏文书籍的翻译出版工作。

## 第五节　回鹘式蒙古文书籍的出版

### 一、蒙古族和回鹘式蒙古文的创制

公元13世纪初，一个新兴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以其生气勃勃、剽悍勇猛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北方广阔的草原上。从此对中国、对世界的历史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

蒙古族的族源长期以来聚讼纷纭，未有定论。一般认为源出东胡的蒙兀室韦，最早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森林中，8世纪后开始向西迁徙。840年回鹘汗国覆灭，回鹘人西迁后，漠北草原这一历史大舞台出现了短暂的沉寂，这为蒙古族的先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空间。到11世纪，蒙古等诸多部落已分布于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和土拉河上游及肯特山以东地区。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蒙古诸部逐渐从氏族制度向早期封建制度过渡，到12世纪中叶以后，长期争斗不已的各部落趋于统一，终于到1206年，乞颜氏贵族首领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贵族最高会议上被立为成吉思汗，一个规模空前的蒙古帝国诞生了，这是诸部结束分散自立状态，形成一个统一强盛的民族共同体的开始。

蒙古诸部走出山林，通往草原的过程中，随着与其他民族联系的增多，自身闭塞狭隘的状态日渐消失，汉、党项、畏兀儿等先进文明越来越多地被蒙古族所接受。其中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是文字的产生。

蒙古族在无文字的时期，和许多处于蒙昧时代的原始民族一

样，记录事件、传达信息只是刻木为契，或是口耳相传。“蒙古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1]。“蒙兀初起，浑噩无文，处理万事，徒资唇舌，使命往返，必以口授”[2]。

【1】[元]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中华书局，1985。

【2】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十五，罗贤佑《元代民族史》，71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1204年，蒙古大军征服乃蛮部落后，俘获了乃蛮太阳汗的王傅兼掌印官塔塔统阿。乃蛮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游牧部落，活动于阿尔泰山一带，实力强大。12世纪末内部分裂，遂为成吉思汗一一歼灭，成为蒙古汗国的属民。塔塔统阿是回鹘（元代亦称畏兀儿）人，生性聪慧，能言善辩，并且精通回鹘（畏兀儿）文字。成吉思汗对其才华十分欣赏，让其随侍左右，优渥有加，并“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3]。这样书写蒙古语言的畏兀儿文字成为回鹘式蒙古文，蒙古族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

【3】《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

蒙古语与回鹘语同属阿尔泰语系，都是粘着语，而且有大量共同成分，语音系统也相似，由于有这样密切的关系，蒙古族使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就很方便。回鹘式蒙古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最初有5个元音字母，14个辅音字母。字母在词首、词中、词尾等不同位置有不同形式，以便连写。书写时从上到下竖写，从左往右移行，这种早期的回鹘式蒙古文大约使用到17世纪初，后来形成了近代蒙古文。

## 二、回鹘式蒙古文书籍的出版

### （一）回鹘式蒙古文图书的编撰

蒙古族自从有了自己的文字，便上升到一个新的文明时期。蒙古文字创造伊始，成吉思汗在命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学习的同时，还起用一批畏兀儿文人为蒙古王室贵族的师傅。著名的如哈剌赤北鲁、岳璘帖穆尔、撒吉思、昔班等人。忽必烈时期，更在朝中及诸王位下设立“畏兀儿八合赤”的官职，由一批畏兀儿人专门教授蒙古贵族子弟文化。畏兀儿文士不但用自己的文化影响了初期的蒙古帝国，还为大蒙古国培养了最早的知识分子。这些从王公贵族产生的蒙古文人利用自己的文字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

回鹘式蒙古文一经产生，首先便应用于行政事务上。成吉思

汗任命的蒙古帝国最高行政长官失吉忽秃忽为也客扎鲁忽赤（大断事官），根据蒙古部落的习惯法和成吉思汗的法令（蒙语为札撒）审断刑狱、登记人户、掌管赋敛等，并一一记录在青册上，成吉思汗作为蒙古帝国的最高领袖所发布的种种法令、军令、训言、格言（蒙古语“必力克”），也记录于青册之上，成为“札撒大典”。这些“札撒大典”平时珍藏在统治者的库房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会集 [共商] 国事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帙拿出来，仿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1]。这些蒙古语称为“大札撒”的成文法典在成吉思汗时代具有无上的权威性，也是回鹘式蒙古文的第一批文献。

【1】〔波斯〕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28页，商务印书馆，2004。

蒙古族一向珍视本民族的历史，和许多游牧民族一样，自古以来由长辈向晚辈讲述祖先的世系和光荣历史。著名的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在其《史集》中说：“因为蒙古人自古以来有保持对自己的起源和世系的记忆的习惯……所以父母要对出生的每个子女解释有关氏族和谱系的传说，这种规矩永远为他们所遵守。”[2]在没有文字的漫长历史时期，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当文字一旦确立时，一批历史著作便应运而生了。这当中最重要的便是闻名遐迩的《蒙古秘史》。

【2】〔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册第二分册，34页，商务印书馆，1983。

《蒙古秘史》是蒙古族最早的一部用本民族语文畏兀儿体蒙古文写成的官修历史著作，作者佚名，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成书。这部书用编年体例从蒙古起源的原始传说写起，一直写到窝阔台汗统治时期，前后凡500年，全书共282节，内容丰富，是研究蒙古古代史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此书在叙述历史时用传记文学的手法，语言生动优美，韵文与散文相结合，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充满草原生活特有的清新气息。书中保留了大量古代蒙语的语言、语法修辞，还保留了一些民间故事和诗歌，也是一部文学巨著。此书被誉为蒙古族的百科全书，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此书列入世界名著。

《蒙古秘史》在1240年成书后，一直收藏在元朝的国史院内，

秘不示人。朱元璋灭元后始获此书，谕令译成汉文。洪武十五年（1382年）翰林院侍讲火源洁、编修马沙亦黑将此书蒙文原文用汉语标音，每个词用汉文直译，在每一节后再用汉文意译，此书译出后更名《元朝秘史》收入《永乐大典》，但蒙文原书已佚[1]。

除《蒙古秘史》外，著名的回鹘式蒙文史书还有《金册》。拉施特在写作《史集》时曾经见过并利用过它，蒙古书名为《阿勒坦脱必赤颜》，但未流传下来。另有《白史》，蒙文名为《查罕图克》，全名为《崇高至上转轮圣王十善福白史》，这是一部忽必烈时代颁布的圣旨、法规和典章的总汇，其范围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历史、军事等多方面，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补《元史》等史书的不足。有的学者认为此书到至顺元年（1330年）方整理成册，以抄本流传。此书在16世纪末被鄂尔多斯部忽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于肃州发现。此书还有一部畏吾儿人必兰纳识里收藏的抄本。萨囊彻辰洪台吉将此二部最早的抄本互校并作了序。此书后来又有众多的抄本流传，仅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就收藏有8个抄本，蒙古国国立图书馆藏有2个抄本，俄国圣彼得堡藏有一个抄本，是1910年从内蒙古伊克昭盟鄂金霍洛收集到的。

另有一部内容与《蒙古秘史》相近的史书，汉译本书名为《圣武亲征录》。此书所记成吉思汗主要事迹及窝阔台汗一朝的历史，与《蒙古秘史》相比，有同有异，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也有详略之别。一些学者认为《圣武亲征录》的蒙古文原书已经失传，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汉译本，但其成书年代很难确定。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此书可能是忽必烈时代的大臣王鹗等人撰修的。

早期的回鹘式蒙文图书还有《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这是一部文学作品，作者佚名，根据书中内容和某些语句可以断定是13世纪的作品。这部作品为诗歌体，应用了许多民间俗语，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场景，具有浓厚的蒙古民族特色。这部文学作品被收录在17世纪初罗布桑丹津主编的《黄金史》中，终于被保存下来。

[1] 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1957。
格什克巴图译、策·阿拉腾松布尔、苏雅拉达来注释、孟克宝音拉丁注音：《格什克巴图译元朝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在大蒙古国和元代，用回鹘式蒙文书写的史籍和收集的各种史料很多。著名的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不仅在编写《史集》时曾利用藏在汗室金库中的《金册》，还亲眼目睹了收藏在伊儿汗国宫廷中的大量史籍，他在《史集》中说道："(蒙古人和突厥人的)信史，逐代均曾用蒙语、蒙文加以记录，唯未经汇集整理，以零散篇章形式（保存于汗）的金库中。它们被秘藏起来，不让外人，甚至（不让他们自己的）优秀人士阅读；不信托任何人，深恐有人获悉（其中所载各事件）"，"整理一切有关蒙古起源史籍、与蒙古有亲属关系的突厥诸部的世系，以及有关他们的零散事迹和记述，这一切有在荣盛(国）库中者，也有托管于陛下的大臣、近侍者，直到最近，还无人敢于着手汇集到一起，无人获得整理它们的荣幸"[1]。

【1】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115~116页。

由此可以看到蒙古汗国的统治者对自己辉煌的过去是多么珍视，收集、记录已往的历史是多么经心，可惜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藏于深宫秘库的历史文献也都烟飞灰灭了。这些早期的回鹘式蒙文书籍是何种形式，采用何种材质，是桦树皮还是木片，或是皮革、纸张？书写工具是什么？这一系列疑问也成了永远的猜想。

大德十一年（1307年），历史上第一部论述蒙古文语法的著作《心箍》问世。此书另一名字叫《蒙文启蒙》，是著名的蒙古语言学家、畏吾儿人搠思节斡节儿的作品。14世纪初，随着印度、吐蕃、汉、畏吾儿等地的文学作品和佛经大量译为蒙古文，蒙古文学语言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蒙古文学语言吸收了其他民族语言文字中的精华，自身变得更为严密、丰富，蒙古语的正字法也逐渐进入轨道，受到印度、吐蕃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蒙古语言学的研究也开始了。于是《心箍》一书应运而生，作者不仅是一位语言学家，也是一位翻译家，他将很多藏文佛经译成回鹘式蒙古文。《心箍》一书首次归纳整理了蒙古书面语语法，在确定蒙古文的正字法和正音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以后的蒙古语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可惜原书已经失传，只

有后世学者对该书所作的研究，如18世纪丹赞达格巴、毕里贡·达赉的《蒙文启蒙注释》等。

现存的回鹘式蒙文原创文献主要是碑铭和函件两类。纯蒙文的碑刻存世只有两通。一是《也松格碑》，又名《成吉思汗石》，此碑为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尔次子也松格立，共5行文字，内容为记述成吉思汗西征凯旋途中，在不哈速赤忽召集全蒙古那颜大会时，也松哥射出335步远之盛况。此碑不署年款，经研究应建于1225年，是现存最早的蒙古文文献。碑原在蒙古国额尔古纳河上游，19世纪初俄国人发现后将其断为两截，现收藏在俄国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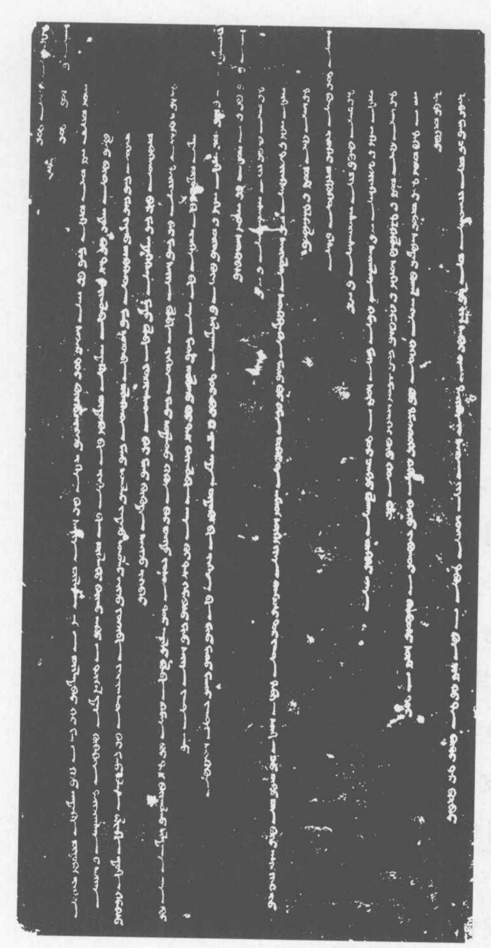


图99
元回鹘式蒙古文《云南王藏经碑》

另一通为《云南王藏经碑》（1340年），这是元代云南王阿鲁颁布给筇竹寺的一道令旨，碑高210厘米，宽6.3厘米。碑额为八思巴字拼写汉语“云南王藏经碑”六个大字，碑文共20行。碑的另一面是元仁宗1316年的圣旨，共21行汉字，现立于云南昆明筇竹寺内。另外大多是元朝晚期的碑刻，蒙汉文对照，如《释迦院碑记》（1257年）、《张氏先茔碑》、《少林寺圣旨碑》（1253—1268年三通）、《竹温台碑》、《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1362年）、《济源十方大紫宫圣旨碑》（1240年）等。（图99）

大蒙古国时期对外交往写的回鹘式蒙古文函件亦有留存。如《伊利汗国阿鲁浑汗致腓力·贝尔函》（1289年）、《阿鲁浑汗致尼古拉四世函》（1290年）、《合赞汗致天主教教皇函》（1302年）、《完者都汗致法国皇帝函》（1305年）、《蒙哥汗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函》等。

现存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都属于大蒙古国时期，或是元代末期，至今尚未发现属于元代初期到中期的回鹘式蒙古文遗物，有

专家认为这可能与忽必烈大力推广八思巴字有关[1]。

(二) 回鹘式蒙古文的汉籍翻译

蒙古国兴起后，除了大量吸收以畏兀儿文化为主的西域文明外，还接受了中原的汉文化。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后，蒙古的统治中心从漠北的哈剌和林移到燕京，后更名大都，国号也取《易经》中“乾元”之义改为“大元”。忽必烈积极推行汉法，广泛接受汉族的传统文化，迅速将蒙古族的文明程度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使处于封建制度初期的游牧民族很快接受了中原地区的较发达的农业封建文明，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核心是尊儒兴学，使蒙古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接受汉文化教育。忽必烈早在登位之前，便开设幕府，延揽汉族文人作为幕僚，为其出谋划策，并讲述儒家经典。1244年又访求到金朝末年状元王鹗，请其讲解《书经》、《易经》、《孝经》等儒家典籍，可见忽必烈有较深的汉族传统文化的造诣。

学习儒家经典，对于刚进入中原地区的蒙古人来说最困难的是语言文字。为此，忽必烈擢用一批通晓蒙古语的汉族文人来翻译儒家典籍。

早在大蒙古国时期，在燕京便设有专门学校，教授汉人和色目人学习蒙古语文，培养翻译人才。《黑鞑事略》载：“燕京市学，多教回回字及鞑人译语；才会译语，便做通事。”[2]当时有一批汉族儒生通晓蒙古语，最受忽必烈赏识的是赵璧，他将《大学衍义》译成蒙古语在马背上为尚在“潜邸”的忽必烈讲说，忽必烈还选派10名蒙古青年跟从赵璧学习。赵璧还受命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书译为蒙古文供忽必烈及其他蒙古贵族子弟学习。“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然后贵近之从公学者，始知圣贤修己治人之方矣”[3]。赵璧的蒙古文水平深得忽必烈的欣赏，忽必烈读其译文后赞叹不已：“汉人乃能为国语深细若此！”[4]除赵璧外，王遵、史弼、马充实等也是一批“能练习国体，通晓译语”的翻译人才，许多儒家经典的蒙文译文都出自他们之手。

【1】罗贤佑：《元代民族史》，73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2】彭大雅等：《黑鞑事略》，中华书局，1985。

【3】《元史》卷一九五《赵璧传》。

【4】[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二《中书平章政事赵璧谥议》。

忽必烈即位以后，还下令翻译了很多经史典籍。至元元年（1264年）“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至元五年（1268年）“敕从臣秃忽思等录《毛诗》、《孟子》、《论语》”。十九年（1282年）“刊行蒙古畏吾儿字所书《通鉴》”[1]。从汉文史料记载看，被译为蒙文的还有《百家姓》、《千字文》、《大学衍义节文》、《忠经》、《尚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帝范》等汉文典籍。有的当代汉文书籍也作了翻译，泰定元年（1324年）“敕译《列圣制诏》及《大元通制》，刊本赐百官”[2]。以儒家经典为主，包括一批重要的汉文图书被译成了蒙古文，这些译本滋养了一批新的蒙古族文士，汉文化在蒙古族中的传播更为广泛和深入。

【1】《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九》。

【2】《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本纪一》。

元朝科举制度的实行，对蒙古等少数民族接受汉族传统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元仁宗时，重开科举考试，到元末蒙古族和色目人有1 100余人被取为进士，参加考试的人数则更为可观。应试的需要大大刺激了图书出版业的发展。

从当时的史料片断可以看出蒙古文译本的一些端倪：一、儒家经典的蒙译工作是由皇帝亲自决定的。二、有的书籍反复译过多次。三、忽必烈时代译者多为汉人，后期多为蒙古族或蒙汉人士合译，说明通晓汉籍的蒙古士人已经增多。四、忽必烈即位之初，在上都有专门馆舍供译写经书，这便是翰林国史院。以后的许多译书都是由翰林国史院组织编修的，具体说是秘书监下的兴文署。天历年间建立的奎章阁学士院下属的艺文监也辖此事，“专以国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雠者俾兼治之”[3]。但有时中书省也负责，如《孝经》便是。五、汉文经书的蒙译本主要用来教学，也用来颁赐王公大臣，尚未见有出售的记载。

【3】《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四》。

元代的汉籍蒙译本虽然经历了一个繁花似锦的兴盛时期，但传世的元刻蒙古文图书现在尚能见到的只有汉文蒙古文合璧的《孝经》残本，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此书框高24厘米，宽17厘米，四周双栏，白口，双鱼尾，半叶七行。这部书翻译水平很高，既忠实于原作的精神，译文读起来又朗朗上口，表现了

高度的翻译技巧[1]。（图100）

【1】道布：《回鹘式蒙古文》，《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2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图 100
回鹘式蒙古文刻本《孝经》

关于《孝经》蒙古文译本的成书时间，有专家认为是明刻本而非元刻本[2]。

【2】照那斯图：《再谈故宫博物院藏蒙古文孝经版本年代》，《事业之路同仁之情—蒙古学学者莲见治雄教授退官纪念文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

在明末太监刘若愚所著《酌中志》中，记录了“内版书目”，其中有一条为“《达达字孝经》一本，四十二叶”，说明蒙译《孝经》在明代还印过，但是否利用元版重印，还是重新雕版，则尚待研究。

（三）回鹘式蒙古文的佛教典籍

蒙古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的，也是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的。13世纪初蒙古社会主要是信仰萨满教，后来有一部分人接受了景教。景教是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元时称为也里可温，一度传播甚广。伊斯兰教也是一部分蒙古族信奉的宗教。忽必烈之孙安西王阿难答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对蒙古族影响最大的宗教莫过于佛教了，尤其是藏传佛教，得到皇室和达官显贵的崇奉，备极尊荣。

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在西藏开雕蒙古文《大藏经》，这是在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回鹘、蒙古、

汉等僧众共同参与，将藏文大藏经译成蒙古文。在元朝廷中，有负责译经的专门机构，八思巴及其弟子都亲自参与译经工作。元朝廷还组织力量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典，如《菩萨修行化生经》、《佛说十二颂》、《大乘庄严宝度经》、《大涅槃经》等。搠思节斡节儿将藏文《入菩提行论》、《妙法莲华经》、《五护》等译为回鹘式蒙文。至顺二年（1331年），“诏以泥金畏兀儿字书《无量寿佛经》千部”[1]。这些元代蒙文译经都未流传下来。

【1】《元史》卷三十五《文宗本纪四》。

20世纪初，在新疆吐鲁番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许多宗教典籍的残片，以佛经为最多，其他还有基督教、摩尼教等宗教的经典。佛经使用的文字多达汉、蒙、回鹘、藏、西夏、梵等六种。其中有蒙文的《入菩提行经注疏》，这是元皇庆元年(1312年）的木刻本，残存12页，现藏于德国柏林。在吐鲁番出土的还有一部元代蒙文抄本《亚历山大传奇》，残存7页，现藏于德国社会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图书馆。

参与蒙文佛经翻译的，除蒙古族外，畏吾儿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元代有很多著名的畏吾儿翻译家，如阿鲁浑萨理、阿璘帖木儿、盛熙明等，最著名的译经师必兰纳失里于元皇庆年间奉命将五六种汉、梵、藏文的佛经译成回鹘式蒙文。如从汉文译出《楞严经》，从梵文译出《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从藏文译出《不可思议禅观经》[2]。又如安藏，为别失八里人，字国宝，自号龙宫老人，家中世奉佛教，安藏自小耳闻目睹父兄讲诵经论，后来成为著名的翻译家，将多种汉籍译成了民族文字[3]。

【2】罗贤佑：《元代民族史》，22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3】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26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另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是畏吾儿人迦鲁纳塔思，忽必烈时代受安藏的推荐到大都讲法。他精通佛教，懂梵、藏等多种文字。以“畏兀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4]。这条记载中的“畏兀字”即是回鹘式蒙古文，从其内容可以知道在忽必烈时代已有蒙古文佛经的刻本了。

【4】《元史》卷一百三十四《迦鲁纳塔思传》。

当时元大都的白塔寺是蒙古文佛经的翻译刻印中心，白塔寺的正式名称为妙应寺，位于北京西城，至元八年（1271年）由尼

泊尔工匠阿尼哥主持修建一喇嘛塔，历八年方竣工。后以塔为中心，建庙名大圣寿万安寺，元末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毁于雷火，明重修寺庙，更名妙应寺。不少元代的佛经后面都提到了它。出土于吐鲁番的一份宣德年间佛经残件后面有一篇用押头韵的诗体写成的题记，其中说道："这项翻译最优秀的作品的工作由迦鲁纳塔思圆满无遗漏地实施并完成了。翻译的地点在大都的精美奇妙的白塔寺中进行，时间吉祥的虎年，十干之壬年七月。"时在元大德六年（1302年）。这份佛经印本现藏于德国。

另一份同样在吐鲁番出土的蒙文佛经上也有一段题词，上面写着"余受合罕之命，于鼠年（1330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夏月第一月初一日，于大都白塔寺内刻印"，此经"印行千册以传众生"。由此可知，北京是元代蒙文佛经的翻译刊印中心，佛经印量往往以千册计，传播也很遥远，不仅大都的王公大臣可以得到，连远在万里之外的高昌王国的贵族也可得到赐经[1]。

参与元代译经活动的译师是多民族的，蒙、汉、回鹘、吐蕃、西夏等民族都有，译成蒙文的母本也有梵、藏、汉等多种文字，这种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多种民族文字的互译活动大大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

## 第六节 八思巴字书籍的出版

### 一、八思巴字的创制与使用

八思巴字是元朝国师八思巴根据忽必烈皇帝的旨令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开始忽必烈命名其为"蒙古新字"，后又改为"蒙古字"，在一些文献中又被称为"国字"、"国书"。"八思巴蒙古字"、"方体字"是近代学界对这种文字的称呼。

元世祖忽必烈对待宗教比较宽容、开放，对各种宗教都允许存在并很尊重，但其本人却偏重于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

八思巴出身于后藏的昆氏家族，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法王，

[1] 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27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是“萨迦五祖”之第五祖。其本名为罗追坚赞，八思巴为其尊号，意为“圣者”。他的伯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于1247年在甘肃凉州与蒙古宗王阔端进行谈判，确立了西藏列入蒙古汗国的版图，二者建立宗主与藩属关系，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协议。八思巴跟随其伯父目睹了这一历史事件，那年他刚十岁。八思巴聪慧多才，号称圣童。他遵照阔端王命，研习显密佛法和“五明”诸论。1251年首见忽必烈于六盘山营地。1253年，已是萨迦派新教主的八思巴再次晋见忽必烈，忽必烈对这位博学多识的青年僧人的才华十分欣赏，“与语大悦，日见亲礼”[1]。忽必烈还接受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秘密戒法，并赐八思巴以印信，从此八思巴在忽必烈身边获得无可比拟的信任和尊崇地位。忽必烈即皇帝位不久，于中统元年（1260年）尊封八思巴为国师，秩正二品，管理总制院，并掌管中原佛教事务和乌斯藏地区的军政各项事宜。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即命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到至元六年（1269年），新文字创制成功，忽必烈下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同时说明了创制新文字的原因，规定了新文字使用范围和地位。诏令说：“朕惟字以书言，言以记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寖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2] 两年后，又下诏规定“今后不得将蒙古字道作新字”[3]，因而在《元史》等史籍中所称的“蒙古字”、“国书”、“国字”等都是指八思巴字。

忽必烈创制八思巴字是要以这种文字“译写一切文字”，即是说不仅书写蒙古语，还要书写其他民族语，与秦始皇“车同轨、字同文”的政策不同，忽必烈并不废除其他民族文字，而是将其“副之”，为“正”的当然是八思巴字，这就将八思巴字置

[1]《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

[2]《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

[3]《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第三十一《礼部·学校》条。

于国字的地位了。从现有文献可以知道八思巴字除拼写蒙古语外，还记录了汉语、藏语、梵语、回鹘语等语言。

忽必烈下令创制八思巴文字的动机，一是当时的客观环境有此需要，大蒙古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通行的有回鹘式蒙文、汉文、契丹文、西夏文等文字，这种情况使忽必烈认为应有一种统一的文字来改变这种状态。但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忽必烈登基时，大蒙古国已经高度统一，而自视甚高的忽必烈认为“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必须加强文治，方显自己的统治才能，文治的重要标志是文字，他在诏令中说“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所以先从创制新文字着手。忽必烈认为，辽、金这些被征服之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我如今登基，文治方兴，怎能没有自己独有的文字？这些心理都是出自自己的民族尊严，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巩固自己的统治。

八思巴字创制后，忽必烈利用行政手段不遗余力地推行、普及，在大都和各地州、郡设立学校，教蒙古贵族子弟和百姓中的优秀子弟学习，至元八年（1271年）在大都设立蒙古国子学，选派蒙古贵族大臣子弟入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设国子监，生员达120人，蒙古、汉人各半。在国子监中培养出来的蒙古贵族子弟后来有很多是熟悉汉文化的元代高官名臣。政府规定官方文书及碑刻、玺印、钱钞、牌符等必须使用新字，同时又竭力排斥回鹘式蒙文，多次禁止在公文中使用回鹘式蒙文，如至元十五年七月诏：“虎符旧用畏吾字，今易以国字。”至元二十一年五月“敕中书省：奏目及文册皆不许用畏吾字，其宣命、札付并用蒙古书”[1]。

在忽必烈及其后历代皇帝的大力推行下，八思巴字成为元代的官方文字应用了八十余年，但八思巴文字照搬了藏文字母和藏文正字法，没有很好地结合蒙语的自身特点，不符合蒙语发展的规律，这些文字本身的缺点使其很难得到推广，蒙古族民间仍在应用回鹘式蒙文，到元朝灭亡，八思巴字便成为一种死文字了。

【1】《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十》。

## 二、八思巴字蒙古语书籍的出版

为了推行蒙古新字，并使京师和各地学校有足够的教材，元朝翻译了许多八思巴字蒙古语图书。忽必烈下诏推行八思巴字的第三年即至元八年（1271年），将《通鉴节要》译成八思巴字，在京师蒙古国子学中作为教材，并“颁行各路，俾肄习之”[1]。忽必烈去世后，各代皇帝继续重视八思巴字蒙古语的翻译。武宗时曾翻译、刻印《孝经》。大德十一年（1307年）八月，“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2] 仁宗至大四年（1311年）六月，翻译《贞观政要》，“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于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3]。21年后此书再译，至顺三年（1332年），“命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要》，锓板模印，以赐百官”[4]。延祐元年（1314年），仁宗诏令将《资治通鉴》择要再译。“帝以《资治通鉴》载前代兴亡治乱，命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及李孟择其切要者译写以进”[5]。《大学衍义》也译了二次，仁宗作太子时便读过这部书的蒙译本，到登基后的延祐四年(1317年）又下令重译刊印，“仁宗延佑四年四月以《大学衍义》译国语。先是帝为太子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像《孝经》、《烈女传》并刊以赐臣下。至是翰林学士承旨和塔拉都里默色、刘赓等译《大学衍义》以进，帝复令翰林学士阿林特穆尔译以国语。延祐五年八月，复以江浙省所印《大学衍义》五十部赐朝臣”[6]。

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译本绝大部分已经散失，至今尚能见到的八思巴字图书只有寥寥几种。一是《百家姓蒙古文》，是八思巴字与汉文对照的图书，收录在宋陈元靓的《事林广记》（元增修重版）中。此书有五个版本：1. 元至顺建安椿庄书院刻本；2. 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年）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3. 明永乐十六

【1】《续文献通考》卷五十。

【2】《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纪一》。

【3】《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纪一》。

【4】《元史》卷三十六《文宗本纪五》。

【5】《元史》卷二十五《仁宗本纪二》。

【6】《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三》。

年(1418年）建阳翠岩精舍刻本；4. 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刻本；5. 收录在清袁延梼贞节堂抄本《译语》中。《译语》是20世纪70年代末发现的一个传世抄本，此书录自明代，其中有6页八思巴字百家姓，篇前有题“蒙古字体”，见《事林广记》续集，中多讹误。此外还收录五种民族译语。《译语》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库中。(图101）二是《蒙古字韵》，这是用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韵书，按汉语的音韵分为15个韵部，收录八思巴字856个，是八思巴字拼写汉字的范本，有元刻本一直流传至清代，今已失传。现只存有一个旧抄本，是元至大戊申年(1308年）朱宗文的修订本，共两卷，各33页，现藏英国博物馆。

图 101
清抄本《译语·百家姓》

现存八思巴字图书还有一种是《萨迦格言》残本。《萨迦格言》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四世祖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的文学名著，元代被译为蒙古语，用八思巴字雕版刊印。此书为经折装，书的中缝上端有“八失”二字，下端标有汉字页码。可见此书是在内地雕版印刷。20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新疆吐鲁番发现4张残页，现分别收藏在德国（3页），和芬兰（1页）。上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清理敦煌北区洞窟，共整理鉴选出蒙古文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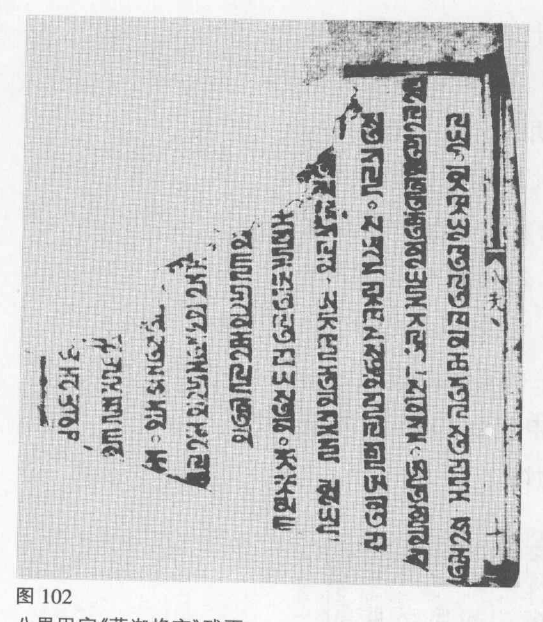


图 102
八思巴字《萨迦格言》残页

残页68件，其中回鹘式蒙古文62件，八思巴蒙古文6件，在其中发现有《萨迦格言》八思巴字刻本残页，仅一叶，据照那斯图先生研究，此件与吐鲁番出土的残本不是一个版本，可见《萨迦格言》八思巴文译本在元代刻过不止一次。照那斯图先生还告知在日本还有一片刻本残叶，上面除八思巴文外还有几个汉字，但尚未断定是何种图书。（图102）

1930年一个农民在俄罗斯伏尔加河畔的一座古墓发现了25叶桦树皮，其中有一叶上面写有八思巴字。这些桦树皮现藏俄罗斯彼得堡一家博物馆中。

在广东曲江南华寺，珍藏着两道护寺圣旨，这是元仁宗于1312—1317年间颁赐给南华寺的，圣旨为纸本、墨书，高54厘米，宽332厘米，共58行，拼写蒙古语。此件曾经装裱，但因不识文字，将两道圣旨错拼，造成文意不通。20世纪80年代初经照那斯图先生辨识后方予复原。八思巴文的纸质文献存世极为罕见，这两道八思巴文圣旨不仅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文献版本学方面也是十分珍贵的传世佳品。

## 三、八思巴字碑铭

留存至今的八思巴字文献主要是牌符、印玺、钱币和圣旨原件等，此外还有不少的碑铭。碑铭内容绝大多数是元代各朝皇帝或太后的圣旨、懿旨，总的数量达60种左右，其中拼写蒙古语的有近30种，另有30种左右是拼写汉语的，存量最早的八思巴字蒙文碑刻是1276年颁布的《安西王忙哥剌鼠年令旨》，其他主要碑文为：

《薛禅皇帝牛年圣旨》（1277或1289年）

《薛禅皇帝龙年圣旨》（陕西周至，1280或1292年）

《阿难他令旨》（陕西永寿，1283年）

《元成宗完者笃皇帝狗儿年圣旨》（河南林县，1298年）

《完者笃皇帝牛年圣旨》（西藏，1301年）

《小薛大王兔年令旨》（山西芮城，1303年）

《怀宁王海山蛇年令旨》（西藏，1305年）

《完者笃皇帝马年圣旨》（北京平谷，1306年）

《元仁宗普颜笃皇帝牛儿年圣旨》（河南林县，1313年）

《元仁宗普颜笃皇帝虎年圣旨》（陕西郃阳，1314年）

《普颜笃皇帝马年圣旨》（陕西郃阳，1318年）

《答已皇太后猴年懿旨》（西藏，1320年）

《答已皇太后鸡年懿旨》（河北易县，1321年）

《格坚皇帝猪年圣旨》（1323年）

《也孙帖木儿泰定元年圣旨》（西藏，1324年）

《帝师公哥罗古思监藏班藏鸡年法旨》（河南浚县，1326年）

《也孙帖睦尔龙年圣旨》（西藏，1328年）

《妥欢帖睦尔皇帝猪年圣旨》（山东邹县，1335年）

《妥欢帖睦尔皇帝鼠年圣旨》（河南许昌，133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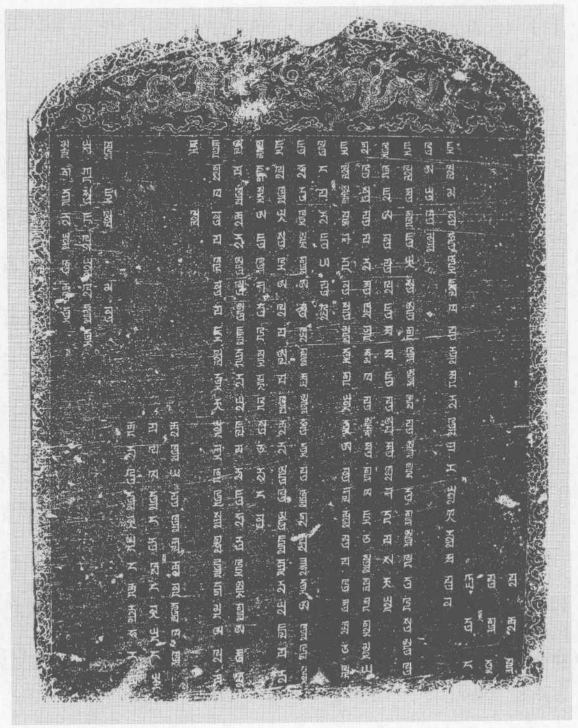
《妥欢帖睦尔皇帝兔年圣旨》（陕西周至，1351年）

《重阳万寿宫圣旨碑》（陕西周至，1352年）

《妥欢帖睦尔皇帝至正二十二年圣旨》（西藏，1362年）

《妥欢帖睦尔皇帝猴年圣旨》（西藏，1368年）（图103、图104）

图 103
八思巴字薛禅皇帝圣旨



八思巴字石刻还有居庸关石刻（1345年），《敦煌莫高窟六字真言》（1348年）、四川涪陵《白鹤梁题记》和



图 104
元八思巴字《西安王令旨碑》

禁约榜文等[1]。

八思巴字的纸质文献遗存极少，散布于全国各地的石质碑刻成为今天研究这种创制于13世纪，流行于14世纪的独特文字的主要资料。八思巴字碑铭是反映元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历史、地理等实际情况的原始资料，记录了当时真实客观的历史，十分珍贵。这些文献对研究元代的政治状况、民族关系、宗教政策、行政区划、历史人物等各方面都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八思巴字碑铭的重要意义尤为突出。首先，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是研究中世纪蒙古语的可靠依据。用回鹘字或其他文字记录蒙古语，在表音能力和记录语音的准确度上都有缺陷，如元代蒙古语的四个圆唇元音，用回鹘字或其他文字都不能准确反映，而八思巴字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1】《民族古文献概览》,455页,民族出版社,1997。

其次，八思巴字文献对研究元代蒙语的白话体和元代汉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及蒙汉两种语言的相互影响也有重要价值。

八思巴字碑铭中有一半是拼写汉语的，这些八思巴字汉语文献更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在古代对汉语的语音只能分出类别，但对其实际音值就很难确定。而八思巴字的汉语文献就能够解决这一难题。八思巴字汉语文献可以用来比勘当时汉语音韵资料。如元代的汉语有无入声字、入声带不带辅音收声，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但根据八思巴字的《蒙古字韵》，这个问题很容易得到澄清。八思巴字拼写的汉字保存了元代的读音，这种读音就可能为今天对汉字的正音提供重要的参考作用[2]。

此外，还有八思巴字印章、钱币、夜巡牌等。（图105）

【2】照那斯图、杨耐思:《八思巴字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3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图 105 八思巴字等五体文字夜巡牌

## 第七节 傣文文献的出版

能歌善舞的傣族居住在美丽、富饶的坝子——云南西双版纳等地，这里是热带、亚热带气候，山川秀丽，资源丰富。傣族有悠久的历史，有发达而富有特点的民族文化。傣文至少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形成了大量的书籍。

### 一、傣族和傣族文化

傣族历史悠久。公元前一世纪，汉文史籍已有关于傣族的明确记载。汉代称为“滇越”、“掸”，唐代称为“金齿”、“银齿”、“黑齿”、“白衣”、“茫蛮”。晚唐已有“茫蛮”用象耕田的记载[1]。宋代属大理国，11世纪金齿部贵族驱使大量农奴大兴水利，开垦种植水田，手工业和商业也很发达，逐步进入封建社会。12世纪时西双版纳第一世主叭真建立景龙国。元朝在傣族地区设立金齿宣抚司，后在车里设立车里军民总管府，通过土官进行统治。但上述族称都是他称，傣族一直自称“傣”。“傣”意为酷爱自由、和平的人。11—15世纪曾以瑞丽为中心建立称雄于

[1] [唐]樊绰:《蛮书》卷四。

世的王国，被尊为“勐卯弄”，意为“大瑞丽”。

傣族是跨境民族。国内主要聚居在西双版纳、德宏以及耿马、孟连等县。傣族的住宅是“干栏”式建筑，也称高脚房屋建筑，在潮湿炎热的南方，既防潮，又通风。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面积广阔，是驰誉中外的“普洱茶”的主要产地，当地还盛产宝石。

傣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傣族文化在继承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中原和印度及中南半岛的文化。傣族原来信仰原始宗教，后改信奉小乘佛教，即南传上座部佛教。大约在一千多年前，小乘佛教开始传入傣族地区。傣族居住的村寨几乎村村有佛寺，月月有节日。其民族节日多与佛教有关。泼水节是最盛大的传统节日，系傣历新年节，有浴佛、祈雨、祈年之意。傣族过去没有学校，傣族男子八九岁时便送进佛寺里当和尚，通过诵读经文学习傣文，学习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知识，佛寺起着学校的作用。

## 二、傣文的创制及使用

傣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傣语支。傣族有自己的文字，傣族人民用它记载了丰富的历史传说、宗教经典和文学诗歌。傣文有四种地方性变体，通用于西双版纳州的叫西双版纳傣文或傣仂文，通用于德宏州的叫德宏傣文或傣哪文，通用于红河州金平县的叫金平傣文或傣端文，通用于德宏州瑞丽县的叫傣绷文，四种方言文字在形体上差别很大。

傣文是在公元13至14世纪左右开始随着小乘佛教传播而在傣族地区流行的。这种文字来自印度字母在中南半岛的某种变体，它除了沿用印度字母的一些基本拼写规则外，又规定辅音字母可以直接充当韵尾，因此它可以认为是与藏文制度相仿的一种“音节—音素”文字。这种文字在傣族居住区一直使用至今。

傣族有极为丰富的古代文献，其著作多不注明著者和写作年代。现在只能根据其内容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和文字上所反映的语言情况推测或考定其写作年代。

傣文古籍的内容甚为广泛，包括政治历史、法律道德、宗教

经典、天文历法、农田水利、占卜问卦、故事唱词以及语文学、军事学、纹身技术等方面的著作，还有一部分是译自汉文和译自印度的文学作品。

## 三、傣文出版物的特殊载体——贝叶

傣族古籍的载体很特殊，主要是用贝叶，从而形成了傣族特有的贝叶文化。贝叶是取自一种叫贝叶棕植物的叶片，经一套特殊的制作工艺制作而成，可保存数百年之久。贝叶棕原在西双版纳地区并不出产，后由于写经文的需要才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引进。贝叶棕十分高大，很适合这里热带雨林的气候。傣家人喜植贝叶树，常在佛寺庭园里栽培，因此它是很容易得到的书写原料。

傣族的贝叶书籍制作方法是，首先把长方形的贝叶两端剪成半圆弧状，经煮、晒、压后做成可书写的叶片，并修整成册，在册的中间打上两个小圆孔，用绳子串起，然后用特制的铁笔把文字刻在上面，再用小桐子油拌烟墨刷在贝叶上，使文字清晰地显示出来。这种贝叶经能防潮、防腐、防蛀，数百年后，字迹仍然清晰，它对保存傣族文化起了巨大作用。贝叶经的规格有页四行式、五行式、六行式和八行式等四种[1]。

【1】张公谨:《傣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傣族贝叶文化与佛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随着古印度巴利文字的传入、贝叶文书的运用、书面教育和写作的发展，形成了傣族社会特有的文化。历史上用傣仂文书写而保存下来的文献极为丰富，这也即是人们平常所习称的有名的“贝叶经”。傣文贝叶文献内容包括两个大类：一类是佛教经典。小乘佛教传入傣族地后，开始用傣文翻译佛经，傣语称贝叶佛经为“坦”。另一类傣文文献，即一般的傣文书籍，称为“簿”。两者概念上虽有明确区别，但在民间赕佛的活动中，对这二者的性质和功能往往并不做区分，因而将全部傣文贝叶文献统称为广义的“贝叶经”。(图106)

傣族地区的佛寺收存贝叶文献早已成为传统，其来源一是由佛爷自己刻写，二是接受世俗众生“赕坦”献经或“赕簿”献书。傣族民间“赕佛”献经献书活动蔚然成风。“贝叶经”中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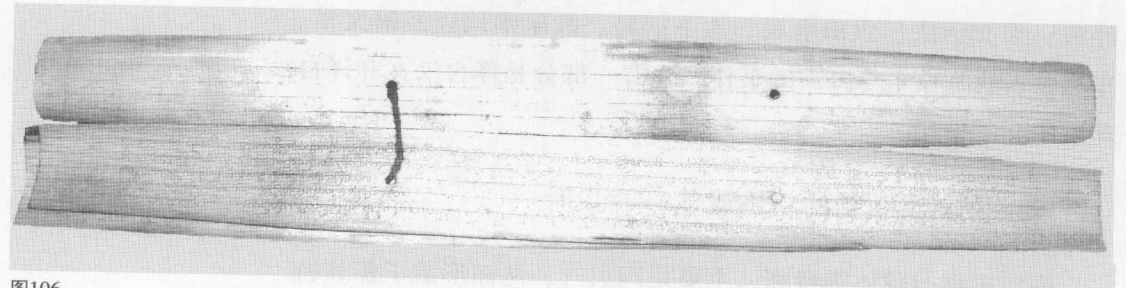


图106
傣文贝叶经

有来自印度教的故事，又包含涉及傣族民间原始信仰的传说，因此贝叶经荟萃了傣族社会各种文化知识和思想观念。除佛寺集中收存贝叶经而外，傣族世俗民间也流藏有各类贝叶文献，所以贝叶文化从佛寺到民间，成为傣族文化的代表和象征。

傣族“贝叶文化”事实上已涉及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认识活动的方方面面，分化出若干相对独立的学科：天文历法、数学、农业生产技术、医药学、生理学、语言学、史学、文学、政治法律、军事战法、美学等。贝叶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对傣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贝叶文化是对傣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性称谓，是傣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统称。贝叶经使得傣族文化延续、传承，并发扬光大。

## 四、傣文《大藏经》

傣族古籍中数量最多的是《大藏经》，号称八万四千部，现在仅存一部分。这些经典保存了小乘佛教经典较早期的面貌。

傣文《大藏经》是部派佛教南传上座部巴利语系《大藏经》之一。有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和傣绷文三种不同的方言文字写刻本。其内容和其他文字的巴利语系《大藏经》基本一致，也分经、律、论和藏外典籍四大部类。除了相应部和增支部收入的各经大部分未曾译出外，其他经籍都有译本。其中，律藏分为波罗夷品、波逸提品、大品、小品、附录五个部分。经藏也分为五个部分，即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相应部经、增一阿含经、小部经。小部经是由各种不同性质的篇目集起来的经集，内容较短，分为十五种，人们所熟悉的佛教文学作品《本生经》就是其中的

一种。《本生经》有五百四十七个佛本生故事。论藏分成七个方面，即：法集论、界论、设施论、双论、发趣论、诲事论和摄阿毗达义论。藏外经典有佛音、法护、佛授、《弥兰陀问经》、《岛史》、《大史》、《小史》、《清净道论》等。此外，还有用傣文翻译的部分重要典籍和注疏，以及信仰上座部佛教各民族僧侣的著述，涉及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语言、诗歌、民间传说、佛经故事等，都被视为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傣文《大藏经》的流传地区，以西双版纳傣文和德宏傣文书写的经卷流布面较广，傣绷文经卷则只在耿马的勐定和勐连一带流传。

## 五、其他傣文书籍的出版

傣族不仅用傣文翻译、编撰了很多佛教经典，还编写了不少世俗著作。但由于至今未发现一部世俗文献目录，只能从现有的文献中进行分析。

傣族有编写地方史志的传统。傣文编年史书《车里宣慰使司地方志》，又名《泐史》，傣文名"囊丝本勐仂"，始编于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后历代陆续累记，各抄本终迄时间不一，有的抄本写至1950年。内容记当地统治者召片领的各代世系和地方政事。但至今未发现早期版本。

傣族最早的一部法典是《芒莱法典》，也是以西双版纳傣文书写，为13—14世纪作品。芒莱是西双版纳第四代召片领的外孙，曾在景线为王，先后建都于今泰国的清莱和清迈。该法典是当时制定的法规，在西双版纳地区有法律效力。此书有棉纸写本，每页长41厘米，宽21.5厘米，共有21页，现存中央民族大学，抄本年代不清。（图107）

图107
傣文《芒莱法典》

用绵纸书写的傣文古籍傣语称“薄嘎腊沙”。这种绵纸是用生长在西双版纳森林中的构树的树皮纤维作为原料，用一般手工造纸的工艺制作而成。纸张洁白且韧性好，可以经久保存。书写时用野蕨杆削成的笔蘸墨后将文字书写在绵纸上。其规格有宽面页式和连折叠页式两种，以宽面页式最为普遍。德宏一带的棉纸本借用毛笔书写，西双版纳构皮纸本用蕨笔或竹笔书写。傣文纸本书籍只写单面，上下折叠装订。这种书籍的装订很特殊，它不是在书的左侧或右侧装订，而是在书的页顶装订，上下翻动阅读。因傣文是横写，这样装订线与各行文字平行。德宏棉纸本有的以两窄竹片夹住页的顶部前后，再以彩色丝绸垫底，包裹成卷，书籍得到保护，又十分美观。

## 第八节　察合台文书籍的出版

十三世纪初，高昌回鹘和阿力麻里葛罗禄先后依附成吉思汗，天山北部尽属蒙古。1218年左右，蒙古大军出征西辽，将天山南部均收囊中，自此结束了唐末以来新疆各地割据纷争的局面，开始了一个统一的新局面。

成吉思汗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后，将其领土分为四份，分封给四个儿子。中亚河中地区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给了二子察合台，建立了察合台汗国。1347年（元至正七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察合台汗国所辖即今中亚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诸国及阿富汗北部地区，1370年演变为帖木尔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包括今新疆及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由察合台的后裔秃黑鲁帖木尔建立，这是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蒙古汗王，在其统治下，天山以北有16万蒙古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从此伊斯兰教势力在新疆日益发展。

从14世纪开始，新疆和中亚地区的突厥语民族在喀喇汗王朝维吾尔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超方言的书面语。由于宗教的关系，这种书面语受到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强

烈影响。察合台文是现代维吾尔文的前身，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采用阿拉伯文的28个字母和波斯文的4个字母进行拼写，字体分印刷体和手写体两种。维吾尔族直至上世纪30年代文字改革前，一直使用这种文字。由于这种文字通行于察合台汗国，是察合台汗国的官方书面语，故称之为察合台文，亦称“近代维吾尔文”、“古乌兹别克文”。[1]

在察合台文通行的几百年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和科学家，留下大量的文献资料，其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文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东察合台汗国时期文学创作十分繁荣，这一时期诗人辈出，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主要作品有：

《先知传》（又译为《先知的故事》），作者拉勃胡兹，其真名为纳斯鲁丁·布尔罕尼丁·拉勃胡兹（约1279—1351）。他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颇有造诣，曾任过伊斯兰法官哈兹。此书写于1308—1310年。全书共72章，前64章所述的是源于犹太人《摩西王经》的故事，后8章讲述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其四位门徒的故事，这部作品在哲学、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先知传》大多以手抄本流传。一类是早期抄本，即是作品诞生时代或与此相近时代的抄本，此类抄本的语言属于黑汗王朝后期的哈喀尼亚语，或由哈喀尼亚语向察合台语过渡时期的语言。另一类是晚期抄本，即是16—19世纪的抄本，所用语言为察合台语。此类抄本在新疆流传最多。

《爱情篇》，作者笔名花喇子米，真实姓名和生平事迹无考，约生于13世纪末代14世纪初。从其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具有较深的文学修养和艺术造诣，曾在中亚游历，一度在金帐汗国宫廷工作，有较高的声望。该书创作于回历754年（1347年），写成后献给金帐汗国可汗。该书由序诗和10封书信加结尾组成，共570行，格式严谨，内容深刻，全书用优美的富于音乐感的语言赞美了纯真的爱情，是维吾尔古典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爱情

[1] 安瓦尔·巴依图尔：《察合台文和察合台文献》，《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哈米提：《察合台文》，《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为主题的长诗，被称为维吾尔诗坛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同时它也是连接黑汗王朝与察合台汗国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曾有很多版本流传。

《爱情篇》留存至今的版本有藏于英国博物馆的1432年亚孜德城的维吾尔文本和1508—1509年阿拉伯文本。1957年在意大利罗马又发现了此书的另一维吾尔文本。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图书馆还藏有两部维吾尔文残本，其中一些内容为其他版本所缺。据说在俄国彼得堡博物馆也藏有此书另一抄本，但迄今未公布。

## 第九节　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出版特点

有宋一代多个少数民族王朝与中原王朝并立，少数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十分活跃。元朝统一中国后，结束了各民族政权分立的局面，而元朝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朝代。因此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化高度发展，民族文献出版也出现繁荣景象。

这一时期，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民族文献的出版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有直接关系。当时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先后建立了强大的少数民族王朝，与中原的宋朝或南北对峙，或三足鼎立。辽、夏、金三国都以武力建国，立国后统治者和社会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文字的创制都有迫切需求，作为强大民族政权的主体民族，创制民族文字也是民族自尊、自信的表现。当时三个王朝都在皇帝的倡导下分别创制了民族文字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并以政府的力量推行使用，在中国北方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少数民族文献出版热潮。从出版物的文字种类、内容、形式和数量上看，都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北方少数民族王朝尽管主体民族不同，语言各异，但从他们迅速崛起的过程看，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他们都充分吸收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营养，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社会制

度和生产关系的改革，使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就是这些标示民族文化特性的的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也都明显地受到汉字的影响，打上了汉字的烙印。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还与宗教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当时各王朝普遍信仰佛教，信徒众多，需要佛教经典的种类和数量很多。因此无论是北方的回鹘文、西夏文，还是西南地区的藏文、傣文的出版物，都以佛教文献为大宗。至今虽未发现契丹文和女真文的佛经，但辽朝和金朝却分别用汉文刻印了全藏《大藏经》。西北地区的回鹘除信仰佛教外，还信仰摩尼教和景教，因此除佛经外，也出现了摩尼教、景教经典。

宋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活字印刷得到比较多的应用和发展，使中国活字印刷出版达到更高水平，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域。11世纪北宋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这一对文化发展特别是对出版影响巨大的发明，很快传播到西夏和回鹘地区。西夏不仅继承了泥活字印刷，还首先使用了木活字印刷，并且朝廷设置董理活字印刷出版的官员，使活字印刷出版成为官方行为。回鹘的活字印刷使用了字母活字，开创了字母活字的先河。

元朝统治者建立了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大一统帝国，兴学立教，尊经重儒，大量吸收和发展汉族文化。随着元朝的建立，民族文化也得到强化，中国又诞生了两种民族文字：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并设立专门机构，将一批重要汉文史籍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刊印，但大多数未能保存下来。

也由于元朝的建立，原来分立的政权消失了，契丹、女真、党项民族走上了消亡的道路，契丹文、女真文的出版趋于萎缩。西夏文文献虽仍有一定数量的出版，但与西夏时期的出版也不可同日而语。

9—10世纪初伊斯兰教进入黑汗王朝，打破了以佛教为主的文化格局。经过多年的斗争，原信仰佛教的于阗国被伊斯兰教征服。黑汗王朝接受伊斯兰教后逐渐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突厥语，但在一段时间内回鹘文还在继续使用。高昌王国仍信仰佛教，与

黑汗王朝对峙。13世纪初成吉思汗将其征服的土地分给他四个儿子，次子察合台分得西辽故地，名为察合台汗国。1347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察合台汗国包括今日新疆和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随着察合台汗国的建立和伊斯兰教的东进，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的察合台文产生了。这种文字与黑汗王朝的语言有着密切关系。其出版物也开始出现，但其出版高峰是14—17世纪的明代。尽管当时在西域印刷业已经很发达，但黑汗王朝和察合台汗国的出版物仍以手抄本形式流传。

# 附录一 宋辽西夏金元出版大事记

## 宋（960—1279年）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 元旦，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赵宋王朝。

**北宋建隆四年（963年）** 二月五日，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上言："《周刑统》科条繁浩，或有未明，请别加详定。"帝"乃命仪与权大理寺少卿苏晓、正奚屿、丞张希逊，及刑部大理寺法直官陈光义、冯叔向等同撰集……。至八月二日上之，诏并摸印颁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刻印出版的刑事法典，名曰重定《宋刑统》。与此同时，窦仪又上《建隆编敕》四卷106条，诏与所定《宋刑统》30卷并颁天下。

**北宋开宝四年（971年）** 北宋中央政府派高品张从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主持开雕《大藏经》13万版，5 048卷，480函。这是我国第一部刻印出版的《大藏经》，名曰《蜀藏》，也称为《开宝藏》。

**北宋开宝六年（973年）** 四月，开局编修《五代史》，亦称《梁唐晋汉周书》。第二年闰十月，历时19个月，书成局罢。凡150卷目录2卷。这是宋代第一次修前朝正史。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三月，诏翰林学士李昉等14人仿

以前类书，将群书分门别类编成一书，以便披览。至983年（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诏史馆所修1 000卷的这部《太平总类》日进3卷，皇帝御览。阅后特赐嘉称，改名《太平御览》。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三月，诏李昉等取野史、小说编辑成书。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八月书成上之，号曰《太平广记》，凡500卷。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 《乾元历》修成，颁布施行。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 九月，太宗以诸家文集其数至繁，且优劣相间，因命李昉、扈蒙等广阅前代文章，撮其精要，以类分之，为书千卷，目录50卷。986年（雍熙三年）十二月壬寅书成上之，号曰《文苑英华》。

**北宋端拱元年（988年）** 三月，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唐孔颖达《五经正义》180卷。《易》则十月版成以献；《书》则二年（989年）十月版成以献；《春秋》则淳化元年（990年）十月版成以献；《诗》则淳化三年（992年）四月版成以献；《礼》则淳化五年（994年）五月版成以献。

**淳化五年（994年）** 国子监判李至上言诸经义疏、释文仍有讹舛，宜更加刊定。并推荐一批硕学鸿儒进行复校。996年（至道二年）李至又请命一批人参与校订。998年（咸平元年）刘可名又奏《诗》、《书》正义仍有差讹。999年（咸平二年）十月，直讲孙奭请摹印《古文尚书音义》及新定《释文》。1000年（咸平三年）三月，又命国子监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正义；重定《孝经》、《论语》、《尔雅》正义，凡165卷。翌年九月，由邢昺、崔偓佺表上之。至此，《七经疏义》全部校竣版行。

**淳化五年至熙宁二年（994—1069年）** 内府陆续多次组织力量校正《旧唐书》以前的十五史，并陆续刻印出版。

**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 宋、辽签订澶渊之盟。

**北宋景德二年（1005年）** 九月，真宗命王钦若、杨亿等修《历代君臣事迹》。强调“朕编此书，盖取著历代君臣德美之事，

为将来取法。”至1013年（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八月，王钦若等上表进呈，经八年而书成，名曰《册府元龟》，凡1 000卷，分31部，1 104门。

**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 对以前校正过的《九经》由国子监重新刻印出版。

**北宋天禧二年（1018年）** 北宋内府刻印出版《齐民要术》、《四时纂要》。1023—1032年（北宋天圣中），由崇文院再次刻印出版《齐民要术》。

**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 十一月，宋真宗《御制集》正式刻印出版。

**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 以岁久磨损，又令国子监重刻经书版片，再次出版发行。

**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 四月，命国子监刻印出版前一年晁宗悫、王举奉敕校定的《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诸病源候论》。同年，内府刻印出版《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北宋天圣七年（1029年）** 监三馆书籍刘崇超上言：“‘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校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天圣七年十一月版成，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校对焉。”

**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 因陈彭年、邱雍所定《切韵》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又命宋祁与贾昌朝、王洙、丁度等重修定。字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分十卷，名曰《集韵》。由国子监出版颁行。

**北宋康定中（1040—1041年）** 曾公亮等奉敕编纂的《武经总要》书成。书中所记焰硝、硫磺、木炭、松脂、沥青、蜡、药等三个火药配方，及用人工磁化法制作指南鱼等方法，在军事科学上走在世界前列，极具价值。

**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 克什米尔人阿底峡到西藏，三年后应邀到前藏传教，后撰30多种著作。

**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 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奉敕编修《新唐书》。至1060年（嘉祐五年），历时十七年全书始告

竣，凡225卷。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 北宋政府在编修院置校正医书局，命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校正。每一书毕，即奏上御览，而后下国子监刻印出版。并补注《本草》，修《图经》、《千金翼方》、《金匮要略》、《伤寒论》，并均由国子监刻印出版。

**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 置太常礼院，始修《太常因革礼》。至1065年（治平二年）九月书成颁行。到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十一月，又续修藏事，名《绍兴太常因革礼》。

**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 司马光编成大事年表，名曰《万年图》。1066年（治平三年），司马光为便人主披览又撰成《通志》八卷，记战国至秦二世之事。进呈后颇得英宗赏识，命再编《历代君臣事迹》，并在崇文院设局，任其选择刘攽、刘恕、范祖禹等谙史学者共襄其事。1067年（治平四年），英宗去世，神宗即位，司马光进呈续写部分，神宗为之作序，赐名《资治通鉴》，凡294卷。1092年（元祐七年）下杭州镂板。

**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 回鹘文抄本《弥勒会见记》问世。1072—1074年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撰成《突厥语大词典》。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 由冲真、普明、咸辉等主持，募捐于福州东禅寺开雕大藏经。至1103年（北宋徽宗崇宁二年）工竣，历时23年，刻经6 430卷，580函。因刻经题记中有“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字样，故名《崇宁万寿大藏》。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 秘书省校书郎叶祖洽及赵彦若等六人，校定《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五经算法》、《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五曹算经》、《缉古算经》、《夏侯阳算经》、《算术拾遗》等算学十书，经宋神宗钦准，由秘书省刻印出版，史称秘书省本，或称元丰京监本。1213年（南宋嘉定六年），鲍澣知汀州，又重新刻印出版过这十种算书。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 宋神宗赵顼《御制集》中的《文辞》10卷、《政事》150卷由内府正式刻印出版。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 内府刻印出版李诫重新修撰的《营造法式》34卷《目录看详》二卷，为世界建筑史宝库平添了巨大财富。

**北宋大观中（1107—1110年）** 广南东路潮州韩文公庙刻印出版《韩昌黎集》，这是宋代家庙也从事出版活动的实例。

**北宋政和中（1111—1117年）** 将道士刘元道等就书艺局校定的《道藏》5 387卷，送往福州万寿观，令福州知州黄裳鸠工镂板，进于京师，名《万寿道藏》。这是我国第一部刻印出版的道教总集。

**北宋政和中（1111—1118年）** 敕撰《圣济总录》200卷成书，被誉为“医经之会要，学者之指南，生民之司命”。

**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 由本明、宗鉴、行崇、了一及蔡俊臣、陈洵、冯檝等主持，在福州开元禅寺开雕大藏经，至1172年（南宋乾道八年），历时60年工竣，世称《毗卢大藏》，凡6 170卷，567函。

**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 唐元稹《元氏长庆集》60卷由刘麟刻印出版。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 由王永从及其弟、侄、眷属发愿出资，僧宗鉴、净梵、怀琛等主持，在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开雕《大藏经》，世称《思溪圆觉藏》，凡5 480卷，548函。至1175年（南宋淳熙二年），思溪圆觉禅院久已升格为思溪法宝资福寺，又在此利用旧版重修增刻大藏，世称《思溪资福藏》，凡5 740卷，599函。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 井宪孟提举四川漕台，命各州学官搜求嘉祐旧本南北朝七史，组织眉山地区刻字良工刊行出版，世称《眉山七史》。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 麻沙水南刘仲吉刻印出版《新唐书》225卷。

**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 刘仲立家塾刻印出版《后汉书》120卷。

**南宋乾道中（1165—1173年）** 麻沙水南刘仲吉刻印出版《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50卷。

**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 蔡梦弼东塾刻印出版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二家注合刻本《史记》130卷。20年后，黄善夫家塾之敬室刻印出版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三家注合刻本《史记》130卷。

**南宋中叶** 黄善夫家塾之敬室刻印出版《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东坡纪年录》1卷。

**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 施元之在衢州刻印出版苏颂的《新仪象法要》3卷。此书可视为欧洲天文钟的祖先。秦九韶的《数学九章》是代数的发明者；而钱塘杨辉的《杨辉算法》则是三角法的发明者。表明科技、数学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 严陵郡庠刻印出版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42卷。这是史书纪事本末体的首创之书和首行之本。

**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 孝宗命吕祖谦所编《皇朝文鉴》150卷成书，建宁书坊、新安郡斋先后刻印出版。

**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 开始编纂傣文编年史书《车里宣慰使司地方志》（《泐史》年）。

**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 魏齐贤、叶劳编辑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刻印出版。

**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 周必大出判潭州，依据沈括《梦溪笔谈》所记之毕昇泥活字印书法，仿制成泥活字，用来排版印制了自己的《玉堂杂记》28事。此为中国出版史上用泥活字排印具体书的最早记载。

**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 刘元起家塾刻印出版《汉书》100卷、《后汉书》90卷《志注补》30卷。

**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 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集》150卷《附录》5卷，由家乡后贤、当朝宰相周必大主持刻印出版。

**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 《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由四川眉山地区刻印出版。

**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 魏仲举编刻出版《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40卷《外集》10卷《序传碑记》1卷《韩文类谱10卷；《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45卷。

**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 致仕宰相周必大在家乡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主持校补刊正《文苑英华》1 000卷，并予刻印出版。这是《文苑英华》的第一个刻本。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 周纶为谢世二年的父亲周必大编刻出版《周益文忠公集》200卷。

**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 金华吕氏祠堂刻印出版吕本中的《童蒙训》。

**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 严陵赵氏祠堂刻印出版赵彦肃的《复斋易说》。此与上述一条，是宋代祠堂从事刻书出版活动的实例。

**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 由藏主法忠、功德主清圭、沙门德璋、志清、慧琚、慧朗、志明、志莲、志昌、行昌、行一、惟总、昙瑞、惟吉等共同主持，在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开设大藏经局，开雕《大藏经》，世称《碛砂藏》。至1322年（元英宗至治二年）全经才竣工蒇事，历时91年。共刻经6 362卷，1 532部，590函。

**南宋端平中（1234—1236年）** 朱在为其父朱熹刻印出版《楚辞集注》。

**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 章樵重编的《古文苑》27卷，由常州军刻印出版。

**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 内府刻印出版宋慈编撰的《洗冤录》5卷。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早于西方350多年。

**南宋咸淳中（1265—1274年）** 赵孟奎编选的《分门纂类唐歌诗》。此书收唐代诗人1 300多家，诗4万余首。

## 辽（916—1125年）

**五代梁贞明二年，辽神册元年（916年）** 契丹人耶律亿建立大辽国。983~1012年（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中）又改称大契丹。1065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咸雍二年）以后又复称大辽。

**辽神册五年（920年）** 正月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等创制契丹文字。

**辽天赞年间（922—926年）** 辽太祖之弟迭剌借鉴回鹘文创制了另一种契丹文字，史称契丹小字。

**辽圣宗统和元年至三十年（983—1012年）** 大字汉文《辽藏》在辽南京（今北京）刻印出版，凡505帙。

**辽圣宗统和十五年（997年）** 辽释行均所撰《龙龛手镜》刻印出版。

**北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 宋、辽签订澶渊之盟。

**辽兴宗耶律宗真重熙元年至辽道宗咸雍五年（1032—1069年）** 小字汉文《辽藏》在辽南京（今北京）刻印出版，凡579帙。

## 西夏（1038—1227年）

**大庆元年（1036年）** 在西夏国主元昊的倡导和支持下，由大臣野利仁荣创制西夏文字（蕃书），教国人记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 依据北宋王朝赠予的《开宝藏》开始翻译西夏文佛经。

**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 元昊役民夫建高台寺，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人，继续翻译西夏文佛经。

**䄇都五年（1061年）** 罗瑞智忠等编纂西夏文韵书《文海宝韵》。

**䄇都六年（1062年）** 向宋朝求赐《九经》、《唐史》、《册府元

龟》，诏赐《九经》。

**惠宗时期（1068—1086年）** 编纂西夏文韵图《五音切韵》。

**天赐礼盛国庆年间（1069—1073年）** 完成西夏文韵书《文海宝韵》的编纂。

**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 陆文政刻印汉文《夹颂心经》，是目前所知有年代可考的西夏时期最早的汉文刻本书籍。

**大安十年（1084年）** 刊印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大安十一年（1085年）** 刻印西夏文《佛说阿弥陀经》，是目前所知有年代可考的西夏时期最早的西夏文刻本书籍。

西夏前期于政府机构中设立刻字司，专主刻印事业。

西夏前期切韵博士令六犬长、罗瑞灵长等编纂西夏文字书《音同》。

**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 印施汉文《大乘圣无量寿经》一万卷。

**贞观元年（1101年）** 设国学，教授汉学，立养贤务，供给廪食。

**贞观年间（1101—1113年）** 已有西夏王朝法典《律令》。

**贞观年间（1101—1113年）** 编印西夏王朝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

**元德二年（1120年）** 至天庆十年（1203年） 编制连续历经西夏崇宗、仁宗、桓宗三朝84年写本西夏文、汉文合璧历书。

12世纪初期以前宣徽正息齐文智编纂西夏文类似汉文《千字文》的蒙书《新集碎金置掌文》。

12世纪中期印制西夏文泥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

**正德六年（1132年）** 刊印西夏文字书《音同》修订版。

**仁宗时期（1140—1193年）** 依据南、北经重校西夏文佛经。

仁宗时两次出使金朝的官员李师白尽得金国民风土俗，著《奉使日记》三卷。

**人庆二年（1145年）** 在皇宫内建立小学，还建立大汉太学，仁宗亲临太学祭奠先圣先师孔子。同年为祭奠去世六周年的崇宗

皇帝，印施番、汉佛经。

**人庆三年（1146年）** 仁宗尊孔子为文宣帝，下令各州郡立庙祭祀。

**人庆四年（1147年）** 行唱名法，仿中原选举制度立进士科，策试举人。

**天盛元年（1149年）** 仁宗刻印番汉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和《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一万五千卷。

**天盛年间（1149—1169年）** 北王兼中书令嵬名地暴领衔修订西夏王朝法典，编成《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二十卷。

**天盛四年（1152年）** 刘德真刻印汉文《注华严法界观门》、梁吉祥狗刻印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

**天盛十三年（1161年）** 仁宗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彦、王签等为学士，修撰《实录》。

**天盛十九年（1167年）** 仁宗为皇太后去世一周年而印施番汉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共二万卷。同年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任得敬印施《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天盛二十一年（1169年）** 枢密内宿等承旨、殿前匭匣司正库瑞忠茂印施西夏文《佛说父母恩重经》千卷。

**乾祐七年（1176年）** 梁德养初编西夏文谚语集《新集锦合辞》，至乾祐十八年（1187年）王仁持增补刊印出版。同年有写本西夏文《杂字》问世。

**乾祐十二年（1181年）** 刻字司刻印西夏文类书《类林》。西夏文《论语》、《六韬》、《黄石公三略》与《类林》的刻工颇多重复，为同时代刻印。

**乾祐十三年（1182年）** 刻字司印制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

**乾祐十五年（1184年）** 仁宗于本命年印施番汉文《佛说大乘三归依经》五万一千余卷，彩画功德大小五万一千余帧。袁宗鉴等人刻印汉文《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佛陀罗尼经》。

**乾祐十六年（1185年）** 刻印西夏文诗歌集，包括《赋诗》、《大诗》、《月月乐诗》、《道理诗》、《聪颖诗》等。同年僧人智

通印施汉文《六字大明王陀罗尼经》。

**乾祐二十年（1189年）** 仁宗在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散施番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

**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 骨勒茂才撰著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

**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 仁宗去世，西经略使在凉州组织大法会悼，念雕印散施《拔济苦难陀罗尼经》番、汉文二千余卷。

**天庆元年（1194年）** 皇太后罗氏于仁宗“周忌之辰”印施《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番文一万部，汉文二万部。

**桓宗时期（1194—1205年）** 皇太后罗氏令人新写西夏文大藏经契一藏，今存《佛说宝雨经》和《佛说长阿含经》卷第十二。

**桓宗时期（1194—1205年）** 番大学院教授曹道安编译西夏文《德行集》以活字版印行。

**天庆二年（1195年）** 罗太后于仁宗“二周之忌辰”印施《佛说转女身经》番、汉文共三万余卷，并彩绘功德三万余帧。

**天庆三年（1196年）** 皇太后罗氏又于仁宗“大祥之辰”，许愿在三年之中，开读经文：藏经三百二十八藏，《大藏经》二百四十七藏，诸般经八十一藏，大部帙经并零经五百五十四万八千一百七十八部，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九万三千部消演番、汉大乘经六十一部。

**天庆三年（1196年）** 张罗讹因旧刻西夏文《大密咒受持经》因年日久，印版损坏，而重新刻印。

**天庆七年（1200年）** 僧人金刚幢译，智广、慧真辑《密咒圆因往生集》一卷，为后世列入汉文大藏经的西夏人著述。

**天庆七年（1200年）** 仇彦忠印施《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六百余卷。

**应天四年（1209年）** 襄宗散施佛经并作广大法事，读诵经：《大藏经》番、西番、汉一百八藏，诸大部及余杂经等共二万五

十六部，散施番汉《金刚经》、《般若经》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阿弥陀经》等共五万卷，消演番汉大乘经五部，大乘忏悔一百八十一遍。

**皇建元年（1210年）** 张盖利、僧人李智宝印施汉文《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和《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郭善正令人重刻印的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耿长葛发愿刻印《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

同年印刷汉文活字版《西夏光定元年（1211年）辛未岁具注历》，是目前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汉文活字印刷品。

**光定四年（1214年）** 书写泥金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神宗遵顼撰发愿文。

**光定六年（1216年）** 以活字版印《胜慧到彼岸要语学禁现前解庄严论显颂》，并记主持人御前注补印活字都案头监、出家功德司承旨云智有、御前注补印活字都案头监、工院正王忠敬。西夏后期排印西夏文木活字版《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共九卷。西夏晚期任观文殿大学士并以南院宣徽使出使金国的罗世昌，辞官归乡里，知国将亡，专心著书，谱《夏国世次》二十卷。

**元太宗皇后乃马真称制乙巳年（1245年）** 至定宗贵由二年（1247年）施主陈慧高等重刊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夏元之交西夏僧人兰山云岩慈恩寺护法国师慧觉编辑《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四十二卷。

元世祖忽必烈时元朝开始雕刊西夏文大藏经，至元九年（1272年）一行国师着手刻印西夏文（河西字）三藏新经。至元三十年（1293年）于杭州万寿寺中刻印西夏文《大藏经》。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成宗即位后一度罢宣政院所刻西夏文《大藏经》板。元成宗不久恢复刻印西夏文《大藏经》。大德六年（1302年）夏始告完毕，印施十藏。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又印施西夏文《大藏经》三十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寺院，永远流通。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西夏文《龙树菩萨为忏陀

迦王说法要偈》即为当时印本。

**大德十一年（1307年）** 武宗在潜邸时印施西夏文《大藏经》五十藏。今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悲华经》卷第九、《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五、《经律异相》卷第十五以及《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卷第十八皆为当时印本。至大四年（1311年）又印施西夏文《大藏经》五十藏。元代排印西夏文活字版《大方广佛华严经》，今国家图书馆等处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为当时印本。

## 金（1115—1234年）

**北宋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金收国元年（1115年）** 阿骨打即皇帝位，建国号为金。

**金天辅三年（1119年）** 完颜希尹奉敕依据由汉字改制而成的契丹字创制了女真字。至1138年（金熙宗完颜亶天眷元年），又创制成笔画简单的女真字，称为女真小字。

**北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年）** 12月，金兵攻破北宋都城汴梁。

**北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 正月九日，金兵掠取北宋国子监书版、三馆、秘阁四部书。二十三日，金人索取监书、藏经。并移文开封府，用现金收买，开封府直取书籍铺。二十六日，金人再索古器、秘阁、三馆书籍、监本印版、古圣贤图像、宋人文集、阴阳医卜之书。二十九日，金人差董逌权司监业、起书籍等，差兵八千人运赴军前。三十日，金人再索秘书省文籍、国子监印版。北宋百余年官私所积之图书、版片，至是为之一空。

**南宋绍兴十九年至乾道九年，金皇统九年至大定十三年（1149—1173年）** 山西信女崔法珍以断臂苦行募化众缘，在山西解州天宁寺开大藏经局，开雕释家《大藏经》，世称《金藏》，也称为《赵城金藏》，凡7 182卷，今存4 800余卷，藏国家图书馆。

**金天德三年（1151年）** 金人设立国子监，由此陆续刻印出版《九经》、《十四史》和《老子》、《荀子》、《扬子》。

**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 专设女真进士科，选拔官吏。大定十三年设立女真国子学。

**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 印刷女真文《孝经》上千部付点检司，分赐给护卫亲军。

**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 金世宗完颜雍下诏将金南京（今开封）所藏北宋《万寿道藏》板片调往中都（今北京），贮天长观，由道士孙明道主持修补，两年蒇事而进行刷印，凡6 455卷，602帙，定名为《大金玄都宝藏》，此即金代刻印的道藏。

**金明昌二年（1191年）** 金章宗下令废止契丹字，只准用女真字和汉字。

13世纪初塔塔统阿受命以畏兀儿字书写蒙古语，成为回鹘式蒙古文。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印刷术开始传入藏族地区，在西夏地区出现藏文刻印书籍。

12 世纪末至13 世纪上半叶制回鹘文木活字，印刷回鹘文书籍。

## 元（1206—1368年）

**蒙古太宗八年（1236年）** 立编修所于燕京，立经籍所于平阳，负责编译经史。1267年（元世祖至元四年），忽必烈诏立弘文院。1269年（南宋端平三年，元世祖至元六年），徙平阳经籍所于京师，并入弘文院。

**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 撰成回鹘式蒙古文《蒙古秘史》。

13世纪上半叶萨迦教派第四代祖师萨班·贡嘎坚赞著藏文《萨迦格言》。

**蒙古宪宗八年（1258年）** 八思巴著成《道果法明鉴》。

**元中统元年（1260年）** 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年）制成，下诏“以新制蒙古字颁行天下”。

**元至元元年（1264年）** 忽必烈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

**南宋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1271年）** 蒙古族立国号为元。

**元至元八年（1271年）** 将《通鉴节要》译成八思巴字，作蒙古国子学教材，并“颁行各路，俾肄习之”。

**南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 元军渡江南下，攻破临安，南宋灭亡。世祖命焦友直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伯颜入临安，遣郎中孟祺籍宋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图书，由海道运至大都。又接受许衡建议，遣使取杭州在官书籍版及江西诸郡书版，立兴文署以掌之。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 六月，以《大明历》浸差，诏郭守敬与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测验。1280年（元至元十七年），新的历法造成，郭守敬与诸太史同奏上，是为《授时历》。

**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 四月，《资治通鉴》被译成蒙古畏吾儿字，正式由兴文署刻印出版。

**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 五月敕中书省奏目及文册皆不许用畏吾字，用八思巴字。

**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 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务其事，立局置属，始修《大元一统志》。至1303年（元大德七年）最后修成，历时18年，全书凡1 300卷。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 邬坚林巴在桑耶和协扎掘出藏文《五部遗教》和《莲花遗教》。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 参知政事魏天祐在福建行省刻印出版《资治通鉴》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五月，中书省右丞何荣祖上所编《至元新格》，帝命刻板颁行。

**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 在西藏开雕蒙古文《大藏经》。

**元大德二年（1298年）** 王桢木活字制成，并用这套木活字排板印制了《旌德县志》100部，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用木活字排印的方志之书。

**元大德六年（1302年）** 西夏文大藏经雕刊完成，并印施流

行。僧录管主八于印藏文《乾陀般若》等经。

**元大德六年（1302年）、元至顺元年（1330年）** 于大都白塔寺内刻印回鹘式蒙古文佛经。

**元大德九年（1305年）** 由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发起，先后由九路儒学刻印出版了十七史，版本学上称为九路儒学《十七史》。

**元大德十年（1306年）** 忽必烈命达玛巴拉等在大都勘校藏汉文佛教典籍，编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完成，并刻板流行。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 六月，武宗遣使四方，旁求经籍。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并谓："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像孝经》、《列女传》同时刻印出版，赐臣下。蒙古语言学家、畏吾儿人搠思节斡节儿撰成论述蒙古文语法著作《心箍》（《蒙文启蒙》）。1308—1310年纳斯鲁丁·布尔罕尼丁·拉勃胡兹撰成察合台文（《先知传》）。

**元仁宗至大四年（1311年）** 六月，以八思巴字翻译《贞观政要》。

**元皇庆元年（1312年）** 三月，仁宗采纳王恽、郑介夫建议，下诏以格例、条画有关风纪者类集成书，名曰《风纪宏纲》。

**元皇庆二年（1313年）至延祐七年（1320年）間** 在西藏那塘寺雕印藏文《大藏经》。1322年藏传佛教夏鲁派创始人布顿·仁钦朱著成藏文《布顿佛教史》。

**元延祐元年（1314年）** 八月，以前所出版的《农桑辑要》字体过小，仁宗诏换成大字，命江浙行省重新刻印出版1万部，颁行天下。至1332年（元至顺三年）又刻印出版1万部。

**元延祐二年（1315年）** 四月，仁宗命李孟等类集累朝条格，成书后奏闻。后成书，名曰《元典章》，亦称《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凡60卷。

**元至治三年（1323年）** 二月，英宗接受御使李端建议，命完颜丹、曹伯启纂集累朝格例而损益之，凡得2 539条，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

**元至治三年（1323年）** 二月，英宗敕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二部，命拜住等总领其事，诏吴澄制序。澄则曰："主上写经，为民祈福，甚盛举也。若用以追荐，臣所未知。盖福田利益，虽人所乐闻；而轮回之事，彼习其学者犹或不言。不过谓为善之人，死则上通高明，其极品则与日月齐光；为恶之人，死则下沦污秽，其极下则与沙虫同类。其徒遂为荐拔之说，以惑世人。今列圣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荐拔？且国初以来，凡写经追荐，不知几举。若未效，是无佛法矣；若已效，是诬其祖矣。撰为文辞，不可以示后世，请俟驾还奏之。"会帝崩而止。

**元泰定四年（1327年）** 李好文建言请修礼书，三年而书成，名曰《太常集礼》，凡50卷。

**元天历元年（1328年）** 萨迦派喇嘛丹巴·索南坚赞开始撰写《西藏王统世系明鉴》。

**元至顺元年（1330年）** 正月，文宗命赵世延、赵世安、虞集等纂修《皇朝经世大典》，翌年书成，凡880卷，目录12卷。

**元后至元二年（1336年）** 徽政院校正出版《元官板大藏经》6 510卷。

**元后至元二年（1336年）** 十二月，由翰林国史院待制谢端等推荐，授经郎苏天爵选编之《国朝文类》70卷奏进都省，下令刊版。

**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 国子监牒呈中书省批准，下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派庆元路儒学召工刻印出版宋王应麟所辑类书《玉海》200卷。

**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 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朱墨套印出版了无闻和尚注释的《金刚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套色印刷品。

**元至正三年（1343年）** 三月，惠宗下诏以中书左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在翰林国史院置局，开始撰修宋、辽、金三史。

**元至正四年（1344年）** 三月，《辽史》修成；十一月，《金

史》修成；1345年（元至正五年）十月，《宋史》修成。1345年，江浙、江西行中书省奉诏刻印出版《辽史》、《金史》；翌年，刻印出版《宋史》。

元至正六年（1346年） 蔡巴·贡噶多杰撰写藏文史学著作《红史》。

元至正八年（1348年） 蔡巴·贡噶多吉出资写造藏文《大藏经》。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 在甘州印制回鹘文佛经。

13—14世纪以傣文编制傣族最早的一部法典《芒莱法典》。

# 附录二　参考文献

## 一、史料类

【1】[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
【2】[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扫叶山房本。
【3】[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
【5】[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
【6】[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中华书局,1985年。
【7】[宋]叶隆礼撰:《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8】[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9】[宋]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上,现代出版社,1987年。
【10】[宋]王应麟:《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本,1987年。
【11】[宋]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2年。
【13】[宋]王溥:《五代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
【14】[宋]洪迈:《容斋随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5】[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
【16】[宋]王明清:《挥麈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17】[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史金波、聂鸿音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

人民出版社,1989年。
【18】[元]一行慧觉录:《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
【19】[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四部丛刊本。
【20】[元]脱脱等撰《辽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21】[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22】[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
【23】[元]陶宗仪:《书史会要》,上海书店,1984年。
【24】[元]王士点、商企翁撰,高荣盛点校:《秘书监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25】[元]方回选评、[清]纪昀刊误,诸伟奇、胡益民点校:《瀛奎律髓》,1994年。
【26】[明]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27】[明]陈邦瞻撰,王树民点校:《元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
【28】[明、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9】[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本。
【30】[清]吴广成:《西夏书事》,清道光五年(1835年)刊本。
【31】[清]张澍:《养素堂文集》,清道光十五年刊本。
【32】[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33】[清]黄丕烈撰,缪荃孙编:《尧圃藏书题识》十卷,江阴缪氏刻本,1919年。
【34】[清]钱曾撰,管庭芬校正、章钰补:《读书敏求记》四卷首尾各一卷,章氏刻本,1926年。
【35】[清]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7年。
【36】[清]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80年。
【37】[清]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王国维遗书》第二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38】[清]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84年版。
【39】[清]钱东垣:《崇文总目补遗》、《崇文总目附录》,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上,现代出版社,1987年。
【40】[清]朱彝尊:《经义考》三百卷《目录》二卷,文物出版社,1987年。
【41】[清]张金吾:《金文最》,中华书局,1990年。
【42】[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43】《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影印元刻本,1998年。
【44】陈述:《辽文汇序例》。
【45】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十六卷,宜都杨氏刻本,1897年。

【46】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上虞罗氏印行,1927年。
【47】杨守敬撰,王重民编:《日本访书志补》,中华图书馆协会,1930年。
【48】叶德辉考证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上,现代出版社,1987年。
【49】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中兴馆阁续书目辑考》,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上,现代出版社,1987年。
【50】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巴蜀书社,1989年。

## 二、文集类

【51】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编辑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52】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一、二、三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第八、第十一、第十三,1932年、1933年。
【53】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1年。
【54】释道安、张漫涛:《大藏经研究汇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
【55】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56】傅懋绩主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57】释法尊撰、吕铁钢、胡和平编:《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1990年。
【58】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刊行,1990、1991年。
【59】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西夏天盛律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
【60】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3册,1994-2006年。
【61】邓文宽辑校:《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62】潘国允、赵坤娟:《蒙元版刻综录》,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
【63】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64】耿世民:《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65】龚煌城:《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002年。
【66】顾廷龙:《顾廷龙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

【67】潘天祯:《潘天祯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
【68】史金波、王菡主编:《国家图书馆学刊》增刊《西夏研究专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69】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20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2007年。

## 三、著作类

【70】《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
【71】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1957年。
【72】钱基博:《版本通义》,古籍出版社,1957年。
【73】陈垣:《史讳举例》,科学出版社,1958年。
【74】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
【75】王伯敏:《中国版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
【76】郭味蕖:《中国版画史略》,朝花美术出版社,1962年。
【77】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
【78】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增订本,1983年。
【79】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1981年。
【80】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2年。
【81】罗福颐等:《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82】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83】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3年。
【84】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85】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华书局,1985年。
【86】彭大雅等:《黑鞑事略》,中华书局,1985年。
【87】清格尔泰、刘凤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88】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89】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
【90】王尧、陈践:《吐番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
【91】张公谨:《傣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
【92】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93】杨绳信:《中国版刻综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94】蔡巴·贡噶多杰著、东噶·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95】戴锡章编撰、罗矛昆点校:《西夏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96】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97】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

【98】布顿·仁钦朱著、郭和卿译:《布顿佛教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

【99】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00】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0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2】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

【103】李致忠:《古代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104】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雕版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

【105】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06】芭·丹杰桑布:《本教源流弘扬明灯》,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

【107】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文物出版社,1991年。

【108】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历代刻书概论》,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年。

【109】唐景福:《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

【110】陈炳应:《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1】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年。

【112】李致忠:《宋版书叙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113】林英津:《夏译〈孙子兵法〉研究》(上、下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4年,台北。

【114】陈炳应:《〈贞观玉镜统〉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5】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6】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编著:《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117】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8】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

【119】俄罗斯冬宫博物馆:《丝路上消失的王国》(台湾中文版),1996年。

【120】肖东发主编:《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121】罗贤佑:《元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

【122】李范文、中岛干起编著:《西夏文杂字研究》,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7年。

【123】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4】张公谨主编:《民族古文字概览》,民族出版社,1997年。
【125】阿不都克里木·热合曼主编:《维吾尔文学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
【126】李致忠:《肩朴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127】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8】蔡景峰、王春林:《〈四部医典〉考源》,大象出版社,1999年。
【129】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
【130】张天锁:《西藏古代科技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
【131】格什克巴图译、策·阿拉腾松布尔、苏雅拉达来注释、孟克宝音拉丁注音:《格什克巴图译元朝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2】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3】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134】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
【135】史金波、中岛干起等:《电脑处理〈文海宝韵〉研究》,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0年。
【136】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37】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38】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139】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1年。
【140】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
【141】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42】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43】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144】王天顺:《西夏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145】黄润华、史金波:《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
【146】牛达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147】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148】中国国家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编:《大夏寻踪-西夏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49】李锡厚、白滨、周峰:《辽西夏金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150】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5年。
【151】林世田主编:《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中的汉文文献释录》,北京图书馆出

版社，2005年。

【152】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文物出版社，2005年。

【153】〔日〕长泽规矩也：《图解和汉印刷史》，汲古书院，昭和51年（1976年）。

【154】〔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

【155】〔波斯〕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

## 四、论文类

【156】冶心：《福建版本史述略》，《福建文化》，1933(2)。

【157】张秀民：《金源监本考》，《图书季刊》，1935年2卷1期。

【158】张秀民：《辽金西夏刻书简史》，《文物》，1969(3)。

【159】金启孮：《陕西碑林发现的女真字文书》，《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合刊。

【160】安瓦尔·巴依图尔：《察合台文和察合台文献》，《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61】刘凤翥、于宝林：《契丹字研究概况》，《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62】张承宗：《金代刻书中心平水考辨》，《苏州大学学报》，1982(2)。

【163】昌彼得：《我国历代版刻的演变》，《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

【164】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上、中、下，《文献》，1984(21,22)；1985(1)。

【165】陈国莹：《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文物春秋》创刊号，1989年。

【166】方彦寿：《闽北詹余熊蔡黄五姓十三位刻书家生平考略》，《文献》，1989(3)。

【167】徐信孚：《广东板片纪略》，《广东文物》下，1990年。

【168】金永田《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考释》，《考古》1991(4)。

【169】彭学云：《藏文雕版印刷浅探》，《西藏研究》，1993(1)。

【170】方彦寿：《闽北十四位刻书家生平考略》，《文献》，1993(1)。

【171】方彦寿：《闽北十八家刻书家生平考略》，《文献》，1994年第1、2期。

【172】程有庆：《宋蜀刻本〈唐六十家集〉考辨》，《文献》，1994(1)。

【173】杨晏平：《宋代的江西刻书》，《文献》，1996(3)。

【174】乌拉熙春：《西安碑林女真文字书新考》，《碑林集刊》第5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

【175】毕奥南:《元仁宗赐书高丽杂考》,《文献》,1998(4)。
【176】黄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载《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
【177】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西藏大学学报》2000(5)。
【178】卢迎红、周峰:《契丹小字"耶迪烈教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1)。
【179】石金民、于泽民:《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2)。
【180】赵志伟、包瑞军:《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3)。
【181】刘凤翥:《契丹小字"韩高十墓志"考释》,《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82】郑晓光:《契丹小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2(2)。
【183】阿华:《藏文手写体本教〈大藏经〉及其相关典籍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02(3)。
【184】唐彩兰、刘凤翥等:《契丹小字"韩敌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2(6)。
【185】照那斯图:《再谈故宫博物院藏蒙古文孝经版本年代》,《事业之路同仁之情-蒙古学学者莲见治雄教授退官纪念文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
【186】史金波:《西夏的佛教信仰和风俗》,台湾《普门学报》2003(1)。
【187】刘浦江:《近20年出土契丹大小字石刻综录》,《文献》2003(3)。
【188】刘凤翥、清格勒:《契丹小字"宋魏国妃墓志铭"和"耶律弘用墓志铭"考释》,《文史》2003(4)。
【189】史金波:《最早的藏文木刻本考略》,《中国藏学》2005(4)。
【190】史金波:《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印刷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二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91】蔡美彪:《平谷元兴隆寺圣旨碑译释》,《考古学报》2006(3)。

# 后　记

本卷书稿第十一章《西夏出版事业概况》，由史金波先生撰写；第二十章《宋元时期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出版业的繁荣》，由史金波、黄润华先生撰写；其余宋、辽、金、元十八章由我撰写，故在文字风格上，叙事表述方式上，内容结构上，节与目的安排上，还是有些不同的。这与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文习惯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两章的内容有异，造成不能与其他章节完全一致。这一点我想读者方家是会理解的。

这一卷书稿交稿于五年之前，在其后的研究中虽有新知，但书稿体例一定，内容不便增删，加之我的计算机技能较差，故几年来并没有大拆大改，致使读完校样连自己也不很满意。特别是有些资料引文的重出，尤其是元代部分，资料重复出现较为频繁，让人生厌。这固然与资料多功能，可以从不同角度使用有关，但本质还是自己用功不够，知识贫乏，使本有别的资料可以替代者，却用一条资料重说。这一点我只能向读者致歉。

另外，在史料引证、理解、运用等方面，在大小背景、因果关系、事物分析等方面，在章节设计、结构安排、内容调度等方面，都不敢说有绝对的把握。近年来，我深深感到年龄越来越大，知识却越来越少，做学问的胆子也越来越小。深感自己一共也没知道多少，却要参与写这么一部书，除坦诚交代力不从心外，就是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方家的有益指正。

李致忠

2007年国庆节


ISBN 978-7-5068-1786-8
9 787506 817868 >
定价：74.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出版通史　4　宋辽西夏金元卷
作者=李致忠著
页数=575
SS号=12211924
出版日期=2008.12